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三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三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



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上编、下编组成。上编各文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下编系根据访问记录整理而成，经过被访问者本人审阅。发表前编者除作了个别技术处理外，其余一切照原文排印。

目　录

上　编

下　　编

上　编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　荣　桓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分，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

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攻，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

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

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联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

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

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

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原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秋收起义前后的片断回忆

刘　型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发展到长江流域。这时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热情极高，要求把革命继续深入和扩大下去，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却极力破坏这个革命，企图颠覆革命势力，维持并巩固其反革命统治。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一方面，政治形势变化得十分险恶，发生了一连串的反革命事变：蒋介石三月中旬在赣州、南昌屠杀工人，三月下旬在安庆屠杀民众，四月十二、十三两日又在上海大规模屠杀工人和革命民众，公开宣布"肃清"共产党，完全揭穿了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但在另一方面，革命势力也在继续扩大深入：武汉革命势力继续向北伸张，南方各省(主要是湖南)农民运动高涨；反对豪绅恶霸，建立乡村农民革命政权，开始要求分配土地；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

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五月二十一日（马日）长沙军阀许克祥的叛变，是反革命势力向湖南革命势力进攻的一页惨史！由于当时的革命领导者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革命势力遭受到重大的损失。随后萍乡发生“六五事变”，醴陵、萍乡的革命势力退入安源（即萍乡矿区）。继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徐州会议后，武汉政府叛变了。我党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路线，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成份，决定了坚持并深入革命的正确路线。与“八一”南昌起义同时，党中央派毛主席来湖南领导农民秋收起义，以恢复并坚持革命阵地。这是中国革命从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到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武汉政变后，卢德铭（团长）同志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该团有二百多安源工人，内有我党员十多名，由高门立同志率领，到武昌后编为一连，由伍中豪同志任连长，于七月三十一日由武昌乘船东下。至中途，得知南昌起义，九江被阻，不能通过，即在阳新黄颡口登陆，开入阳新县城，拟经武宁、靖安至南昌会师。部队行至奉新，得悉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已率部经赣东、福建向东江前进，当时赣江两岸驻有反动军队第三军、第六军、第九军、不能通过。党乃决议派卢德铭同志去南昌探明消息，部队则折回修水（湘、鄂、赣、三省边境）训练，并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为临时番号，以取得缓冲机会，充实力量，整训部队，俟了解敌情后，再决定行动。不久，平江、浏阳一带农民自卫军和湖北崇阳、通城一带农民自卫军相继赶到，即编为第三团，开往铜鼓训练。这时正值毛主席奉党中央命来领导部队行动（卢德铭同志也来），支持农民斗争，以打败反革命势力的进攻，恢复革命阵地，深入发动革命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计划是要实现这样几项任务：（一）革

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分清敌我；（二）组织工农革命军队；（三）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四）推翻国民党反革命政权，建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革命政权；（五）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秋收起义的目的。

毛主席为了领导秋收革命斗争，曾奔走于安源矿工与平江、浏阳、醴陵一带农民自卫军之间。当时反革命气焰甚凶，到处捕捉革命的工农及青年学生，稍有"赤化"嫌疑，即被枪毙。有一次，毛主席（反革命分子并不知道是他）在浏阳文家市被反动的"民团"扣留了。毛主席在被解往浏阳县城不远时，机智地逃脱了。躲藏在一个有深草的池塘里。这时民团士兵到处追寻他，且强迫附近农民搜索他。搜索的人好几次走到他的附近，但终于没有发现，直到夜暮，只好停止搜索。毛主席爬山越岭，走了通宵。没有鞋子，脚被打烂了。经过沿途革命农民的照应（农民也不知道是他），买了一把雨伞，一双鞋子，一些食物，穿过罗霄山脉北段，才安抵革命军队中。当时毛主席到达部队时，身上仅只剩有两个铜元了。

当毛主席到达部队以后，即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资格，召开党的会议，决定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以卢德铭为军长。以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王新亚为团长，任左翼，进攻萍乡（城坚未下）、醴陵（攻下），向浏阳集中。以武昌的警卫团为第一团，另收编夏斗寅进攻武汉被击溃后的残部（流窜在鄂南一带）为第四团，共同进攻平江，为右翼。由农民自卫军编成的第三团，先进攻浏阳东乡白沙市，拟于十二日与第二团会师攻取浏阳。各路得手后，拟定十五日进攻长沙，由城内数百武装同志与数千工人担任内应。不料一、四团进攻平江时，四团叛变，勾结反动军队攻打我第一团，以致攻平江的一路失败。三团闻迅，即停攻浏阳。浏阳反

动军队闻我军在平江失利，即向白沙市我三团进攻，我军稍有损失，退出白沙市，会合第一团后，在浏阳万载之间集体整编。第二团因不明情况，按原计划向浏阳进攻，在东门外遭敌伏击，陷入重围，背城面水，大部英勇牺牲，少数逃散。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失败。

毛主席这时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转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区域建立革命根据地。在一三团会合后，毛主席召集部队训话，以高度的革命决心和信心，来鼓励大家，振作精神，继续沿湘赣边境前进，为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革命政权而奋斗。于是部队立即按照计划行进。但路经桐木、小枧，行至芦溪后，又遭反动军队江定营伏击。我军以情况不明，没有准备，加以暑天行军害虐疾者很多，没有根据地，部队缺乏训练，军纪不良，不能作战，致损失很大，卢德铭同志战死，在这革命低潮的形势下，尽管不坚定的分子退出了革命的队伍，而坚决的勇士们，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毫不动摇地跟着毛主席走。这些同志们以后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中，多数都已牺牲，为人民流了最后一滴血，现在还在的，不过三十多人了。

芦溪失利后，部队继续前进，经莲花到三湾，改编为一个团，然后又经永新、宁冈到达井冈山地区。在这里，毛主席就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革命斗争的新阶段。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军夺取茶陵，第一次成立革命政权——人民革命委员会。以后会合了湘东、湘南、湘赣边农民游击队，特别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会合了朱德同志所率领的南昌“八一”起义的部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会合了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七月在平江起义的部队，于是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声势，就愈来愈大了。

由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关键，其意义极为重大。如果没有毛主席英明的正确领导，在当时革命低潮的形势下，或者盲动冒险，或者退却逃跑，都必然会使革命遭到更大的损失。由于毛主席坚持在湘赣边的斗争，中国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找到了新的发展形式——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且由此发展到今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原载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南昌起义时的警卫团

杨　立　之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反革命向湖南革命势力进攻的“马日事变”以后，我——一个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共产党支部书记，在湖南反动省政府的两个连的搜索下，出走武汉。经湖南区委(当时不叫省委叫区委)介绍，在武昌一个小花园里办公的党中央军委，我初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命我随同当时在坐的陈赓同志去二十四师叶挺同志的部队工作。到了武汉黄土坡二十四师留守处后，二十四师为了成立补充团，命我去湖南任新兵招募委员，随即同由安源工人一百多人组成的一个新兵连回武汉。党就决定我任这个新兵连(当时称第九连)第一排排长。这个工人连的共产党员大约占二分之一左右，加上湖北天门十多个青年学生，又都是共产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党的领导很强。我们二十四师补充团首先组织了一个营（除我们连外，其余几个连都是湖南、湖北两省来的农民及若干做过工农运动的同志），就开始了紧张的暑天练兵。在七月二十几（忘记了日期）的一个晚饭后，我们游历了蛇山回营时，连长黄赞（党员，黄埔学生）通知我今晚有紧急行动，嘱我将全连部队即刻准备好。黄昏以后，我们全营就静静的开往当时（国民政府）警卫团的营房，一天一夜不准一个人出营门，第二天黄昏时，宣布我营编入警卫团为第三营（警卫团原第三营大概因为有守卫勤务而留下）。团长是卢德铭（共产党员）。接着，全

团以迅速的步伐，不到两个钟头的时间，登上了长江中的一艘大轮船。我们三营搭载在船的最高一层。轮船开动了，顿时歌声阵阵，军旗飘扬，舳舻直下，破浪中流，站在船的最高处，远望浩荡长江，其雄伟难以形容。连长秘密通知我说：上级党指示，现在反革命在全国各地进攻革命，武汉政府已经叛变。党的任务仍是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实行土地革命。我们奉命开往南昌去，要与二十四师会合。当时我们这个营尚未全部武装起来，每连只有二三十支用作新兵操练的不大好的步枪。第二天天明后船泊黄石港。由于我们的团长卢德铭同志事先派有一小轮沿江侦察，此时回报九江方面有反动军队布防，不好通过，团长就决定由黄石港登岸，从陆地步行去南昌。当时见到长江中有部队连舟东下，卢团长知系我教导师，亦奉命开往南昌，便发号音通知停止前进。因江宽水急，号音难达，未能阻止，后闻该师经过九江时被反革命军队全部缴械。我军登黄石港后，以两天行程到达阳新县城，向县政府筹发每人十六铜元一百枚。休息一天后，经水路乘了一程船，步入武宁城，跨过九青山脉，进入靖安。我军在城外野营一夜后，继续向南昌前进，进到南昌附近之奉新县城。因连日酷暑行军，战士们非常疲劳，就地休息了一天。这时候得悉南昌起义的部队于我们到达奉新县城的一天，已撤出南昌向南行动了。团长卢德铭同志认为已追赶不及，不得不放弃与大军会合的企图。乃将部队折回，西进到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之修水县城。部队停下来整理训练，命名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当时表面上与江西朱培德办交涉，故称此番号，以取得能在修水暂时休整的时机），我团编为第一团。大概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团于阳历九月九日由修水向平江出动了。我因病月余不能在连工作，师委调我到师部任副官。我到师部后得悉我师准备进攻长沙，一团消灭长寿街敌人后进攻

平江县城。三团经浏阳东门、浒达进攻浏阳县城。据说二团则由萍乡进攻醴陵。三路同时出发，得手后，合攻长沙。师部新制了一百面大红旗，出发第二日在渣津过中秋节，第三日进到龙门厂谁知一到龙门厂传来了前线失利的消息。我仅离开三天的那个连，干部都牺牲与失踪了，全连仅归来士兵三十多人。师部当晚即东折向湘赣两省交界之浏阳、修水、铜鼓地区开进。收容队伍后继续南进。某日在宿营时，我在师长处见到了用五倍子写在几张草纸上面用明矾洗出来的信，信后面署名“毛泽东”。信上谈到第三团在东门作战不利，一团在金坪失败，要师部和一团向文家市进发，与第三团会师。由此我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经过几天行程，我们到达了文家市与第三团会师。毛主席来到师部了，与师长们谈了话出来后，我以万分高兴的心情迎接他到睡的房屋里去了。睡觉的地方，仅仅是一块门板。当时，他穿着老蓝布农民衣服，赤脚穿双草鞋，脚趾已溃烂。我说我早就知道他，在报上看过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问他的脚是怎么溃烂的。他告诉我，脚是由长沙来时爬山烂了的，并带惊奇的说：“你看到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吗？”我说：“看到！你那篇报告对我们在湖南搞农民运动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当时只知道说这句话，还不知道这是正确路线反对机会主义）。他们总说我们‘过火’，实在怄气要命！”第二天，队伍在文家市中一个不大的坪里集合了，到会的只几百人。我也到了会。毛主席出现在部队面前。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对他的出现大家都表现得非常高兴。但因为旧部队中是不准拍掌欢迎的，使大家当时不能尽情的拍掌表示欢迎。他要部队坐下来，向部队讲话。他首先告诉我们国内情况，继而指出这次两湖秋收起义，我们的斗争才开始，打了两个小小的败仗不算什么。我们有湘鄂赣粤已经过组织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在和我们一道与

反革命作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得多，继续勇敢作战，我们是能够胜利的。大家听了都满面笑容。失败情绪一扫空。部队好似有了灵魂，继续向南开进。从此，这支部队就在毛主席亲自指挥教导下，经过无数的残酷斗争，创造了艰苦卓绝的英雄业绩，成为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的钢铁队伍。

在全国胜利、人民解放军空前壮大正在向现代化前进的今天，回忆起三十四年前，我们警卫团由武汉出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因陆路行军延迟了两天的时间，而未能到达南昌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使我不能不深深的追念着我们这支部队中，在以后的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闽西斗争、江西中央红色区域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等战争中，与敌人作过无数斗争而牺牲的无数先烈，怀念着当时领导我们行动，而后来在江西萍乡芦溪作战中牺牲的卢德铭同志，以及在二十四师补充团曾任我营第十连连长，而后曾任红四军三纵队与一军团所属之十二军的领导人，在一九三〇年攻打吉安时战死于安福的伍中豪同志（共产党员，湖南耒阳人，北大学生，黄埔军校毕业）。从武汉出发的千余同志中，至今还生存的只有十人左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正确的领导与军事指导及全国人民支持而赢得的，也是我们无数烈士拚命牺牲流血所筑成的。

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纪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

谭 震 林

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九二七年九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到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地区，挺进赣南、闽西为止，先后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曲折的胜利斗争。正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最初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土地革命的纲领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正确思想，奠定了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对无产阶级建党、建军、建政的学说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又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个毛泽东思想的鲜明特点，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给我的感受是很深的。

（一）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

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毛泽东同志提出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著作中都是找不到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的空前创举，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没能提出这样的理论。甚至当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创见已为斗争的实践所证明，党内还有不少人反对这个理论，斥之为"农民意识"、"保守主义"等等。他们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醉心于城市起义和攻打大城市，继续幻想由此迅即夺取全国的胜利。

这是为什么呢？

根本的区分就在于，他们只是从"本本"出发，脱离具体革命实践；而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把革命的理论当作教条，他总是注重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洞察现实的客观规律，并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在实践的检验中更深入更全面地去把握客观规律。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它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光辉的典范，是我国人民的丰富革命实践的历史性的总结。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同志就坚持从实际出发，重视实践对认识革命真理的作用。辛亥革命后的旧中国，政权落入以外国帝国主义为主子的封建军阀手里。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利于封建军阀的分裂和混战。"有权者自立为王，有枪者各霸一方。"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政治局面。中国向何处去？不能不成为广大爱国青年昼夜萦怀的问题。为了追求救国的真理，毛泽东同志早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就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并利用假期，在一九一七年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县进

行社会考察，了解城乡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一九一八年秋他赴北京，中途在河南郾城农村又作了调查。五四运动期间，他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曾组织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自己却留在国内，立意多了解和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在党成立后，他在革命实践中不但领导过工人运动，还领导过农民运动，先后主持了广州和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七年初，他回湖南又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对农村有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农民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有着深切的了解，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也十分熟悉。因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很快就具有深刻的正确的见解。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农民群众，而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陈独秀又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招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早在"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在武汉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就曾号召：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主张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夺取政权。他指出，民众运动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须知政权是枪杆子里出来的。当时，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是极其深刻的历史结论，说明在敌人十分强大的城市，我党领导的暴动多次失败后，他已从实际中认识到应当把革命的希望从城市转向广大的农村，认识到农民及其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秋收起义后，他在文家市召集受到挫折的部队，坚决制止了再次攻打

长沙的主张，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进军，这决非偶然。当时井冈山上王佐、袁文才的农民武装队伍就是"绿林朋友"。毛主席曾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毛主席还让我们讨论，王佐的武装在井冈山能长期存在，我们有党，有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什么不能存在呢？军阀能割据，为什么我们不能割据？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途中，在宁冈举行了著名的"古城会议"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上，毛主席指出，我们要作战略性的转变，千百万群众是我们的基础，要以罗霄山脉中段为依托，建立后方，轻装上阵，还要建立地方武装，收缴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有了群众和地方武装，我们的军队就不会孤立。毛主席还说，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六县，境内井冈山地势极为险要，还有九陇山等重要屏障，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边界六县盛产稻米、油、茶、木材，群众基础又好。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中国的形势会有大的转变，广大农村是海洋，我们象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意义决不限于六县，对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是有很大意义的。

可见，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的形成，跟他通过实践对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特点不断加深的认识，完全分不开。他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一九二六年大革命以来的惨痛革命教训，认清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革命的武装斗争，也主要是农民的武装斗争；认清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城市敌人的力量强大，而广大的农村则敌人力量薄弱，在经济不平衡、政治不统一、各地军阀竞相割据的局面下，边界地区农村敌人的力量尤其薄弱；这

样也就必然得出任何本本上所没有的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崭新结论。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终至燎原，这就表明，如果毛泽东同志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不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二）

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形成自己的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新的实践经验丰富某些旧的原理，使之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同时还用新的原理取代为实践证明不再适用了的个别旧的原理，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生命力的所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党的领导下，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去推进红色政权的建立和红色区域不断发展的思想，以及土地革命的纲领、根据地政策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制定，同样是马列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进军井冈山后，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的问题也是有一个认识上的不断提高和深化过程的。

记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开始只由部队派谭梓生同志去担任县长，其他人员还是用旧的办法，仍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还靠商会，群众十分不满。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立即指示改变做法。后来，茶陵县工农兵民主政府成立，我被选为主席，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分派人员到城郊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赤卫队，但没有来得及分田地。不久，敌军压境，我军撤退，茶陵县重被敌人占领，当地赤卫队

二百多人也只好上了井冈山。在茶陵，我们取得打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经验。但茶陵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则土地革命便无法开展，农民群众也不可能充分动员起来支持革命，已经占领的地方既保不住，到头来即使建立了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所以，后来我们攻占遂川、宁冈、永新等县，建立县工农兵民主政府后，就着手抓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抓成立县、区、乡各级地方武装；抓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抓发展生产，开办学校（小学）；帮助群众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一九二八年一月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时，毛主席还主持制定了施政大纲三十条，相当完整地体现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地区和后来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建设的初步蓝本。但一九二八年四月以前，边界土地革命还未深入，三月间湖南省委又将正规部队调往湘南，致使边界陷敌一个多月。这再次证明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对于红色根据地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四月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砻市会师，成立红四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政策，这才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井冈山的斗争》）很快就使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鼎盛的时期。以毛主席亲自率领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团并且各县干部大力经营永新为例，半个多月内分兵发动群众，建党、扩军、成立红色政

权，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后来红军大队前往湘南，敌人十一个团进攻永新，毛主席仅以三十一团一个团的兵力，充分依靠地方赤卫队、暴动队和广大群众，坚壁清野，用四面游击的战术，将敌十一个团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达二十五天之久。一九三四年在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总结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时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就是为了创造敌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保证我们能以人民战争去战胜敌人，保卫自己，使红色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在井冈山初期，我们非但对建立根据地红色政权没有经验，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也缺乏经验。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善于从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正确理论，因而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参加领导。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也由于党的支部没有建立在连队上，党没能完全掌握军队，因而在敌人的压迫下很快失去了大部分军队的领导权。有鉴于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普遍建立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使之形成连队坚强的战斗堡垒。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三湾改编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整顿了行军纪律，强调部队要做群众工作，奠定了我军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传统，有力地反对了当时部队中严重存在的军阀作风和单纯军事观点，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对部队进行了初步改造。一九二七年

十月，毛泽东同志在荆竹山第一次宣布我军的三大纪律。同年十二月从茶陵回师砻市，毛主席又总结经验教训，正式提出和宣布了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后来在桂东沙田，毛主席又针对实际情况，再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并添加了六项注意（一九二九年到闽西又发展为八项注意）。此外，井冈山斗争还首创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暴动队三结合的我军体制。所有这一切，也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这些原则，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得到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阐明。这个历史性的决议，成为我们建党建军的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献。

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的建军原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同样是找不到的，但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拘泥于任何教条，紧紧从实际出发，从革命实践的经验出发，他才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无产阶级的建军学说。这些原则的贯彻执行，使我军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成为党所领导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从井冈山时期起，军队就不但打仗消灭敌人，而且从事筹款、生产，帮助地方建党，发展地方武装，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地方革命政权，从而成为完成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最重要的柱石，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

井冈山地区地域广大，地形复杂险要，群众条件又好，十分有利于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毛主席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就是在井冈山斗争这样特定的条件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著名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

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都是在当时粉碎敌人三次围攻的多次战斗中，鉴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总结和丰富起来的。秋收起义队伍进军井冈山途中，在芦溪突然与强敌遭遇，不及退避，造成很大损失。总指挥卢德铭同志牺牲。后来，到了砻市、茅坪，值湖南敌人因湘桂军阀混战，将反动军队大部调离边界各县，我们就乘虚攻取茶陵。等湖南强敌压境，又退回井冈山，向军力薄弱的江西遂川进攻，打垮反动地主武装，一举攻克遂川。当我军主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时，赣敌朱培德部一个营在反动地主武装配合下占据了宁冈新城。毛主席一面指示宁冈、永新等地暴动队、赤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一日数惊，疲惫不堪；一面集中主力回茅坪休整后，深夜急袭新城，次日一战全歼守敌。这些战斗就初步创造了运用十六字诀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成功战例。毛泽东同志当时曾对部队说到井冈山以前一个“山大王”朱聋子的故事。朱聋子曾讲，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他还说：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兵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去向，就得重新调查。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象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打我叫你打不着，我来打你一定把你吃掉。其后著名的龙源口战斗，我军先是向西佯攻酃县，诱引不知虚实的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深入，而后绕一圈子，突然回师东进宁冈新城，占领新、老七溪岭有利地形，经过一天鏖战，全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又乘胜猛追四十里，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还有一九二八年八月间困敌永新的战斗等，也都证明了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

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就土地革命来说，井冈山斗争初期分田，按中央的指示，是没收一切土地，以村为单位按劳动力分配。但这样做，第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不利于联合中农阶层；第二，以村为单位，穷村、富村所分田地的肥瘦多少，势必悬殊；第三，按劳动力分配，则人口多劳力少的户就无法养活家口。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就修改办法，改为没收公共和地主的土地，兼按人口和劳力，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这样做，得到群众的拥护。在这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确立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后来在兴国颁布的土地法就比井冈山时期的第一部土地法较为完善和切合实际。"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也是毛泽东同志后来有鉴于实践的经验而提出的。因而闽西、赣南的土地革命就进行得更为顺利。

（三）

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发扬民主，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和做实际工作的下级干部的意见。他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模范。凡召开会议，作出决定，他都要先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沟通上下情况，集中群众智慧，然后才作结论。要是会上同志们不发言，他就很不高

兴，常常先宣布休会，让大家回去先就所讨论的问题再作调查研究。平时，他非但规定部队每到一地都立即调查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填写调查表格，而且常常亲自作调查。在井冈山他就作过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到赣南、闽西又作过寻邬调查、兴国长冈乡调查和上杭才溪乡调查。为了了解实际情况，他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找实际工作的中下级干部和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各色人等，召开调查会，向他们请教。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严厉地批评那些犯有本本主义错误的同志，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实践，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正是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生动表现。而主观和客观的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正是一切机会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同志由于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他也就敢于并善于反潮流，敢于并善于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队伍中存在林彪一类的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右倾悲观思想，还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以及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等思想和干扰。当时湖南省委所执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干扰尤为严重。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南省委取消前委，解除毛泽东同志前委书记的职务，要他随军挺进湘南，策应湘南暴动，造成了边界根据地的大部被敌人攻占和破坏。同年六月底，正当红四军成立后，连续打胜仗，边区红色区域发展到全盛的时期，湖南省委又派杜修经到井冈山，勒令红军向湘东湘南挺进。结果又造成了湘南八月失败。这两次毛泽东同志都事先提出正确意见，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湘敌兵力强大，未可轻动，而赣敌比较孱弱，红军应

该着重向江西发展。特别是六月三十日于永新召开的前委、军委和各县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决定抵制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并由毛主席亲自起草信件，向省委申述正确的意见，主张红军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继续巩固和扩大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由于杜修经一意孤行，乘红军主力到了湖南酃县，而毛主席又远在永新之际，导扬红二十九团不安心经营边界根据地，思返湘南家乡的错误意见，强迫军委领军南下攻取郴州，结果造成红二十九团惨败，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同志牺牲。早在湘南暴动时期，“左”倾盲动主义者便提出“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的口号，鼓吹要把“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湘南暴动在湘南特委推行这条路线的影响下，一度乱烧乱杀，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地区就坚决抵制了上述盲动主义的主张，没有乱烧乱杀。杜修经来到砻市，责怪我们何以没有把砻市烧掉。毛泽东同志说：房屋可以住人，为什么要烧掉呢？始终没有烧。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毛泽东同志还颁布了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草林圩和大陇的圩场，在交流物资，活跃经济上，当时就起了重大作用。这样就有利于争取和团结中间阶层。在党内生活中，毛泽东同志说：我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多数不同意就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在井冈山时期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表现了既坚持正确意见，决不盲从错误的领导，但又遵守党的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典范。

（四）

井冈山的斗争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篇章。在毛主席领

导下，井冈山所开辟的道路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也是全世界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道路，在井冈山斗争中，我们可以生动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作为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正是依赖于实践，并且为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实践经验的丰富，毛泽东思想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形成的正确思想，在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向前推进了。

毛泽东同志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还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主席的这些话，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光辉写照，也是全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光辉写照。

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

陈 伯 钧

找党，找革命军队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部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了震惊全国的武装起义。革命武装的起义，原定在八月十三日，待驻在武汉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到达南昌后举行。由于情况发生了紧急变化，八月一日清晨二时，南昌城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率领驻在南昌的革命部队，发动了武装起义。

南昌已经动手了，我们教导团还没有得到通知。我们仍按原计划从武汉登上大木船，急匆匆顺江赶往南昌。

还是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到武汉以后，黄埔军校五期（政治大队特科大队的一批学生，其中有许光达、张宗逊等同志），从广州迁移到武汉，又在武汉，重庆等地招考了一批学生，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后又改称中央军事学校第六期）。我在重庆报名投考，被录取，后来到武汉入校。开始蒋介石是校长，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江西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国民党军队残杀，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反革命的面目已很明显，学校即由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当时校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有汪精卫、谭延闿，邓演达、侯连

瀛、恽代英等五人。其中只有代英同志经常住在学校，事实上一切工作都由他直接领导。学校里的共产党员相当多，一个连一百二十几个人，约有二、三十名党员；连国民党连队上的区分部，三个委员中，就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剩下的一个还是国民党的左派。学校的党组织在代英等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力量坚强，组织也比较严密。大部分同学都能团结在党的周围，革命热情非常高昂。因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成为当时武汉革命群众运动的先锋和骨干。陈赞贤被残杀的事件发生时，同学曾到国民政府请愿，甚至提出了“愿为讨蒋先锋”、“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自然，这些在当时脱离实际而又过“左”的口号，很快被党组织纠正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代英同志，在同学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当同学们提出“愿为讨蒋先锋”、“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代英同志临时集合请愿的队伍，讲话说：“你们现在喊这个口号喊不得，容易闹出误会。你们喊‘打倒蒋介石’，‘打倒’这是直接行动的口号。蒋介石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国民政府还未解他的职，你怎么打倒？”代英同志的意见就是要我们改变一下提法：赣州残杀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应由江西军事领袖负责（当时蒋及其总部正在南昌）；就是要我们少喊空洞口号，有策略地进行斗争。同时，代英同志还经常告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搞革命、搞武装。记得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湖北咸宁打夏斗寅时，他曾给我们讲过一次话，大意是：你们毕了业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专做政治工作人员。国民党军队有什么政治？争取工农群众的时候，他要我们；不需要工农群众的时候，就一脚把我们踢开。给几个盘缠，叫你走路。这还算是好的，留点面子，搞不好就杀头或者关起来！……讲到这里，他问我们：“你们是想做这样的政治工作人员呢？还是当个排长，带上三四十条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帮助下，举

行了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清党”，我们在学校里也“清党”，蒋介石清的是共产党，我们清的是国民党右派。我们手中有枪杆，谁胆敢在学校里反对工人阶级、反对共产党，说工农群众的坏话，我们就关他们的禁闭。当时学校的禁闭室关的，差不多都是政治犯。此外，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也非常高涨，打土豪、分田地，在湖南醴陵，农民把当时国民革命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老太爷抓了起来，戴高帽子游街。何键当时正住在汉口及鄂西一带，气得咬牙切齿，大贴标语要“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并挖空心思想缴我们的械。为了防止被何键缴械，我们只得以“打野外”为掩护，将队伍开到武昌市郊躲了半个月。到了宁汉准备合作之际，由于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的力量扩大、增强，四集团军所辖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感到很大威胁，于是张郎利用汪精卫改组派的活动，积极收罗兵马，企图回广东搞个天下。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为了避免被何键缴械，党又正在准备武装起义，加上叶挺同志的十一军、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名义上都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建制，为更好地配合起义，于是，我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了。

张发奎这个反共家伙，又阴险，又恶毒，当我们临离开武汉时，他把我们手中崭新的汉阳造七九步枪，连刺刀带子弹全部换走了，换回来的都是第二次北伐在河南缴获东北军官双英部队的破旧的三八式步枪，而且每人只有四排（二十发）子弹。不要说我们忿忿不平，就连张发奎的参谋长谬培南也说：“子弹再不能少了，少了他们路上碰到土匪都没有办法啦！”

警卫团在前，教导团在后，乘着缓慢的大木船驶向九江。在当时极端混乱的环境中，又没有通迅工具，警卫团没有和我们联系上，他们中途得到消息，就在黄石港上了岸，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去了。而我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闷着头继续向九江

赶。

八月四日，大木船摇摇晃晃地来到了九江。我们的船只刚刚靠拢太古码头，忽然发现沿着江岸排列着许多重机枪，枪口分别对准了各条木船；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气势汹汹地监视着我们。我们这才发觉：中了张发奎的埋伏！不一会儿，张发奎派人来了，要我们放下武器上岸。听说要我们缴械，群情顿时沸腾起来。然而，木船漂泊在江上，跑不了，打不得，人心惶惶无主，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人们咒骂着，愤怒地把枪支砸毁，把子弹投入滚滚江心；自然，也有人在唉声叹气，嘴里嘟嘟哝哝地埋怨着。终于被解除了武装。

上岸后，我们被送到九江第四军的陆军医院附近露营。张发奎来了，召集我们讲话，开口就说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一向是拥护的”。这立刻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表示欢迎他“联共”。但是，接着他就说什么这次他同汪精卫从武汉到九江来，中途发现有“共产党的阴谋……”。听到这里，人群骚动了，再没有人去理睬他那些胡说八道了。

当晚，我们就在陆军医院附近露宿。这里林木葱郁，风景优美。我们八个人一堆，十个人一伙地围在大树下休息。我与大家的心情同样很苦闷：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又找不到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连身上的武器也没有了。怎么办呢？真是前途渺茫呵！正在这时，刘梦笙同志找着我，领我来到一棵僻静的大树下，轻声地说道：“九江的地方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了，接不上头。我们想，趁这个混乱的机会，逃出这里，到南昌去找贺龙、叶挺同志的部队。你干不干？”

刘梦笙和我同是四川人，一起在万县师范学校读书，又是兰交兄弟。我们同时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前，为了继续革命去找自己的党，找自

己的军队——贺龙、叶挺同志所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为什么不干呢？于是，我们暗中约了七、八个同志，在漆黑的夜色中悄悄地溜出了宿营地。

天将拂晓，我们一行七、八人来到了江边，装着洗脸漱口。一个同志暗中找来一只小船，看看四周没有人注意，大家纵身跳入船舱，立刻离开江边。急忙忙将小船摇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在船上脱掉军衣，摘去军帽，算是伪装好了，随即拿上洗漱用具，弃船上岸而行。沿南浔铁路南行，有被张发奎的警戒部队盘查和扣留的危险。于是我们决定走小路，沿瑞昌、德安、永修向南昌兼程前进。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起义部队于八月五日全部离开南昌城南下了。

天色大亮了。我们互相看看身上的装扮，未免担心起来：七、八个人一律光着头，没有留头发，由于长期戴军帽，晒太阳，额头上半截黑半截白，而且黑白界限分明。上身穿着军用的衬衫，下穿短裤，穿一双黑皮鞋，这哪里象个走长路的？既不象是老百姓，又不象是学生，更不象个生意人。我们心里也明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当兵的。大家立刻商议好：沿途如果遇到军警盘问，就说是外地读书的学生回家，路上被散兵抢了，所以落得如此模样。当然，在比较有经验的警察面前，还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好在这些人也是当差混饭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处在兵荒马乱、散兵游勇的局面下，也不敢怎样惹我们。

我们一路行来，沿途不断地打听消息。情况愈来愈不妙，张发奎的队伍已经进驻永修，进驻南昌。南昌起义的革命武装，听说已经向抚州方向开拔了。……张发奎到了南昌。我们是不能再去南昌的了；而抚州方向的去路，又被张发奎的部队截断。怎么办呢？到哪里才能找到党？怎样才能赶上自己的军队呢？大家心里又焦急，又愁闷。同行的八个人中，除了一个

汀州人，一个赣州人，其余六个都是四川人，真是走投无路，人生地不熟，一个个干瞪眼没得办法。最后，大家只好同意了赣州人的意见：向他的家乡走，找个落脚处，同时一路上继续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消息。

大路上，车马骡轿络绎不绝，行人很多，有开小差的士兵，有辞职返家的军官，也有发了洋财的贪官污吏……我们八个人夹杂其中，不顾疲劳地长途奔波。但不管怎样，我们的决心是毫不动摇的：一定要找到革命军队，一定要找到党！除此之外，我们再没有出路了。

这天，在去高安县的途中，遇到一个身穿夏布长衫的人。他怀疑地看了我们一会儿，便照直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他是黄埔军校四期的老同学，根据我们身上的穿着（黄埔军校发的衣服从来都是一样的）、行动，以及额头上的上白下黑种种迹象，看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并问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好回避隐瞒了。我们看看面前的陌生人，他虽然换了便衣，而且装扮比我们强多了，仍然感觉到他是一个军人，态度很是诚恳。于是我们就说出了真实来历。他听了以后，指点我们一条出路，要我们到高安县城去找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的聂思琨同志。他留下一个地址，就和我们分手了。

得到这条线索，我们的精神大为兴奋，急忙赶到高安，顺利地找到了聂思琨同志。我们把从武汉出来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请他帮助我们想办法。他考虑以后，把我们六个四川同志编为一个临时支部；汀州和赣洲的两个同志，因为离家乡不远，便让他们回家乡工作去了。

这时正是八月中旬。高安城里的空气特别紧张，人心惶惶，到处散布着流言蜚语，街上张贴着国民党第六军十八师的条子，说他们的部队很快就要开到高安来了，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为此确实捏了一把汗，躲在城里整整两天不敢

出头露面。后来才弄清楚了，这是国民党县政府搞的鬼。他们惧怕二十军（军长贺龙同志）的独立团进驻高安，故意摆了个“迷魂阵”，虚张声势，企图借此阻止独立团进城。独立团一经查明真相，当即开进高安城，把国民党县政府的官们抓了起来，缴了反动地方武装的枪，高安城雨过天晴，人们为革命军队的胜利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几个人更是怀着激动的心情，由中共高安地委正式介绍给独立团。我们这几个离群失散的孤雁，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回到人民军队里来了。

毛委员来到我们部队

二十军独立团，是由湖南党领导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马日事变”，军阀许克祥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大量屠杀工农群众。这时，平江、浏阳等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打长沙。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情况，未能进攻长沙城，退了下来。他们一边寻找上级党联系，一边整编队伍。队伍编起来了，需要有个名义，他们就打起贺老总的招牌，叫做二十军独立团。张启龙同志任组织委员。南昌起义暴发，他们想去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但是贺龙、叶挺同志率领大军出发已久，联络不上。他们沿途又遭到一些挫折，和反革命武装的阻挠，便一边派人继续寻找上级党的关系，一边转战在湘赣边。

几天后，独立团从高安出发了。沿途与少数散匪进行了一些战斗，经上高、宜丰到达了铜鼓。这是一座僻静的山城，约有二、三百户人家，并没有城墙，也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只有几个祠堂还比较宽敞一些。有名的肖家祠堂就是我们团部的所在地。肖家祠堂的前面，有一条小河，我当时在新兵训练处工作，就住在小河对面的另一个祠堂里。

我们独立团在铜鼓休整近一月。这期间，从武汉赴九江途中在黄石港上岸的警卫团，转移到武宁、修水，和我们联系上了。在山口——铜鼓、修水之间的一个小镇子，召开了“山口会议”。独立团原来只有一、二两个营，会后补充了我们一个营，由伍中豪同志率领编为独立团第三营。

正在这个时候，部队中发生了一件激奋人心的大事，毛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只身从湖南来到了部队！毛委员的头发很长，上身穿白线褂子，下身穿白细布长裤，脚穿草鞋，手里还拿着一件短上衣。听说，毛委员在来铜鼓途中，曾经遇险，一度被敌人扣留，所幸身上带了几块钱，才设法得以脱身，来到部队。记得正是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团部召集排以上干部，在肖家祠堂举行会餐。饭前，毛委员和全体干部见了面，并且讲了话，说党很怀念大家，关心大家，他特地来看望大家。毛委员接着为我们阐述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号召我们举行秋收起义。

过了中秋节，我们就出发了。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原警卫团改为第一团，以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我们独立团改编为第三团，第四团则是收编军阀夏斗寅的残部。部队的任务是总攻长沙，计划是：一、四团由修水出发，先打平江，再攻长沙；二团自萍乡、醴陵先打浏阳，再攻长沙，三团从铜鼓出发，与二团的同志打浏阳，会攻长沙。

我三团首战攻克白沙市。这天刚拂晓，老百姓还没有起床，街旁商店门前的洋油灯，仍然闪烁着黯淡的微光。毛委员从湖南来部队时，长途奔波，历尽艰险，脚被草鞋磨烂了，不能行走，我们临时找张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走。这时已是九月中旬，天气渐凉，毛委员身上那件细布短褂，自然抵不住仲秋的晨露，只好披上一件白布夹被御寒。我团顺利地占领了

白沙市，毛委员非常高兴，称赞我们旗开得胜，马到功成，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

这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缺乏弹药，没有给养，三分之一的战士患疟疾，打起摆子来，不用说打仗冲锋，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当时，党的绝对领导还没有树立起来，革命的武装斗争也还没有经验。我们到达东门市时，部队很疲劳，突然遭到敌人强烈火力的袭击，我团败退排埠。王新亚同志率领的二团，因不明情况，孤军向浏阳进攻，并占领该城。敌人在东门市击败我团后又回头打浏阳，遂使二团陷入重围，背城面水死战，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了。至于打平江的一路，前面刚到长寿街与敌人打响，未经改造的四团便发生叛变，勾结反动军队前后夹击一团，一团也垮下来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失败了。我团退至文家市，才与一团会合。

部队被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受到挫折。在最艰难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坚定、沉着地出现在部队面前。他讲话说，我们不要怕失败，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次长沙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事还要继续干。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革命进行下去！……毛委员的话，坚强有力，驱散了同志们心头的阴影，再一次鼓舞了我们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念。毛委员在文家市收集了败退下来的部队，向南退却，当通过芦溪时，又一次遭到敌人的伏击。剩下不到千把人了。到达永新县三湾，毛委员毅然决定改编部队，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整顿纪律、原来一个师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下设一、三两个营，没有第二营。毛委员同时宣布：凡不愿意留队者，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让他回到农村去工作。这样，留在革命部队

的同志，便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了，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在毛泽东同志胜不骄、败不馁，意志坚决，毅力顽强的伟大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影响下，向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沿着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阔步迈进！

毛委员建立军事根据地

这时全国处在革命的低潮，反动势力十分嚣张。土豪劣绅提着几杆土炮鸟枪，竟敢于埋伏在我们行军道路两旁的山上，躲藏在茶树林里袭击我们，截堵掉队落伍人员，灭绝人性地残杀革命志士。我亲密的战友刘梦笙同志，就是由于东门之战腿部负伤，转移时失去联络，被反动派这样杀害了。敌人这种残忍、恶毒的罪行，只能激起我们更大的愤怒，坚定我们的革命意志。

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必须进入大海，才能有所作为；猛虎，不能呆在平川，必须依靠高山密林，才能威震山峦。毛委员亲自率领我们这支小小的红军队伍，进入了宁冈地界。

井冈山上有两股地方武装，他们的头目一个是王佐，一个是袁文才。袁文才过去是个中学生，大革命时当过赣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退居宁冈一带，编了一个营的武装，自立为王。毛委员经过研究，认为袁文才参加过大革命，和统治阶级有矛盾，可以争取和改造他们。于是给袁文才的部队补充了一百条枪，决定把伤病员留在宁冈休养。几天后，毛委员率领我们离开宁冈的古城砻市，向湖南酃县之水口方向前进。

在水口，部队一面整休，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毛委员对于我们这支小红军要找个立足之地，时时刻刻悬念在心。这

时，他决定派游雪程、徐彦刚同志和我三个人，到袁文才的部队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帮助他们练兵，培养革命干部，借此打下后方根据地的基础，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临离开部队时，我们去见毛委员。那是在一个祠堂里，神龛脚下铺着稻草，毛委员坐在地铺上，简单地向我们交代了几句：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文才）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的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我们随着袁文才派来的交通，身上带着武器，经过两三天的行军，到达袁文才的营部所在地——井冈山脚下的"步云山"。

"步云山"是一座大庙，位于半山腰上，可以住下一个营。庙门前有一块大坪，可作练兵的操场。大坪的下面就是阶梯式的水田。一旁是山。山上松杉成林，茅草丛生，不易攀登。庙后直通山上。这里确实是个"安营扎寨"，便于警戒的好地方。从山下来的人，离很远我们就可以发现，若想接近庙宇，必须在大坪前面绕很大的弯，才能上来。如果发现敌人，我们守可以踞高临下打击敌人；退可以掩护主力从庙后登山。而且一有敌情，老百姓会及时通知我们。这正是井冈山附近群众与当地军队关系密切的具体表现。

我们刚到"步云山"，还没有正式到连上去工作，山下传来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的消息。袁文才营部的人就领我们来到一个更加荒僻的山沟茅屋"打埋伏"。"打埋伏"，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新名词，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敌人一来，我们就暂时躲避一下；待敌人走后，我们再出来活动。这在当时就叫做"打埋伏"。此番，我们被"埋伏"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没有地方睡，四个人挤在一张木床上。十月间，山区正是秋收时节，早晨起来，喝一碗米酒，（江西人用糯米蒸酒），吃过早饭，就拿根棍子随房东老头到打谷场上。房东老头除了供给我们吃喝外，什么话也不问我们，这大概是袁营长预先交

代过的吧。敌人走后，我们回到“步云山”，当即集合人马，操练队伍，以待时机。

不久，毛委员上了井冈山。原来，我们三人在水口离开部队以后，毛委员便率领团部及一、三两营向大汾移动，在大汾与反动地主武装——江西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肖家璧打了一仗后，团部和一营就上了井冈山。第三营由张子清、伍中豪两同志率领，后来听说，他们打了两个反冲锋，夺回了一、两个山头，但因与团部失去联络，便将部队带到湖南桂东县的鹅形整休。以后他们与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系。一直到十二月，在茶陵县与敌第八军独立团作战时，他们才归队回到团部。

毛委员率团部和一营在井冈山上整训休息，巩固部队、加强战斗力。同时趁机消灭小股的“靖卫团”，发动群众打土豪，解决给养问题。这时，我们的心里都踏实了，觉得有了个家，军队可以养精蓄锐，进退自如了。

井冈山周围数百里，人烟稀少，土地不肥沃，粮食很缺乏。山上虽然有不少竹木山货可以换取粮食及生活用品，但是敌人封锁，贸易往来完全断绝。部队多了，不能在此久呆，这时茶陵恰好是坐“空城”，没有敌人的正规军驻扎，只有当地“挨户团”团总罗定的几百人。（当时江西的反动地主武装叫做“靖卫团”，而湖南的反动地主武装则叫做“挨户团”）我军奉毛委员命令，稍整休后、顺利地进占了茶陵县城，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相继建立了工会、农会、赤卫队等群众团体和群众武装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浪潮。

正在这时，一名穿着国民党军官衣服，佩带着国民党正规军符号的人，来到了茶陵城。在他的证件上，注明系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副官，名叫覃泽。一经盘问，原来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的胞弟毛泽覃同志。他把泽潭二字颠倒过来，除去潭字的三点水，作为他的化名。他是从朱德，陈毅同志那里来井冈山取联络的。我们随即派人送他到井冈山去见毛委员。与此同时，正在桂东县鹅形的我团三营，也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说他们不久就要带上部分被服、弹药来茶陵归队。我们驻守茶陵的部队，后来又与本地“挨户团”团总罗定的反动武装较量过一两次，我们不但打败了他们，而且把县城守住了。这时的形势对我军来说，较之上井冈山之前沿途挨打的状况是大有好转了。

茶陵城距离井冈山一百多里路，前后方的交通联络十分不方便，中途又有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和阻挠。为了保证前后方的交通联络，掩护、接送来往伤病人员，我们这个连没有暴露红军的身份，利用袁文才与当地绅士的关系，驻扎到宁冈与茶陵之间的地区，名为维持地方治安，实则暗通消息，维护我军的前后方交通联络。这里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插曲——

一天，我连驻地的士绅忽然大惊失色地跑来报告，说是红军来了，要我们赶快准备一下。为了查明情况，同时也为了应付这些士绅，我们当即将队伍拉出来。袁营长和我几个人跑在前面，想瞧瞧到底是谁，便登上桥头观看，发现是井冈山上休养痊愈的伤病员，去茶陵归队。他们知道这里是袁营长的部队，觉得从这里通过更安全些，于是就不打个招呼闯过来了。伤病员中有的认识袁营长，见他站在桥头，还向他立正敬礼一番。袁营长为了应付当地士绅，只好督促他们快点通过。至于后来袁营长如何向当地士绅交代，我们就不大清楚了。不久，我连撤回了井冈山。

毛委员挽救了革命的危机

秋收起义前后，毛委员由于长途跋涉，脚被草鞋打坏，脚

背上烂了一个洞，一直没有痊愈，不能够随军去茶陵，留在井冈山一面养伤，一面研究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领导革命战争问题。他对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刘辉霄做了许多工作；并向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以及被敌人赶到井冈山上来避难的中共永新县委刘珍，王怀等同志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把土、客籍的共产党员团结在一起；经过调查研究，他还指示了在一定条件许可下开展地方工作。毛委员利用一切空隙时间，阅读了很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书籍。我们连回到井冈山以后，毛委员经常深入到我们连队里，和战士们一起交谈。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都会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我们领会毛委员的意思，是鼓励我们学习本事练好兵，积极壮大革命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总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已经在英明领袖的头脑中形成了。

待脚背上的伤口略有好转，后方的工作又有了一定的安置，毛委员当即决定下山，赶上红军大队，抓住时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

记得是十二月的一天，毛委员亲自找我谈话，说他要下山到茶陵去赶大队，要我负责护送。能和毛委员在一起，而且是到前方去，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当即带了一个班的战士，随毛委员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毛泽覃、黎猷教两同志以及随从人员。第一天，走了六、七十里路，夜宿茶陵县境坑口圩。这里的农会已经成立，我们进村时，农民们正在开会，分土豪的东西。我们为了保密，加之经过一天的徒步行军，确实有些累了，没有过多地打听消息，便找地方住下来。

次日，估计当天可以赶到茶陵城，就决定让袁营长派来护送毛委员的一班战士，回井冈山归队。当时我还有个打算，不

愿意老呆在井冈山后方，想跟随毛委员回大部队工作，故将带来的一个班战士打发回井冈山，自己设法留下来了。我们一行八、九人，紧赶慢赶，离茶陵城还有二、三十里路，就听到茶陵方向传来激烈的重机枪和步枪声。我们摸不清情况，好在茶陵周围的群众都组织起来了，沿途有农民赤卫队放哨，我们一边询问情况，一边继续前进。不久，夜降临了。我们既没有夜间通信联络的信号，又不知道部队的口令，更不知茶陵城打了一天仗，情况究竟有何变化，不好轻易乱闯。毛委员决定在茶陵东南五、六里地的小村子里暂且住下，由赤卫队派人到城边去打听消息，探明情况。

吃过晚饭，我们准备休息了。毛委员对大家说，赤卫队派人去城边打听消息，还没有回来，他们虽然在村子周围放了哨，我们还是不能疏忽大意，我们几个人最好轮流放哨。大家立刻商议轮流放哨的次序和时间，毛委员把他和我两个人安排在下半夜到拂晓这段时间，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夜已深沉。枪声逐渐稀落、疏远。战斗的结果怎样呢？这个问题一直回旋在我的脑际。根据傍晚传来激烈的枪声判断，敌人不会是“挨户团”团总罗定的队伍，他们是没有重机枪的，也许是茶陵的土豪劣绅班来了敌人的正规军，向我们进攻。当然，茶陵城内我军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一营驻守近一个月，打过两次胜仗，既熟悉了地形，又获得了战斗经验。现在生力军第三营赶来会合，武器弹药都有了相当的补充，再加上工农革命群众的支持，必然会使敌人大吃苦头。

这时，几名到城边打听消息的赤卫队员回来说：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被拆掉了。再问他们别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浮桥是被谁拆的呢？这更加使我感到迷惑了。莫不是我们部队自己拆的？这似乎不大可能，从茶陵城到井冈山，东门浮桥是必经之路，为什么把它拆了呢？难道他们竟连退路都不要了吗？

是想死守茶陵城呢，还是另有打算？这很使人怀疑。如果是敌人拆掉了浮桥，为什么赤卫队员们在东门外没有看到敌人？……忽然，我的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万一在我们住的村子附近发现敌情，怎么办呢？我们八、九人，我和毛委员的警卫员各有一条驳壳枪，另一个同志有条马枪，统共只有三条枪呀！遇到敌人怎么招架，怎么才能保证毛委员的安全？我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我看看正在值班的毛委员，他神色泰然，默默地吸着烟，似乎在思考问题，判断情况。

天将拂晓，我们盼望已久的赤卫队队长才返回村里，报告说：我军由茶陵城向南撤退了；而敌人则尚未进城。听到这个情况，大家觉得非常奇怪，我们的部队不向东——不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反而向南——向酃县水口方向撤退，这是什么道理？毛委员胸有成竹，决定马上向南去追赶部队。早饭也来不及吃了，我们在群众的帮助下，临时把放在岸上的小船推入水中，渡过河去。登上岸滩，毛委员便催着我们，沿着茶陵通往水口的大路急匆匆奔南而行。途中，碰到三个掉队的伤员，他们一看到毛委员，真是见到了亲人，急忙说："毛委员，我带了花，走不得了。"毛委员一面亲切地安慰了他们。一面将自己的担架让给伤兵坐。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向茶陵县城进攻的敌人果然是国民党的正规军——第八军独立团的部队。我军是在夜间开始撤退的。

我们紧紧跟随着毛委员，急行军奔波了三十多里路。大家的肚子实在饿了，加上收容了三个伤病员，要找民伕和担架，于是在一个村子里停了下来，一面找民伕，绑担架，一面草草搞了点饭吃。毛委员问我："假若敌人在后面追来怎么办？"我回答说："我同你的警卫员打掩护，你只管往前面走！"说罢，我就要毛委员的警卫员到村头去放哨，监视来路有无情况。

经过一阵短促而又紧张的忙乱，总算绑好了三副担架。民伕们抬上三个伤病员，一行十余人继续向水口前进了。谁曾想到，毛委员和我们竟变成了我军撤退的最后“收容队”和“掩护队”了。

我们赶到水口，天已黄昏，部队正在休息。当晚，毛委员就召集各负责同志开会，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毛泽覃同志和我在另一个屋子里，只听到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具体内容就不大清楚了。紧接着，毛委员下令部队向后转，折回井冈山，向着宁冈县的砻市开拔。

三营从桂东来到茶陵，刚刚和一营会合，就碰上了这样激烈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一夜，伤亡较大。部队十分疲惫，极需补充、休息，总结经验教训。毛委员决定走大路，每天只走二、三十里路，一边行军一边休息，从一开始出发，毛委员就亲自下到连队里了解情况，分别和连队的干部谈话，边走边谈，在一个连队里谈完了，又转到另一个连队的行军行列里。毛委员这种灵活及时、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深深受到感动。到达宿营地，战士们休息了，毛委员又召集各负责同志继续开会。深夜，散会以后，毛委员把我找去，交给我一封信，要我连夜取捷径走小路赶回砻市，把信交给住在那里的中共永新县委的同志，要他们回去预先准备一下，以便部队到永新一带去活动。

我到砻市不久，毛委员带领部队回来了。第二天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总结了经验教训，宣布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同志任前委书记。从此党、军队和地方组织取得了统一的行动。

直到这时，我们才算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了。原来，部队退出茶陵城，不回井冈山而去水口，是由于团长陈皓和他的副团长，参谋长等人的叛变阴谋。他们对革命悲观失望，贪生怕死，利用茶陵一战对我军不利的情况而进行叛变。陈皓是黄埔

军校一期的学生，方鼎英曾经当过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因此陈皓企图把部队拖去投降方鼎英的国民党十三军。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毛委员下了井冈山，及时赶到部队，揭穿了陈皓等人叛变革命的阴谋，把部队带回井冈山附近。从水口到砻市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正是毛委员团结同志们向叛徒进行坚决的斗争。毛委员根据党的决定，随即将陈皓等人撤职，任命原三营营长张子清同志为团长，朱云卿同志为参谋长。

这样，新生的幼年红军所遭遇到的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被我们党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挽救了。

井　冈　山

何　长　工

井冈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一座壮丽、雄伟、险峻的红色堡垒。井冈山区南北九十里，东西一百八十里，是一个周围五百余里的椭圆形山区。在当时敌人不断地围攻、封锁和我们的反围攻、反封锁的斗争中，就是由于有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由于广大群众的英勇而顽强的斗争，由于井冈山的险要地势与其他优越条件，挡住了敌人的千军万马在深山密林里，我们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地打击敌人，就象舰艇出没在碧绿的海洋里，航行自如，战无不胜。

井冈山的斗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保存了大革命的有生力量，并且加以发展提高，在当时的形势急剧变化，革命大转变的紧急关头，要有伟大的气魄和远见，才能那样果敢地进行主动的，积极的战备退却，使革命事业转危为安，并且依靠这个革命根据地聚集革命力量，推动革命前进和高涨。中国革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小块红色根据地到全国解放，由小游击队到建设几百万现代化的大军，井冈山的斗争是一个关键也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主要基础。

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光辉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占领的城市，然后夺取

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这条完全正确的适应中国特殊情况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在井冈山斗争过程中开始形成的，在大革命时期我们还有大城市观点，到了井冈山我们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创造的建党、建军、统一战线思想，既打仗又建党，还做群众工作。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各种政策摸索、尝试时期的一个综合“试验田”。这段时期虽然很短，但是却解决了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许多根本问题，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井冈山开始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长期的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反革命联盟的残酷统治下，没有武装斗争，就不能保存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关于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结合的思想，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主要内容，武装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井冈山是一个坚固的革命阵地。在井冈山斗争中，井冈山的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为了革命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地学习和纪念。那时，斗争环境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苦，不仅要和穷凶极恶的敌人作斗争，而且要和酷暑严寒，林间毒蛇猛兽作斗争。由于我们的工农红军和革命群众表现了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由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爱戴和支持，我们历尽艰苦，经过千锤百炼，终于克服一切困难，取得了胜利。我们的胜利是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没有革命先烈的鲜血凝成的革命的花，也就没有今天得到的胜利果实！

井冈山也是一座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所敬仰的革命的山。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能引起当年革命斗争的回忆，这里的每个革命遗址都发人深思，唤起人们的怀念。从井冈山这本画册中，我们可以看到井冈山的雄伟的山川形势，可以看

到一系列有意义的革命纪念：三湾，古城、茅坪、砻市、七溪岭，大陇，柏露、茨坪、大小五井和险要的五大哨口，也可以看到今天井冈山的可喜的建设和新的面貌，当年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已成为熊熊的革命烈焰，红遍了全国。

三湾改编

谭　　政

远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天，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部队从战场上收拾下来。每天总是从天未明就出发，一直走到黄昏以后才宿营。经过平江、浏阳、铜鼓、萍乡到达莲花东南永新境内的三湾，着手改编部队。这算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难关。自从长寿街战斗失败以后，湖南的敌人，拚命地跟着我们后面追赶，总想把我们这些革命种子，一下弄个精光。没有经过锻炼的"小娃娃"，哪容易经得起这样的风波？弄得病的病，死的死，累的累，怕的怕，情绪非常不好。真象打了几十个败仗一样。

到了三湾的第二天，师长集合部队讲话："……现在人员减少了，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改编为两个营。……"听不下去了，只看到全场的人，大家都瞪着眼睛，痴呆似的望着他，非常难过。忽然由新任团长介绍毛泽东同志出来讲话。从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穿着一件老百姓的烂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绑腿，脚上套上一双草鞋。他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走到部队前面，顿时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来。"……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

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大家不住地点头微笑，显示着特别高兴地样子。当着队伍解散以后，只看到一群一群的在那里讲论着："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原载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毛委员在连队建党

赖　　毅

芦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那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革命部队正在烈火中经受着锤炼！

就在这次革命部队的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同志展开了最紧张的工作。那时我是一营二连一班的班长。每天行军，我都看到他那魁梧的身体，出现在战士们的行列中，今天在这个连，明天又在另一个连。他和战士们谈话，问他们在家是做什么的？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问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最初，有个别同志还不认识他，以为他是老百姓，便要拉他挑担子。毛泽东同志笑着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见过他的战士便说："他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呀！"战士都惊奇地围到他身边，看着他那和蔼的笑容，谁都从心里和他更亲近了，纷纷向他诉说自己的经历。

当时连队中很大一部分人，原是大革命时期在各地搞工农

运动的骨干分子，有许多还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大革命失败，革命组织受到反动派的摧残，家乡站不住脚，便跑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这些经历过失败和艰苦斗争，并且从反动派的刀口下跑出来的人们，对于目前的失利和艰苦生活，并不放在眼里。他们能够继续革命，能够拿着枪杆和反动派干。可是大家都还为一件事苦脑着，那就是当革命组织遭受破坏时，人都跑散了、谁也没有带组织介绍信，因而原来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现在都失掉了组织关系。

毛泽东同志自从在文家市收集秋收起义的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以来，每天不倦地找战士们谈话，正是为了了解部队情况，考虑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

部队中的逃亡现象清楚地说明了：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另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这样才能巩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非常鲜明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时候，由于党缺乏经验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虽然共产党员们在黄埔军校，在北伐军队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却没有抓住军权，也没有在部队中生根立足，没有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联系。因而，一旦反动派倒戈相向，共产党员们不但抓不住军队，反而不得不被他们从各个岗位上赶走，甚至遭受迫害。

毛泽东同志恰恰是在这个紧要关头，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研究了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从而觉察了问题的症结，采取了坚定的措施，那就是开始在连队中建立党的基础组织，并且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

就在芦溪受挫后的一次行军途中，副班长刘炎同志和我谈话，问我家庭的情况和个人经历。我猜想他是党员，便告诉他，我原是造纸工人，在搞工会工作时加入了共青团，后来从家乡逃出来，到修水找到了这支革命队伍。他听完我的叙述就

说："好吧，我们找找看。我想党代表一定是党员，去向他要求入党吧。"后来，党代表果然把我找去，对我说："你要求入党，那很好。毛委员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今后你要更好地工作，努力争取入党！"

没隔几天，党代表又找我谈话，这次叫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部队开到酃县的水口休息下来。第二天下午，党代表就秘密地通知我：晚上跟他一路去团部开会。

会议的地点选在靠近水口街的一个大祠堂里。我和五班长李恒同志跟着党代表上了阁楼，屋里已经有十几个人，各连的党代表都来了，其余大多数是各连的班长。毛委员也来了，正在和几个同志低声谈话。房间里放着几条长板凳，靠北墙有一张四方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桌边上压着两张下垂的长方形红纸，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另一张上写着三个弯弯曲曲的外国字。我知道要举行入党宣誓了，心不禁剧烈地跳动起来，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等人来齐了，毛委员便站到方桌旁边宣布开会。

先由各个入党介绍人(都是各连党代表)分别介绍了各个新党员的简历。接着，毛委员便走到排列在最前面的六个新党员面前，依次地询问了许多问题。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心中又紧张又激动。他问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要更坚决的革命！"

毛委员点了点头。

接着，毛委员又把那三个大家没有见过的外国字作了解释。原来这几个念"西西皮"（C·C·P），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以后，他又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

会场上充满严肃的气氛。毛委员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亲自带领我们宣誓。他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牺牲个人，服

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洪亮、庄严的声音，在这间破旧的小楼阁中回荡。

宣誓结束了，会场里活跃起来。同志们互相勉励，老党员谆谆嘱咐，都使我十分感动。特别是毛委员的讲话：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作宣传，多作群众工作；要严格组织生活，严守党的秘密……这许多嘱咐，都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底。

临走时，毛委员又嘱咐各连党代表：回去后要抓紧发展工作。以后，各连都要象今天这样，分批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在那些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经不起考验的动摇分子纷纷背叛革命、脱离党的时候。毛委员亲自发展了我们这一批工农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我才知道，党员最多的二连，除刘炎同志是带了组织介绍信入伍的工农出身的战士党员外，其余四个党员都是干部：连长、副连长、党代表和一个排长，他们都是在黄埔军校时入党的。

不久，连里的支部都建立起来了（在这以前，支部设在团里，各连只有小组）。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支部里当时布置党员们做好三件工作：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的思想，解除他们的顾虑；注意培养和发展新党员。

我和刘炎同志编在一个小组里，他担任小组长。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研究一下当天的情况。对革命意志坚定、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同志，我们就积极教育他，帮助他，然后介绍他入党。这样，群众就更加和我们靠拢了。

由于支部设在连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

数量逐渐增多。这样，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里的核心和堡垒。当我们打下茶陵后，连里几个学生出身的干部党员，因受不住考验而走上了可耻的逃亡道路时，我们连并没有因此垮台。许多工农出身的同志们从实际锻炼中成长起来了，成为连里的领导骨干，在部队撤出茶陵回到井冈山时，毛委员一下就把刘炎同志从副班长提到连党代表的重要位置上；而我们的连队，也由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并发挥了作用，变得更加巩固和坚强了。

（原载《解放军文艺》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跟毛主席上井冈山

何　长　工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反动派为了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背叛了人民。同年七月，蒋介石、汪精卫这两个历史臭名昭著的卖国贼，进行所谓宁汉合作，进一步屠杀人民，使全国的土地都弥漫着白色恐怖的血腥气氛。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并没有屈服，仍然高举革命的红旗，这就是人民的旗帜，胜利的旗帜，这就是插遍全国各地鲜艳而可爱的旗帜！

首先高举起这面红旗的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部队，这支队伍由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同志所领导。接着，革命的红旗，便随着他们艰苦的足迹南进，在赣、闽、粤三省，划开一条红线，于是广大人民在一片乌云的笼罩下见到了红光，重新获得了希望。

在南昌起义的同时和南昌起义以后，湘鄂两省人民纷纷举行暴动，这就是毛主席在湖南所领导的著名的秋收起义。几乎是湖南全省和鄂北赣西各县的人民都举起了革命的红旗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在当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没有燃成一片，但是火种撒在人民的心里。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斗争，终于燃遍了全中国。

一支红军的兴起

南昌起义以前，驻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和直属队的一部分，在七月上旬悄悄地离开了武昌，向湘赣边境出发。这就是后来毛主席带到井冈山去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主力。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何长工同志当时就在这个队伍里当参谋。

这支队伍到了江西修水以后，编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师包括四个团，第二团是安源煤矿的工人纠察队；第三团是湖南浏阳的工农义务队；第四团是由一支旧军队改编的，总共约八千余人。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修水成立后，随即向长沙周围进军。当时全军指战员满怀仇恨，恨不得一口气打下长沙。他们不顾炎天暑热，不管敌人的力量比我们大过十几倍，还是分兵攻打平江、浏阳等城，对长沙采取包围的形势。这时敌人集中力量对付兵力分散的红军，第二团首先在浏阳被敌人歼灭，接着第四团反水。

经过这次失败后，队伍只有暂时退却，回到浏阳东乡活动。

毛委员来了

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派毛主席（当时都称他为毛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到湘赣边境的铜鼓一带找队伍。毛主席走到浏阳张家坊时，不幸被反革命的民团捉住。那时恰巧第一师的队伍逼近文家市，民团十分恐慌，便派团丁连夜把毛主席解送浏阳县城。毛主席那时穿着农民服装，草鞋走破了，脚也走

破了，脸晒得黑黑的，因此民团没有认出他来。在押解途中，毛主席机智地逃脱了。

毛主席来到部队时，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当部队到文家市后，立即召开了会议，研究当前的革命形势。毛主席认为：现在不是进攻的时候，是退却的时候，应该很好地组织退却，找安定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毛主席打开地图一看，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建立军队和政权。这就是从城市转入乡村，从合法斗争到"非法"斗争，从政治斗争到武装斗争，从没有根据地到建立根据地，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转折。

从此，毛主席便和这支队伍在一起，这支队伍从此便有了灵魂。

上 井 冈 山

井冈山在湘赣边境，中段则在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酃县、桂东等县之间，四面山峰环绕，颇为险要，山上还有一片平地，周围有十九个圩场（即集市），中间有上、中、下、大、小五井（村庄），山的四周都是梯田，出产丰富。周围各县的农民，因为受过大革命的影响，觉悟程度较高。地势险要，出产丰富，群众条件好，这就是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这时，山上有一股土匪，约五六百武装，带头的一名王佐，一名袁文才。王、袁两人一文一武，分工合作，王善于打仗，袁善于策划。红军来到宁冈县后，研究的结果：认为袁参加过大革命，和统治阶级有矛盾，估计有争取的可能，便决定和他们打交道，争取和改造他。送给他们一些枪支，他们答应让红军在茅坪设立一所医院，把伤病员寄放在那里。红军经

过长期的行军苦战，发疟疾的人很多，到这里才得到休养的机会。

改造土匪部队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主席称为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即使在这个小小的山冈上，统一战线的工作也还是十分必要的。

当时派到山上去做工作的，是何长工同志。他在王佐家里做客，被称之为毛委员派来的何委员。

最初工作很难做，何长工同志不能随便和王、袁接近或同他们一道吃饭，便去接近王佐的母亲、兄弟和老婆。为了多接近他们，经常替他们抱小孩。王、袁的报复性很大，喜欢杀人，每次要杀人时，何长工同志便说服他的母亲去劝他，后来杀的人也少了。

王佐有个世仇，是吉安等七个县的联防司令，名叫尹道一。此人经常来井冈山骚扰，对红军组织群众的工作也有很大影响，必须铲除他。何长工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对王佐说，愿意帮助他报仇。王佐大喜，立即出兵袭击尹道一的指挥部，红军的一个排埋伏在旗锣坳，等王佐将尹道一的前锋引上了山，他的指挥部还在旗锣坳休息的当儿，一个伏击把尹道一杀了。从这个时候起，王、袁对红军才真正心服。

仗打完，正逢阴历年，何长工提议庆祝胜利，给全体发饷，发新衣服，吃肉、喝酒，这样，红军又在山上的军民中建立了信仰。由此，逐渐地接近王佐部的下级干部和士兵，这支部队受到了红军的影响，渐渐地建立了红军的纪律，学习红军的制度，王佐和袁文才等人因为阶级觉悟的提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

迎朱总司令

红军到达井冈山后，曾派何长工同志到衡阳和特委联系。何长工走到鄙县的沔渡时，被民团捉住了。民团立即给他插上个标子，将他拖去杀头。这时有个团丁问他：

“毛泽东的队伍在哪里？”

“今晚在鄙县宿营。”

“经过哪里？”

“经过沔渡。”

民团一听慌了，没有杀他，以为他真是从红军逃出的俘虏。团长贾威放他走，他不肯走，说：“你们的地方机关太多，我就留下当马夫吧！”贾威无心和他多扯，便给了他一个路条。他拿了路条后，便一帆风顺地到了长沙，找到了湖南省委。

任务完成后，他又南去联系别的关系。在韶关的澡堂里洗澡时，听到范石生的下级军官谈：

“王楷的军队到了犁铺头，王楷就是朱德，要留意点！”

犁铺头在韶关西四十里，他立即赶去，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和陈毅同志。原来朱总司令自潮汕退却后，便带着队伍由江西的天心向粤北去，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化名“王楷”。朱总司令和樊士申是同学，和樊打交道，假称是樊的一个团。朱总司令知道毛主席在井冈山，非常高兴，立即叫何长工同志回去，带信给毛主席，准备进行湘南暴动。

毛朱会师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总司令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在

宁冈县的砻市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编成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师。军长朱德，政委毛泽东，这就是今天五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初的胚芽。七月，彭副总司令也由浏阳一带，带了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红军的优良传统，是和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分不开的。单就战斗队兼工作队的这个任务来说，就在一开始就有了的，最初部队中有工运动委员会（就是政治部的前身），除了部队本身的政治教育以外，还要做群众工作。一九二八年，井冈山附近的六七个县都建立了红色政权和地方武装，农民协会、少先队、儿童团等闹得热火朝天。各县的反动派、土豪劣绅、地主都纷纷往吉安逃，人民的力量大极了。

毛主席到哪里，红旗插到哪里

一九二八年冬，在敌人的多次围剿后，井冈山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山上油、盐、粮都断了，部队没有东西吃，只好吃黄豆。反动派的飞机散发传单吹牛，说他们有飞机，有大炮，有机枪，有炸弹，耀武扬威的。

红军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并没有丝毫胆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就在这时候，毛主席、朱总司令决定新的转移，留下一小部分队伍坚持井冈山外，其余都到赣南又建立了大片根据地，那就是后来的中央红区。

毛主席到哪里，胜利的旗帜就插到哪里。在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面前，那些当时握有飞机、机关枪、大炮的家伙们，看你们现在往哪里逃！

（原载《新观察》第壹卷第叁期）

难忘啊，入党宣誓的时刻

赖　　毅

带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不久前我又来到五十年前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一处处革命旧址，重温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我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仿佛毛主席又来到我们中间，毛主席在我军初创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二七年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踏上了向井冈山进军，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征途。当时，战斗激烈，情况艰险，少数同志产生了消沉的情绪。一些旧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不到胜利的前景，不告而别。革命部队正在斗争中经受着锤炼。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紧要关头，觉察到了问题的症结，决定采取坚定的措施：把"支部建在连上"。并指示：要在水口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

当时我曾向党代表倾吐了渴望入党的心情，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队伍到达湖南酃县水口的第二个夜晚，党代表把我秘密地领到一间祠堂的小阁楼上。进门一看，一位身材魁梧，蓄着长发，穿黑色便服的人正和一些同志小声交谈着。我心里一阵紧张，没有想到，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来参加今天的会议，主持我们的入党宣誓仪式啊！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等候着。不一会，毛主席站起身来宣布会议开始。等介绍人介绍了各个新党员的简历

后，毛主席走到我们六个新党员的面前，依次询问了一些问题。当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为什么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从小做牛做马，受尽地主老财剥削压榨的悲惨遭遇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回答说："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要更坚决地革命。"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接着，毛主席给我们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和"C·C·P"三个英文字母的意思。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毛主席带领我们宣誓了。我们学着毛主席的样子，举起握紧拳头的右手，跟着毛主席洪亮的声音向着伟大的党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结束后，毛主席又对我们讲话，他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作宣传，多作群众工作；要严格组织生活，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要严守党的秘密；……毛主席的指示，一字一句深深地印入了我们的心底。快要散会时，毛主席嘱咐各连党代表说：回去后，各连就组织支部，抓紧发展工作，以后各连都要象今天这样，分批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这永生难忘的情景，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回想起来依然是那样亲切。毛主席亲自到军队建党，亲手把支部建在连上，使我军牢牢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真正成为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长期的艰巨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住种种严峻考验，从胜利走向胜利。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说："五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历史表明：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毛主席的旗帜，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重读这一节，感受尤深。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让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光辉，照耀千秋万代。

（原载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解放军报》）

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

赖　毅

一九二七年深秋，我们跟随着毛泽东同志到了井冈山附近地区——江西永新县属的三湾，把部队整编好了。但那里没有什么根基，住下来之后，立即要着手建立根据地。毛委员派特务连、军官队和一部分伤员到井冈山区去开辟工作；其余的分成三路，向井冈山附近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茶陵、万安、酃县等地去活动。临行之前，毛委员召集我们讲了话，指示我们：要向群众作宣传，扩大革命影响，并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他还要我们用郭亮同志的名义出布告。

我所在的二连和三连一路，由团长和党代表率领，开往酃县、安仁、茶陵一带。

一路上，按照毛委员的指示，用郭亮同志的名义，在街头巷尾到处张贴布告，又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张贴“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许克祥”、“打倒帝国主义”、“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万岁”等标语。起初，群众看到我们这些颈上系着红布带的军人，摸不清我们的来路，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是共产党的部队回来了，人们便走出家门，拥到布告、标语下面，看着、念着。

当时，反革命力量很大，我们两个连只有一百多人，只能一边走，一边宣传，不敢多停留。在安仁县城，我们打了一个大土

豪，没收了一大堆资财。在茶陵开监放了犯人。就这样，在几天时间里、穿过了三四个县城，回到了山区。

虽说只有短短的几天，但由于当时部队刚建立不久，纪律松，办法少，又远离毛委员的领导，闹出了不少事情。

在安仁县城打土豪时，没收了许多资财。按说这些东西应该分给贫苦群众。可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考虑怎样公平合理地分给全体士兵。研究了几次，还是采取绝对平均的办法：把部队带到空场上，两个连混合起来，排好队站在一边，墙那边放着一堆堆事先搭配好了的东西，有皮袄、鞋子、被子、毯子，甚至还有草篮子、鸡蛋等等。军官们有的负责分东西，有的负责监督。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就喊起来："第三伍前一名出列"，"倒数第二伍后一名出列"……就这样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资财分掉了。

从茶陵回来之后，我们二连住在茨坪，进行了一个月的整顿训练。每天吃的是井冈山出产的红米和南瓜，穿的仍是在修水发的单军衣。那时已是严冬，山上更冷，每天只好钻在稻草里过夜。后来，领导上想尽办法筹集了一些钱，在山下小集镇上买了些各种颜色的布，又买了些棉花，分给各人自己缝棉衣。

十一月中旬，突然接到出发的命令，我们走到大井，一、三连也赶到了。这时才听说毛委员要我们下山去打茶陵，大家兴奋极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大陇，等整理好队伍之后，毛委员就给我们讲了话，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现在宁汉军阀混战，反动军队都拉走了，山下县城空虚，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接着命令我们向茶陵方向行动。他说：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说到这里，毛委员用手指了指脚，脸带微笑，诙谐地说：可是我的脚不让我革命，这真叫没办法。原来，他的腿上长了疮，行动不方便。

我们又一次离开毛委员，下山去了。

一路上很顺利，打茶陵也没遇到对手，一下就占领了。没几天就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且把原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出来，恢复了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是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怎么搞法，只好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

部队在城里住下来，仍沿用旧式带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以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虽然也曾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去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部队的给养，也象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这一段时间，部队乱得很。

我们在茶陵的所作所为，很快传到了毛委员那里。他写来指示：立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派谭震林同志任工农兵政府主席，并指示要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

毛委员的指示下来之后，县政府大衙门的样式去掉了，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在茶陵诞生了。

正当我们欢欣鼓舞庆祝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的时候，宁汉战争停止了，湖南的敌人吴尚派了一个团，开到了茶陵，企图把我们一举消灭。当时，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游击战术，体会不深，也不能灵活运用。因此，竟和敌人展开了拚消耗的阻击战。顽强的战斗一直坚持到黄昏，周围的敌人仍在陆续增兵，部队在茶陵无法立足，只好撤回到井冈山，住在宁冈县的砻市。

有一天，毛委员又来到我们这里，召集大家讲话。他开头先表扬了我们茶陵战斗打得勇敢。接着又指出：部队在茶陵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这次行动很大的缺点。

这时，毛委员开始给我们讲解了工农革命军的任务。记得

大意是说：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和颜悦色，就象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讲到这里，毛委员停了一下，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扳着左手手指，逐步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在茶陵所犯错误的老根子，明确了革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象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把前进的道路照得透亮。从此，我们就不再象以前那样糊涂了。

在砻市那次讲话中，毛委员还再次向我们讲解了三大纪律，要我们严格遵守，谁也不得违犯。后来，我们都把三大纪律背得滚瓜烂熟，并且认真地照着它做。连的党支部还把它当作检查行动的标准。

以后，毛委员集合部队讲话的次数更多了，每一次都要给我们讲解当前的形势、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道理、井冈山的地势和周围群众的生活情况……。在讲解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同时，毛委员还经常教给我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记得他说过：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

又有一天，毛委员把部队集合起来说：上次你们从井冈山西边的茶陵来，这次我们一起到东边的遂川去。那个县里敌人只有很少地方武装，不敢同我们打仗。那里有很多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工人农民都穷得要命。到那里以后，大家

都要做群众工作，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

部队随着毛委员下山，迎着深冬的寒风，走着崎岖的山路，向遂川挺进。我们的军装虽已磨损得破烂不堪，然而几个月前由于挫折而带来的张惶、不振的情绪早已一扫而光。个个精神抖擞，步伐雄壮，都想到山下轰轰烈烈地干它一番。

队伍经过黄坳，来到大坑。这里完全不象我们在山上时所想象的集镇的样子，老百姓都走光了，街道上冷冷清清，偶然碰上一两个人，也尽是些老头、老婆婆。

按照毛委员的指示，我们打开土豪紧锁的大门，里面真是五光十色，什么都有。光是泡在茶油里的腊肉、腊鸡、腊鱼和各种各样的油炸果子，就有好几大缸。土豪们已经把过年的事安排得妥妥贴贴了。可是，走到穷人家一看，阴暗、潮湿、破烂的房子里，除了床上的一条破席子以外，啥都没有。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同志们都气鼓鼓的，立即把土豪家搞了个天翻地覆，只要能拿的，全都搬了出来。搞到的那些资财，全部送到穷人家里。

来到遂川，情况和大坑相仿。我们向没有走的老人宣传，他们多半都不理睬；把财物分给他们，他们摇摇头，拱拱手，谁都不接受。于是我们就从小处着手、先分给一些可吃的东西、因为东西吃掉了不留痕迹，不怕土豪倒算，以后，我们加强宣传，消除群众顾虑，使留在城里的人逐渐靠近我们。

工农革命军爱护群众的行动，很快传开来。两三天里，穷人们都陆续回来了。我们的宣传工作也繁忙起来。由班、排干部组成小组，每个组都有红布做的小旗子，旗子上横写着三个大字：宣传队。红旗到处，群众团团围住，静听红军战士讲话。因为我会讲湖南客家话，小组就常推我来讲。也不知怎么的，一看到站在前面这许多穷人，自已在家受苦的事，一下就涌上心头。我高声说："我在家跟你们一样，受尽了土豪劣绅

的压迫和剥削，没命地干活，也吃不饱肚子。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打倒土豪劣绅，要分他们的田，要组织革命委员会来跟他们斗啊……"这么一讲，小组的同志和群众就一起呼一阵口号，然后我们就带着群众到土豪家里去分东西：用具、衣服、谷子，连猪也杀了，切成一块一块地分给穷人。穷人们欢天喜地地抬着东西，回到自己家里去。

没几天，县城的局面打开了。毛委员就派我们到郊区去开展工作。我们连被派到离城二十多里的和尚坪。在那里活动了近二十天，毛委员从城里传来指示，要部队回遂川过年。

走的那一天，群众都来送行。时间虽短，却已和群众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

回到城里，只见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家家户户挂灯结彩，男女老幼穿得整整齐齐。卖年货的店铺里，更是人流不断。人们发现了我们一队队军容整齐、容光焕发的工农革命军战士，一下就围了上来、象迎接远出归来的亲人一样，问长问短、亲热得很。

各路部队带着胜利，带着筹集的物质、款项，陆续回来了。见了面，大家三人一群，五人一伙，谈着各地情况，那种兴奋、激动的情绪，只有打了大胜仗的时候才会有。

除夕那天，毛委员宣布放假三天。每人发给几块银元，夜里还举行了大会餐。我们二连在一个古祠堂里摆上一张张方桌，不分干部战士，团聚共乐。街上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军民沉浸在欢乐中，整个遂川城灯火辉煌，彻夜不熄。

我们就这样欢欢乐乐地过了第一个胜利年。休息几天之后，除了留下在遂川城和郊区工作的少数部队以外，又分成好几路，下乡去开展全县的工作。

我们这一路，由营长陈毅安带着去左安。到了左安又分成几路出发。我们一路走，一路举着宣传队的红旗，向群众作宣

传，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起初，群众也不敢来，到后来，只要把红旗一举，后面就汇成一条人的洪流，男女老幼挑着箩筐，扛着扁担，背着口袋，一边走一边招呼路旁人："走啊！跟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去！"在左安，我们需要筹款时，便在土豪劣绅的门口上贴上一张罚款布告，上写：某某是土豪劣绅，平时欺压穷人，现在决定罚款××元，限×天内交来，到期不交，定严惩不贷。土豪劣绅害怕，大都在限期里派人把钱交来。

为了更好地统一军事指挥，统一领导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毛委员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或营或连，不分大小都要组织起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要三、五天就要检查一次工作，例如进行了几次宣传，组织了多少群众，打了多少家土豪，没收和分发了多少东西，筹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经验、优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都要作详细的汇报，并按级上送，直到毛委员那里。行动委员会检查工作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们杀了土豪的一只猪分给群众，留下一部分较好的肉和猪肝改善生活。这件事让行动委员会检查出来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以后成了一条纪律：凡是好东西要尽先分给群众，任何人都不准擅自拿打土豪得来的东西。

遂川全县就在这短短的时期中，掀起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土豪劣绅打倒了，反动政权垮台了，贫苦群众站起来了，工农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赤卫队，游击队保护着革命胜利的果实。

我们从左安回来以后，毛委员亲自领导着大家，总结了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三四天以后，又分成几路到各地去开展工作。我们二连这次是去遂川西北的五斗江，出发前，每人都穿上了灰色的新军

装，戴上八角形的工人帽，还发给一套白布衬衣，连子弹袋，干粮袋也换了新的。系在颈上的红布飘带，也换上印有“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布袖章了。

我们这支人数不多的工农革命武装，就这样在毛委员亲自领导下，在井冈山四周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建立并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它就象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着井冈山四周的广大农村，到处点燃起革命的烽火。

（原载一九七六年《解放军文艺》第十一期）

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

韩　　伟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方针，号召各地党和人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来到湖南，领导了当地的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前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矿工和平江、浏阳、醴陵等县的农民自卫军。这些队伍在修水、平江、浏阳、铜鼓一带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因为部队成份复杂，又缺乏经验，在连续打了几次败仗之后，有些同志看不清前途，思想动摇，逃亡情况严重，幸亏毛委员赶到军中，指出革命的前途，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在三湾，把剩下的七百余人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建立党代表制度，这才把这支濒于瓦解的革命武装挽救过来。从此这支队伍就在毛委员的直接领导下，依托井冈山根据地，展开了积极的革命斗争。

井冈山峭壁耸立，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它位于湘、赣两省边界，敌人统治较弱，而且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便于我们积草囤粮，聚集力量。这是一个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我们在那里得到了休整，士气为之一振。

但是，那时我们许多人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还缺乏认识，因而对这支幼年的革命军队，怎么去和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反动政权的强大敌人作战，怎么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

固和扩大，怎么以根据地为依托，战胜敌人，壮大自己，最后取得全国胜利……这一系列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建军和作战方针的问题，认识非常模糊。大家一时还摆脱不了旧军队的老一套，以为打仗嘛，过去没少打，有些人还进过军事学校，既有军事理论又有作战经验。再说，我们有党的领导，政治质量高，战斗作风英勇顽强，要攻就攻，要守就守，还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并不这样简单。

十月间，宁汉战争爆发，各派军阀大动干戈。混战一团。边界各县敌人守备空虚。毛委员决定趁机发展根据地。十一月中旬命令我们下山攻打茶陵。他因病，这次没有亲身率领我们行动。

茶陵县城的守敌是"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的一部分挨户团，战斗力很弱。我们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赶跑了敌人，占领了县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可是过去了四十九天之后，问题来了。湖南军阀暂时向南京方面妥协，敌八军军长吴尚腾出手来，派他的独立团团长俞业裕率部配合罗定，向茶陵进攻。独立团是八军的主力团，人员充实，装备又好，仅重机枪就有十二挺。再加上罗定的七、八个连，足有二十个连约两千多人。而我们算上后来赶到的第三营，一共也只有七个连，人数不多，装备也差，别说重机枪，连轻机枪也只有一挺，步枪的子弹也不多，和敌人硬碰显然是要吃亏的。但是那时的团营连指挥员，甚至连我们这些排长在内，大部分是军校或旧军队出身，习惯于过去的作战方法；一提打仗，就是拉开架子打硬的；守就是守，攻就是攻。当时也有人主张撤退，可是有人立即批评说："撤退？我们是革命军，要有大无畏精神，看见这些敌人就怕了，全国那么多反动派怎能打倒呢？革命者要永远勇往直前！"这话听起来也对，于是就和敌人打起来了。

战斗是从拂晓打起的，敌人一下子扑到城郊，十几挺重机

枪，打得我们阵地上烟雾腾腾。我们的部枪压不住敌人的火力，敌人就成排成连地冲过来。我们打得很顽强，许多同志几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山头丢了，又奋勇地夺回来。但是终于寡不敌众，只好趁着夜幕降临，在交替掩护下撤出战斗。

撤离了茶陵，到湖口整点一下部队，人员损失不少，仅我们排就伤亡了七八个人，弹药也消耗很多，休息了一会，部队突然改变了前进方向，向南走下去了，行军速度也猛然加快。我们心里不由一阵嘀咕："南面是广东，有敌人的重兵，为什么要连夜向南走呢？"正在疑惑，忽然传来了命令："毛委员来了，部队返回湖口宿营！"翌日清晨，我们集合在湖口南的一个大草坪上，心里估计，可能有重要指示，昨晚的闷葫芦也可以揭开了，大家都怀着紧张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

毛委员站在队伍前边。炯炯的目光向四周环视一下，首先说明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动摇分子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接着，严肃的指出：我们团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欺上瞒下，想带起队伍投降军阀方鼎英去。这一情况使我们万分震惊，队伍里立刻骚动起来。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部队向南走，为什么毛委员连夜赶来。大家都愤恨地唾骂那些叛徒。毛委员当即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并逮捕交革命法庭审判。然后，把部队带回井冈山的砻市。

在砻市，毛委员先安定部队情绪，说我们作战勇敢顽强，这很好。接着问我们这仗该打不该打。我们想，弄出这样的结局，看起来是打错了，可是不打又打怎么办呢？心里没有底。毛委员接着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打仗也象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他还讲到走路的问题，说：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说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

宁冈战斗，是秋收起义以来我们第一次在毛委员亲自率领下进行的战斗，也是秋收起义以来军事上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次战斗不仅歼灭了敌人，弹药装备得到了补充，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而且它的全部进程也是一堂生动实际的军事课：湖南敌人来进攻了，我们便巧妙地转到江西遂川，分散兵力，积极发动群众。等敌人重兵赶来，又迅速集中兵力休整，命赤卫队袭扰宁冈敌人。我们休整好了。敌人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于是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把敌人彻底歼灭。毛委员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通过这次战斗，生动活泼地体现出来了。同时，也使我们较深刻地体会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用兵作战。

一九二八年春，正是敌人内部暂时稳定时期，湘赣两省反动派不断派兵"会剿"我们，战斗十分频繁。在这个情况下，毛委员的指导思想是：在敌人内部尚未发生破裂时，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步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布四处，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正因为我们照这样做了，所以在敌人不断"会剿"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连续取得胜利。根据地日益扩大，土地革命日趋深入，红军和赤卫队也发展了，战术水平也提高了。

在一九二八年井冈山斗争期间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委员为了教育部队，把过去的作战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是当时作战原则的概括；是以弱少的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唯一正确的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在军事上的伟大创造。这不仅武

域。这时朱培德部的一个营，趁我们在遂川之际，进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北面大门宁冈。这股敌人孤军深入红色根据地，开始还谨慎小心，不敢乱动。宁冈县委根据毛委员的指示，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地袭扰，使他们一日数惊，坐卧不宁。后来敌人发现我方尽是赤卫队，没有主力，便骄傲松懈了。毛委员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使用优势兵力（一团全部，二团一个营）吃掉这股敌人。深夜，毛委员亲自带着部队，赶到宁冈，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天才大亮。敌人和往日一样，正在城东的操场上练操。毛委员带我们隐藏在距操场不远的地方，等敌人架好枪支，做徒手体操时，命令我们一排子枪打过去。敌人大乱，有的连枪都顾不得拿就逃向城里。第一连连长带着战士们，扛着梯子，背着稻草，跟踪追到东门。转眼间，梯子搭上城墙，突击班沿梯而上；接着城门洞里冒出一股浓烟，烧城门的也得手了。我们高喊着"冲啊！""杀啊！"穿过浓烟烈火，冲进城去。攻南门的三营也冲了进来。敌人在城里四处乱碰，企图突围，都被我们顶回去了，最后只好逃出西门。出城不远，是片稻田，又遭着我们二团一个营的伏击。我们前后夹击，一场歼灭战就在这片洼地上展开了。

战斗打得干净利落。没到晌午，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部分民兵团，外加一个县公署，都被我们收拾了。

傍晚，我们开了个祝捷大会，然后浩浩荡荡胜利回山。这真是胜利凯旋，很多人扛着双枪，身后是一长列俘虏。行列里，时时发现愉快的笑声和歌声。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在茶陵吃败仗的情况，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这才叫打仗，不打便罢，一打就来个干净彻底，又抓俘虏又缴枪。"

"这就是蚀本不干，赚钱就来！"

"……"

的学问哩！他举了个例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委员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是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最后他笑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当然我们那时还不能深刻领会毛委员的战术思想，可是已经开始知道老打法行不通了，应该改变。究竟怎样转变呢？还是毛委员亲自带着我们打仗，才使我们逐渐明白的。记得几天之后，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部队集合在砻市向阳的山坡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听毛委员交代任务。他说：井冈山这边是湖南，那边是江西，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可见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些。我们来他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遂川去活动。

遂川和遂川以西的大汾镇，都是驻的反动民团。我们在大汾镇打垮了民团三四百人，消灭了一部分，接着就顺利地占领了县城。根据毛委员的指示，部队分散开来，以连排为单位，到四乡去开展群众工作。我带一个排在城郊和藻林一带活动。每天以班排为单位，打着红旗，挨村逐镇地展开宣传，打土豪筹款、组织革命政权。并按毛委员教导的办法，抽出枪支和好战士，去帮助地方党组织赤卫队。这是我们第一次作群众工作，看到了广大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过了阴历年没多久，大约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又象上次在茶陵一样，敌人调集优势兵力向遂川压来，企图把我们歼灭。毛委员迅速把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带回井冈山中心区

装了我们的思想，指导了当时的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而且奠定了我军作战原则的基础。这些原则在以后的长期战争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随着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的巩固扩大，红军也由游击队壮大成为游击兵团。到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已经进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了。这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作战原则，保证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运动达到空前的鼎盛时期。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伟大创造，和他在其他方面的伟大创造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重要课题。他的天才的军事思想，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奋勇前进！

艰　苦　转　战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片断

杨　至　诚

井冈山会师

记得是一九二八年的四月下旬，毛委员派毛泽覃同志带了一个连，来湖南和我们的部队联络；我们这支队伍，是南昌起义后保存下来的一支不大的队伍，由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湖南宜章打起了革命的红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暴动。红旗飘扬已经有四个多月了，为了调动敌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转移阵地，由毛泽覃同志带路，部队向着井冈山出发了。

上井冈山和毛委员的部队会师，战士们的情绪十分高涨，一路上议论纷纷。这时正是五月初旬，风和日暖，触目是青山绿水，雄伟壮丽。部队来到井冈山下的砻市，镇头上，高高地搭起牌楼，满墙写着大字标语：欢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会师。

五月四日，在砻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指出这次会师的历史意义，说明当时的形势，确定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向北发展，向南游击，这样就明确了当时革命斗争的方针。前委决定把毛委员带

番的队伍和朱德同志带来的队伍，合编为红四军，以三个师的番号组成。实际上只有五个团、即二十八团（南昌暴动的）、二十九团、三十团（湖南暴动的）、三十一团（秋收暴动的）、三十二团（井冈山地方的）。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从此，红四军就以井冈山为依据，在湘赣边境与敌人进行游击战争。

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敌人有全国性政权，有飞机大炮；我们一无所有，不能和敌人硬拚。因此，毛党代表规定的作战方针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军就以此为法宝，与敌人进行斗争。在战斗中，我军充分发挥了这个法宝的作用，打得敌人落花流水。记得在遂川所属的五斗江战斗中，我军乘敌不备，集中优势兵力把敌人一个团全部消灭。在我军战士中，那时有三句谚语：猛打、猛冲、猛追。敌人遇到红四军，真是丧魂失魄。

我军为了对付敌人，取得了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毛党代表提出了建军方针。首先是对部队的思想建设要有新的内容。因为我们的部队是从旧军队中起义和农村斗争中来的，另有一部分是在战斗中俘虏过来的。战士们来自四面八方，思想不统一，纪律也不大好，有些人存在着浓厚的本位主义，打起仗来还有点发洋财思想。记得我们部队到井冈山会师的时候，前委决定由二十八团抽调一些子弹补给三十一团，在这件事情当中，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有不少战士把子弹藏在自己的包袱里，不愿意拿出来给兄弟部队。有些战士在打土豪当中，见到有合用的小东西，就自己拿用；打仗时，见着俘虏就搜腰包；也有的战士只愿呆在城市里，不愿在乡村，对于创造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概念是模糊的。就这些人来说，他们的流寇思想相当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委认为要把这支队伍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非改造思想和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不可。毛党代表在

前委提出了建军路线，并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始是六项注意，后增加了两项）。成为红军的生命线。部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连队里真正的建立起来了，连有党代表，改变了军队的面貌。因为我们的队伍是由旧军队转变过来的，连队里是有政治指导员，实际是挂名的，连队里看不起这个组织。而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首先从政治工作着手，在连队里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制度，加强政治教育；官兵生活待遇一样，一切经济公开。在对待俘虏政策方面，提出不搜腰包，不打不骂；愿意当红军战士的欢迎，有伤有病送医院治疗；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这些政策决定和实施后，战士们就以此为方向，处处依靠党，依靠群众，保障了部队的巩固。

记得我担任连长时，滇军有个班长，名叫曹福海，被我们先后俘虏了三次，最后他顺从了，愿意参加红军，补到连队里表现很好，以后被提拔担任排长，作战勇敢顽强。在大厦战斗中，我的脚部负伤。他把我抢救下来，然后带领一排战士冲锋，壮烈牺牲了，这种事例很多，不胜枚举。由于我们加强对敌人的政治攻势，严格执行了俘虏政策，敌人整营整团起义的不少，在战场上经常俘获成千上万的敌人，这正是毛党代表对敌军政策的胜利，

在毛党代表和前委的领导下，把建军路线、方针初步明确起来了使我们在斗争中有了一个奋斗的目标。从此，我们部队基本上改变了面貌，大家都能够严格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上级决定什么事情，都坚决去办；对群众关系密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和在战场上缴获的物资都归公家。部队的纪律大为改观。对八项注意也能很好执行，如对群众态度好，买卖公平，借了群众的东西保证送还，损坏了就赔偿，不打人骂人，爱护群众的庄稼，这就大大改善了军民关系，使部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坚守井冈山

我们在井冈山的几个月中，敌人多次不断向根据地侵犯。记得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天，湘赣敌人各一部向我发动进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军二十八、二十九团于七月中离开赣边，到湘南去了；八月间，毛党代表带领三十一团一部，去桂东方向迎还大队。只有三十一团的一部分及袁文才、王佐部队留守井冈山；另一部队在永新莲花一带打游击，阻击敌人进犯。这时，湘赣两省的敌人见我伤病员多，留守机关多，防守兵力却仅一个营。于是，便乘我军毛党代表和大部队没有归还之际，向井冈山发动了进攻。

我们得到敌人进攻的消息，山上一时轰动起来，同志们议论纷纷，也有部分同志表现得情绪不安。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召集了在山上的机关、医院的负责人及伤病员代表会议，讨论应付敌人进攻的对策。我那时没有随大队南下，留在井冈山上，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守，一是撤。有的同志认为，山上兵少粮缺不能守，主张把伤病员分散在深山和老百姓家里，队伍撤退山下去打游击。有的同志认为，山上虽然兵少粮缺，守住井冈山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在湘赣边区进行了革命斗争，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有的地方农民分了田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组织了赤卫队和少先队。井冈山下的市镇、乡村的革命群众斗争情绪很高，敌人如果向山上进攻，他们必然会扰乱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的物资接济，阻止敌人，这一力量是不可轻视的。加上我们井冈山地势高陡，十分有利。我们守山，不是为山守山，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井冈山，它是我们边界创造根据地的起源，如果把它丢了，影响很大，更何况红军的伤病员没有地

方隐蔽和安置，部队士气必然要受影响。总之，大多数同志举出种种理由，想出各种办法，主张守，不同意撤。最后，何挺颖同志作结论说，我们要坚守井冈山，这个方针是不能动摇的。毛党代表在下山以前，就决定要我们保存井冈山这块根据地，要坚决反对逃跑主义，团结、批评一切不稳定的、对革命根据地认识不足的同志。到会的大多数同志听了何挺颖的讲话后，都纷纷表示坚决执行前委和毛党代表指示精神，坚守井冈山。

几天以后，湘赣敌人于八月三十日向黄洋界发起了进攻。黄洋界在井冈山的北面，高十五里，除了一条重重迭迭的小路，四周都是悬崖陡壁，无法攀登。我军在山上、哨口筑有坚固的工事，这种工事虽然没有钢骨水泥，但它有粗大的松木，和几人深的厚土坯，结结实实，是能够抵御一般火器的。当时我们缺少地雷，就想了个土办法：把竹子削成尖尖的竹钉子，埋在山坡上、溪沟里。头一天，敌人用了两个营的兵力，攻到黄洋界的工事外围地区。我们凭险据守，用机关枪扫射，用手榴弹打击，杀伤敌人很多。敌人在外围中，被我们埋的竹钉刺伤了不少，使他们的进攻不能得逞，战斗到晚上七点多钟就停止了。第二天清早，敌人继续向我们进攻，气势比头一天更厉害，上午连续几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下午，敌人又发起更猖狂的冲锋，共有好几个团的兵力，比我们多十几倍。我们的工事渐渐难以支持了。我军原有一门迫击炮，因为炮弹少，一直没有使用。这时，我们便把它架起来，出其不意向敌人密集的队伍猛击。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损失很大，往后败退。我军乘机奋起追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狼狈逃窜。这一场战斗胜利结束了。

我军以少胜多。使敌人大为震动。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给湘赣边界的群众和红军战士以很大鼓舞和深刻的革命斗争教育。同志们深深感到毛委员的伟大和英明。有的同志说："我

们的主力部队不在，留守的人这样少，还有些伤病员，敌人可就上不了山，这倒有点象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哩。”另一个同志接口说：“这不是空城计，是毛委员给敌人摆的‘空山计’。我们也编段戏文唱唱倒不错！”这个提议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几个人就仿照京剧“空城计”，你一言我一语凑起唱词来。最后凑成了一段戏文，还给它起个名字，叫“毛泽东的空山计”。

这段唱词是：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经验少，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这以后，我们山上文娱活动又多了一个项目。一到休息的时候，就找些破洋铁皮子敲敲打打，弄床毯子一披，就唱起这段戏文来。

艰苦的岁月

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由此可以想见，那时我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记得在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们还是穿着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从军长、党代表起，都是一样苦，因此士兵们没有什么怨言。

井冈山的物质生活是这样艰苦，战斗是这样的繁重，我们还能坚持下来，主要的是依靠党和毛党代表的正确领导，在党外依靠士兵委员会，依靠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长官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开会说话有自由，长官不对，他可以在会上提意见；一切不必要的礼节都把它取消了，使官兵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士兵中有经济委员会管理伙食，一切经济帐目公开；有时打到土豪还能打打牙祭，吃得好些；在活动较好的地区，有时能从油盐菜金中节余一点零用钱（名叫伙食尾子），每人每天匀得六、七十文钱。这样的办法在我们连队是很有效果的，特别是那些新来的俘虏兵非常满意。他们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仗不是勇敢的，到了我们军队就勇敢了，并也和我们一样吃苦，原因在那里呢？就是他们的精神得到了解放。毛党代表说过：红军是一个大火炉，俘虏过来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制度就是军队也需要民主，军队内的民主制度，将是破坏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军队内民主性越大越好办事。回忆我们从南昌起义的时候，在潮汕失败后，回到粤闽赣地区，士兵中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现象，不管怎样严格约束，甚至要枪毙，他们都不在乎。到达井冈山以后，毛党代表提出了建军方针，军队内实行民主制度以来，队伍的精神面貌与过去截然不同了。

我们红军的官长，是能以身作则的。冬天，我们还没有穿上棉衣，领导上想尽办法，打土豪或利用关系到白区买来了棉布、棉花，在茨坪后方组织妇女和留守机关人员缝制棉衣。毛党代表很重视这项工作，亲自参加缝棉衣，和群众一起铺棉花。棉衣做好了，送到部队里，战士们穿上暖和的棉衣，心情是多么兴奋呵！一个领导人，不仅要管全局，就是一些看来细小的事情也要亲自动手，这说明我们共产党的领袖是如何的勤劳和关心群众。

这时候，山上很缺粮食，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俗话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样多伤病员和群众，没有粮食怎样过日子？一定要想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前委和毛党代表决定动员部队到山下运粮上山，供给伤病员和留守在山上的老弱人员。这一指示下达后，同志们立即响应号召，军首长和各级干部亲自带头挑谷上坳。黄洋界山高十五里，从山脚挑粮食到山上的五井，大约有三十多里山路，一天挑两次。同志们不辞辛苦，累得汗流浃背。我和粟裕等同志挑着粮食到了半山上，放下担子休息，不一会儿，就看见我们的营长胡少海同志，肩上横扛着整麻袋粮食，从山坡下走上来。他们精神勃勃，看不出一点疲劳的表示。接着，来到半山上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同志在唱歌，有的同志在互相攀手劲；也有的同志把汗湿的衣服脱下来晾一晾，他们的背上有的磨起了红块，小泡大泡，而他们毫不在乎地说："不要紧，起点泡算什么？我们在枪林弹雨中都不怕，还怕这点泡泡！"这是多么英勇顽强的气概呵！有的同志还编起了顺口溜：挑谷上坳，粮食可靠，为着伤员，不怕起泡。休息过后，挑粮的队伍继续爬上山了，有的挑着箩筐，有的背着口袋，也有的把粮食装在裤腿里，挂在脖子上……真是各色各样。同志们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好象一个蛇阵。歌声嘹亮，震荡山谷。有人说："我们打仗能爬山，挑谷也能爬山；不管山多高，还是要赛跑"。胡少海同志说："我们今天挑粮食等于打仗，我们又胜利了！"

在井冈山上，不仅粮食困难，医药同样是困难的，中药都用不上，那时伤病员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毛党代表率领大队南下时，要我留在井冈山上管理伤病员的工作，这个任务比打仗还难。我看到伤病员在床褥呻吟，辗转不安，十分痛苦。这些情况，我是有责任的，必须尽力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我们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万般无奈，同志们提出要我到永新去找毛党代表请示。

前委驻在永新城外一个村庄里，七月下旬，我到那里时，毛党代表到农村去了，两天以后，他才回来。当天晚上，我就走进他住的一间小平房里。毛党代表正在油灯下看文件，见我进来，他站起身说："你来了。听说你等了两天。"我当即向他汇报了伤病员的情况。毛党代表非常关心伤病员的情况，静静地听我谈完了以后，说：我们好人没有吃，没有穿，是不大成问题的，但对伤病员一定要照护周到，不然就会影响战斗情绪。这不单是个伤病员问题，而要看作是一个战斗问题，如果不医治好伤病员，传到部队去，就会在战士中起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对伤病员的医疗看护工作非常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毛党代表说完以后又接着问："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回答说，要解决钱和药的困难。他说，"好，你们到团卫生处去商量一下，分一点药。钱，现在是困难，部队的菜金还没有！不管怎样，也要由团经理处想办法，给一些让伤病员用"。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要两百块大洋。他便写了个条子，命三十一团团长去办。随后，他还谈了谈当时的革命形势，要我回去转告伤病员，嘱咐他们安心疗养。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我辞别了毛党代表，到了三十一团团长那里。团长见了我很热情，亲切地询问着伤病员的情况。他看了毛党代表的条子，就叫传令员找来团经理处、卫生处两位处长。结果，卫生处的药虽少，为了照顾井冈山上的伤病员，他们尽可能分出一些碘片和其他必需药品；而经理处的钱很困难，想尽办法才搞到一百六十块大洋，还等了两天才拿到手，足见那时我们的经济是多么困难。

我回到井冈山上，把这次出去的经过谈了谈，伤病员们都很兴奋，说毛党代表真是我们的好领导。他们表示：我们一定要把伤病员养好，赶回前线杀敌，以报答毛党代表和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我把带回来的钱，六十元用作伙食费，一百元交

给王佐营长利用关系到吉安买药，度过了难关。

在井冈山这一段时间，毛党代表不仅在生活上很艰苦，在工作和学习上也是很刻苦的，真是我们的榜样。他非常关心时事，记得还在井冈山会师时，我们刚到大陇，一见面，他就问我们带报纸来没有。我们从参谋处找来几种报纸，他如获至宝，把这些报纸都拿去了。有一天我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看“资本论”，研究马列主义学说。他时时刻刻不忘记学习，经常看书到深更半夜，工作稍有空隙，他就学习，即使在行军中，骑在马上也要看书，马袋里满满的都是书。他看书很认真、重要的地方点圈划线加标语，进行分析和研究。所以，他作文章也好，讲话也好，都是引古证今，深刻、透彻、明确。凡是重要报告和文件，都是他亲自撰写。如“井冈山的斗争”就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的。同时，他还写了一些诗词。毛党代表在战斗环境中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是我们应该深刻体会和学习的。

我们到井冈山地区将近一年了。湘赣敌人围攻我们好多次。我们执行了毛党代表的作战原则，打垮了三次进攻宁冈七溪岭的两杨（杨池生、杨如轩）滇军，从敌人手里得到不少弹药和器材。补充了我们部队。大队南下回来后，经过整顿，同志们的觉悟提高了，部队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湘赣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有的地方分了土地，成立了苏维埃；彭德怀带领平江暴动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后，革命声势就更加壮大了。但敌人是不肯坐视革命势力的发展的，湘赣两省又调集大军，向我们“围剿”。为保卫井冈山，扩大根据地，有效地打垮敌人的“围剿”，毛党代表留下平江暴动来的队伍守山，亲率红四军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离开了井冈山，到粤赣闽边界进行游击运动战，以分散敌人的力量，扩大革命根据地。毛党代表和红军每到一处，红旗就在那一片大地飘扬起来了。

回忆井冈山上的战友 张子清同志

何 长 工

看到今天全国人民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便不能不想到过去的艰苦斗争，和在斗争中以生命换取胜利的英雄们。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共同参加秋收起义，后来又在井冈山上一同工作的战友张子清同志。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那还是在井冈山上，我和他一道工作。张子清同志是湖南益阳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共产党。记得他对我谈过他是毛主席在广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因此很早他就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了。“马日事变”后，他乘当时招募新兵的时机，参加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在那里担任副营长，警卫团到江西修水，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他升任营长。部队到达井冈山以后，他任三十一团副团长、团长等职。三十一团是毛主席的基本队伍，也是我党领导的大革命所遗留的宝贵财产。从那时起，他就成为毛主席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之一。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在罗霄山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我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革命形势由战略进攻阶段转入到战略防御阶段，也即是储蓄革命力量待

机转入新的进攻阶段；在军事上从大规模的集中的正规战转入游击战，由城市转入农村根据地。当时，个别同志的脑筋，一下子还转不过来，但他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的，进入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战斗——茶陵战斗中，他遵照毛主席的意图，取得了占领县城的胜利。张子清同志不仅具有充分的军事知识，而且有革命斗争的智慧，所以他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体会很深。在游击战术方面，他有许多新的创造，因为他有一个特点，善于总结经验，每打一次仗，都总结经验教训，所以进步很快，这自然是毛主席思想对他的影响。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整训部队，无论什么样的部队，经过他一训练，就能够打仗，而且打得很好。这是因为他善于团结干部与联系群众，能当兵也能当将。自然也是毛主席思想对他的影响。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会师，是我党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事件。张子清同志就在这个伟大事件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一九二八年春，毛主席得知朱总司令领导了湖南起义，即主动地组织动员井冈山一带的力量配合湘南各县的群众斗争。为了使朱总司令的队伍顺利地到达井冈山，张子清同志完成了最艰苦的后卫掩护任务。当时分途追击朱总司令队伍的敌人兵力，约有三师之众，其中敌吴尚部三个团企图在酃县县城截击我部主力。张子清同志亲率三十一团侧击来犯敌人，他自己带一个精锐的后卫营，乘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占领酃县，就先通过酃县，消灭了酃县以北高地上的敌人，占领了这个高地和酃县县城。

战斗开始后，他坚守阵地，敌人凶猛地向高地冲锋，都被他顽强地击退了。时间，在这次战斗中是最紧要的，他能多坚守一天，多坚守一小时，甚至多坚守一分钟，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队伍都有莫大的好处，因为一分钟可以多通过一分钟的队伍，一小时可以多通过一小时的队伍。他不但击退了敌人十

多次的冲锋，而且，组织了十多次反冲锋，杀伤敌人数百，迫使敌人停止在鄷县以北不敢蠢动。就这样，他坚持了三天三夜，打破敌人截击及追击我军的狂妄企图，不但创建了我军以少胜多的战史范例，而且取得了充裕的时间，保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胜利会师。由于这个掩护战斗的胜利，保证了会师计划的完成，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周围的广大根据地。

不幸，张子清同志就在这次英勇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脚骨被打断。当时我们还谈不上有医药设备，只能找些草药医治，他的左脚就一直溃烂着。但是他带伤上山后，仍旧坚持工作，在重伤时期，还代理过一个时期的特委书记。当时他走路完全依靠担架，我们看到他病体已经愈来愈衰弱，脚上已经溃烂得不成样子，几次打算把他化装后通过封锁线出外治疗，但是因为张子清同志面貌清秀，不易化装农民，而且脚上是枪伤，又纯系湖南口音，不易混过敌人的检查。同时张子清同志自己也几次犹豫难决，他对我们说："不要冒险，与其死在敌人手里，还不如在山上养伤。我想我是会活下去的，最多成个残废。"又说："不要紧，你们放心，脚残废了算什么，一样还能革命。"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湘赣两省敌人三次"围剿"井冈山，他因脚上的伤口还在溃烂，不能走路，只好留在山上。我们撤退后，他藏在青石岗的一个石缝里，外面下大雪，他就在石头缝里吃干豆、竹笋和雪团。后来干豆吃完了，饿了四天，气息奄奄，幸敌人被我军围困而慌忙地撤退了，才把他找回来。从此，他的病势更重了，一九二九年四月，这个意志比钢铁还坚强的亲爱的张子清同志与我们永别了。

忆及在井冈山的霞园地方一个柏树林子里，我曾经和他在一起养过伤。特别使人难忘的是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不论在多艰苦的环境中，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老是镇静地笑着。养

伤时，伤势已经很重，但他还是精神焕发，谈笑自若，唱歌子，哼小调，朗诵诗词，讲故事给我听。在那间小小的茅棚里，他常鼓励我们，坚定我们的斗争意志。他总是肯定地说："天很快就要亮的，黑云就要散的。"因为，他坚决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胜利，共产党一定胜利，有毛主席，就一定会领导我们走向中国革命全面的胜利。今天证明他的遗言是说中了。

（原载《红色风暴》第二集）

改造王佐部队

何长工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

一九二八年初，毛泽东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坑，消灭了肖家璧的反动民团，乘胜占领了遂川城，迎来了井冈山第一个胜利的春天。我从粤北联系南昌起义部队返回不久，一天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向我说：“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我问：“去多少人？”毛泽东同志笑笑说：“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

听说要我自己上山，心里真有几分犹豫。王佐是井冈山上的一支武装，他和袁文才，一文一武，是土客籍的两个领袖，如今虽然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反抗旧势力，但这支武装，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纯粹是靠着封建的红帮关系维持他们的内部，完全是闯江湖的一套。我单独一人，怎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呢？

“不要怕。”毛泽东同志看出我有顾虑，便鼓励我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参谋长张子清同志在一旁说："毛委员的意思要迅速改造这支部队。他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如果山上出了问题，我们就有后顾之忧。毛委员已经直接做了许多工作，宁冈县委也跟袁文才谈妥了。你去吧，只要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去做，一定成功。"

毛泽东同志给了我许多指示，他特别强调指出，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毛泽东同志常说的一句话），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

我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带着他亲笔写给王佐的信，背起一个小包袱就出发了。

井冈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一座高峰，方圆五百五十里。周围有七个县，十五个市镇，山上有一片平地和许多梯田，王佐带领一支队伍，就住在山区的中心——茨坪；袁文才带领一支队伍住茅坪。他们一个山上，一个山下，把守了通向井冈山的七条道路，特别是五大哨口。

工农革命军开始进入井冈山地区的时候，他们对我们不了解，有戒心，不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在古城会议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这种思想，强调指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的武装。为此便通过地方党的关系，对王佐、袁文才进行了说服教育，并且送给了他们一些枪弹。毛泽东同志的名字，王、袁是早已熟悉了的。因此我上得山来，一说是毛委员派来的，王佐便以宾客相待。

王佐这人，只有三十来岁。身个不高，白面胖胖的，两条

眉毛浓黑，穿一身贡缎的黑色短衣，挎一支新式的驳壳枪。他有一身的好武艺。听说有一次十几个敌人把他包围了，他拿着一条板凳，就打出了重围，然后摸过一个竹竿，嗖地一下，跳上了房顶。他原来是文盲，这时已能读一般的文件了。他读了毛泽东同志写的信，连声叫道：

“好，好！欢迎，欢迎！”

说了一会话，王佐便命人摆酒设筵，说要为毛委员派来的人接风。

他们的生活作风，颇象当年的绿林好汉，大碗饮酒，大块吃肉。虽是靠山为营，但吃的都是山珍海味。饮酒中王佐盘开了我的“家底”。毛泽东同志曾嘱咐过，说他们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这条原则，我毫不掩饰地讲了自己的出身，经历。

王佐听了面带笑容。看来他对我坦率的回答颇为满意，随即也将他自己的出身、经历说了一番。最后感慨地说：“我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当过裁缝，种过田；因不堪地主豪绅的压迫，才起来闹革命。”接着他谈起了几年的战斗生活，谈到他的劲敌尹道一。

尹道一，是井冈山七县反动民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地头蛇。王佐和他打了多年，结下了血海深仇。这支反动武装，也是我们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一大障碍。听得王佐一说，我便应道：我们一定想法把尹道一收拾掉，把七县的地主武装民团肃清，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第二天，王佐集合队伍，当众宣布说：“弟兄们！毛委员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发展我们的事业……”他的言词流利，富有鼓动性。

王佐手下约有四、五百士兵，多是土籍人。他们实行季节

性和临时雇佣性的兵役制。无事窝兵务农，有事揭竿而起。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善爬山。听人说，他们下得山，若是被打散了，便会自动地跑回山来。这些士兵对我的来到，也无敌意，这就使我增强了信心。

可是，事情要比预料的困难得多。当时王佐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想靠近我们，但又怕我们拆他的台。因此戒心很重，故意说，在司令部不方便，便把我安置在离他一里路之外的一处小房里。并且派了一个颇不简单的“勤务兵”照顾我，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王佐还特别对我说：“你初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这话，听起来客气，实际上，是给我的警告：不许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

我没有来以前，他们摆香堂、拜把子是公开的活动。我来以后，因为知道我们党反对这些，他们就瞒着我搞。最初几天，我也很小心谨慎，只要他们不让我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他们开会、筵客不请我参加，我就当作不知道。

我每天吃罢饭，就看看书。看倦了，就出门散散步，看看山上的景色。站在门前的山峰上，向四处望去：山峦巍峨，古木参天，绿竹满目。再远处：东有秦岭帐，西有金狮面，南有金竹山，北有旗锣坳，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崴嵬险峻的井冈山，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发展壮大的好地方！可是，眼下有个王佐在此，要争取他，不知道要做多少工作，“既不能缓，又不能急”，这是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原则，每当想到这句话，心里总是很着急。

为了消除王佐对我的戒心，我便经常到他家里坐坐，有时还帮他办些家务事，趁机向他的母亲、哥哥、妻子宣传些革命道理。王佐对我到他家里去并不反感，认为我这人“爱朋友”，“讲交情”。这就开了方便之门。我便通过他的家属，对他做

了些宣传工作。渐渐地，王佐也主动来接近我了。

王佐有三个心腹朋友，一是袁文才，二是刁飞林，三是李克昌。他有什么大事，总是和这些人商量。而经常在他身边的，又是刁、李二人。他们是王佐的左右二将。这两个人性情豪爽，重义气，颇易接近，找他们谈心，很快就搞熟了。谁想，有一天刁飞林突然提出要和我“饮鸡血酒”。

这事就使我为难了。饮鸡血酒，就是磕头结拜。不答应，怕伤了他的情面；答应了，显然是有害的。我经过慎重考虑，便婉言暂时推开了。

原先王佐最担心的是我会拆他的台。过了一个时期，他见我没有拆台的意思，又加上他母亲，刁飞林等人从中说了些好话，疑心便渐渐消退了。有一天，他来和我商量收拾尹道一的办法。

尹道一一向很轻视王佐，他仗着人多势大，每次和王佐打仗，总是穷追一气。当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建议王佐，设法把尹道一引出来，选择一个有利地形，打他的埋伏。

王佐听了，两眼眨眨转了几转，两手一拍叫道：“着！此计甚妙。不把这个贼子灭了，我决不甘心！”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行动计划，在一个夜晚，率领部队下了山。

尹道一的司令部，驻扎在永新县东乡的拿山，从那里到茨坪，中间要经过一个险要的山坳，叫旗锣坳。据说，从前井冈山出过一个翰林，这里是举旗鸣锣接翰林的地方。我们估计，尹道一不追便罢，要追，一定要经过此地。因此，我和刁飞林带一个连埋伏在这里，王佐和李克昌带一支人马赶到尹道一所在地拿山。他们拂晓打响，天一亮回头便跑。尹道一不知是计，带领民团，猛追出来。

天将中午，他们追到了旗锣坳。先头部队追上了山，尹道

一的指挥部驻下吃饭休息。

我们埋伏的部队看见尹道一上了圈套，一个猛冲，打了下去。他们有的在吃饭，有的把枪放在一边睡觉，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着，顿时慌作一团，纷纷四处奔逃。尹道一当场被打死。刁飞林把他的头颅斩下，用包袱包好，收拾了胜利品，便收兵回山。

到了山上，天已大黑。消息早有人报给了王佐。他连声问道："真的把贼子除了？"

"请看这是什么！"刁飞林展开包袱，把尹道一的头抛在地上。

王佐端过灯一看，拍着手大叫道："看！就是这个贼子！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作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说罢便令人摆酒设筵，庆祝胜利。

这一夜，山上灯火通宵不熄，如同过年一般。王佐喝了个大醉，不时把大拇指伸到我面前，连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

其实，这个小伏击战，对我们工农革命军每个指战员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这是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基本作战方法，但在王佐的眼里，却是了不起的事。

第二天，王佐派人抬上尹道一的头颅，到各村各镇去游乡示威。一连闹了几天。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他们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特大喜事。从干部到战士，思想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人笑逐颜开，个个斗志昂扬，出出进进歌声不断。于是，我便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在部队展开了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我发现他们唱的歌多是些山歌、小调，缺乏现实斗争的政治内容，一天，我对王佐说："你们歌唱得不齐(没说不好)。"王佐说："你不是会唱歌吗？找些人来你教教。"于是，便从各连抽出三名士兵，组织了一个"学歌"小队。这当然是个好机

会，通过教歌，对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又通过他们去宣传别人，从此打开了接近士兵的大门。

打完尹道一，王佐提出要扩充部队。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建议王、袁两支部队合编一个团。

王佐也有此心，便说去和他们“老庚”商讨。

他所说的“老庚”，就是袁文才。这人是个知识分子，参加过大革命，思想比王佐进步些。他是客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曾对他做过一些争取工作。王佐既然愿意改编，他那一关就不难通过了。

一切条件成熟以后，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便在宁冈大陇举行庆祝合编大会。正式宣布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毛泽东同志到了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根据他们自己的提议：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实际上领兵的是他)。党任命我为该团党代表。宁冈、遂川县委发动了当地群众，对他们进行了热烈慰问。袁文才、王佐带头举行了宣誓：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提出口号：向第一团学习。

这时井冈山四周，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形势很好。在这种情况下，王佐要求给他们派遣干部。就在这个进步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又派了徐彦刚、游雪程等二十几个干部，先后来到这个新生的团队，徐彦刚任参谋长，游雪程任政治部主任，其余同志分别担任各营、连长和党代表。团里成立了党代表办公室，以及工农运动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处）。从此，党的政治工作，便在这支部队里生了根，加强了部队革命化的建设。

毛泽东同志对改造这支部队，是费了不少心血的。他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和袁文才、王佐谈话。给他们讲解形势，讲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并借古喻今以教育他们。王佐最高兴和毛委员谈话。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从茨坪路过，和王佐谈了多

半夜。事后王佐兴冲冲地向我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对于他们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很及时，很具体，经常给我们指出工作中的重点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后，他又指示说：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要继续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

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如何使这支少数人掌握的武装，变为党绝对领导的武装；使绿林作风、游民习气很重的部队，变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部队；在部队的内部关系方面，要以革命的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来代替封建的雇佣关系；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等等。

第一团来的二十几个同志，都是优秀的政治干部。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分析研究了部队的特点，做出了工作计划。首先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同时开始建立了政治课、文化课的制度。通过新旧事物的对比教育、环境（即时事）教育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连队的一切制度和建设，都以第一团为榜样。并组织下级军官和士兵去第一团参观。第一团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支秋收起义的部队，经过三湾改编，树立了良好的革命秩序。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和群众的关系密切，部队思想觉悟很高。去参观的人，无不羡慕，甚至有的士兵参观后，都不想回来了。

王佐虽然没有去参观（他是不轻易下山的），但听得他手下人称赞第一团，他也说："咱们向他们学习，他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于是，士兵委员会、纪律检查组便先后组织起来。

士兵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衣，学唱歌、学演戏，茨坪山上充满了新的气象。王佐看到这一切，

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是会领兵，会做群众工作，深得群众拥护，照这样下去，怎能不打胜仗。"

三月，井冈山的部队，应湘南特委的要求，去支援湘南起义。同时掩护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和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同毛委员率领的部队会师。因此新生的第二团也踏上了征途。这是它走向较大规模作战的开始，也是它政治上得到进一步改造的良好机会。

每到一处，群众夹道欢迎，送茶送水，十分亲切。这是王佐和他手下的人从来没见到过的。每逢有人欢迎，王佐就把手举得高高的，使劲地鼓掌，并不时兴奋地回头向我说："党代表，人民群众对我们太好了，太好了。"

王佐从来没出过远门，没见过大世面。出了山，他对一切都觉得新鲜。

部队住下以后，他到街上去逛，眼更不够使了。东看西看，看到电灯也奇怪地说："嘿！好古怪的东西！不点火会亮！"

这次出征，使王佐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受到了群众革命斗争的教育，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心。晚上，他兴奋地谈着自己的见闻，谈着人民如何热烈地欢迎他，自言自语地说："三十年来，住在山区里，真不知外面还有这样好的世面，这样好的地方。将来，我们在山上搞起这样的局面，那该多好！"

这时候，我便向他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剥削阶级，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同时对他说，一个革命者，首先为大多数人民着想，决不是为着个人。他听了点头说："此话有理！此话有理！"

这次下山，王佐原来是有顾虑的，担心回不了井冈山，担心部队垮了。资兴县的滁口一仗，在湘军第七师配合下，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获了许多枪支，王佐的信心高了。特别是不

久以后，井冈山成立了红四军，二团改为红四军三十二团，对他更是很大的鼓舞。

回到井冈山后，一天吃罢饭闲谈，他突然问我：

“党代表，你说，象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入党？”

听他这话，以及他从湘南回来的许多表现，可以看出他内心起了很大变化。这是半年多来党的政策对他影响的结果，同时，红军日益扩大，人民拥护党、拥护革命军的真诚行动，也使他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便向他解释入党的条件，鼓励他以后更好地靠近党，把心交给党，他听了后连连点头。

改造王佐这个人是不容易的，改变这支部队的一套旧制度、旧作风，更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组织士兵委员会，很多连长反对，他们说：“什么都是士兵讨论，还要官干什么！”连队公布伙食帐，有的连长发脾气说：“公布什么帐，我贪污啦！”士兵唱歌演戏，有的连长说：“这是兵营，还是戏班子？”为着这些，营连的党代表不知说了多少话，磨破嘴皮地和他们谈。特别是废除打骂现象，开始时遭到很多人反对。有的甚至说：“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不打不骂怎么成！”

我们说服了王佐、袁文才，并要他们下命令，不准打人。这样，公开打人的现象逐渐地减少了，但又出现了许多变相的打，如扭耳朵扭眼皮，罚跪。为了彻底纠正打骂士兵的军阀残余习气，去各连党代表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当时打人最凶的是七连副连长。一天行军中，有个士兵犯了个小错误，他当即拿绳子绑了起来。该连的党代表说服无效，路上别的连队党代表看见了，就鼓动士兵一起喊口号：

“反对绑人！”

“反对军阀残余！”

那个副连长在群众的压力下，和其他同志帮助下，只好认错，把人放了。经过一番内心斗争，事后找党代表作了检讨。

随后部队建立了党组织，党员的人数一天一天增多，更加速了部队的改造。许多旧习气、旧作风也慢慢改变了。加上边区的发展；土客籍广大群众拥护党，拥护革命，这就大大影响了部队士兵。士兵的进步，推动了袁文才、王佐进步；他们两个人以及许多下层干部的进步，也影响着部队。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从外部到内部，许许多多因素，促使着这支部队迅速改变着面貌，从落后变先进，从游击变正规，从分散变集中。……

虽然也有个别流氓习气拒绝改造，逃跑叛变了，但绝大多数的人都走向了革命道路，做了新人。王佐后来也入了党。一九二九年部队扩编为红军第五纵队，王佐做了副司令。原来在王佐手下一名号兵，在红军长征时也做了团政治委员。

这支旧部队的新生，为后来改造旧部队创造了一个好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到井冈山后一个英明的措施，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原载一九七八年《解放军文艺》第八期）

伟大的会师

何长工

（一）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伟大的秋收起义，以后又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井冈山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程，引起了无数革命者的向往。

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十月五日我自井冈山出发，十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十二月中旬辗转来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由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

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下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汽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急忙洗完澡，会了帐，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我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象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地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同志部队的哨兵把我转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见了蔡协民同志，不由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湘西洞庭湖一起作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象马克思。"蔡协民同志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同志。

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进进出出，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同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同志去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部分盘费，握着我的手说："希望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二）

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我回到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朱德同志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消息。湘南暴动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宜章、郴川、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就建立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湘粤两省的敌人，立刻出动"会剿。"湘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衡阳，粤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曲江，沿粤汉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郴州。江西的敌人也出动了，牵制我们井冈山工农红军的行动。但由于湘南是湘粤两省的要道，是敌人必争之地，也因湘南特委在政策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部分地脱离了群众，因而暴动失败了。

三月上旬，应湘南特委的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师长，率

领部队向湘南行，支援湘南暴动。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同志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一团作为左翼，楔入桂林、汝城之间，命令我们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第二团是在收编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一千人，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过战。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队伍，拿的都是土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师长叫邓允庭。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敌情：湘敌何键的部队，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将北犯的粤军，阻挡在九峰山脉，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同志的暴动总指挥部撤退。会上又决定第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

我们连夜经汨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了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滁口离郴州不过一百多里。敌人也刚到滁州，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不大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奋力攻打了两天两夜，敌人终于软下来了。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来，向南撤逃。我们跟踪追击，向南直追到接近文明司的地。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主力，朝我们压迫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

摆脱了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

探听到何键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逼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送到郴州，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夹击。我们北撤时，不意在资兴附近却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军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我们急忙问他："朱德同志呢？"陈毅同志说："他和总指挥部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同志从郴州撤离时，正是我们打滁口的时候。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阻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祜涛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祜涛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回衡阳去。杨祜涛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份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发了。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回来的时候，陈毅同志和我并马缓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不幸的预感、无能为力的自疚，在我们心头起伏。

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给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一个党和团的特委机关，就这样损失了，这是在游击战争初期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三）

我们回到彭公庙，就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立即撤回井冈山，他带队伍在后面撤护，并正由汝城向酃县撤退。

当我们快接近酃县的沔都时，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朱德同志带领的队伍已经到了沔都了！"大家一听说，都高兴得加快脚步，飞速赶去。进街后，果然看见一些军人在来往，他们有的穿军衣，大部分都穿的便衣，颜色有黑的有灰的，帽子也不一致，但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神气得很。

我随着陈毅同志、邓允庭同志，以及几个县委书记，一齐来到朱德同志的屋里。他穿着一身不大整洁的灰军装，绑腿却还是打得那么结实，脸色比在犁铺头的时候黑多了。他笑呵呵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问他："这次没有受损失吧？"他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理发，胡子长得很盛了。家务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我说："我们拚命向南打，想不到你撤得这么利索。"朱德同志笑咪咪地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的撤退。"接着他又问："毛泽东同志在哪里？"我报告说："他担任后卫，大约还得三四天才到。"

我们陪朱德同志吃了饭。饭后，我告辞说："我先回宁冈，准备一下房子和给养，还要动员群众热烈欢迎你们呢！你还有什么指示？"

朱德同志和蔼地说："你们是主人，你们咋个料理都行。"

第七师归队了，陈毅同志也留在朱德同志身边。四月二十

四日，我们第二团回到砻市，将队伍布置在东边，向江西警戒，然后将宁冈附近的后方机关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为欢迎兄弟部队筹备房子和给养。

回到砻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同志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砻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第一团回来了，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象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竖立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涛，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同志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同志到来时，朱德同志赶忙偕同陈毅同志到门外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龙江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前几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那么深情。

进了龙江书院里，毛泽东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同志作了介绍。

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赣两省的敌人竟

没有能整到你！”

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同志热情地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说着，转过身叫我负责准备一下大会，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等他指示完毕，我们几个跟他来的同志就告辞出来，让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可以安静地商谈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同志带来的战士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倾吐盼望之情，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展望未来前途，表示今后决心。到处欢声笑语，一片热闹景象。

（四）

山清水秀的砻市，今天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油菜花更黄，溪水更清，秧田更绿。在砻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插满了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板。

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十点钟，二十里路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和湘南农军约一万人，群众也不少。人山，旗海，歌声，笑语，汇成了喧闹的浪潮。

十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我担任大会司仪，便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

从树顶直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威武雄壮，响彻云霄，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

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了。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个大会庆祝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红四军军委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

朱德同志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他的话刚结束，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同志讲话。他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的背后去“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手心里玩。毛泽东同志这一

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

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讲了一番军民关系的问题后，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贺新成立的红四军，在将来跟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根据地能顺利地发展和巩固。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胜利会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声势更加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会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进攻，取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湘赣边界的红旗子，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兵群众的希望。这时，许多学生和安源煤矿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了井冈山。醴陵也有一批革命农民和学生，长途跋涉奔上了井冈山。后来滕代远、邓萍等同志率领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

（原载《星火燎原》第一集）

激流归大海

——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

粟　　裕

就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艰苦转战的同时，毛主席亲自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举行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经过著名的文家市会合，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到达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当我们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消息，非常高兴。陈毅同志曾读过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他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领袖，久已景仰。这时我们正处于孤军转战、极端艰难的境遇，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的消息，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十一月间，我们在崇义、上犹地区时，为了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情形，朱德、陈毅同志便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去进行联系。不久从毛泽东同志那里来了一个营，由张子清、伍中豪同志率领，是上井冈山途中在大汾遭敌袭击而转移到这里的。起初据地方党组织报告，上犹县的鹅形地区

有一支革命武装在那里活动，陈毅同志立即换便衣亲自前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知道了一些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登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那时候，兄弟部队之间很讲阶级友爱，我们从范石生那里搞到的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不仅补充了张子清、伍中豪同志带领的这个营，还有一部分由这个营携带返回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二月初，我们打郴州时，毛泽东同志又派一个特务连到郴州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湘南起义创造的一片大好形势，遭到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严重损害。当时，"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主张，即为了不让军阀队伍沿湘粤大道停下脚来占领湘南，要求把湘粤大道两侧各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湖南省委专门派人到部队来传达这错误主张，并要求坚决执行。"左"倾路线的烧杀政策，虽然受到一定的抵制而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贯彻，但已经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激起人民的反抗，使我们的斗争受到很大挫折。同时，由于湘粤大道是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我们占据湘南，控制这条大道，对各派军阀威胁很大。三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刚刚结束，他们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妥协，便立刻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我们进行"协剿"。朱德、陈毅同志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果断地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四月上旬，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同志率领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向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分路赶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转移，在汝城、酃县城郊打击了追击之敌，掩

护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湘南部队顺利地到达砻市。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胜利地回到了砻市。

"激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队伍就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光芒万丈的井冈山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道路。自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都竭尽全力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同时总结了其他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这条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夏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接着，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出了四军军委，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五月初，又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军党代表，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任军参谋长。记得在如今称为建军广场的那个场地上举行的庆祝会师大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大量的禾桶排列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的讲坛和

舞台，演出了许多在当时算是精采的节目。部队和民众挤满广场，大家的革命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主席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摘自1978年12月1日《解放军报》）

忆红四军片断

曹里怀

上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初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到了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湘南各县建立起来了。农民纷纷起来，举起红旗，拿起梭标，对土豪劣绅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斗争。

不久以后，敌人反攻了，白色恐怖来到了。为了避敌优势，红军和一部分暴动的农民开始向井冈山转移。当时在资兴的红军是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何长工。我就参加了这个部队，随着上了井冈山。

我开始在团部，后来分配到了第四连，连长叫徐彦刚，四川人，黄埔学生。连党代表叫房灿，是学生出身。我由他们二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入党还是秘密的，要举行很严肃的入党仪式，宣读誓词。记得誓词是写在一块一方尺的红布上面，誓词最后两句是："遵守纪律，永不叛党。"这两句话在当时艰苦困难的游击战争中，对每个党员都有极为重要的行动意义。

我们要打开向井冈山前进的道路，一路上要同地主反动武装战斗，打垮他们。我们连里有老兵，也有新兵，也有农民，也有学生。这些初次走上战场的人们，从来也没有学过什么战斗动作。初战滁口，勇气虽然很大，但听到枪一打响，心里就

发了慌。应该怎样隐蔽，怎样打枪，全靠班长和老兵具体指导。打了一仗，因为是在森林里，也没看清敌人，可是子弹倒消耗了不少。这次战斗以后，大家才懂得了要爱惜枪支和子弹，因为每一粒子弹的取得都是经过战斗和流血的。

经过了一段行军作战，终于到达了井冈山上的茨坪。

在茨坪每天顿顿吃的是红米、南瓜，大家开玩笑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但是仍然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因为井冈山是贯穿数省的罗霄山脉的中枢，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一个较好的游击根据地。

茨坪是一个不平凡的地方，有山、有水、有田地、有人家，真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有不少的部队，机关都在这里驻扎过。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曾经住在茨坪，和大家一起同甘苦，共患难。井冈山真不愧为红军的发源地。

令人难忘的大柏地之战

一九二八年寒冬，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开始在赣南地区行动。首战告捷，进占了大庾，守城敌军闻风丧胆，不战而逃。红军的机动范围扩大了，在数省边界间纵横驰骋。

红军的行动，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惊慌。他们想趁红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消灭红军。当时在赣南地区的解放军有李文彬、刘士毅两个旅，他们的战术是穷追、截击、袭击。在寻乌县项山地区，才脱离了险境。红军在那种情况下，时时刻刻都要准备行动，准备打仗。在行军的时候，要争取黄昏以前到达宿营地，布置警戒，了解地形、敌情、找好紧急集合场。每到一地，就要向群众作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作群众工作。这些措施，当时已经成为红军非常牢固的制度。

快要过旧历年时，红四军进入了瑞金县的大柏地。

自从红军下山以来，在敌人的所谓“穷追”之下，天天行军打仗，不少人脚都走肿了，有的掉了队。而敌人又跟着来了。继续走呢？还是打他一仗？当时上下都要求打这一仗。这一仗的胜负，对于红四军以后胜利地前进和发展也的确是极为重要的。

记得在大柏地这条小街上的一间店子里，用木柴燃着一堆熊熊的火焰（这在饱经餐风露宿之苦以后，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们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坐在火旁，一面烤火取暖，一面谈论，策划和决定了这场利害攸关的战斗部署。

战斗一开始打响，就非常激烈。肖克同志所带领的部队子弹几乎都打完了。但因红军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上下一心一德，求战心切；我军先到，可以选择有利地形，又是预先有准备的伏击；尾追的敌人是刘士毅的两个团，战斗力不强；在追击、截击我们时，敌人同样疲劳。这样，大柏地一仗，我们终于打垮了敌人两个团，取得了胜利。大家都喜在眉头笑在心，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毛主席在“菩萨蛮”一词中有“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两句，就描绘了这场激战的情景。

打了这一仗之后，枪也多了。军队每人发了一支长枪，连朱总司令也背了一支。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宁都城。经过一段休息，大家脚也好了，也没有掉队的了。由宁都转到兴国的东固的红二、四团根据地，休息了一个星期，又继续向闽西进军。

夜渡梅江

红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一九二九年已分为一、二、三纵队。当年夏天，在江西雩都城和彭德怀同志统率的红军第五军会合后，红五军转往湘赣边界，红四军就在闽粤赣三省边界行动，互相响应。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由江西而福建，

由福建而广东，爬山越岭，神出鬼没，过着痛快的游击战争生活。当然，战斗生活是艰苦的，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红军官兵都喜气洋洋，深信革命终将成功，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我们经过许多地方，都开展了党的工作，发展了群众运动，军民关系真如血肉相连，水乳交融，使红军毫无孤立的感觉。

一九二九年的秋天，红四军由福建向广东的东江行动。这时正值秋高气爽，东江一带遍布色直树、果木园，具有特殊的南国风光。

东江开头一仗是夺取梅县。敌军闻风而逃。红四军进占梅县，震动了潮山敌军。第二天，敌人反攻，我军为俟机再战，决定主动撤离，渡过梅江，进入山地隐蔽集结。

红四军建立经过

何重仁

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所剩基本队伍一三两团，在浏阳万戴之间的文家市会合整编。毛主席赶往军中，召集部队讲话，以高度的革命决心和信心，鼓舞了战士们再接再厉地为革命胜利而奋斗的坚强意志，并亲自率领这支部队，沿湘赣边境向井冈山进军。

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按照计划进行，途经平江、浏阳、铜鼓、萍乡，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但在芦溪地方，我军以情况不明，加之沿途染疾病者很多，因而遭受到反动军队江宝定营伏击时，损失很多，卢德铭同志战死。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坚决革命的战士们，虽然身负重伤，仍然毫不动摇地跟着毛主席从莲花东南进入永新境内的三湾村（现改隶属永新县）。在这里，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由一个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更换了军事指挥员，建立了党代表制度，成立了前敌党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虽然当时人数不过两营，但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战士们都具有极其坚定的革命信心和无限的斗争勇气。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毛主席整编队伍以后，即进驻宁冈古城。这时，宁冈农民自卫军队长袁文才在茅坪，闻说有部队到了三湾，派陈慕平（毛主席所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共产党员）等三人去探询。陈慕平在古城遇着毛主

席，便把毛主席队伍迎往砻市，并将毛主席送给袁文才的一支马枪携回茅坪，介绍袁去见毛主席。袁文才直接受到了毛主席的教育，对革命更具热忱，即为毛主席的队伍筹办粮饷六百元，此后，毛主席率部队到井冈山北麓茅坪的步云山整训。毛主席给袁文才一百支步枪，叫他扩充两连人，并派吴兆梅任袁部教练官，许彦刚、游雪臣、袁炎飞、陈伯钧分任连长副连长。当时毛主席部队称三十一团，袁文才、王佐（井冈山地方武装）两个部队称三十二团。毛主席还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原则，并亲自讲授。至此，革命实力，以宁冈县茅坪、大陇、桥林三乡为活动中心，以井冈山区大小五井（村）一带地方为后方据点。这便是我们的工农革命军从城市转入乡村建立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开始。

新城战役——革命队伍经过整训扩充以后，在十一月间占领了茶陵，成立了第一个工农政府。一九二八年旧历新年，毛主席带第三营回到了茅坪，得知宁冈县伪县长张开阳带了一营兵到达新城。毛主席即召集袁文才带二连兵力，一连打左翼，一连由老七溪岭包后路，毛主席亲自带第一营与第三营的主力，经柏路打东门，另分二连在正面古城梅杨守候。计划已定，当夜三更出发，在蒙蒙的晨雾中，我军沿河摸到离新城二里的长望亭的排哨，静悄悄地包围了新城。翌晨，敌人吹过起床号，到城外上早操，我军埋伏一排枪打过去，吓得敌人惊慌失措，丢下枪支逃回城内，紧闭城门，企图顽抗。我军在城外缴得步枪三十支，冒着弹雨冲到城墙脚下，身背着城墙，枪向上瞄准，敌人如敢伸出头来看一看，我军就给他一枪，这样接连打死几个，再没人敢伸头出来了。敌人倚靠城墙保护，拒不投降，我军即用洋油烧城门，同时，我方八位英雄组成一个爬城冲锋队，在机关枪的掩护下，用长梯爬城。我军冲上城去，敌

人开西门逃走，西门外我伏兵予逃敌以迎头痛击。一营反动军队，差不多全被消灭。这一仗，活捉了张开杨，俘敌百余，缴枪三百多支，子弹无数。我军剩胜追击至永新城，迫使敌人拆掉浮桥，困守城内。我军就在永新南乡，由当地王怀、尹铎等同志作向导打土豪、除劣绅，为民除害。我军回到砻市，立即召开了全县性的庆功大会，四乡农民群众赶道前来参加，公审张开杨，就地处决。这是宁冈自古以来第一次公审吃人的贪官污吏，也是工农革命军建立以宁冈县为边界中心根据地的开始。从此，井冈山附近人民革命情绪更加高涨起来了。

湘赣边界建政建军工作——边界工作，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做起，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有了党的组织。除酃县外，各县都建立了地方武装。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工作，成绩都很好。这个时期的政权机关是“工农兵代表会”及“人民委员会”两种名义，简单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废除了薪饷制。游击部队行动时，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一个多月（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间，毛主席率部在酃县沔渡，下馆一带击败挨户团，到资兴彭庙与朱总司令相会。于是边界原有部队与由广东经湖南来的南昌起义部队及湘南农军陆续返抵宁冈，在井冈山大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第一次边界党代表大会——五月二十日在茅坪召开了第一次边界党代表大会，选举毛主席为第一届湘赣边界特委会书

记。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和茨坪开办干部训练班，又在茅坪训练号兵百多人，在茨坪开办党团训练班，宛希先同志任教育长。自“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之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势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各次的军事胜利及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与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割据，且也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

湘赣边区的扩大——边界的斗争几乎完全成了军事的斗争。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的进退，代表着中国革命的进退。因此，每一次战役的胜利，对于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发展革命根据地，巩固工农政权，起着直接的影响，革命队伍以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在边界的武装斗争中，写了自己的光辉历史。例如一九二八年端午节头一天，国民党反动军队杨如轩、杨池

生两个师由永新进攻宁冈，我军得到消息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新城议定了歼敌办法。由朱总司令亲率三十一团，由西源背抄袭敌人的后方龙源口，袁文才、王佐由老七溪岭袭击白口敌人补给站；并动员全县赤卫队、暴动队，一律携带梭标鸟枪前往助战。我军枪支不足，朱总司令鼓励士兵说："有枪的好好打，无枪也要打出枪（意即缴敌人的枪。）"端午节那天我三路大军都按计划进入阵地，二杨兵马果然从龙源口爬上七溪岭，当其刚至吊谷上仓，还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朱总司令一声号令，冲锋号响震山谷，敌人就在机枪扫射下，横尸遍地，这时，毛主席部队从龙源口包抄过来，袁王部队也攻占了白口，二杨匪军腹背受敌，受创甚巨，军心散乱，就在呼降的口号声中，降的降，逃的逃，丢枪乱窜，连永新南乡陇里的妇女、农民、手持竹竿镰铲，也缴获不少枪支。我军并乘胜追击，解放了永新城。缴获大量军需物资，充实了自己的队伍。由于这回"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

红军的扩大与组织——在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进一步加紧部队政治训练，健全部队组织，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的中心任务。因为当时革命队伍的基干，一、朱总司令率领的潮仙叶（挺）贺（龙）部队的一部分；二、毛主席率领的卢德铭团（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浏平农军；四、湖南柳州、耒阳、永兴、宜章、资兴五县农军及水口山的工人。其前三部分，经过一年多无数次的战争，损失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过三分之一；即湘南农军，在边界八个月的斗争，伤亡数目亦很大。至

于边界各县工农分子，因从事生产，在部队里还只占极少数。以上四部分因其质量之健全，成为革命军的坚实基础，但战士数量上比例，老战士已远不如从反动军队中过来的俘虏兵那样多。所以只有加紧政治训练改变部队中游民无产阶级及带有雇佣性质的成份，才能保证革命队伍的充分纯洁性。革命队伍中的成员，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变成的，其所以能够转变，主要是党的教育和彻底的民主主义之实行。当白军士兵一到我方，就感觉到前日的营垒中与今日的营垒中完全是两个世界，精神上获得解放所感到的无比愉快，远胜于在白军中比较好些的物质生活，因为雇佣军队中士兵的奴隶生活，简直不是人能忍受的。而革命队伍，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共甘苦，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之彻底公开，士兵代表审查决算，伙食由士兵管理，特别是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具有重大的作用。如每连由全连士兵大会选五人至九人为连士兵委员会的执委，推主席一人每营由全营每五六人选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选十一人至十三人为营士兵委员会执委，推主席一人，常委三人。每团由全团每十人举一代表组成团士兵代表会，选十七人至十九人为团士兵委员会执委，推主席一人，常委五人。每军由全军每三十人至五十人举一代表组成全军士兵代表会，选十九至二十三人为军士兵委员会执委，推主席一人，常委五至七人。主席及常委的任务是：一、参加军队管理；二、维持红军纪律；三、监督军队的经济；四、作群众运动；五、作新兵政治教育工作，他们并有这些权限：一、有建议和质问权，有直接干涉和处理权；二、开会需有党代表参加，党代表是监督士兵委员会贯彻执行一切工作任务的支持者，但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兵委员会或不准开会，这样真正代表士兵利益，并可监督长官，参加军队管理，又对内（军队内）做政治训练，对外做民众运动。因此，战士

们都有阶级觉悟，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政权，武装工农等政治常识，知道他们是为自己为工农阶级而战。所以虽在经济艰苦的环境中，人人对消灭敌人与做政治工作（政治训练与群众运动）都发挥了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是党推行民主建军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摧毁中国封建的雇佣军队之重要政策。其意义和成就是非常巨大的。这样一支建筑在高度政治觉悟、阶级觉悟如民主制度基础上面的革命武装力量，处在经常吃南瓜，冬天穿两件单衣，并与反动军队苦战不息的激烈斗争中，坚决地消灭敌人，其革命热情、革命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之高是难以比拟的。

工农红军第四军共编为第十、十一、十二三个师（随后不久取消师一级，由军部直辖各团），分辖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个团。全部兵力在万人以上，同时宣布毛主席手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成立了军部工农运动委员会。接着由朱总司令讲话。之后，即举行阅兵典礼。这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建军节日，不但给革命军队奠定了优良的军纪，并且对于红军的编制、训练和生活内容，都有进一步的调整和推进。例如：在部队编制和组织方面，为了适应“集中以应付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的原则，每一独立部队，规定不能超过五个单位以上，每个单位如连（队）不能超过一百五十人以上，这样的形式，就充分具有机动性。并经常注意，不轻易作战，战则有必胜的把握；军中要有充足的政治工作人员，从事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单是每连也都有五个宣传兵，组成讲演队和标语队。所以“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这足够说明宣传工作的影响和成绩之大了。又在组织革命群众团体，进行分配土地工作上，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故红军不但是英勇善战的战斗兵，并且是有很大作用的政治兵。这样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帮助群众，自然群

众也就成为自己的耳目和助手，而敌人则陷于孤立无援盲目失措的被动地位，除失败以外，别无他途。由于红军是人民的队伍，又具备高度的政治水平和优异的战略，所以尽管处在国内外敌人反动势力暂时还很强大的困难环境中，愈磨炼愈发挥了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就在红四军成立的第二年，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原载一九五二年八月二日第八十二期《进步日报〈史学周刊〉》）

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

肖　克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已经一周年了。

但是，毛主席没有离开我们。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是指引我们奔向灿烂的共产主义的灯塔。

恩格斯曾经是这样称颂马克思的："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用这个意思称赞我们的毛主席，也是恰当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就没有我们这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就没有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今天！我们要坚决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的号召，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千秋万代，永远高举。

作为毛主席培育、统率下的一个老兵，缅怀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回忆毛主席对我们许多难忘的教诲，有说不完写不尽的往事。这些事象一条不断延伸的红线，引导我们继续革命。

在开国第十九年欢度五一节那一天，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忽然看见我，高兴地笑着说：我们是在龙溪洞会面的。并问我：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我立即意识到毛主席指的是我们那支宜章农民起义武装，就说："老小加在一起，五百多人，六十多条枪，三百多根梭镖。"毛主席点点头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古今中外，有多少革命人民揭竿而起，然而成功的很少。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所以从揭竿而起，由小到大的发展起来，正是有毛主席的领导。回想那支小小农民武装的成长，也正是这样。

那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朱德同志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胜利形势的影响下，宜章县黄沙、梅田两个区的农民，纷纷起来打土豪、闹革命。我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了湘南，也参加了黄沙区起义。国民党反动派惧怕湘南暴动点燃的革命烈火，急派湘、粤两省军阀白崇禧、许克祥等，南北夹击起义队伍，占领了宜章到衡阳的大道，工农革命军主力和宜章县委向东转移。黄沙和梅田两区，僻处宜章西南，和上级失去了联络，两个区的革命武装，就在梅田会合，经过商议，组成独立营，人们也称梭镖营。当时，我曾写诗赞道：

农奴聚义起宜章，
晃晃梭镖刺大天。
莫谓湘南僻岭海，
骑田岭上瞩中原。

不久，敌人占领梅田市，我们就在一天中午，登上骑田岭。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白晃晃的梭镖，倒插云天。我们背靠岭海，瞩目中原，队列中不时发出雄壮而嘹亮的《国际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骑田岭山峦起伏，这一支从未出过远门并失去了上级领导的梭镖队，象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可是，我们究竟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得知毛主席在湘赣边界领导的工农武装，得知毛主席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当时，在宁冈、酃县一带活动。我们也意识到朱师长和宜章县委及胡少海同志率领的宜章农民大队，一定东去。于是，

于四月中旬，从骑田岭向东出发，深夜通过宜章郴州大道，继续东进。

迷雾之中见太阳，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在前进中，迎面碰见了毛主席领导并直接指挥的工农革命军，会了一团一连连长陈毅安同志。久离上级的梭镖营，真象孤雁得群，人群沸腾了！“见到毛师长的队伍了！”我向陈毅安同志谈了简单的情况，并接着问毛师长在哪里？陈毅安同志热情地安排了部队就地宿营，便领了我们十几个同志去见毛主席。走了几里，路上遇到师部派来的通信员，他把我们领到前面村落中有几间铺子的小街上。这里就是湖南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洞地区；分上中下三洞，有十几个村庄。当时通信员大声招呼：“宜章独立营来了。”铺子两边许多人跑出来欢迎。我问：“毛师长在哪里？”一个同志对我说：“这就是。”群众中一位身材魁梧，，满面笑容的红军领导人，过来和我们握手，他就是我们盼望着要找的毛主席。同毛主席一起的，还有师政委何挺颖同志。毛主席的出现，一股对革命创始人敬仰之情，使我兴奋得一时说话都有点结巴。毛主席亲切、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朱德同志的队伍向东转移了。还把今后的行动方向告诉了我们，要我们一起行动。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率领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红四军，毛主席任四军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陈毅同志为军委书记。梭镖营归还宜章农军建制，全县农军编为红军第十师二十九团。这个团和梭镖营一样，枪少梭镖多，不同的是有两门迫击炮。

我们这支新编的队伍，穿的五颜六色，大家看到毛主席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戴八角帽，穿军装，扛的都是“来路货”（五响枪），走起路来十分威武整齐，也看到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

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精神抖擞，武器精良。大家都多么渴望着把自己的梭镖也换成“来路货”！

五月的天气，气流暖人。一天，队伍集合在一片葱绿的山坡下，毛主席站在高高的青石板上，对我们讲话。开头便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的战士，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罢。我们听了，很新鲜。革命的道理虽然懂得不多，但多少晓得一些。这“二、三、四”的道理，却是头一次听说。

毛主席提高了嗓音接着说：“二”，是指两种战争。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古今中外不断地打仗，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无产阶级打资产阶级，共产党打国民党，被压迫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

“三”是三大纪律。革命军队，第一条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是“打土豪要归公”。毛主席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搞好革命工作，不能打胜仗。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不能侵犯工农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也不能拿。

“四”呢？是说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毛主席举起左手，用右手按着左手指说：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就能广泛的发动农民群众，把农民团结起来；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有了地方革命武装，农民协会才能巩固，主力红军才有后备军；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群众发动了，地方大

了，就要建立革命政权；和刮（国）民政府对立起来；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做“倨”，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意思是“我们的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毛主席说，我们分兵发动群众，就是要做好这四件事。

毛主席的讲话，声音洪亮，道理深刻，通俗易懂。这番话，闪耀着游击战争初期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光辉！当时，大家听了心里格外明亮：要把农军建设起来，不只是头戴八角帽，肩扛“来路货”，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怎样做一个红军战士！

革命必需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什么是路线，什么是政策，那个时候，不仅年轻的战士不太懂，好多干部也懂的不多，只懂得要革命。一次，毛主席用一个神话故事作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路线和政策的重要，使我今天还记忆犹新。他很风趣地说：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啊！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着了吕洞宾，传说吕洞宾也成了仙啊！问张果老到哪里去？张说：“上蓬莱朝圣”。吕洞宾有点惊异的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得到？”张果老生气了，认为自己有理，反驳道：“我的脸是朝着东方的蓬莱啊”！毛主席讲完故事后说：即使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张果老虽然面朝向蓬莱，路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蓬莱。

毛主席总是抓住一点一滴的具体事例教育我们：要和违反政策的行为作斗争。在井冈山，不仅经常教育我们要注意分配土地的政策，还要注意土籍和客籍关系的政策；进城市，要注意城市政策；打仗要注意俘虏政策。在我军初创时期，毛主席亲自抓军队的战场纪律，抓对待俘虏的政策，一不许打，二

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治疗，愿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开始，有些同志不能理解：俘虏不管怎么说也是"阶下囚"，为什么待为"座上客"呢？一次，我们抓了国民党一个营长和几个军官，有的同志说当兵的当然不杀，当营长的还不杀？毛主席知道了，一方面向部队解释瓦解敌军的重要性，另方面，亲自找他们谈话、做工作，不久放他们走了。这个政策，对敌人震动很大，白军士兵三三两两，甚至成群拖枪过来。敌人无可奈何地哀叹"毒矣哉！"以后，我军把瓦解敌军官兵的工作，发展成为军队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内容之一，解放战士成为我军补充的来源之一，这对我军成长壮大，有重要作用。

对违犯党的政策的行为，毛主席批评教育是严肃耐心的。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队伍到广昌一带，有个部队两个负责同志，把一个地主兼商人的铺子没收了。毛主席知道后，把我们纵队的领导干部找去，严肃地说："现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对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如果有些特别坏的土豪、恶霸的商店，必须没收，就一定要出布告，宣布他的罪状，以提高群众觉悟。纵队党委批评了两个同志，并决定给予停职反省的处分。过了一个月，毛主席又亲自同他们谈话，严肃耐心进行教育，当他们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后就恢复了原职。

毛主席还经常教育我们，要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一九二九年四月，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江西于都胜利会合。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我部有几个同志因伤病留井冈山治疗，康复后编入红五军。他们见了我，都要求回四军。我就到军部找毛主席，提出要他们回来。毛主席笑着问我：四军人多，还是五军人多？我说："四军三、四千人，五军才六、七百人。"毛

主席又说：五军本来人少，还要他们几个人回来，不是更少了吗？我说："是他们要回来的"。毛主席严肃地对我讲：你要说服他们，先要说服你自己。都是红军，五军多些人不更好嘛。我顿时感到不好意思，有些尴尬，敬个礼就走了。由于毛主席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启发我们顾全大局，使我口服心服，是毕生难忘的一课！

井冈山斗争的前期，我们许多同志，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习惯于新的作战形式游击战术。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有消灭敌人，缴了他的枪，抓到俘虏，才能挖掉他的命根子。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毛主席给我们讲战术。毛主席说：白军强大，红军弱小，我们以弱斗强，只能采用游击战术，什么叫游击战术？简单扼要的说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个大字。讲走路，连三岁的小孩也会，讲到打仗和行军，就是一门好大的学问。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他和当时的统治者斗了好些年，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主席说：朱聋子前一句话不对，后一句话是对的。我们改它一下就好了，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这样才能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迷惑敌人。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几个圈子，看出它的弱点，抓准就打。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毛主席还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毛主席讲的深刻生动，简短几句话，就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讲透了。这年十一月末，毛主席给中央的报告，继续发挥这个思想："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毛主席讲话的时候，会场上时而寂静，时而腾起一片欢笑声。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以后长期的

斗争中，我们打过许多仗。多少年来，每想到那些胜利的战斗，内心就有一句话："毛主席用兵如神"！许多参加过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老同志，都不会忘记毛主席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一九三〇年底，蒋介石兴师十万，兵分八路，进攻中央苏区，这么大规模的"围剿"，还是头一次，到底怎么打破敌人的"围剿"，许多人心中无数。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决策，当时许多同志思想不通。毛主席大会讲，小会讲，反复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于是，红军四万健儿先后两次大踏步撤退。一退就是近二百里，来到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猪、牛上山，粮食埋藏，游击队和赤卫军，随时准备打击敌人，支援红军。几天后，敌军十万兼程尾追至吉安、建宁一线，布开阵势。总司令部决定先打谭道源的五十师。我军在源头附近林丛中隐蔽待机，等了好几天，谭道源不来犯我。毛主席、朱总司令急令红军向西转移，迎击由西深入到龙冈镇的张辉瓒的十八师。

龙冈镇有四、五百户人家。镇后是一座大山，前面是一条两丈来宽的河，河对岸是一座坡度不大的小山。这是便于隐蔽和展开兵力的地形。红军第三军从正面进攻，第四军从东北面包围，红十二军从龙冈西南面攻击，一下切断敌军师部和后梯队旅（在东固）的联络，把敌师部和两个旅包围起来。下午发起总攻，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人民群众齐出动，枪声、军号声和喊杀声，谱成一部悲壮的乐曲：红缨如火，刀光闪动，整个龙冈盆地象被红色的大海淹没。经过一天激战，张辉瓒的九千多人悉数就歼，张辉瓒被活捉。谭道源师得讯，怆惶东窜。总司令部又令我们猛追，在东韶追上了，又歼敌半个师。东韶离洛口三十里地，得知洛口有许克祥、毛炳文的两个师。我们

都想该打洛口了：大家整装待命。第二天总部开会，我想准是去接受打洛口的任务了。谁知，会上毛主席宣布马上转兵，不打洛口。毛主席象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打破了敌人"围剿"的主力，有些同志好象天兵天将，又想打洛口。你们晓得洛口有敌人两个师和谭道源残部，还有十二个团，集中在一起，又有工事，再去打就不会象打张辉瓒、谭道源那么容易了。我们才恍然大悟。会议一散，议论纷纷："为啥不打洛口呢？是总政治委员的主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许多老俵和部队同志说："诱敌深入的战法，真好，真好！龙冈捉了张辉瓒，东韶打垮了谭道源。"

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有多少光辉的战例，每一个胜利，都闪耀着毛主席思想的灿烂光辉。毛主席的军事科学，永远是我军百战百胜的旗帜。

在井冈山艰难创业的日子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总司令，他们和红军战士一样，穿的是草鞋，吃的是红米、南瓜。五分钱的菜金。冬天，垫的是稻草，盖的是夹毯子。晚上，毛主席还常常在马灯或青油灯下书写一篇篇指导着斗争、指导着中国革命的光辉著作。

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和不断革命的精神。毛主席还是愿意吃"八宝饭"。周总理还是喜欢吃几种菜一锅煮合菜。朱委员长还是要吃五谷杂粮，在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家里粮食不够，他硬是不要国家补足，用瓜菜代的办法，把吃超的粮食补回来。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他们都反对建立豪华的别墅、行宫。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还提出：不做寿，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起地名，这四条自觉的约法，都是谦虚谨慎永葆无产阶级本色的具体体现。六年之后，毛主

席在一个会议上说，有人建议要我和他用个人名字在上海命名两条街道。毛主席当时回答说：做一件事总要想到对人民是不是有些好处，改一个街道名字，就要重新油漆门牌，就要用人民的钱，改了以后，人们也不熟悉，还不方便。毛主席严肃地对他说：你也不搞你的×××路，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每每想起这些，就感到一定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最不能忘记的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带着我们去十三陵工地劳动的那番情景。党的八大二次中央全会期间，十三陵水库正紧张施工。一天，毛主席指示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都去十三陵水库劳动。大家都坐大轿车，同志们依次由前向后入座。我们那辆车上完，后面还空四、五个位子。快开车了，突然看到毛主席从车后门走上来，同志们都站起来，目光转向他，毛主席向大家挥挥手，就在后面一个空位子上坐下。坐在最前面的同志，跑过来请毛主席向前坐。毛主席笑着说：有了位子总要有人坐的嘛！他还是坐在后面。汽车开动了，同志们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过去，毛主席统率我们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今天，又以普通劳动者，带领我们一块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我有时回头看看毛主席，有时眺望窗外，觉得道旁的树木，格外青翠；我们乘坐的大轿车，似乎越走越快，不断地飞驰在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

（原载一九七七年九月号《人民文学》）

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朱德同志

肖　　克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和陈独秀机会主义者放弃革命领导权而遭到了失败。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担任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同志积极参加了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朱德同志一九二六年底从国外回来，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任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团长，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教导团有一千多名学员，朱德同志重视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引导他们参加工农运动，在斗争中提高觉悟。他还在教导团中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使教导团成为一支非常活跃的革命力量，成为南昌革命活动的基地和堡垒。同时，朱德同志还经常到农民运动训练班、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中去指导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推动了南昌地区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向前发展。一九二七年六月，江西省省长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朱德同志就离开南昌去武汉。

七月二十一日，朱德同志在武汉接受了党的指示先行秘密返回南昌，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向江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传达中央决定；安排叶挺、贺龙同志领导的部队到达后的住

地；积极组织教导团留队学员和公安局的革命同志参加起义；利用与国民革命军第三、第九军官的关系，掩护我党中央领导同志平安到达展开工作；详细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等。在周恩来同志到南昌后的前委会上，他向会议报告了各项准备工作和敌人的情况，为前委组织发动起义和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朱德同志根据前委指示，利用他的社会地位，于七月三十一日晚上，在伪南昌市长家里大摆宴席，宴请城内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分团以上军官。事先，朱德同志派部队在住地周围秘密监视。同时，将赴宴军官的警卫人员支配到别处，另行"款待"。饭后，军官们兴致勃勃，随意消遣。深夜，朱德同志借故退席。这时，我警卫人员按照朱德同志的事先安排，将这帮家伙一一扣押，使一部分敌军失去指挥，为我军迅速歼灭这些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周恩来同志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指挥下，起义部队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部歼灭了驻南昌的敌军，解放了全城。

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是我们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伟大开端。

南昌起义大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以后，朱德同志在极端危急的关头，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举战斗的旗帜，在三河坝与强敌苦战三天三夜之后，退至饶平，和从潮州撤出的一部分部队会合，共两千多人，经闽西向赣南挺进。这时，部队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四面受敌，但朱德同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士气，甩掉敌人，和陈毅、王尔琢同志一起，把部队带到了农民运动开展比较好的湘南地区。在朱德同志和湘南特委领导下，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在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武装由一千多人发展到包括农军约一万人，建立了威震湘粤的宜章、

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苏维埃政权。

湘南五县的暴动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惊恐，蒋介石调集了许克祥，白崇禧等大批反动军队前来“会剿”。加上党内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危害，致使起义部队很难在湘南立足。这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朱德同志总结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的教训，决定率领起义军主力和农军退出湘南，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会师。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宁冈砻市，两军胜利会师了。经过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为军长，毛泽东同志为党代表。从此，这支部队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领导下，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井冈山艰苦奋斗的日子里，朱德同志在毛主席关于“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的方针指导下，组织井冈山地区军民打土豪、分田地，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和赤卫队。当敌人向井冈山根据地进攻时，朱德同志协助毛主席指挥战斗，使红军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会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国民党纠集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共十一个团，向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分兵合击。毛主席按照对湖南方面进犯的敌人取守势，集中兵力打击江西方面进犯之敌的方针，决定红军主力到龙源口、新老七溪岭迎战。朱德同志亲自率领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直奔新七溪岭。当我军抢占制高点后，敌人向我连续发起冲锋。在朱德同志的指挥和鼓舞下，红军指战员奋勇杀敌，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各路部队密切配合，全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缴枪一千多支，粉碎湘赣之敌第一次大

“会剿”，取得创造井冈山根据地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一九三〇年，红军创立了以端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发展到四万人，朱德同志担任红军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总政委。蒋介石先后纠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围剿”。在连续激烈的反“围剿”战斗中，朱总坚决贯彻毛主席“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协助毛主席巧妙地捕捉战机，指挥部队，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反革命“围剿”。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虽然“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但朱总司令同周恩来同志一起，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选自《人民的光荣》，题目是编者加的）

光明磊落　革命一生

——缅怀陈毅同志

谭震林　粟　裕

陈毅同志是四川乐至县人。他从小不满黑暗腐败的旧社会，追求真理，向往革命。一九一九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年仅十八岁的陈毅同志，毅然决然到法国去，又做工，又读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他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押送回国。一九二二年，他在重庆编辑《新蜀报》。一九二三年，他进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北京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一九二六年，他在四川协助北伐军做兵运工作。一九二七年被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

那时，中国革命正面临一个紧要关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事变，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贺龙同志、叶挺同志、刘伯承同志等，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拿起了武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陈毅同志从武汉到江西，赶上了撤离南昌南下的起义部队，担任一

个团的党代表。起义部队南下到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留在三河坝的部分部队，由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向粤、赣、湘边界转进。这时，既有敌军尾追，又有土匪和豪绅民团袭扰，部队经过长期转战，减员日多，思想混乱，处境异常困难。在这关系到能否保存起义部队的严重时刻，朱德同志振臂高呼：愿革命的跟我来！陈毅同志立即奋起响应，协助朱德同志对部队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耐心说明革命的前途，鼓舞士气，坚持斗争。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组织领导下，保存了南昌起义部队的骨干。不久传来了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毛泽东同志开辟的革命道路，象灯塔一样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同志、陈毅同志与湘南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发动和领导了湘南暴动，打起红旗，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革命政府，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阶级。后来由于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部队受到挫折。在敌人重兵"会剿"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井冈山部队前来接应。陈毅同志协助朱德同志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前进，和毛泽东同志在砻市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陈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南昌起义保存的部队就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同志任红四军军委书记。他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边界党的正确的政策、策略，协助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发展工农红军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在中央苏区时期，陈毅同志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了排挤、打击。但他在主持江西军区工作时，依然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

红军的路线，先后组建了两个军的红军部队，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几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陈毅同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江西苏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当时，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陈毅同志和战友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坚决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一九三六年冬天，陈毅同志在梅山被围二十余日，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他写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篇，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陈毅等同志领导的赣粤边游击斗争，保存了革命火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配合了其他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陈毅等同志所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摘自一九七九年《人民日报》）

井冈山下

吴树隆

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的湖南秋收起义农民同朱德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的一部分部队及湖南独立三师胜利地在革命的发源地——井冈山会师了。当时驻防于江西省宁冈县城内的红四军二十九团二营六连，距离井冈山只有二十余里。在不到九十里的江西省永新县城就盘踞着国民党的两个精锐师，两个师长——一个杨智生，一个杨宇先，带领着万余人，直接封锁并大大威胁着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且不时地向根据地发起进攻。

敌人要进攻这块根据地，就必须通过井冈山的大门——"新旗子岭"和"老旗子岭"。当时敌我的情况是：红四军诞生不久，武器仅有一部分步枪，还是杂牌的，子弹非常少；轻机枪以上的武器更是奇缺。敌人在装备上当然比我们好过百倍；他有轻、重机枪、迫击炮，还有小钢炮，最低限度每人也有一支步枪。但我们这支人民武装，既然诞生了，就要成长下去，为革命忠诚的服务，不论敌人怎样强大，我们是决不畏缩和屈服的。

四月十二日，是一个晴朗的天，天空中连一点云花都没有，小风飕飕地吹着，红红的太阳挂在蓝蓝的上空，气候已是暖暖和和的了。高大险要的井冈山伸入高空，显得格外地雄伟。围绕在周围的群山好似都在尊重它。山的四周本来很平

静，到了约摸上午十点左右，突然，枪炮声划破了长空，在蓝蓝的天上，刹那间飞起了团团的战斗火焰和一股股烟气，天气慢慢的变的暗黯下来。一场激烈的战斗就在新、老旗子岭之间开始了。这是红军从井冈山会师后，同敌人展开的第一次较大的战斗。

当时我在红四军二十九团二营六连一排当排长。我团任务是争夺"新旗子岭"，守住这个岭子，消灭前来进犯的敌人。我连守着一个小山头，监视着对面山头敌人约一个营的兵力。不大一会，连长的传令兵叫我到连指挥所，连长命令我："吴排长，给你一个任务，令你排埋伏在山腰的右侧，协同友邻部队，消灭对面山头向我冲锋的敌人，给敌人个措手不及。然后，夺占敌人的山头阵地。"连长布置完任务，问我："怎么样，吴排长？"我短促有力的回答："坚决执行！"时间不允许我更多地考虑其它问题，向连长打了敬礼，就要跨出指挥所。这时，连长又叫："吴排长！"我急转回头："有！"连长看到我充满信心和激昂的情绪，满意地微笑着说："你可以走了。"

我接受了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心情确实是兴奋的。回来先和副排长吴生平交待了，随后对全排的同志作了宣布，士兵们听到要打伏击战，个个情绪都很高，尤其是身材魁梧，个子高大、持"梭镖"的武术勇士邓光汉更是气粗，他跳起来拧拧手中的梭镖，在大家面前示威似的说："老鹰抓兔子，给它个措手不及，就凭咱这个'古器'也得叫敌人见阎王。"副排长拍了拍邓光汉的肩膀说："大显身手的机会，该加把劲了。"全排武器有三分之一是梭镖，其它虽然是步枪，也都是些杂牌陈旧的东西，什么单响七九土造；九响双筒毛瑟；五响七九粤造；奉天造……什么都有，子弹平均才二十五发，其他就是三十来颗手榴弹了。这就是我们全部对付敌人的"家当"。

我和副排长分了一下工：他指挥一个梭镖班；我指挥两个步枪班，立刻进入埋伏的地区埋伏下来，待机行动。

刚过了几分钟，大家就急得什么似的，个个都睁大眼睛，屏住气，等着消灭敌人。又过了一些时间，有些同志等的不耐烦了，有的轻轻耳语，嚷嚷起来。爱说话的吴纯芳讲话了："排长，敌人是不是不出来了？要不的话等这么长时间还听不到一点动静？"我说："不要嚷，要沉住气。"话刚说完，轰！轰！炮声接二连三地从我们头顶上掠过，在山头阵地上开花了，一股股的浓密烟柱冲向天空，重机枪也随着炮声哒、哒、哒的吼叫起来。子弹在空中嗖嗖的响，土坡上掀起了一堆堆的土尘。小伙子们高兴的笑了，意思好象说，排长快下命令了。平时不爱说话的邓隆兴小家伙也嘟嘟喃喃的："排长，到时候了吧？"我镇静的向大家说："要打好仗，就要沉住气，现在还不到时候，要听我的命令行动，大家要死死地盯住敌人。"这时候，通过层层烟雾和密密树林，看到敌人象羊群似的挤成一疙瘩，缩着脖子，弯着腰，提心吊胆地向我们山头阵地爬了上来。当敌人进到我们的射击圈时，"打！"口令一出，组织的排子枪射击，象机枪似的冲着敌群横扫过去。看，敌人一个个接着倒下去。"瞄准指手划脚的指挥官！"随着我向战士们喊出的命令，敌指挥官马上倒下去了。敌人乱阵了，是的！那能不乱呢？被我突而其来的射击，敌人吓呆了，不敢再前进了。在我们开始射击的同时，左侧友邻部队也打响了，给敌人来个两侧夹击，我们组织的排子枪继续发挥着它的威力，光在我那杆陈旧的枪下，就有七、八个敌人送掉了性命。敌人开始往回窜了，可是往那里逃跑呢？当我们一看到敌人的鬼企图，早就从右侧绕到敌踞守的山头工事那里。另外，我们正面部队、左侧友邻部队也都及时赶了上来。我们象一把锐利的三股钢叉狠狠地刺向敌人。全排跳进敌人腾出的工事里

用手榴弹、梭镖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一部分狡猾的敌人知道要完蛋，就夺路逃跑。可是敌人刚到唯一的一条小路时我们另一支事先埋伏的部队早在那里等待多时了。其他三面都是悬崖绝壁、这下子敌人无路可逃了，这些丢盔卸甲、狼狈不堪的残兵败将，最后只好举手缴枪，作了俘虏。

在我们庆贺井冈山会师后的不久，首次交锋，敌人便把一个营送给我们作了它的"贺礼"。

"八月失败"的回忆

杨　得　志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七溪岭战斗打垮了敌人的"两省会剿"以后，红四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斗争，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天深入，红军和赤卫队也一天天壮大，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可是这种胜利的局面却由于一部分同志的错误而被破坏了。这就是令人痛心的"八月失败"。

原来那时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来，要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分兵向湘南的敌人进攻。党的红四军军委，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省委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同志就是极力反对这种错误主张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正是统治阶级内部暂时稳定时期，不应该采取在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时期的政策。可是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却不顾联席会议的正确决议，乘毛泽东同志远在永新的时候，跑到酃县，找到在这一带活动的红军大队。这时，由宜章起义农民组成的二十九团的干部和战士们，想返回湘南家乡；而二十八团却想往赣南去，也不想返回井冈山根据地。杜修经、杨开明就利用了二十九团的这种家乡观念，鼓动他们向湘南冒进。

于是，红四军大队就在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了。二十九团在前，朱军长率特务营和二十八团跟在后面走。当时，我在特务营三连当战士。

七月二十四日，走到郴州城东十来里路的地方，碰上了敌范石生部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我们让在道旁，看着二十八团的同志跑上去。有些老兵一面跑，一面就讲怪话："……哼！二十九团整天喊：打回去，打回去，真打了，还是得我们来！……"

二十八团上去，很快把正面敌人打垮了，冲出一条道路来，直奔郴州城。城里只有敌人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不顶打，中午十二点钟左右就把守敌歼灭，进了郴州。

敌人补充师的装备很齐全，崭新的水壶、饭包等用品扔得到处都是。几个仓库里的物质更是丰富。那时我们部队虽然群众纪律不错，但战场纪律不太好，特别是二十九团的一些同志，农民意识严重，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拿，直到我们特务营在各个仓库放了岗，才制止了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

天快黑的时候，忽然听到城北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传令兵传来了命令：准备出发。接着炮声越来越紧。守卫城北的部队也垮下来了。原来敌军有两个师共五六个团，驻扎在城外，当我们打进城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遭到很大打击，尤其城北敌人的四个团根本没有动着，现在都向我们反攻了。

这时，街上到处是人，乱成一团。部队仓卒集合，乱哄哄地向东门转移。东门外就是耒水，河上有一座大桥，二十八团，军部和特务营都过来了。二十九团大部分还没有过桥，就被敌人冲到桥边插断了。

我们特务营是在后面过桥的，和敌人隔河打了一阵。当时我又紧张又难过。难过的是部队吃了败仗，又和我哥哥失散了。我哥哥杨得麟比我大五岁。我俩一道参加红军，后来又编在一个连里，他在一排三班当班长。这次被冲散到二十九团去了。后来听说二十九团被打散后，并没有积极找主力大队，却自由行动，沿耒水西岸跑回宜章——他们的家乡去，一部分被土匪胡

凤章消灭了，一部分散在郴宜各地，军部只收集了一小部分。

部队离开郴州，连夜向东进。走到汝城（桂阳）北面，进行了整编，军部特务营和二十九团的一部都编在二十八团，我被编到三营九连。王尔琢团长在这次整编中升为军的参谋长兼团长。二十八团原有一千九百多人；虽然这次遭受了失败，整编后人数仍然不少。只是当时天气炎热，部队连续行军，加上又远离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支援，经常吃不上饭。记得在汝城以西，有一天，整整一天没停脚，没吃一点东西。最后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路过一个村头的时候，看见老百姓屋檐底下挂着一串干苞米穗子，我就掰下一个来吃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违犯群众纪律。这样连打带拖，部队情绪更不太好，讲怪话的也有了。

东进中，二营率团部的机炮连担任前卫，早走一天。两天后，忽然听说二营营长袁崇全带着部队叛变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十分气愤。我心想：这才叫倒霉！两个团零一营，打得剩了一个团，现在又有一个营去干反革命。我们郑营长更是气得要命。经他一讲，我们才知道，袁崇全这家伙早就有叛变的企图，只是没有找到叛变的机会。例如在郴州城战斗的时候，他就很消极。三营在城市迎击敌人，二营集中在北门外马路上停着。当时敌人攻得很紧，郑营长派人通知袁崇全，要求他支援。袁崇全却说："哼，你是营长，我也是营长，你凭什么指挥我？"故意按兵不动，结果一、三营支持不住，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次他乘部队情绪不稳定，竟骗大家走上反革命道路。郑营长气得眼睛通红，说："……这狗东西，无论跑到哪里，都要把他抓回来！"

当天上级就命令我们三营先出发，前去追赶二营。追了一天，，没追上。就停下来了。等到军部和一营上来以后又向东进，中途碰到白军第八军，打了一仗。这期间，二营许多同志

发现袁崇全叛变了，纷纷跑来归队，最后只剩第五连和机炮连继续被他胁骗着向江西崇义逃去。

八月十八日，部队占领桂东县。有一天，连党代表讲话，说：毛党代表带着三十一团的一个营从井冈山来接我们了。听说毛党代表到这里来很不容易，沿路几次遇到敌人，打了几仗。最后一次，部队被冲成两截，他只带着几十个人，击退围追的敌人，终于找到我们。毛党代表也带来了井冈山人民的期望，他们天天打听二十八团，盼望我们快些回去。

原来毛泽东同志得悉郴州失败，并且知道了二十八团中有人不愿回井冈山，为了使部队团结、集中，避免继续分散被各个击破，他特地赶来，向主张分兵的人说明利害，以便把部队带上井冈山去。这件事使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坚持正确的路线，维护党的团结的精神是十分伟大的。

部队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取道崇义、上犹，向井冈山进发。有一天，我们班担任尖兵，枪上上着刺刀走在最前面。路上碰到一位老乡，我问他："老板，前面有队伍没有？"

"有。"老乡毫不迟疑地回答。

"离这里多远？"

"十五里路。"

"是什么样的队伍？"

"三天以前和你们一样，打的是红旗；现在换了，在红旗上面加了蓝布白星。"

我一听，估计可能是二营，心想，袁崇全这家伙干反革命是铁了心了，走了七八天了，连旗子也换了。班长一面叫我原地监视，一面派人向上级报告。

过了一会，我们全营都上来了，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带着警卫排也来了。王参谋长命令我们原地停止，他自己带着警卫排经直往老乡说的那个镇子走去。

这时已是黄昏，我们都注意着参谋长去的方向。约摸一个钟点以后，听见一两声枪响。停了一会，又听见几声枪响，就没有动静了。

后来听警卫排的同志说，他们一走进镇子，哨兵打了两枪。王尔琢同志当即喊："不要打，我是你们团长，来叫你们回去！"因为王参谋长时常给部队讲话，哨兵听得出声音，便没再开枪，但二营队伍听到枪声就乱起来。当时天已黑了，王参谋长进了街，边走边喊："同志们别怕！我是王尔琢，来接你们回去。""同志们，快回来革命吧！"混乱渐渐平息下来。这时，叛徒袁崇全正在打麻将。听到王参谋长的声音，提起两支驳壳枪，顶上子弹就冲出来，迎面撞上王参谋长，他两支枪一起开火，把参谋长打倒，跑到村头，又把放哨的一个班骗去了。经过一场斗争，被叛徒胁骗的最后两个连终于也被争取回来了，但王尔琢同志却当场牺牲了。

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我们接到命令继续前进。经过这个镇子，看见路边放着一具尸体，上面蒙着一条被单。当我们知道这就是敬爱的参谋长时，心里十分难过，很多同志都哭了。王尔琢同志是参加南昌起义的，后来和朱德、陈毅同志一道把起义军的一部带上井冈山。他很年轻，打仗勇敢，在部队中威信很高，现在却牺牲在叛徒手里。我们怀着悲痛和愤怒的心情，从烈士遗体边走过。

二营同志很快整编好了。我们掩埋了王尔琢的遗体，怀着对这次行动失败的悲痛心情，跟着毛党代表回到了井冈山根据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敌人趁我们冒进湘南，根据地空虚的机会，把我平原地区全部占去。幸好毛党代表布置三十一团三营守卫井冈山中心根据地，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才使根据地没有完全丧失。这时，我们都更深刻地体会到错误的领导带给革命的损失是多么巨大！

黄洋界保卫战前后

刘　型

西　江　月

井　冈　山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这是毛主席咏黄洋界作战的诗词。通过它，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这一保卫战的重大政治意义。

黄洋界是通往井冈山大小五井的要道，左翼是一片深谷；峡谷左侧又是陡不可攀的高山。右翼则是陡坡，山上是茅坪通往井冈山的孔道。从山岭上往下看，尽是飞鸟难越的悬崖陡壁。扼守住黄洋界，就把从酃县来犯之敌给阻住了。

井冈山通往山下的道路，包括只能攀缘爬上去的山道，统共不过九条路。山上约有两千余居民，都是从南北朝时代移居来的客家人，耕种着收获稻谷不到万担的水田。红军据此，在毛主席正确的领导下，依托着永新、莲花、宁冈、酃县、遂川等地，在党所领导的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持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为向湘、赣和鄂南、粤北发展的良好根据地。在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守住井冈山，就表明中国革命的红旗招展，买办地主阶级是压服不了中国革命的。这就是扼守黄洋界一战，打垮从湖南来犯之敌的重大历史意义。

进驻井冈山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领导着秋收起义的武装部队到达莲花，对井冈山的形势作了初步调查。进驻井冈山以后，又对井冈山周围各县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群众斗争情况、党内机会主义领导者所造成的失败、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自卫武装和工农群众组织所受到的摧残等各方面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据此，毛委员订出创立根据地的工作步骤与行动方针：对袁文才、王佐部队进行争取与改造工作；整顿与恢复地方党的组织；办党员训练班，清除机会主义的遗毒，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建立军队后方，安置伤病员；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确立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思想。

毛委员直接领导的部队，番号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开始的行动，采取打大小圈子、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的方针。当时对井冈山农民斗争的发动威胁最大的，是各县地方联防司令尹道一的武装。我军对待敌军的办法是，以王佐部队为钓饵，把尹部诱到井冈山的旗锣坳，引敌入瓮后，埋伏在两侧的主力部队，一鼓聚而歼之，尹道一也被击毙。随

后，我们在井冈山周围展开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斗争，相机打击了肖家璧、李七廉两大股地主武装。

蒋(介石)唐(生智)战争爆发后，我主力部队乘机夺取茶陵建立了第一个地方人民政权——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壮大声势，扩展占领地区，扩大部队，筹集给养，更广泛的发动群众斗争。

秋收起义的部队是我党领导的武装，继承了第一次大革命的优良传统。可是，开始时期，因为成员来自各个方面，有些人把国民党军队的旧制度，旧作风也带了过来。因此，要使它成为人民武装，就必须在斗争中继续进行深入改造。当我军在茶陵时，发现团长陈皓(黄埔毕业)和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方鼎英勾通，进行阴谋活动。我军和敌军作战一日后，毛委员把部队调回砻市整训，将陈皓等四个反革命分子予以处决。为了纯洁内部，又把余沙渡等二十多个动摇分子加以清洗。部队在毛委员直接领导下，战斗力大大增强。一九二八年年关的晚上，我军乘着遍地皑皑白雪时节，突然由宁冈袭击遂川，消灭刘士毅旅一部。在春节那天晚上，又乘敌不备，突袭宁冈古城，歼敌一营。在毛委员的亲切领导下，根据地一天天扩大，群众斗争一天天深入，部队和地方武装一天天壮大起来。

可是，三月初当时的湖南省委却指令部队到桂东、资兴一带行动。这样，部队脱离井冈山达二月之久，附近各县重被敌人攻占，造成不小的损失。这时，只有毛委员领导着王佐部队，一直坚持着井冈山的工作。

当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以后，毛委员就非常重视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坚实基础的工作。在这里，先后建设的地区有：遂川的井冈山区；宁冈的西北西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山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莲花的西区；酃县的青石岗和大院区。这些地区地势险要，筑有防守的工事，群众阶级觉悟比较高。毛委员率领部队到达这里以后，立即展开各

项工作。调查研究社会状况，进行宣传，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武装，分配土地，建立地方党组织……毛委员对工作抓得很紧，七天一布置，一月一汇报。经常检查，每周每日都有中心工作，各项工作又互相渗透，执行前一任务时，即为下一任务做好准备，如此继续深入，往复循环，向前发展，便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四周地区的工作依托着中心区域的工作，由点及面，波浪式地推进，反过来又使中心区的工作深入一步。当时地方党及红军，都是经过毛委员每日每周亲自布置检查总结，以至形成后来的一套工作方法。

部队里，每个人都要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每个连队有五个到七个固定的宣传队员；一个月有十元到十五元银洋的宣传费；每到一处，书写标语，向群众进行宣传动员，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毛委员不但亲自主持宣传员会议，还经常去检查宣传工具，如棕笔、石灰粉、桶子等，看是否完善，用起来是否顺手。毛委员亲自拟订标语口号，把当时的斗争要求，用简单明确、通俗的话告诉群众。毛委员经常教导宣传队员：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时，要使用群众的语言；写标语时，要写得高，写得大，色彩鲜明，群众看了高兴，敌人来了也不容易铲掉。同时，千万不要写怪字，如把“人”字写成“从”字，把“工”字写成“互”，群众和红军战士不认识，看不懂，这是脱离群众的做法。这些工作制度，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便成为红军的优良传统。

成立红军第四军

一九二八年三月湘南暴动失败。四月间，毛委员，朱德同志会师井冈山，成立红军第四军。接着，召开井冈山边界各县党代表大会，成立边界特委；召开红四军党代表大会，成立红

四军军委；召开边界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边界政府。同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土地法令。当时，特委的决定指出：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反对分兵逃跑，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红色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地方党和地方武装，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作战方针，以打破敌军的“围剿”。

红四军成立不久，便出击进驻五斗江之赣敌一团。我军乘阴雨濛濛和浓雾笼罩的天气，突然袭击，歼敌一营，打死敌军团长，乘胜直取永新。这时，进驻宁冈之赣敌，又折回来，配合吉安之敌进攻永新。我军主动撤出，分兵一部分攻打茶陵高垅，敌军以为我军部队已转向湖南，就出城寻求我军决战。这时，我主力大部集结在城西十五里处，小部分散在潞江、澧田一带作群众工作，筹集给养，扩大红军。看到敌人来犯，就集中兵力，一鼓而歼灭之。接着，又袭永新城。当我军突然进攻城内时，敌军师长还在打麻将，一闻枪声，便屁滚尿流的抱头逃窜，全师资材被我缴获。至此，敌军第九师基本被消灭。不久，又有敌军一个师加该师残部，从吉安来犯，我军乃撤回宁冈休整。在休整中，毛委员向部队宣布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收缴获要归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重申不杀俘虏，不搜俘虏腰包，优待俘虏的政策以及城市政策等。整训时是用民主方法，走群众路线，发动战士整顿纪律。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利用士兵委员会协助维持纪律，作群众工作，讨论打仗。当时我军内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制度，以激励士气，团结内部，密切军民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毛委员又分别集合部队讲话，召集连党代表开会，讲执行纪律和各种政策的意义。记得毛委员当时对我们说：你们召开党支部、党小组会、士兵委员会时，不要光讲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大

套，要活泼些，要启发党员战士讲话。国际国内形势要不要讲呢？要讲，但不要用学生腔去讲，而要用士兵听得懂的话去讲。他还说：我军如没有纪律，几千人有几千条心，不是一条心，那是不行的。军阀的军队没有纪律，乱拿群众的东西，群众便会拿起扁担锄头来打他们。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决不允许乱拿群众的东西。当讲到城市政策时，他说：现在我们的革命，只打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政府、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因此，只打土豪地主，不打资本家。因为地主只收租，有钱埋在地窖里，也不拿出来办工厂、学校；买办阶级是洋奴，替帝国主义作事的，我们要打倒它。至于办工厂的、开铺子的人，今天我们还少不了他们，不能没收他们的东西，你们想想，如果没有商人，农民的竹木便卖不出去，便没有钱买盐吃，买布匹和药材。我们的军队现在又不能到南昌、武汉去买东西，还是要商人把我们需要的东西贩卖过来。一打进城市，不能驻在学校、邮局、商店里，只能驻在庙里、旧军政机关里。买东西要照价付钱，不得少给。当讲到俘虏政策时，毛委员说：国民党军队几百万人，不是工人出身的，就是农民出身的，有钱的人是不当兵的，所以，国民党士兵一经放下武器，就不应杀害他们；他们那几块卖命钱，几件衣服，也不应没收。要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他们愿意参加革命的，非常欢迎，愿意回家的，欢送他们，并发给他们几块钱作路费。他们能回家的就回家去了，不能回家的，下次再来打仗，就不那么拚命了。当我们认真贯彻了毛委员所指示的俘虏政策后，立即揭穿了敌人的“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敌军感到非常恐慌，大叫：“毒矣哉！”从这里更可看出这个政策的意义了。

毛委员经常注意时局动向，常派出部队到附近城镇去寻报纸。打仗后，要搜集的胜利品首先也是报纸，弄到手的报纸，他亲自动手编成新闻简讯，自己写蜡纸，自己校对，然后印好发

下去，使同志们了解时局变化，耳目不致闭塞。

部队经过整训以后，为了把钻在永新城内的敌人引出城来歼灭，六月上旬，我军向酃县佯攻，占领十都、水口、沔渡等地后，立即又撤回砻市大垅集结。这时，赣敌以为我军远出湖南，企图攻占宁冈，六月二十三日（端午节），我三十一团在七溪岭阻击从龙源口来攻之敌二团，我二十八、二十九团从左侧迫击敌迂回来攻之三个团，从上午八时一直激战到下午五时许，敌三次冲锋，均被我们打垮，我二十八、二十九团实行反冲锋获胜，歼灭敌人大部，直抄龙源口，敌纷纷溃退，我星夜第三次占领永新城。我军中出现一个谚语："不费红军三分力，消灭江西两只羊"（意指敌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足见我军士气之高。三次占领永新胜利之大。

第三日，毛委员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讲明当前形势，布置分兵发动群众工作，实行红军"打仗、作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的三大任务。二十八、二十九团分布在莲花、安福一线，三十一团分布在永新南乡直至吉安天河一线。此时，是我军全盛时期，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红色区域大部分建立了各级政权，分配了土地，建立了地方武装。

黄洋界保卫战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旬，湘敌吴尚第八军乘我军分布在永新、莲花、安福一带作群众工作之际，侵入宁冈。我军立即取道永新拿山向宁冈之敌进攻。敌在我根据地群众包围之中，耳目不灵，仓卒经永新、莲花边境逃回茶陵。我军仍决定从酃县向茶陵进击该敌。当二十八、二十九团进至酃县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顾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建议，十七

日强使二十八、二十九团进击湘南，说这是“正确路线。”毛委员不得不亲率三十一团一、三两营阻击从吉安进攻永新之赣敌第三军、第六军共十一个团之众。当时以毛委员为指挥中心组成党的三路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亲率二、三两连驻石灰桥，一营营长陈毅安为指挥，阻击从天河进攻宁冈之敌，并指挥各路的行动；北路以宛希先为书记，三营营长伍中豪为指挥，率第一、第七，第八三个连，位于永新北乡，背靠天龙山，阻击北面进犯永新之敌一个师；中路行动委员会以何挺颖为书记，团长朱云卿为指挥，辖团部特务连的三营九连，在永新城外阻击从吉安天河来犯之敌。在群众掩护下，用游击战，一面作战，一面作群众工作，在永新三十里以内，相持达二十五日之久。敌在我群众包围之下，如盲如聋，不敢进犯永新城。待我二十八、二十九团在湘南“八月失败”，赣敌知道我主力不在，乃发起几路猛攻，我乃逐渐转移至预先指定的小西江区会师。北路部队则星夜绕经天龙山、潞江、茶陵高坑回至集中地。当部队集中后，毛委员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作战经验和部署任务。在会议进行中，由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传达省委要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指示，并说湖南敌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红四军配合贺龙同志往常德，益阳发展的行动，以便夺取长沙云云。……他讲过话后，毛委员当即提出几个问题问他，大意是：长沙的工人运动怎样？斗争怎样？学生运动怎样？有罢课的吗？白军士兵工作怎样？有哗变的吗？商人有罢市的表示吗？……袁代表都不能回答，只说这次未把各方情况搞清楚，下次来一定答复所有问题。正在这时，驻地有一农民运送二十人，二十九团炊事担子，匆忙回家来，毛委员当即找来询问，才知道主力在郴州失利的消息。因此，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决定毛委员亲率第三营，往桂东沙田一带迎接二十八团回井冈山。第一营仍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翌晨，第三营出发了。为了不使敌人尾随第三营之后，第一营乃在宁冈、永新、茶陵边界游击。三天过去了，湘敌吴尚第八军抢赣敌之先，从酃县直趋黄洋界，进攻井冈山。企图趁我主力未回之际，逼我于井冈山，外围在失去依托，极为不利的地势条件下作战，达到消灭我军的目的。我第一营得到情报，于八月二十八日星夜兼程从茅坪撤守井冈山。此时山下平原尽落敌手，从茅坪上井冈山六十里，荒无人烟，山路崎岖，异常难行。可是，每个战士们都知道这回急行军，是回到井冈山老根据地坚守后方，待主力集中后，相机歼敌，再图发展。所以士气仍很高涨。沿途笑话呀，歌声呀，不绝于口。当有人唱起"打倒地主呀，天天吃南瓜"的滑稽小调时，轰然的笑声，立即响彻全营。

二十九日下午三时，部队到达五井（这是一个破烂不甚的小镇），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即召集连级以上干部开会。何党代表向大家说："目前是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广州暴动失败了，海陆丰苏维埃区、湖北黄（安）麻（城），湘东湘南暴动都暂时受到了挫折，湘西未发动起来，全国目前只剩下井冈山这一小块红色政权。现在湘赣两省敌人全面向我进攻，企图趁我主力不在之际拿下井冈山。我们必须以生死与共的决心坚守井冈山。只要这一小块根据地还保存着，这面红旗不倒，就向全国人民证明，反动统治阶级永远消灭不了革命！"他的话简短而有力，激励着每个干部誓死坚守井冈山！接着，团长部署作战任务，以第三连去警戒黄坳、五斗江通遂川之敌；王佐部队警戒白泥湖、罗浮通永新之敌；金州是通我主力方向，有鄂县地方武装警戒；一、二连派一个排担任通茅坪的警戒。各路都有群众掩护，其余担任扼守黄洋界的作战任务。

会议完了后，又参加营长陈毅安同志召集的排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传达敌情上述军事政治任务，具体指示作战布置与方

法。我回一连后，又召集各班讨论，个个战士莫不摩拳擦掌，严阵以待。会后，我向营部去汇报情况。走到营部时，适逢营部通讯员在上井、中井山泉流下来的小溪里，捉到二十多条小鱼虾，加上一点干笋（井冈山产竹），煮了一锅汤。还有一把青椒，放在火上烧一烧，加点盐巴一捣，盛了一碗，营部二十多人就此聚餐了。我在这里饱尝了一顿粗红米饭后，又到团党代表那里，看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一进中井，看见党代表和团长住的敞屋内（当时不进居民的内房住的）只有两条板凳支着门板，上面放着军毯。这时，党代表正在阅读"列宁主义概论"（即斯大林著："关于列宁主义的基础"）论党一章，并与团长和其他几个同志讨论在阶级斗争中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到了共产主义政权衰亡了，党亦自然衰亡等问题。他见我来了，就指示我，在作战时，要加强战斗鼓动工作。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匆忙的几小时内进行的，进行完毕，即率部队向黄洋界进军。

部队一到黄洋界，连排长察看地形，分配任务后，即率战士们加固原有工事，挖掩体，搞好射击依托，搬大石块作炮弹。天黑了，大伙割些茅草，找好一块平地铺上睡觉，好在大伙的心是热的，因此，虽然在二千几百公尺的高山上，睡在一起，任它寒风吹啸，猿猴鸣叫，大家盖着垫着茅草，紧紧地挨着，也就不觉得寒冷了。只有放哨的燃着一支小香，燃完一支轮换一班，其余的战士倒地熟睡，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战斗。

八月三十日清晨，空中罩着薄雾，在小井准备好的饭菜送来了。吃完饭，天色大亮，雾也消了，敌人还无动静。原来是路窄行走不便，雾大看不清山上，只好捱到八点钟光景，才向我攻击。我军在山上，注视着敌军，历历入目，只待敌走到二十至三十公尺内时才射击。路窄山险，敌人疏散不开，只能一个一个挨次鱼贯向上爬，尽管后面吹着冲锋号催着，还是爬不

快。我军战士屹然不动，待敌人走入有效射程内，指挥员才一声号令“放！”敌兵一个个的倒下去了。因为我军弹药不多，有的只有一排（五发），最多的也不过三排（用小竹筒塞满子弹带，表面是看不出有多少弹药的），乃利用踞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用大石块滚下去，砸死砸伤敌兵。同时一粒子弹往往不是打倒一个，而是可以打倒好几个敌兵，死尸滚滚而下，逼得敌兵无法前进。敌机枪好似对空射击，发挥不了作用，瞄高了，无效果，瞄低了，又使敌兵无法前进。就这样，从上午，中午到下午，敌军更换进攻部队四次冲锋，我军都严阵还击，把它打得落花流水，敌死伤达百数十人，打垮了一个团，丢下许多尸体，毫无所得，只好星夜逃回鄠县去了。我军除消耗一点子弹外无一伤亡，胜利地完成了黄洋界保卫战，便于次晨乘胜尾追，各中心地区的地方武装相继出动，收复失地。湘敌失败后，赣敌便不敢进犯。我军依然把井冈山的红旗插满山下四周，迎风招展着。

八月二十三日，毛委员率领三十一团第三营在桂东沙田与二十八团会师。除留少数部队坚持龙溪十二洞的游击斗争外，主力经崇义回井冈山。九月十三日与堵击我军之赣敌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队战于遂川，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战胜深入宁冈之赣敌周浑元旅于贺家壁。十一月九日又战胜赣敌一个团于古城和龙源口。我先头部队直趋永新城，因敌顽抗，乃退回宁冈，敌人不敢越出永新河一步。于是，第二次“围剿”乃被我军彻底粉碎。“八月失败”的被动局面开始转为主动局面了。

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

十月中旬，在宁冈召开各边界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红四

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毛委员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了革命性质与任务，红色政权之所以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批驳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机会主义谬论，论证了“八月失败”的原因，指出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巩固这一根据地的任务等，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在毛委员和边界党的正确领导下，十一月，红军又占领遂川，分散在遂江左右两岸之藻林、左安、大汾、沙田等大片地区，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斗争，扩大红军，筹足给养，购买过冬布匹、棉花和药材等，以作坚持井冈山长期斗争的准备。此时，毕占云同志率领湘军阎仲儒部一营起义，编为特务营，张威（在大庾牺牲）率赣军一营起义，编为独立营。我军力量更为壮大了。

在我军进至遂川时，严格遵守党代会决定争取中间阶级的政策，取消一切杂税，贯彻执行城市政策，不仅得到农民的拥护，中小商人亦无不齐声道好，在一个圩场开群众大会时，群众到者两万余人。足见党的政策的正确。

下半月，我军撤回宁冈整训，构筑强固工事，搬运粮食上山，加强地方党的领导机构，派遣并轮训地方武装干部，加强后方医院等各方面的工作，准备粉碎赣湘粤三省的“围剿”。朱军长亲自背粮上山，士气更为高昂。

十二月上旬，平江起义的红军第五军来到井冈山会师，十二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在茅坪召开胜利的会师大会。这时得悉三省“围剿”已开始组织，何键任总指挥，驻萍乡。蒋、桂两派矛盾虽然很深，但还未表面化，买办、豪绅、地主阶级之间暂时是一个稳定时期。在“反共”的旗帜下争夺领导权。我军在红四、五两军会合后的形势下，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有可能和必要把主力转移到敌人包围圈外去打击敌人。毛委员

决定：派红五军固守井冈山，红四军除留下王佐部队外，全部在敌人未逼近时，转移至敌后去。有人主张转至湘鄂赣边界去，毛委员考虑到该地区狭小，北有长江，东有赣江，西有湘江，南有株萍铁路，敌人运动便利，我军回旋地区太小，不宜前去。另有人主张去湘南，毛委员考虑到敌人交通便利，当地群众斗争已受挫折，亦不宜去。最后经过充分讨论，决定转移至赣南地区。其理由是：①赣敌除刘士毅部系本省军队外，其余都是外省军队，曾被我军打败过，敌人力量较弱；②在赣东北有方志敏同志的游击区域和红军部队，在吉安东固一带有江西独立第一、第二两个团，可互相支援配合；③江西的自然经济成分比较大，交通不便，农民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易于发动起来；④有江西、闽西、浙西、粤北广大的回旋地区可资活动，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量可资支持。这样，便在军内、党内、部队干部以至战士中进行教育，全军莫不拥护这一英明的决定。

部队在出发前，按中央指示，成立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有指导所在省委工作责任之前敌委员会，毛委员还曾亲自拟好四言布告和党的宣言，宣布我党我军主张。待一切安排妥当后，红四军四千余人，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毛委员、朱德同志的率领下，经上犹、崇义至大庾，向赣南进军了。这一壮举成为尔后建立中央苏区的前奏。

结　语

（一） 井冈山斗争的一年，是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在局部地区形成高潮的一年。它向全中国全世界表明：蒋介石反动政权是压服不了中国革命的。它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表明：井冈山的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不久的将来，就可成为燎原之势的。

（二）井冈山一年的斗争所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党的路线、政策，红军的战略战术，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证明了毛主席教导着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一整套的理论与政策，特别是建立根据地中心地区坚实基础的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稳定时期，我不宜分兵，分兵易为敌各个击破；在其内部破裂时期，则可在较大范围内的分散兵力，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的一整套思想之极其正确性。

（四）井冈山斗争的一年，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作斗争的一年。历史证明：盲动主义政治路线是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的报复反抗和失望情绪的狭隘性，缺乏对形势的正确估计和革命的坚持性。由此，其一套政策，为烧杀行为，“制造”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破坏中间阶级的利益，过早的组织共耕（如在醴陵），脱离农民；在军事上，攻打城市，以致在湖南导致了湘南，湘东与“八月失败”。而正确路线则是毛主席一整套的对形势的客观分析估计，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争取群众多数（首先是农民）正确的社会政策，军事上的正确路线，这就是井冈山的斗争光辉的历史。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一个俘虏兵的故事

杨至诚

我们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与秋收起义部队合编成红四军。当时上级宣布了一些政策、纪律和指示，我们都感到非常新鲜。别的不谈，单拿对待俘虏的事来说吧，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当时听来，不仅新鲜，简直令人百思不解：俘虏，不管怎么说也是“阶下囚”，怎么待为“座上客”呢？

这样想一点也不奇怪。那时红军的成员，不是暴动的农民，就是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官兵。农民在家里受尽了地主豪绅的压榨和迫害，“四·一二”后又有许多亲人被残杀，他们在战场上见了敌人，就想报仇雪恨。从旧军队来的官兵呢，过去打仗抓了俘虏，搜腰包，发洋财，开口骂几句，伸手打两下，那是家常便饭。当时很多人都怀疑宽待俘虏的做法。

不久，我们的部队去攻打永新。敌人是杨池生部，战斗力不弱，在永新外围，我们和敌前锋营遭遇。由于我们处于绝对优势，战斗展开不久，敌人就招架不住，开始动摇了。这时，敌人的一个军官拿着驳壳枪，对准了敌兵发疯似的大喊：“他妈的，给我顶住，不许跑！”“小心别当俘虏，共产党抓住你们要剥皮抽筋的！”在他的威胁下，白军士兵又拚命顽抗，死不

缴枪。可是他们哪里挡得住我们的冲杀。不一会，敌人溃退了，我们捉了不少俘虏。

当时我是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我想检查一下部队执行俘虏政策的情况，便怀着好奇的心情向俘虏们走去。

战士们围着俘虏，个个虎视眈眈。俘虏呢，抖抖索索挤在一角，脸色灰白，双眼失神，流露出绝望的神情。我便对他们说：

“不要怕，保证你们生命安全，一根汗毛也不动你们的！”

他们呆呆地转转头，你看我，我看你，没什么反应。这时，我发现有一个大个白军士兵，佢偻着身子藏在后边，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还掉了一只袖筒，看了他那副样子，我想起刚才拚刺刀时有个死不缴枪的白军士兵很象是他。我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

他浑身一抖，脸抽搐得几乎变了形，上牙磕着下牙，十分艰难地回答：

“姓曹……叫……叫曹福海。”

“刚才是你吧？几个人才把你拖住。”

“长官，不不不是我！”

“怎么不是你，看，我的手都被你抓破了，还想抵赖。”一个战士在旁边插嘴。

这句话象宣布了他的死刑。他苦苦哀求：“长官，积德呀，一家老小全靠我呢，饶了我一条命就是救了我全家。”

从谈话中，知道曹福海也是个受剥削的农民，是被国民党抓出来当兵的。于是我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番，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一提起参加红军，他又害怕了，又是什么“长官积德”啦，“饶了我就是救了我全家”啦。我再问别人，也是如此，苦苦央求，硬是不愿当红军。

说实话，那时候我对究竟能否争取俘虏也是怀疑的。既然

争取无效，我就派人把他们送到团里去处理。

团里对他们照顾得十分周到。尽管我们生活很艰苦，药品也很缺乏，但还是让他们住得舒服，吃得好，带伤的还一律给以治疗。临走那天，团里又开了个欢送会。会上，团首长向他们说明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放下武器就是兄弟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之后，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如果仍是当白军，再和红军打仗，枪口不要对着自己的兄弟。

散会后，又按规定，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钱的路费，还给每人发了一些简明通俗的传单。记得传单的内容是："白军弟兄们，不要给地主资本家卖命；你们流血牺牲，家里照旧受穷。""参加红军吧，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不骂，经济公开。"等等。发完东西，我们敲起锣鼓，高喊口号，把他们送出很远。重伤的俘虏，派农民自卫军用担架抬着。俘虏们深受感动，有人痛苦失声，拍着大腿说："以后打仗再碰上红军一根汗毛，我就不是人！"有的看着手里的银元，嘴里不住的骂："哼，'剥皮抽筋'，简直是放屁！"

看了这些情景，我心里一动，脑袋也开窍了。这样处理俘虏果有好处！这些人如果回到白军里，不是我们很好的宣传员吗？能彻底揭穿红军"剥皮抽筋"的那派胡言，使白军士兵今后打起仗来不再象曹福海那样拚命，打败敌人就更容易了。

但是，事情却不象我想的这样顺当。那年六月，江西的杨池生、杨如轩部向井冈山进犯。我们在老七溪岭阻击。敌人出动两个师，装备良好，训练有素。战斗一打响，就是一场硬拚硬的恶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把敌人打垮，俘虏几百。战斗打得很残酷，战友们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我们心里又沉痛又气愤。有人指着俘虏的鼻子说：

"这回一个不放，放回去还当反动派！"

"消灭一个少一个！"

“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上级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情绪，记得好象是在这时候，毛党代表给部队讲话，再次强调俘虏政策。他说：出气、报仇，你们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不是地主豪绅，你杀了他，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越是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帐不是很好算？大家心平气和了，心里也亮堂了。

整整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把这些俘虏处理完。全军上下，人人动口动手，工作比上次更加细致周到，甚至连敌人的尸体都用棺材装好，写好姓名和战死地点送了回去。我想，这几百人一回去，杨池生、杨如轩的部队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有我们的“宣传员”了，再打仗将会怎样呢，等着瞧吧！

秋天，敌人又向我进犯，在七溪岭一带遭遇。战斗只打了半天，许多白军士兵纷纷缴枪，其余的溃散了。

说来也巧，在俘虏群中我又看到了曹福海。这回他穿戴得整整齐齐，不象上次那样狼狈了，也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只有低着头难为情地傻笑，我问：“又来啦？”

他嘿嘿笑了两声，样子满憨厚。

“怎么没回家呢？”

“家在云南，怎么回去啊？”

“还是当红军吧，打倒反动派再回家！”

这时连党代表也插嘴，小号兵也帮腔。可是，曹福海向四周看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

“还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打了两枪，还是朝天上打的。”

也许是他看到我们穿得破破烂烂，拿的是杂牌枪，甚至还

有许多棱镙，不相信红军真能把反动派打倒吧？那时根据地很小，部队也只有几个团，装备低劣，生活艰苦，一个受国民党欺骗影响很深的白军士兵，这样想也是很自然的。一回不行两回，发给他路费，开好路条，又热情地把他送走了。

红军连续得胜，根据地不断扩展，但敌人的“围剿”也更频繁了。不久，杨池生和杨如轩的部队又来了。双方在七溪岭一接触，就有大批敌军拖枪跑过来。

战斗结束后，二营的同志对我说：“有人找你。”

“谁呀。”

“俘虏，他说一定要找你。”

不打不成交，倒是真的打出交情来了。可是究竟是谁呢？我正想着，通信员把那个俘虏带来了。原来又是曹福海。他看出是我，就晃着高大的身躯跑上来，满脸得意地说：“这回我再也不回去了，免得老是当俘虏。你看，我还带来十几个弟兄。”本来很憨厚的人，现在显得很活跃。再看他身后，直溜溜地站着十四五个白军士兵，他们和曹福海一样，一个个面带笑容，毫不拘束。

这事出乎我意料之外，但一想起毛党代表的讲话，又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我很高兴，便脱口说了句笑话：“怎么，不怕剥皮抽筋吗？”

他们哄的一声开心地笑了。有的说：“谁听那些狗屁！我们早听说了，你们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气！”

我问曹福海：“你呢，怎么想通的！”

曹福海叹了一口气：“唉，早先我常这样想，忍着吧，家里困难，每月多少有几块饷钱，给家寄去兴许顶点事。谁知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这个捐那个税的，当了几年兵，老人孩子照旧挨饿受冻。”说到这里，他摇摇头，“我左琢磨右琢磨，觉着还是你们说得对，大权在别人手里攥着，穷人就别想过好日

子……"

是啊，真理是不能蒙蔽的。

我们把这事向上级报告后，便把他们编到班里。和白军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艰苦得很。每月的津贴很少，每天只吃五分钱的伙食。快到冬天了，身上还只穿着两件单衣。但是我们有政治教育，有民主制度，官兵一律平等。加上废除了体罚和繁琐的礼节，经民主选出的士兵委员会又按群众的意见管理生活，使从白军过来的士兵感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是一个人，在白军里是儒夫，到红军里变成了勇士。同是一个人，在白军里似乎愚昧无知，到红军就成为能说会道、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的战士。曹福海表现得尤其突出，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很快当了排长。可惜，他在大庾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以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地区，战斗十分频繁，俘虏也增多了。我们一直认真地执行着毛党代表制定的俘虏政策。红军的影响，越来越扩大。白军成连成营地拖枪过来。有些今天过来，明天就投入战斗，表现很好。这一政策，不仅从政治上瓦解了敌军，同时也争取大量白军投入红军，壮大了自己。

（摘自《星火燎原》选本之一）

在冈井山上

杨兴顺

“我们是穷人的军队”

我从小就给地主扛活，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穷人。滇军打黔军，滇军到处抓兵，我和三个同乡，由贵州家乡逃出来，流落到湖南省。

在湖南我们听说有红军，听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不打人，不骂人。我们四个人背着人合计了一下，当时在外乡当长工的苦也不愿再受下去了，就决心参加这个穷人的军队去。

我们寻找红军，由湖南走到了江西的萍乡，由萍乡又走向宁冈。这时是一九二八年九月间，红军正和国民党江西军第七师打仗。在永新、宁冈、泰和、万安一带都有红军。沿途只要打听穷苦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红军好的。有的听说我们是去参加红军的，还给我们做饭吃。

我们到达宁冈这天，正是红军大败国民党军，占领了宁冈。街上的红军被三五个老乡围着，兴奋地询问着胜利的情况。红军有很多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有的头上还缠绕着蓝布。只要是红军，臂上都带着红布箍，领子上也围着红布。有的拿枪，也有的拿梭镖。我们上前去打听参加红军行不行，他们都表示欢迎。说实话，我们几个当时看到红军穿的那样不好，思想上还顾虑当红军是不是仍要挨饿！我们又合计了一下，大家都说高

高兴兴的挨饿，总比受着气挨饿强，第二天就正式参加了。

红军头一天打下宁冈，第二天又攻打永新城。我们几个到的是二十八团一营，由一个副官同志把我们带到永新。

在永新城东南有一条小河，在河滩上坐着不少的红军。一个四十多岁的同志，正在向大家说什么。这个人戴着一顶破蓝布帽子，头发很长也没有剪。一身蓝色衣服上满是泥垢。当他知道我们是新参加的，用眼上下打量了我们一下，含笑地看着我问："怎么样呀！愿意吗？"我说："愿意"！他又问了另外几个，他们也都说愿意。于是这个人就和我们谈："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穷人的军队。我们要打倒大资本家、地主，打土豪分田地……"话还没说完，枪响了，这个人就带着队伍冲下去了。

我们几个被带到永新城里一家很大的房子里，副官同志告诉我们这是军部，叫我们先在这里休息。我们也不知道军部是干什么的，初到那里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敢到处乱走。军部的几个红军同志，知道我们是新参加的，就过来和我们说话，有的还给我们端水来喝。谈话中才知道他们以前也都是穷人。我们问起刚才和我们说话的那个四十多岁的人是谁，一个同志告诉我们，他是二十八团朱团长，可是另一个说是朱军长。（朱德同志当时是红四军军长），因为以前是二十八团团长，所以二十八团仍有些同志习惯称他为朱团长。他们还告诉我们：毛委员（当时这样称呼毛主席）率领队伍在离县城七、八里地的地方放哨呢！

朱军长！我脑子里又出现了他那慈祥的面孔，和那亲切而有力的"我们是穷人的军队"的声音。

"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

红军打了胜仗，占领了永新城。朱总司令（以下在叙述上，都用今天习惯的朱总司令和毛主席这个称呼。）和一个高个子、

穿灰色衣服的人一起回来了。老同志告诉我们，这就是毛委员。他们一回来，军部就忙起来了，出出进进，尽是找他们办事的。

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穷人，有很多要求参加红军的也来到了军部。打仗时，从国民党那里得来不少的现洋，也抬到了军部。

晚上，毛主席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的同志讲话时就提出钱的事，他说："我们是保护穷人的军队，不是保护大资本家的军队。他们的钱都是上面装腰包。我们不是的，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

我刚参加，还没有发过钱，但是我相信是这么回事，因为我看见了朱总司令那身衣服，毛主席看起来穿得好一些，但是除了比朱总司令的衣服干净些，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了。

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军部里第一名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东，以后点大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

"要一枪打死一个敌人再开枪"

打下永新的第三天，敌第七师、十八师匪军来得多了，我们退出了永新，经宁冈回到了井冈山。

到井冈山后，我被编到二十八团通讯班当通讯员。发给我一支汉阳造小马枪。当时二十八团枪最多。可是也还有不少的同志拿梭镖。有枪的同志，也只不过有三、五发子弹。我只有三发。

敌人三面包围井冈山，通往井冈山的几条路都叫我们封锁了。

从宁冈通往井冈山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窄的地方只能通一匹牲口，两面都是无法攀登的绝壁。我们在上面设置"哨口"，用机枪把守着。从哨口到山脚下，我们用削尖了的竹子，埋在地里，摆成"尖刀阵"。

敌人要上井冈山，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在工事里等着。

毛主席告诉我们："枪响时不要乱开枪，我们子弹少，要一枪打死一个敌人再开枪"！这样，我们往往用少数的子弹打败很多的敌人。敌人来到我们近前时，机枪、步枪一响，匪军就连滚带爬，不是被打死，就是掉到我们的"尖刀阵"里活活打死。敌人围了一个多月，到底也没有攻上来，最后不得不退回去了。

"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

驻在宁冈的敌人的一举一动，通过老乡和我们侦察员的报告，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

敌人大部队撤走了，只留下一个营。

这天，朱总司令集合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全体同志讲话。朱总司令含笑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朱总司令问的是什么，都回答："不知道"！朱总司令环顾了一下几百只向他注视着的眼睛，用缓慢而有力的口气说："我们现在枪很少，子弹也很少。我们要找第七师（国民党江西军）去借借枪，借借子弹，大家有决心没有？""有！"大家一声响亮的回答。朱总司令又告诉大家应该准备的工作。夜里一点钟吃饭，三点钟出发。二十八团三连两个排向敌人驻地东面包围，一连向南面包围，我们通讯班和三连的一个排，由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率领，在敌人的西面。东面最远，要等东面发出信号，三面同时攻击。

黑夜里，毛主席指挥着部队，走出崎岖的山路，来到宁冈。这时天刚发亮，正是敌人将要出早操的时间。

我们静悄悄地摸到敌人操场的西面，毛主席命令我们隐蔽在离操场不远的沟里，不许动，也不该咳嗽，等到东面信号枪一响，每人只许打一枪。

敌人出操了，一个营的人操得很整齐。他们扛着枪跑了两

个圈。以后就向左转向右转走步，最后立定在一条线上，面向着我们。

我是第一次跟着部队出击敌人，看着敌人眼睛直看着我们这里，真怕敌人发现了我。我偷偷地看了看毛主席，他却很沉着的，在监视着敌人的动作。

"齐步走"！敌人一直向我们走过来。这时，我有点害怕了，不时的偷看敌人。毛主席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情，用左手向下一摆，向我作个手势，意思是叫我快爬好，不要动。

敌人走到快到操场边缘的地方，立定停下了，离我们那么近，我心里直跳，不知敌人要干些什么，是不是发现了我们，我正在发懵，只听"架枪"一声喊，跟着敌人值班员的口令，整整齐齐的一排枪架好了。敌人后退一步解下刺刀，又后退一步解下了子弹袋。后退几步又来了个向后转。敌人已离开了他们的武器十几公尺远了。看样子，敌人不是要做徒手体操，就是要"拔慢步"。我心里想：这机会有多好呀！我恨不得一下跳出去打它个落花流水，可是信号枪还不响，我侧头看看毛主席，头在向上昂，眼光中露出些焦灼的神情，同时，自言自语的，从喉底齿缝中发出轻微而急促的声音："信号枪怎么还不响呢？"话刚出口，叭的一声，一颗白色的信号弹，在东面冲上天去。我们每个人几乎同时打响了第一枪，跟着毛主席，喊着"杀"！冲上去了。其他两边的同志，也冲进敌人的操场。敌人被这突然的攻击吓住了，连房子都没敢进，就向东北山上跑去，又被三十一团的同志打了一下子。

我们忙着收取敌人的武器，一个人背好几支枪，围好几条子弹袋。毛主席、朱总司令身上也围了几条子弹袋。有些同志冲到敌人房子里，弄了些棉被和大衣，当时毛主席就命令他们扔下，告诉他们说：我们主要是拿武器，现在要那些东西没有用，以后我们会要比那更好的。

把敌人的武器收拾完了，毛主席指挥部队，马上撤回井冈

山。快走到山下时，毛主席叫司号员用号调队伍。这时，我们刚发完子弹；只发给了我五盘，心里正在犯嘀咕，我心里想：我背了那么多子弹，怎么才给我五盘，嫌太少。其实我们通讯班经常跟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五盘还比别人多。别的同志也有嫌少的。队伍调齐后，让一个排到山上放哨，毛主席把队伍集合在山沟里，他站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高大的身躯显得特别魁梧。慈祥又温和的面容中透露出打胜仗后的心情，他感染了我们每个同志，一个个挺胸含笑，等待着听取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也看出了他的战士们这时心里的愉快，含笑地问我们："同志们，你们说好不好？""好呀"！大家愉快而响亮的回答声，在山中回旋激荡。"你们高兴不高兴？""高兴！"这一声比上一声还响亮。"你们高兴，我也高兴。打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大家打的都很好！……这次得来的枪，三十一团和别的团枪还少，要多给他们。……"我一听，对呀！毛主席接着又说："同志们枪得了不少（约四百支）子弹也得了不少。有的同志嫌子弹分的太少。"说着毛主席指着自己的驳壳枪笑着说："我这只手枪只有三颗子弹，真正打起来我到那里找子弹去！你们得了那么多子弹，你们一颗也没有给我"。这一来把大家都说笑了，最后毛主席变严肃的告诉大家："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把子弹都给了那一个人，他也不能打胜仗！……。

毛主席原来早就发现了我们埋怨分子弹太少，他的话好象就向着我说的，当时我觉得脸上直发热，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了。我记住了毛主席的话："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

"全部粮食都运上了山"

在井冈山上，我们的物质生活很艰苦，平时的伙食是糙米加南瓜。在敌人围山的时候，外面的粮食运不进来，有时就只

能吃煮南瓜。但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和我们一样，我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就是每天打饭时，我们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先打。可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工作不知要比我们忙多少倍。那时候我和毛主席住里外屋，晚上，我们睡了，毛主席却经常点着油灯，工作到深夜。

井冈山上的粮食，大部分是要从外面运进来。有一次在宁冈集中了许多粮食，马上要运进山里，因为敌人很快就要来。

红军战士往山上运，老乡也帮助往山上运，背粮的人拉成长长的一列。毛主席也和我们一起往山上背粮。

第二天，天上没有一点云，太阳晒热了石头。背着粮食走起来，特别吃力。可是，毛主席仍然背着粗粗的装满米的布袋子，敞着底服，走在运粮的行列里。有人要抢着替毛主席背，有人劝毛主席不要背，可是毛主席仍然坚持着。他指着肩上的粗粗的米袋子向一个战士说："我背这些，我一个人一天也吃不了呀！"毛主席感动了大家，一个个都尽量多背，争着快走，好再多背一次。

第三天，敌人到了永新，我们的粮食还没有运完。朱总司令就把两个粗粗的白布米袋子，用一根扁担挑着往山上运。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的粮食都是运到"哨口"就放下，转身下山来再背。

有的同志趁朱总司令在哨口指挥置放粮食的时候，偷偷地把他的扁担藏起来。朱总司令发现扁担没有了，有点着急地说："你们拿走了我的扁担，我用什么挑呀！"本来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一来朱总司令就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总司令没有了扁担，仍然往山下走去。这时，拿扁担的同志不得不把扁担还给了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挑着两袋米，颤悠悠地走着，脚步很快，边走边鼓励大家："快走，再有一二次就行了！"这样，在天刚黑的时候，敌人没有来到以前，全部粮食都搬运上了山。

上井冈山找毛委员的队伍

李 寿 轩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高高举起镰刀斧头的红旗，喊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向井冈山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军，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

向井冈山进军，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指明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前进道路，这就是在革命低潮时期，将革命力量转移到农村，在农村扩大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从一块根据地发展到建立多块和大块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并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赢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这条道路，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发现的。它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火”的唯一正确道路。

要活下去　要闹革命

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南平江二十多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围攻平江县城，举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却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锻炼和教育了人民，给反动统治以极大的震动。湖南反动当局当即组织了“平浏清

剿”，国民革命军何键部独立第五师，就在这时候被调到平江地区来进行“清剿”了。

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的官兵们，经受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特别是在湖南革命运动直接影响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蕴藏着强烈的革命情绪。在这支革命队伍中的有些连队里，已经出现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秘密的士兵委员会。

连队的秘密士兵委员会，从维护士兵利益和生活着手，随即组织了公开的经济委员会，清算全连经济账目，掌管缺额军饷，给士兵改善生活，从而制止了军官的贪污和对士兵的尅扣，后来又组织了以军士为主，吸收个别士兵参加的读书会，讲解革命道理、国家大事，向士兵们进行启蒙的阶级教育。曾领导过全营展开了闹饷斗争，逼着师长不得不接受士兵们的请愿，每人预支一元军饷。所有这些工作，我们连长李灿同志都亲自组织和领导。后来，我们才知道，李灿同志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了。

一天，李灿同志的弟弟由湖南宜章县来部队。士兵问他宜章的情况如何？他说：“不得了，毛泽东、朱德的红军正在那里闹革命！”士兵又问：“怎样的革命？”他说：“打土豪分田地，杀土豪劣绅、官僚恶霸。”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想起自已都是穷苦的工人、农民和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们一起经受过土豪劣绅、官僚恶霸的残酷压迫。每个人的心坎里都燃烧起阶级仇恨的烈火。要活下去！要闹革命！要找毛泽东、朱德的红军！要举起铁锤来，把这个吃人的社会砸碎！

从此，每餐吃饭之前，全连就集合起来，由值星军士领着喊口号：

“弟兄们，我们吃谁的饭、穿谁的衣？”

“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

“穿的衣、吃的饭是工人农民的血汗！”

"我们不要忘记工农！"

"要为工农谋福利！"

喊完口号才吃饭。

不久之后，中共湖南省委派来了滕代远同志，负责组织领导这次部队的起义工作。滕代远同志和彭德怀、黄公略、邓萍、李灿、李光等同志迅速地完成了起义准备工作后，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成千上万农民群众的支持下，这支部队在平江城吹响了革命的号角，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

这次装武起义的胜利证实了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警觉的正规军作为骨干，否则，便不易发动；就是发动起来也不易形成战斗力。这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更证实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之后，我党向农村进军，向井冈山进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红军，以及开展游击战争等等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土地革命的口号深入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中，这也证明了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党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希望，鼓舞着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

走井冈山的道路

平江起义之后，当国民党反动派慌忙调兵遣将企图镇压起义部队时，党组织很快决定遵循着毛泽东同志亲自开辟的道路——向农村进军，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方针——到井冈山去！井冈山，这是多么辉煌的名字啊！那里有毛委员领导的红色政权，那里有威名远扬的红四军。井冈山三个字，就象海上的灯塔，在茫茫黑夜中指示着航行的方向。它又象东方初升的红日，给人以无限美好的希望。走井冈山的道路！使得这支革命队伍不仅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免遭失败，而且必将继续发展壮

大，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八月里，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行动了。沿途，我们遭到了敌人的拦阻和追击，几乎每天都要和敌人奋战数次才能前进。当时部队还没有来得及整顿，又还没有同人民群众建立紧密联系。因此，在这艰苦激烈的斗争中，许多同志为革命光荣地倒下了。但是，也有一些旧军官和动摇分子经不起革命考验。在夜行军中，甚至有整连整排整班叛变投敌的现象。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少，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部队走到江西万载大桥，又遭到反动军朱耀华旅的袭击，在敌我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伤亡很大。这时，继续前进是不可能了，第一次上井冈山失败了。人们带着沉重的心情，不得已退回到平江、修水、铜鼓三县边界一带休整。

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打不烂拖不垮的。革命锻炼了部队，也教育了部队，受一次挫折，就多一次经验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这是辩证的真理。共产党人在困难和失败面前，绝不动摇和灰心，而是更勇敢更顽强地战斗。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更坚定了上井冈山的信心。

在这次失败中，我们获得了教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红军的重要原则。这就是：红军必须是无产阶级政党绝对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是毛泽东同志建军的根本思想。从这个根本指导思想出发，一方面必须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保证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和对雇佣军的政治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必须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根据地紧密结合起来，使广大农民群众靠拢我们，使革命武装在群众中生根立足。

于是党组织决定：一面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彻底清洗

反动的旧军官；吸收一批起义后表现坚定的同志入党；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士兵们逐步懂得不是为别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一面为粉碎敌人的“进剿”，调动阻拦我们上井冈山的敌人，部队便向湖北崇阳、通山一带发展，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湘鄂赣根据地。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李灿同志领着我们把一担担粮食亲自送到贫苦农民的家里，沿途农民群众热烈欢迎红军，青年农民大量报名参军，地方武装得到迅速发展。不多的日子，红五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几千人。

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士兵们亲眼看到没吃没穿的农民兄弟分到粮食，分到衣服，分到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大家一致表示：“我们穷人要翻身，只有坚决干革命，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由于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密切结合，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就大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也迅速地打开了局面。

与毛委员的队伍会合

当部队回到台庄后，红五军党委与湘鄂赣特委举行了联席会议。鉴于局面已经初步打开，决定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一、三纵队在平江、铜鼓、修水一带发展；二纵队在浏阳、万载一带开辟工作，以巩固和扩大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军部率领四、五纵队继续向井冈山去和红四军会合。

向井冈山进军的队伍，第一仗奔袭了万载县城后，继续取道株潭、西村、宣风镇等地前进。在这些日子里，困难是很多的，要冲破敌人的封锁，摆脱敌人的追兵，一天要打几次仗，要走一百多里路。挂了彩，没有医药，就用土办法治；没有鞋，就自己动手打草鞋。天气冷，没有棉衣，就用没收地主豪绅的布匹棉花自己缝，把长袍剪去下襟缝上对扣就成了。大家一心一

意要上井冈山，要找毛委员，要和红四军老大哥会合。一想到这些，就不觉得什么困难了。一路上，大家以极其兴奋和愉快的心情，势如破竹，所向披靡，顺利到达了红色根据地——莲花。

到了莲花，先与毛委员派来迎接我们的何长工同志的部队会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我们终于到了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师了。红四军，这是多少天来我们一直敬仰着的老大哥啊！为了到井冈山来和红四军会合，我们经历了一段多么艰苦的道路啊！如今这个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敬爱的毛委员和朱德军长也就要和我们见面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会合啊！此刻，又怎能让我们的心情安静下来呢！我们和红四军的老大哥们紧紧地握手，谁也不肯先松开。崇高的阶级感情一下子便把我们融化在一起了。

进入红色根据地以后，所见所闻样样那么新鲜动人。沿途一山一水，每村每户都那么可爱。这里，毛委员亲自领导着劳动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乡村苏维埃政权的牌子，那么吸引人；赤卫队，少先队配合红军站岗放哨，盘查坏人；广大人民参加了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劳动人民生产劲头特别足；红色山歌唱得人心花怒放；红军纪律异常严明，对待老百姓和蔼可亲，人民对待红军也亲如家人。我们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给烧茶送水，让房搭铺，殷勤接待，体贴入微，晚上睡觉，也睡得分外甜。

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合之后，毛泽东同志很快从红四军派党代表同志，到红五军各大队来工作，帮助建立和巩固各级党代表制度，传播红四军政治工作经验。把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在红五军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教育，并建立了许多革命制度，加强了对这些年青的红色战士关于党的纲领、政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克服红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量。

这对于刚刚起义的红五军进一步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奠定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以便发展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是有着极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在毛泽东同志加强对红五军政治领导的同时，我们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从丰富的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概括的作战方针。红四军的干部用他们生动的实际战例，做了介绍和讲解。证实了执行这个方针就一定打胜仗，违反这个方针就一定打败仗。红五军也派了干部到红四军去访问和学习。根据红四军经验，利用战斗空隙，积极进行练兵，这又使得红五军的官兵们，对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情况所规定的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得到初步了解和认识，为后一时期胜利地开展游击战争，在军事指导上获得了有利的基础。

粉碎敌人的第三次“进剿”

正当我们热火朝天进行练兵，准备夺取新的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反动派慌忙地调兵遣将，纠集湘、粤、赣三省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准备对红色井冈山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进剿”。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党内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了。毛泽东同志召集了红四军红五军高级干部会议，分析当前国内外有利形势；预断新的军阀混战将要再起，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红旗，一方面要保卫和扩大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同时还要采取积极行动，调动和分散敌人，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在反动统治薄弱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就这样正确地解决了新老根据地关系问题。于是，毛泽东同志对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亲自作了动员和部署后，就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向赣南、

闽西一带进军，扩大和创造新的根据地。

一月中旬，各路反革命军齐集井冈山下，敌人企图以其绝对优势的兵力，将留守井冈山上的红五军一举歼灭在山上。但是，敌人这个企图失败了，我红五军在给敌人以严重杀伤以后，随即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从井冈山冲杀出来。经过几十天行军作战，在四、五月间到达瑞金，再次和红四军会师。

不久，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红五军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讨论了红军的任务。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指示，决定红五军迅速返回井冈山，恢复和扩大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革命根据地，拯救在白匪军和地主恶霸残酷压榨下的红区人民。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很快由滕代远同志在红五军排以上干部中间传达了。经过热烈讨论，我们懂得了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了解到有了根据地才有地方进行休整和补充力量，以便继续战斗，走向最后胜利，更了解到井冈山根据地对整个斗争的重要关系。记得还在一九二八年冬，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指出："边界红旗始终不倒，不仅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因此，全体指战员一致拥护党和毛委员的决定异口同声地高呼：

"拥护毛委员的决定，坚决打回井冈山！

"不怕艰苦，克服困难，一定打回井冈山去！

在我们临行前，毛泽东同志亲自指示从红四军拨给我们一部分物资、药品，要我们带给井冈山地区的人民群众。红四军许多同志也托我们带慰问信和礼品送给在井冈山上坚持斗争的战友。这是多么深厚的同志爱，这是多么崇高的阶级感情啊！

天气炎热，烈日当头，一路上人人汗流浃背，草鞋象火烤

了似的，从脚板心直热到心里。队伍怀着毛委员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日夜兼程，直奔井冈山。

走到信丰、南康地区时，领导上为了照顾生病的同志，决定动员他们留在游击区里休养，痊愈后再归队。游击区的领导同志也非常欢迎。上级虽然如此关怀，但是谁也不想留下来，大家都希望早一天到达井冈山。有的同志口说留下，当部队出发时，他又跟上队伍行动，谁也不愿意掉队，谁也不愿意晚一天回到井冈山呵！

我们在信丰地区休整了几天，地方党组织派县委组织部长郭一清同志带来一百七十多个青年参加红军，领导上决定和原来的保卫队合并成立军政治部保卫大队，并指定郭一清同志任党代表，我任大队长。新战士参加红军，个个都高兴，他们说："这回能把白匪（指国民党军队）、狗子（指地方民团）打个痛快！"新战士要求立刻发枪，可是当时只抽了十几条枪，许多同志还得用大刀和红缨枪。开始，有的战士不愿意用红缨枪，我和党代表耐心地作了说服教育工作。我们鼓励大家说："枪，要靠自己从敌人手里夺来！我们要学老同志那样，到战场上去缴获敌人的枪来武装自己！"这些话给新战士很大鼓舞。他们都把红缨枪背起来，在行军空隙中，把它磨了又磨，擦了又擦，那矛头就象镜子那样闪闪发亮。

当我们离开井冈山时，反动派认为红军早已打垮了。他们高枕无忧地龟缩在城镇里。一路上我们的行动迅速秘密，敌人又捉摸不到，当我们到达黄坳时，碰到了"地头蛇"肖家璧的地主武装。这个极端反动的民团头子，盘踞在黄坳一带，奸淫、烧杀、抢掠，群众痛苦不堪。我们决定消灭这股反动地主武装。经过简短动员，战士们怀着无比的仇恨，勇猛地向敌人冲去。瞬时，冲杀声震动山谷，敌人猝不及防，仓皇应战，很快就被打垮了。这一仗，提高了新战士的斗志，许多战士的红缨

枪、大刀换上了步枪，用敌人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七月里，我们终于胜利地完成党和毛泽东同志交给的任务，重新踏上了井冈山美丽的土地。

井冈山的红旗万丈光芒

雄伟的井冈山，森林茂密，鲜花盛开。工农群众听说毛委员的队伍回来了，儿子扶着母亲，母亲拖着孩儿，争先恐后地前来迎接我们。当他们看到自己的队伍，激动得热泪盈眶，控诉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诉说红军替他盖的新房子被烧掉了；妇女们哭诉自己的亲人被杀害了；孤苦伶仃的孩子哭诉爸爸被抓走了；大家满腔悲愤地要求红军替他们报仇，要求红军保卫他们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立即安慰他们，并说："我们是毛委员派回来的，一定要巩固和建设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扩大苏维埃政权。"接着，就把毛泽东同志叫我们带来的钱和物资通过地方党组织分发给广大群众。他们激动得连声感谢共产党、感谢毛委员、感谢红军，说："毛委员管革命大事那么忙，还这样关心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委员走！"谁爱人民，谁为人民做事，在他们心目中是十分清楚的。

在井冈山上，原来因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断了联系而在山上坚持斗争的李灿、何长工、王佐、袁文才等同志，又和我们亲热的相会了。下山前留在人民群众中散藏的伤员，病员同志们，也一个个欢天喜地地走出深山密林重返部队，互相间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紧紧地握着手，欢乐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重返井冈山后，红五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恢复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团结军民，高举红旗，坚持斗争，把无产阶级伟大革命的火焰更加旺盛地燃烧起来。

从九都山到井冈山

李 寿 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一手制造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刚刚掀起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时期。

蒋介石建立反动统治不久，国民党各派军阀开始了混战。一九二七年十月，被蒋介石打败了的唐生智部队，由安徽经湖北一直退到湖南，仗着人多势大，大鱼吃小鱼，在湖南安乡击溃了四川军阀杨森部队，占据了湖南一带。

当时，我在彭德怀同志领导下的营里工作。这是唐生智部的三十五军第一师。一九二七年在南县改为独立第五师第一团。

“一营共产化了”

一九二八年春，我们在湖南南县九都山上练兵。

九都山的风景很雅致，有山有水，确是个好地方，但天天练兵，士兵的生活很苦，晚上睡在祠堂破庙里，虱咬蚊叮，夜不成眠。士兵们厌军厌战的情绪日益高涨。

这时，我们连里已经有了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士兵会”，我是这个会的委员。起初我们人数很少，先从团结进步士兵，维护士兵生活着手，并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暗示，一营各连里组织了公开的“经济清算委员会”，清算全连经济，掌管缺

额军饷，并由士兵轮流值厨，担任采买，制止了军官的贪污和对士兵的剋扣。积累起来的钱，除改善伙食外，余款集中起来为全营每个士兵作了一顶蚊帐。这些措施都深得士兵的拥护。

奇怪的是，我们连长李灿同志，对这些事情非但不加阻止，还亲自组织了以军士为主，吸收个别士兵参加的“读书会”，使我们学习了一些进步书籍。这时，正巧他的弟弟由湖南宜章县送他的爱人来部队看他，士兵们就问连长的弟弟宜章情况如何？他弟弟说：“不得了，朱德、毛泽东的红军在那里闹革命，杀了好些人。”士兵又问：“杀的什么人呢？”他说：“打土豪分田地，杀土豪劣绅，官僚恶霸。”士兵们听了，心中暗暗高兴，对红军深表同情。李连长在旁边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看来也没有反对的意思。

从此，士兵们开始接触到新的生活，觉悟渐渐提高，精神也振作起来了，连队里，开始呈现一种新的空气。

每当吃饭之前，全连就集合起来，由值星军士领着大家喊口号：

“弟兄们，我们吃谁的饭？穿谁的衣？”

“穿工人的衣！吃农民的饭！”

“我们不要忘记工农！”

“要为工农谋福利……”

这样，喊完口号之后才开始吃饭。

有时晚饭以后，由值星军士带着队伍到野外作游戏，解散以后，士兵们便三三两两的，在九都山附近的河堤上散步谈心，有时也谈论国家大事。这时，常有身穿绫罗绸缎，拄着文明棍的土豪劣绅，大摇大摆地从河堤上经过，我们对这些家伙恨极了，有时嘲笑，有时漫骂。土豪们听到骂他们“光吃饭不作事的寄生虫”，心里当然很不舒服，但也不敢怎样，只是冷冷地看我们几眼，灰溜溜地走了。

这样一天天下去，绅士们终于恼怒了，跑到师长周盘那里去告发：

“师长老爷，你们的一营共产化啦？”

“我不管它共产化不共产化，只要执行我的命令就行。”那位醉心于花天酒地的师长，毫不介意地这样回答。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其实，一天天向共产化方向发展着的，岂只是一营呢！

雨夜送枪

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轮到我值班查哨。

士兵们都睡了。我走过连长李灿同志的门口，看见屋里还有灯光，连长好象看见了我，叫道：“李军士，你进来。”

我走进去，给连长敬了礼。李连长含笑望着我：“李军士，今晚有件重要事情要你去办。”他指着身旁的一支盒子枪和两支长枪对我说：“你给我把这几支枪送走。”

“送到哪里去？”

“就是我们打野操的那个破土地庙，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

当时，我们打杨森部后，连里存有一部分好的枪支，但李连长把它送给谁呢？我不禁有些惊奇，便问道：“连长，是送给什么人呢？”

“这你别管，也不许给别人说。”他说着，把枪交给了我。并告诉我暗号：“从那里来的，”“有人派我来。”

平时，我就很信服李连长的，便愉快地接受了。

我先偷偷地把枪从围墙下送到排水洞内，瞒过了哨兵的耳目，然后再从大门口以查哨的样子出来，取出枪，一口气跑到那个庙里。果然，早已有两个人在那里等我了。黑夜中，也看

不清他们的面孔，问暗号也答对了。将枪、弹交给了他们后，他俩激动地连声说："谢谢同志，谢谢同志！回去后，请转达李连长，我们会很好地爱护枪的，武装也一定能继续发展。"

这些话，我当时听起来，似懂非懂的，于是我只有牢牢记住，又一口气跑回去。李连长还没有睡，我把原话向他报告，他静静地听着，脸上浮上了微笑，听完，他小声地叮咛我："李军士，这件事只有你知道就行啦，对任何人也不许讲！"

"嗯！"

我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继续查哨。但心里却不断的想这个事情，这枪送给谁呢？送给共产党的游击队？李连长是共产党员？很可能！要不他平素为人为什么这样好呢！我似乎觉得自己猜对了似的，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觉得自己一生中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从这以后，我对"秘密士兵会"的工作，更加积极了。

闹 饷

不平静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五月中旬，师长突然召集了距离师部较近的一团团部及一、三营官兵训话。在训话中向大家透露：本师已奉命立即出发前往平江"剿匪"。第二天，我们一营"秘密士兵会"的负责人、营部传令班长张云生，来本连召开了紧急会议。他说：这次出发，军官们都预支了军饷，士兵却一个不发，我们准备组织闹饷。这天，适逢我值星，便立即召集各军士开会讨论布置。

这时连里士兵们正在整理行装，作行军准备。由于一年多军饷分文未发，大家穷得要命，连烟都抽不起，有的还欠老乡一些债无法偿还，怨声四起，一听说要闹军饷，一个个兴致勃

勃，当即推选了谢嵩同志为代表，这时营部和其他各连也推选出了代表，统由张云生同志率领，先往团部请愿。为了保护代表的安全，各军士召集了士兵开会，选李灿同志指挥全营。我负责本连。如代表一旦被扣，大家就去营救，解决师的特务连，把部队拖到石道、湘西一带去。

当天，代表们在士兵们的欢送下，理直气壮的到了团部。彭团长不在，金团副见了代表，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训了一顿“发饷是上级的事，爱发就发，不发就不发，胡闹什么，岂有此理，快回去”。他骂他的，谁也没有理他，一心等着彭团长回来。

提起团长彭德怀，全团上下没有那一个不钦佩的，而且在全师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仅廉洁奉公，勤俭朴素，爽直赤诚，而且特别关心士兵和人民的疾苦。他每次下连来，首先就到士兵们住的地方，问生活好不好，有没有军官贪污，有没有欺讹百姓或打骂士兵的。遇着违犯军纪，贪污舞弊的，他是绝不轻饶的。记得在大革命北伐后退时，彭德怀同志当时是我们营长，我们营担任全军后卫。当时国民党的队伍一打败仗是士兵发洋财的机会，散兵游勇，三五成群，一路上奸淫抢劫，无所不为。我们队伍撤离安徽桐城的第三天，正在一个山上休息，忽听得附近树林里几声枪响，他立刻派人去把放枪的两个散兵抓来，一看这两个散兵口袋里装满了抢来的大洋，手上还提着两只鸡，他当时怒不可遏，厉声喝道：“谁叫你们来糟踏老百姓的！”立即下命令把这两个家伙枪毙了。这件事传出去，老百姓莫不称快。当时我这个营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不仅部队纪律严明，而且作战也是全军闻名的，当部队撤退时，就连给师部炮兵营抬炮的民伕也说：“走慢点不要紧，有彭营在后面呢，敌人休想追上来。”

因此，我们士兵们对彭团长非常信赖，相信他一定会支持我们。

不一会，彭团长回来了。不出大家所料，彭团长亲切地接见了代表，问清了来由，然后说："好！我支持你们，马上向师长报告，你们到师里去吧！"这一支持，犹如火上加油，代表们兴高采烈，勇气百倍，奔赴师部去了。

师部的传令排（师长的警卫排）听说一营的代表们来闹军饷，同病相怜，深表同情与支持。这一来真是闹得满城风雨，压力很大，师长不得不接受代表们的请愿，每人预支一块钱，暂时了结了这场惊动全城的风波。

闹饷胜利了，广大士兵获得了教益，提高了政治觉悟，相信自己是有力量起来斗争的。

初到平江

部队懒洋洋地离开了南县，拖着疲惫的双腿，经过长途的行军，到达了平江县城。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三面环河，一面靠山，水田里稻穗初出，一片青葱，风景很优美。但此刻却有一股临危的气氛，由千余地痞流氓组成的清乡队，胡作非为，敲诈勒索，横行霸道，弄得市面冷落，人心惶惶。县政府的三所监狱里，关押着八百名"共匪"。"消灭共产党""活捉游击队匪首孔荷宠，胡筠"的标语，到处皆是。但在城郊地主土豪们的墙壁上，却还留着"打倒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等红字标语，虽已涂擦，但字迹还能看得清楚。

我们一到，县长领着那些绅士官儿们，出城迎接，十分殷勤。他们早已熟知彭团长在北伐战争中的威名，以为自己的"保护者"来了，于是大摆筵席，逢迎献媚。

团部驻城里，一营驻城东郊天岳书院，三营驻北门，二营驻离城五十多里的思村、安定桥一带。部队驻下后，绅士们杀

猪宰羊、大行“慰劳”，我们安静地过完了端午节。

不几天，游击队与二营间有接触，双方都有些伤亡。六月底，彭德怀带领我们二连，到二营巡防。

一到二营，我们就想听听关于游击队的情况，只听二营的士兵说：“你们别听人瞎说了，哪里有什么土匪，都是老百姓嘛，人家打土豪分田地也作得对呀，我们在山上抓到了好几个人，都放了。”也有思想比较落后的士兵说：“他们杀人放火，那就是土匪。”但这种人为数很少，而且立刻受到大家的反驳：“什么土匪，分明都是老百姓嘛！”他们还向我们谈他们抓到的那几个“共产党”都很有骨气，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工农的人民游击队，我们听了心里都很钦佩。

当地土豪劣绅们闻听彭团长亲自出马，都纷纷赶来迎接，大肆奉承，并埋怨二营“剿匪”不力。彭团长为了迷惑反动派的耳目，便敷衍塞责地答应了这些家伙们的请求，当面命令第二营去“搜山剿匪。”

第三天彭团长率领第二营返防时，我带着尖兵班经过一个小山头，忽然发现前面成群结队的，约有几十个人，便马上报告连长。李连长跑上山来一看：“哎，不是土匪，朝天放几枪吧！”连长这样一说，我们也就朝天乱放了几枪。连长又叫我们就地丢下了许多子弹和手榴弹，然后马上拉着队伍走了。这简直象打信号似的告诉游击队说：我们送礼来了，请你们来收下我们的礼物吧！

但是，想不到事情竟发展到如此迅速，彭团长带队回城后，立即就布置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一面通过秘密士兵会进行活动，一面亲自到各营动员。彭团长讲话时，就这样暗示我们：我们奉命来此剿匪，其实不是土匪，全是穷苦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他们，就象你们家乡的父老兄弟一样，苦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要活下去，就得要举起铁锤来，把这个社会砸

碎……。”这些话，正说到士兵们的心上，大家革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

七月十八日，彭团长带着马弁李光来到我们营里，紧张地布置了暴动。我们连担任解除县政府监狱的反动武装和释放犯人等任务。连长李灿立刻带我们军士很巧妙地进城侦察。

平江城，还象往常一样平静，土豪劣绅、伪政府官员们仍在梦中，他们根本想不到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就要在这平静的小城爆发了。

七月二十二日

七月二十二日，天气晴朗，我们饱餐了早饭，就全副武装，整队集合在天岳书院的广场上。这时，彭团长向大家讲话，大意是今天我们要去执行一次光荣的革命任务，去解决那些屠杀我们工农弟兄的反动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我们不再当军阀的看门狗，我们要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坚决的奋斗。接着他又宣布了各队的指挥员和革命纪律，最后命令各队装好子弹，整队出发。

我们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挺起胸膛，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城里进发。一到城里，各队立即分头奔向预定目标。十三时许，各处的枪声就一齐响起来了。

我们冲进了县政府，解除了反动政府的武装。不到两小时，解决了全部清乡队，捉到了县长刘作柱和清乡队长，缴获了上千条枪。平江城的反动势力，被我们摧毁了！

我带着全班士兵，迅速向监狱奔去。被关在监狱里的人，听到枪响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国民党又在屠杀自己的同志和难友了，都惶惶不安地张望着，脚镣手铐叮叮当当地响着。我们一面搜捕着看守监狱的反动武装，一面向他们喊

道："同志们，我们是彭德怀的队伍，我们是红军，特地来救你们的。"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地欢呼起来。我们用斧头砸开了牢门的铁锁，又叫来铁匠砸开了他们的镣铐，人群象潮水似地涌出来，欢呼着，跳跃着。有的抱住我们，有的含着眼泪拉着我们半天说不出话来，有的当场就要求参加红军，有的马上带着我们去搜捕反革命……。整个平江城沸腾起来了。士兵们高举着枪，人们挥着双手，重新获得自由的人举起砸碎的镣铐，唱着、跳着、欢呼着："民主自由万岁！""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一面光辉灿烂的镰刀、斧头大红旗，呼啦啦飘扬在平江城的上空。

一上井冈山

暴动后的第二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正式成立了。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

平江暴动的胜利消息象风一样传遍四方，鼓舞了平江一带的共产党、游击队和老百姓。

正如彭军长在红五军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我们这次暴动，敌人会恨入骨髓，不久将会进攻我们。果然，反动派震惊了，慌忙调遣了超过我们十余倍的兵力，向平江城扑来，情况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平江地下党的负责人胡筠同志带着大队的革命农民进城来了，与彭德怀同志取得了联系，把城里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连夜运往山区。我们在平江城住了一星期，最后和敌人激烈地战斗了一天，便主动地放弃了平江城，转入平江北面山区。为了与红四军会合，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八月底，我们从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进发。

沿途，我们遭到了敌人的前阻后追，几乎每天都要与敌人奋战数次方能前进。在这艰苦激烈的斗争中，许多同志为革命光荣地倒下了，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但是也有些旧军官和动摇分子，经不起革命严重环境的考验，叛变了革命，临阵脱逃，在夜行军中，甚至有整连整排整班的叛变投敌。部队的人数越少，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

部队行至江西万载大桥，遇敌朱耀华旅袭击，激战一场，敌众我寡，我们伤亡较重，第一次上井冈山失败了。部队退回平江、修水、铜鼓三县边境一带休整发展。

但在这次失败中，我们却取得教训。我们一方面分散到黄金洞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整编和训练，把反动的军官清洗了，又调一批优秀士兵带领着一些动摇分子到游击队中去锻炼。与此同时，党吸收了在起义后表现坚定的同志入党。我也在这时由李灿同志介绍，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次部队整训，就象是生铁回炉，经过再一次的熔炼之后，部队虽然只剩下五百来人，整编成五个大队，但却比以前更加团结、纯洁、精锐，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显然大大提高。也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又来围攻我们了。

二上井冈山

九月上旬，为了迷惑敌人，彭、滕二同志率主力先向湖北边境发展，在江西修水县的渣津街消灭敌人江西省宪兵营大部及该地的地主武装。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和游击队，使活动在山区的游击队得到迅速的发展。沿途人民群众热烈地欢迎红军，青年工农纷纷参军，不多日子，我们即由五百来人扩大到数千人。

但是，部队由湖北回到江西白沙岭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

当天晚上召开会议，研究部队行动问题。正当彭德怀同志讲话时，久怀反革命之心的四大队长（原二营营长）雷振辉，突然掏出了手枪对准彭军长，幸而被他身边一个干部及时发觉，立即夺取了反革命雷振辉的手枪，并且当场逮捕了这个反革命分子，禁闭起来。会议仍照常进行。会上，决定把部队向铜鼓和万载一带发展。

在第二天出发时，召开了全体士兵大会。会上，彭军长讲了话，五军士兵委员会宣布了反革命雷振辉的罪行，官兵们无不愤怒。但雷振辉却在垂死之前仍然凶恶的挣扎，猛然向彭军长的警卫员扑去夺枪，两人互相扭打起来。这更激起了官兵们的怒火，这时黄云桥同志上前，一枪结束了反革命雷振辉的狗命。滕代远同志立刻领着大家呼起口号，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里，人们又上了一堂极为深刻的政治课。大家提高了警惕，斗志更加高昂了。

由白沙岭出发到台庄，五军党委与湘鄂赣特委举行了联席扩大会议，决定将五军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为了扩大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决定一、三纵队在平江、铜鼓、修水一带发展，二纵队在浏阳，万载一带开辟工作，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四、五纵队到井冈山去和红四军会合。

宁冈会师

红五军向南行动，势如破竹，消灭了万载城的地主武装。在万载休整三天后，部队继续行动，沿途打土豪分发财物。我们经过萍乡、宜丰到了莲花。在这里，与红四军何长工同志率领的部队汇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终于到了井冈山和红

四军会师了。

井冈山，这是多少天来我们一直就向往的地方啊！为了到井冈山来和红四军会合，我们经历了一段多么艰苦的道路啊！记得在万载城休整的三天里，听说不久就要和红四军老大哥会师，我们是多么兴奋啊。每个同志都为和红四军会师准备了礼物，大家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鞋，买了袜，有的是自己打草鞋……。现在，会师大会就要举行了，久为我们大家敬仰的朱德军长和毛党代表，就要和我们见面了。此刻，怎样让我们的心情安静下来呢！

会师大会是在宁冈城外的一个广场上举行的，会场上临时搭起一个台子。当我们整队入场时，首长们还没有来到，我们即挨次排列在台前等待着。

忽然一阵掌声，朱德军长和毛党代表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地望着。我坐在前头，看得很真切。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都穿着一身灰布军服，头上戴着五角帽子，脚上穿着草鞋，一见我们，立刻含笑向我们挥手，那亲切、慈爱、充满胜利信心的笑容，真是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领导同志一齐走上台去，因为台子搭得比较简陋，也没有想到会上去这么多人，竟一下子将台压垮了。我们立刻七手八脚的又把它搭了起来。正在这时，人群里有人说话了："哎呀，这可不吉利呀，今天会师就垮台了。"这句话，大概让朱德军长听到了，他笑嘻嘻地跑上台去，朝着大伙说："同志们，不要紧，刚才台垮了，但是我们立刻又搭起来了，无产阶级的台是垮不了的！"

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当他说到："今天，我们红四、五军胜利地会师了，我们的革命力量更加强大了"时，全场又掀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我感到毛泽东同志说出了我们千百个战士蕴藏在心中的话。

接着，彭军长、滕党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最后，朱德军长站起来，他是那样乐观而又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们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今天，我们有红四军、红五军，将来，我们会有几十个军，我们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当时，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困难形势之下，首长们这些充满乐观情绪的讲话，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广大士兵的胜利信念。

从此以后，我们便和红四军亲密团结，共同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发展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奋勇作战。

献身革命 鞠躬尽瘁

黄 克 诚

彭德怀同志是湖南省湘潭县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出身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从十一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当过煤炭工人和挑土工人，饱尝了地主资本家的欺凌压榨。苦难悲惨的童年，使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种下对压迫剥削者的仇恨，磨炼出对旧社会的叛逆性格。有一年，他的家乡发生了一次大灾荒，加上地主逼租逼债，弄得湘潭一带怨声载道，饿殍遍地。人民为了活命，自动组织起来闹粜吃大户。而家藏万石粮的豪绅大户们不仅颗粒不给，而且残酷镇压。当时年仅十几岁的彭德怀目睹此一情景，再也遏止不住心头怒火，带领数百名饥饿群众，冲进一个大地主家里，运走了仓里的大半粮食。他的叛逆性格第一次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一九一六年，他抱着为工农大众寻找出路，为中华民族谋求解放的强烈愿望投入湘军。一九一九年，他当连长时，在连里组织“救贫会”，团结进步官兵，为工农谋利益。一九二〇年冬，驻防南县注磁口时，为了减轻当地农民痛苦，经“救贫会”讨论，秘密派人杀了一个恶霸地主。这个恶霸地主是大军阀赵恒惕一个少将参议的哥哥。此举在当时震动很大。被告发后，他弃职潜逃。一九二三年他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历任连长，营长，以“救贫会”为核心，组织“士兵委员会”，提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打倒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六条纲领，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彭德怀同志参加了北伐战争，他指挥的营作战英勇，屡见战功。一九二六年秋，他任代团长，在北伐军围攻武昌时，认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同志。段德昌同志对他进行了党的教育，介绍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等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这时，他才真正寻找到工农翻身，民族解放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于一九二八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彭老总在党的领导下，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鼓舞下，横眉冷对铺天盖地的反革命恶浪，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老总任军长，积极开展湘鄂赣的游击战争，开辟了湘赣根据地。同年十月，率领红五军主力奔向井冈山。经过辗转苦战，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到达宁冈地区，与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合。从此，他在毛主席的统帅下，指挥千军万马，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纵横驰骋于巍峨井冈、苍茫赣水和碧绿闽山之间，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跨越万水千山，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清楚记得，一九三〇年冬富田事变时，有人伪造毛主席的笔迹，写信给古柏同志，要古柏同志在审讯AB团案件中，审出彭德怀是AB团。这封信转到彭老总手里，尽管笔迹很象，但他一眼就看穿这是敌人的阴谋。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不是毛主席写的，毛主席绝对不会写这样的信。他立即召开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宣读了这封伪造信，揭穿了敌人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煽动反对毛主席的阴谋；并把原信连夜呈送毛主

席。毛主席看了这封伪造信后，更增加了对彭老总的信任。一九三一年六月，我红三军团三师驻在南城和黎川之间。一天，哨兵带着两个人到司令部来见我，其中一个五十开外，头发花白，自称是黄公略的叔父的人，说是从南昌专程赶来，有要事找彭德怀面谈。我随即派人把他们送到彭老总那里。当彭老总弄清了这个家伙是国民党特务，奉蒋介石之命前来对他进行策反活动时，他豪放地笑了起来，很有风趣地说："那很好啊，我会妥善答复蒋介石的"。他立即将此情况报告毛主席，把这两个人押回我处，并亲自给我打电话："把那个家伙的脑袋砍下来，叫他的随从提回去，交给蒋介石。"我当即执行了彭老总的命令。彭老总就是用这种特殊妥善的方式，答复了蒋介石，表达了他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送给彭老总，并亲自写了条子：中国革命要胜利，这本书不可不看。没隔多久，毛主席又把《国家与革命》送给彭老总，又亲笔批道：中国革命要胜利，这一本更要看。毛主席常常把最艰巨的、有关全局的重大任务交给彭老总，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把保卫井冈山的重担要彭老总来挑。

在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上，彭老总总是呕心沥血，排除万难，千方百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宁冈不久，湘赣两省军阀即纠集十八个团的反动军队，向井冈山地区"会剿"。根据当时的严重情势，毛主席作出了英明正确的战略决策，决定以红五军少数兵力（约一个团），留守井冈山，吸引两省"会剿"敌军，掩护红四军挥师赣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显而易见，红五军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险的。当时红五军军委会内部，多数同志不同意担当此任，主张迅速北返，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在这重大的战略

抉择面前，彭老总为了革命的大局，力排众议，说服大家，毅然挑起毛主席交给的千斤重担。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刚刚三天，四面八方的敌军即以泰山压顶之势向井冈山疯狂地合围攻击。经三昼夜激战，在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被迫突围。经辗转苦战，彭老总所部仅剩三百余人。但是，仍然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四军在赣南地区的胜利发展。几十年间，彭老总都是这样以实际行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还记得，在江西苏区一次反"围剿"战斗中，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妄图将我团困绝地而聚歼。从地图上看来，我军的确濒临绝境，难以突围了。但是，彭老总亲自察看前沿地形，终于发现一条险要路径。他立即指挥部队，由此轻装疾进，钻出重围，然后，在敌军侧背，予以猛击，重创敌军。他的指挥所也十分靠前，以至我们这些他的下级指挥人员不断向他提出"抗议"："你的位置这么靠前，让我们的指挥所扎到哪里去?!"

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彭老总历来无私无畏，旗帜鲜明，敢于向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左"倾教条主义者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前线，命令彭老总按照王明路线"不丢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作战方针进行广昌保卫战。彭老总遵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当面之敌有十一个师之众，又采取堡垒战术，步步为营，节节进逼，我军寡不敌众，绝无取胜可能，他断然表示，决不能死守一地，被动挨打。后来，在他们以中央名义强令之下，不得不打，终致严重损失。事过之后，彭老总不顾他们显赫权势，坚持斗争，向他们提出尖锐的批评。彭老总还用"崽卖爷田心不痛"这句湖南土话，愤怒斥责他们说：中央苏区将会被你们断送！随后，在

广昌与石城之间，彭老总指挥了高虎瑙战斗。由于采取了巧妙的防御部署，此战出奇制胜。“左”倾教条主义者就借此机会要彭老总撰文，用以证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战术的正确。彭老总坚持实事求是，不讲违心之言，更不投其所好，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他那卓越的胆识，凛然的正气，使一切奸邪之徒闻之胆战，望而生畏！

彭老总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而又不固执错误意见。每当他与别人发生争执时，总愿意听听对方不同的见解；而一旦认识到自己的意见错误时，又总是十分乐意地加以改正，并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改正错误的决心。一九三〇年第二次打长沙后，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军阀混战暂时停止，蒋介石集结重兵，准备向我中央苏区实行“围剿”，决定我军向赣江以东收缩，集中兵力，粉碎敌人“围剿”。彭老总未能看清这一形势，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仍然主张向赣江以西发展。毛主席向他解释，他一时不通。毛主席又请长江局代表对他进行说服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彭老总根据井冈山时期斗争的经验，认为在陕北地区也要在巩固中求发展。毛主席根据当时新的形势，否定了他的意见，提出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思想。经过毛主席说服帮助，彭老总认识了毛主席战略思想的远见卓识，愉快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彭老总亲自担任了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毛主席兼任政委），东渡黄河，以席卷之势，横扫晋西，晋南广大地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彭老总生活是极其艰苦朴素的。他自红军时代起，就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莫忘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人民的血汗。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不要忘本，不要忘记人民，不要铺张浪费，不要追

求生活享受。他自己身体力行，不愧为艰苦朴素的模范。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他与部队同甘共苦，从来不搞特殊化。一九三〇年，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感到和普通战士一样：头戴旧的红军帽，身穿灰色红军服，脚上穿的是麻草鞋。他吃的也和战士一样。那时，由于敌人的封锁，非常缺盐，他就和战士“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供给部规定每月另外津贴他一点生活费，他坚决不要。

彭老总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平江起义的鲜艳红旗，黄洋界上的隆隆炮声，长征路上的险恶鏖战，太行山上的抗日烽火，保卫延安的日日夜夜，朝鲜战场的胜利反击，建设国防的辛勤工作，记录了彭老总毕生奋斗的伟大功勋，刻划了彭老总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崇高形象！我们要学习彭德怀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摘自《人民日报》《丹心昭日月　刚正垂千秋
——悼念我党我国和我军杰出领导人彭德怀同志》）

留守井冈山

姚　喆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红五军在彭德怀军长领导下，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

当时，湘赣两省军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已经彻底失败了，他们正在调兵遣将，准备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会剿。"根据党的"白露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带着红四军下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五军留守井冈山。

井冈山很险峻，方圆数百里，只有五条羊肠小道可以上下。我们八大队奉命守白泥湖路口，每天上午出操，做工事，下午背粮食，晚上每人还要削十个做障碍的竹钉。纵队司令贺国中同志每天都同我们一起筑工事。他是黄埔军校高级班的学生，懂得筑城学，一面做工事，一面对我们讲筑城常识。

那时，我们构筑阵地都是就地取材。没有铁丝网、地雷，就砍些有刺的树枝堆在阵地前沿，再钉上几排尖尖的短竹钉，构成阵地前沿的障碍。南方军阀队伍都是穿草鞋，踩到树刺和竹钉上就要大吃苦头。

山上很冷，我们没有棉衣棉被，穿些单衣，赤脚穿草鞋。晚上睡觉，铺间烧一堆火，身上盖些稻草，有的同志用夹被装上稻草，就要算是最漂亮的被子了。

一月中旬，各级反革命军队都聚集在井冈山下：江西九个团，湖南九个团，广东三个团，共计二十一个团的兵力，把井冈山的各个路口层层封锁起来。一月十七日，双方打起来了，打

了七天七夜未分胜负。

这七昼夜，我们八大队一直守在工事里，由于雾大，五十公尺以外看不见人，这对我们的防守更为不利，可是敌人也不敢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只是每天都有几次迫击炮、山炮和重机枪的火力战。敌人有时还在夜里派遣小部队上来偷袭，但每次都被我们打了下去，伤亡不少。一天夜里，敌人大约有一个班偷偷地摸上来了，我们早就埋伏在鹿砦下等着，敌人爬到鹿砦边上，我们用机枪一扫，接连倒下三、四个，以后敌人就很少来了。

有趣的是，双方停火时，我们就同敌人互相喊话。我们问："你们是哪里人哪？""我们是为工农大众革命的呀，你们为什么来打我们哪？"接着我们就宣传："红军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你们过来吧！"一对敌人进行政治宣传，敌人就开火，有时互相喊话中对骂起来，骂火了也要打一顿。

这几天生活十分艰苦，饭菜是十五里路以外的后方送来的，送到时早就冰冷。整整四天四夜没有送过开水。渴了，我们自己用缸子装上雪，在堑壕里烧开喝。最难过的是夜晚，那时是隆冬天气，每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四五寸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夜晚又特别冷，大家弄些稻草铺在泥水上睡。可是睡不到一会，上面盖的给雨雪打湿了，下面垫的给泥水浸透了，上下冰冷，实在难受。许多同志恼火，恨不得冲下山去和敌人拚一场。这七昼夜，大大地锻炼了我们这支红军的坚韧战斗的精神。

二十四日中午传来消息，一大队守的黄洋界被敌人抄到后面攻去了，四大队守的八面山的工事被敌人的炮火轰坍了，阵地也被敌人占领了。这时，我们已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坚守下去，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领导上决定撤出井冈山。

五条能出去的路都被敌人封锁了，我们只能从旁边的悬崖下山，人人都是弯着腰，抓住小树和竹子，慢慢地往下走，在树林乱石中走了一天，才下了二十多里。傍晚，在一条河边宿

营，没有房子，没有帐篷，大家找些枯枝烧起一堆篝火，围坐着，火光中闪着一簇簇人影，给这黑暗的山谷凭空添了许多生气。雨阵阵地下着，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坐在火边，大家感到又累又饿。有几个同志带了生牛肉，在火上烧着吃。但是外边烧熟了，中间没有烂，嚼不动，等中间烧熟时，外边又烧焦了，不能吃。我饿得不行，用缸子在河里舀了一些水，放上一把红米煮饭，结果真给煮熟了，吃起来特别香甜。许多有缸子的同志也跟着煮开了。我的缸子，这个拿去煮完了那个又煮，煮了一夜还没有回来。这种雨夜露宿生活虽苦，但回忆起来真有不少的乐趣。

天亮以后，队伍没有吃饭，在河边待命出发。晨雾中，彭军长向部队作了简短的指示。他号召大家：忍受艰苦，听从指挥，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突破敌人的重围。他说："只要我们英勇战斗，一定能突破敌人的封锁，一定能开辟广大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声音宏亮有力，战士们情绪振奋。军长讲完话，部队就满怀信心地出发了。

第二天冒着雨雪，继续爬了几十里的山，才走上了一条小路。第三天一早又向南走，根据侦察的情况判断，这天一定要进行突围战，成功失败，在此一战。一路上指挥员论议纷纷，一致表示要勇猛突围。我们原是向黄坳，后来听说黄坳有敌人两个团，又转回来向大汾挺进。离大汾不远，敌人一个团散开一条线，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立即开展战斗队形。枪一响，只听得杀声动地，红军勇士一个个飞奔前进，冒着弹雨，猛打猛冲。敌人挡不住，闪开了一个缺口，红军的铁流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从此，"红军要龙头，白军要龙尾"，一连要了四十多天，转战几千里，消灭了敌人许多地主武装和正规军队，夺取了几座县城，五月间又在江西瑞金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了。

二十里竹钉防线

孙　鹤

一九二八年年底，彭德怀同志带着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牵制敌人。敌人调来了二十一个团的兵力，重重包围了井冈山。彭军长派五纵队长李灿和三十二团一连连长徐彦刚，带着二百多人扼守黄洋界岭。

留在井冈山的红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凑起来只有五、六百人，三百多支枪，有的枪还打不响，一支枪只有十几发子弹。这样，想守住这座大山，牵制着敌人，当然很困难。但是，一定要守住大山，因此，我们按着命令赶修各种工事。

那天，落着鹅毛大雪，把山野盖满了。我跟着李纵队长，到山头上巡视。正走着，只听到从山坡那边传过话来。

“你还有几颗子弹？”一个湖南郴县口音的人在问另一个人。

“只有十颗了。”一个尖嗓子的人回答。

“我们子弹这样少，就凭工事能消灭进攻的敌人吗？”

“子弹少，我们有办法呀！贺老总①两把菜刀闹革命，也打出半个天下来呢！”

“你有什么办法？”郴县人又追问。

这一句话把尖嗓子的人问住了，他一时没有回答，一见李纵队长走过去，象来了救兵似的，一把拉住纵队长说：“纵队长，我们枪弹少，用什么办法守住山？”

---

①、贺老总，红军战士对贺龙同志的爱称。

李纵队长跳进工事，眉毛向上一扬，笑着说："当然有办法，不过办法不会从天上落，地下生，要靠同志们动脑筋想。"

郴县口音的战士说："这就难想啊！"

尖嗓子战士搔着头，象煞有介事地在想。突然，他笑起来说道："队长，我想出一个办法，如果我们有电丝网，把井冈山包围起来，敌人来攻，我们在工事里不用开枪，叫他们一个个触电死！"郴县口音的战士哈哈笑起来："电网？我们现在连一根铁丝都没有，哪来的电网！你想的这个办法真象吃糖包子，不怕烫嘴！"纵队长忙说："不要笑，这也是一个办法。只要大家肯想，没有电网，总有别的办法能行。"说着，他拿过铁铲，帮他们挖了一阵土，就又往南走去。

北风卷着雪花越下越紧，我跟着纵队长冒着风雪吃力地往南山爬着，不多会，身上，头上便落满了雪花，一路上我听见纵队长嘴里喃喃念着："子弹少，电丝网。"没走出多远，忽然纵队长"哎哟！"叫了一声，他连忙抬起脚一看，脚板上的血直往下滴，血透过脚上的草鞋，把雪染红了。他扒开雪一看，竹钉子雪盖着，没看见，竹刺一下穿进了他的脚板心。他忍着痛再往南走，见一片茂密的竹林，从黄洋界岭向南延伸好远好远。他兴奋得叫起来："有电网了，有电网了！"他三步并两步，赶回队里，立即召集了班以上干部会，提出了用竹钉子代替电网的办法让大家讨论。徐连长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李纵队长说："井冈山这么大，方圆几百里，用竹钉子能挡住哪一条路？"

"积少成多，滴水成河，几百个人天天削，天天钉，还怕不行！咱们试试看。"

干部们你一句我一句，大多数都同意了这个办法，并研究了竹钉子的长短和钉法。这个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地飞进了战士们的耳朵里。大家拿着削刀、马刀，借了老百姓的

柴刀、斧头，今天削二百个竹钉子，明天削三百，大大超过了上级规定的数字。

一天，战士们正在山腰高兴地唱着歌，钉着竹钉子，突然，彭德怀军长来了。他看见战士们正在山上钉着竹钉子，立刻明白了这个意思，向李纵队长说："想得好，真是发挥了我们工农兵的智慧。好，你们钉吧！"第二天白泥湖八面山的部队也在钉竹钉子了。这样，在我们阵地前沿，都密密麻麻钉满了竹钉子。在井冈山的山腰，就又加添了一道两里路宽，二十多里路长的竹钉子防线。

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了，湖南吴尚带了两个师，向我们黄洋界、八面山进攻。红军战士坐在工事里，眼看敌人在茫茫风雪里喊着，吹着号，气势汹汹地向山上爬，只是不理睬。只见他们越爬越慢，爬到半山腰就不喊了。原来他们碰上了我们的"电网"——竹钉子，有的脚穿破了，有的袜子挂破了。我们在工事里暗暗好笑。这时，前面的敌人想退，一个敌人军官举着枪，大声叫喊："后退的就地枪毙！"白军士兵只得继续向山上爬，一边爬，一边咒骂："哎哟！他妈的，这还顾得打枪？"他们爬到离我们只有几百步的竹钉中心地段，我们李纵队长瞄准前面的几个敌人，打了几枪，紧接着我们也向他们打了个排枪，前面的十几个敌人倒下了。这时，敌人跑也不行，爬也不行，刚站起身又倒下了，哭的哭，喊的喊，哗啦啦地滚下山去了。我们越打越高兴，越打越来劲，跳出工事去捡敌人的武器。看见敌人有的被钉子穿破肚子，有的给戳瞎了眼睛，有的还给打得半死不活钉在竹钉上直喊救命哩！

敌人进攻八面山，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国民党妄想把我们红军消灭在井冈山上，可是，他们头一仗就碰了钉子，这是真正名符其实的"钉子"，不是铁钉子，而是我们红军创造的竹钉子。

向赣南、闽西进军

张 际 春

进军之前

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行动，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开始的。

记得行动以前，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干部中初步传达过党的第六次大会的方针，他着重说明了现时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反动统治三大敌人的任务及其具体政策，还说明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打破敌人对于井冈山地区的包围封锁，红军除坚持在井冈山打击敌人的进攻外，还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在更广大的地区内展开游击战争，来调动敌人和粉碎敌人。他还亲自起草了红军第四军进军宣言和有名的四言体布告。宣言和布告中，通俗地解说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当前任务、政策，号召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地主、官僚买办的统治，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斗争。为了使留在井冈山的部队和后方人员得到必要的物资准备，全军干部和士兵还积极地参加了运送粮食至大小五井后方的工作。……

大庾城战斗

进军部队在井冈山茨坪和东南麓的小行州等地集结之后，

经大汾、左安等地出动。部队经营前、杰坝、铅厂之线，迅速进占了大庾县城，在大庾城附近展开了群众工作。

在大庾城待了大约不到一周的时间，江西敌军李文彬二十一旅从遂川方向向大庾城进犯了。我军依据大庾城东北高地迎击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给了敌人以迎头痛击。战斗到傍晚，我军主动撤出了战斗，向城东南上下杨梅和梅岭关东北地区移动。在这次战斗中我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负重伤，独立营营长张谓同志，二十八团特务连连长郑特同志等英勇牺牲。

第二日我军进到鸟迳、大塘铺一带。在前进中我三十一团一部与侧翼来敌发生了战斗，第三营营长周访同志牺牲。

部队在大塘铺集结休息，抬着何挺颖同志的担架也随队伍到达了。这时已经天黑，我和二十八团党委的几个同志走进一间屋子，在烛光底下看了何挺颖同志。他负伤后一直是躺在担架上的。我们看了他的伤口，扶他坐起来，给他喝了开水，还略略谈了几句话，他当时精神尚好，很清醒。不久，军部副官处通知伙食担子和担架集合，先行出发，但是第二天天亮以后，跑回来的炊事员同志传出了不幸的消息：他们昨晚走错了路，遭到敌人的袭击，何挺颖同志就这样牺牲了。何挺颖同志原是三十一团党代表，陕南人，上海大学学生，是个优秀的党员。他是在部队行动之前从宁冈县城调来二十八团的。他来二十八团以后，积极开展整顿党组织的工作和对居民群众的宣传工作。大庾战斗快要发起的时候，他一面按着手枪，一面对团党委的同志说："马上要打仗了，对今天的敌人要切实地揍它一下！团党委的同志可随军部行动。"讲毕他就立刻出发了。何挺颖同志那种勇敢、刚毅、生气勃勃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大塘铺附近当地党的地下支部同志当晚探报：敌人已离我军不远，正准备明日拂晓向我军进攻。我军遂于拂晓前继续东进，但是走不多远就天亮了，尾随之敌仍然与我后卫部队接

触。由于我军是在一道狭长的山谷中前进，利用了有利地形，节节掩护前进，迅速地击退了敌人。

进入“三南”地区

此后我军进入了“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地区，几乎每日行程都是八十里、九十里甚至百里以上。当部队进到鹤子圩地区时，由于反动派造谣宣传和红军在那里的影响比较小，群众大部分都逃避到山上去了，但是我军即使在这样紧急行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治纪律，还是取得了群众的同情。这点在后来我们从俘虏的谈话中，得到了证明。他们说：“我们每天和你们距离刚刚相差一天的行程，你们昨天的宿营地，就是我们今天的宿营地，累得我们腰酸腿痛，很多人掉队；你们如果不停下来，我们是永远也赶不上的。”当我们问到沿途群众的情况时，他们说：“老百姓大部份都逃了，只有几个老弱在家，老百姓说：‘红军与你们不同，他们走时，住房、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借了的东西送还，不打人骂人……。’”

在吉潭

有一天我军进到了吉潭、项山，并在那里宿营。估计尾追我们的赣省敌军刘士毅旅可能在第二天早上赶到，便及早作了些准备，大队宿营时，将一部分部队安排在山上，一部分在山脚，以应付敌情。天亮以前，我们大部队都已吃完早饭，待令行动。敌人果然来得很快，天还没有大亮哨兵线上就打响了。军部直属队一部曾经处在敌人的包围中，但大家都知道刘士毅，这是我军的老对手，在遂川城早已吃过我们的败仗，心里

有个数、所以利用将明要明的蒙胧时分，从容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只有很少几个同志被敌人隔绝，失去联络，后来他们同附近寻邬、安远县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游击战争。

在闽赣边境行动

我军离开吉潭、项山以后，进到了罗嶂山地，在这里休息了一天。为了更便于行动和打击敌人，领导上在这里曾计划改编部队，并决定了把部队改编为三个纵队的方案，把原二十八团主力改编为第二纵队，把原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但是实际动手改编是在后来进占福建长汀城以后才实现。

部队离开罗嶂以后向福建武平和江西会昌边境山地前进。这时天气忽然转冷，雨雪交加，有些路旁的枯草上，挂着一根一根的半透明的圆形冰柱，风吹着一摇一摆，有的被行人撞落流动着。在行动中，有的同志冻破了脚，行动不免有些困难，但都支撑过去了。

走出了山地，进到武平县东流后，又折向江西会昌、瑞金境内行动，经武阳到达瑞金城北约二十里的黄柏圩、隘前一带宿营。当天正是夏历十二月三十日大年节。

大柏地战斗的胜利

因为我军在吉潭、项山避开了战斗，敌军刘士毅部以为我们怕了它，便洋洋得意地在我们的屁股后面紧跟上来，我军决定再给它一个严重教训，就在大柏地蹲下来了，我军利用大柏地以南的有利地形，等待着敌人。就在大年初一那天上午，战斗打响了，我军一面从正面迎击敌人，一面派出部队绕到敌人

侧背，包围敌人，激战竟日，把敌人打垮了。这次战斗，我军打死打伤敌人不少，俘虏了敌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八百余人，缴获不少武器。大柏地战斗是这次进军中最大的胜利。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二十八团第二营党代表胡世俭同志、第三营第十二连党代表彭葵同志等光荣牺牲。

与红军二、四团会师

大柏地战斗以后，我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当地驻军地主武装赖士璜部不战而逃。我军在宁都县城仅驻了一晚，第二天经黄陂向吉安县属之东固前进，在这里红四军与江西第二、第四独立团会师了。

在东固休息了好几天，红四军和江西二、四团举行过联欢会，毛泽东同志并在会师后的干部会上，对党的第六次大会方针和目前形势、任务又作了详细报告，给了全军很大的鼓午。当我军在东固地区与江西红军二、四团会师之际，江西敌军李文彬之二十一旅本来已经于我军离开宁都城的当天就进入了宁都县城。这个敌人一向是很骄傲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同伴刘士毅部被我击败，而我军又与江西红二、四团会师，增加了它戒慎恐惧的心理，所以缓慢了它的行动，好几天才逼近东固。我军曾经计议会合红二、四团在东固附近打击这个敌人，但是考虑到我军休息不够，弹药不足，而江西红二，四团又还缺乏同敌人主力作战的经验，无全胜把握，乃暂时放过了它。

进军长汀

几天以后，红四军经荇田、东韶、广昌县城向南折回瑞金县北之壬田市，东向福建边境前进。我军进入福建地区以后，

在长汀县附近迅速地消灭了盘踞闽西的土著军阀混成旅郭凤鸣部，郭凤鸣本人在战斗中被击毙，我军进占长汀县城。部队在长汀城附近展开了群众工作，没收了地主粮食物质，分发给当地贫苦群众，还向长汀城大中商人筹集了一部分军费。在长汀城缝制了灰色夏服，红四军第一次统一地发给了全体官兵每人两套新军装，一顶缀有红色五星的新军帽，一双新绑腿。三个纵队也在这里正式改编成立了。

值得特别提起的一点是，党在长汀城除了再一次开会传达讨论党的第六次大会方针外，还利用长汀印刷条件，翻印了数千份党的第六次大会的文件（政治决议、苏维埃政权组织决议、土地问题决议），并分发给全军每一个党的支部委员和小组长保存一份，以便随时抽出转发给地方党组织。记得当时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情曾经作过这样的指示，他说由于严重的斗争环境，地方的党组织往往中断了同中央或省委的交通联络，中央的决议、指示很不容易到达他们手上，我们武装部队中的党组织就必须负担替中央散发决议指示的责任，我们走到那里，就应该把党中央的决议、指示带到那里。他同时还讲到红军战斗队和工作队两方面的作用。

部队在和汀城附近工作和休息了大约二十天左右，立即转回江西行动，用当时蒋桂战争开始爆发的有利形势，在赣南广大地区展开了发动群众工作。

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进军，到长汀战斗为止，转战赣粤闽三省边境，走路几千里，大小仗打了数十次。以大柏地战斗和长汀城战斗为标志，它的胜利为尔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展开创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胜利，树立了先声。

（原载《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

“龙头”和“龙尾”

姚　喆

一九二九年一月，敌人从湘、粤、赣三省调集了十八个团的反动军队，对我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敌人企图以其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我们当时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一举围歼在井冈山上。但是敌人这企图失败了，我红五军在给敌人以严重杀伤之后，即突破了白军的重重包围，从井冈山杀出来。

敌人“围剿”井冈山扑空失败之后，又纠集了江西、广东两省的反动军队，仗路把关，穷追不舍，想在运动中消灭我们这支仅有数百人的年轻的革命武装。当时，我红五军一方面要拖住敌人，以便策应红四军东进闽赣边的战略行动，一方面又要尽力避免与优势的敌人打硬仗，以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于是，我们在彭德怀军长的率领下，以机动灵活的游击姿态，和敌人周旋了四十多天。敌人不但未能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拖得疲于奔命，甚至有时遭到我们严重的打击。

旧历年除夕那天，我们向大庾、南康之间的新城镇进发。大清早，我们刚出发不久，就发现敌人盯在我们后尾追过来，恰恰当时天又下雪，山陡路滑，山道两旁的翠竹被雪压得弯下来，有的拦住了路，必须用刺刀砍断才能通行。我们艰难地爬过了几座大山，还是不能摆脱尾追的敌人。敌人渐渐追得近了，背后枪声频频地响着。当时，我就想，这一仗是非打不行了。

可是敌众我寡，我们当时弹药又少，如果停下仓促迎战，那对我们肯定是不利的。但敌人追的这样紧，不打怎能行吗？正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后面枪声大作，震动山谷，正不知是哪一个部队和敌人干上了，岂料响过一阵之后便嘎然停住了，就是连敌人的枪声也没有了，原来这是上级看透了这个敌人虽然追得很紧，但其实它是胆怯的，便抓住它这一弱点，想出了一条吓唬敌人的妙计——弄些爆竹丢在煤油筒里放起来，一时满山轰鸣，宛如枪炮齐响，敌人竟真的被吓住了，没有敢继续追上来。

下午，我们下了山，天也晴了，前面不远就是新城镇，军的领导上查明该镇并没有驻敌军，乃决定到该镇去过年。

当时，我们天天都是紧张的战斗和行军，莫说休息，就是热饭也没能吃上几顿，所以同志们一听说驻大镇市过年，个个精神倍增，兴高彩烈，一边走着，一边就进行了“过年”的分工。有的负责搞鱼，有的负责搞肉，我那时是八大队的四班长，分工去搞酒。大家都劲头十足，准备欢欢乐乐地过个好年。

这新城是南康西南的一座大镇市，我们赶到该镇时，天已黑了，只见家家户户都正在烧香接祖宗。我安排全班宿了营以后，便闯进一户富豪家里。那家富豪全家已经闻风躲藏起来。我点起蜡烛，找到一坛子酒抱回来，其他同志也都分头从土豪家搞来了鱼、肉和别的年菜。我们肥吃饱喝地过了一个好年。这天夜里，部队连夜在镇上打土豪，筹了一些款，每人发了五十枚铜元，这是我们红五军从湘鄂赣南下三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发零用钱。

部队闹腾了半夜，才搭铺睡觉。我刚刚合眼，传令兵就来通知出发。我赶忙爬起来，叫班里同志们把晚上的剩饭每人装了一缸子，边走边吃前去集合。这时看天上星位，也不过是深夜三点钟，正是“爆竹一声辞旧岁”的时候，四周到处是密密

麻麻的鞭炮声，一片太平景象，不象有战斗情况。正在犹疑间，忽听得在噼啪噼啪的鞭炮声中，夹杂着清脆的叭咕、叭咕的步枪声，果真是敌人来了，部队赶紧熄灭马灯，立即开拔。

当敌人赶到时，我们已经出了镇子。敌人只好在后面紧追不舍，枪声、呐喊声、军号声不时地从我们后面传来，非常热闹。我们只是不睬，一口气走了三十多里，爬上一座大山，敌人终于被我们甩开了。

我们在山上休息了一会，等走在后面的同志。这时天已亮了，向山下一望，好家伙！敌人正在集合呢！原来是广东军阀范石生的部队“会剿”井冈山扑了个空，又返回来追击我们。于是，我们不等敌人展开，拉着队伍又走。

这一带尽是大山，我们翻山越岭不停地走着，一直走到下午两点多钟，距九都圩尚有十余里，大家又饿又累，部队乃停下在山上休息，派人下山搞饭吃。我和五班副郭荣魁同志及一个传令兵一块到山脚下的村子里买饭吃，传令兵怕大队部有事找不到他，赶着吃完饭要先回山。他刚一出门就又缩回来，对着我们直打手势，我们俩一看他那副紧张的样子，马上把饭碗一放，抓起枪就跑出来，一看敌人已经进村了。我们急忙拐出村子撒腿朝山上跑，敌人在背后一个劲地叫喊：“捉活的！捉活的！”我们很快就爬上了山。

我们八大队和九大队奉命就地抗击，掩护部队撤退。敌人越来越多，在山下聚集了一两千人，可是由于我们在山上，地势很有利，敌人不敢上来，只是拚命地朝山上吊迫击炮。我们坚持到天黑，才撤离山头，转移到九都圩。

我们到达九都圩时，先到的部队已经吃完了饭，正在休息。一天走了一百多里山路，又没有吃饱，确实很累，我们赶紧吃了饭，正准备休息，忽然外面有人在急促地喊起来：“集合！集合！”我们当即跑到集合场，队伍早已集合了。党代表

在队前讲话，他说刚才捉到敌人的通信兵，缴获了敌人营长给他们团长的报告，内言他们一个营已经在前面埋伏好了，只等他们团长率大队把我们挤进“袋口”，就可以前后夹攻，把我们一举消灭。因此，我们应立刻转移。

在黑暗中，部队又出发了。为了避开敌人的伏击，我们来了急行军，连夜又走了九十多里，抄小路绕到敌人的背后。就这样，我们在一天一夜之间，打了一仗，急行军二百里，当天亮宿营时同志们累得几乎走不动了，但是由于我们终于胜利地摆脱了敌人，大家在精神上还是很兴奋的。

初二又从安息圩出发，我们班担任尖兵，抓了敌人分公所的一个司书带路。那家伙身穿长袍，看去一副斯文样子，可是心却狠毒，把我们向敌人大部队那里带。幸而我们在吃午饭时，又遇到一个湘剧艺人，才把真实情况弄清楚。原来前面正有大队敌军埋伏在山路两边等着我们。我们险些上了那个司书的当。军部当即将那个司书枪毙了，请湘剧艺人带我们绕过了敌人的埋伏地带。我们又脱了一次险。

进入寻邬县境时，已经是正月初四了。部队连日兼程行军，很少休息。战士们疲惫不堪，休息时连歌子也唱不起来。这天我们担任后卫，看到彭军长背着一个皮包和一只装满军用地图的伞袋，跟在队伍里和我们一道行军，走得挺有劲。休息时他和我们坐在一起，一面擦汗，一面提高嗓音问我们：“怎么样？苦不苦哇？”我们说：“苦是苦哇，没得法子呀，要革命就要吃点苦罗！”他抬头开玩笑地说：“对啦，革命就是苦差事。我过去在军阀那里当团长，不是骑马就是坐轿，现在当军长，跟你们一样走路啦！”说完，大家都哈哈笑了。同志们心里都知道，军长比我们更辛苦，他同我们一块行军，一块作战，一块挨冻受饿，还要研究情况，指挥部队，做政治工作，多操许多心，只有一样比我们少，那是比我们少睡觉、少休

息。这天彭军长一直和我们走在一起，在休息开会时，军长拿个碗在我们班里吃饭。当时虽然只有一点青芥菜，大家却吃得特别甜。

这一天，我们走路并不比以往少，而且路上还同地主豢养的挨户团和红枪会打了几仗，可是大家却个个情绪饱满，精神抖擞，以前那种垂头丧气的疲劳现象已经一扫而光了。

第二天，我们又遭到江西之敌第九军的追击。我们在转移途中遇到寻邬的一条河，河水很深，不能徒涉，河边只有一只小船，每次最多只能渡一个排，在短时间内，我们全部渡过去是很困难的。而敌人的追兵已经迫近了，情况万分紧急。这时纵队司令贺国中同志想了个办法：在船的两头拴几条绳子，渡河时两边用人拉，加快了速度。当敌人赶到河边时，我们最后一船刚刚渡完。

从井冈山下来以后，我们就这样紧张而艰苦地行军战斗了四十多天。在这四十多天内，通常情况是我们在头里走，敌人在后边追，当眼看敌人将要追到时，我们一摆头又把敌人甩开，敌人只能跟在我们后尾转来转去，可就没法奈何我们，所以我们当时把这种形势叫做："红军耍龙头，白军耍龙尾。"

当然，我们在这种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这"红军耍龙头，白军耍龙尾"的四十多天内，我们部队减员三分之二，最后全军只有二百四十多人，一百六十支枪了。但是，我们仍然经常伺机主动出击，积极地打击敌人。雩都一战，我们以奇袭致胜，一下子就歼敌人正规部队一个整营。

当时，我们事先侦察到敌人在雩都驻有一个营的正规军，乃急行军一百四十里，当夜赶到雩都城下，架起梯子悄悄地爬上城墙。当城门的敌人哨兵发觉时，他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们马上叫他带路去包围了敌人的营房，敌人还在呼呼大睡呢！当即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到三个小时，敌人一个营就缴

了械。

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解决了我们很大的困难。战斗以后，地方党组织又为我们补充了一些新战士，我们的力量又壮大了，接着又挥戈南下，打到了安远。

三月，正是万紫千红的春天，我们红五军到达了瑞金，和红四军再次会师了。

和红四军会师后，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我们没有休息，就开始了练兵。一天，我们在瑞金南门外田野中进行对抗演习，为了使演习带一点实战的气氛，我们以爆竹代替枪声，“战斗”非常“激烈”。朱军长从头看到尾，演习结束时，纵队首长贺国中同志请朱军长讲评。朱军长穿着一身灰色的旧军服，扎着绑带，神采奕奕地站在队前，看样子，他对我们的演习比较满意。他脸上浮着和蔼的笑容，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行了几个月的军，打了几个月的仗，很辛苦。现在有一点时间，就抓紧练兵，这种精神很好。只要我们有这样的精神，就不怕被反动派打垮！不愁革命不胜利！”他又说：“敌人用了很大的兵力，企图消灭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一样的打土豪，一样的扩大苏区，一样的发展红军，被消灭的不是我们，而恰恰是跟在后面追剿我们的敌人自己。我们只要吃苦耐劳，抓住敌人的弱点，开展游击战争，我们就一定能壮大自己，打败敌人。”

朱军长的话，使我马上联想到我们刚刚过去的那段“我们耍龙头，敌人耍龙尾”的日子，越发感到他的话句句都讲到我们的心里。当时我们都感到异常的兴奋，忘记了一切的辛苦与疲劳。

回忆井冈山

宋新怀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为着建设革命武装，坚持革命阵地，便在一九二七年冬天，率领工农红军，进到了井冈山。井冈山屹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间，南北山麓相距九十里，东西百八十里，四周长五百五十里。入山的道路只有五条，每条都必须经过一、二十里高山急流的险路。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为着统一军中党与地方党的领导，组织了前敌委员会，以党中央代表毛泽东同志兼前委书记；又在湘赣边境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井冈山特别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任特委书记。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一九二八年二月，井冈山附近的宁冈、永新、莲花、茶陵、万安、酃县等县，都有了党的组织，领导当地人民重新组织地方革命武装，如赤卫队，工农暴动队，少年先锋队等。这些地方武装在推翻当地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人民政权，镇压反革命，协助红军作战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时开始实行土地革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各级党的组织也发展得很快。这一切成就，都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坚决与敌人斗争，反对盲目的冒进政策而获得的。

一九二八年春天，朱德同志率领原在南昌起义后又转战福建、广东、并发动湘南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合，成立了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

党代表。红四军下面主要辖有四个团。当时的番号是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还有各县的独立团与工作人员等，人数共约四五千。二十八团是朱德同志原有的部队，战斗力强；二十九团是湘南农民起义的队伍，来井冈山没有多久；三十一团是由原来武昌警卫团与平（江）浏（阳）的农民武装起义整编的；三十二团是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由六十条破枪所组成。同志们穿的衣服，形形色色，什么都有，从国民党匪军中俘虏或投诚过来的士兵，就穿着国民党匪军的服装，原是工人，农民或学生，就照常穿着他们原有的服装。冬天来了，没有棉服，有时虽然有了棉花，又没有布，问题依然存在。士兵们常常因天气寒冷，不能安睡，于是就改为白天睡觉，夜晚下操或跑步，来与寒气作斗争，每个士兵除了一条枪，几排子弹，和一支干粮袋以外，其他都没有什么了；干粮袋大半是得自国民党匪军的战利品，有的是群众慰劳的，有的是找到一块布自己缝制的；没有子弹带的，就将子弹和碗筷，手巾一起装在干粮袋内，跑起路来，轻松、快捷；打起仗来，也很灵便。战士都有阶级觉悟，知道是为自己工农作战，所以无论是怎样苦的生活，怎样激烈的战斗，都没有怨言。

士兵们的生活虽然苦，常要受到受冻受饿的威胁，可是作起战来，非常勇敢，听到枪声，准能捉俘虏，这是由于毛泽东战略天才领导的结果，士兵们能善于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军事秘诀。记得是一九二八年，大概是四五月间，国民党军队湖南吴尚的第八军与江西杨池生、杨如轩的两个师作所谓第一次的“湘赣会剿”，吴尚狡猾，明知要吃亏，便按兵不动，却让赣军冒险轻入，结果，在宁冈、永新县交界的七溪岭附近，全部被我们消灭了。那时士兵们编了一副对联“不用红军三分力，消灭江西两只羊”，到处张贴庆贺。

又记得同年八月，当朱德同志率大军去湘南，山上力量单薄的时候，国民党军吴尚部和王均部共四个团，乘机合攻井冈山，当时我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凭山北黄洋界天险，激战一昼夜，将敌击退，敌死亡甚大，所谓第二次湘赣“会剿”又被粉碎了。这次战役，不仅保存了根据地，且使敌人胆寒，从此不敢轻视我军。士兵们仿诸葛亮“空城计”编了一齣京剧叫“毛泽东守空山”，我现在还能仿佛唱出其中的一段：“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耳听得人马闹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湘赣剿共军’。既到山下就该把义起，投降当个光荣的工农红军，我这里井冈山上无别敬，只准备南瓜红米，红米南瓜，慰劳你们起义军。若是迟疑心不定，顷刻之间被包围，我们的枪炮认不得人，一来是性命难得保，二来落得个反动的名，就是死了也不光荣！来、来、来，奉劝大家快把决心下，参加工农革命军，争取全中国的胜利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得到翻身，大伙儿这才走向光明。”就只凭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红军士气的旺盛。

在全国都为反革命势力所统治的时候，井冈山高竖着革命的红旗，而且阵地一天天在推广，人民武装在扩大，这主要的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我记得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就有好几百长沙学生与安源煤矿工人，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上了井冈山。醴陵也有一批革命农民与学生，从醴陵经攸县、萍乡到莲花，走这条路上了井冈山。我还记得有一个安源煤矿工人王志刚同志在醴陵领导农民起义，也带了一批武装上山。不但工、农、学生如此，就是蒋介石的军队，也不断投入工农红军，如当时国民党的第八军第三师就有两三百人投诚，编成一个特务营。我记得还有一个独立营，也是国民党军队中投诚过来的。零星拖枪上山的国民党士兵，更不可胜数。他们有的是头一天投诚，第二天就参加打反动派立功；有的甚至是当天投诚，当

天就立功，俘虏来的也是如此。这证明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投降，是走的一条死路，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才可取得全面的胜利解放。

反革命蒋介石匪帮是死也不愿意承认失败的，他们对井冈山这么一块根据地，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来进攻的，都一次一次的被粉碎了。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我党在宁冈县境步云山一个庙里召开了湘赣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一些经验，布置了新的工作；不久，彭德怀同志所领导的红五军，到宁冈，与红四军会合，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又召开了白露会议，出席的是共产党井冈山特委、红四红五军军委与边界各县党委，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粉碎敌人对湘赣的第三次"会剿"。当即决定：红四军出发到江西、福建一带进行游击战争，扩大革命阵地，与赣东兴国，雩祁苏区，闽西上杭，永定苏区取得联系，后来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红五军负责守山，与共产党井冈山特委共同来摧毁敌人的第三次"会剿"。这年大约是十二月，敌人动员几十个团，大举围攻，来势甚猛，在敌我众寡悬殊之下，彭德怀同志的红五军被迫暂时放弃井冈山，突围上赣东与红四军再次会合，加强了新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因而后来能够打垮蒋介石匪军全国第一次十万兵力的"围剿"，生擒了敌"总指挥"张辉瓒。这次部分没来得撤退的革命武装，在共产党井冈山特委事先周密的布置下，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也保全了一部分实力。红四、五军虽然都离了山，但还有特委领导，集中零散的人民武装，利用敌人的弱点，进行反攻，毕竟将占领井冈山没有几天的反革命军队赶走，逐渐地恢复了革命政权，后又不断地扩大武装，加强组织群众，宁冈、永新、莲花三县革命政权又全部建立起来了。

国民党反动派只是幻想把红军"一网打尽"，将井冈山"夷

为平地”，但事实却与他们的希望相反，第三次反革命“会剿”又失败了。但他们狰狞凶恶的面孔却更为显露，接着就来了一次残酷毒狠的大烧杀；从莲花县境的山里开始，经过永新的小江山、九龙山和宁冈的蔡家甸。井冈山的大小上中下五井，荆竹山，到鄗县的大院止，千多里路的地方，见屋就烧，见人就杀·被屠杀的人真是无法统计。留在井冈山的红军伤病人员及共家属，和山上来不及逃出去的老百姓都遇害了，藏在山洞里的人被敌人发觉了的，就一批批被他们用柴架起来烧死在石岩底下。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是这样凶残地对待人民，但革命的势力是绝对摇撼不动的，革命的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下，继续与国民党匪帮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终于最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在纪念共产党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谨向老苏区的共产党员，革命人民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礼！谨向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致以沉痛的哀悼！

（原载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一日《新湖南报》）

革命故乡——井冈山

李　立

雄伟的井冈山

一、井冈山是长江以南鼎鼎有名的“罗霄山脉”中段，位于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五省的边境，东出福建，南至广东，西到湖南，北至湖北、南昌等地，周围河流环绕，东有赣江，西有湘江，北有长江。正因为它横跨五省居高临下，在这山脉中过去虽然公路很少，但是人行小道是四通八达的，并且当中又分成若干支脉，满布着茂密的森林，也是江南很好的自然风景；尤其在军事上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遂川的硃砂冲，宁冈的黄洋界，八面山等形势非常险要，全境以大井、小井、中井、上井、下井等地为中心，只五个哨口出入其境，并有永新之万源山、武功山、九龙山，茶陵的十八团，酃县的大院等地为其外围基地。在军事上，真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围绕在井冈山周围的广大地区，如江西的赣西南，湖南的湘西南，湖北的鄂南，广东的粤北，在这数十个县的范围内，生长着一千余万人民，有无数的田地和森林，由于山多田多，此地的出产很丰富，以大米为主，其次是木材、竹子和数十种药材如当归、厚朴等等。另外特产如桐油、茶油、茶叶、棉花、豆子、花生、蜂蜜、樟脑、薄荷等。同时蕴藏在罗霄山脉

的矿产，首先是世界著名的钨矿，产量很多质量又好，次则是天河的煤，永新的铁、石炭、石膏和赣江的金矿等。

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地区那样辽阔，形势这样险要，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这种天然的自然经济，给了当地广大人民自给自足的生存条件，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地形上具备了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

可是在长期的反动统治下，被地主阶级的挑拨离间诱惑欺骗，造成了长期时间的宗派斗争，即土籍与客籍之分，所谓土籍就是本地方人，客籍是从广东、福建来此居住的，井冈山的周围客籍人很多，但过去在政治上当权者是土籍人，就是利用这一矛盾缔造势力来欺骗、压迫、剥削、陷害当地人民，以致农民内部闹不团结，而地主阶级坐享其成，更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农民。农民，尤其是客籍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用自己的血汗开垦的田地，以及种植的茶山、竹山、杉木等，等到有了收成或树成林后，便成了地主阶级所“永远管业”，使农民长期的过着挨冷挨饿的生活。

正因为上面这些原因，以致几十年从来没有断过土匪，黄洋界、八面山几个人不敢行动，经常发生拦路劫抢，造成社会不安，人心恐慌，使农村经济走向破产，农民的反抗激增。

二、一九二五、二六年面对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广大人民起来为推翻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由城市扩展到农村，革命的浪潮传播了赣州、萍乡、吉安等地，很快就普及到各县。井冈山周围的遂川、泰和、万安、永新、宁冈、上犹、崇义、以及湖南边界的酃县、茶陵、攸县等县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的工人、农民与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中到处宣传革命，要反帝反封建，因为这正是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拥护。

那时正当毛主席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声势浩大，给了

湘赣边界各县农民最大的鼓舞。

尤其这块地方的广大人民，同样的在政治上、经济上直接受着土豪劣绅与间接的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革命的浪潮更汹涌澎湃，形势日益发展，在政治上给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严重打击，一致提出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工人加入工会”，“农民加入农民协会”，“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号召下，广大的工人、农民，都已卷入了革命的浪潮，大多数县都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毛主席领导下的萍乡工人运动给了井冈山周围各县的工人运动很大推动，在吉安就有一万多工人参加，各县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并且受到了革命的教育，撒下了革命种子，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

毛泽东旗帜插在井冈山上

一、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匪徒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与人民为敌，首先制造了“四·一二”事变，残酷的大量的屠杀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从此大革命失败了。同时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在当时遭受到暂时挫折。

但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继续坚持着大革命英勇奋斗的战旗，为了反击蒋介石卖国贼勾结帝国主义向人民进攻，在湖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并率领着这支农民武装，沿着罗霄山脉进入了井冈山，选择了井冈山为革命的基地。

当时毛主席根据井冈山政治、经济等各种条件以及五省交界的情况，充分利用了敌人内部省与省之间的互相矛盾和军阀混战的时候，在井冈山创立革命的根据地。

为了要充分发动群众，进一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用革命的暴动手段来推翻统治阶级的反动政府，成立了工农政府。为了广大人民的翻身，而进行尖锐的土地革命斗争，从此农民分得了土地等。

二、自从毛主席率领着这支队伍到达井冈山以来，给井冈山周围各县的人民带来了光明，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强有力的打击，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方向。

首先在井冈山上周围各县的人民，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用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的方式前后推翻了反动统治政权，成立了工农政府。广大农民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暴动队，首先在遂川、宁冈、永新、莲花、茶陵、酃县等地建立了县工农政府和红军游击队。

三、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湘南会师了，力量更扩大和加强了，更加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周围的游击战争如火如荼的向着敌人的地区发展，在军事上不断的给了敌人以迎头痛击。

二杨大败七溪岭

自从蒋介石匪徒叛变革命以后，毛主席率领的武装进入罗霄山脉，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的基地，在敌人的心脏里（湘鄂粤等省当中），即反革命的后方，插进了一把刀子，广大人民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组织起了革命的人民武装，反击了敌人对人民的屠杀，使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了武装斗争的道路，给了南京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一个严重的威胁。一九二八年的五月，蒋介石便命令他的匪徒杨池生、杨如轩带着反革命军队二个师，从永新向宁冈的七溪岭进来“围剿”人民武装，但是被剿的不是别人，正是匪徒二杨带来送死的反革命军队。

当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亲自率领队伍埋伏在七溪岭两旁的山顶上，等待着痛击敌人，敌人毫不介意的向七溪岭前进，当着前面的敌人爬上了山峰，气喘不过来，要休息了，忽然从山上不断的打出了机关枪、步枪、手榴弹，敌人一个个倒下去，一下把敌人打的屁滚尿流。"缴枪呀"、"投降呀"、"不杀俘虏"的喊声，吓得敌人心寒胆颤，从七溪岭的最高峰将敌人打垮，一直追到永新城里。除了打死、俘虏投降的以外，一部分被打散逃窜山中的匪军先后被有组织的农民缴枪，彻底消灭了敌人。

这一仗打得好，打败了敌人，拿敌人的枪武装了我们自己，在军事上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使敌人异常恐慌，而人民的情绪非常高涨。革命的根据地首先是永新、宁冈、莲花、酃县、吉安、安福、遂川、茶陵、攸县、萍乡等一部分，从此大大的扩大起来了。广大人民自动的武装起来，推翻了压迫他们的统治阶级政权，以工农政府代替了旧的反动政府。

广大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起来推翻了反动政府以后，立即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分了田，分了山，分了房屋，我们在依靠无产阶级领导着广大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进而巩固了"井冈山的革命基地"，与此同时在井冈山周围和永新的九龙山，万年山，安福的武功山，茶陵的十八田等地，建立了革命的根据地。

红军第四军在大陇成立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朱总司令亲自率领从南昌"八一"起义的军队，经过艰难困苦，粉碎了敌人层层的封锁、拦阻，胜利地到达了井冈山与毛主席的队伍胜利的会师了，这是创建井冈山上革命根据地的不可缺少的力量，经过七溪岭大败二杨后，

我们钢铁般的人民军队不断的在巩固和发展。

毛主席亲自创造的人民军队，如八月桂花从井冈山上送往祖国大地一般。南昌八一起义这支中国的铁流都从各个山谷带来了新的胜利，在井冈山下的宁冈县的大陇集结了，大家很兴奋愉快的来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八一”南昌起义。

大会在歌声号声中宣布开会了。首先毛主席朱总司令讲话，然后为了纪念“南昌八一起义”，并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朱总司令兼军长、毛主席兼党代表。

接着由毛主席宣读他手订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敌伪财产要归公，贪污腐化纪律绝不容。八项注意件件要作到，时时刻刻切莫忘记了。第一进出宣传一定要，革命政策处处都传到。第二公物我们要爱护，不能浪费革命的财富。第三讲话态度和好，不许骂人开口就争吵。第四买卖价钱要公道，按着市价分文不能少。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交还切莫遗失掉。第六若把家具损坏了，按价赔偿一定要办到。第七不搜俘虏的腰包，除了武器不许随便掏。第八清洁卫生要做好，室内室外脏物要打扫。八项注意件件要做到。模范纪律到处都称道。

这一英明的创造，是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保证，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直到现在还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

我们的军队充满了革命的胜利信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胜利是我们的。

红军横渡赣江东征

当着一九二八年的五月，在七溪岭击败二杨以后，给

湘、鄂、赣广大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兴奋与光明前途，农民游击战争如火如荼的在湘、鄂、赣边界上蓬勃发展，直接威胁着南昌、长江等中心城市。

蒋介石和他所豢养的匪徒们坐在南京仓皇不安，故派匪徒何键带十八个团的反动军队，进行湘、鄂、赣三省"会剿"井冈山开始了，当时我们在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指挥下，在广大农民的热情支援下，很快的将井冈山周围的五大关卡——黄洋界、八面山、硃砂冲、双马石、桐木岭筑了强固的工事，筑有险要的壕沟、鹿柴、用竹钉代替了电网，农民组成的暴动队日夜把它坚守起来，这就是农民保田保家的具体表现。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要把我们的红旗插遍祖国的土地上，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朱总司令率领了全军人马在泰和与万安之间的赣江上面，横渡了赣江，东征而去，创造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红色区。

但是井冈山人民坚决配合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坚守井冈山，为保卫井冈山而奋斗。

在一九二九年的一月里，白狗子（指反动派军队）从永新、宁冈、遂川、酃县分四路进攻井冈山，从宁冈来的朝着黄洋界、八面山一带疯狂而来，从遂川来的向硃砂冲夹击，永新的敌人向桐木岭进攻，酃县的敌人向荆竹山打过来，一共是用了一十八个团的兵力，那时红军不到三百人配合农民暴动队守山，枪是土造的，子弹顶多的只有五十发，大小五井周围的防线只有二十里，这算是后方，我们的农民热烈支援自己的队伍，白天蒋匪徒们用他们的大炮把工事打坏，晚上老百姓立即抢修好，并往前线阵地送茶送饭，在腊月的寒天里保证我们的队伍能吃到热茶热饭，往后方送伤兵。在军民的团结下，和当时优势的敌人坚持了七天七夜，使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胜利的渡过了赣江，然后我们的队伍从井冈山安全的转移了新的阵地，即

永新的九龙山一带。

毛泽东旗帜到处飘扬

一九二九年的一月，敌人用了很大的力量进攻井冈山，最后终于失败了，人民的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一九三〇年，井冈山周围的广大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红军的实力一天一天在发展，在壮大。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一直把红旗插到长沙和吉安城。

由于军队发展的结果，我们的地区也扩大了，在井冈山周围，以永新为中心建立了宁冈、莲花、茶陵、攸县、萍乡、吉安、吉水、鄗县、安福、上犹、崇义、遂川、万安、泰和、新余、峡江等十几个县的工农政府。

在这些地区里，帝国主义的势力被驱逐出去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势力被铲除了，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手里夺回了自己的田地，农民曾经有过一段最长的八年，最短的也有一年半载的时间，过着自由幸福的日子。

就在这块土地上，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的拥护下，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保证了红六军团的壮大，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里在任弼时同志的领导下，红六军团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举行了西征和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块地区时留下的部队，在谭余保同志率领下，与当地的广大人民同艰苦，共患难，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封锁之下，我们始终没有被消灭，相反在斗争中日益壮大。谭余保同志亲自率领的部队孤军奋斗，同敌斗争了三年之久，最后粉碎了敌人的围歼。

当着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大江南北进攻时，我军奋勇向前杀

敌，向敌人的后方江浙前进，以致后来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之一。

毛泽东旗帜重插井冈山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当着人民解放战争已获得基本胜利，在举国同庆声中，我人民解放军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回到了人民军队的前身——红军的诞生地。回到了二十年前红旗招展、毛主席、朱总司令亲手创造的根据地——井冈山，将毛泽东旗帜重新插在井冈山上。

进军井冈山的部队，纷纷提出“不消灭土匪不收兵，土匪跑到那里我们追赶消灭它在那里”的口号，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以连续五夜前后扑空十七次的顽强反复搜剿的英勇精神，胜利的捕捉了屠杀人民的屠夫——萧家璧等。

九月二十三日前各进剿部队完成了一切准备步骤，分南北两路从永新、遂川开始向井冈山地区压缩搜剿，南路的部队首先组织了五个突击小组，以两昼夜秘密行军长途奔袭罪恶昭著的萧匪。二十四日拂晓扑空后，连夜又包围石上坑，二十五日晨开始合击，因森林茂密，萧匪发觉后逃脱，自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前后扑空十七次。因天阴雨淋，山上奇寒，部队缺粮，接连吃了三天稀饭，有的甚至只喝喝红薯汤。

二十七日晚得到萧匪藏在湖坑一带的消息，部队立即从十余里外的地方调回，冒着夜黑天，崎岖的山道峻岭悬岩，连夜进发，沿着漫无人迹松林密布的大山上，对湖坑形成了包围，待天亮便从大山上面开始由上而下的严密搜剿，这时萧匪从小房子里逃出，仍图脱网，但被我哨兵枪弹封锁而隐藏草中，后来在一个野草没人的山沟里，我战斗英雄赵文珍同志首先发现这个被群众称为“萧屠夫”、“阎罗王”，“焦面虎”，二十

余年来的杀人魔王萧家璧擒获了。

生擒萧匪后，消息马上传遍了井冈山上的大小山沟，群众扶老携幼纷纷下山回家，大家在烧香感谢人民领袖毛主席，庆贺井冈山人民重获解放。

进军井冈山的部队，受到革命老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与积极支援，他们亲切的询问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近况，控诉着二十年来国民党匪帮的残暴罪行。二十年来，井冈山人民的生活，是一部充满着血和泪的阶级仇恨史。自从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匪帮在这块革命土地上实行了惊人的大屠杀，如今全部人口不及当时的三分之一了，被毁房屋更难统计，周围四十里所有村庄，几乎片瓦不存，整个井冈山区变成一片荒凉，近年来又加上土匪的蹂躏，人民有苦说不出，只得用血和泪捱过这些日子，时刻在盼望着自已的亲人归来，他们永远忘不了子弟兵——红军，忘不了人民救星共产党，他们的恩人毛主席。解放后井冈山人民掀起复仇的怒火，他们致祭于烈士墓前说："我们要替你们报仇！……"他们以最大的热情，积极配合部队剿匪、带路、起枪、烧茶、送饭、送粮、报告匪情、控诉恶霸，吐出二十年来的满腔冤曲，当我们的电影队给当地英勇斗争的人民在解放军鲜红的旗帜下拍照影片时，大家兴奋地说："我们要保持着毛主席的红旗到处飘扬。"

井冈山上的无名英雄

在小井村的北边，一条小路旁边的荒田里，静静地堆着三座无名无姓的荒坟。同志！这是二十一年前有一百多个人民英雄在这里流尽了他们的鲜血哟。

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我们进到小井时，就遇见早年曾经在工农政府中当过土地委员的柳辛林同志。他沉痛地而详细告诉

我们这群英雄的历史——

在一九二九年的一月，国民党匪军象一群疯狗似的进攻了大小五井，到处焚烧抢掠，杀人杀红了眼睛，连八十岁的老婆婆和在襁褓中的小毛毛也都被他们用枪打死或者用刺刀杀死。

那时候红军后方医院就在'中和昌饭店'及后山临时盖的第一所和二所，里面还躺着一百多个在历次战斗中光荣地负了伤的红军战士，因为行动不方便，来不及随大队冲出重围，被国民党匪军逼到村北的田野里，不给吃饭，更不给换药，最后架起机关枪将他们狂扫一阵，这群曾经为人民流血的英雄战士们倒下去了，他们的鲜血把这块土地染得通红。

当着反动派退走后，当地的老百姓悲痛的擦干眼泪，沉痛的把他们掩埋了。到四月间红军的队伍重回井冈山时，红军的党代表邓远廷等同志率领兄弟们给他们修起三座坟基，并亲自在坟前举行了祭礼，愤怒而奋勇地号召勇士们要为先烈复仇，继承他们的事业而斗争。

后来红军北上抗日，井冈山一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下，不准老百姓到此地扫坟，于是周围的野草越长越长，坟上的落叶一天比一天堆得更厚了。

日子过的真象漫长的黑夜啊！这群无名英雄在地下已经沉睡了二十二年，但是他们的事业如含苞的花蕾，今天已在全国开花了。解放军回到这革命的圣地来了，当年的刽子手已经在人民的铁锤下粉身碎骨了，全体同志沉痛地站在这里经过了二十二年风吹雨打的三座烈士冢前，激动的告诉他们"我们给你们报仇来了"，献过花圈之后，全体军民一齐高举起手，千百个喉咙合成一声巨响，喊出了从心里发出的誓词："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为死难烈士复仇，我们要以解放全中国的胜利来纪念死难烈士"。

井冈山上的功臣赵文珍

为人民除害活捉匪首屠夫萧家璧的是一四二师四二五团二连九班的班副赵文珍同志。他立了特功，他所领导的小组也集体立了大功。

千万劳动人民痛恨的萧匪，当着大军横渡长江进入罗霄山脉时，他想凭借井冈山区的峻岭丛岩，作流窜骚扰的顽抗，并曾妄言威胁群众“你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岭”。满以为这个剿穴是很安全的。

九班接到活捉萧匪的任务时，他们提出口号说“萧匪叫我们看见的话，决不能放过他，不怕任何困难，要争取这个光荣，坚决完成上级和人民给我们的任务，为人民除掉这个大害”。这一口号变成了二连尤其是九班行动中的决心。

四二五团团长王星同志亲自率领二连于二十四日晨三时，由遂川正面直捣萧的老巢——大坑，阴天没有星星和月亮，伸手不见五指。乡村道路崎岖不平，到处都是溪和坑。赵文珍同志一下没小心掉到七尺多深的大坑里，爬出来时说：“不要紧，这是为完成上级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这是对二连和他领导的小组的鼓励和教育，同时保证了他能光荣的立特功当功臣。

他这样坚决是因为他随时随地都不忘本，他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他知道自己是吃糠吃树叶，放羊做长工出身的穷人，受尽了反动派和地主恶霸的欺压，他知道劳动人民要翻身，就得在革命斗争中坚决奋斗，当他在家乡——河北迁安五区安蒙峪当民兵时，村干派他和农会主任到地主家里探消息，当时农会主任受到了地主的贿赂，把真实情况隐瞒了，还贿赂他也不要讲。但是他立场坚定，回去还是报告了村干，因为他坚定忠实，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自报奋勇参加了解放军。

在搜捕萧匪时，真象是做捉迷藏游戏的真空战斗。他不但坚决要完成任务，并且总保持机警和细心，粗中有细的赵文珍同志每通过隐蔽地那怕是一点点风吹草动，也吸引他静悄悄地向四周观察半天，从不大意疏忽，这是他能捉住萧匪的重要条件。这种机警和细心是他在过去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一九四五年他在冀东从民兵调到十二分区警卫营当战士，有一次上级给他破坏交通以阻挡敌人的军事运输的任务，他独自一人完成了。那时他是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学会机警，现在在清剿残匪战斗中他更加细心，没有这种机警和细心以及忍受一切困难的决心，剿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萧匪是二十八日拂晓被我们捕获的。九班进入湖坑西山时，赵文珍同志敏锐细心的眼光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形体正沿着山坡爬，当时他大喊一声“谁！”那可疑的形体慌乱的滚到山底草丛中去了，他接着朝天放了一枪（朝天放枪是因为纪律不允许随便打伤人），同时因为任务是要“活捉”，所以他又灵活机警地向那形体那个方向放了一枪，那形体躲在草丛里不敢动弹了。赵文珍同志勇猛的不顾一切，率领他所领导的小组也同样滚到山底，在草丛中把那可疑的家伙搜索出来了。这，正是我们要捉的反动匪首萧家璧。

这时萧匪没有再说“我有千山万岭”的话了，因为事实教训了他。

血海深仇在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的冬天里，是敌人三省“会剿”“封锁”井冈山，同时加之大雪封锁井冈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率领着亲手创造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山渡过赣江东征了。

蒋介石匪徒豢养的猎犬萧家璧、尹豪明等肆无忌惮地向井

冈山人民伸出恶毒的血爪，在这只猎犬"清洗井冈山"和"石头也要过刀"的血腥嚎叫中，匪徒们舞动着锋利的刀刃，疯狂地毁灭着井冈山善良人民的生命。

人民怀着"毛司令快来搭救我们"的渴望，而敌人把井冈山人民当成鸡和鸭似的杀的杀掉。他们有的光荣牺牲，有的仍坚毅不屈地斗争着。每隔十天半月，匪徒们就疯狂地屠杀，二百五十多人的茨坪，在匪徒七次反复屠杀中杀去了六十四人。在小井，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申丁桂同志叙述当时的惨况说："从井冈山脚上走回家没到十里路，就看见十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横躺在路旁。"大井区也是毛主席常住的地方，匪徒们一次杀害了一百三十六人，当年的少先队队员邹少恒，一家被杀五口。李春发的伯母和嫂子，因为不愿给匪徒们带路，也惨遭杀死了。

山上的人民怀着仇恨的心逃亡到山沟里，在森林或石岩下亲眼见自己的亲人死在匪徒们的屠刀下。茨坪王斗乔被匪徒杀死后，亲人偷偷地把他埋了，但灭绝人性的萧匪却从泥土里把尸体挖出来，把棺材烧掉；茨坪李文早全家大小八口被杀绝了；土岭一个八十多岁姓罗的两公婆也遭毒手。人们不敢出面认领尸首，任凭山鹰野狗撕裂啄食。

二十二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毛主席的队伍又回到了革命的故乡井冈山，山上的人民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控诉蒋介石匪徒和他的鹰犬萧家璧、尹豪明的罪恶。

在树背村五十六岁姓毛的老婆婆见到了我们，知道是毛主席的队伍时，眼泪盈眶的跪了下来。她悲痛而愤怒地控诉了萧家璧的罪恶，她说在十多年前，萧家璧杀死了她的大儿子，并且用香烧她的鼻子和胸口。她说："我的儿子不死，如今就三十五岁了。"

八十岁的老头段银臣颤抖抖地说："自从你们走了以后，

可恨的反动派今天杀人明天放火，我们穷人不晓得被他们害死了多少哟，现在天开眼了，穷人又见青天了。想不到我这快死的人，还能亲眼见到你们回来给我们报仇，看到匪徒的下场。”

这就是被蒋介石匪徒和他豢养的鹰犬萧匪屠杀下的井冈山的人民，他们整整被屠杀了二十二年，但是没有被屠刀所屈服。他们终于看见了毛主席的队伍又回到他们的身边了。

匪徒们除了屠杀以外就是放火焚烧。大井连续被烧四次，下井反复烧了十三次，井冈山周围四十里共烧毁了房子七十余栋，完全在匪徒们的恶毒放火中变成瓦砾。坚强的意志支持着我们，在断垣残壁上加盖屋顶栖身，但是匪徒们一次又一次地烧，并且用锹镐把墙掘坏。烧茨坪的时候，李春发在山上望着自己亲手盖的房子冒出黑烟，象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哭泣了在小井只剩下一个中和昌小饭店，那是因为匪徒们在那里盘踞的缘故，但这房子并没有幸免，匪徒们临走时照样放了一把火，现在这座饭店还部分的保留着当年匪徒们暴行的恶迹。

人被屠杀了，房子被焚烧了，田被荒芜了，活着的人们为了生存，在风雪交加的严寒冬天里踏着一两尺深的雪踯躅在山沟里，每天只能煮一、二两米的稀粥度日，露宿在草丛里。在石岩间的人们，忍受着寒冷和潮湿，与敌人和饥饿死亡作斗争，山上的野草树根已成为他们珍贵的粮食，但他们宁愿冻死饿死病死在山岩上而不愿受辱地死在匪徒们的屠刀下。茨坪区工农政府秘书黄应龙夫妇就是这样和无数不屈的人们一块冻死在山岩下的。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匪徒们“石头要过刀”的血腥恐怖，并没有征服他们的意志，过了三四年以后他们才三三两两的回家，但是家被荒草瓦砾掩没了，被荒芜了的田，没有耕牛和农具，全靠自己的手，又重新过着旧日的生活。他们艰苦

地挖了一块田和土，种下了一些不足的种子。快要收割的时候，匪徒们又来从经济上剥削他们，什么田粮呀，什么壮丁税呀，什么捐税呀，一算就是你家五担谷，他家十担谷，但他们忍受着熬煎。因为他们相信毛主席的队伍会来报仇的。

二十二年了，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这面红旗领导下，回到了井冈山。人民艰苦的日子从此结束了，但二十二年来人民的血海深仇满腔冤屈必须清算，被活捉了的蒋介石匪徒的猎犬萧家璧，应该知道他怎样来偿还这笔血债的。

井冈山人民扬眉吐气公审杀人魔王萧家璧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晨光下，在遂川城东河岸旁边的大广场上，聚集了来自百里以外的革命圣地井冈山上及周围的人民，其中有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也有工农政府时期的暴动队和土地革命的老红军，以及工农政府的委员和农民协会的会员，而且更有许多数十年来被恶霸匪徒——萧家璧等镇压的喘不过气来的广大群众。他们从四面八方，从每个山路中形成了千百条巨流，汇集成一片人海。他们高举着二十年前的红旗和二十年前暴动时期的梭镖，从埋藏的地窖里取出来，擦去腐蚀的铁锈，闪出银色的光芒，使广场上成了枪林，多么雄壮，多么威武。在这里显示着人民力量的强大无比，很多人身上挂着红布条，和他们过去曾经挂过的一样，上面写着“农协会员”。他们背着干粮爬山越岭起早贪黑的来到这广场上，怀着强烈的希望，热爱自己的祖国，更怀着无限的悲哀与愤怒哟。

明朗的太阳在天空照耀着。大会开始了，礼炮排山倒海的响了起来，国旗飘展在天空，主席报告后，分区李立政委号召：“井冈山的太阳从红军北上抗日后，被乌云遮住了，人民

遭了殃。现在乌云被毛主席拨去了。你们在毛主席的太阳下站起来了！今天要翻掉压在你们身上的大石板。”

接着李立同志代表人民向剿匪有功的四二五团献旗授奖给活捉匪首萧家璧的特等功臣赵文珍同志，以及立大功的张耀、李金柱、李兴和大坑乡群众锺海东等。全场人民都以极敬爱的眼光注视着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勇士。

跟随而来的追悼先烈的仪式又宣布开始了，数百个烈士家属身穿孝服，哀乐如泣如诉的吹奏着。匪徒刽子手毒害先烈的惨景激动了每个人的心，吉普灵车载着先烈的灵位缓缓地向会场驶过来，主祭人李立同志率领着全体公祭人员，迎至会场大门，接上灵台，宣读祭文时，人们的心灵里时而激怒时而悲伤，想起刽子手肖家璧、罗普权等被生擒又感到痛快。至送灵时人们含着无限的悲哀与复仇的怒火，呐喊着要求公审匪首肖家璧——这杀人的魔王，我们要替死难的烈士复仇哟。

公审开始了，向人们悔过自新的匪徒狗腿子肖兴元、郭坏诰、赖开茂，人民宽大了他们，当场认错后释放了。罪恶较重的刘尚换判处了徒刑，群众大声叫喊，先带肖居夫上来，接着肖、罗匪徒带在台前跪下，鄙视的唾骂声忿恨声，怒涛一般的响了起来，这是仇恨的怒火，这是数十年欺压下的反映。被杀了儿女的父亲母亲，以及许许多多被害的男女老少，纷纷上台恨恨的控诉着匪徒们的残酷罪行，自己的痛苦愈诉愈苦，愈诉就愈恨哟。大坑乡六十九岁的老婆婆范国香丈夫被杀了，儿子也被残杀了，房了被烧掉了，只剩下孤苦一人，她从台下哭到台上，哭得说不出话来，要他赔儿子呀！五里乡何登怀的家被抄了，老婆被卖了，房子被烧了，自己不敢回家，剩下八十多岁的母亲不能生活，说肖居夫应该千刀万剐哟！接着罗振亚上去说：“肖家璧你也有儿子，能下这样的毒手，我刚生下不到一岁，就把我父亲杀掉，到现在也不知父亲

是个什么样子。”康照喜的老婆背着小孩子哭到台上，诉说她丈夫被杀，咬紧牙关替她丈夫报仇，揪住肖匪的胡子说：“也有我出气的今天呀！”六十八岁的老婆婆，张太太哭着说，肖匪杀害了他的独子张久传；李珍秀哭诉着匪徒们用电烧死了他的父亲李正芳；陈正人同志的母亲被他开刀破肚；工农政府主席胡嗣玲被切成五段……。诉苦伸冤的越来越多，台下不停的喊着“铲除恶霸肖屠夫”，“为死难烈士报仇！”“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春雷一般的喊杀声，有的说要一刀刀割，有的喊要熬油点灯，议论纷纷，最后人民法庭宣判了，在遂川杀人二千以上、焚烧房子五千余间的匪徒肖家璧，当场处以死刑。

井冈山人民富有革命传统，是红军的摇篮，誉为革命策源地的井冈山人民，当着今春土改完成以后，井冈山的人民充分地表现了兴奋愉快的心情，尤其积极的在迎接祖国的生产建设高潮。

二十二年来他们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最残酷的统治压迫蹂躏，杀害了革命同志与无辜人民，焚毁了房子七十余栋，荒芜的田地八百余亩，以致造成了井冈山人民的贫苦饥饿，迫使他们长期的过着挨冷挨饿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意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剿匪、反霸、征粮、土改、生产等群众运动中，发挥了他们光荣的优良革命传统，在各项工作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为祖国与人民的利益，大井乡的人民宁愿自己吃蕨粉，在去年征粮七天内完成了公粮入库的任务，他们唱着山歌：“鸡啼三次会天光，喊醒妻子早起床，赶紧烧火做饭吃，吃了早饭送公粮。”“这么多老俵送公粮，眉开眼笑喜洋洋，爬山越岭无辛苦，总要争取模范当。”“我们大家心要齐，公粮送到井冈区，就护前方打胜仗，农民翻身快活哩。”从这些山歌中，我们就可以

知道井冈山人民的送粮情绪与爱国热忱。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遂川全县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井冈山人民在这一运动中消灭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整顿了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优秀的青年农民光荣的加入了青年团，为了保家卫国，健全了民兵组织。现在一百三十二个青年参加了民兵，他们抓到了逃亡恶霸地主张洪祥、刘孟光，破获了宁冈的国民党反动派地下军袁×龙，缴获了反动武装，计长枪七支、子弹七百七十八发，巩固了地方治安。全区大井、茨坪、下庄等乡于今年三月十日已胜利的完成了土地改革，他们深刻的体会到二十年来的贫苦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给他们的，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敲诈。

莲花一支枪

龚　铁

在井冈山区，老一辈的乡亲们还会记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歌谣：

陈精进一支枪充团长，

一支枪啊追朝湘，

追得（那）朝湘（唉唉）到处钻。

这首歌谣一直激动着年轻赤卫队员的心，给我们留下了忘不掉的自豪的感情……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罪恶的“马日事变”。同年八月当反革命军队打进江西的时候，莲花乡纠察队的领导人陈朝湘剥掉了革命的外衣，露出反动的狰狞的面目。纠察队六十支枪被他攫走了五十九支。

陈精进带着我们六个同志逃出了虎口，来到城外的九都村。我们七个人唯一的武器，就是贺国庆和苏广明拚着生命抢出来的一支俄国步枪——这支古老而结实的枪，就是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写的“莲花保存一支（枪）”。

在九都没过多久，我们重新组织起来的赤卫队已扩大到一百三十多人。陈精进当团长，贺国庆当我们中队长。我们有许多红缨枪、鸟枪和竹筒枪，但是真正的枪全团还只有那一支俄国枪。

要闹革命就得有枪！于是我们选出了苏广明、王仁妹、苏

国贞、杨潘和陈建五个同志，先后混进莲花城里，加入了叛徒陈朝湘的清卫团，等待着机会。

九月的一天，陈朝湘带领了八十来个“靖卫团员”向九都开来“清剿”我们。我们得信后就隐藏在九都附近的山里。第二天夜半时光，我们包围了他们睡觉的新兴饭店。贺国庆端起了那支真正的枪，“乒”地一声，我们投入了赤卫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战斗。

早已联系好的五个同志，马上背了六条“湖北条子”（伍仁妹还拿了别人的一支枪），回到自己的队伍里。这样，七支步枪加上几十条鸟枪和竹筒枪，瞬时打昏了敌人的头脑，不知我们来了多少人，有多少枪啦。

我们一面打还高声大叫：

“把陈朝湘交出来！”

“缴枪不杀！”

敌人在屋子里顽抗。我们冲开了第一道大门，他们堵住了第二道大门，爬在第二幢楼房里放枪。我们正想进攻第二道大门，讨厌的东方却泛起了灰白色的云块，天要亮了。天一亮，如果敌人发觉我们只有几条枪，那是很危险的。无奈何我们只得退了。同志们恨的咬牙切齿，临走时给他放了把火。

当天下午，陈朝湘纠合了陇西、上西两处的地主武装，从两个方向袭过来。陇西的敌人对这里的地形是不熟悉的，陈团长决定先干掉他们。

我们躲在山上的树丛里，等这些送死的脓包走到山脚下，几尊土炮“轰”地一下把几十斤铁粒子，朝他们迎头扑过去，紧接着在一片震天撼地的喊杀声中，我们发起了冲锋。

敌人最害怕面对面地拚杀，一见我们冲锋，他们转身就逃，我们就紧追，追了十五里路左右，八十多个敌人往两面山坳里逃的一个也不剩了。这回共缴了十一支步枪。

敌人连着吃了两次亏，一定不会甘心。和他们硬拚是使不得的，因此县委命令我们退到永新县附近的和山山区。

县城里的两个靖卫团员李海云和严富成，知道我们在和山，他们就背了四支步枪来投奔革命。说起李海云可真是了不起，天上飞着的麻雀，他们一举步枪不用瞄准就能打下来！可是，这回多余的两支枪我仍旧没有分到手啊！

大约是快到九月底的某一天，陈团长把我和刘培益、刘雨华三个人喊了去，对我们说：

"喜事来了……"说着望我们微微地笑了起来。

难道又要去打靖卫团缴武器吗？

我们正在猜测，陈团长说起来拍拍年纪最小的刘雨华说："毛主席要送三支枪给我们团，决定派你们三个人去领，领回来就归你们背。怎么样？该是桩喜事吧！"

这，难道是真的？……我们三人扭转身就奔到宁冈梅花山，在红军政治部里领来了三支"比国造"。回来的路上，我们不停地用手指头顶着衣袖，摸着摸着，心里还在说着："总算熬出来了，又有三支真正的枪了！"

真正的枪，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有了二十八支。

一九二八年夏天，蒋介石把他的第六军的三个师调来打我们。他们挨家挨户地进行清乡。高州区苏维埃主席谢垣标四兄弟全给杀了，许多赤卫队员的家属也遭到惨杀。我们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的二十八支枪必须暂时隐藏起来。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夜晚：贺国庆带着我、刘培益和老杨头（忘了他的真名），四个人悄悄地来到一个山谷里。我们把带来的二十八支枪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才恋恋不舍地埋藏起来。然后，我们对着黑夜的长空，对着山下乡亲们的土地和房舍，用红色战士的名义起誓：

“如果我被敌人抓住，头可断，藏枪的地方决不说出！”

天明以后，又遇到了敌人清乡，我们四个人都被冲散了。我独自躲在没有收割的稻田里，挨过了整整七个白天和七个黑夜。白天，太阳晒得头昏脑胀，半夜里露水落下来，浑身上下又是一片湿。但总算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没有暴露也没有饿死。

不久，我们接到县委的通知，离开了山区，来到湘赣铁路边的宜春县城。谢德兴同志带着他的妻子，在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店，谢振兴同志混在国民党县党部当“师爷”（即文书一类的职务）；我和谢风山两人领了八块光洋，干起了烧炭的买卖；还有……加上老杨头这个一忽儿化装成乞丐、一忽儿又化装成商人的联络员，我们十多个人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组成了一个联络站。联络站不断地把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文件，和驻在城内的何键部队的动态，输送给县委。

重阳节来到了，国民党军队高高兴兴地等着发饷银。

用乡亲们的话来说：“这真是天意！”事情是这样的：谢振兴同志相识的一个姓张的营长，碰巧赌运不佳，一个通宵把全营的饷银输光啦！发不出饷银，许多官兵把他告到团长那里。他闻说团长要杀他的头，急得走投无路，连夜来找谢振兴帮助。谢振兴就趁此机会动员他投奔红军，并且还给他下了保证：如果他能把全营的武器都带去，还可以继续当营长。

再也没有第二条路了，他也向我们赌咒，说是：

“我如有三心二意，出门炮子穿心！”

于是，我们带着这个起义的营离开了宜春。走到武功山附近，被国民党军队何键部队撵上了，一仗打下来，回到莲花村时只剩了两个连。

接着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把起义的营和赤卫队合编为“莲花县独立团”。陈精进为团长，刘绪川为党代表，起义的张营长为团参谋长。贺国庆当了三连连长，我是一班副，我的

班长就是那位神枪手李海云。

十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团在井冈山受了一个月的训练后又回来九都，听当地乡亲们报告说：离这儿三十多里路的南波村有个名叫杨良盛的大劣绅，他最近买了九十六支步枪，还有一支快慢机，一支手枪和一支驳壳枪。

同志们得知了这个消息，乐得要命。第二天拂晓，我们得到了县委的批准，就向南波村出发。真倒霉，在南波的山顶上遇到了杨良盛的一个哨兵，战斗在没有把庄子包围之前就打响了。结果被杨良盛的弟弟杨容盛带了一支驳壳和五支步枪逃走了。杨良盛当场被打死。余下的枪又全部补充到我们团里。

这个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前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基本上还是打得漂亮的，特别是我们班长李海云，表现得最勇敢最机智。他一个人就缴来了六支枪。有歌谣为证：

天上乌云变红云，
红军出了个李海云；
李海云打仗真是强，
一人缴了六支枪。

队伍从南波回到九都，正好碰到红军第五军彭德怀军长也从湖南浏阳赶来九都。无巧不成书，不知死活的国民党罗林部队就在这时候来攻打我们。

他们用两个团把我们团围在米粿山里。第二天中夜里，我们在彭军长的指挥下，人不知鬼不晓地离开了米粿山，但是红旗还仍旧让它们在山顶上飘着。我们悄悄地绕到罗林的师部背后，给它来了个反包围。

天亮以后，我们在山上的树丛中，瞅着罗林在山下的空地上集合了队伍，指手划脚地说了起来：

“……他们被我们包围啦！已经一天一夜没有饭吃啦！……”

他正吹得起劲，我们的重机枪响了。看来整齐而威严的队列，一下子象一团受惊的马蜂似的到处乱钻。彭军长举起手里的左轮枪，喊道：

“莲花赤卫队员，冲下去缴他们的枪啊！”

我们都象出了膛的子弹，刷地冲到山下。敌人的一个师部和一个团部就这样给消灭干净。乡亲们又欢天喜地的编起了新歌：

彭德怀摆了空城计，
山上插着五面旗；
绕到山后打罗林，
打得罗林逃东又窜西。

这一仗共缴获了五挺重机枪，一百多支步枪。因为我们地方武装并不很需要重武器，就把独立团缴获的两挺重机枪送给了红五军。彭军长把我们表扬了一番，不但把缴来的一百多支步枪全部给了我们，还另外送给我们二十八支步枪和一支驳壳枪。

从此，原先只有一支枪的莲花红色独立团，现在每一个战士都有了一支名符其实的真正的枪。

（原载《红色风暴》第二集）

从山谷中打出来

谭家述

一九二九年冬天，敌人用了很大的兵力“围剿”井冈山。为了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我们在离井冈山一百多里的茶陵和永新之间的九龙山地区，展开了游击战。

九龙山的地势非常险要，重峦高峰，峻崖陡峭，到处长满了茅柴和野草，还有茂密无际的天然林。这样险要的地形，很适合进行游击战。敌人为了消灭我们，用了几个团的兵力把九龙山包围起来，以分进合击的战术，想把我们包围在中间，一网打尽。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大七、八十倍。我们这支游击队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几支枪，如果和敌人硬干是不行的。为了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胜敌人，保存自己的力量，和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我们就根据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把队伍拉上九龙山顶上的一个非常潮湿而阴暗的峡谷中隐蔽起来，准备避实击虚。

山里的气候很坏，经常是浓雾弥漫，有时下起大雪，有时又下起毛毛雨。腊月的天气是很冷的，树上和竹子上都挂满了亮晶晶的冰柱。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冰冷潮湿的地方住了下来。在这个山洼里找不到山洞，同志们只好在悬崖下面比较干的地方，铺上一些茅草，睡在上面，每人只盖一床毯子，夜里冻得经常睡不着觉，只好起来跑跳，等困倦得实在支持不住的时候，

才能睡着。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毯子上都落了一层霜雪，同志们的头发上都结了冰。

由于敌人疯狂的"围剿"，山里的几户老百姓都跑光了；房子被敌人烧毁了。我们和老百姓的联系失掉了。部队弄不到粮食吃，饿了只能吃一点红薯丝。白天不敢点火烧水、作饭，怕被敌人发觉，渴了只能喝点冷水。只有等到晚上，才能用从山下拣回来的半边破锅煮一点红薯丝吃。虽然生活这样艰苦，但大家每天仍坚持学习。茶陵县委有时送一些文件给我们，有时派人来讲讲当前形势。我们这样坚持了二十多天。后来红薯丝越来越少了，每顿饭只沉在锅底下一点点。可是谁也不肯捞稠的吃，只盛点汤喝，最后汤干了，红薯丝却一点没有动。队长兼支部书记一看这情况，就跟大家说："同志们，吃吧！"大家看看队长自己不吃，谁也不肯盛。炊事员老曾看大家让来让去，真着急，拿起勺子给每人的碗里盛了一点，才算打开这个僵局。最后这仅有的一点红薯丝也被吃光了，加之满天密布着阴云，又下着大雪，整个山林都被雪盖住了。同志们又冷又饿，腰带紧了再紧。饿极了只好抓一把雪吃，往嘴里一放真是透心凉，禁不住上下牙直打颤。雪到了肚里引起咕噜咕噜一阵叫喊，结果越发难过。

坚持了三天，就到了腊月二十九晚上。大伙饿的没有一点劲，眼睛发黑，直冒金星，气色非常难看，身体快支持不住了。有的背靠着背坐着，有的依着山石垂着头打瞌睡.有的望着天，也有的相互看着默默不语，空气非常沉闷。队长看大家饿成了这个样子，心里正着急，恰巧派出的侦察兵这时回来了。他报告说，敌人因为没有粮食吃，饿的受不住了，已经退出九龙山。队长根据这个情况分析：敌人虽退出九龙山，但并不一定是结束了三次"围剿"，外围仍有敌人存在，战士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虽然情绪并没有低落，但是饥饿和寒冷对他们的身体和

情绪是会有一定影响的。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思想上发生混乱。为了使大家团结得更紧，把斗争坚持下去，配合井冈山部队粉碎敌人的"围剿"，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是很必要的，因此，必须通过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来研究办法。

第二天早上召开了支部委员会，统一了思想，然后召开士兵委员会。队长在会上首先发言，他说："现在我们的处境是很恶劣的。我们正经受着严重的考验。敌人已在昨天晚上退出了九龙山，但外围还有敌人存在。现在来研究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必须找一条出路！"沉静了一会，有一个大约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瘦长脸的队员，站起来有气无力地说："让我说一点吧，敌人虽然退了，但还会来的，我看不如把枪埋了，从小路分散回乡做地下工作，等革命势力大了以后，再武装起来。"他刚说完，立刻有一个青年的队员站了起来说："我不同意他的意见，这简直是解除自己的武装，向敌人投降。我们不能把集体搞散了，集体就是我们的生命。依我看，还是转移到梅花山、七都山、八都山或潭湾山等地进行游击战。"过了一会，又有一个同志要求发言，他说："埋枪不好，但转移对我们也不利。转移到任何一个山里去，我们都要走两个白天，同时要通过一段开阔地，很容易被敌人发觉，给部队带来伤亡和损失。我的意见，找个地主保安团去打，解决目前粮食和武器问题。"这时大家你一嘴，我一嘴的讨论开了，大多数的同志同意第三种意见。队长从这次讨论中看出大家革命意志是坚决的，是有信心的，虽然也有个别意志薄弱的人，但问题不大。于是他最后站起来说："我同意第三种意见。第二种意见虽好，但不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同时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一昼夜通不过去，又没有落脚的地方，很容易被敌人发觉，对我们不利。埋枪散伙，实际上就是解除武装

向敌人投降。因为敌人已实行了十家联保制，回了家也会被杀害，这等于自己找死路。现在我的意见是以九龙山为根据地，和敌人继续斗争下去，坚持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消灭敌人，武装自己，扩大红军力量。'根据侦察员的报告，离这里一百多里的黄沙庄没有国民党军队，驻防的只有一百多名保安团，大约有一百多支枪。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击。打垮保安团就可以解决粮食和武器不足的问题，然后再慢慢开辟我们的游击区。这次出击，虽然敌人的武器比我们多，但人数是一样的，我们给他一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是可以干掉他的……"大家都同意，认为有出路了，情绪也高了。

队长命令大家准备出发。队员们立刻忙了起来，有枪的背枪，没枪的拿起了手榴弹、大刀、梭镖。队长这时召集了干部会，分配战斗任务：第一排为前卫排，第三班为尖兵班。为了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必须把敌人的哨摸掉，因此，选出摸哨最有经验、年轻勇敢的党员彭贵云、彭协和、彭玉昌担任这个任务。干掉哨兵后，立即冲进去进行肉搏。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面，占领后面山头。司务长、上士、炊事员、通信员负责打土豪、挑粮。在布置妥当之后，立即集合队伍。队长除向大家宣布了这个仗怎样打法和行军战斗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外，还嘱咐大家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许动老百姓一针一线。

游击队在下午两点钟出发了，沿着羊肠小路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天越走越黑，雪越下越大，山坡很陡，路很滑，走着走着就摔倒了。

爬过了重重高山，终于在夜里三点多钟来到了黄沙庄。早已化装好的"三彭"，大摇大摆地来到村口。尖兵班轻轻的躲在草丛里。敌人的哨兵正在来回地巡视着，一发现有三个人向村里走来，立刻端起枪喊道："不许动，干什么的？"彭贵云

大大咧咧地说："他妈的，送信的。你们的队部在哪？""送信的有证明吗？""有啊！"彭贵云一边慢慢往怀里摸一边往敌人跟前走去。等靠近了，一个箭步上去卡住了敌人的脖子，敌人想喊也喊不出来。后面两个同志跟上去缴了他的枪。尖刀班、前卫排霎时冲进村去，包围了敌人的院子。这时敌人都睡了，我们往院里仍了几个手榴弹，跟着冲进去。敌人看游击队来了，就乱成了一团。有的从后边跑了出去，在村外和我们打了起来。那些没来得及跑出的，被堵在屋子里出不来了。我们开始向他们喊话："缴枪不杀！再不出来我们往里扔手榴弹了！"少数人仍想抵抗，我们立刻向里面扔，了几个手榴弹，炸死炸伤很多。剩下的就从屋里走出俯首投降。拿刀和梭镖的同志都换上了枪，就更加威风了，马上跑出去支援村外的战斗。负责运粮的同志赶快把地主家的仓库打开，炊事员和一个排挑了很多粮食、肉类和油盐等，由一个班护送回山了。敌人这时组织了兵力想反击，我们就虚张声势地迷惑敌人，喊道："一连往左迂回，二连往右……"敌人一听，以为我们人很多，就没敢反击，退到一个大山的后面去了。这时，我们就由一个班掩护着往回走。等到天亮，敌人看清我们只有一百多人的时候，想追已来不及，我们已经沿山走远了。

同志们回来后，欢欢乐乐过了个年。我们这次出击，不但打破了九龙山的"围剿"，牵住了敌人，提高了士气，坚定了斗志，而且解决了粮食问题，缴获了敌人四十多支枪和很多子弹，用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敌人以后也不敢在黄沙庄住下去了，这一带从此就成了游击区。

以后，我们这支游击队就在艰难残酷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一直发展成为红军二方面军六军团。

（原载《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

湘南游击队的初期活动

唐　天　际

一九二八年春，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部队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委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敌人向湘赣的三次“围剿”。同年七月底，由于湖南省委杜修经等人的错误主张，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南下湘南，攻占郴州，先胜后败，部队便撤离湘南，重返井冈山。

为了巩固井冈山政权，扩大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湘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主力回师井冈山途中，党临时决定成立湘南红军游击队，由湘南特委直接领导。党决定我离开二十八团三营党代表职务，调任这支游击队的大队长。

当时，这支游击队只有三十多人。朱德军长批准由二十八团抽调一部分枪支，但由于武器短缺，结果只抽出了十二支枪（其中套筒枪、毛瑟枪各两支，单响枪八支），其他都是些土枪梭镖等。就这样，我们这支游击队便开始留在龙溪十二洞、八面山与资、汝、桂边的崇山峻岭中展开了游击活动。

早在大革命时期，湘南就掀起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遭到了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秋收起义的部队到了井冈山，湘赣边的农民又起来了。朱德同志、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军来到湘南，又点燃了湘南暴动的烈火。在这时期，曾以资兴为中心，动员农民组成一个师。所以这里有革命基础，群众对我有较好的影响。龙溪十二洞斜倚在资兴的东

南，紧靠着八面山，雷公仙，方圆数十里。山地中村落稀疏，人民贫困，更是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场所。我们来到这里以后，首先明白的告诉农民：我们不走了。接着就着手发动群众，广泛地作调查、宣传、组织工作，同时，打土豪、分粮食，解决农民的实际生活困难。这样，经过我们短时间的工作后，群众就发动起来了。

我们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敌人就不断地来"围剿"。开始，他们到处追踪，企图将我们消灭；但我们处处有群众支援，哪里能消灭得了？敌人看看没法，便使出了更为毒辣的手段，到处大杀大抢，烧山烧房子，妄想以残酷的白色恐怖困死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战斗，打击敌人的气焰。但要打仗，就得有枪、有弹药。而我们武器既少，弹药又奇缺。同志们说："我们好枪太少，象这样的吹火筒，这样几颗子弹，还能打胜仗？"这时，我们同样按照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如何以少胜多、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术原则，将全队三十多个人分成三个班，与当地赤卫队配合起来，和敌人进行游击战。

枪弹少就有枪弹少的打法，打法是：坚决勇敢，不怕牺牲，神出鬼没，力求隐蔽，机动灵活，动作迅速。特别是坚决勇敢不怕牺牲这一条更重要。有了这一条，再加上灵活的战术，即使装备有困难，也能打胜仗。于是，我们首先便从小规模的伏击战着手。我们常常是这样："以两条枪、两发子弹作为攻击力量，又以一条枪一发子弹作为掩护力量，这样以枪组成一个小组。打的时候，前面两条枪对准一个敌人，后面一条掩护，必要时增援，其余无子弹的人作为预备队。每当遇到三五成群的敌人的散兵，只要我们采取这个打法，准能打倒几个敌人，不仅能得到枪而且能取得几十排子弹。有了子弹，我们就可以全队参加作战了。在准备一个较大的战斗之前，我们常常

是在群众掩护下首先分班打几次这样的小战斗，一方面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另方面又作了战斗的物质准备。当时，我们除了经常的政治口号外，还强调提出：子弹是我们最宝贵的粮食。没有粮食，我们就要饿死；没有子弹，我们就不能打胜仗，甚至还会被消灭。

连打了几个小战斗，取得了几百排子弹以后，我们便有打“大仗”的可能了。记得在彩洞附近进行过一次战斗。

头一天就得到消息，敌人从资兴开来吴尚的一营“正规军”和民团几百人；汝城匪首胡凤璋派了一个队来到南洞，桂东也来一个营进至沙田。我们决心与敌人打一仗。按照地形，便于腰斩敌人，于是决定先打资兴来的敌人。

阴沉沉的天气，下着牛毛细雨，树叶上淅沥淅沥地滴着雨水。战士们有的戴着树枝做的斗笠，有的披着草制的蓑衣，但还是全身湿透了。我们将部队带到山坳，派出两个突击队，分别隐蔽在小路的两边杂木草丛中，其余的与群众在一起，分别布置在制高点上，作为掩护和预备队。

一条只一尺多宽的山路，稍带弯曲地从山前搭到山背，象一根浸湿了的土黄色的带子。敌人分成三截，前后是民团，中间是“正规军”，成一路纵队，沿着这条湿滑的沙石小路，躬着背吆吆喝喝地爬行着。

雨越下越大。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爬到坳上，又慢吞吞地下到坳背去，一个、两个、三个……。

翻过山的敌人已经有几百名，两头的数目渐渐差不多了，于是，我们一声号令，埋伏在两边的队伍顿时捆了出来，往敌军腰间一插，切成两段。一时枪声、喊杀声大作。敌人措手不及，在窄小的山路上也施展不开，慌慌乱乱，连滚带摔，哀叫声，乱枪声和雨声混在一起。两头敌军有的走过了，有的没赶上来，又因山路崎岖来不及增援，只好各自逃窜。近千名敌

人，不到一小时，被我们全部击溃，死伤百余。

这次战斗，我们很少伤亡，俘虏很多，第一次缴到了两支自动步枪。胜利鼓舞了战士们，更鼓舞了广大农民。

除了上述这种以少胜多的打法外，我们还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这也是我们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点的必胜的战法之一。当大股的敌人进攻时，我们就先分出一部分力量，与赤卫队和群众配合起来，四处吹角鸣锣，袭扰、迷惑、牵制和吸引敌人，使敌人觉得草木皆兵，举棋不定。主力则隐蔽起来，发现敌人的错觉和弱点以后，即迅速地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份，一下子打垮或消灭它一股。用这种打法，我们常以一个排的兵力消灭敌人一个班，用一个连的兵力消灭敌人一个排甚至几个排。敌人吃了败仗，如果还不回头，我们则用同样的打法连续战斗，歼灭敌人另外一股；如果敌人被迫撤退，我们则立即动员起广大的赤卫队和农民群众，尾追和沿途侧击敌人，又可以给敌人一些杀伤。这样在战术上虽然以多胜少，但在战役上仍然是以少胜多的。

当敌人集中较大的兵力大举“围剿”的时候，我们看看吃不掉它，便又采取了一种和敌人换防的打法：突出敌人包围，插到白区里活动。突围的战斗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当敌人一开始进攻，我们便和敌人同时进军，避过敌人主力，插到敌后去；有时，我们故意与敌人接触，且战且退，边退边抽出主力，待将敌人引进山区，我们的主力也已撤出一旁集中起来，以便突然动作甩开敌人，插入敌后。有时索性钻进深山密林隐蔽起来，以岩石作墙壁、瀑布作门帘，挖竹笋、采香菇吃，休息它几天，待“围剿”的敌人围拢了，我们瞅得准准的，或抓住他们合围部队参差不齐的弱点，利用敌人同时并进、你进我不进的矛盾，乘隙突出去；或者隐蔽转移，或者留一小部吸引敌人，主力突围，或者干脆化整为零，从敌人的合围网里渗透出

去。这样一下子打出外线，进入白区，收拾掉小股的敌军，打土豪、分粮食，搞得敌军蒙头转向，土豪日夜惶恐不安。

记得在田庄附近打了一仗就是这样：敌人集中了几路来围攻，我们以一支小部队配合赤卫军虚张声势吸引敌人，开始敌人怕上当，派出探子来侦察，我们抓住了侦探，故意把我们的主力暴露给他，然后放他回去。愚蠢的敌人以为得计，便全力来攻了。我们的小部队便紧紧地把他们吸住，主力则星夜进入敌后，连扫几个村镇，大打土豪。等敌人大队闻讯仓皇撤回，我们却早已安全转移了。据说当地土豪对敌军大为不满。骂他们："你们'围剿'红军,怎么反把红军'剿'到我们家门上来了！"

当然，我们这样一支小的游击武装，在强大的敌人包围中进行活动，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与群众亲如鱼水的关系，要想生存，发展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游击队建立的开始，党就指示我们：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在每次战斗之后,那怕是十分短暂的空隙时间，我们也立即分散开来,向根据地四周的村镇展开活动,游击队严格执行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手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作宣传，人人作调查,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粮食、收缴地主武装。群众发动起来了,建立了党的组织,组织了赤卫队，配合游击队向地主、挨户团展开了斗争。群众对革命、对游击队的爱护和支持是无微不至的，当我们隐蔽休整的时候，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往山上送粮送菜，打仗的时候，他们送情报、运伤员、配合游击队袭扰敌人……。当我们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的时候，他们又想尽办法掩护我们。此外，还有大批的青年农民参军，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

在连续的胜利战斗中，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部队也迅速发展了。不到几个月，游击队就扩大到了三百多人，有了一百

多条枪，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群众组织也发展了。部队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工作也更健全起来。我们建立了几个中队，中队设有政治指导员，党的支部和青年团组织也更健全了。一切战斗和工作都经支部讨论决定（大的问题请示特委决定），此外还建立了伙食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管理大家的生活；日常的奖惩也都经军人大会讨论决定。为了适应频繁的游击活动，我们从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拟定编制：没有专任的侦察员、通信员，都是临时指派；没有挑夫、伙夫，由大家轮流担任。这样，人人是战斗员，又是工作员，人人作调查、宣传，大家都有接近群众的机会。部队便真正成了一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工作队，内部更加团结，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上级党组织给我们送来了我党“六大”决议和一封信，要我们立即行动，前往配合作战。

广大群众知道主力来了，万分兴奋，普遍地掀起了参战参军的热潮。战士们听说主力来了，更是欢腾，都说：“这回要给胡凤璋尝尝厉害了。”

我们立即兼程南下。天气闷热，草鞋、胶鞋象火烤了似的，从脚板心直热到背心。队伍象一股热流，直奔汝城。敌人发觉了，欺负我们人少，就来堵击，幸亏我们行动灵活，且战且走，才摆脱了敌人，但却失去了和主力会合的机会。

我们走到沙田附近，敌人又跟上了，面前横着一条两百公尺宽的滁水，没有船，又不能徒涉；沙田又有敌人一个营把守着。前面受敌，背水作战，情况是很不利的。我们决定在追敌没到之前，以一小部分队伍牵制敌人，把敌引向另一方向攻击，而先头部队却以便衣偷袭对河口守敌，首先消灭敌人的军士哨，然后主力渡河。这样，等守敌发觉和后面的敌人赶到河边，我们早已顺利地渡过滁水，把沙田撇得远远的了。这次我们不但没有伤亡，而且还打垮了敌人一个排，消灭了敌人一个

班。

这一次，虽然红军主力没有在湘南久留，但却给了湘南的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军狠狠的一次大打击。一些小城镇的地主老财，都惶惶不安，撤到大县城去了。群众得到有力鼓舞，我们的工作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信心更足了。

就这样，我们这支红色游击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遵循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原则，紧紧地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人民利益而战斗，在战斗中成长、发展、壮大，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开展游击斗争的任务。

（原载《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

湘赣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何 重 仁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上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壮大发展起来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是毛主席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里，最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建立了红色政权；它是中国人民的灯塔，照亮了革命的胜利前途，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因此，这个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重要关键。

我这次随中央访问团湘赣边区分团访问了永新县、宁冈县、遂川县井冈山区等地方。现将个人访问所得的一点材料，简略地报导如下：

边区人民武装斗争的英勇壮烈事迹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湖南到了江西宁冈县的茅坪，驻扎在村东两里的步云山。第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山上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又先后组织了农会、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工农暴动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并展开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于是，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形势如星火燎原一般发展起来。

二月十七日，毛主席率领革命群众配合军队进攻宁冈县新城敌人的城防部队有滇军一营和地主武装“靖卫团”枪精弹足，凭靠城墙顽抗。我军八九百人，枪枝不足，许多人还使用着梭镖、镰刀、杀猪刀等，按武器说，远不如敌人。但是战士们一想到出发前毛主席所讲的话：“我们要过好日子，我们要保住从土豪那里分来的土地和粮食，我们就得从白军手里夺过他们的枪炮来武装自己……”，就鼓舞起坚强无比的战斗意志，从早到晚奋勇冲锋，终于在枪林弹雨中，架设梯子爬上城墙，攻克新城，活捉伪县长张开杨，缴枪七百多枝。经此一战，肃清了当地的反动武装。

三月初，湘南特委把宁冈我军调往湖南，敌人又乘虚侵入宁冈。四月间，由湘南退回的部队与朱总司令所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共同逐走盘据宁冈的敌人，仅在井冈山北麓的大陇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毛主席亲手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奠定了人民军队优良的傳统军纪。此后，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广大群众的支援，不足四个团的兵力的红军，配合了区县两级的赤卫队、乡村的暴动队，屡次击败倍于我们的敌军。红色区域及革命武装的扩大，给反动政权以严重的威胁，敌人继续不断地发动大规模“围剿”，企图挽救自己垂死的命运。

六月间，蒋匪帮朱培德部第九师杨池生、二十七师杨如轩倾全力由永新进犯宁冈，到了七溪岭山上。但就在这里，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着革命群众和红军，一举歼灭了敌军主力。

七溪岭在新城以北五里，是永、宁两县的界山，形势险峻，不但屏障宁冈，且为井冈山外围重要据点之一。敌我在此激战的经过情形，据当时少先队员新城谢长生说：“这一仗是在端午节（六月二十二日）打的。战事发生以前，敌人师部扎在岭南山脚下龙源口、秋溪街一带，团部到了山上蛤蟆湖（即

下马铺）打算攻下新城过节！”

打仗的前一天，我们在城里城隍庙开群众大会，大家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动员报告，情绪激昂万分，提出了“永不叛党”、“牺牲个人一切”、“坚决斗争”、“宁死在刀枪之下”四句战斗口号，表示歼灭敌人的决心。远近各乡村的农民，来了五、六千人，编成每十人为一单位的小队，每队一面红旗，一杆梭镖一杆枪，配合红军作战。同时组织许多担架队、送饭队，整夜做准备工作。

在黑夜星光下，我们分三路出发去包围敌人。清早六点钟，就开火了。我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连陈伯钧连长在岭北山谷中埋伏好两排兵力、自己带一排人上山诱敌，果然一下就把敌人搜山连队消灭了。敌人主力部队源源不断地赶来，陈连长为避免包围，就退守岭北山足风车口。经我两翼部队猛攻之后，敌人一直溃退到山顶上，凭险扼守山口，用四挺重机枪火力，封锁山路。

这时朱总司令在山腰流芳阁指挥进攻。那里有个开伙铺的王狗仔（现在新城乡下），特地端了自己过节的食物来慰劳，朱总司令谢他一块钱，他硬不肯收下，并且说道：“打垮白军，铺子才开得长久，自家人吃点算不了什么”。

激战许久，我二十九团第二营一百零九人，只剩下十四个了。朱总司令说：“剩一条枪也要打，打垮敌人才有生路！”亲自带着战士坚守阵地。两分钟后，我援兵赶到了，争着要当敢死队员，去完成夺取敌人机枪阵地的光荣任务；最后还是挑选了四十个人去的。他们中间的一位，突然出现在敌人头一挺机枪面前，用自己肚子挡住枪口，双手紧抱枪身，死也不放。他就英勇壮烈牺牲了！但就在这刹那间，跟着猛冲上来的一批战士，就把敌人阵地夺下了。同时我二十八团从左边包抄过来，三十一团第三营、三十二团从右边包抄过来，四面八方只见尽是红旗，一片“不杀俘虏呀”，“快缴枪呀”，快投降呀”的

喊声，震动山谷。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在山顶望月亭一带全被解决了。

我们丢下梭镖、拿着敌人枪杆、一口气从山上冲击四十多里以外的永新城；沿路又缴得许多枪杆，我军从此不再是"梭镖队"了！并且还有了机关枪、迫击炮。我们又把敌人堆积在城里的军用物资，全搬运到步云山，所以连吃、穿、用的东西都不缺少了。

今天边区还流传着"不费红军三分力，吃掉江西两只羊"的民谣，便是颂扬这次巨大胜利的。

这次战斗，就是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的龙源口之战。自此以后，不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及安福、吉安、遂川、酃县一部，全属红色区域；并成立了边界政府（设在大陇附近两里的客醉楼）；而且土地革命得以广泛深入，县、区、乡人民政权及地方武装得以普遍建立。

反动派感到更严重的威胁，七、八、月间，湘、赣两省敌人，纠合十八个团、发动"两省围剿"。当时，红军主力被湖南省委调往湘南，敌人再度进犯宁冈等县。留守的我军，虽仅只一个团，但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用"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四面游击的方式，迫使七月中旬侵入宁冈、永新的湘敌第八军吴尚慌忙逃退茶陵。这时赣敌第三军王钧、金汉鼎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我守军一团及革命群众，在毛主席指挥下，把敌人围在城郊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我军大部退入井冈山区，小部与各县地方武装退入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宁冈的西北两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冈和大院区。这些山区，敌人始终无法夺取。例如井冈山黄洋界之战，这时毛主席已率领一营人离山往桂东去迎还红军主力，留下袁文才、王佐带领不足一营的兵力防守。八月三十日，吴尚、王均匪部四个团

由宁冈来攻。当敌人进至山腰半坳时，我三十一团特务连凭险猛击匪军；激战一昼夜，敌人死伤累累。因此湘敌溃至酃县，赣敌退据各县城及平原市镇乡村。另外，由永新进犯山区的西路敌人，也遭遇到同样的失败。一路是尹匪在中所带领的千余人。当其到达旗锣坳时，被我三十二团第四连金连长带领的暴动队三十余人狙击。我队员李珍珠、罗正彩等数人，乘隙冲入敌阵猛扑匪首；正彩抱住尹匪、珍珠顺手用旗杆的铁叉向尹匪腹部猛扎，即时将他杀死。尹匪被杀之后，敌人惊惶失措地溃败了。李罗二人因此荣获"人民功臣"的奖励。另一路是高功、尹豪民等匪部数千人。当其进至长汲岭时，我三十二团第二营四、五两连，三十一团特务营，共两百余人，与敌人激战三昼夜。最后我军所剩子弹不多，于是由第四连李才龙、何世项、邓洪林、刘佑材等诱敌深入伏地，然后我军四起冲杀，仅打了三发子弹，就将敌军击溃。总之，这两月间，红军、赤卫队、暴动队与敌人正式部队及地主武装"保安队"、"挨户团"大小数十战，英勇机智地赢得许多辉煌战果，保全了山区根据地。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率领了在桂东会合的红军回到井冈山区，先后击败了盘据遂川、宁冈、永新之敌，收复宁冈全县。敌人的攻势是再度被粉碎了。

不甘失败的反动派，在冬季又纠合湘、赣、粤三省十八个团匪军，发动"三省围剿"、"四路进攻"。在敌人围攻井冈山之前，毛主席、朱总司令决定率领红军主力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建立更广大的根据地，以扩大对全国的影响。其后彭副总司令已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来会，就担任留守井冈山，吸引牵制敌军主力，以便我主力部队作战略上的转移。

在大军出发以前，为了储备守山用的军粮，毛主席、朱总司令带着红军和群众，天天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朱总司令还新自砍了一根扁担，上写"朱德记，"用来挑米。群众在搬运

粮食时，顺口编唱一首山歌道："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十二月初，红军开往赣南。彭副总司令只带着不足三百人的部队，配合了暴动队守山。为使兵力集中，就扼守山区周围哨口黄洋界、桐木岭、硃砂冲、八面山的顶端。到了初九日，敌人从宁、永、遂、酃四县分向四个哨口猛攻。在大雪天，我军穿的是夹衣，盖的是稻草，吃的是南瓜，战斗意志却极为强烈，不断地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这时，山区群众冒着风雪炮火，把自己家里的热茶热饭送到前线，又彻夜抢修好被炮火轰坏了的防御工事。因此，敌人的猛烈炮火，始终不能摧毁我军的阵地。当时匪首蒋介石虽一再严令匪军限期攻入山区，但敌人却寸步难进。十八日，黄洋界山脚源头村匪军官被摧逼得慌了，就急忙找到当地的一个廖老头（现仍在源头），准备要他第二天上山送投降书。不巧在当天傍晚，山腰半坳的敌人，抓着斜源村（在半坳右边五里）游民陈开思，邓丙珠；并用两百块钱收买他们带路。于是敌军在十九日清早，从斜源经汪洋洲窜到黄洋界后牵三里的滚子坳，截断了我军后路。于连长带着第五连冲出重围到永新九龙山根据地与彭副总司令带领的部队会合。这十天牵制性的战争，使我主力部队胜利地渡过赣江，开辟了更广大的中央苏区。所以敌人虽侵入井冈山区，但基本上却遭到更大的失败！

革命力量在九龙山发展壮大起来，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建立了以永新为省府的湘赣边苏区。此后红军北上抗日，游击队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与敌人作顽强的艰苦斗争；直到七七事变，始编入新四军，开赴皖南抗战。

人民武装部队全部离开边区之后，反动派更疯狂迫害人民。因此，边区人民二十来年的痛苦生涯，是一部充满了血泪的生活斗争史！

白色恐怖统治下的边区情况

反动派统治时期，人民的生命被残害，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洗劫；幸免于屠刀的人，又遭受种种压迫、剥削，生活濒于绝境。这种暗无天日的凄惨情境，人民愤恨万分地说："这好比黄鳅滚油煎"！他们怀念着红军时代的幸福生活，就普遍流传着："爹在娘在不如朱、毛在，千好万好不如红军好"的歌谣。这个尖锐的对比，充分表现了人民心中的爱和恨！

反动派残害革命人民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匪军及地主武装侵入井冈山之后，疯狂地嚎叫："清洗井冈山，换过人种，换过谷种，毛房要过火，石头砍三刀！"不但杀害了大井村一百三十余人，并且用机枪屠杀小井村红军医院的全体重伤病员（至少在一百二十人以上）。更以种种灭绝人性的方法，如打地雷、踩杠子、钉四肢、香火烧、艾烟熏、抽脚筋、锁颈骨、挖眼、挖心、剖腹、剥皮、点天灯（先把煤油浇在人身上，然后吊起来点燃烧），水烫（并在伤口上擦盐沫或涂石灰），刀割（竟强迫被害人吃掉割下来的肉）等等酷刑，虐杀革命人民。例如朱于和烈士（毛主席主持的农民讲习所的学生，死时年仅十九岁），在酃县被捕后的三天中，被鞭打得遍体鳞伤后，又遭受割耳跪火砖、上铁箍等毒刑；就义之前，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竟又被割掉舌头。

由于反动派的长期残害，边区人口大量减少。宁冈县在一九二六年有九万人，现剩三万五千。永新县原有三十万人，现剩二十万零三百七十人。遂川县、井冈山区，被敌人污蔑为"土匪窝"。屡经匪军及"四大屠夫"肖家璧（遂川）、贾少栗（酃县）、尹道一（永新）、肖根光（宁冈）轮番烧杀，损失尤其严重。仅大小五井（村）的居民一百二十多户，竟被杀绝

了六十九户，约占全数的百分之六十八。

反动派不但杀害人民并烧毁无数房屋。永新县九龙山小江地区，只七昼夜焚烧全区三分之二的房屋，约计二千五百七十四间，完全被烧毁。宁冈县茅坪、大陇、桥林等乡各村庄的房屋，被烧毁的平均在半数以上。例如：坝上村有房屋二十栋，被烧掉十三栋；天平村有二十多栋，被烧掉十六栋；成山、周山两村共有三十三栋，被烧掉二十五栋（现剩的八栋有五栋是残破的）；源头村的五十多栋，全被烧光。遂川县、井冈山区的房屋，曾经不断地被敌人烧毁。例如：大井村周年古家连续被烧九次；下井村被烧十三次。因此从前房屋颇多的大小五井，现剩数间破房而已。尤其凄凉的是下庄荆竹山间五十多里路内，所有房屋全成灰烬。

反动派除烧、杀以外，又继之以抢劫。人民财产的损失，年深月久，已无从调查。仅就土地、耕牛、农具、谷种四项举例来说：关于土地的损失，永新一县的农民计失去土地十一万零九百四十七亩。关于耕牛的损失，永新县波阳、澧田、石桥、怀忠四区被抢走一万二千三百零三头；遂川县、井冈山区被抢走一千三百三十头。关于谷种的损失：仅永新县九龙山小江地区就被抢走三千三百六十石。

在反动派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更有长年的“倒算”，巨额的“罚款”，经常“罚苦工”逼使老百姓卖妻鬻子。并且厉行“十家连保连坐”条例，压制革命活动；发现一家有革命分子，即将十家连坐，悉数杀害。

反动派对待烈、军、干属及参加过革命群众组织的人，尤其暴虐。不但污蔑他们为“土匪”“土匪婆”、“土匪崽”，随时随地加以凌辱；并且迫令他们缴纳所谓“自首费”，配带“自新证”，悬挂“特别户”红门牌，由反动派经常肆意搜查。

反动统治下的苛捐杂税，名目更其繁多。每年向每人派捐

五角的所谓“脑壳捐”。更为苛刻，经常预征到四、五年，且连不宰杀的牲口也要照样派捐。甚至杀害了人，还要向被难家属征款。例如反动派砍杀茶陵农民刘端保后，竟提着人头到刘家勒索了四十块钱的“手工钱”！

在苦难的岁月里煎熬着的边区人民，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到来。当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传到边区时，群众知道快要翻身了，立即组织起来，反抗暴政，拒缴捐税。当时反动派征收不到“马粮”，就赶马群到田里吃庄稼，搜括不到准备逃跑的“应变货”，就遍地抢劫。最后匪军逃跑时，还到处抓“佚子”，强迫人民替他们担挑抢劫的赃物。茨坪人王丙详、李定开竟一直被拉到海南岛。该岛解放后，才由解放军发给路费路条，随送回家。在反动统治下的二十来年，尽管反动派凶焰炙人，但边区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始终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反抗敌人。烈士邹善昌，先后组织了扁担队，鸟枪队与敌人作战；被捕后在游街示众的沿途中，不断高呼口号；在刑被打了一枪时，还回转头来唾骂刽子手：“瞎了你的狗眼，当个兵，枪都打不中”！井冈山人民说：“宁愿做饿死在山的人，决不作反动派的狗！”他们住岩穴，吃野菜，树皮，“用兜山头”的方式，随时抗击敌人。贫农黄福英说：“我全家四口人，妈妈、哥哥、嫂子吃了四年灯芯草子，都活活饿死了。可是我一想到毛主席，我还是忍着活下去；晚上躺着就掐指头计算毛主席走了几多年”。井冈山人民，在万分艰苦的环境里，迫于饥寒而死在深山的，就达三百六十三人之多；但其余的人仍英勇地继续奋斗，坚信毛主席临走时所说的话：“革命一定胜利！红军一定回来！”

今天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边区人民英勇奋斗的功绩是分不开的！饮水思源，我们不但深深地感谢他们，而且应该积极帮助他们，迅速地恢复多年所遭受到的过分严重的损伤。

（原载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进步日报》）

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

邹文楷　马夏姬

我们当年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回忆起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和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井冈山革命精神，感到分外亲切。

新型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秋，毛主席以空前的胆略和宏伟的气魄，率领不足一团的兵力，来到方圆五百多华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回想当年，井冈山根据地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外有白色政权的层层包围，内有机会主义的重重干扰，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红军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粮食、布匹、药品、食盐都很缺乏，战斗又十分频繁，差不多天天打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红军为什么能够出生入死，克服千难万险，使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呢？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也如此频繁，仍然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从最初建立工农红军的时候起，毛主席就十分重视党的建设，规定"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加强军民的无

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我们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才开始懂得冤有头，债有主，只有打倒反动派，劳动人民才能得解放的革命道理；懂得我们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无论红军战士，还是赤卫队员，暴动队员，我们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把心贴在一起，贴在革命上。

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亲手培育了井冈山革命精神，提出了处理革命队伍内部人们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红军废除了雇佣制，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那时，士兵还有自己的组织，叫士兵委员会。一次，一位副官违反了纪律，士兵委员会议决定罚打。领导知道后说服大家：“官长不打士兵，士兵要打官长，对吗？”结果撤销了罚打，改为进行思想教育。在红军内部，官长士兵是一家，革命不分你我他。当时流传一首歌谣说：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一个样，
没有人来压迫人。

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到处可以看到干部关心战士，战士爱护干部的动人事迹。打土豪搞到一点布，除了分给群众外，部队得了一部分。如何分配这点布，干部首先想到的是给这个战士做件褂子，给那个战士裁条裤子。官兵们同吃粗糙的红米饭和没有油盐的南瓜汤或秋茄子，有时只得靠野菜，竹笋充饥。那时，从军长到伙伕，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

生活。直到现在，在永新县残存的石碑上，在宁冈砻市原红军军官教导队旧址的墙壁上，还可以依稀看到这样的标语："红军中官兵伕薪饷一样"，"红军中官兵伕穿吃一律平等"。寒冬腊月，红军官兵穿的都是两件单衣，垫的同是稻草，盖的同是稻草，薄线毯或破夹被。这种亲密无间的新型官兵关系，使得红军无论在什么艰苦条件下，始终充满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时，红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两首歌谣：

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好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

干稻草来软又黄，
金丝被儿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
暖暖和和入梦乡。

不仅官兵平等，军民也是鱼水情深。上井冈山后不久，毛主席就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一九二八年夏；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九二九年以后，又增加了两项注意，成为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军民鱼水情的结晶。

红军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红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宣传革命道理，帮助地方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工农政权。打土豪，分浮财，红军首先想到的是分给贫苦的工农群众。缴获敌人的武器也要留一部分给地方武装。有一次，红军打下永新城缴到一些盐，挨家挨户地分给群众，自己却吃用老墙土熬的硝盐。红军对待群众就象对待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经常帮助群众打柴，挑水，扫院子，做农活。打五斗江那一仗，正是插秧季节，战斗刚结束，红军连口气都没歇，就帮助群众插起秧

来。红军为工农群众，工农群众也从心底里拥护红军。群众不仅为红军洗衣，做鞋，挖药，带路，放哨，护理伤员，而且还直接投入战斗，积极参加红军，给了红军以极大的支持。

在艰苦的斗争年代，正是党的正确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战胜千难万险。我们亲眼看到，那时连消毒药水都搞不到，伤员开刀硬是咬紧牙关，用盐水洗伤口而没有怨言。在一次战斗中，莲花县委书记不幸被捕，最后被敌人残酷地割了舌头，剖了腹，英勇牺牲。一九二九年初，主力红军去赣南闽西，敌人乘机进犯井冈山，小井村一百多名红军伤病员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抓住。敌人架起机关枪威胁他们投降，但一百多名坚强的战士面不改色，齐声高呼："红军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全部壮烈牺牲。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井冈山的战旗，辉映着井冈山革命精神。

伟大的榜样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是毛主席亲手培育了井冈山革命精神。他老人家不仅提出了正确处理革命队伍内部人们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而且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带头实践这些原则，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

毛主席率领部队上井冈山时，和战士穿着一样，身背斗笠，脚穿草鞋。在井冈山一年零三个月的战斗历程中，冬天，毛主席穿的是两件单衣，睡的是硬板床，垫的是稻草，盖的是薄线毯。白天指挥战斗，晚上彻夜工作。夜里天寒，就披上毯子工作。毛主席吃的也是红米饭、南瓜汤和野菜。一次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吃野菜时，对战士们说，这野菜是苦的，但有政治营养，吃了后我们干革命就不怕苦。那时，由于反动派的封锁，井冈山灯油缺少。为了节约用油，红军规定，连以上单位

晚上办公，一盏油灯可以用三根灯芯，部队查哨则用一根灯芯。按这个规定，毛主席晚上工作可以用三根灯芯，但毛主席坚决只用一根灯芯。后来，打土豪缴来一盏马灯，战士们把它送给毛主席。可是，毛主席只在开会和访贫问苦时使用，自己办公仍用一根灯芯的油灯。就是在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毛主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

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始终以一个普通战士的姿态出现。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解决粮食问题，毛主席脚穿草鞋，常和战士们一道翻山越岭，去宁冈挑粮，往返一百多里。有一次，挑粮战士在黄洋界檞树下休息的时候，毛主席问战士，站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地方？战士们回答："能看到湖南、江西两省。"毛主席说，应该看得更远。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我们挑粮上山，就是为了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给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

毛主席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对战士、群众却非常关心。毛主席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教育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毛主席亲自给井冈山群众写过几十块"分田牌"，带领红军战士给九陇山区群众打过水井，还给永新塘边村贫农老大娘挑过水。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毛主席发动干部和战士，节约粮食，支援当地贫农缺粮户。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毛主席深入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思想发动工作。一次，茅坪的群众捕获了一条狗鱼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指着狗鱼问大家，它吃什么，怎么长得这么大？群众答：它"专吃鱼虾。"毛主席风趣地说，原来它是鱼中的恶霸，是吃鱼的鱼，正象土豪劣绅是吃人的人一样。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人间的狗鱼！毛主席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斗志。

毛主席最关心群众，群众无限热爱毛主席。大井的一位老太婆，为了感谢毛主席，把仅存的一瓢鸡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坚决不收，后来不得已才把鸡蛋买了下来。但毛主席却又把鸡蛋转送给了红军伤病员。伤病员非常感动，毛主席对他们亲切地说，你们负了伤，流了血，比我们更需要它。并勉励战士们好好养伤，早日重返前线，为人民立新功。

毛主席的光辉榜样和伟大教导，哺育着井冈山革命精神，激励着井冈山军民的革命斗志，使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光辉。

辉煌的胜利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团结，官兵团结，因而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取得了新城、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使边界红旗始终不倒，创造了英雄的事迹，写出了不朽的篇章。其中，“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就是这不朽篇章中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八年八月，敌人乘我红军主力去湖南之际，用四个团的兵力向我黄洋界进攻，妄图扑灭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当时，井冈山红军只有两个连，武器、弹药十分缺乏。但是，在毛主席一定要坚守井冈山的伟大指示下，井冈山军民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迅速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伟大胜利。这在红军初创时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当时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而参加黄洋界保卫战的竟达一千多人。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男女老少齐上阵。儿童们组织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们组织妇女会，大家都来支援红军打仗。井冈山大小五井的各家各户，没有一个闲人。战斗前，我们暴动队员，赤卫队员有的化装成挑粮的农民，深入国民党控制

区，侦察敌情，有的造土枪、土炮，修工事，送弹药。战斗打响后，暴动队员、赤卫队员又直接配合红军，并肩作战。缺乏地雷，群众就用土办法，大量制造加了毒汁的竹钉，埋在黄洋界哨口的山坡上，溪沟里，刺伤了不少敌人。军民们还在山坡工事上堆满了檑木滚石，等待敌军迫近只有几十米时，军民突然奋起，把檑木滚石一齐往下推，打得敌人抱头鼠窜。井冈山群众还主动分散到各个山头，这边敲锣，那边打鼓，另一边吹号，妇女，儿童也挥旗呐喊，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弄得他们晕头转向，胆战心惊。

黄洋界保卫战是井冈山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胜利，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光辉体现。

锐利的武器

井冈山根据地那种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的革命精神，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万丈光芒，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传家宝。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井冈山斗争的光荣传统，正确处理了革命队伍内部的相互关系，官兵同甘共苦，军民团结战斗，靠小米加步枪，夺取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井冈山的光荣革命传统，又成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特权，奋发图强，继续前进的锐利武器。

我们这批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解放以来，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很大的荣誉和很多的照顾，有的同志还出席了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多次幸福地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尽管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但是我们决心不能躺在安乐窝里享清福，一定要继承井冈山革命精神，争取为革命

多作一些事。我们中一些同志主动担任校外辅导员，给红卫兵、红小兵上政治课；有的同志担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毛主席旧居的义务讲解员，把我们在井冈山时期，在毛主席领导下，走过的战斗道路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讲给工农兵听；有的同志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烧炭，养猪，喂牲口、种蔬菜。有一位同志，身体不好，住在敬老院，一件棉衣穿了十几年已经破了，组织上要给她缝一件新棉衣。她说什么也不同意，补补缝缝又穿上。她说："我虽然不能参加集体劳动了，但还可以节约嘛。为国家节约一分钱，也就是对革命作一分贡献。"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永远高举毛主席亲手点燃的革命火炬

邹文楷　马夏姬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而惨遭失败。在敌人的大屠杀面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江河大地。在这革命的关键时刻，是毛主席挺身而出，挽救了革命。他英明地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领导了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创立了第一支人民武装，来到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星火。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底，毛主席身背斗笠、脚穿草鞋，亲自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时的情景。他老人家一来到井冈山就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几千年来，为什么我们贫苦农民当牛做马，吃不饱、穿不暖？毛主席告诉我们，是土豪劣绅压迫和剥削了我们。毛主席还说，零散的稻草轻飘飘，拧成绳的稻草拉不断。广大劳苦农民只要团结起来，勇敢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倒土豪劣绅，就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就能建立自己的政府，当家作主人。在毛主席的耐心启发教育下，我们起来造反了，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赤卫队、暴动队、妇女会、少先队和儿童团。人人手持鸟枪、梭镖、大刀，协助红军作战，从事修工事、守哨口、探敌情、抓特务、送消息等革命工作。妇女和儿童们也为红军送茶水、运弹药、洗衣服、做军鞋、站岗放哨、查路条。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湖南茶陵县城，建立了

我们工农群众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工农兵政府；江西遂川县城里，挑大粪的贫苦农民当上了工农兵政府的主席。在根据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了我们自己的区、乡政权。地主老财被我们打得威风扫地，我们用血汗辛勤开垦出来的土地又回到了自己手中。我们第一次抬起头来，扬眉吐气，当家做了主人。当时，在井冈山根据地里，到处流传着这样一首歌颂毛主席的红色歌谣："北斗星，亮晶晶，毛委员，爱人民。一片爷娘心，恩情说不尽。"毛主席帮助井冈山人民翻了身，井冈山人民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恩情。

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相信和依靠群众。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群众也自觉地、踊跃地参加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记得一九二八年八月，毛主席带领主力部队到湖南桂东一带去了，井冈山只留下不足一营人守卫。敌人纠集了四个团的兵力，妄图乘虚从黄洋界进犯我根据地。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边区军民不可侮，我们团结一致，击退了敌人的进犯。在敌人到来之前，我们的赤卫队员、暴动队员就化装四出，深入到敌占区，侦悉了敌人的兵力及其动向，及时地报告了红军。当时边区男女老少齐动员，人人参加保卫战。他们自动削了大量的竹钉送上黄洋界，并协助红军构筑了五层防御工事，将竹钉埋置在最外层。敌兵一进入阵地踩上了竹钉，刚要弯下腰来拔，另一只脚也踩到了竹钉上。敌军双脚不稳倒在地下时，头上、脸上、身上到处都扎上了竹钉，只好连痛带叫滚下山去。当敌人再次组织冲锋时，我们又把存放在军械处的一门迫击炮抬来，架在高处轰击敌人。炮声一响，漫山红旗招展，遍地号角声响，吓得敌人魂飞魄散，胆战心惊。乘着敌人惊魂未定之际，红军和赤卫队立即组织出击，杀伤了大量敌人，逼得敌人不得不连夜后撤九十多里。"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

（择自一九七六年《历史研究》第五期）

下　　编

给遂川县宣办的复信

陈　正　人

关于一九二八年一月毛主席领导的前委和万安县委举行联席会议的回忆：一九二七年秋九月间，万安中心县委在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影响下，组织发动了万安农民起义。这是江西在大革命遭受失败后，农民武装起义最早的一个县。那时，我在万安中心县委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按照毛主席向万安县委的建议，我回到遂川工作。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地点是在遂川城的一个天主堂里，当时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就住在这个地方。那时候大家称呼毛主席为毛委员，群众称呼毛司令。

毛主席对万安农民起义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使万安的革命斗争能够顺利向前发展，和井冈山取得配合，毛主席曾请万安县委负责同志到遂川城来举行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时间是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地点据我回忆最大可能是在遂川城天主堂里。万安县委的负责同志可能住在五华书院。我回忆，那时遂川县委就住在五华书院（当时是一个高等小学），也可能在五华书院开过联席会议，但主要会议地点是在县城天主堂里。

万安县委到会的成员，有曾天宇（万安农民起义委员会书记，万安中心县委常委，以后在万安光荣牺牲）、刘光万（万

安农民协会委员长、万安县委常委，以后参加了红军，也光荣牺牲）等人。我只记得有他们两位，是否还有别的人，现在记不清楚了。毛主席当时领导的前委，出席会议的成员：毛主席、宛希先、张子清。遂川县委参加会议的成员除我外，还有王瑞麟、王佐农。会议时间不长，大约只开了二、三天。

会议内容：首先是万安县委的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万安党组织发展的历史、现状，农民起义的情况和农民武装的现状，以及今后斗争的计划。万安是大革命时江西农民运动最有基础的一个县，党组织也是有相当好的基础。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在大革命失败后也基本保持下来了。但是，当时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大都在丘陵靠赣江沿岸地区。在当时的斗争条件下，地形不是很有利的，尤其是当时毛主席曾向他们建议，要万安县委把斗争方向逐渐转到河西这边来，和井冈山取得联系，依托更有利的地形再向前发展。

毛主席在这个会议上作了形势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干部的右倾悲观情绪，指出了一定要走农民武装起义的道路，并着重指出了依靠广大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十分重要性。然后向万安县委提出了把建立根据地的重点放在河西靠井冈山这一边的建议，万安县委到会代表同意了毛主席这个十分正确的建议。

会议经过上述的汇报、报告和讨论后，大约二、三天时间就结束了。

毛主席那时住的地方在遂川城天主堂里。他那时只有三十四岁，是青壮年时期，精力非常旺盛，日夜不停地把全副精力倾注在指导当时极其艰难、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上，是他给我们党在全国迷漫白色恐怖的妖雾中指明了航向。

我在一九二七年冬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穿的是：上身一件灰布的短棉袄，对襟布扣；下面是一条薄薄的灰布罩裤，在房

里他不戴帽子，外出时戴上八角军帽，帽上有五角星，发式和现在一样。他吃的是战士一样的饭，盖的是一条薄薄的白夹被。他和同志们个别说话还是向群众讲演，语言总是深入浅出，十分生动，十分扼要，也是十分明确，每次都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深刻印象。他很注意地方语言，说话力求群众化。他在遂川城曾和农民群众讲过多次话，群众都能听懂他的话，因此他的每句话都讲在群众的心坎上。

毛主席当时有警卫员，但可惜我记不起警卫员的名字来。联席会议开会时，没有布置什么会场，那时一切都是简朴的、战斗性的，开起会议来，找上一张吃饭的方桌，有条凳或椅子就用，没有就坐在地上或砖头上，晚上用的是煤油灯，那时遂川县城是有煤油的。

给何挺颖烈士亲属的一封信

肖　　克

十月一日来信，前天才由有关单位转送我，读后知道你是打听你哥哥何挺颖牺牲的经过的，多年来我对这位牺牲了的老战友，每一念及，深为感慨，接到你的信后更是如此。

我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湖南资兴的龙溪洞看到你哥哥的。他那时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党代表（一九二九年冬改为政治委员），五月初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担任三十一团团党代表，是年冬调二十八团党代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在赣南大余县与敌作战负伤，在由大余向东转移的一个夜行军中，在乌迳附近（属广东境）牺牲。时间大概是二十六日。我当时在营工作，另走一路，次日才听到同志们说的。林彪那时就是有严重军阀主义的人，他对政工人员和你哥哥的态度，我在揭发材料中已讲到，如果他当时对革命战友采取爱护的态度，你哥哥是不会牺牲的。由此可见，林彪的堕落为叛徒卖国贼，绝非偶然。历史是最好的裁决者，何挺颖和林彪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反革命，一个流芳百世！一个遗臭万年！

我过去不知道你哥哥是哪里人，也不知道他的家庭、学历、何时参加革命、多大年纪，你来信也没有说及，有暇请告。

给茶陵县纪建委员会的信

赖　　毅

六月十五日来函敬悉。根据提纲所述，现将我回忆起的我所了解的情况转告你们。我先后参加到茶陵县城的部队活动共有四次，这四次的具体情况是：

第一次：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村改编后，由毛主席亲自领导进到宁冈的古城，在那里继续整顿了部队，对那些动摇的对革命没有信心的分子，毛主席公开宣布发给他们路费，遣散回家。毛主席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使湖南、江西靠近井冈山四周各县的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要起来闹革命，而革命的势力并不是被消灭，自己的部队还存在，毛主席就命令我们分兵两路，到湖南、江西各处，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写贴标语、布告等，扩大政治影响。我亲自参加的这路部队是由当时一营的营长黄某（名字记不清了）、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的一营二、三两个连(我当时是在二连当班长),时间大约是九月末、十月初。我们由古城出发，经过湖南省的酃县、安仁到茶陵。在茶陵袭击了县政府，抓到了反动的县长，挨户团跑了，部队在茶陵只是进去了少数人。其余的人都在城外警戒，我们打开了监狱，放了犯人，部队在城内买了熟饭后，就在茶陵县城渡过了河，在河的对岸休息，吃了买来的饭菜，并把县长就地枪毙了，记得

还抓了一个什么高级官。部队到处张贴了标语和布告，是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名义张贴的，布告内容是说明我们是什么军队、宗旨是什么，号召群众都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全文就记不太清了，还记得落款是用第一团团长郭亮的名字。郭亮在大革命时期是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很有影响。毛主席告诉我们用郭亮的名字是为了鼓励湖南省革命群众的革命情绪。使广大的革命群众都知道革命的力量并没有被消灭，郭亮还在我们部队当团长。事实上郭亮同志当时并不在部队。部队这次在茶陵只停了二、三个小时，后即返回了井冈山。

第二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蒋、唐军伐混战，此时茶陵空虚，毛主席命令我们进占茶陵，发动群众，大概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我们上次从茶陵回到井冈山后休息了个把月）。我们从井冈山出发，井冈山的主要部队都参加了这次占领茶陵的行动。团长陈皓、参谋长徐庶，还有个团副韩昌剑（团副不是副团长，类似副官长职务），党代表宛希先，好象还有党代表何挺颖、一营营长黄某，带一营全部（一、二、三连）还有四连，好象还有一个特务连，即井冈山的全部主力部队都参加了。毛主席因脚被鞋磨破了，没有下山。部队经过坑口、湖口到茶陵。此次行动，挨户团不敢与我们接触，我们未打一枪，就占领了茶陵的整个县城，在茶陵大概住了一个月左右，尔后退回井冈山。

第三次：大概是一九二八年春末时期，天气比较暖和了，可能是与朱德的部队会合之后，部队先是占领了江西省的永新县城，后由永新撤出。我们第一团第一营被撤到永新西乡潭田，部队进行了伪装，改打青天白日的旗，由营长袁一民、党代表（名字记不得了）带领一营全部（一、二、三连）经过永新西乡进入茶陵县属的高垅，来到县城。

第四次：一九三〇年，我们部队支援彭德怀部队占领长

沙。从长沙撤出后，我所在的这个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军，经过醴陵、攸县到茶陵，在茶陵只住了一两夜，经过茶陵回到江西，现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交墨就是这次参加红军的。

我亲自参加过的、所了解的、所记得的就是以上四次。是否毛主席或部队还到过茶陵，我也就没有印象了。

下面根据你们列来的提纲所述还需要调查落实的问题，经个人回忆、个人了解的，作个简单的答复如下：

（一）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占领茶陵一月左右的情况。正如来文所述，这次行动主席因脚被草鞋磨破了，主席本人没有下山。但部队出发时，在宁冈的砻市，毛主席亲自给部队讲了话。大意是说：目前军阀混战，各地空虚，没有兵，我们正好去开展群众工作，扩大政治影响。再是说他自己因脚不好，不能随部队出发。因主席不能去，也没有很好的经验，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作群众工作，正如来函所说，每天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另外，只是按照大革命时期的旧形势恢复了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等组织。你县法家述同志就是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外地的，此次部队占领了茶陵以后，回到茶陵县仍让他带农民自卫军的。这次在茶陵成立了一个县政府，派去了一个县长，名谭梓生，完全按照旧的形式派部队送县长到县政府去上任的。这个政府只存在三十来天的时间，只搞了一些还粮纳税等工作（近年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馆内发现有谭梓生的名字，才知道他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据说，当毛主席知道成立了这样一个旧式的县政府，即来信指示不能组织那样的旧衙门式的旧政府，应该改为组织工农兵政府，设主席。于是才改为工农兵政府。政府的主席当时是谭震林。成立了工农兵政府以后，才进行了发动群众等工作。这个政府也只有十来天的时间，我们这次在茶陵前后只有一个月左右，当时部队主要是住在中学校里面。这中间我们打了两次仗，一次是八县联防的

挨户团罗定部队来袭击我们，我们就同他们打，把他们打败了，只有三连的一个班长牺牲了，其它没有什么伤亡。再一次是，因当时的蒋唐战争已结束，唐派遣吴尚部队一个团进攻茶陵，经激战一天后，晚上我们被迫撤出茶陵。

当敌吴尚团进攻茶陵时，我守井冈山，后转去湖南的第三营是中午返回茶陵的，参加了战斗，进行了增援，并于是当晚与一营一起撤出了茶陵县。

在茶陵一个月，团营连领导干部中一些旧军人出身的军官，对革命没有信心。他们不做群众工作，这时有的逃跑了，团长陈皓企图把部队带到湘南去投降范石生，宛希生为首的多数干部则坚持反对，正争执不休时，在万分危急时刻，毛主席下山来了。据说主席还没有到茶陵天就已经黑了，住在离茶陵十几里的一个老百姓的家里，闻知部队撤出茶陵又发生紧急情况后，就赶来寻找部队，把部队带回井冈山，及时处理了这一严重的情况。

当部队撤出茶陵后，宛希先同志坚决要把部队带回井冈山，而陈皓等人则要把部队带往湘南，双方在途中争执不息，部队在路上停了几个小时。这时毛主席赶到了部队，次日大概到了湖口，就集中部队公布了陈皓、韩昌剑、徐庶、黄某等人企图带部队叛变投敌的罪行。毛主席查明情况后，就逮捕了他们。部队撤回宁冈，到了砻市，又集合全部队宣布了他们的罪行，把他四个坏分子立即枪毙了。

处理叛徒后的新任团长，据我回忆是张子清。

（二）占领永新城有若干次，其具体的时间、次数是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有一次打到城外没有攻进城去。当时二十八团的团长是王尔琢同志。林彪当时是二十八团的一个营长。

关于高陇战斗的情况：大致是一九二八年春末夏初，当时是伪装去的，宣布的主要任务是毛主席要我们到高陇搜集湖南

省报等各种报纸，供主席分析研究国内外形势用，记不得有配合战斗的事。我们去时，高陇是没有敌人的。我们占领高陇住了几天后，才有吴尚部队来进攻我们。经半天的激战，敌众我寡，而撤出了高陇，经永新回井冈山。营长袁一民同志在这次高陇战斗中牺牲。

以上的情况，我回忆到这里。

另外，参加当时茶陵县政府工作的有陈士渠同志。他是以士兵代表参加这里的政府工作的。陈士渠同志现在北京工程兵司令部工作。他对当时的政府工作，可能比我更了解一些。

两次占领茶陵县城和后一次进攻高陇，谭希林同志都参加了。他当时是一个排的排长，到高陇时是一个连长。现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因病休养，他可能对详细的情况更清楚些。特此函复。

给茶陵县纪建办的复信

赖　　毅

关于毛主席在茶陵革命活动的具体事迹，因为时间太久了，现在很难准确地回忆起来，现见你们来信所询各点，根据我所回忆起来的大致答复如下：

1、部队从茶陵撤出的那天晚上毛主席究竟在什么地方追上部队的，这一点我个人是根本无法肯定。我只记得当晚部队从茶陵县城撤出还没有走几里路时，就在路上停下来很久没前进。当时许多人都很着急地追问前面为什么不走？因为那时还不断听到敌人的零星枪声，所以大家更着急。次日上午大概是八、九点钟的时候部队才到了湖口宿营，后才听到我们班的副班长刘炎同志（他那时任党的小组长）说昨晚上离茶陵不远的地方部队停下不走的原因是：以团长陈皓为首的一派坚决要把部队带到湘南去投降国民党的军队，而另以宛希先、何挺颖等同志为首的一派则坚持要把部队带回井冈山去，因为互相争执不下才使部队停止不前。后来幸好毛委员来到了才把部队带回来了，但我在湖口集合部队看到毛委员讲话以前，因为是晚上又在行军中，并未亲眼看到毛委员。所以我不知道毛主席究竟在哪里追上我们部队的。那次我们部队停下的地址据我记忆是湖口，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我记得我们部队是上午八、九点钟

时到达的，那天正好是湖口赶圩，很多人做买卖，因为我们家乡没有这种习惯，我又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我就很惊奇，为什么这样一个小集镇子有这么多人做生意，而且许多货都摆在地下而不是摆在铺子里面。根据你们来信所述，我记得我们部队那天晚上撤出来到湖口我记得走的都是平路，没有走什么山路，依我的回忆，到的地方肯定是湖口而不是什么瑞口。

2、部队到湖口的第二天，毛委员讲话，据我的记忆，好象主要的是对我们部队住茶陵一个月工作优缺点的评价，鼓励和批评。对陈皓等企图投敌的事件也讲了。但我好象没见到当场逮捕陈等反革命分子。好象陈皓等反革命分子也没有到场，是不是早已把陈皓等人扣押起来了。我只记得在砻市是集合部队由毛委员当场宣布了陈皓等反革命罪行后，当场将陈皓等四人枪决了。

3、那时我们部队穿整齐一律的灰色军装，戴八角帽，打绑带。还有每人一个灰色干粮袋(即现在那种挂包)，灰色子弹带，左臂带红布袖章。是撤出茶陵后由毛委员亲自率领到遂川，放手发动群众打土豪筹了大量的款子后，才在遂川县城制的这些灰色服装。我记得每人都发了两套军装，而在这时以前包括在茶陵时，虽然穿的基本上还是灰色军装，但很不划一。而且都是国民党军队那种样式的。这些军装既有武汉警卫团穿出来的，也有平江、浏阳、湖北的崇阳、通城各县的自卫军穿出来的。还有部分是修水定制补发的。后来因天气冷了，还有不少穿的是井冈山自己动手缝制半军装半便衣式的杂色的棉衣。三营回到茶陵时穿的则是在湘南时搞到国民党军队的草绿色的军衣。我记得我在那时见到的毛委员总是穿黑颜色的（湖南称为青布）短便衣，穿草鞋，留长头发，衣服似有点象当时所谓学生装，但从来没见到毛委员戴帽子和穿过长衫子；也从来没有见到毛委员手上拿过什么棍子，那时部队里也好象根本

没有马，后来的马是打仗缴获敌人的。

4、部队到湖口团部住的是哪栋房子，我完全不知道。

5、陈皓等四个反革命分子姓名、相貌现在回忆起来好象就是：陈皓、似乎是湘西什么地方人，个子不太高。团副好象是韩昌剑，是个高个子，那时我才离开家乡不久，还不能识别口音，现在想起来，他好象有点带湖北的口音。徐庶只记得个音，究竟是哪个字一点也不敢肯定，这个人好象不太高也不太矮，稍瘦一点，很少听他说过话，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另外有个姓黄的营长，是中等个子，稍胖点，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6、在高陇战斗中牺牲的营长叫袁一民，是陕西省人，这个人好象谭希林同志与他很熟识。

以上是我个人所回忆起来的大致情况。

给茶陵县纪建办的信

谭 家 述

一、我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打开茶陵，带队的是一师一团一营营长黄子吉，部队从砻市出发，经过坑口、桃水到茶陵，主要战斗地点在乱葬山一带。

二、第一次打开茶陵未建立工农兵政府，第二次打开才建立。

三、我军离开茶陵的原因，据我所知是因敌人反扑，敌强我弱。

四、毛主席到湖口是十二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路线是由砻市经坑口到湖口，住宿地点据说是在湖口市一家姓王的地主的大房子里。

五、毛主席赶上部队的地点是茶陵的湖口，部队集合地点是湖口墟背后一块旱田里头，毛主席在部队集合好后讲了话，大意是：革命形势很好，军阀混战，革命群众经过挫折，觉悟提高了。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我们屁股坐在罗霄山脉，两脚伸出江西、湖南。向西有茶陵、酃县，向东有遂川、万安、泰和，向南桂东，向北永新、莲花，周围十几个县，上千万人口。我们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红军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红军可以发展到一百万人。

并说我们内部有动摇变节分子，宣布了团长陈皓、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是反革命，他们要带部队投降方鼎英，按照革命的纪律将他们逮捕，同时宣布了由袁一民代理团长。毛主席讲话后宣布出发。代理团长宣布部队行军序列。

六、在砻市处决了陈皓等人，由宛希先、何长工主持开大会，宣布他们的罪状，当即执行了枪决。

给桂东县委的一封信

龙开富

你们带来的纪念毛主席来桂东迎还红军大队四十周年筹备会秘书组编的第一期《大会专刊》，我看了。你们对毛主席在桂东的伟大革命活动作了认真地调查研究，写得好。事情的经过，都比较符合事实。

四十一年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江西、湖南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秋收起义队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率下，冲破重重艰险，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从此，中国开始有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一九二八年三次来到井冈山下的桂东。我记得两次是从砻市出发，经沔渡、水口到桂东。第三次去桂东，很多人都认识我们了。毛主席到桂东亲自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率领桂东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斗争。毛主席当时去桂东的意图：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要把桂东拿到手，把桂东的群众发动起来。如果桂东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可作为井冈山的一个前哨，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同时，湖南是有革命基础的地区。我

们在桂东开展革命活动，扩大革命影响，使湖南和全国人民知道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不但存在，而且在迅速的发展、壮大，可以推动耒阳、桂阳、郴县、宜章、界首，乃至湖南全省和全国的革命向前发展。

毛主席在桂东开过很多次会，我记得，在沙田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部队有一百多人参加了。毛主席讲了话，讲的原话我记不清了。记得毛主席讲了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劳苦人民打天下的。讲了我们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地主剥削穷人，收地租、利息加三加四加五，把穷人压迫剥削得抬不起头来。我们不起来闹革命，一辈子也不能翻身。毛主席的话句句讲在农民的心坎里。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打着红旗，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了，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打土豪打劣绅，分田地，分东西。把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劳苦大众，革命闹的热火朝天。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沙田很快成立了工农兵政府。毛主席指示：光靠军队不行，要发动群众，创建地方武装，要普遍武装工农，要发展农协会、工会、儿童团，建立红色政权。很快地成立了游击队，游击队开始十几人，很快发展到三十多人，有力地开展了武装斗争。当时桂东的反动派何其朗，很坏。压榨、迫害人民很厉害，人民恨之入骨。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军民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先吃小的，后吃大的，开初打一个营，再打一个团，逐步发展，很快消灭了反动武装何其朗全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关心群众，时时依靠群众，最相信群众，和广大群众心连心。毛主席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当时不动富农），严厉打击地主，特别是恶霸地主。地主的财

产都是剥削农民的血汗，一定要分还给农民。毛主席到桂东找农民谈话是很多的。毛主席强调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意义，谈得很具体。如：怎么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发动、组织、武装群众；如何分配土地，如何进行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巩固政权；如何进行党的建设；如何部署战斗，开展革命斗争等重大问题，都谈得很具体，很生动，很精辟，群众一听就懂，牢牢记在心里，毛主席的话象明灯，照耀着革命的前程，指引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主席在沙田还给部队上政治课。教导我们：军队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成立小组，军队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团结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红军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红军要纪律严明，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改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是为人民解放而打仗，而战斗的，红军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军队。部队的士气很高，战斗力很旺盛。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部队保证打胜仗。毛主席指到哪里，部队就打到那里。

在桂东，毛主席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收集"五四运动"、"义和团"等方面的书籍，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五四运动"，什么是"义和团"，不管什么书都搞来，毛主席看了把不要的烧掉，要的留下。后来毛主席告诉我"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义和团"是农民运动。毛主席还亲自教我学政治，教我识字。当时我只认识字，不懂意义，毛主席就耐心地教我。毛主席对我这么好，我永远也不会忘的。

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

陈　正　人

一、毛主席选择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呢？毛主席是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具体形势出发，选择了湘赣边界即井冈山地区作为农村根据地的，一方面毛主席早已了解井冈山地区的情况。主席知道，井冈山地区即湘赣边界地区的农民运动，党的组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比较有基础，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也知道井冈山曾有过武装起来的农民自卫军。主席还认为井冈山地区是当时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主席对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都很了解。主席历来是很强调调查研究的，主席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明远见，从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即以农民的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这个特点出发，决心要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对井冈山情况很早就了解，有过调查研究。另外，井冈山和秋收暴动的地方——平、浏一带在地理上比较接近，井冈山的地形也是很险要的，这也有利于当时的革命斗争。

二、毛主席和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湖南暴动时有二句这样的口号："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人！"这是典型的盲动主义的口号，也正是左倾盲动主义的突出反映。针对他

们的这种盲动主义路线，毛主席提出，杀人、烧屋会失掉群众基础。主席是不主张烧屋的。他说：反动派的屋留下分给贫苦农民住不更好吗？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我军离开遂川时，当时有人主张把遂川县城的天主堂烧掉，主席也不同意。主席说，烧了天主堂，并不能打破群众中的迷信，要破除群众中的迷信，是要经过革命斗争和对群众反复的教育。"左"倾盲动主义是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少数人的主观愿望搞暴动。结果，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反而帮助了敌人。主席坚决反对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盲动主义。主席认为武装起义（武装暴动）的方针必须是坚决的、积极的。但首先要积极创造条件，要有群众基础，要根据当时主客观条件选择有利的起义时机，要有长远计划的去积极争取胜利，保证胜利。

上井冈山以后，在政治、军事等问题上，是存在两条不同的路线之争。

1.首先最主要的是表现在要不要建立根据地这个根本问题上。主席非常注意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主席认为为了积聚力量，准备条件，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首先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依靠农村来包围城市，即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通过武装斗争为主的斗争形式，夺取全国政权，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主席首先主张要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主席曾讲过，军阀可以割据，为什么我们不能割据，这句话虽然很简明，道理却非常深刻。主席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特点，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又是几个帝国主义分割统治，通过新旧封建军阀来统治的这样一个互相割据不统一的国家。各派军阀虽然可以实行割据，革命势力在未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是完全可能的。这

是主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主席认为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边界，向前发展，一面可威胁江西赣江的下游，如吉安、南昌等地，另一方面可威胁湖南的衡阳、长沙等地，可为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创造条件。井冈山各方面条件都有利于当时在那里首先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以，主席坚持要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反对跟着湘南特委跑，脱离井冈山根据地去打湘南。同时，主席认为要建立根据地，必须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要帮助群众建立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地方武装，这些工作都是比较艰苦的。在主席这个思想指导之下，三十一团不仅会打仗，还会做群众工作。一九二八年元月，主席在遂川时，就制定了一个作社会调查的调查提纲。当时，主席的部队一到哪里，就根据调查提纲进行社会调查，并且很快把各项社会问题都搞清楚，主席还强调，部队要懂得群众语言。那时部队有个宣传队，拿个铁筒子，根据宣传要点，到处写标语，发动群众搞斗争。这样，很快把群众都组织起来了。主席还提出要把缴到的枪发下去，发给有觉悟的贫苦农民群众或党员同志。

2.表现在军事路线上首先要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即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部队纪律，是军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区别人民军队和旧军队的标志之一。也是毛主席建军路线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主席领导的三十一团是秋毫无犯的，纪律非常严明。三十一团到那一个地方，都受到群众的尊敬，都受到群众的拥护。

有的同志却反对主席的意见。他们认为在湘赣边界建立政权影响不大，他们有流寇思想，到处搞流寇主义，今天打这里，明天打那里，不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党的组织。他们不愿过艰苦生活，不做群众工作，认为打了土豪没收了东西，

生活可过好些。所以开始的时候，二十八团不会做群众工作，很明显，搞流寇主义一定要失败的，是非常危险的，敌人来了就会使自己没有依托，没有群众保护。有的同志还不愿意，发枪给群众，不了解建立地方工农武装的重要性，也不懂得在发展地方武装基础上才有利于发展壮大红军主力的道理。主席讲，你越是不发枪武装地方工农群众，你的枪就越少，红军主力就更难壮大，因为你今天发了几支枪给工农群众，他明天就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十几支、几十支、几百支枪。

在这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总路线的问题，是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是决定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建军路线的问题，是跟流寇主义、军阀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三、改造袁、王部队

袁文才是个中学生，出身较富，可能原是地主家庭，客籍人，在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并在一九二七年赴南昌参加过江西省党代会。当然，袁文才的入党，并不是说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由于当时和土籍的统治阶级有矛盾，有一般的民主革命要求。袁文才个人英雄主义很厉害，自己有点见解，个性也比较固执，有点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纪轻，本事不大。因此，他们之间有一些矛盾，不大合得来，但是，在反对封建势力，反对土豪劣绅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是相同的。王佐也是客籍人，裁缝出身，和袁文才结拜了兄弟，王佐在主席上山前七、八年就当了“土匪”，与周围各地豪绅地主为敌，经常出去“吊羊”，抓一些有钱的富人来，迫使他们出钱来赎命。他“吊羊”也很有策略，抓远的不抓近的，井冈山周围的豪绅也很痛恨王佐。王佐家里很富有，井冈山上他原是统治者，当地

人都称他为“南斗哥”，他的名字又叫“王南斗”。

主席上山以后，为了争取改造袁、王，除了对袁文才做了许多工作外，还对王佐做了许多工作，用通俗而意义深刻的话来帮助他，启发他，还给了他一些枪。给他枪，起了不少作用，使他相信我们，把我们看作是帮助他进步的朋友。王佐本来有许多田，山上一千多亩水田都是他的。后来，主席跟他讲，保持土地菩萨是不行的，不要相信真有什么土地菩萨。土地是农民开发出来的，不让农民得到耕地，农民会不拥护我们的，我们也会站不住脚的，要看远一点。主席还讲，你家里不愁吃不愁穿，要那么多田干什么，这样会和农民对立起来。以后，他听了主席的话，把土地分给农民了。主席为了改造袁王部队做了许多工作以后，袁王的部队里也派进了党代表。王佐部队共派进了三个连党代表、一个营党代表，做政治工作，在他的部队里发展党的组织。在退出遂川（即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后，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编成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部队的成份也逐渐起了变化，把一些年轻的农民吸收进来，把一些“老油子”送回地方去安置，同时，王佐在一九二八年春还入了党，是主席批准的。

一九二八年冬，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来井冈山。“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二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主席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作初步传达。会上主席还逐段逐句地念了“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这二句话时，由于当时王佐也在场，主席忽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主席当时考虑决议中这条政策，在井冈山对袁、王怎样执行。后来，主席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我，还有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等参加）。主席说，决议是对的，但要根据具体情况执行，要对袁文才、王佐作具体分析。

主席认为，袁文才这个人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这个人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豪绅对立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主席还谈到，由于王佐得到了改造，欢迎和拥护了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下了家（我们的红军医院和修械处等机构都设在那里）。根据这些情况，主席认为王佐也不能杀，没有理由杀他。

在会上，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死对头，主张杀。后来，主席做了许多工作，反复强调执行"六大"的决议，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应机械地执行。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并为了更好地改造他们二人，决定把他们二人分开，让袁文才跟随部队向赣西闽西进军。王佐留在井冈山，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宁冈县委当时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也是土籍人，思想意识不大好，和袁文才合得来），会上也决定他随部队走。

袁文才后来随部队行动，在进军途中，却又跑回来了（刘辉霄也跑回来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后来才知道他是怕随军行动生活艰苦，缺乏斗争的坚定性。在这一方面，袁文才是有错误的。

一九三〇年一、二月间，彭德怀带了红五军到了永新，驻扎在县城里面。彭把袁、王部队也调到了永新。这时有人又把袁、王的问题提出来了，并主张要缴袁、王的枪；同时王怀和龙超清也竭力主张杀袁、王。结果，在一个晚上，枪杀了袁文才，王佐逃跑淹死在一条河里。王佐死后，其弟王云龙就叛变投敌，敌人给了他井冈山伪特区主任的名义。杀害袁、王那天晚上，在我听到打枪后，别人才告诉我这个决定。那时我已不在特委工作，到安福任中心县委书记。

一九三〇年八月间，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主席，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主席，主席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一九五〇年左右，那

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有时向主席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也总提到袁、王的事情。主席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王佐这个人是有一定功劳的，主席到井冈山后，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和当地豪绅封建势力是对立的。主席到井冈山后，王佐的部队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改造。袁文才有个人英雄主义，一九二九年还私自逃跑回来，这是他在政治上一个严重错误，应该受到批判和处分，我现在回忆，当时曾给过他一个党纪处分。但杀袁文才是不应该的。

四、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和领导下解决"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样一个关系中国革命胜利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哪一个人提出来的，而是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同志的一种思想，因为在全国白色政权中间建立红色政权，这在中外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相当一部分人缺乏信心，怀疑红色政权能否长久建立。主席在这次大会上，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运用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主席全面发展马列主义最生动、最令人信服的伟大创造、伟大功绩。主席的思想是十分伟大的。毛选上选登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著作虽然不多，但是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包括建党路线、建军路线里面却都有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能不能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能不能以军事斗争即武装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建立工农割据（即工农红色政权）。对于这个问题，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都没有讲过。即依靠农村包围城市，走由农村到城市的革命道路，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是否走得通？如果只靠现成书本，那就糟了。马克思的书，恩格斯的书，列宁的书，斯大林的书，都找不到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四十几年前的事，主席如此及时地、无比英明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理论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根本问题，更深深体会到主席的伟大。主席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主席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斗争，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理论上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极其复杂极其重大的革命理论问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是具有伟大世界意义的。主席在边界党的一次大会上在解决中国革命这个根本的理论问题之后，随即又进一步明确确定要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这一斗争目标，为全党、为中国革命明确地指出了胜利方向。根据主席确立的这个政治战略部署，六月以后，主席就很注意建立永新根据地，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湘赣边界根据地打下基础。

在边界党的"一大"上，还讨论了分配土地的问题和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问题，还注意到了政权建设和工农武装建设的问题，还提到了发展、整顿党组织的问题。

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形成了文件，但是以后找不到了，主席离开井冈山时，曾把六、七箱或十几箱（铁皮箱）文件放在王佐那里。解放以后多次组织过人寻找，没有找到。

五、新城战斗

新城战斗，是敌人第一次"围剿"的期间进行的。新城战斗是对敌人的一个袭击。敌人镇压了万安暴动以后，调动了部

队进攻遂川。这时，我们主动从遂川撤出，袭击新城（敌朱培德部下也有一个二十八团，是他的精锐团，战斗力较强，当时我们一般避免和此敌打）。从遂川撤出打新城，时间间隙是很短的，但也不是马上就打的。途中经过黄坳、茨坪，在茅坪休整了一、二天，然后再打新城。由于我们的行动消息在群众的掩护下是能够封锁起来的，虽然走了那么多路，又翻了一座大山，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新城战斗有很大意义，鼓舞了士气，并且打下了新城，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我们地方武装（遂川）在五斗江战斗中担任探听消息、带路和运送伤病员等任务，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打下五斗江以后，直奔永新，占领永新。

在井冈山上，三十一团是很会打仗的，既会进攻，更善于守。

六、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遂川时（即一九二八年一月）就听到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到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在遂川还听到主席提出的"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部队到一个地方把敌人打垮以后，不是呆在那里不动的。如第一次攻占遂川后，毛主席只留下团部和特务连在城里，其余全部分作三路到农村里去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在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毛主席率领部队把黄坳、大坑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主席高瞻远瞩，有一个长远计划，想把遂川的黄坳、大坑、上七、下七、草林一带和井冈山连起来，逐步把湘赣边界六个县都搞成根据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在永新，主席还想把永新搞成一块主要的根据地，后来以九龙山为中心，创建了湘赣边界第二个根据地，因为那时宁冈已经成了巩固的根据地，遂川和井冈山相连的部分也有根据地，酃县和莲花也成了游击区，所以，在攻占永新后，集中力

量，争取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力发动群众，平分土地，着重建立永新根据地。永新人口较多，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有宁冈县作后方，有依托，敌人来了也好对付。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主席计划争取一个月把永新根据地搞起来，从而创造大块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主席还提出，一定要在一个月内把永新靠近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搞好，在宁冈，除了砻市和新城一带有时敌人来窜犯外，其余的地方都属于我们的，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比较巩固。但光有宁冈县是不够的，必须继续扩大根据地。宁冈新城翻过七溪岭就是永新，条件比较好，当时就是要把永新和宁冈连成一片。主席有远大目标，首先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因那里条件很好，中段建立以后，还准备向北段或南段发展，即为夺取湘、赣、鄂三省政权作准备，也就是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作准备。

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及宽待俘虏

在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这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禾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打烂东西要赔。”那时也听到过三大纪律。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执行六项注意的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主席在井冈山每到一个地方，一方面搞社会情况的调查研究，同时也熟悉、了解地方语言。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时候，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工农兵政府的政纲，有三十多条，请主席审阅时，主席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作了修改。如“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又如“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这样群众就容易懂了。在遂川，主席曾经先后在两次群众大会上讲过话，一次是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另一次是遂川县赤卫队的成立大会（两次会都是一

九二八年一月在遂川县城召开）。在前一次大会上，主席讲我们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老百姓才能自由，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主席还讲我们工人、农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是能够坐天下的。最后主席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要自己拿起枪来，和工农军队一起跟敌人作斗争。主席每次讲话，时间都不长，只有十几分钟，内容很扼要，语言群众都听得懂，道理却极深刻。主席虽然是湖南人，但在会上也讲了许多遂川地方语言，主席总是和群众心连心，是最能体会群众的思想感情的，所以主席讲的话，群众都能懂。

主席上井冈山以后，就提出了宽待俘虏这样一个政策（在遂川时，也听到对于敌人的俘虏不能杀）。那时，俘虏愿意回家的，就发给路费；愿意留下的，就欢迎当红军。当然对于一些兵痞，我们是不要的，对他们做过政治工作，进行宣传教育以后，发路费让他们回家，对于一些年轻的，成分又好的，我们让他留下来。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军队里一条是讲民主，士兵组织士兵委员会，一条是讲官兵平等。所以，国民党的俘虏来到我们部队里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在我们的军队里士兵有说话的自由，还可批评长官。这些，对他们触动很大，很快也就接受了我们的影响。

八、发动群众与建立党的组织

发动群众有一个过程，是十分艰苦的工作。开始还不能分田地，因为一则情况还不了解，二则群众也不敢要。为了发动群众，一九二七年冬就组织搞年关斗争。那时快要过年了，正是地主逼债的时候，由于地主逼债，有许多人上吊死了，被逼得家破人亡。利用这个机会，搞年关斗争，强调废债，焚毁契约，还没收土豪财物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通过这样的斗争，

有一部分群众先站出来，是勇敢分子。主席指导群众运动是很有经验的。他了解：有些先站出来的，不一定是真正的贫苦农民，而往往是一些游民，虽然他们有时也会起一点作用，但是，还不能把游民分子发展成为党员，必须进一步发动，并且进行调查研究，找到那些是真正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把他们发展成为党员。如果部队马上就走，那么也不一定急于发展党的组织。比如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我们退到黄坳后，过了一段时间，对群众情况了解后，才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那时发展党员是秘密的，秘密建立党的组织，不公开。有三个党员即可建立一个支部。在游击区里，党组织更是秘密的，以防止敌人的破坏。初建党组织时，党内也混进了一些投机分子，有些富农或富裕农民乘机混入党内，这是违反主席建党路线的。经过发动群众，查明情况，就把他们清洗出去。一九二八年一月，主席率领部队在遂川时，县城里只留了一个连，其余都到乡下做群众工作。发动了群众以后，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还把少数的枪发给那些勇敢的、积极的贫苦农民，帮助他们组织地方武装，建立乡暴动队，或者动员他们自愿参军，补充正规红军。

再谈一下发动群众这个问题。在未进到武装起义之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只能进行秘密活动时，有的共产党员，利用小学教员的社会地位，采取秘密方式，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这样，利用教师这个职业，一则可以使自己得到掩护，同时，又可以做党的秘密工作，做发动群众的秘密工作。办农民夜校，是我们进行工作的一个方法。这种方法，一般不会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通过它，我们进行文化工作，联系了群众，教育了群众。在夜校里，开始要和群众交朋友，和他们交心，使他们了解我们，使他们相信我们。群众相信了我们，一方面他们什么话都会向我们讲；另外我们讲的话，他们也听得进去，可以逐步进行宣传。当群众愿意听我们

话的时候，第一步跟他们进行打破“宿命论”的教育，帮助他们破除那些“听天由命”、“命中注定”、“八字不好”等迷信思想，让他们懂得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这是对群众的启发教育，是很重要的一步。迷信思想破除以后，第二步就是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树立斗争胜利的信心，使他们懂得，穷人的力量是最伟大的，我们穷人是能够打天下、解放自己、坐天下的，在宣传时，要学会使用群众的语言，根据他们的切身利益，针对他们的思想状况，来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经过这些教育后，既联系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也取得了群众的拥护。有了群众，就要具体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领导他们开展斗争。开始也可能是减租减息，作一些日常的局部斗争，逐步进到更有组织的抗租抗息，反对反动派的政治压迫等等斗争。揭露封建地主阶级霸占耕地，实行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这是贫苦农民所受各种苦难的根源，使农民群众逐渐觉悟，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封建地主的反动统治，农民才能翻身作主人，才能解除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在斗争中，应该提什么口号，应该开展什么形式的斗争，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主客观力量对比条件，总之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只凭主观意愿随意作轻率的决定。

经过减租减息以及抗租抗息等等斗争，增强了农民的斗争信心，也锻炼了农民。这时，农民的觉悟越来越高，党的组织也越来越发展，党在群众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时，我们斗争的策略目标也要及时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就有可能由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发展为公开的武装斗争，时间长短，速度快慢，不能由主观愿望来决定，必须遵照主席的教导，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些工作，都不是很简单的，是相当艰苦的，情况也是不断变化和十分复杂的，要求我们不怕累，不怕

苦，不怕牺牲。

遂川西庄王家的群众工作在大革命和大革命失败后，是做得比较好的。那时有一个党员，叫王瑞麟（一九二五年底或二六年初入党，一九二八年任遂川县委宣传部长，后牺牲，是个烈士），根据主席思想，也就是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传授的关于如何进行农民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在那里做了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使得西庄王家成为遂川农民运动比较好的一个典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王次谆，湘赣边界特委常委王佐农，以及其他一些领导干部，都是西庄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党员。遂川游击队里，有相当一部分队员是西庄人。遂川游击队班长以上的干部，也大多是西庄人。大革命时期，遂川有几十支枪。后来，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要枪杆子，压制农民自卫军，到了蒋介石向全国的革命势力实行反扑后，结果遂川农民自卫军的枪大部被缴去，最后只存下了六支枪（都是好的，汉阳造的）。这六支枪，就是保存在西庄。当时西庄是出干部的地方，也因为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在这里屠杀了不少革命群众。

在井冈山上，农民运动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按照毛主席在农讲所中的教导去做的，完全是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办事。在大革命时期，全国都向往农讲所，想到那里去学习，接受毛主席的教育。许多想革命的青年，都有这样的愿望。工人运动也是这样，是在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下开展的。

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时，对于阶级成分，毛主席也很强调，但不是唯成份论。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对于其中真正表现好的，愿意参加革命的，主席还是欢迎的，还是争取、团结、改造他们的。那时还建立团的组织，一个县里，有县委，也有团委。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参加共青团（叫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有儿童团。

再谈一下县委和特委是怎样工作的。

那时县委组织机构很简单，只有组织部、宣传部、还有妇女运动委员会。以及加上工人运动委员会。在政府机关里有党组织，对武装的领导则有军事部，在井冈山上，党的各项工作完全围绕着武装斗争总的要求，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一切为了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日常考虑的是怎样战胜敌人，怎样打破敌人的进攻和“围剿”。实际上也就是，怎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群众工作，围绕着总的目标，开展各项斗争。为了完成这个总的目标，县委要抓土地的分配，帮助群众建立土地委员会，使农民能够得到土地。同时，县委要派出干部去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暴动队和赤卫队，建立政权机构。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县委还要抓发展党员的工作，发展党员，不是一批批地发展，而是一个个地发展，完全按照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来行事。在井冈山上，进行党的建设的过程中，毛主席非常强调阶级路线，强调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毛主席认为一定要把贫雇农吸收到党内来，防止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当然，在下面具体执行中间，由于领会得不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这说明贯彻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有个反复的过程，有个不断提高自觉性的过程。

在井冈山上，由于交通不方便，特委开会次数不多，大部分工作还是靠县委去做。有时，特委派一些人到各地巡视一下，看看各县贯彻特委的决议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或者还碰到什么问题没有。特委的组织机构也很简单，有组织部、宣传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

九、政治思想建党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工农红军里，一开始就规定了党的支部怎样做工作，编写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教育材料。这

些教育材料也拿到我们地方上对党员进行教育。我们办过党员训练班，是短期的，有时办一、二天。在党员训练班里，当时是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幸福的党，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是要领导穷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让工人、农民坐天下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对群众讲话时就说是为穷人谋幸福的党，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是要领导穷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让工人、农民坐天下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讲话时就说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要组织穷人起来打天下的。还讲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在训练班里还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讲工人、农民是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主阶级夺去了山、田（那时不说生产资料，这些名词群众也听不懂，山、田就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靠了这些，地主才能剥削和压迫我们。我们要翻身，就要打倒地主这个剥削阶级，要打垮压迫穷人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还讲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帝国主义和军阀、地主豪绅阶级是一家，要打倒它们，贫农才能翻身，这样，就讲到了为什么要革命，以及怎么样革命，并且还强调了斗争要坚决，革命要彻底。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斗争是非常艰苦的，要有高度的牺牲精神。有些人斗争不坚决，在敌人面前屈服了，所以考验党员有没有决心斗争下去，就显得特别重要。斗争时时刻刻都在考验共产党员，要求共产党员经得起考验，在党员训练班里，还讲破除迷信，因为在农村里，封建势力很强，宗族观念很重。所以在训练班里讲不靠天，不靠地，不靠泥菩萨，只靠自己。主席在向农民讲话时，经常讲没有什么神，没有什么菩萨、没有什么“八字”，要靠自己，那时要破除群众的迷信观念是很重要的启蒙教育。在训练班里，还讲党的纪律，要求党员必须做到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绝对忠实。在训练班里，也讲当时的形势，在

一九二八年五月以后，还讲“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讲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天下一定能够被我们打下来的，以树立大家的信心。在训练班，讲的另一个内容是，讲党的方针、政策，讲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做群众工作，和群众密切联系，以及怎样发展党员。总之，那时主要讲党是干什么的，讲要为工农，要干革命，要搞武装暴动，打倒豪绅地主、国民党反动派，要工农自己坐天下等等，实际上也就是讲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除了讲民主革命阶段党的纲领以外，对共产主义也作一些通俗的解释，指明将来的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一九二八年春就举办党员训练班。那时办党员训练班，完全适应战争的环境，办短期的一、二天或者三、五天一期，规模也不大，每期参加人员有二、三十人，每期讲一、二个问题。办党员训练班完全由县委自己派人来进行教育，不象现在党校那样，有专门的教员，也有专门的校舍。

这里再讲一下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问题。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地主阶级搞起来的。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土、客籍矛盾在宁冈特别严重。那时土籍和客籍学生不能进同一个学校念书。客籍人被土籍豪绅封建势力压迫，把客籍人看作是外来户，低人一等。土客籍的矛盾，本质是地主阶级和客籍农民之间的矛盾，但却把阶级矛盾掩盖着，不利于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地方主义也是封建经济的反映。有了地方主义，各地革命斗争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这是危险的，只有利于阶级敌人。主席不断对地方党的同志进行教育，指出：地方主义、土客籍对立，这都是帮助敌人的，违反工农阶级利益的。土客籍矛盾的危害很大，敌人常常利用这个矛盾挑起械斗，破坏革命势

力。

主席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首先在党内进行教育，指出：土客籍对立、地方主义，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并且明确指出：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地主阶级搞起来的，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要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毛主席在井冈山经常讲国际主义，这是主席的一贯思想）。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这些都是和共产党的思想不相容的，我们只能分谁是那一个阶级。其次还靠敌人来作"反面教员"，敌人来了，不管你是土籍、客籍，也不管你是哪一个地方的，凡是革命的就一律镇压，屠杀，这样就教训了大家。这就是说要在斗争中进行教育。在实践中，由于闹土客籍对立，闹地方主义，在敌人进攻下，吃了亏得了教训，才真正容易明白为什么不能搞地方主义，不能搞土客籍对立。

主席很注意既要培养土籍革命干部，也要培养客籍革命干部。在客籍人多，土籍人少的地方，要设法把客籍干部培养上来，乡政府主席或支部书记，要培养客籍人来当。建立、发展党组织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客籍中贫雇农中的党员，在经济上也要注意土客籍群众一律平等，如分田时，不能分坏田给客籍农民。总之要强调土客籍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平等。

十、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成立的。三十一团第二营，即是茶陵赤卫队改编而成，没有多少枪。以后茶陵县委

改为茶陵特区，由谭思聪同志任书记。酃县工农兵政府，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成立的。我们从遂川撤出后，曾去过酃县一次。莲花县工农兵政府是什么时候成立，就不太清楚了。

在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上，还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时，出过一次布告。边界工农兵政府一直设在茅坪，没有迁往别处。边界政府没有什么机构，只是起政治号召的作用，以后也没有出过什么布告，或颁布过什么法令，活动也很少，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主席是毛泽东同志，副主席是袁文才。

工农兵政府成立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各地派出一定数量的代表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然后在此基础上成立工农兵政府，县工农兵政府设有土地部、军事部、财政部、教育部等，大概有四、五个部那时工作人员很少，每个部只有三、四个人。工农兵政府当时不收税，可能宁冈收了一点税，也不多。政府的财政来源不是靠收税，主要靠打土豪筹款。

工农兵政府虽然不是普选产生的，但是，在工农群众高度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与群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和群众共患难，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和群众打成一片，有高度民主，干部和群众之间没有什么界限，看不出干部和群众之间有什么差别。

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中心工作是抓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抓军事，成立县，区、乡各级地方武装；抓政治，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基层政权；抓发展生产，那时还要办学校，主要是办小学。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搞经济封锁，工农兵政府还要帮助群众战胜敌人封锁，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要搞好宣传工作，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揭露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并教育人民要用革命斗争保卫、掌握政权，人民要

自己打江山、坐江山。在军事上，工农兵政府要强调对敌人斗争，不断加强工农赤卫队、游击队。当时，对敌斗争很激烈，很尖锐，处在战争环境，敌人会不断破坏我们，不断骚扰我们，差不多天天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敌我形成拉锯形式。今天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明天又可能被敌人占领，“拉锯”很厉害。所以，警惕性要非常高，每天要站岗放哨。对于小一点的敌人，乡政权可以自己应付；对于大一点的敌人，和赤卫队、游击队配合起来消灭它，那时完全是政治挂帅，靠政治，靠对敌斗争有决心，靠阶级觉悟高。

十一、分配土地

我们在万安搞暴动的时候，也想分配土地。但是，不知道怎样分法。当时也不知道怎样遵照主席的教导，走出去，向农民请教，而只是呆在房子里研究怎样分田。一九二七年冬主席到了井冈山，才指导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主席是很重视调查研究的，对农村里的情况非常了解。在他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对农村里的社会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主席了解了农民。熟悉了农民，根据农民提出来的“平分土地”的要求，正确地领导了井冈山周围几个县的土地革命运动。

分配土地时，首先一个问题是，以多大范围地区为单位来进行土地的分配，原先以村为单位来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好的，是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的，即利用姓氏宗族的封建观念蒙蔽农民，造成假分田，还因为村庄有大有小，大的村庄往往地主多，土地也多，而且好的土地多，这样分配土地时，好的土地结果还是落在地主、富农手里，小村庄的农民群众仍旧种贫瘠的土地。这样一来，不仅满足不了农民

对土地的要求，而且还会被地主所利用。他们利用封建宗族观念，制造矛盾，挑起姓氏冲突（往往一个村庄一个姓），挑起村庄与村庄之间的斗争。所以，这样就不利于农民之间的阶级团结，不利于打破姓氏界限。后来改为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这个办法是主席经过调查研究，经过斗争实践的摸索和总结才找到的，直到全国解放还是采用这个方法。

在分配土地时，原来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后来发现，这办法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雇农，因为富农的地，一般是比较好的，贫雇农种的地，一般是比较差的。如果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那么，富农中的好地就分不出来，贫雇农和以前一样，还是种坏田。结果还是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后来主席提出要“抽肥补瘦”，把富农的好田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

负责分配土地的机构叫“土地委员会”。它是由工农兵代表会（县、区、乡各级都有工农兵代表会）选举产生的，由五——七人组成。工农兵政府在讨论分配土地时，就由他们先行研究。土地委员会还要作调查研究。井冈山有划分阶级的规定，但比较简单，那时只有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之分，还没有把富裕中农划成一个阶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后，才把富裕中农划出来。在井冈山上，主要对准地主、富农来进行土地革命。

哪个地方经过游击战争，形成了游击区，地方反动武装消灭得差不多了，反动政权也被推翻了，真正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政权，建立起了农民政权，又比较巩固了，并且，农民发动起来了，有了阶级觉悟，有了斗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进行土地革命了。否则，如果游击区还不巩固，基础还不好，就很少可能进行土地革命。即使进行了，农民也不敢要地主的土地。在游击区里，往往也从抗租抗税开始搞起，逐步向彻底

分配土地发展。等到农民分到了土地，更确立了他们的斗争信心，就更拥护我们了。这时虽然我们也会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有时也从游击区里暂时退出来，但是，群众还能和我们一起坚持斗争，以后可以再进去，把敌人赶走。那时，我们就是这样逐步推进斗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就是这样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

遂川分田是在一九二八年阳历四、五月间，开始只是摸索，以取得经验，然后就接着展开分田斗争。王佐一千多亩水田是在八、九月间分的，井冈山土地革命最早是在宁冈进行的，因为那里是个巩固的根据地，其次是遂川、永新。在酃县和茶陵，因为那里都是游击区，分了田的地方比较少。

《井冈山土地法》肯定不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写成的，还要早些。因为在此以前，遂川、永新、宁冈等县早已分配了土地。到了当年十二月的时候，当时斗争的重点是在准备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我记得在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表会上，就讨论过土地问题。在延安的时候，我听主席讲过，主席还保存着一个比较早的《土地法》，里面提到“没收一切土地”。这个土地法是不是《井冈山土地法》，我没有弄清楚。一九二九年四月在《兴国土地法》里就不再提“没收一切土地”改提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十二、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是在主席亲自主持领导下召开的。在会上，主席根据几个月来收集的时事材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井冈山，主席非常重视收集报纸，以了解国内外的情况。有一次，主席专门派了三十一团第一营去打大军阀谭延闿的家乡高陇收集到了不少报纸）。主席认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即新、旧军阀的统治是不稳定的，内部有着许多不能克服的矛盾。主席特别发现新旧军阀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争权夺利的斗争，而且斗争越来越厉害。主席认为，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估计要爆发蒋桂战争（后来证明主席的预见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一九二九年春果真爆发了蒋桂战争）。主席又认为，军阀混战爆发以前，敌人必定会对井冈山发动新的“围剿”。因为红军在井冈山已经打了很多胜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是个大威胁，特别是对湘、赣、鄂的反动统治却是个极大的直接威胁。所以，军阀混战未爆发以前，敌人为了保持其反动统治，必定会“围剿”井冈山，企图解除我们对他们的威胁。根据主席当时对形势的英明分析，大会确定湘赣边界特委的中心任务，就是准备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为此，大会以后，井冈山军民拚命运粮、削竹钉、修工事，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会议还讨论了主席亲自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在这以前，曾讨论过一次。在这个土地法中，提出了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还提出了“抽多补少”。但尚未提出“抽肥补瘦”（“抽肥补瘦”这一条是在主席领导的赣西南“二·七”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井冈山的口号是“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一切土地”。口号虽是这样，实际上没收和分掉的还是地主的土地。在井冈山上，当时，永新的土地革命经验最丰富。由于永新人口多，分田地区比较广大，主席当时亲自领导三十一团、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永新集中力量搞了一个多月，创造了永新的工农割据。

会议还讨论了《工会组织法》，这次大会后，谭震林任特委书记，因为“八·七”会议有个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人都要由工人出身的党员担任有关职务，那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工人出身的向中发。其实，他只是个名义，大权掌握在瞿

秋白手里，后来又掌握在李立三手里。

会议还讨论了党的组织等问题，讨论怎样整顿党的组织，把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投机分子清洗出去，巩固党的组织。在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有些不坚定的分子经不起考验，这些人也要清洗出去。

十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在井冈山上，主席就强调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拿打仗用的枪来说，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在大革命时期，在主席的革命路线引导下，农民自卫军从豪绅阶级手里夺了枪，武装了自己。那时全国农民自卫军有十几万支枪。后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解除了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这十几万支枪在一个早上被豪绅阶级重新夺了回去，只有个别地方保存了极少的一部分。在井冈山上，我们开始枪很少，怎么办？从敌 人 那 里 夺取，从国民党军队手里以及反动地主武装手里夺取。枪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少数坏枪变到多数好枪的，完全体现了主席的辩证思想。我们手里有多少枪，以及从敌人手里能夺取到多少枪，这是成正比例的。我们手里的枪也就越多，人民武装越扩大，打的仗就越大，胜利就越大，夺到的枪越多。在打仗的时候，最根本的一条不是我们手里有没有枪，或者枪是好是坏，而是农民群众想不想拿起枪来，他们拥护不拥护我们。如果农民群众想拿枪，拥护我们，那么，没有枪也会变成有枪，坏枪也会逐渐变成好枪。这又体现了主席的彻底革命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彻底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群众路线思想。

我们用的钱，也是通过打土豪筹款子来解决的。那时没有财政部，也没有什么外援，完全靠我们依靠群众自己想办法解

决。在打土豪时，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得农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那时土豪往往把钱藏在窖子里，群众都不熟悉，只有在他家做过长工的农民才会知道。另外，有的土豪家里还有夹墙，金银财宝都藏在夹墙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不帮助我们，不给我们带路，那么，是无法找到的。所以，干革命重要的一条就是群众觉悟了没有，群众拥护了我们没有，群众运动有没有和主席思想结合起来。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没有；有了这一条，一切都会有。主席很强调这一点，要求我们相信群众，要求我们依靠和支持群众。这是一条根本的原理。

那时药也很少，有点碘酒、药棉就算不错了。我们最怕的是子弹伤到骨头里面去。如果这样的话，就拿不出来了。张子清受伤，就是子弹打到了他的脚底板里，拿不出来，后来过了一年就感染死了。为了解决用药困难，我们设法通过关系到外面买一点来，更主要的是，用土药来治病，那时基本上都是用草药来治病的。

吃饭也有困难，每天菜金只有五分钱，还要从这五分钱中节约出部分来作伙食尾子。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军饷的，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冬天没有棉裤穿，棉衣也很少。到了夏天棉衣就要收回去，洗一洗后，明年再用。一年只发一件单衣。有时，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有时就在外面露宿，下雨也是这样，睡在外面，那时确实非常艰苦。但是，一条靠主席艰苦奋斗的思想，一条靠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一条靠打土豪。

十四、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斗争

第一次反“围剿”，是在一九二八年春。那时我们刚从遂川撤出不久，很快打败了江西的敌人，当时赣敌有二、三个团来“围剿”井冈山，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围剿”，但他们却称

之为“围剿”。这次湘敌没有来。

第二次反“围剿”，是在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湘赣两省敌人都来了，总共有七、八个团。在八月份，敌人曾困了我们好几天，其中八月三十日这一天战斗最激烈。当时主席带了一个营（大概有三——五个连）到湘南去迎还红军大队了，井冈山只留下一个连，其余红军在永新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做群众工作。我们估计主席已经在湖南找到了红军大队，并且很快就要回来，但是不知道确实情况。敌人却有无线电设备，通过联络，知道主席带领部队快回来了，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对井冈山猛攻，其中黄洋界这一路有两个团的兵力。当时形势很紧张，但是在井冈山上，我们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有优越的地形。敌人虽然人很多，武器也很好，但是，他们是为资本家卖命的，怕死。所以，他们那天也不敢拚命往上冲。

八月三十日在战斗进行的过程中，由于战士们已经打了好几天的仗，有点疲劳，情绪不是那么饱满。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宣布主席要回来了，并且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要坚守井冈山，和井冈山共存亡。这消息传出去后，战士的情绪很快振奋起来，表示一定要和敌人战斗到底，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主席在部队中，在地方上，威信都是非常高的）。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们把家里的两门迫击炮搬了上来，还拿来了几颗炮弹。由于我们站在黄洋界上，在高处看下去很清楚，所以，我们对准敌人的指挥所打下去。那时炮弹很少，颗颗都很珍贵，要弹无虚发。一打，果然打中了敌人的指挥所。他们听到迫击炮响，以为主席带领队伍回来了，吓得一个晚上就撤退了。

主席没回井冈山之前，在九月上旬就知道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喜讯。在九、十月间写了光辉诗篇《西江月·井冈山》。因为那时第二次反“围剿”已取胜，第三次“围剿”还没有开始，形势不是那么很紧张。

第三次“围剿”敌人有六、七个师，十七、八个团，总指挥是何成濬（湖北敌军军长）。当时在讨论谁留在井冈山的时候，主席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谈到第二次反“围剿”，我们只有一个连就把敌人赶跑了，现在有那么多部队守山，还守不住。一九二九年一月，主席做了许多安排工作以后，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了井冈山，当时想一方面扩大根据地，另一方面红四军主力部队在外围打击敌人，调动敌人，牵制敌人，也就是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主席离开井冈山不久，敌人就来进攻井冈山了。

十五、柏露会议和向赣南闽西进军

敌人准备第三次“围剿”时，我们曾开过几次会研究过这个问题，从讨论形势到部署兵力。柏露会议最后讨论决定保卫井冈山的军事力量以及红军行动的计划。在柏露会议上，主要是反对保守主义，地方党组织生怕红军主力走掉后，敌人来了会遭到损失，怕井冈山守不住。所以，柏露会议上主要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树立保卫湘赣边界政权的信心。井冈山斗争时期，在一九二七年冬到“八月失败”前，机会主义表现为“左”倾盲动，大烧大杀。那时主要和“左”倾盲动主义作斗争。根据地搞起来了以后，主要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与保守主义、流寇思想作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在柏露会议上，主席还看到了统治阶级要破裂，新的军阀混战要开始，讲到了要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柏露会议后，在群众中也广泛动员保卫井冈山，向群众宣传保卫井冈山的有利条件，还谈到了红军主力要在外围运动中消灭敌人，至于到哪里去，怎样的意图，具体的战略部署，在群众中就不讲了。

主席离开井冈山前，在井冈山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有思想准备、物质准备、武装准备，做了几个月的准备工作。红军本身也做了准备工作，除了思想上、军事上准备外，经济上作好准备，带了十几天的伙食费和粮食。另外，怎样安置袁文才和王佐，也做了准备。主席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走的是一条路，是从黄坳那边走出去的，不是分几路走的。主席一贯是反对分兵的。

十六、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从来没有支持过主席，一直是反对主席的，站在主席的对立面，怪得很，他们来井冈山的人，和主席都是不一致的。杨开明和主席有亲戚关系，却在政治上不和主席站在一起，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执行的路线，开始是瞿秋白的路线，后来又是立三路线，一直和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他们无论是在政治路线方面，还是在军事路线方面，都不执行主席的路线。

我记得罗迈（李维汉）和夏曦任过湖南省委书记，杜修经任过湘南特委书记。

湘南特委和井冈山前委是什么关系呢？主席担任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可以领导湘南特委。可是，主席是很伟大的，非常谦虚，从来不以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井冈山上，我们都自愿接受主席的领导，但是主席总是以讨论、商量的口气来领导工作）。当时，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和湘南特委，都来井冈山领导。

在井冈山时期，前委或特委主要与湖南省委联系，而和江西省委联系不多。这是一方面有个交通条件，从湖南株州上井冈山很方便，从南昌过来却不怎么方便；另一方面有个历史条件，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发动和领导的。在主席离开井冈山以后，我们曾派了个名叫刘珍（师范学生，主席对他的印象很不错）

的同志到江西省委工作，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主席下山以后，和赣西南特委联系较多。赣西南特委和湘南特委不一样，和主席配合得较好，能接受主席的领导。那时刘士奇任赣西南特委书记。“二·七”会议以后，中央把刘调离江西，之后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在那里，他被张国焘杀害。一九二九年以后，闽西特委和主席配合得很好，所以闽西在主席领导下，形势一下子发展很快。

十七、《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的历史人物

谭震林是湖南攸县人，店员出身，后任茶陵总工会主席。

龙超清是宁冈人，中学生，和袁文才站在对立面上。其父叫龙清海，曾任江西省伪教育厅厅长。龙任宁冈县委书记，有地方主义，有明显的土籍和客籍界限，对客籍有不正确的观念。从现在看来，龙在主席离开井冈山以后的一段表现并不怎么样。他的出身是大官僚，后来自己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虽然入了党，还任过县委书记，可是旧的思想意识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可能是在肃清AB团时当作AB团被处决了的，或者由于其它原因而死的，我不大了解。

朱昌偕是永新人，裁缝工人，任永新赤卫队党代表。那时他还年纪很小，只有二十多岁，打起仗来很勇敢。后来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被当作AB团误杀，没听到过有什么叛变行为。

刘天干（毛选上是刘天千）是永新人，出身很好，是雇农。后来邓乾元离开特委，刘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恐怕也是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刘也作为AB团而被误杀了。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打下南昌后，蒋介石在南昌反共，凑合了一个反共组织，叫AB团，专门用来对付和反对共产党。这个组织的三

个骨干分子叫段锡朋（北大学生、永新人）、周利生（任过吉安阳明中学的校长，开始是偏向左的，后来倒向右，彻底反共）、王礼锡、在王明路线期间，一九三一年春，组织湘赣省委，中央派了王首道任湘赣省委第一书记，派吴德峰在保卫局（原先叫肃反委员会）工作。在此期间，把朱昌偕和刘天干当作AB团杀害，现在看来是杀错了。他们出身都很好，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是反对国民党，经过了一些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员。在"七大"时，中央有个决定，认为当作AB团误杀的，可以平反，可以作为烈士看待。

阖盘珠是茶陵人，农民，后来好象担任过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主席。

谭思聪。谭是茶陵人，中学生，后任茶陵特区书记。这个人后来牺牲了。还有一个人叫谭家述，也是茶陵人，任茶陵赤卫队队长，对阖盘珠和谭思聪的情况比较熟悉。

谭兵，此人是酃县人。

李却非是酃县人，北大学生，任酃县县委书记。

朱亦岳（毛选上写作宋亦岳）是莲花人，知识分子出身，任莲花县委书记，后牺牲（牺牲情况不详）。

王佐农是遂川人，农民，湘赣边界特委常委。那时常委有三个人：谭震林、陈正人、以及王佐农。听说此人后来牺牲。

宛希先是湖北人，知识分子出身，任过三十一团政治部主任（那时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都有政治部主任）。其哥叫宛希俨，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后任过江西省委书记，后牺牲。宛希先在前委中是个比较机动的人物，有时在这个营任党代表，有时在那个营任党代表。在整顿党组织的时候，主席指示解散永新县委，宛执行了主席的这个指示。在执行过程中，宛杀了几个人，得罪了永新县委，王怀等人就此怀恨在心。一九二九年十一、二月间，在永新小江区茶水冲一带召开特委会

议时，王怀把罪名强加在宛的身上，说他有个人野心，最后把他枪毙了。那时永新县委和宁冈县委的观点是一致的，在特委里占多数。这是王怀等人地方主义发作的结果。一九三〇年我把王怀杀死宛希先的情况告诉了主席。主席知道后，认为王怀做错了。宛在被杀之前，虽是特委成员，但不住在小江区，经常帮助茶陵特区开展工作。宛希先思想水平很高，是一个相当有水平的人。但是，有点自信，看问题有点偏见。宛希先在井冈山表现是很好的，应该作为烈士看待。

杨开明是长沙人，虽然在井冈山上是跟湖南省委走的，是反对主席的，但是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杀死了，为革命而牺牲。

何挺颖是陕西人，知识分子出身，任三十一团政治部主任时间比较长一点，恐怕是在红四军下山以后的途中牺牲的，牺牲得比较早。何是个很厚道的人，品质很好。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任师委书记时，还是听主席的话。在井冈山上，他是听主席话的。

袁德生是水口山工人，任中央巡视员，也是湖南省委的巡视员。袁本人不错，非常忠实可靠，但水平不高，有点糊涂，有时也能听主席的话。袁每次来井冈山，往往是替中央到这儿来要钱的，说中央没钱用了，要井冈山帮助解决一点。袁任过湘赣省政府主席，后作ＡＢ团误杀。

宋乔生是湖南人，水口山工人，好象懂得修理枪械，

毛科文是湖南宜章县人，农民。毛科文是湘南暴动出来的。

十八、其他历史人物

胡少海是湖南宜章县人，是湘南暴动出来的，任二十九团团长，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其六弟胡少华是个大土豪。在湘南时，他们两人打了一仗，其实是假打。后来胡少海牺牲了。

龚楚是二十九团党代表，在一九三〇年叛变革命。

陈东日是郴州一带的农民，任三十一团党代表，后牺牲。

王次淳是遂川工农兵政府主席，是个很纯朴的农民，后牺牲。

张子清在主席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以后，一直在小江区（那是我们第二个根据地）养病，没有来过井冈山，在养病期间，他只是休息，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也没有担任过红五军的参谋长。

十九、其　它

1．"八·七"会议的内容，我们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才听到传达的。那时江西省派了个吴德峰（国共合作时期任武昌公安局局长）来传达，谈到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还谈到了现在应该举行暴动。

2．一九二八年七月，朱德同志率领部队打过范石生的部队。在搞年关暴动前，朱德同志的部队曾在广东乐昌利用旧的关系，受范石生收留过。虽则叫"收编"，实际上没有受范收编，部队的体制仍按原来的。通过"收编"，得到了范的掩护。后来他们与湘南特委取得联系，脱离了范石生，参加了湘南年关暴动。

3．我记得红四军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有个决议，内容就记不清楚了。

4．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主席是袁文才。那时只是名义上有这么一个机构，并没有什么部，也没有什么政府机关。

5．防务委员会开始叫防务处，后来才改为防务委员会，王佐任主任。防务委员会负责筹备修工事的材料，负责后方粮食的保管，以及负责伤兵，医院的管理。军械处、被服厂等，不属于防务委员会管的。防务委员会其实也没有什么办事机构，只是几个人具体料理一些事情就是了。

6.五大哨口是在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前开始修建的，大概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以后。修筑五大哨口的任务、地点，都是主席亲自提出来的。主席对井冈山地形是非常熟悉的。黄洋界哨口没有什么营房，那时也不可能有什么营房。在下庄、白银湖等地，红军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或者搭个棚子，或者睡在工事里，都没有什么营房。

7.二十八团一九二八年八月在湘南时，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领两个连叛变。当时团长王尔琢和袁感情很好，想劝说袁回来。结果，由于警惕性不高，当向袁喊话，动员他们回来时，被袁开枪打死。袁用枪打死团长王尔琢，也暴露了自己的叛徒面目，使两个连的战士觉悟了。所以，脱离了袁崇全，回到了二十八团。袁叛变后，在赣南投奔了敌刘士毅部，当上了敌师参谋长。九月十三日，刘率领部队攻打我军。我军在主席的指挥下，一下子把他们打败。这时，刘要袁带领队伍作后卫，掩护他们的撤退。我军乘胜追击，打死了袁崇全，这就是叛徒袁崇全应得的下场。

8.恶匪肖家璧，是解放初期在遂川大坑附近被我活捉的。当时我军进入遂川后，肖匪死不投降，躲入深山，准备作垂死挣扎。那时有些群众还没有觉悟，惧怕肖匪，也怕变天，还经常送东西给肖匪吃。有一天他们杀了鸡叫小孩送去，肖匪吃了群众杀的鸡后，贼性发作，又把小孩杀了。这下群众给激怒了，看清了肖匪的反动本性，主动地把肖匪躲藏的地址告诉了我军，所以，一下子生擒了肖家璧。

9.江西伪政府主席，开始是朱培德，后来是熊式辉。江西是由云南军阀统治的。朱培德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或一九三〇年下台的。朱的下台，是和我军在井冈山打了好几次大胜仗，把他的部队打掉了不少分不开的。湖南伪政府主席，开始是鲁涤平，后来是何键。湖南从来都是由军阀统治的。

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

何 长 工

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决不是盲目的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具有远大战略远见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光辉发展和伟大实践，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谱写了国际革命运动史上新的篇章，充实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宝库。

我党在一九二七年“八·七”紧急会后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被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国共分家后到一九二八年秋，计被屠杀了三十三万七千多人（单湖南就超过十万人），五万多共产党人只剩七千多人了。

我们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教训中，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在中国革命急遽变化的紧急关头的一个转危为安的伟大的转折点。唯独毛主席高瞻远瞩，不避艰险，顶着狂风恶浪，把党的中心工作引向农村，点燃了井冈山星星之火，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崭新的道路，创建了中国第一个

农村革命根据地，缔造了第一支红军（当时叫工农革命军），揭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序幕”，为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指引了一条胜利的金光大道，把中国革命历史推向了新的纪元。

毛主席奉党中央的任命为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到湖南改组了湖南省委，并着重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党应当以主要的力量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推动土地革命。是年九月九日震撼人环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打响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号炮。

当时国际上正处在经济上相对稳定的时期，这是第一次大战之后的第三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很突出，国内官僚资本还在形成。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把革命重心放在城市交通要道，还是移到农村？这时，主席的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指导我们前进。历史上，世界上几次革命，如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唯有秋收起义是独立自主地以农村为中心的。当时形势大变，毛主席以他英明的雄伟的远大战略思想领导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及时地做了战略退却，就地革命。为中国革命的大业，选择了井冈山这个战略据点，保存下优秀的干部和火种，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保留革命火种的紧急时刻，毛主席做了积极的战略退却，保存了力量，成为历史上模范的有秩序的退却。这是党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候，是彻底失败，还是保存下种子扎根广大农村，成为星星之火，就看你掌舵的了！毛主席高瞻远瞩，积极的退却，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准备时机成熟后转入另一阶段的进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积蓄力量，发动群众，将来城市还会都归我们。那时有人怀疑说：毛泽东这样做不对，跑到山上当山大王去啦！

但毛主席说：形势变了，是当红色根据地的“山大王”的时候了！今天我们上了山，到时候，我们命令敌人将所有大城市都交给我们。

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那时主席曾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绕，绕不赢就蹲，蹲不赢就化。不久主席定为“十六字诀”。

回忆一下历史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乃正确之先导。当时的形势，虽然是“逼上梁山”，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于敌人残暴的白色恐怖，沉重的教训也使我们受到了革命的考验和锻炼，致使我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建设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秋收起义，形势转变了，我们做了胜利的战略退却。打得赢不打，是右倾机会主义；打不赢不走，是拚命冒险主义。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

推翻满清，南方十七个省参加了，北方没有份，袁世凯做皇帝只八十三天，连一百天都不到。十月革命，最后还是向农村发展，扑灭了白匪军的叛乱。秋收暴动是在国际上突破了暴动只在城市的理论，它增添了马列主义的真理宝库中的新内容，打破了狭隘的成见和偏见。这对今天世界革命还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当时有人污蔑毛主席是个“书生”，不是军人。因而不信服毛主席的精辟见解。但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崎岖坎坷的艰巨胜利的道路，斗争的事实情景说服了这些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灿烂辉煌发展的结果。

当时，毛主席毫不犹豫，毫不留恋地带着队伍把皮鞋脱掉，穿草鞋，戴草帽，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解决了中国武装革命的道路问题，解决了我们前人所没有解决的革命问题。毛主席一贯注重农民问题。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

主席主持开办的。毛主席还走遍三湘四水去作艰苦细致的考察。他坚决地，耐心地到农村去工作，为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后来王明他们说：山上不出马列主义。而毛主席就是用人民战争来培养人民战争的人材和经验，从频繁的战争中学会指导人民战争的！斗争出智慧，实践长才干，斗争就是马列主义：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时期，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的同志只当党代表，不当军事指挥员去掌握兵权，"马日事变"的血的教训，费了血的代价才教育了我们。秋收起义，是在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之后，毛主席思想还没得到人们认识的情况下搞起来的。

"马日事变"，许克祥在长沙只带一个土匪团，当时我在洞庭湖带五、六千人，和当地农军一起满可以打败他。可陈独秀下命令不让打，各地农军缺乏统一的指挥，湖南七十五个县的农民自卫军除湘东几个县保存少数力量外其余均失败了。

秋收暴动共有四个团。第一团是警卫团，这个团的基础，是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由武汉政府警卫团和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合编的，团长卢德铭，副团长是余洒度，参谋长是韩昏，团指导员是章华文，都是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学生。第二团是王新亚，是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军组成的部队。由苏先骏、余贲民率领的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编为第三团。第四团是从鄂东来的夏斗寅、邱国轩的残部，经过崇阳县委的关系，由我们改编的。当时黄埔一期的多是团级干部，二期是副团级干部，三期是参谋长，四期是营长、连长。

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的整个过程，我把它归总成过五关：

第一关：登陆黄颖口

我是一九二三年冬天回国的，回国后领导要我到黄埔军校

去当教官；后来组织分配我到湖南的华容一带参加县委和特区委工作。北伐军到湖南以后，我在洞庭湖区任农军总指挥。以后又到了洪湖，转到武汉，跑到警卫团去当兵，当时杨立三是招募委员。我当兵在第五连，这是干部连。在这连当兵的，起码都是县级的工农运部长，县委委员和书记。有一次，党的团委会开会，我在会上讲了一次话，不知怎么把我看中了，要我到青岛去，然后去苏联学习，我为此向团长请假，团长不同意。我那时二十七岁，还年轻，不甘心大革命的失败，因而安心在连里过战士生活。当时我们的任务是警卫兵工厂、仓库、保卫银行，把守海关，连汪精卫的住宅也是我们站岗。

在七月二十九日这天，团里开了个会，会上布置要防止开小差，要战士们系带子弹，准备往南昌开。那几天，听见珞珈山一带，天天晚上有枪响。为了防止有人抓我们，天天拉出去打野外。二十九日，"八大处"和指挥部都上了船（拖驳）走啦。好多的拖驳，连起来有一两里长。当时还有中央军校的一个女生宣传队跟着走，后来走散了。开拔后，八月一号我们船到黄石港，和南昌联系不上。反军张发奎的指挥部设在南浔路上的马回岭。只听到九江反军布防吃紧，这时情况严重，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改名为军官教导团，从后边跟上来了，划归为警卫团长卢德铭同志统一指挥（张发奎第二军团司令部的"八大处"）。我们吹号和他们联系，他们没听到，结果教导团的船开到九江就被缴了械，该团由张发奎到广东曲江后又武装起来了，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了。我们开到田家镇，在船上开了个会，领导、指导员、党的积极分子二百多人参加，会上团长卢德铭宣布南昌起义了，决定我们船调头往回开，到了江南阳新县境的黄颡口。上岸露营，急行军去赶"八一"起义的主力部队。当时公开讲，蒋介石叛变了，决定快速进军南昌归队，赶主力部队去。这时，"七·一五"国共公开分家，"马日事变"和南昌起义，这一带地方的县

长们还不太知道，所以还有的地方设宴欢迎国民革命军。

部队上岸后，正碰上八月天的炎天暑热，五千多人的队伍，武器弹药很多，天常下暴雨，走起来很多困难。到了武宁与苏先骏、余贲民率领的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会合了，两支部队建立了一个临时的统一建制，番号改为革命军独立师，我们是第一团，他们是第三团。部队开到靖安、奉新一带，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向东转移，敌人在南昌、清江、樟树一带已经布防，赣江两岸有朱培德的三、六、九军设防。我们不能渡江东下，遂放弃追赶主力军的计划，并决定卢、韩、辛等领导同志去中央请示。队伍只好折回修水休整和训练，扩充兵源，准备暴动。这时我调到了侦察连搞侦察，发现了三连连长是个反革命分子，把他抓住枪毙了。接着在部队里开始进行了谨慎的肃反工作，巩固内部。

卢德铭团长当时极力要团结内部，为此，我们也没打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但是脱离了国民党的指挥，这是借此麻痹一下敌人，争取时间整训部队。

第二关：修水整编待命（准备起义）

在修水开了一个团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团长卢德铭去找党中央联系未返期间，由副团长余洒渡代理团长。

我们开到修水，朱培德曾派人来和我们联系，我们想在与敌斗争中学些军事，作点统一战线工作；朱则妄图用威胁利诱的方法，软硬兼施引诱我们上钩。我们则以软硬兼施、拖延的措施，用谈判来赢得时间。而后，他们来了五个人，经常在我们这儿转，有时给我们讲，“你们这里有很多人材，北伐有功，有的还是我们的老同学”，用这些话来拉拢麻痹我们，其实他们也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共产党员，妄图将我们改编为江

西省防军，我们采取拖延政策，谈而不破，闹而不打。他们妄图诱惑我们开到涂家埠点名发饷，正式改编，借此机会解除我们的武装，但这条一网打尽的毒计未能得逞。

等到八月，月亮圆了，我们才独树一帜，举行起义了，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子，番号都做好刻好并发下去了。那时我们这支部队还是很骄傲的，动不动一开口就是我是叶挺独立团的，两次打过汀泗桥，夺取和保卫过武昌城，到过河南，胜利进行第二次北伐凯旋而归的功勋部队。

在开往修水的路上，战士们背了很多子弹和枪支，走得个个汗流浃背，一些过去当首长的，也要同士兵同艰苦，为了防止开小差，一个党员要包几个人，党员说了话，群众还是听的。团长卢德铭品质很好，军事政治都很强，威信也高.身材长得也很英俊，行动起来忙前跑后，很关心部队，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严格要求部队。部队过境秋毫无犯，对群众影响很好，有时过境，也会碰到红枪会拦住不让走，我们派代表谈判，露营拿钱买粮食，做饭，吃了就走，结果顺利通过了，没给我们找麻烦。这时我们经常喊话，穿着便衣，走在前面喊话，打通了和群众的关系，一些地方武装也不敢动我们了，湖南这地方是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必争的战略要地，有名的出兵的地方，历史上经过多少次动乱，一些兵带枪跑了，因而散在群众手里的枪不少，地方武装里很多就是这样当过兵的老打手。第一次大革命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广东人出银，湖南人出兵，浙江人出官，江苏人出太太。"

经过肃反之后，在内部还有左中右的斗争。因为当时情况复杂，条件困难，政治军事斗争均还不成熟，因而组织上公开地讲：你愿不愿意干，吃不吃得了这个苦？不干就自己走。许多女同志拖不动，走了很多。我们留下的人背了很多东西，走起来都说，国共分家，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当时我们还有一种

理论：历史上从没有消灭过土匪，今天怎么能消灭我们这些马列主义武装的“山大王”？要调皮就调个咬皮。要捣蛋就捣个大蛋。你骂我混蛋，我骂你你一百个王八蛋！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百拳，要分家我就给你分大家，分少了还不干！并要抄你们反动派的老家！这就是我们反正不能吃亏。俗话说：“沉浮应在自己”，这就是说要全靠自己救自己，当时只有靠自己觉悟团结起来，自己当家做主人。我们就来个枪杆子里面夺取政权，当掌柜的。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不明，又是一支孤军，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剧烈，上面分家啦，下面也开始向下贯彻。我们筹粮，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开家族会议，会上一讲，他们就会把存的公粮交给我们。那时招兵也很容易。当时我们发的衣服是灰、黄各一套，打绑腿，穿草鞋。警卫团的人，一些军校学生，军官很讲究穿戴，有所谓“三金主义，五皮宪法”，就是指：金丝眼镜，金戒指、金牙。皮鞋、皮绑腿、皮带子、皮包、皮鞭子。

第三关：秋收暴动

秋收暴动是在阴历八月。

起义前，卢德铭同志经鄂归队，任暴动总指挥，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为毛泽东同志。到公历九月九日在修水的渣津、马坳地区，卢总指挥严肃地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这次起义由毛泽东同志领导，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赶到，目前在军事上要我来负责。

秋收起义是由几个战斗组成的，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长沙。当时分兵两路：三团、二团首先打浏阳；一团、四团首先打平江，然后包围长沙。结果，驻安源的王新亚的第二团，虽然攻

下了醴陵和浏阳城，但没有与三团取得联系，攻下浏阳后由于缺乏经验，疏于防范，遭到伏势敌人袭击，几乎全军覆没。据说王新亚同志以后下落不明了。三团由铜鼓赴浏阳增援，到浏阳东门遭敌阻击未成。这时他们知道二团已被敌人消灭，就回师向修水、铜鼓之间的张家坊，白沙来同我们会合。打浏阳的一路就这么失败了。我们与四团一起打平江，首先打长寿街，这里驻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有一些防御工事，虽然我们装备不好，打还是可以打胜的。一打，我们一营、二营失利，一营战斗失利，二营损失很小，二营营长钟文璋失踪。同时，第四团邱国轩部在火线的后方洪岭叛变，这个团原是夏斗寅部队残部，改编后也没经过改造和训练，马上投入战斗。他们野性未驯，我们在前面打仗，他们在后面造反，使我们战斗失利，不得不撤退，向南到浏阳东乡的张家坊，白沙一带与三团会合，会合后一起进驻浏阳文家市。

这时，毛主席还没有到部队来，我们还比较幼稚，打仗还是按照黄埔军校的思想体系来的。现在看来，进攻长沙是相当冒险的。当时是个急于报复的进攻战略。另外，由于我们采取了分兵的办法，不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敌人，相反地把队伍分成几路打敌人，力量分散，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了。我们这个团损失不大，但在情绪上受了打击。加上这时炎天暑热，很多人发疟疾，医药又很缺乏，部队的健康情况也不好，于是在文家市休息了一两天。（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在浏阳文家市与部队见面。）

当时二团如不打开浏阳也许会好一些，碰个钉子部队也许会保存下来。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些改编的部队，非混编不可，非有我们的骨干不可！否则，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结果吃了四团的亏，等于把国民党的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再有一点教训，就是没有一个目的地，没有一个落脚

点，没想到“家”安在哪里，何处是归宿。

卢德铭团长是一个好同志，但在秋收暴动的布署、指挥上是有问题的。关于这件事现在还缺乏更系统的总结，反正在毛委员来到之前是有错误的。我们是一支疲劳之师，是一支孤军，分散兵力显然是不当的。用毛主席的正确指导思想来看，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切忌分兵。毛主席当时说：“雷公打豆腐，专找软的欺”，要集中兵力打软的，打容易打的，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以十当一。不过，我们那时还很幼稚，不能以今天的水平来估计当时的情况。我们要当做一个教训来接受，这是第三关。

第四关：文家市前委扩大会议的斗争

毛主席来到部队，部队就有了灵魂，指挥加强了，领导也健全了，使部队有了正确的方向，引导部队走向胜利。

毛主席到了部队，就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当晚在文家市的一个学校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战胜了余洒渡等少数人坚持再冒险打长沙的错误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天早上对起义的全体人员讲了话。我记得大会是在一个茶埂子上开的，还有一幅绘有罗霄山脉的地图用树枝子支挂起来。毛主席戴着个草帽子，穿双草鞋，脚也走跛了。毛主席非常生动有力地对我们说：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一根禾草、一个鸡蛋也不能拿，一针一线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只要我们跟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站在一条战线上，站在一块，血肉相连，我们就能够胜利。毛主席还说：军队与人民群众如鱼之于水，失去了群众，就象鱼失去了水。与群众结合，在群众中生了根，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这就是胜利。毛主席用鲜明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教育干部和士兵，给我们印象很深，他

讲话象讲故事一样，用通俗的形式、生动的表情讲出来，既精采又生动，真是工农群众不觉深奥，知识分子不觉浅薄。那时，我们都叫他“毛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广大劳动群众、革命干部以及队伍对他非常亲热和爱戴。大家一致说有毛委员领导就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毛主席到了部队，就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推迟了革命的进程。革命正处在大转变的关头。在这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我们不应该留恋大城市，交通要道，而应该及时退却！毛主席说：情况变了，我们没有力量占大城市，占也占不住。历史上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我们这儿是几省交界的接合部，是敌人统治薄弱的环节，到崇山峻岭之中去当红色武装割据的“山大王”，但不是过去的“山大王”，我们有马列主义武装，可以和群众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政策好，纪律好，群众会拥护我们的，那时，我们一呼，群众就会响应。我们没有失败，只是受了点挫折，怕什么？毛主席讲的大家思想开朗了，呵呵直笑，信心十足。

毛主席说：“罗霄山脉，分北、中、南三段。北段，有长江，好象一根扁担挑武岳、南浔两条铁路；南段，敌人挑两条江——湘江、赣江，都便于运兵伕。我们要利用中段的山（井冈山挑两个省和省城（长沙和南昌），在山上可以发动群众，养精蓄锐，同时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关起一个门来打一边，也可以两边一守一攻。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时，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已经萌芽啦，当时叫就地革命，退却就地退却，这是个有胆量、有方向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是接受和保存革命遗产的问题。这就是：五个有经验的人，比一万个没有经验的人要强得很。

毛主席还说：“我们退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就是为了

开始准备另一阶段的进攻。”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看得准，拿得稳，领导得恰当，不失时机，及时地组织了向井冈山做大规模的战略退却。这是一个非凡的有伟大气魄的行动。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积极的包含着另一阶段的进攻在内的退却，不是消极的退却逃跑。这样，一个革命阶段的结束，一个革命的挫败，就酝酿着，孕育着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出现，这实际上是敢不敢斗争和胜利的问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要敢于采取大踏步大规模地积极的退却，如果按余洒渡等少数人的意见，仍然徘徊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我们的队伍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后果就不堪设想。当时正是中国革命处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创造时期，在生死存亡的紧急转折点上，毛主席毫不吝惜大城市的战略退却，保留了大革命的遗产，这是模范地、积极地战略退却。因为、我们保存了干部，培养了干部，积蓄了力量，保留了第一次大革命中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们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用鲜血换来的几点火种，终于点燃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

当时的部队，疲劳得很，得病的很多，违反纪律的也很多，毛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不能打自己人，要有纪律。我们活动的地方，在两省交界的地方。毛主席讲：我们可以在这儿搞出个局面来，这给人很大鼓舞和希望。当时毛主席还讲：敌人南边来北边不来，北边来南边不来，他们不能协作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他说：别看我们枪杆子不多，人也少，又牺牲了一些，贺龙同志一把菜刀照样闹革命，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

毛主席当时有一匹马也不骑，让它驮军图和收容伤病员，自己戴着草帽，穿着草鞋，身穿农民服装，常在队伍中穿插往来。他非常注意调查研究，走起路来不是和战士们谈话，就是和连、排长或积极分子谈话，了解情况。

在文家市，如果毛主席不来，我们也不知往哪儿落脚，毛主席来到一抓，就象下棋一样，选中了以井冈山为秋收起义的落脚点，也是发展的出发点。这伟大战略性的一着对了，局面就不一样了，下棋要见一着！毛委员一反历史之常，创造了胜利的局面。

我们这支部队是革命的骨干。这支部队的大部分，是来自叶挺的独立团，特别是在“马日事变”后，它汇集了两湖的革命干部。这些革命的干部和士兵，革命的武装力量，是大革命的珍贵遗产。毛主席接受了这个遗产，并把它发展壮大了。应该看到，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一个开端，一个预示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良好开端。终于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面貌。

以上就是：毛主席脱险，进入部队，局面扭转，形势大好。这是第四关

第五关：芦溪遭受伏击

毛主席到部队后的一两天，我们就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了。朱培德派了两个团阻击我们，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当时虽然也有侦察员，但侦察不力），以为是一些地方民团之类。我们两个团（一、三团）从芦溪出发，朝东南走。不料，第三团的参谋长何坚把三团带错了方向，朝西南走到萍乡方向去了，路上被敌人打散了，许多人退回了平浏地区，几乎没什么归队。从芦溪出发，部队政治思想状况是良好的，走的是人行大道，但不能过汽车。我们走到芦溪与莲花交界处的一个三岔路口上，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敌人拦路截击，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二营抢夺阵地时，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虽然整个队伍没有受到太大损失。但我们连由于坚持着打，损失较大，在突出敌人

包围时，我被敌人抓住了。我那时当指导员，我向敌人说：“人不亲枪杆子亲，和尚不亲帽儿亲，我们也没有什么仇和恨，这儿有几个铜板给弟兄们吧！”说罢，我把挂包里还有的一吊多铜板往地下一甩，敌人都爬在地上拾钱，我就跑掉了。回到部队以后，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我：怎么搞的？我说：我连在后头掩护，卢总指挥在阵地上不幸牺牲了。

芦溪一仗，总指挥牺牲了，三团溃散了，只剩下第一团，我们更孤单了。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困难的环境里，在毛主席领导下，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继续向井冈山前进。三团的溃散，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些打散的同志，后来在浏阳平江一带建立了很多小块根据地，并成了开辟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力量。我们这个团后来又打莲花县城，那里只有一个一百多人的保安队，被我们打进去了，还捉住了县长（据说是个共产党员，后来把他放了）。曾带他见了毛主席，表现很顽强，后连人带枪让他回去了。

这一关，打掉了第三团，失去了总指挥，这是最危险的一关，如不是毛主席来了，群龙无首，就会散了。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转危为安，上了革命的井冈山。铁不打不成材，人不磨炼不成汉；井冈山成了起义士兵的宿营地。等死不如去找井冈山，井冈山成了革命的收容所。中国革命低落时期，井冈山成了众星拱望的北斗明星和中国革命人民的希望。

当时在湖南，唐生智他们通缉我七次，杀害了我的全家，家乡人传说我放洋了（出国了），其实这时我已到了井冈山。

在上井冈山的队伍里，有行伍出身和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出来的做正职的多，行伍出身的做副职的多。黄埔军官命令主义多一些。有的人没有经验，主观片面性强，有些瞎指挥，使

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而遭损失了。

在这一关里，还有毛主席做群众工作、干部工作和农民工作，这里不多讲了。

芦溪遭伏击，毛主席把队伍带上井冈山，这就是第五关。

起义的部队来到了永新境内的三湾，进行了改编。这就是有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意义就是把军队重新组织起来，解决了几个问题：

1.把战斗队与非战斗队分开，建立了后方，把伤病员分出来。过去病员与战斗队一起行动，发生战斗，不能打，也不能掩护，把部队拖得很苦。当时，成立一了个卫生处，我被调去，当党代表，这个卫生处搞了一个后方医院，收容伤病人员，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放下担子，整顿组织，鼓励士气，团结内部，准备开展游击活动。留下的人，还可以搞后方建设。这是在宁冈，茅坪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萌芽阶段。这样整顿以后，我们的活动是“赚钱就来，蚀本不干！”一碗油洒到地下拣不起来，一碗豆子洒到地上还可以拣起来。军队就好比是油，当时还有一个修械所，有点一般的工具，他们原是去南昌会师的，没赶上，结果也上了山。

2.建党。支部要建在连队，班排要有小组，连队如没骨干，就不能把党的工作做到连队。

3.军民关系，群众观点。那时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久在斗争中充实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

4.专门打民团武装，武装工农。我们到一个地方要坐天下，到那儿要把民团消灭。

6.要有胜利信心。贺龙一把菜刀就能胜利，我们有几百条枪还怕什么？天下是我们的，闹革命要干到底！

接着，部队向宁冈前进。宁冈有新城和古城两个城，我们在古城开了一个会，叫做古城会议。这个会，找不着存档，我

反复地讲才有人记起来，毛主席不说，没人知道。这个会我参加了。古城会议有四个内容：（1）总结了秋收起义的教训。毛主席说："秋收暴动布置上有点毛病。①分兵作战，不是各个击破敌人，而是被敌人各个击破；②不应该攻打大城市；③炎天暑热，我们以疲惫之师去打击敌人，敌人以逸待劳，我们怎么能打赢？"秋收起义时，毛主席没赶到指挥部，因而毛主席采取团结的方针，有些意见没多说，没有过多的指责批评，只是很婉转地说了这几点。

（2）派遣活动，派人四出联络，沉浮在你，顺水流舟，自我淘汰。表现好的将来还是朋友。当时有些动摇的人，吃不了苦，部队规定可以"请假"，以后愿意来再来。大约走了五十多人。走了也好，少几个没决心革命的。当时，蒋介石还放风说：决不杀黄埔学生。因黄埔学生救过他的命。所以一些黄埔学生因当时部队缩小了，又没有官做，走了一部分。余洒渡这人后来也走了，蒋介石还给他官做了。后来借口说他贩毒，还是被蒋介石杀掉了。

（3）派人与中央、省委和县委联系。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建立了一个后方。另外，还派人出去广泛联络，建立统一战线。我记得与我们联系的有宁冈县委。县委书记龙兆卿，他父亲是江西省议会的议长，他借着世家子弟的身份做共产党的工作，外边的人也不怀疑他。

（4）还做一些统一战线工作。为了争取王佐、袁文才，曾送了几十条枪给他们。他们答应我们在茅坪设立一个留守处，一个后方医院。虽说是医院，病员来了多是休息，没有西药，中药也不多。

古城会议后，部队开始进行游击活动。"游击"这个词是后来用的。当时我们叫行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只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那时形成的。

毛主席的建党、建军、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思想也开始体现出来。毛主席经常组织一些工作队、工作小组，做群众工作，亲自领导，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这样，我们就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

古城会议，只讲了以上几个主要问题。

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是一个关键，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在革命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开始了土地革命，由城市转到农村，由交通要道转到偏僻山区，由大革命的正规军变为革命的游击武装，实行武装割据，用乡村来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争取全国胜利。在大革命中，我们是大城市观点，轰轰烈烈，占领交通要道和大城市，有大后方，大兵工厂。到了井冈山，空空如也，两袖清风，又穷又白，白手起家。由白变红，由穷变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就要依靠正确的领导，正确的路线。在井冈山形成了一条完全正确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苏联十月革命，是先有列宁格勒起义，成立政府，再来建设军队。与苏联不同，我们是相辅而分，又建军，又建党，又搞统一战线，军队又打天下，又建党，又搞群众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各种政策摸索、尝试时期的一个“试验田”。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试验田”，这对今天的世界革命是一个卓越的贡献。（查阅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出征的四字布告。）

进军井冈山，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这是一个由城市到农村的大转变。当时人们思想很不容易转这个弯，很多黄埔出身的同志想不通，说：“过去轰轰烈烈，现在冷冷清清。”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明能不能正确适应这个转变，就是敢不敢胜利的问题，说服了大家。这个大转变，接受了大革命的教训，保存了革命的骨干，没有这些骨干是困难的。我们接受了革命的遗产，保存了它，并使它发扬光大，使井冈山成了红色

的保垒，成了东方的北斗，成了中国的希望，成了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宿营地、集合点、宝库。使中国革命的武装群众，象在洞庭湖惊涛骇浪中颠簸的航船，终于由毛主席这个伟大的舵手指引的航向，使我们在井冈山靠岸，得到了休养生息。进军井冈山，这是要不要依靠农民的问题，要不要依靠工农联盟的问题，要不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在农村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在我国，农民问题，农村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一系列的最大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许多人犯错误，就是忽视了广大农民和农村武装割据夺取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常说：要依靠群众，要争取多数，利用矛盾，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敌人。这个战略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治建军，进行人民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秋收起义中的几个人物

卢德铭——第一团团长，黄埔第一期的学生。这个人长得很漂亮，魁梧奇伟、高个俊脸，说话嗓子很洪亮，有煽动力。平易近人，他既能将兵，又能将将，到了宿营地，他常到下面和战士们在一起，民主作风很好，风度也不错。他很少骑马，总是把马给掉队的同志骑。后来他当了秋收起义的总指挥，适应山地行军也穿上了草鞋，给人影响很大。人们说，首长是黄埔出身的人都能吃苦耐劳，象普通一兵，我们为什么不能？他曾搞过几次“民意测验”，不愿干的填表就走。他在关键时刻，非常果断，有事能与群众商量。如在长江船上，决心掉转船

头，登陆黄颡口，是一种起义的非凡举动，到了武宁、奉新、靖安地区渡不渡赣江追赶主力？他认为不能犹豫徘徊，非久停之所，决心转到湘赣边区的修水。尤其是当形势越显不利时，他决心去找党中央请示。他当时说：我们不能象洞庭湖中的小船，荡荡漾漾；我们不能象水上的浮萍一样，摇摇晃晃。他组织能力很强。在武汉时，一个新兵枪走了火，他没严厉批评，他说："你们半夜走火多不好，亏了没打着人，要是把我这个团长打死了，一定会有人说你有意暗害我呢，那时你解释不清楚了，下次注意！"

卢德铭这人警惕性也很高，国共分家之后，他一直带我们到处打野外，怕在营房里叫别人收拾了。练兵时选的地形也不坏，一面靠山一面靠水。政治活动能力很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战士们脚打了泡，他叫军医及时看护，对部队抓得很严。平时很少看见他睡觉，总是在下边到处转。叶挺手下的独立团，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在大革命时代，我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对政治工作还是有一套的。

卢德铭是中小知识分子，确有股子闯劲。虽然在芦溪战斗中不幸牺牲，但是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

宛希先——湖北黄梅县人，脸上有点白麻子。入伍之初，也在我们五连当班长，很能干。据说以后地方上肃反把他误杀了。这可能是地方上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冤枉了他。现在已经追认为烈士。

杨立三——当时是警卫团派到湖南去招收革命干部的招募委员。他任过我们连的司务长。大革命时和滕代远一起在长沙做农民运动工作，他俩与毛主席联系较密切。杨立三到特务连时，我更进一步认识了他。他穿一身黄衣服、马裤，非常精神，也很艰苦，从来不特殊。他很活跃，走到哪里哪里活跃，边走边唱，很有朝气，从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他深入群众，

群众关系很好，热情是他的最大特点。他组织担架队，脑子很灵活，穿的衣服都是他设计的，还会打草鞋。部队经常没钱，他想办法去筹款，越困难越挺身而出。在打张辉瓒时，抓了一万多俘虏，给他们发光洋放他们走。一人发三块，半夜里在桥上发，俘虏们把我们挤的掉到水里去了。我上来说：快冻死我了。他说：这是政治任务，没关系，咬紧牙关吧！这下把俘虏都感动得流了眼泪。当时有的兵被我们抓住七次了，见面后说：何同志，我又来了。我说：没关系，来的次数越多越好。

杨立三的乐观主义精神很强，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低头。打了败仗回来他说：老子又蚀本了，敌人欠我们的账是要加倍赔偿的！这个人模范作用太大了，管经济的人，但自己从不特殊。我们说笑话，革命不胜利，我们不结婚。他说：对，谁结婚就是叛变！当时我们这些人对结婚问题，都没什么要求。到了江西，有些老乡给我们介绍姑娘，大家都不谈。那时，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要求不是很严格，但大家都不谈。到一些地方，一些姑娘在门缝里望红军哥哥。我们望都不望一眼，谁望一眼，就会被人说作风不正派。

当时打仗之前，相互之间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告诉我的老母亲，你儿子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光荣牺牲了。另外一句话是：胜利之后，在烈士纪念册上给我登记一个名字。大家都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的乐观主义。

当时调动工作，叫往哪儿就往哪儿，没个上下之分，到什么地方去，都没有一个讲价钱的。杨立三同志讲：我们干革命，没这种组织性纪律性，就不是真革命。他是干后勤工作的，我常向他讲这样一句话：买卖七十二行，烧酒熬糖，叫花子打狗，专管这一行。要他爱他这一行。他工作很有魄力，是个很好的同志。一九五六年，杨立三同志去逝了，我送了一幅挽联："立志为革命献身，血战二十载，建设方殷君遽陨；病殁

令神送束手，骨归万里，回忆井冈我犹悲。"

辛华文——他是个文人，善于言词，早晚点名都要讲话，好事表扬，坏事批评，周末布置下周任务。据说他同卢德铭由中央一同返回修水时在鄂南殉难了。

三个具体问题

一、六大以后，连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北伐时，连的政治人员叫党代表，团的叫指导员。

二、毛主席到文家市，戴草帽，穿短衣服，白色的短上衣，穿草鞋。那时候穿大褂的是绅士派，怎么能下乡呢？他背一个小包袱，没有警卫员，后来才找人照顾他。头发是方头，手里挂着一个竹子小棒棒，后来给他搞了匹马。

三、关于朱毛会师的提法，有些不同意见和解释。有人认为应提毛朱合师，这不对。朱德找毛泽东会师，朱德同志没有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有根据地，毛是主，朱是客，所以朱毛会师的提法是正确的。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

江　华

我今年六十六岁。我在井冈山时叫黄琳，那时，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宁冈县委书记叫刘辉霄，下井冈山后在南雄县的乌迳林同袁文才一起逃跑了。莲花县委书记是陈精进。那时，何长工任宁冈县委书记。

我在前委是一位工作人员，任秘书。我是二八年红四军成立、朱毛会师后到井冈山根据地的。

井冈山的斗争历史是不能颠倒的。你们是什么时候上山的？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湘南暴动时，林彪是第一连连长，上井冈山后，他还是个连长，直到七溪岭、龙源口战役前才提拔当营长。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会师，不是与其他的人会师，有人还把南昌暴动说成是林彪领导的，这是篡改历史嘛，要抵制，要批判。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历史就是历史。国际上谁都知道，朱毛不能分开，有朱必有毛，有毛必有朱，长征、抗战，直到解放全国都不能分开。

我对篡改历史的人最讨厌。马列主义是讲历史的，历史是唯物主义的，是真理的东西。过去，江西中央苏区都是讲“苏维埃”的，现在连“苏维埃”三个字也都不敢写了。江西苏区就是苏维埃区域，老百姓都懂得。红军战士有了这样的一个口号：“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现在连“中央苏维埃区域”也不敢写

了。真是莫名其妙。难道讲"苏维埃"就是教条、宗派吗？历史就是"苏维埃"嘛。当然，并不是我不赞成讲工农兵民主地区。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主席在茨坪住的时间多。你们要把主席的思想宣传。全国很多地方。建议江西不要搞多了，有井冈山、南昌、瑞金就够了。一多就乱。瑞金主要是宣传一、二、三次反"围剿"，创立红色根据地，主席的活动，各有特点。一搞多了，材料不集中，问题的中心就不突出了。对这个问题，请省委统一起来。

茨坪主席住过的那个房子没有保存好。六五年我回湖南，想去井冈山，因为人太多，没有去成。主席在桃寮、茅坪、砻市都住过。

小井医院原来叫红光医院，院部所在地在中井，在筹建时，我还献了两角钱。一个姓刘的同志负责筹建，他是浏阳工会的委员长。红光医院的院长是曹镤，党代表是肖光球，是我的同学，郴州人，他爱人叫刘涵秋，是三女师的。还有个云南人叫铁玉同志。

后方留守处是邓允庭在那里负责，他是宜章人。我在大井休养两个多月，下山前出来，到前委去了。

茶陵县苏维埃主席第一任是谭震林，是攸县人。当时，其他人都不愿干，他是工人同志，无产阶级，所以叫他当了第一任苏维埃主席。那时，茶陵县委书记是宛希先，他到特委去后，就由谭思聪当。谭思聪以后任湘赣独立十六师政委，牺牲了。我是接谭思聪的工作。谭家述是茶陵游击队副队长，他知道这段情况，可以去找他。谭家述原是叶挺教导团的。我当茶陵县委书记时，县党委和政府的人是很少的，都随游击大队行动，无一定的办公地点，只在宁冈浆山，靠茶陵高陇到永新的小西江边活动。我病了以后，又是谭思聪接任茶陵县委书记。青年团县委

是由罗青山同志负责。

永新县委书记是刘真。遂川是毛泽覃还是陈正人兼不十分清楚。陈正人是特委副书记，是不是兼职不清楚，可能由毛泽覃接他。毛泽覃是与我们一起下山的。谭震林也是特委副书记，主席是前委书记。几个县委的书记，我晓得的是毛泽覃、刘真、刘辉霄、陈竞进、刘宣生。酃县开头是刘寅生，原来是黎育教，这两个人都是第三师范的同学。

边界“一大”、“二大”未参加，不清楚，我刚到，我是五月初到井冈山的。“二大”时，我在山上养病。

十一月还是十二月，彭德怀到宁冈，滕代远上茨坪，我们不久就下山了。滕代远他们上山后，与我们一起下山开会，是在柏露开的会，房子很大。五军到湘赣苏区时，开过联欢大会，是在新城开的。会后就改编了，原五军部队编入四军，为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当副军长，滕代远当副党代表。与三十二团部队一起守山，袁文才随军下山了。三十二团袁文才只两个营，王佐第二营，袁文才第一营。

一九二九年，在于都时，我病了，前委开会决定留在井冈山的部队编为第五纵队，何长工任党代表，王佐任纵队司令员，是叫彭德怀带命令回去的。一纵是林彪，党代表熊寿祺；二纵是胡少海，党代表彭祜（宜章人，江西失败后叛变了）；三纵是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四纵贺国中；五纵王佐、何长工。

那次会（指于都会议）上，林彪表现不好，他给一些破烂枪给人家，本位主义很重。

当时（1928年春季），湖南省委书记是贺昌。我是二八年五月初上山的，我看八月失败同湖南省委很有关系。湖南省委对井冈山不大相信，主要是因湘南特委某些人本身有本位主义，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才被杜修经、龚楚等把二十九团、二

十八团拉走就是这个问题。二十九团垮掉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不强。

开头，主席的部队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主席，我记得是这样，不一定对。

湖南礼陵暴动也影响到了湘南暴动。一九二七年底，湘南特委也搞得很厉害，乱烧，乱杀，乱没收。“左”了，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主席是坚决反对这些错误东西的。所以，后来主席总结说，与国民党合作，容易右倾；与国民党分裂，容易“左”倾。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与国民党分裂了，我们党内容易“左”。

不清楚主席是什么时候给蔡协民烈士照片题字的。这张照片很早。蔡协民是华容县人。谭政是团里的文书。

谭希林要找他，打黄洋界就是他掌迫击炮，打炮把吴尚军队的饭锅子也打破了。那时他在三十一团，他知道些情况。

赖毅也是三十一团的，在南京。

滕代远不能讲话了，本来他对五军、平江暴动、五军上山和守山的情况都知道一些。

刘型、犹龙到井冈山后在连队活动，对连队情况了解一些。

找谭震林可以问前委、特委领导上一些情况，问我不清楚。

刘敌是牺牲了，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

湖南张平化能知道酃县那一部分情况。

下山意图是原想打破敌人的“围剿”，一部分守山，一部分出击，从外面调动敌人，结果适得其反。在大余却打一个败战。一打败就回不来，转到“三南”了。所以，主席讲要慎重初战，初战必胜。一打败，就两头不好。出去的第一仗在大余打不好，调动不了敌人，对围剿井冈山的敌军影响不大，从而与井冈山没有联系了。

下井冈山以后，与江西独立二、四团在吉安东固会师。一个

叫李绍九，一个姓段的，因为与井冈山隔离太远了，过去不知道他们，到东固才知道还有他们的部队。

那时，江西省军委书记是蔡申熙。我是在上海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老婆还记得起我，说有这么一回事，现在她已死了。

到东固时，我们还不知道敌人占领了井冈山，到处找报纸，也没有看到有关消息。到龙岗时，我留下住地，了解地方民情与敌情。房东是地主，而地主很害怕，赶快把我送到东固去了。我一到那里，部队刚准备出发，我就跟着走了。二、四团有盒子枪，有刺刀，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们从东固出发经过宁都北部地区往东南白沙到石城的路上，才知道井冈山失守了。因为一路上都发现后面有部队跟，但不知是什么部队，后来看到墙上有标语，是红五军的标语，又听老百姓说，那个部队很好，打土豪，分谷子，分钱呀，这样才知道井冈山被敌占领了。有时，我们还看到五军的布告。他们没有到东固，打到于都去了，消灭敌人一个工兵营。我们只看到布告上署名是五军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想找他们，就是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后来，我们从瑞金到福建武平，遇到郭凤鸣旅。郭凤鸣从汀州派两个团来堵我们，最后在长弓岭打一仗，消灭了他两个团，击毙郭凤鸣。接着我们直达汀州。郭凤鸣还有一个团在上杭。三月十二日进住汀州。以后在瑞金与彭德怀会合，是赣南特委书记杨柳青秘密写信通知我们的。四月五日在瑞金开了会，又到于都继续开，决定彭德怀部回井冈山。开会前我病了，没有参加会议。

下山前，主席到（红光医院）院部来问我走不走？主席叫我到前委去，我就离开院部到前委去了。出院后到茨坪住，这时"六大"文件来了。以后会见滕代远就下山，在柏路开了会。

有个医生叫段执中，是云南人，外科医生。记得他抽烟是把大竹筒吸烟的。听说他现在还在云南。

医院门口有牌子，写了“红光医院”，可能是纸写的，什么纸记不得了。红光医院是总的名称，大井、小井、中井各有一部分，院部在中井。

后方留守处在大井。它管家属，还搞农业生产，种地、种菜、养猪等。因为伙食单位归它管，有伙食单位就要种菜、养猪。伙食钱每人两分钱一天。很早就成立了留守处，我上山前就有了，有个邓允庭，就是留守处的负责人。

我到大井，那里有一个破庙。我去看病，就是在这个破庙里看的。那时，我住在老百姓家里。破庙靠在山边边，在中井到大井的路的右边。我住在老百姓家里，是在路的左边。在大井吃中药，西医在小井看外科。师长张子清在中井院部住，他走不动，要别人照顾他。他两个脚都伤了，走路要抬着走。他是敌人用机关枪打伤的，是在赣州被杀的。井冈山失败时，张子清被敌人捉去了，解到赣州被杀的。还有伍若兰同志也是在赣州被杀的。

欧阳健是浏阳人，是同宋任穷在一起的。

我们在项山住一晚。圳下那次战斗，林彪是后卫，三十一团是前卫，中间是毕占云的特务营。你们可以去找他，他是特务营营长。特务营的哨兵一撤，敌人从中间将部队插断，敌人就射击了，林彪没有掩护，这时，谭震林叫主席快走。杨梅生的手枪班掩护了主席，朱德就到二十八团那里去了。到项山会合，我们才知道伍若兰同志被俘了。

在项山，朱老总化名王楷，是有个准备，因为在大余打散过，这次又打散，准备再打散，所以部队分为一、二、三纵队，有情况，我们跟三纵走。但是，好事不过三，准备了没有实现。

张子清在三十一团的指战员中有很好的影响。他是唐生智的北伐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长。我在中井院部时，到过他那里，看过他。院部的房子是新建的，比较宽，老百姓的没有那么

宽，是个土房子，里边没有多少东西。房子都是杉木皮盖的，木头的多，砖瓦很少。开始树梁时，刘老头还在梁上挂了红纸，迷信得很，要选个“黄道吉日”上梁。我说会垮，他说革命胜利了，垮了就垮了，我到城市去了。

《井冈山的斗争》嘛，当然是在井冈山写的。我记得是在茨坪一个柜台上写的。这是一个铺子，一进门，右边就是一个柜台，主席睡在柜台右边，我们睡在里边的地上。柜台可以睡人，又是写字的桌子。这篇著作就是在茨坪写的。主席有时去桃寮，住桃寮的也很多，茅坪也住过，主席经常住桃寮、茨坪两个地方。长篇著作究竟在什么地方写的，那就不清楚了。我举个例子：红四军在新泉时主席写给中央的一个报告，在几个地方都写过，一个地方写一段，在新泉是最后完稿。到这里写一段，到那里又写一段，最后到新泉才写完，你硬要说是固定在那个地方写的，那就没有办法呀！在长汀写的一个报告，是三月十二日打开汀州后住下来才写成的。总是要安定后才能写东西，有一个时间性嘛。在柜台上就不能写啊？！一定要在办公桌子上写啊？！外面的石头上也可以写。主席也不是用现在这样的笔（指钢笔）写的，主席当时主要用铅笔写。那时，毛笔也不好在战争行动中用，我们用也是铅笔多，你们要画有什么办法！在战争环境里，哪有那个东西，还有墨水什么的，买墨水到哪里去买？要相信人嘛。战争环境里，住三天都不容易。敌情不允许你多住，就要转移。非要消灭了敌人，才能住上三几天。一般住一两晚就不错了。

对湖南省委怎么看，主席历来不谈这些。怎么会对我们谈呢？我们讲到湖南省委书记时，主席只讲我认识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我们讲我们认得陈佑魁，主席讲这个人我也认得。

我记得在五几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把井冈山“八月失败”的情况与主席凑了凑。八月失败，我们不了解。我认为陈

毅应负主要责任，因为陈毅是军委书记，他要负责。主席讲，陈毅有个检讨，事先写了信给他，事后也写了信给他，不能怪他。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也有责任，二十九团龚楚，还有王尔琢这些人附和。去了就失败了，不听主席意见嘛！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卅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持的人（指陈毅同志）死掉了。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那时刘真还在。我去之前，特委在永新县城开了一个会。我去时，是带了主席的信，不是口头说的。我口头不能说，因与他们不熟。他们讨论后回来跑了四十里，到了过河那里，是沔渡吧，我还等他们过河呐。要过河，他们就不过了。二十九团把枪放下来，不愿意过河，非要南去不可。我就回来了。我说，你们走，要报告党代表，陈毅就写了信。他事后有报告，我不清楚。主席讲了，责任就弄清楚了。地方主要是湘南特委杜修经。军队是二十九团龚楚他们，没有教育战士。龚楚后来叛变了。

井冈山的老百姓不知道林彪，只知道朱毛，对林彪很讨厌。这些人还在嘛，过若干年后就没有什么人了，现在朱老总还在嘛。林彪背米！那时他病得要命，他哪里背米！肖克还在，就有意见。肖克是第二营营长，他不知道吗？！营长背过米，也没有什么嘛！

四言体布告是在山上写的。下山是做了准备的。下山时，主席与前委机关是一起走的。军部走，我们就走。杨至诚是军部副官长。前委在的没有什么人了。谭震林是前委的，是前委委员。下面有些人留着，没有下山。

工农运动委员会是出发前就组织起来了。负责人是主席、谭震林，是公开的，做政治工作的。那时没有四军政治部，就是一个军委、前委。忘记了是叫“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还是“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是主席、谭震林，毛泽覃是搞宣传的，哪个搞组织？大概是彭祜或陈毅搞组织，陈精进是农民，我是职工，伍若兰是妇女，青年是万什么才？酃县人。就这些人，青年、妇女、组织、职工、农民、宣传。我记得在大余还到工厂找木工、店员开会，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解决一些问题。陈精进做农运工作，伍若兰做妇女工作。打开汀州，成立了红四军政治部。路上没有什么活动，因为没有停，一直在走。

原来，前委秘书长是邓乾元。邓乾元没有下山前就走了接着刘辉霄是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在乌迳同袁文才开小差了。

从红四军成立到离开井冈山前后的几个主要战役

肖　克

八月失败的经过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旬，湖南敌人吴尚第八军侵入宁冈，再进永新，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二十八团从安福来，二十九团从莲花来，没有打上敌人，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到了酃县，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确定回湘南，派人通知我们在后方的人能走的赶到酃县。到了酃县，我就听到讲回湘南的问题。第二天早晨就集合出发，这时朱德出来讲话，说军委还没有决定，令部队开到沔渡，但下面吵着要回湘南。可能当时军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那时也不是大家都要去湘南，二十八团就不赞成回去，我们二十九团单独回去也没有信心，起码我是没有信心。当时农民意识反映出来的极端民主化，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军委领导无能。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里说："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情况就是这样。

部队勉强开回到沔渡。如果当时军委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说服部队干部战士，是可以挽回的。当时二十八团不愿意回湘南，二十九团也不是全部要回去的，如果把道理讲清楚，

是能说服的。但是，杜修经放火，底下农民意识在那里作怪，上下的错误倾向合流，加上军委领导无能，最后还是决定回湘南。杜修经随军行动。

后来，部队走到水口，还有两种意见。二十八团不同意回去，二十九团也有人不同意回去，因此在水口又开了个会。我的脚没有全好，没有去参加，我们支部派代表去，他回来对我说：王团长（王尔琢）反对回湘南，杜修经就指着王团长的鼻子骂："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云云。

在水口停了一天，第二天又走，二十九团走在前面，二十八团走在后面。二十九团就是想回家乡，一天走七、八十里，二十八团赶都赶不上。

过了六、七天，到七月二十四日打下郴州。二十八团住在靠北边，二十九团住在靠南边。将近黄昏，范石生的部队从北面来反攻，同二十八团打，二十九团一听到打枪就向南面走，老小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里乱跑。走出两、三里路队伍还是不停。我看情况不对，二十八团在打仗，二十九团怎么不去增援，反而向南跑，因此，我就叫我们这个连坐着，不要走动，我们那个连还比较整齐，只走散一些。二十九团的人走完了，北面二十八团还在打。我想军部没有去宜章的命令，是大家向南乱跑的，就带着这个连往回走，走到晚上八、九点钟，二十八团正向东面来的路上撤退，我们就跟着二十八团向东走。

第二天，退到东江，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带着通讯排也回到这里来了。因为队伍掌握不到，他只带了一、二十个通讯员，特务连也没有到齐，还有些勤务人员。当时我那个连有六、七十人，四十五枝枪。二十九团全部一共只有一百多个人，八、九十条枪。住了天把，全军又退到资兴的龙溪洞（那是山区，一块开阔地有三四个村子，就叫一个洞，在资兴、桂东汝城之间有龙溪十二洞）；就把二十九团的一百多人编到二十八

团。同时，把军部的特务营也编到二十八团去了。宋乔生是特务营营长，水口山工人，特务营改编后，他就到军委工作去了。

八月一日，在龙溪洞的布田圩开了一个“八一”起义纪念大会。以后就在龙溪洞、桂东县沙田圩一带分兵，有人揭发二营营长袁崇全从郴州回来就想带着队伍另外走一条路，说这个人靠不住。后来就开了个会，地点可能是在布田圩，当着他的面在会上又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个家伙暴跳如雷，说没有这回事。后来军委感觉到这个人不可靠，决定调动，但还没有执行。那时队伍要分兵，就由他带着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和二营全部分兵游击。那时有少数人动摇想跑，又发觉另外两个干部想跑，军委就决定把他们抓起来，结果走漏了消息，那两个家伙逃跑了一个。

袁崇全带着六个连向前走，越走越远，干部们就怀疑了，以机关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和六连党代表赵尔陆为首，就找其他连大部分党代表和连排长商量，说有问题。一个排长说：他要反革命，我就敢打死他。他们十几个人就带着盒子枪到营部问：到哪里去？军部有命令没有？营党代表和副营长都是反革命，假造一套说军部口头交待的。他们回来了，但不相信，就商量当天晚上几个连到一个地方集合。到了半夜，六、七、八连和机关枪连共四个连集合了。迫击炮连靠着营部住，五连连长是袁崇全的亲信，这两个连没有来。四个连集合起来就往回走，回到了团部、军部驻地。叛徒带着第五连和迫击炮连走了。

四个连回来报告说，袁崇全叛变了。于是就由王尔琢来兼二营营长，继续分兵。第一营分到桂东，住了一个礼拜，毛主席来接我们了。第二天朱德、陈毅同志就带着军部来桂东和毛主席会合，决议重回井冈山。这时敌人吴尚的第八军就来进攻，我们第一营跟敌人打，打得很恶，敌人把毛主席带来的第三营和我们切断了，毛主席在军部这一边。

撤退下来以后，我们就向南转向井冈山。有一天，老百姓说，在崇义的思训圩有二三百人的队伍，有三门迫击炮。思训圩离我们三十多里，晚上王尔琢就带着二营的三个连去包围，半夜，把思训圩包围住了。叛徒发现了就打枪，王团长就带着通讯班往街上走，王团长喊：我是团长，来接你们的。士兵听到是王团长的声音，就不打枪了。这时叛徒带着十几个死党，集中了七、八条枪向王团长射击，王团长牺牲了，袁崇全和十几个死党跑掉了，那两个连也回来了。

当时下面揭发反革命，领导上有缺点，决定调动袁崇全没有立即执行。王团长革命坚决，对反革命警惕不够。结果自己死掉了。我们大家都怀念这个同志。

以后，部队就经过遂川回到了井冈山。

从湘南到井冈山

湘南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都陆续到井冈山来了。我们的部队是最后到的。正因为是最后到的，所以在资兴的龙溪洞见到了毛主席。

我们宜章农民队伍有五、六百人，六十枝枪（大部份是土造的五响枪），三、四百枝梭镖。上井冈山以前，我们住在粤汉线西侧宜章县的西南面，三月下旬，白崇禧的军队从衡阳，耒阳向南进攻，许克祥的部队和范石生的十六军从广东乐昌向北进攻，把单汉线切断了，我们就在宜章县境内的骑田岭活动了半个月。一天晚上，我们偷过粤汉线（那时还没有修粤汉铁路，在修公路），从宜章、郴州之间插到东边的五盖山。下了五盖山，再向东走，走到资兴的龙溪洞，正好和毛主席带的部队（打汝城回来）碰上了。我们首先碰到的是陈毅安的连。我说："我们是宜章农民队伍。"陈毅安说："我们是毛师长的队伍。"

我们就在龙溪洞见到了毛主席。从此，毛主席就带领我们上了井冈山（经中村、水口、沔渡、十都到龙市集中）。至于毛主席中途是从水口还是从沔渡离开我们的，我记不清了。（插问：是先到沔渡还是先到十都？）是先到沔渡，后到十都，因为我们宜章县委在十都，我们到沔渡后去十都找到了宜章县委和宜章农民团团部，然后都开到砻市，参加了在砻市举行的红四军成立大会。

成立红四军的番号是：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下分九个团，即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主要是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这四个团。我们宜章农民团编为二十九团，我在二十九团二营七连当连长。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等县的农民编为三十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各团各由哪些地方的农民组成，是不是以县为单位来编的，我搞不清楚。各团的人数和武器也有多有少。

红四军成立时，在砻市召开了红四军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很多，我们二十九团都参加了。

我在砻市见到毛主席两次。一次是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还是什么会议记不清楚了，有一、二百人参加。在砻市街上什么地方开的也记不得了，是不是在军部开的恍惚得很。我记得是在一个颇大的房子里，在会上，毛主席、朱德、王尔琢都讲了话。会议内容回忆了一点，告诉了宁冈的同志。另一次是开大会，主席讲了话。会上除了领导同志讲话以外，还演了些游艺节目。毛主席在大会上讲的还记得点：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要遵守纪律。工人农民的东西那怕是一个鸡蛋也拿不得。大概是讲三大纪律，我现在印象深的是工人农民的军队，要遵守纪律，工人农民的东西那怕是一个鸡蛋也拿不得。

在砻市没有住几天，队伍就出发了。

一 打 永 新

第一次打永新我们二十九团是从砻市出发的，其他的部队是从那里出发的不知道。那时上级通知大家要带五天的粮食，说是要经过一座大高山，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是井冈山，只知有大小五井。到了大小五井，是走大陇来的还是走茅坪来的记不得了。在大小五井住了一晚，接着到了茨坪、土岭、行洲住了一晚。二十八团在我们后面。那天陈毅同志也在行洲，他是湘南红军第一师的师党代表，我是第一次见到他。

第二天一早，大约是五点多钟，我们二十九团从行洲出发，经过硃砂冲的那条小路，去打黄坳。大约走了二、三个小时，在八点钟左右到了黄坳。当时在黄坳的敌人有一个营，占领了黄坳街和黄坳街后面的那两个山头，那天（指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整理者注）我到黄坳问老百姓，老百姓回忆说敌人就是占领了那两个山头。我们的队伍一出口子（指从硃砂冲通往黄坳的小路出处——整理者注），敌人就打枪，我们马上占领了口子附近的山头，立即展开，分几路冲过河去，又往山上冲，把敌人冲垮了。敌人是哪一个部队的我记不清楚。我这次到黄坳时，老百姓回忆说敌人喊他们的头子叫"周团总"，如果他记得不错，那敌人可能是二十七师八十一团。我们缴了他们五、六十条枪。我们自己伤亡了三、四十人。

我们是农民团，能打仗。敌人一个营，有三百枝枪。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少，只有两门迫击炮，两百枝枪多一点点。我们那个连只有三十二、三枝枪，有些连只有二十几枝、十几枝，最多的第一连也只有五十多枝枪。梭镖，我们二十九团有八、九百枝。所以看起来都是梭镖。但是，我们人多，有冲劲。我们

二十九团连老小有两千人，除了老人、小孩、妇女有一千六、七百人。那天参加打黄坳的有一千一、二百人，我们一冲就把敌人冲垮了。我们天亮从行洲出发，大约八点多钟打，打了一、两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

如果我们把整个一打永新当作井冈山斗争全盛时期的第一个战役，那么打黄坳就是第一个战役的第一个战斗。这一仗虽然只缴了五、六十枝枪，但它是农民部队打的，说明农民部队是能打仗的。湘南暴动的宜章农民到这时候，不过三个多月，又从宜章走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垮了敌人正规军，意义是不小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一九四九年就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这个战斗很难说是什么战术，那时主席的“十六字诀”我们还不知道。靠的是革命农民的勇敢战斗，我们是从正面扑过去的。在打仗以前，我们只知道明天出山，要准备打仗，当时部队在行洲挤得密密的，动员简单得很。

打垮敌人以后，当天我们在黄坳住了。不久，军部和二十八团也来了。军部留在黄坳，二十八团马上就开往五斗江。

五斗江战斗是这个战役的第二战斗，是第二天在五斗江打的。敌人是从拿山来的，是八十一团。在黄坳被我们打败的敌人，往五斗江、拿山方向退了。因为我们二十九团打黄坳时，大多数是梭镖，跑回去的敌人就报告说，我们是梭镖队。敌人听说是镖标队，马上就出发，走了一晚，走到第二天早晨到五斗江，包围我们二十八团，结果碰上硬钉子。当时二十八团有十三个步兵连，加上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机关枪连，战斗力很强。

打五斗江那天上午下雨，我们在黄坳听不到枪声，听到前面来报告说，五斗江那边打枪了。吃了中饭，军部带领二十九团赶到五斗江，战斗早已结束了。二八年八月我被调到二十八团后，二十八团参加过五斗江战斗的士兵对我谈起，他们讲：那

天下大雨（在黄坳只是下小雨），我们二十八团住在五斗江，敌人把山都占领了，我们一个反击，打了个把钟头，就把敌人打垮了，缴到了几百枝枪，刘型同志说缴到了三百几十枝枪，我看差不多。"（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七日上午，刘型同志与肖克同志交谈时说：五斗江战斗那天，拂晓，敌人就来了，包围二十八团，我们跟敌人打的是第一营，另外两个营已从后面包围了敌人，然后再打——整理者注）

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二十九团是打黄坳的，没有参加五斗江战斗，五斗江这一仗是二十八团上午打的，二十九团是下午才到的。五斗江战斗胜利后，听说没有一直追下去。我记得后来有人述说：敌人那天从拿山来，走了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很疲劳，如果一直追下去，敌人就可能完全缴械。

五斗江战斗是发现敌人后反击敌人。同时，二十九团没有参加五斗江战斗是确定的。三十一团是否参加这次作战，当时以后都没有听说。纵然参加在发现敌人后反击敌人，也不可能从山上走那么远对敌人形成迂回包围。另外，消灭敌人基本上是在五斗江消灭的。

在五斗江打垮敌人以后，当天二十八团住在五斗江，我们二十九团住在五斗江附近。第二天进到拿山，二十八团先走随后就是军部和二十九团，打黄坳是第一天，打五斗江是第二天，到拿山是第三天。第四天一早我们就随军部出发了。

离永新一里多，就听到枪声，我们下到半山，前面正在打。我们赶到时，二十八团已打垮了敌八十团和八十一团的残部。这一仗是在离永新有五、六里路的地方打的。那天走了六十里，打了两个钟头，打到天快黑才进城，二十八团住永新城，我们二十九团也靠到永新城附近住。

占领永新以后，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开了个大会，有群众参加。三十一团没有看到，但宛希先来了，还讲了话。没有见

到毛主席。

第一次打进永新以后就分兵，前锋部队到了天河，我们二十九团团部住在石灰桥，主要是作群众工作。有一天，叫我们去团部开会，宛希先同志在会上和我们讲了毛主席的“十六字诀”。因为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印象比较深刻，所以对宛希先同志的印象也比较深刻。

第一个战役就讲到这里。这个战役是由黄坳、五斗江、永新三个战斗组成的。第一个战斗是二十九团打黄坳，初战；第二个战斗是二十八团打五斗江，大打；第三个战斗是打永新，结束。

二 打 永 新

第二个战役我没有参加，但大体知道，我认识的二十八团的干部同我讲过。

在永新作群众工作半个月以后，敌人开始从吉安向永新进犯。我们从天河、高桥、石灰桥一带向永新撤退。我们二十九团向烟江、龙源口方向撤，我连是后卫。二十八团开头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才知道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的一个营打茶陵的高陇去了。我们撤退到龙源口这边来，敌人占领了烟江。我们是慢慢撤的，敌人来了，我们抵抗一下才走；不来，就不走，过不几天，我们回到宁冈，二十八团打了大胜仗回来了与我们同在一起。

谈谈二十八团这一路。从当时的通报和与熟人谈话知道。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开头是打高陇。这一仗是打的湖南敌人。我们击溃敌人这是第一仗，随即由西向东，一天从高陇赶到澧田，前卫到澧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与澧田的靖卫团打起来。敌人看不到我们后面的大队伍，以为我们只有一百多人，不知

道我们有大队人马。我们的队伍当天住在澧田。第二天早晨，前进袭击永新。杨如轩共四个团，有两个团到烟江追我们了，我们向团部作了报告，我们的行动是不是上面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除了向烟江进犯的两团敌军以外，县城还有敌军两个团和师部。杨如轩听说澧田有红军，就派七十九团向澧田进犯，两军恰恰在草市坳遭遇，这是属于遭遇战性质，不能说是歼灭战，顶多可以说是歼灭性的打击。敌人从永新来，我们从澧田去，两军相遇，当然是遭遇战，这次战斗打了一、二个钟头，连敌团长刘胡子都打死了。当时敌人在城里还有一个团加上杨如轩的师部。他们还不知道七十九团在草市凹被我军打垮了。我们追到永新城，街上队伍和行李辎重都挤乱了，我 们 缴 了 很多东西。因烟江有敌两个团，我们就经高坑、三湾，退回宁冈砻市来了。二十九团也到了龙市。这就是第二次打永新。二打永新是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打的，二十九团向龙源口撤退，把敌人两个团吸引到烟江。

过了两年，这个材料又得到了补充，因为罗炳辉同志起义过来了。二打永新时他在杨如轩部队里干，用他的话说：你们到澧田的那天，澧田的靖卫团到永新来报告，说你们只 有 百 把人。杨如轩信以为真，说：好，明天派七十九团到澧田去。他不知道澧田有红军的主力。七十九团出去没有好久，杨如轩在师部听留声机，有人听到打枪，向他报告，他说，没有事，七十九团到前面去了。再过了一会，又来报告，说枪声近了。杨如轩正在听留声机听得高兴，又把报告人骂了一顿。枪声越打越近，报告人怕挨骂也不敢来报告。忽然一颗子弹打到瓦上，杨如轩自己听到了，他马上停止放留声机，往外就跑。红军当时已经离城不远，街上满街是人和行李辎重，挤得乱七八糟。杨如轩走到城门口，人和担子把城门塞住了，根本挤不出去，喊也没有人听，城门两边有阶梯，他就从阶梯上上城墙，我军

越打越近，他只得从城墙上跳下去逃命。这时一颗流弹打到了他，使他受了轻伤，他手下的人赶快把他护送走了。这个材料是罗炳辉同志亲自跟我讲的。在井冈山时，有个战士，编了个快板，叫《杨如轩带花》。他根据历史事实和想象加上文艺的词句，一唱唱了一、二十分钟，大家听了很高兴。

二打永新这个战役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先是在高陇打了一仗，接着在草市凹取得很大胜利，追击到永新城又打垮了敌人一个团和师部。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全盛时期二打永新这个战役的两个战斗。

三 打 永 新

现在讲井冈山根据地全盛时期的第三个战役：龙源口大捷。

打龙源口敌人来了三个团。一个团向新七溪岭进犯，我记得是三军的二十七团；两个团进犯老七溪岭。这次战役敌人是杨池生指挥的。据说他在老七溪岭那边。我们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个营，一个特务连守在新七溪岭。

那时我们连是守新七溪岭的，突然接到命令撤退，我们就撤了下来，快下山脚，通讯员传令赶快回头。军部当时在新城（刘型插话：主席也在新城，我看到了）。我连上山以后，到了山上，敌人已占了一个比我们矮一点的山坡；如果不回去，这个山坡仍是我们占领的。不久，大部队来了，接上我们和敌人打，打了一个多钟头，把我们抽下，后来又调我们去冲，冲到山下时，我右脚负伤了，下了火线。晚上听说打了胜仗。老七溪岭的敌军主力被我军击溃了，接着，我军迂回到龙源口，截断新七溪岭之敌的退路，三军二十七团全部歼灭。这一仗胜利是很大的。

这一仗从六月二十三日早晨六点打起，据说下午五、六点钟结束，打了整整一天时间。龙源口战斗结束后，毛主席分兵二十八团往安福，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天河。

我看攻新七溪岭的不一定是李文彬部，理由有两点：

1.如果李文彬部同我们在龙源口打了的话，那就被消灭了；可是过了三个月，李攻我遂川，与他打了几个钟头，结果我们因兵力不集中撤退了。

2.毛选载道："聪明的敌人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这篇文章是十一月廿五日写的，如果李在龙源口被消灭，自己的伤兵也管不了，我们的伤兵是在遂川被俘的。

我记得新七溪岭被消灭的是二十七团。

战前，我都始终在永新，石灰桥一带，敌人来了慢慢退，当时没有明确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行动上是体现了这一点的。老七溪岭我们是一个团打敌人两个团，具体打法我不清楚。这时候我不在二十八团。

四 打 永 新

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率领红军大队从湘南回到了井冈山。这时，宁冈乡下还是我们的。当时我们在茅坪。十月一日，敌人周浑元部的一个营长叫周忠询，袭击我们，正碰到二十八团，在离茅坪二里的坳头垅打垮了敌军，随即乘胜占领新城。这次共打垮敌人六个连。

不久，又分兵了。二十八团二、三营和三十一团全部到遂川打游击，二十八团一营和袁文才、王佐部守井冈山。毛主席在茨坪总揽边界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

去遂川时，组织了遂川行动委员会，指派朱德同志为行委书

记，以后遂川行委也发回文件，主要是谈在遂川的分兵部署和工作情况。当时周子昆同志带教导队在黄洋界筑工事，我们一营派两个连在白泥湖一带筑工事，其他都在茅坪，白露、古城一带活动。

在遂川工作二十多天，解决棉花、棉布的问题。随后，主力重回井冈山。我们打下了新城，歼敌一营，次日，向永新挺进。在四教书院，又击溃敌军一个营，当晚我们住烟江，第二天上午打到永新去。我们去的部队是二十八团全部，三十一团一营和团部，何挺颖同志也去了。我们当时主要是攻东瓜岭。敌人在东瓜岭一带作了工事，一直打到下午，敌人的最后阵地没有攻下，我们就撤退了。我记得有两个连打进去了，因为城里敌人力量薄弱，主力撤退，他们也退出来了。永新城与东瓜岭隔河，东瓜岭是敌人主要阵地，我军从县城也插不到敌后面去。

这个战役是由三个战斗阶段组成的。第一战是打新城、龙源口，第二战是打四教书院，胜利了，第三战是打永新，未胜。没有最后解决战斗。因此这个战役只收复了新城、龙源口。这是主席后来到东固时讲的。主席在东固曾经开大会传达过“六大”的精神。

至于运粮上山，那是四打永新回来以后。当时我们住在宁冈，挑粮时住在柏露。我们把粮食从柏露运到桃寮，再由住五井、茨坪的人派人到桃寮来接。从柏露到寮桃二十里，我们一天运一趟，来回四十里，大约运了一个月。在十一月份我们住在宁冈，有一天我到新城军部去开会还是干什么记不准了，我看到主席写的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手稿（用毛笔写的）好几个人在传看。

其他几个问题

1.我第一次听到“十六字诀”是宛希先讲的，前面说过

了。他把十六个字一句一句作了解释。以后，我也听到毛主席讲过。主席说到打圈子政策，举了个例子说：八十一团有一次追我们，我们打一个圈子他就不知道我们到那里去了。毛主席当时讲了具体地点，现在记不起来了。毛主席说：打圈子是个好办法。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他讲了两句话："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两句话一半对一半不对，我们就应该又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也是把它当作故事来听的。朱聋子不象孔夫子、孟夫子，上了书的，他讲的话没有人注意，主席却能够取其精华，去弃糟粕。我们从这个具体事例中，可以看到主席是怎样善于分析问题的。毛主席在以后著作和言论中，常常教导我们，对于任何问题要取分析态度。

2.主席作了很多工作，我讲不清楚，只讲记得到的一些，例如：为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就多次讲了它的重要意义，当时还发枪给地方武装，例如军部指示我营拨枪给茶陵游击队等等。毛主席有一次把我们当时的思想和工作，用二、三、四这三个字为句首表达出来，二字是讲两种战争，一个是正义战争，一个是非正义战争，并对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作了解释；三是讲三大纪律，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那三条；四是讲四种工作，就是建党，建立苏维埃（主席还说：宁冈的客家人，我叫"埃"，苏维埃政府就叫"埃政府"，表示是我的政府之意），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是不是叫游击队三个字记不清了，也可能是叫暴动队、赤卫队）。这三个字很重要，如果懂得了两种战争就是懂得了马列主义，至少是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三大纪律是红军建军的重要的一方面，四种工作包括了红军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帮助群众建立政权，把红军的重要任务都包括了。这二、三、四我到现在还

记得，影响很深。

3.二十八团刚上山时党员少，上面传下来说主席说的要多发展党员。当年进行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土豪劣绅等许多教育。形势教育是有的，主席当年分析过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问题，分析过蒋派、汪派、桂派、冯派、阎派等中国的各派军阀。记得有个文件专门分析过各派军阀，对国际形势，对苏联的作用，主席当时都讲过。

4.我们下山以前就听说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我们下山时接到了有关“六大”的材料，据说是国民党八十一团的一个秘密党员搞来的。

关于高陇战斗的回忆

肖　　克

我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上井冈山的，对前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茶陵的革命活动，我不清楚。

一九二八年五月打高陇我没有去。当时，我在二十九团。我们二十九团是从永新、烟江撤到龙源口的。打高陇就是二十八团的全部和三十一团的一个营（营长袁一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是朱德、陈毅两同志带队去的。高陇战斗结束后，我军在一天行军一百多里来到永新澧田住宿了一晚，澧田的地主武装将此情况报告了永新城内敌军指挥部。永新敌军杨如轩就派七十九团向澧田进攻，在草市坳击溃。我军来到永新城，又击溃了敌军一个师部和另一个团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高陇战斗和打永新的情况，我是当时听到二十八团的人讲的。

谈龙源口战斗

刘　型

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还有：张宗逊同志，当时是三十一团二连连长。谭政同志当时是在三十一团党委工作，是秘书。朱良才同志可能在三十一团一营任书记（旧军队管理文书工作的职称）。陈士榘同志是一连副连长。韩伟同志是三十一团一营二连的排长，张令彬同志和赖毅同志是管理员（当时叫副官）。李克如为三十一团一营三连的党代表。关于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情况，何长工（当时是团党代表）、粟裕（当时是二十八团连的党代表）、肖克（二十九团连长）同志了解，请再访问他们。

当时敌情是湘赣两省之敌的"会剿"，但其行动并不一致。江西之敌是积极的，湖南之敌是防御的。赣敌是第三军第九师（杨池生）的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团；第九军杨如轩师的八十、八十一两个团在永新城（敌七十九团先在永新草市坳被我军全歼，团长刘胡子被打死。）

我军原在酃县。打酃县是为了把江西之敌调出来打。打酃县是在砻市开的誓师大会。打完酃县回师宁冈在古城开干部会，决定迎击永新之敌。这时（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三十一团在新城。毛主席在新城，作战时朱德同志在新七溪岭望月亭指挥。

敌攻新七溪岭的是第二十七团。二十三日拂晓就打响了。攻老七溪岭的是敌人的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老七溪岭这条路比较大。敌人企图直趋新城、古城到大陇、砻市占领宁冈。新老七溪岭我军总的都是居高临下。但老七溪岭敌人也占了某些次高地。下午，我军在老七溪岭开始反击，打垮敌人后，直趋到龙源

口，将新七溪岭溃逃的敌人二十七团歼灭。当天是新七溪岭先打响的。

第三十一团团部带第三营到睦村担任警戒湘敌来犯的任务去了，王佐部守井冈山，袁文才部的任务是警戒湖南的敌人。可以说红军的全部都参加了战斗。

关于战场上敌军的兵力，写“一个正规师”为好，不要写“五个团”。杨开明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给中央写过一份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报告，其中对七溪岭战斗写得简要，对以后的情况写得较详细。关于七溪岭战斗写道：“……赣敌共三团，杨如轩指挥之，我军亦三团，与敌战一日之久。敌二十五、二十六团为江西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都系老兵，技术熟练。这次的战斗敌我兵力相当，为红军经过所谓大战，其间进退周旋，经过许久的肉搏，因为我们占得地形的优越，敌仰我俯，居高临下，我军一鼓败之，其间战机的危险非常严重，不为敌人所败者几希。……此役敌人三团全溃，缴枪七、八百支，杨如轩带花逃跑，俘虏敌官兵甚多，敌死伤数百，我军亦有死伤，这天二十八团三营长肖劲，三十一团一营三连连长资秉谦，连党代表肖光钺，向大恢牺牲。敌逐退出永新，永新即为我全部占领”。

“三稳”“三猛”不是打七溪岭时提出来的，是第三次反“围剿”后，林彪提出的。当时刘伯承批评过他。第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原是周子昆，一九二七年冬在广东坪石伤后提林彪任一营营长（林原是二连连长）。

当时部队进永新城，毛主席是次日到永新城的。

李文彬是敌第二十一团团长，当时在遂川，没有到七岭溪。以后李文彬为敌第二十一旅旅长。

朱德同志没有到过三十一团一营指挥所，因望月亭离三十一团一营很近，不过几百米之距离，可是却隔着一个断岩，两地不能直达。

黄洋界保卫战回忆

刘　型

黄洋界保卫战，是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是毛主席人民战争路线的一次伟大胜利的战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率领红军第四军回师井冈山的时候，欣悉这一次战斗保卫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便挥笔写就了雄伟的史诗：

西　江　月

井　冈　山

一九二八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毛主席的诗篇，歌颂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成为这段光辉英雄历史的纪录。我们重温这一段历史，就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这一伟大诗篇，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为中国革命而英勇奋斗。

敌 我 形 势

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七月，在湘赣边界，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军事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割据地区也一天比一天扩大。可是，那时的湖南省委却采取了错误的冒进政策。七月十七日，在酃县，“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补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合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毛主席《井冈山的斗争》）是为“八月失败”。

其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红军第三十一团（只有两营）不足一团之兵力，阻击从吉安来犯我永新之赣敌十一个团，“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毛主席《井冈山的斗争》）掩护农民割禾，得到土地革命果实。但狡猾的敌人得知我军于七月二十四日攻打郴州受挫，永新城里的敌人便向我猛攻。八月中旬，按毛主席的部署，撤至永新西部与莲花、茶陵边界集结。

到达九陂村的当天晚上，毛主席便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讨论行动问题，并总结永新阻敌的经验。这时，湖南省委又派袁德生代表来了，要红军主力去打湘东，企图实现其促进湖南省总暴动，并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相联系的盲动主义路线计划。当时湖南省委还说什么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应该坚决地执行哩。岂不可笑又可恼。

夜深了，村子里送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伙事担子的一个农

民回来了，找来一问，才知道我军在湘南失利的情况。得此消息，毛主席当即决定，由他亲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桂东去迎还大队，急令第一营坚守井冈山。

次晨，毛主席率第三营取间道往桂东走了。团长朱云卿、团党代表何挺颖布置了第一营的工作，就带着团部和直属部队到井冈山部署防务去了。一营留在永新、莲花、茶陵边境打游击、作群众工作，保卫工农政权，牵制与迷惑敌人，密切的注视着湘赣两省敌人的动向。

情况紧急！第三营和团部出发后，不几天，得知赣敌金汉鼎部一个团从永新城直趋龙源口，有进击宁冈新城模样，湘敌新八军一个师有从酃县进砻市直取井冈山模样，这时湘敌也正在桂东一带与我二十八团激战，企图趁机袭取井冈山，迫使我主力回不了根据地。我一营营长陈毅安得此情报，乃率第一第三两个连，带有三天粮食急速行进，经高坑、田西、段家坪、柴口、西坑、绞车垇、上源冲、下水湾、垇里、砻市、大陇、茅坪，先敌一天回到了小井，接受保卫井冈山的任务（第二连仍留在原工作地区牵制敌人）。这一路上虽说是羊肠小道，人烟稀少，走起来很费劲，但毕竟由于进出频繁，驾轻就熟，毫不困难。尤其是，我军人员都以毛主席十六字诀的战略思想武装了头脑，知道会走，快走，翻山越岭，就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个个心情舒畅，轻松愉快地赶回了井冈山。

在我军撤出永新县城后，赣敌即发生内讧。敌三、六两军退回清江樟树自己打起来了。设若我主力不去湘南，则消灭如惊弓之鸟的赣敌九军于永新境内，把根据地推广到安福、吉安、萍乡一带，是有可能的。可是，由于湖南省委继续执行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指示，破坏毛主席正确的革命路线，致使边界根据地平原尽失，只剩下产谷不到万担、人口不满二千的井冈山

了。若井冈山失守，其它山区便守不住，则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将难以估计。因此井冈山保卫战的意义十分重大。

保卫黄洋界之战

八月二十九日，部队急行军回到小井，快到中午时分，当即进行紧张的战斗动员。团首长召集了营连干部会，营首长召集了班排长会，连里召集了党支委小组长联席会议、支部大会、士兵委员会，以及全连大会，讲明了敌我形势、作战任务、应有的精神准备和注意事项。经过动员，战士们，个个磨拳擦掌，誓死保卫井冈山，不让一只兽蹄踏进井冈山的土地。后方医院也进行了动员，轻伤病员要求重返前线杀敌，重伤病员则充满了胜利信心，泰然自若。儿童团、少先队则在王佐为主任的防务委员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全都动员起来了，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赤卫队则持着各种旧式武器夹杂着少数钢枪，准备配合作战，妇女们则组成后勤队，为前线服务。井冈山浸透在紧张的战斗气氛中，全体军民决心誓死为保卫井冈山而战斗。

我回到小井，立即去团首长那里，汇报部队和工作情况。团部住在大井，是当时井冈山上的中心。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二七年冬第一次从荆竹山到井冈山时，就住这里，只是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才移到茨坪。我见到团长、团党代表时，他们镇定自若，还在学习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他们听我汇报完毕，又询问了各种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们具体地作了战斗动员和各种战时工作的指示。我回到连里作了动员，就又去营首长那里汇报。适逢开饭，吃的是从小井河沟里捞来的小鱼虾，煮成的一锅汤，还有火烤的青辣椒，都没有油，只放点盐，这顿红米饭，吃得真甜香。

我们连准备好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齐着步伐进到黄洋界阵地。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约一千三百余米，距小井十五里，只有荆棘丛生的小道可通。黄洋界哨口雄峰耸立，陡削不可攀，高山上只有青草不长树木。山与山之间如万丈深谷，极为险峻。清晨，浓雾萦绕山头，迷漫山坳间的树梢，宛似一片汪洋大海，故又有汪洋界之称。天气变化大，山雨时下时停，天气晴朗，雾散云消，群山起伏，尽收眼底，极为壮观。野牛和猴子常在这里集散着。山下的源头、桥岭、陈家全、大陇，是湘敌从酃县来攻的必经之路。从酃县到山下，相距只有一百二十华里，这是我们这次作战的主要防御方向；山上另有一条路可通往茅坪，是袁文才部队所控制的地方。从茅坪到黄洋界一路上也都构筑了防御工事。敌人从新城来攻不容易，因此只须派出一排人警戒并与袁文才部队取得联络就行了。

黄洋界哨口，是井冈山的险要哨口之一，它与小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四大哨口相配合，构成井冈山的全面防御系统。这次作战，其它四大哨口，都有王佐部队和赤卫队警戒。各个哨口，都筑有防御工事。就拿黄洋界来说，指挥阵地的工事，就筑在哨口后山顶上，这次作战，营的指挥阵地就在那里。在山下源头村上来的一条山梗上，茅草丛里，插有削尖了的并用火烤过的坚韧的竹钉。在这条蛇形的小道上，不是熟悉的人，决没有不踏上竹钉的。哨口防御工事，是按坡度筑成前低后高几条不规则的壍壕，壕墙很厚，子弹穿不过，且是垛形，便于隐蔽和射击。每一个工事里，可以容一班至两班散兵，互为猗角。工事都用石块和土坯筑成，高出地面八十至一百公分，非常坚固。工事前面，有自然生长的草丛荫蔽，地形陡削，并埋有竹钉。我可依托着工事俯瞰射击敌人，敌则无法接近我壍壕。

八月三十日，云雾散后，敌人开始向我发动进攻。由于地形限制，敌兵只能一个一个地向上爬，战斗队形呈鱼贯式的散兵线匍匐行进，每一个兵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否则无法射击。所以敌虽以一师之众企图偷袭井冈山，但使用在火线上的却只能是少数。我以两个连的兵力，进入阵地后，又加固了工事，做了许多单兵掩体，还拣了些石块作投掷用。我前沿堑壕里是一个排，另两个排分布在其侧后的堑壕里，这是第一连。第三连则在山后休息。敌人进攻无效，便用机枪射击掩护前进，然而低射则妨碍自己的士兵前进，高射则子弹在空中呼啸，无明确的射击目的与弹着点。待敌人接近我有效射程距离，我军便一声令下"打"，弹无虚发，叫个个敌人去见阎王。为了节省子弹，石块也成了我们有力的射击武器。敌人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冲锋，都无非是送来武器弹药留下尸体。下午四时许，我们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修械厂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也抬来了，安放在我指挥阵地附近。我们向敌人发了三发炮弹，第三发正落在敌人的指挥所驻地——腰子坑爆炸了。敌人原以为主力红军不在山上，听见炮响，又以为我主力红军已经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夜间，敌人利用云雾弥漫，我无法下山追击的时刻，逃之夭夭，蹓到酃县境内去了。我们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井冈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而使井冈山的革命红旗，飘扬在祖国的大地上。

敌人这次袭取井冈山既不明了我情况，又不熟悉地形，士兵则不知为何而打仗，且进入我早已坚壁清野的宁岗，无粮、无柴、无菜，加以我赤卫队和袁文才部的游击，找不到向导，派不出侦察，哨兵被摸掉，两眼漆黑，两耳又聋，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徒呼奈何！我军则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都知道"为土地"、"为政权"、"为工农解放"而战，上下一致、军民一致，"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焉有不胜之理。

歌颂胜利

我军的装备比起敌人来是差的。每个战士只有三至五发子弹，一班只有三至四条破旧的军毯或夹被。进入阵地后只在三十日早晨雾未散前吃过一餐早饭。山上既无哨棚更无房屋，为了防寒，我们就割些茅草盖着垫着。经过一天的激战，我无一伤亡，只是由于高山夜寒，有些人得了感冒，夜间有猴子来捣乱，弄得我们睡不好而已。三十一日晨，云开雾散，山上静悄悄的。我们便沿着敌人的来路下山搜索，可是敌人已无影无迹了。群众见到我红旗一到，便踊跃回村，烧茶水，洗衣服，热烈拥护红军收复失地。

九月十三日，我二十八团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接着，占领遂川。十六日，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胜利会师了。

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部队中掀起了狂欢，几个秀才套《空城计》诸葛亮的唱腔编了一段，叫做“空山计”：“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红军主力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新城多侥幸，为何敢来侵占大小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在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计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降兵；你来，来，来，请你到山上来谈谈革命。”一到休息的时候，大家拿着脸盆，破洋铁罐子，敲敲打打，披一床军毯，就放开嗓子唱起来了。

全国解放后，井冈山人民为了纪念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在哨口现场建立了一个纪念碑。碑上刻有毛主席手迹《西江月·井冈山》和朱德同志“黄洋界”的题词。

两军会师后的一些情况

邓　华

先谈谈我在井冈山时的简单经历。湘南暴动时我们郴县的地方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我在政治部组织科。不久退出郴县。途中，我调到宣传队，以后整编又调到连队去了，所以很多问题不大清楚。我们那个团（指三十三团）回去时，我没有回去，留在井冈山，分配到三十一团，开始在营党委任组织干事，不久调团部，任团党委组织干事。

两军会合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会见地点我搞不清，因为朱总司令带部队是由我县往北经耒阳上井冈山的，我们是由郴县上井冈山的，他们在先，我们在后，因我们是地方武装。听说主席派了部队去接，由张子清带队。在沔渡十都打了一仗，张子清负了伤，以后由朱云卿任团长。

一九二八年春湘南暴动，宜章的地方武装编为第三师，我们县的地方武装编为第七师，下属三个团。军事干部是由朱总司令教导队派来的，政治干部是地方的。师长是邓允庭，师党代表是蔡协民（在下山时，他任三十一团党代表）。参谋长和团营干部都是总司令派的。我们师退出郴县，快到井冈山时，进行了整编，被编为三十三团。总司令的部队为二十八团；宜章的农军为二十九团；耒阳一带来的农军为三十团；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为三十一团；王佐的部队为三十二团；我们是三十三团。我们团有三个营，每个营三个连，每个连一百多

人。

草市坳战斗我没有参加，那时我还在三十三团，没有到三十一团。听说三十一团一营打高陇时，营长员一民牺牲了。我到三十一团时一营营长是陈毅安。

我是二八年四、五月上井冈山的，上山后，就一直往遂川走，去打遂川，这是我团第一次打仗。当时我们每个连没有多少枪，大多数是梭镖，所以遂川没有打开，后来从遂川往拿山撤回，到酃县、沔渡一带，团部召集我们开会说：前委讲为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要我们团到桂东、桂阳一带去打游击，扩大根据地。接着进行了动员，先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然后连干部回去动员，最后全团集合。当邓允庭讲话时，三十三团的王副团长（此人曾在旧军队呆过）就叫嚷："我们要回家闹革命！"把他家乡来的两个连拉走了，影响很大。因为当时农民都有家乡观念，想回家，所以走了很多人（听说这些人回去后就分散了），只剩下干部，军事干部被分到二十八团，政治干部到三十一团。

我分在三十一团。三十一团一直只有二个营，即一、三营。部队到东固时改为纵队，二十八团为一纵队；三十一团为三纵队；四军特务营、独立营（毕占云任营长）为二纵队。一纵队下属一、二、三支队；二纵队下属四、五、六支队；三纵队下属七、八、九支队。部队到福建，打上杭时，歼灭了卢兴民部，接着成立了八支队，就是三十一团第二营。由七支队抽一个连，九支队抽一个连，加上特务连编为八支队。支队长林野，党代表蔡会文。

龙源口战斗时，三十一团是正面攻敌，二十八团是迂回作战。我们一营是为前卫，一过亭子，就和敌人遭遇上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营有三个连，一连长陈伯钧，党代表肖光钺、二连党代表向大恢；三连长资秉谦，党代表李克如。在这一仗

中肖光钺，向大恢和资秉谦都牺牲了。一连的党代表就由刘型接任，二连的党代表由朱良才接任，三连连长由曾士峨接任。

潞江是退出来以后才去的，我们在那里呆了很久。主席也在潞江，主席是从那里率领三营去迎回二十八团的。我们一营是打前卫，后面是团部，三营可能是在后面，我没看见。

主席是在潞江还是在新城指挥战斗我不清楚。

龙源口战斗后进行分兵，我们一营在永新向吉安的方向警戒，记得还出了个事，一位副连长去洗冷水澡，结果敌人来了。

永新困敌时，我们一营在潞江一带，三营可能在天河。当时的三营长是伍中豪，党代表是罗荣桓。后来二八团在郴州失利，二十九团跑了，毛主席带领三营去接部队，我们一营留下来参加了保卫黄洋界的战斗。

困敌可能是将敌人包围在县城周围的三十里之内，因我们退出后，敌人就占领了县城。

《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作主席可能在宁冈写的。那时主席和我们都在宁冈，红五军来了，是在宁冈会合的。茨坪经过了一下就离开了。

五分钱的问题，我昨天想了很久，记得一块花边是四吊钱，抵四百个铜板，四十个铜板合一毛。那时的五分钱能抵二十个铜板，二百个铜钱。

三十三团的团长是徐谆，原是郴州第七师第二团的团长，广东人，从朱总司令的教导队派来的。

三十团是耒阳农军编成的，团长记不清了，可能不是刘之至，刘原是第七师的参谋长，后来在三军团工作。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还没有红领章、帽徽，红带子是有，有的系在手臂上，有的系在脖子上，暴动的时期红带子很多，到井冈山就少了。

第三次打下永新后，红军分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我们营在潞江，后来敌人发动进攻，部队撤回到宁冈，我们营就退到了黄洋界。在潞江时记得只有营部和二、三连，一连可能在九陇方向，一连长陈伯钧负了伤抬到潞江去，可能不久就由二连去接一连的防事。黄洋界保卫战时二连在不在记不清了。毛主席著作讲我军不足一营，凭险据守，保住了这个根据地，主席的提法是正确的。

那时湖南的敌人较强，江西敌人较弱，永新是个大县，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组织，开展过革命活动，有群众基础，人力物力丰富，主席主要想在永新发动群众，深入搞土地革命。

还有些问题我不大清楚，你们可以去访问谭震林、江华（原名黄春甫）和韩伟等同志，他们可能清楚。

三十一团组织机构

邓　华

团长：

第一任　陈　皓：在三湾改编时任团长，第二次打茶陵时叛变投敌，被处决。

第二任　张子清：湖南人，北伐时期在叶挺独立团任副官。一九二八年四月在酃县负伤，后牺牲。

第三任　朱云卿：梅县人，黄埔三期生，下山时任红四军参谋长。

第四任　伍中豪：耒阳人，黄埔四期生，下山时任红四军参谋长，北京大学学生，会写东西，打仗勇敢，后于安福牺牲。

团党代表：

第一任　何挺颖：上海大学学生。北伐时期当过团指导员，陕西汉中人，在部队里威信很高，一九二八年冬季整训后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一九二九年在大庾平顶坳战斗中牺牲。

第二任　邝朱权：原是郴州县团委书记，陈毅同志任书记后由他接任。二八年上山后是三十三团的党代表，湘南部分农军回去后留在三十一团一营任党代表，东固改编后是三

十一团党代表后率领小部队回湖南打游击，叛变了。

团部：

团委秘书谭政

组织干事邓　华：郴县人，初在三十一团一营任组织干事。

宣传科长：杨岳彬：东固改编后是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后叛变。

油印孙开楚

事务股长陈士渠

团部副官赖毅

第一营营长：

第一任黄志奇：三湾改编时任营长。

副营长欧阳成

第二任员一民：山西人，二八年打高陇时牺牲。

第三任陈毅安：湖南人其叔父陈家友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陈负伤后，未下井冈山，后在三军团当师长于打长沙时牺牲。

第四任周坊，耒阳人。

第五任曾士岳

第六任冯明忠

第一营党代表：

第一任　邝朱权

第二任　高自立：原在团部特务连任党代表。

第三营营长：

第一任　张子清　　副营长伍中豪。

第二任　周昆

第三任　陈龙，又名陈正春。后在福建坎市战斗中牺牲。

第三营党代表：
第一任　宛希先
第二任　罗荣桓
第三任　欧阳建：后成立红十二军任三十五师政委，二七年十月在水口入党后在新四军工作病死。
第四任　刘炎
团部辎重队
队长　范树德
杨立三
特务连
连长洪楚才
党代表　高自立
机枪连
连长　冯明忠
党代表　蔡会文，攸县人，后是红三军政治委员，江西军区司令员，长征时留下已牺牲。
第一营第一连
连长　陈伯钧
党代表肖光钺，郴县人，于七溪岭战斗中牺牲。
二任　刘型
第二连
连长张宗逊
党代表向大恢，于七溪岭战斗中牺牲。
二任朱良才
第三连：
连长　资秉谦，于七溪岑战斗中牺牲。
二任　曾士嶽

三任　陈龙鹤，朝鲜人。下山时任连长。

党代表　李克如，现在兰州工作。

黄益善　嘉乐人，原是广州农讲所学生。能力较强，后调前委工作。

第三营第七连

连长　周昆，周任营长前是连长。

党代表　欧阳建

八连

连长　陈玉云，后在福建坎市战斗中牺牲。

九连

连长王　连，四川奇江人，大学生，曾当过红四军军长（接林彪）。

曾正平平江人，参加过秋收起义。

党代表　余甲生

关于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等问题

韩　伟

一、关于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的问题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点燃了工农革命运动的烈火，掀起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全国大革命。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在会上彻底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英明地提出了党应以主要力量领导武装斗争，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会后，毛主席赶到湖南，在长沙近郊召开了湖南省委工作会议。接着，毛主席就到湘东赣西，领导秋收起义。经过毛主席的努力，组成了秋收起义的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井卫团在修水被改编为第一团，打起红旗帜，参加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时间我记不准。秋收起义开始时，第一团住在修水，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到长寿街过中秋节（中秋节是九月十日）。可以推算一下，从修水到长寿街要多少时间，估计不是八日就是九日也可能是十日。在未打到长寿街时，在中途被敌人伏击，使部队遭受到了损失。

当时，要去打长沙不一定对。我们可以在农村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要去打长沙呢？当然，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那时起，毛主席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党等等都是早有计划的，不过我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

战斗结束以后，部队向杨梅尖集结。农民很好，我们三营九连的指导员负了伤，农民派担架把指导员一直抬到杨梅尖。部队在杨梅尖呆了两天，第三天就从杨梅尖出发，向文家市进军。到文家市会师的，除了我们一团的人，还有二团和三团的人。

到文家市后，在很大的一块空地上举行了会师大会。在会师大会上，毛主席分析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形势和当前的形势，提出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还讲了为什么要向井冈山进军的道理。看来，关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毛主席早就计划好了的，因为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后很快就开展了工作。

会师大会以后，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路经莲花等地，来到了永新县的三湾村。在三湾住了几天，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首先是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进行了政治思想上的建军和军事上的整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掌握的军队，如叶挺独立团，是把支部建立在团上，在连队没有建立支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也是我们党掌握的军队，部队里干部党员较多，有的连队已有了党的组织。到三湾改编时，就把支部建在连上，使支部在连队里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我们的军队在井冈山那样艰苦的情况下，拖不垮，打不烂，把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三湾改编时，我被编在一团一营二连。我们连党支部的党员约有十几名，有的副排长和排长都是党员。当时赖毅同志和我们是一个连。“三湾改编”时还确定了建立根

据地的问题。古城会议更进一步研究了这个问题。

在“三湾改编”以后，我们就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井冈山峭壁悬崖，群峰耸立，道路崎岖，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位于湘赣两省边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且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都比较好，利于我们聚集和壮大革命力量。这是一个理想的革命根据地。

二、关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粉碎敌人军事进剿的问题

我们来到井冈山以后，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于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国民党反动派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疯狂地对井冈山进行军事进剿。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不仅巩固了井冈山根据地，而且使割据地还一天天推广。这里我谈一下新城战斗、四打永新和黄洋界保卫战的一些情况。

新城战斗发生在一九二八年二月间，这次战斗是上井冈山后第一个胜利的战斗，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了这股进犯之敌。至于毛主席是在哪里指挥的我不清楚。当时，敌人盘据在新城的有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新城街的北边靠山。我们参战的有一团一、三两个营。第一营攻东门，第三营攻南门，听说二团（袁文才，王佐的那个团，也来了一个营在西门外面埋伏着。另外还有广大革命群众的配合，如组织担架队等等。这次战斗主要是在东门打的，当时在东门的一连连长叫员一民，二连连长叫陈毅安，副连长谭希林，三连连长姓杨，三连副叫张清泉，是个山西人。打新城是硬攻的。那天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三个连一齐往上冲。三营在南门也打了。

后来，敌人就被迫从西门逃跑，我们就在后面追。最后就把敌人消灭在新城西面的洼地里。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抓到了几百名俘虏。这些俘虏被送到砻市，安置在砻市一个大祠堂里。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对于敌军的工作，最有效的，一是医治伤兵，二是释放俘虏。宽待俘虏的政策就是一九二八年二月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新城战斗时过来的现在可能还有几个人。

五斗江战斗发生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这次战斗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当时红四军刚刚成立。红四军成立后，我们就在五斗江打了个胜仗，并乘胜第一次攻占了永新城。当时在五斗江那边的是二十八、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当时在哪里不记得了。

草市坳战斗发生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这次战斗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在这次战斗以前，我们三十一团一营进占湖南茶陵的高陇。进占高陇后，派出三连（连长张清泉）向腰陂游击，遇到了敌人。三连返回高陇时，敌尾三连追到高陇。于是，我们二连和一连就加入战斗。在高陇和敌人打了三个小时左右。一营长员一民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由于我在高陇战斗中负了伤，没有参加草市坳战斗，因此，对于三十一团一营有没有和二十八团一起参加草市坳战斗的问题，我不太清楚。据说三十一团一营是和二十八团一起参加了草市坳战斗。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问问张宗逊同志。他当时当二连的副连长，连长是谭希林。

龙源口战斗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那天是端午节。当时，我们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新七溪岭这边是朱云卿指挥的，这个人实战经验不多，是反过毛主席的。当时，我们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我们占领了山头，敌人又夺了过去，我们再夺过来。老七溪岭也打得很猛。老七溪岭那边打垮了敌人，新七溪岭的敌人也往后退，我们就追了下去。我军乘胜第三次攻占了永新城。这次被我们消

灭的敌人是敌二十六团，因为我们把敌军伤兵抬到医院里，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说是二十六团的。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敌人很多武器，在这次战斗以后，二十九团的好多梭镖都换成了枪。当时还流传着一首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二只羊（杨）。"

四打永新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我军击破敌周浑元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第二天进占永新。我们部队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当时敌人反扑过来，我们把特务营增加上去，把敌人打垮。我们进占了永新以后，随即撤回到了宁冈。

黄洋界保卫战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团开往湘南。二十八、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以后，毛主席率领三十一团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十一个团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华里之内达二十五天之久。后来听说二十八、二十九团在湘南失败了，毛主席在永新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开会的地点不是在潞江，就是在澧田一带的某个村庄。会上，毛主席决定带三营到湘南迎还红军大队，留三十一团一营和一个特务连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三十一团一营是分散的。当毛主席在湘南率领红军大队欲归未归的时候，湘赣两省敌人有四个团向我大举进攻。我军在黄洋界与敌人激战的时候，一连和三连在山上，特务连和二连在山下敌人侧背进行游击活动。黄洋界保卫战打得很好。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以后，红军战士还编了一个京剧，叫《毛委员的空山计》。我记得有人演唱过《毛委员的空山计》。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在红军里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死打硬拚；另一种倾向是退却逃跑。毛主席和这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主席及时总结了我军作战的经验，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

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当时，江西的敌人是外来的，湖南的敌军是土生土长的。江西的敌军比较弱，湖南的敌军比较强。因此，毛主席决定对江西的敌人取攻势，对湖南的敌人取守势。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取得的新城战斗、四打永新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与此相反，分兵冒进湘南，结果造成“八月失败”，使得边界和湘南都遭失败、部队损失近半。

三、关于建立革命政权工作和军民关系的问题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犯。但是，我们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我们部队有个传统：一到村子里就搞社会调查，如哪家是地主恶霸，调查准了，好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还有就是调查进军路线，沿途有哪些村庄等等。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的部队除了打仗以外，就是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我记得我们部队做群众工作是从到遂川才开始的。怎样做群众的工作呢？我们的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就分散开来，调查地方的情况，了解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家，哪些人家是最有钱的，是最坏的，确定哪几家是土豪。然后，再通过当地的老百姓，进一步进行调查。调查确实以后，就上报“没收委员会”批准。“没收委员会”说可以打，那就召开群众大会，讲红军的任务，发动群众打土豪，分土豪的东西，抓土豪罚款。同时，帮助组织暴动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还要组织农民协会、乡政府和做一些党的工作。实际上建党、建政等等工作是分不开的。最主要的还是组织赤卫队，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

条件下，尽量武装地方，还给地方留枪。武装地方，实际上也是准备扩大红军本身。赤卫队有了梭镖、大刀、枪，我们一走，他们就不怕挨户团回来报复。我们的地方武装在一个地方和地主武装作斗争，站稳脚根了，巩固了，我们再扩大一块地方进行活动。

为了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搞好军队内部的关系和军民关系，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还亲自制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记不清了。反正很早，不是"三湾改编"以后，就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打了茶陵以后。我们执行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反映很好。当时，我们不派伕，是在地方上动员，出钱请伕，打了土豪还分给伕子东西。我们找带路的，如果出钱请老百姓带了一段路，接下来找不到人带路，要他继续带下去，就再给他现洋。这样，他们回去以后就做宣传工作，告诉别人说，替红军做事不要怕，红军不仅给你吃饭，还会给你钱。

四、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问题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无论是打仗消灭敌人，还是开展群众工作，都是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敌人的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当时我们困难到了极点。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里说："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伕，除粮食以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情况的确是这样。

为了战胜困难，赢得胜利，在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辉思想指引下，我们当时想了许多办法。我们在后方的部

队自己还搞点生产。我们二连在大井的西山脚下的东南角上还有个仓库。一九二八年十月间，我们还从宁冈的源头向山上背粮食。背上来的不仅有粮食，还有油、盐、干菜、腊肉等。背上来以后，就贮藏起来，以便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

即使我们想了很多办法，生活还是非常艰苦。当时，红军的指战员都一样，除了粮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我们吃的是红糙米、南瓜。有时还把红薯、南瓜切成丝晒干了吃。就是吃这样的东西也很困难，有时一天只能吃一、两顿。南瓜汤里既没有油，也没有盐，特别是没有盐，很难吃下去。穿的，住的也很困难。井冈山的冬天天气很冷，战士们还是穿着两层单衣。后来，搞了一点棉花，又缺少布，战士们就在两层单衣里夹点棉花，拿针缝一缝穿。晚上睡觉，也没有被子，睡的是稻草。因此，晚上睡觉的时候，连人都看不到，因为人都钻进稻草里去睡觉了。在那寒冷的冬天，战士们脚上没有鞋子穿，穿的是自己打的草鞋。当时打草鞋没有麻，我们就把稻草捶软，搓成网绳，再打草鞋，挺有意思，现在要打还可以打。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战士们精神很饱满，情绪特别高，非常热爱红军生活。他们高兴地唱着："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战士们情绪为什么那么高呢？因为脑子里有毛主席教给我们的革命道理，反正我们要革命，要组织工会、农会，要打土豪分田地。无产阶级除了革命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五、关于对党员进行教育的问题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艰苦，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散，首先是由于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很好的党内教育。

当时，对党员进行教育的内容很丰富，也很生动。有基本的

教育，如讲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另外也联系到思想动态，对党员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路线斗争教育、形势教育、基本理论知识教育等等。当时，还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教育，在军队里实行民主。三十一团有个姓鄢的副官违反了群众纪律，士兵委员会要打他的屁股，领导上就去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说："官长不打士兵，士兵委员会要打官长的屁股，行吗?"后来就没有打这个副官的屁股。红军下山以后，在一九二九年期间，部队里有个大队长军阀习气比较严重、打士兵打得比较严重，毛主席就说："红四军里有个铁匠，把红军战士当铁打。"经过毛主席的教育，部队里那种打人、骂人、关禁闭、罚跪、罚晒太阳等等现象，后来就慢慢改过来了。特别是红四军"古田会议"以后，这些现象有了显著的改变。在军队里不仅实行政治民主，还实行经济民主。当时，连里有一个正采买，有一个副采买。一般是有个班长或副班长当正采买，由一个战士当副采买。每个月士兵委员会还算帐，分伙食尾子。分了伙食尾子，会抽烟的可以买点烟抽抽，还有的买点麻打草鞋。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特别是新来的俘虏兵，感到红军和白军是两个世界。正如毛主席所说过的："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对党员进行教育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当时部队里建立了党的组织，设立了党代表制度。一九二七年部队里是排有小组，连有支部。到一九二八年班里也有小组了。党代表要担任党支部书记，进行党的工作。部队里的党员那时还没有完全公开，党代表对党员进行教育，一般都是采取小组会、支部会来教育。同时党代表还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在士兵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把问题讲一讲。再一种是上党课。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桂东的沙田，呆的时间不短，在那里毛主席亲自给我们讲过课，内容是讲建立红色政权有大块、小块，要将小块

红色政权连成大块，逐步扩大我们的红色政权。毛主席的讲话，大大增强了我们进行武装斗争的胜利信心。另外，有时还利用早、晚点名，联系党员和士兵群众的活思想讲一讲。上级机关为了对党员进行教育，还举办了党团训练班。基本教材现在有本本，过去没有本本，但上级一个时期一个时期都有布置的。在时间上，有时为了训练，就设法避开一些战斗。训练的重点，还是政治倾向问题。这种党内教育对于团结全党进行伟大的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关于党内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问题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

在上井冈山以前，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很激烈的。如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建立什么样的党，就有争论。陈潭秋同志在莫斯科还写过一篇关于“一大”的回忆。现在事实证明主席当时是正确的。在党的“五大”上，陈独秀之流把毛主席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甚至把毛主席的发言权都剥夺了。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出卖，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很激烈。瞿秋白等人一度控制党的中央，积极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只讲城市暴动，指责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那时在井冈山还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种说法在我们刚上山时是没有的。按照这种说法，农民有点土地也是“土豪”了。那时，毛主席在军队里实行民主主义，教育军队即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并且针对死打硬拚和退却逃跑这两

种倾向，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有人却说什么这是“部队不象个部队”。由于机会主义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曾使井冈山斗争遭到过“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一九二八年七月红军大队开往湘南，在郴州遭到失败以后，要是别人看到这种情况就算了，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却亲自带着三营到湘南去迎还红军大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率领红四军下山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中央要我们把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要毛主席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毛主席对这种悲观论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一九二九年七月，在福建龙岩的第九中学里，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部队里的连干部可以列席旁听，因为红四军党代表大会是由多级党代表参加的，并没有另外选党代表。党代表大会扩大了连长就可以参加（韩伟同志当时当连长）。会议争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有人主张红军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到农村中去，避免暴露目标。毛主席则反对远距离的分兵，因为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会上，中央来的代表刘安恭和朱云卿等反对毛主席。会后，有人带着二、三纵队到处跑，毛主席和一纵队留在闽西做巩固、扩大根据地的工作。在古田会议前，毛主席回到了部队，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了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决议》中有一项是反对流寇主义，批判不要根据地的错误观念。古田会议以后，到了一九三〇年，形势很好，可是后来又来了个王明路线，他们在某次会议上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推行王明路线的结果，使根据地受到很大的损失。根据地损失十分之九，白区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此后，争取了抗

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谁是谁非，真理在哪一边。毫无疑问，毛主席是正确的，真理在毛主席一边。

七、关于“柏露会议”和向赣南闽西进军的问题

一九二八年底和一九二九年初，敌人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联合“会剿”。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旬召开了“柏露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如何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联合“会剿”。有人说“柏露会议”是讨论“六大”的问题，我没有这个印象。为了粉碎敌人的联合“会剿”，当时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外转移，插到敌人的后面去，乘敌人主力“会剿”井冈山时后方空虚，我们就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我们在大庾打了一仗，后来才向赣南闽西进军。

“柏露会议”以后不久，大约是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毛主席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离开井冈山时，有二十八团、三十一团，还有军部、特务营、独立营，总人数大约有三、四千人。出发地点可能是在茨坪，因为当时红四军军部在茨坪。毛主席是红四军的党代表。下山路线肯定不会是走一条路，起码是两条路，或者是三条路，因为走一条路在山区行军宿营都不便。

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红四军布告，下山前在井冈山就印好了，是用石印印的。

下山后，部队都到了大庾。我们在大庾打了一仗。这一仗没有打好。大庾那里有条河，特务营、独立营在河那边打，我们在这边打，和敌人一直打到下午。打了大庾以后，部队到了乌迳（属广东边界）。

我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

欧　阳　毅

我是湖南宜章县人。彭儒同志、曾志同志也是我们宜章人。与我们一道出来的宜章人还有张际春，吴汉洁等同志。吴汉洁不知是去世了没有？他也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因为多年不见面，详细情况不清楚，听说去世了。张际春是去世了，本来他是知道很多情况的。

现在我们宜章剩下的只有彭儒、曾志和我。但是，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同志还是不少的，如谭冠三、王紫峰等。

肖克同志参加了八一起义，三河坝失败后到了湘南宜章，我们在家时不认识他，到外面才认识的。我们湘南出来的这些人，有的是在路上认识的，有的是在湘南认识的。

湘南动身时，肖克同志在我们县白石区（即黄沙）那一带活动过，他在我们那里搞了一段。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南还有些基础，党还有些活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县反动派极其嚣张，甚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他们就猖狂向革命进攻了。那时我还没入党，但是我知道党的基础是不错的。北伐时，我们的党是比较活跃的，当时宜章县国民党县党部，实际是在我们党控制之下，里面主要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在工作，有些负责人我还记得，其中有个负责人叫李文香，据说毛

主席认识他，与毛主席有来往；他在宜章初中当国文教员，传说他在前清时代当过秀才，禀生、旧书读不少，但思想比较进步，是我党的县委书记。当时宜章初中还有些教员是党员，我虽不是党员，但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当时有个体育教员叫颜兼仁，他就是党员。

"四·一二"前后那地方白色恐怖很厉害。北伐时群众发动得很好，县工会、农会，妇女会都组织起来了，都搞得不错。妇女会主任是曾仆（曾志、彭儒的老师），以后改为彭镜秋。曾仆过去在东北工作，身体不好，后来退休到北京，目前仍然是政协委员，她了解湘南暴动，特别有关妇女运动情况，彭儒与他们还有亲戚关系，她的地址过去告诉过我，现在忘记了。大革命时代，她比较活跃，经常在大会上讲话，作了不少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到了上海，后爱人牺牲了，到延安以后曾在延安师范当过教员，详情我不清楚。工会主席是杨子迈，农会主席是毛科文，李赐凡是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这些组织动员群众对北伐的支援搞得不错，反革命政变后敌人实行大屠杀，革命同志在本地站不住脚.我们学校停办了，国文教员李文香（我党县委书记）有一次被刺没死，负了伤。他是开会回校走在路上，快到了校门口，在校门外被敌人用枪打了，打在腿上,没有死,就叫门，后来被抬进去了，当时没有药，用土办法治，把南瓜瓤附在伤口处，因为瓜瓤是凉性的，可消炎、消毒，他在学校里住了几天，不敢向外宣扬，好多人当时站不住脚。一次敌人派一连反动武装，开到我们学校，专门来捉李文香同志，没有抓到。当时多数同学和教员在，也有少数跑了和躲起来的，敌人搞了半天，没找到，后来不幸被敌人抓到了，因为当时把他藏在楼下一个地方，这地方很小，偏辟，乱放东西，外面用板子钉上了，有缝儿，敌人用铁棍往里面捅，正好触到他的伤口上，他叫一声，敌人发现了，就搜了出来，敌人

拖出来就游街，他走不动，就用罗筐装着拖着走，没有一两天就被敌人枪毙牺牲了，同一个时期，听说体育教员在另一个地方也被敌人捉到，枪毙了。这样学校办不成了。我们回到家以后，也遇到抓人，停不住脚，这是一九二六年或一九二七年初的事，书念不成了，我那时还没入党，我是一九二七年冬一个姓朱的介绍我入团的，我参加工作后做些宣传工作，贴点传单，散发一点《共产主义 A.B.C》、《共产主义问答》等，不敢公开搞，在群众中也有些活动。所以办过工会、农会，都是在他们通缉之内的。我们家乡那地方白石、麻田，凡在外面读书的都成了共产党的嫌疑犯，我父亲在当时办的贫民织布厂里办了点事，有时也搞点宣传，乡下的党是我发展的，当时乡里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杀了不少人。欧阳智泉是我们乡下最大的地主，与县、省里有来往，政治上有很大的地位，在乡下把持一切，要通缉什么人，要杀什么人，都是他们布置的。我们乡下有个画家，画中国画，思想比较进步，有时作点宣传工作，他的活动并不太多，可是也就遭了殃，被欧阳智泉知道了，趁他在外地卖画时，与卖画地方的地主勾结一起，把他枪毙了。白色恐怖很厉害，不少人跑到外地去了，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底。

但群众的革命情绪是压不下去的，虽然反动派压得很厉害，白色恐怖很严重，革命有些消沉，但总的来说，是压不下去。一九二八年春开始了暴动，打土豪分田地。不知什么时候传说红军要来，正在此时党组织在作湘南暴动的准备，其实早就有些准备，群众有斗争的要求，湘南几个县郴州、耒阳、宜章等，就是毛主席在农运考察报告中讲的那几个县，一下子就搞起来了，风一传，那个地方打土豪分田地，马上就搞起来了。我们这地方一搞，附近几个庄子也就立即搞起来了，影响扩大很快。暴动搞起来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苏维埃，我随即

公开出来作事了，开始在村苏维埃工作，搞宣传、演讲，打土豪，我们乡下的那个大地主欧阳智泉跑了，我们就分他的浮财，打开仓库分谷子，给老百姓，我参加了这些工作，群众的革命热情很热乎，群众自己组织了赤卫队，主要是梭镖、大刀，也有土枪，个别地方的赤卫队也有一、二支快枪，一个村一个村都有了组织．我区大部分有村苏维埃，我在村苏维埃工作了一、二个星期后，就与村苏维埃主席（主席叫欧阳祖光，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上过井冈山，打郴州失败没回来。欧阳佩也上过井冈山，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是郴州失败后回山途中失散的，抗日时期还有来往，后来不清楚了）欧阳祖光同时派到区苏维埃工作，我当区苏维埃秘书，他当区苏维埃主席，我在区苏维埃工作时在梅田认识了肖克同志。

当时搞得很热乎，群众的情绪很高，地主闻风丧胆，那时有盲动主义，我们这些人更没经验，在政策上没很好掌握，以后，毛主席才给我们纠正了。当时提出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很对的、很好的口号，但还提出“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梭、梭、梭尽一切贪官污吏”！当然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应该杀，但所有的一切土豪，不管大小都杀，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打土豪、分田地、建苏维埃，都是贫苦农民掌权，共产党领导。当然都是对的，名称叫苏维埃，中央苏区也还叫苏维埃，名称问题不大。

搞了一阵子后，群众发动得很快，到处成立苏维埃。党组织有了发展，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军到我们那一带后，区、乡发动的规模就更大了。宜章县城后来听说是这样搞起来的：胡少海家里原来是一户大地主，他自己当过土匪，后来加入了党，作了一些工作。暴动时，胡少海在地下党领导下约请县政府（不是以前的政府，是叛变后清一色的反动派的政府）县长、科长等旧官员开了个会，趁机收缴了一部份反动武装，把反

革命镇压了，所以整个宜章县发动得不错。

分田地的口号是提出来了，但没有很好地分，因为时间太短了。分浮财搞了，分了谷物、衣物等。还烧房子，烧了不少房子，如欧阳智泉的房子。他盖了一所洋房，花了不少钱，给烧了。听肖克说，我村大地主欧阳智泉逃跑到肖家一个最大的地主家里（这家与军、政界都有密切的关系）躲着。当他听说我村暴动农民起来分了他家的谷子和一切浮财的消息，他还不在乎，后来听说烧了他洋房子，他就晕倒在地，所以当时地主对烧房子是很伤心和害怕的。

这是政策问题，何必烧房子呢？

还有一个传说，说敌人要来了，为了防止敌人的驻扎，把敌人必经之地的房屋，都要烧掉。

人杀的是多了，当然有些人该杀，有的也可以不杀。

大致情况是这样。朱、陈在三河坝失败后，到湘南领导和直接参加湘南暴动，声势很大，后来因敌情紧张，站不住脚，因为敌人除了正规部队之外，民团也有相当的势力，我们那里民团的权力就很大，比如快火（即洋枪）比我们多，我们土武器多，当然胡少海过去当过土匪，也有快枪，但总的没有反动民团的多。因为站不住，就离开了这地区。区里的部队就向胡少海靠拢，往江西方面走。随着走的人确实不少，除了工作人员要走，有不少斗争坚决的群众也跟着走。因为大革命失败后，敌人杀得很厉害，所以除了工作人员外，有不少老百姓也跟着走了。此时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是欧阳祖光，党的区委书记是王政，还有些委员，记得有一个叫曾××，都一道带着群众撤退了，离开湘南后，开始去背地里活动、宣传，后来表面化了，从村里搞起，公开镇压和杀了一些坏人，分东西，正式成立苏维埃，写上几个大字“村苏维埃”，前前后后搞了二、三

个月，连锁反映，这个村搞，那个村搞，说干就干起来，那时革命确实是高涨的形势。后来敌情紧张，不少的群众跟着跑，党的组织也一起跑。记得一次从乡下出来，一个晚上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老老少少很不方便，尽管大家斗争很英勇。最后苏维埃主席、书记、委员们在一起开了个会，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以后分开了，书记留下了，区苏维埃主席与我们队伍一块跑。可跑走的，往江西方面跑。书记他们带的那部分，是老少，不能远走的，留下在当地附近周旋，以后他们的活动情况就不清楚了。

我们一直往江西走，具体经过的路线不很清楚了。记得经过一个大山，叫什么名称记不清了。不知是否叫八面山，将来大家凑在一块，可以记忆起来。这个大山翻了几天，在大山上吃过云雾菜，山上住有和尚，因为过去是向皇帝进贡的，也叫进贡菜。当场泡了一桶，一泡果然有象原子弹爆炸一样有云冲腾起来，很长时间云雾不散，走的时候还带了些。后来到砻市与毛主席部队会师了，当时叫毛师长，也称毛委员。

我当时当秘书，写点东西，肖克是军事干部，沿途打仗的情况他比我更清楚。

两军会合后，把湘南的干部和部队（主要是郴州、宜章一带的）组织成立二十九团，朱、陈带的那部分编为二十八团，毛主席率领的编为三十一团，肖克到过二十九团学生队（教导队）当过队长。我还当了一个短时期学员。二十九团成立宣传队，把我调到宣传队，在宣传队里还有彭儒、彭娟、吴仲莲、杨佩兰、李青，还有彭儒家的好几个人，都是党员。宣传队是二十九团党委领导的。二十九团成立了三个营，一营营长是朱舍我，二营营长可能是陈俊，三营营长记不清了。

下面的连长级干部有个别的还记得。有个叫彭葵的连党代表，是彭儒的叔俵哥哥，为什么对他记得深刻呢？因为下山

时有一次战斗情况很危险，毛主席、朱德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我告诉他：毛党代表、朱德还在后面呢。现在看来，这件事与林彪有关系。彭葵知道了，就号召我们不要走，说朱军长、毛委员还在后面，一定要打。这是个很好的同志，很好的党员。因为当时很紧张，他整理队伍在一个山坡上把敌人堵住了，战斗是在项山的一个地方，他就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此时他是二十八团的一个连党代表）。我经常讲不要忘记这个同志，他年纪不大。伍若兰同志也就是这次被敌人抓走的。

上了井冈山后，我还在二十九团，陈毅同志在二十九团当党代表。陈毅同志是非常好的领导，那时他就能上能下。他当了一段时期，以后是龚楚，此人后来叛变了。成立红四军，陈毅当四军党代表（注：是军委书记），对外是军士兵委员会负责人，实际是作党委工作，下山后曾又当过一短时二十八团党代表，后仍为军党代表。林彪那王八蛋，整这个整那个，陈毅当军党代表时，他才当连长，以后才当一营营长。

二十九团上山后，在毛主席领导下，许多问题有办法了，什么纪律问题呀，几项注意呀，上门板，捆禾草，不能调戏妇女，买卖公平，要节约，都有了。还听了毛主席的一次报告，内容是对敌人要运用游击的战术原则。那时十六字诀已提出来了，上山后没多时，二十九团就参与打仗，战斗是频繁的。在新、老七溪岭打了一个胜仗，缴获不少。我们二十九团在这次战斗后，就改装了，所有的梭镖改成了快枪。敌人是杨如轩、杨池生的队伍。当时有说明士兵斗争意志的两句实话："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倒江西两只羊（杨如轩、杨池生）"以后打永新，打莲花，打龙源口，我们二十九团都参加了。

老七溪岭战斗中，肖克脚上还负了伤，不很厉害，那时他是连长。

记得还有一个同志叫朱义敏，我的同学，是我入团的介绍人，白石人，在三十一团那个连当党代表，打仗很勇敢，据说刚下山不久，在战斗中牺牲了，战士听说他牺牲都哭了。

以后到达湘赣交界的酃县、茶陵一带，湖南省委派代表来，我记得我们一带的宜章人，包括一些干部，想回湘南去。有斗争、有分歧，但多数想回去，家乡观念很浓。有的还带了老小，要求回去。我们与他们争论，说：你们回去站不住脚。因为我们在井冈山一段时间，接受了毛主席搞根据地的思想，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我们还是懂了些，知道一点，就说他们，那里没有根据地，宜章的民团和敌军都比我们力量强，站不住脚，会被敌人搞掉的，不行，回去不得。他们反批评我们怕死，把家乡都丢掉了，应回去与敌人斗。我们认为无根据地，与敌人斗争会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损失的。

我们几个人，包括张际春、李赐凡、吴汉杰、胡世俭、高静山等同志和我，都不同意他们的意见。高静山是宜章的老党员，与毛主席有来往，斗争很坚决，对党很忠诚。我们这些人主张不回去，但人数不多。又碰上了杜修经，他传达省委命令：要回湘南，说湘南的敌人恐慌万状，群众发动的如何如何好。这一提出，正好合了他们的口味，阻止不住了，公开提出来要回湘南去。当时主席不在，主席是坚决反对去湘南的。毛主席的战备思想是建立巩固根据地。杜修经来时，毛主席不在，据说地方党委开过会，也不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陈正人同志知道这些情况。

湖南省委的意见正好合了农民的口味，闹得很厉害。朱、陈当时在军委工作，他们是不赞成的，但没有能够阻止住这一错误行动。结果还是往湘南去了 当时二十九团情绪很高，行军也很快，我们走后面，还是跟不上。二十八团在后面，二十

九团打前卫。二十八团不大赞成去湘南，因为军委未能阻止，所以也往湘南走。在郴州，遇上了范石生的部队，敌人在郴州的部队数量不多，二十九团打得很英勇，但数量有限，没打进去，二十八团上去才打垮，缴获辎重、花边、枪枝、服装都很多。开始打了个胜仗，是个相当大的胜仗，高高兴兴极了。过不久，附近的敌人增援上来，队伍站不住脚就撤。到黄昏时撤，敌人有的打跑了，但有些少数散兵还没清除掉，还在城市里，下令说撤退，命令一下，二十九团战士简直无法控制，正准备集合回山，但几次集合都很困难，刚集合好，隐藏的敌散兵，几梭子打过来，队伍又散了。一连搞三次才集合好。最后一次集合，已是黄昏了。团长胡少海下命令跟着走，走着走着，就掉队了，跟不上去，派人去找，去找的人也不回来了，不坚决的都跟着跑了，后来听说一部分不知去向，一部分到砰石后被土匪胡凤章缴械了，打死的有，跑了的也有。一团人，只剩下不到一连人，不上百人回到井冈山。

往江西方面走，到桂东沙田一带，我们清查了一下，发现我们麻田出来的人很多，如欧阳佩、欧阳祖光等都没看到。记得在沙田休息时还看到了欧阳佩，休息完后，就看不到他了。欧阳选也不见了，失踪了。我们庄里出来的，只剩我一个人了。

到了桂东打了一仗。这时，毛主席带队伍来接我们，毛主席看到这种情况，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下有办法了，有了孔明在了。毛主席威信高，我们感到他有办法，高兴极了。

在回井冈山的途中，大概是在崇义地区的一个什么地方，发生了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叛变的事件。当时二营当前卫、军部的机炮连，附随前卫营行进，袁带领一部分兵力向刘士毅投降，离我们不远，去追，没追上。经过侦察，知道在什么地

方与敌人挂了勾，但还没直接接到敌人那里去，因为敌人害怕有诈，同时党支部对袁的行动也有点察觉。朱德军长、陈毅党代表、王尔琢团长当时都在，决定去追。后来王尔琢被他们打死了，王尔琢是个很好的同志。

（当访问者问“红四军第十师特务营布告”事时，欧阳毅同志又继续回忆说）下山后，在福建时，才成立了师，即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一纵队改为十师，二纵队改为十一师，三纵队改为十二师。三纵队基本是毛主席带的队伍。开始十师的师长是林彪。在井冈山时我在二十九团当少共团委秘书，当时党、团组织并行，比如在一个团里有团的中共团委，也有的少共团委，这种平行组织的形式在军队里是很不适宜的，后来取消了团委组织，把团的工作归党支部领导。我由宣传队调出来，开始是调到少共团委当秘书。少共团委取消后，才又调到党的团委当秘书。二十九团没有了，才到二十八团去。胡少海当二十八团的一个营长，我在二十八团当党委秘书。王尔琢死后，林彪才当团长，到福建后，部队扩大，十师师长是林彪。十师第二任师长是王良，黄埔学生，是个很好的同志。未整编前的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我在纵队部党委当秘书。在长汀、龙岩一带，林彪总想分散打游击。后打东江，开“五大”。那时第二纵队司令员是刘安恭，在打东江丝岭时牺牲的。第三纵队司令员是伍中豪，湖南耒阳人，文化水平高，写字很好，在江西某地生病，住后方医院，病好后在回部队途中，被民团搞掉了。是个很大损失。此布告究竟是井冈山时期的，还是下山后的，据我所知是下山后的。打张辉赞是我们第十师，此时师长王良，李赐凡为政委，我是党委秘书，张辉赞是我们师捉到的。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调我到电台当电台第一任政委。王诤他们一批人过来，我们派人进去，争取他们。

后调到十师教导大队当政委，又到师党部当秘书长，再往

后，到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四八”烈士之一，是“六大”的中委，工人同志、保卫局长）那里工作。当时保卫局要在四军里面调一个干部，讲明了要求什么条件。罗荣桓担任四军政治部主任，他们研究后，把我挑选上了．要我到国家保卫局工作。我在军队搞贯了，不愿去，罗主任说服动员我，说要服从组织。一听要服从组织，我二话没说，到了保卫局。此时三次反“围剿”已打几仗了，半途调到保卫局，就到了瑞金，开始当秘书，后当科长、秘书长，快长征时又调到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工作，直到长征。

保卫局开始是垂直领导，以后才取消垂直领导关系，变为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那一套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罗瑞卿是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张纯清任三军团保卫局局长。保卫局的前身，在地方上开始叫肃反委员会，中央叫政治保卫处，处长第一任是王稼祥，后是邓发同志继任，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后，就改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是邓发同志。

谢维俊是参加井冈山斗争的，下山后同我们是一个纵队，在第一纵队任政治部主任，在政治部时间很短，到江西后，调到地方工作，当过特委书记工作，后来发生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即反邓、毛、谢、古，这些同志就受严重打击。他在井冈山时大概是连级干部，因为我记得在军里开士兵委员会会议时，有谢维俊、粟裕、赵尔陆、熊焘祺等参加。他是耒阳人。

高静山是个很好的同志，到江西时还在四军工作，开始在二十九团，后在二十八团，到福建后，有段时候到省委工作。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对党忠诚，但有些机械性，如打游击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到一个地方，群众跑了，没有饭吃，怎么办，就去群众家里弄点饭吃，他知道了，就说不行，说这与土匪有何区别。此事叫陈毅同志知道了，他就批评

高静山：纪律很重要，但红军饿死了行吗？他就是不灵活，没饭吃，怎么能打敌人，特殊情况下，应如何维护纪律呢？此同志原则性很强，但缺乏灵活性。后来，我军的群众纪律就发展了，群众不在搞吃的，走时，留下个条子，说明吃了多少米，给放下多少钱。这样群众纪律解决了。饭也有吃了。高同志后来转到地方，在闽西一带工作，详细情况不清。肃反时，江西有A B团，福建当时有社会民主党，高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当地说他是社会民主党，我听了很奇怪，认为完全不可能，把材料送到国家保卫局，我向邓发讲，此人不可能是反革命，我把他的斗争历史和我所知道的情况，向邓发同志详细介绍，后来国家保卫局审查后，没当反革命处理，把高同志及材料退还福建省保卫局重新审查。后来他写信给我并向首长写了申请书，要我转给首长，朱、陈我都转给了，毛主席因为离我近，我亲自送去了，不过那时主席说话已没权了。最后听说在长征前后，被当地敌人搞掉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冤案。去年湖南搞干部调查，我说高静山是个很好的同志，在湘南很坚决。有名的毛科文、高静山都是很坚决的。

毛科文好象一家人——老婆孩子都上山了。

袁崇全叛变时，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四、五个同志商量对策。我在场，当时袁崇全离我们不远，朱、陈首长决定派王尔琢带点队伍去把他们叫回。王尔琢在部队的威信很高，打仗很勇敢。袁崇全不相信党，只相信个人，据说他过去相信王尔琢，故就派王带了人去追，追到了，王尔琢喊话，嗓门声音很大，大家一听王尔琢团长来了，没有任何人抵抗，就回来了。据说袁崇全那几个家伙还在庙里打麻将，跑出来正好碰上王尔琢。他们带了几支驳壳枪，一出来打了一梭子，王胸部中了六枪，当场打死了。第二天我们知道了这些情况，只有一个姓杜的党代表和一通讯员与袁一起跑了。其它的都回来了。王尔琢同志牺牲得

很可惜。后在附近一个山上埋葬了，全军给送葬，朱德同志还哭了，因为是左右手嘛，同志嘛。毛主席把我们接上山，在桂东打了一仗，上井冈山后，把部队整编了一下，林彪从一营营长提升为团长，下山到江西扩编当了纵队长，以后改为师长。后当军团长，开始是连长，说是他带兵与毛主席会师，这完全是捏造历史。

在井冈山上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是他提出来的。在福建，主席写信批评他，后来他不承认，我们都可作证，因为主席给他的信，是我接到的，许多同志都看到的，这封信彭祜也看了（他是宜章人，后来在福建任军区司令员，在统一战线之初，由于他丧失警惕，国民党利用整编红军共同抗战之机，把他的部队缴械了，把他关进了班房，后来他叛变了，解放后混进湖南当参事，后被枪毙了）。

朱德的扁担说成是他的！我们是参加了，当时有米袋背的，也有箩挑的。林彪根本没有去，而朱德同志背米上山完全是铁的历史事实，把朱德的扁担当作他的扁担，显然是这个野心家篡改历史。

下山后，大庾一仗，朱德、毛主席很危险。敌人是李文彬旅。那次我们没有打好，林彪不坚决，他们要撤，朱德、毛主席还在后面。毛主席、朱德都讲：这仗要打，不打好不行。结果他们溃下来了，林彪跑在前面，把朱德、毛主席甩在后头，完全不顾首长的安全。幸而有些部队自动在阻击，首长们才脱险。象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的领袖都是亲身参加战斗，是在千百次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锻炼出来的。

在项山地区的那次战斗也很危险，陈毅同志在揭发林彪的罪行时讲得很清楚。朱德年龄虽大了，但很多情况他还记得很清楚，他有次说，项山那次危险的战斗林彪是负有罪责的。我在上面讲的二十八团一连党代表，为了掩护毛主席、朱德同志脱

险而牺牲了的彭蓉同志的事迹，就是指的这一仗。大柏地战斗是一个大胜仗，几乎把刘士毅部队全部歼灭。缴获不少，那次毛主席亲自动员，不管文武官员、老少，能背枪的背一条枪，主席自己也背了一条步枪。当然我们自己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如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负伤，（后因林彪未很好照顾，致使他被一战士抛弃路旁被马踏死），二十八团二营党代表、胡仕俭同志也负重伤，被放在一个地方，后来不知下落。主席知道了，马上派人去找，主席对干部多么关切和爱护啊！可是找到时已牺牲了。朱老总说林彪在这次战斗中也是表现动摇，执行任务不坚决。

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

谭 冠 三

井冈山的同志，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收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来北京访问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毛主席首创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意义非常重大。宣传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这项工作极其重要，一定要做好，所以，对于同志们的访问我是非常高兴的，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为同志们介绍一下。但是，由于相隔时间很久了，有些事情一时也想不起来。今天只能向同志们介绍一下自己在井冈山亲身经历过的几件事情，供同志们作参考。

首先，谈一下毛主席在井冈山是怎样领导我们做群众工作的。

成立红四军以后，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我们打了几次胜仗，缴获到了敌人不少枪枝。在这个基础上，毛主席领导我们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在井冈山上，毛主席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规定为红军的一大任务

为了宣传群众，部队里专们组织了宣传队。三个宣传员组织一个宣传分队，分队上面则有中队。宣传队每到一地或行军途中，就写标语，宣传群众，凡是能写的地方，全都写上标语。开始，是用纸张写的，后来，一则由于纸张容易坏，二则

由于行军背一大捆纸也很不方便，就改为用墨或用颜料写，我们把墨或颜料装在军用铁筒里，用手提着，到处写标语，最后，又改为用石灰水写，我们宣传队有人提了一个石灰桶，用笋壳或棕作笔，在墙上写很大的字，宣传群众。我们还油印小的标语，到处去贴，凡是群众看得到的，又能保存得比较久的地方，都贴上我们宣传队印的小标语。打开永新后，我们还用石印机印过一部分标语。宣传标语都很通俗易懂，也很简短。至于宣传内容，有对工人的，有对农民的，有对店员的，有对城市里的商人的，还有对绿林的，对白军士兵的，每个宣传队员都背上一大捆这样的传单。有时，我们把印好的小传单通过邮寄的方法来扩大宣传面。有时，我们还把竹片（井冈山的竹子是很多的）削得光光的在小木板上写标语，再涂上一层桐油，然后放在河流或小溪里，让水漂走。有的在竹片上面再扦上一面小红旗，这种小竹片和木板宣传品，可以漂得很远，作用很大。除了文字宣传外，还搞口头宣传，我们宣传队想尽各种方法来宣传群众。

宣传队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毛主席非常关心宣传队的工作，每到一地，总是要检查宣传队的工作情况，对于宣传队做得不好的地方，毛主席就给我们指出来。毛主席检查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给我们上课，毛主席在讲话时，批评过我们写怪字，把“工”字写成了“玊”，把“人”字写成了“⼈”。毛主席讲：你们写的字是给谁看的，是给工人农民看的。工人农民识多少字，你们写的这些字，工人农民是看不懂的。宣传时，我们也会讲“打倒帝国主义！”讲“打倒地主！”可是，我们自己还不懂得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地主”。以后，毛主席就给我们解释，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向群众宣传时解释清楚。

在军队里面，宣传队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不是职位高，也不是当官，而是政治地位重要。可是，一九二九年，有

人却主张取消宣传队，或让宣传队员兼司书（文书）、通讯员，实际上就是不要宣传队，不要做群众工作。

毛主席还很强调宣传队要作调查研究（对整个红军也是这样强调的）。毛主席对我们的工商业怎样？地主怎样？工人怎样？都要调查清楚。毛主席还要求我们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工人，农民又是怎样被剥削的，以及一个村庄里的阶级成份，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也都要调查清楚。毛主席还要和我们开调查会。我们到了县城以后，要开工商业者的调查会，要找店员开调查会。到了农村里，要找农民开调查会。那时，对各方面的人都要进行调查和个别进行调查，当时，除了对贫下中农进行调查外，对其他阶级的人同样要进行调查，对于在县衙门里做过事的人，也要找他们进行调查。毛主席教导我们，各个阶层的调查会，不要合在一起开，应该分开开。我们在一个地方作了调查后，都要上报，经过调查，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更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就能分清敌人和朋友，团结多数。由于有了调查，就使得我们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井冈山时期是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

调查这个方法很重要，情况不了解，就不能领导运动，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没有实践，不到实践中去进行调查研究，正确的认识也就没有。说老实话，开始我们是不会做调查工作的，也不知道怎样做调查，即使调查了，也只是一般的东西，不全面，不仔细，虽然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个问题，强调要做调查，要开调查会，可是，在实践中，往往做得很不够，有一次，我们来到了赣南的寻邬。在寻邬住了大概有三、四天后，毛主席把宣传队集中起来，并问我们："你们在寻邬作了调查没有？"我们回答说："调查了。"毛主席又问：

“你们在寻邬作了调查，那么你们讲一讲寻邬做生意中哪一类最多？”毛主席这一问，把我们问住了，我们想了一想说：“大概是马启德做豆付的最多吧。”毛主席接着又问：“就算是做豆付的最多吧！那么，你们再说一说，寻邬哪几家做豆付做的最好？哪几家做豆付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做水酒做的最好？”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们谁都答不出来，只好哑口无言。这时，毛主席笑着给我们回答了上面的几个问题。事后，我们分头去调查一下，和毛主席讲的完全是一样。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既对我们鼓励了一番，又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说我们工作不细致，不认真，走马看花，没有下苦功夫（这是回忆的大慨），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至今还没有忘记，确实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主席还教我们学会算帐，并要求我们替农民算帐，农民算了帐后，就会明白地主怎样剥削他们的，也能发动群众。因为有的地方地主阶级用小恩小惠拉拢贫苦农民，如减斗把谷你就得送只鸡给他们，请他们吃饭，这样一来，贫苦农民往往不了解别人剥削了自己。经过算帐以后，贫苦农民了解到自己一年劳动了多少，又得到了多少，结果，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使他们知道自己是个被剥削者，地主不劳动，却过好的生活，原来是个剥削者。农民阶级觉悟提高了，就会拥护党拥护红军，就会跟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

分浮财，也是个发动群众的好办法。那时打了土豪，没收豪绅地主的浮财后，除解决一部分军需外，全部分给群众。开始群众有顾虑不敢要，后来我们就想办法送上门去。

经过调查研究，把情况摸准以后，我们就帮助群众建立工农兵政权和党的组织。赤卫队的组织在建立工农兵政权时，开始还不很纯，一方面由于调查得不够，加上群众你推我、我推你，结果，往往被流氓无产阶级甚至地主钻了进来，或者地主

的狗腿子钻进来，掌握了大权。经过斗争，权才慢慢掌握在贫农和雇农手里。党的组织开始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一批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入党时政治要求严。在入党时，我们找入党对象一个个谈话，了解情况。开始建党是不公开。有的党员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不兼什么职务，只当一个普遍的农民，但却在那里起作用。政权建立起来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有了保证了。在建立政权的同时，要发动农民分配土地，搞土地革命。是平均分配的，贫下中农易于接受。不好的和较好的可搭配，在分配土地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而是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生产工具，我们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土地和差一点的工具，那时对待地主的政策体现出“给出路”的政策。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土地法》。刚开始分配时，有些人有顾虑，他们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以后，他们会重新要回去，会反攻倒算，在斗争实践中，慢慢打消了这种顾虑。当红军的也分一份。以后有“红军公田”。

分配土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一开始，我们摸了下情况，经过大家讨论了一下，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就急急忙忙扦牌子了。其实，这样做还不行，因为群众工作还没有做好，群众还有顾虑，所以，这样做表面上分了土地，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分，有些地方搞假分，农村里宗族观念是很重的。地主豪绅乘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利用宗族观念来破坏土地的分配，搞假分，经过几次反复就有了经验。一定要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把农民协会组织起来，把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建立起来，征办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同时，还要注意调查研究，把情况摸清楚，这样，才开始分配土地，把土地真正分下去。分配土地时，成立分配土地委员会。土地分配完毕以后，还要复查一下，看看漏掉了没有，看看分配得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个别地方，有漏掉土地现象发生，如果不复查，就

会使农民少得土地。为了使土地分配得尽量合理，采取由农民群众会议（即评议）的方法。当然，即使这样，也不可能使土地分配得非常平均。

土地革命中，最大的问题是武装农民的问题。分配土地后，党的组织建立起来了，农民协会建立起来了，工农兵政权也有了，但是，有时不能巩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武装农民的问题。有时虽然也组织了一些赤卫队，可是巩固得不够,起的作用也就不大。农民手中有枪和没有枪，确实大不一样。农民手中有了几支枪，胆子就会大起来，斗争就会坚持下去。单单有几根梭镖，还不能全部解决问题。所以，毛主席非常强调指出，一定要建立地方武装，要搞武装斗争。毛主席还指出，虽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如果没有武装，那末，地主武装一来，必然会垮台。

在武装群众的过程中，有些人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是帮助群众武装起来，对于地方上的武装，也想尽办法把它弄过来，扩大自己的队伍。毛主席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真理。在地方建立武装时，开始也不太注意成分，让一些流氓无产阶级或者地痞参加了。流氓无产阶级在革命初期也起了一点作用。可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会反水，不大靠得住。斗争有利于他们，就干；斗争对他们不利，就不干。他们动摇性非常大，有时还会做一些对地主有利的事情。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能被改造过来的。在军队里面，在地方武装里面，都有这样一些成分。所以，武装掌握在谁手里，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了的。

红色政权和地方武装建立起来以后，我们还对他们进行教育，经常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教育他们对地主、富农应该怎么样，对待农民兄弟应该怎么样。那时斗争很激烈，刚开始建立的政权或地方武装，由于阶级教育不够，敌人一来时，很快

就垮掉了，找都找不到。通过这个教训，以后就加强了对他们的阶级教育，并且还告诉他们怎样打埋伏，怎样注意策略，怎样公开活动，怎样隐蔽活动，想办法消灭敌人。那时，我们自己懂得也不多。

在坚持井冈山斗争，进行土地革命时，毛主席很强调阶级路线，总是要求我们按照阶级路线去做群众工作，根据阶级分析去发动群众。那时，对工人讲什么话，对农民讲什么话，对城市小商人讲什么话，都要经过考虑，内容都是不一样的，阶级路线非常明显。对于阶级路线，刚开始时，我们理解得不很好，毛主席经常会对我们进行教育。

每到一地，红军就要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分配土地，建立党的组织，如要帮助群众种田，并且由不自觉到自觉。开始我们从遵守群众纪律做起，比如上门板捆禾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公卖公买，这些都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教育大家怎样筹款，怎样打土豪，怎样做群众工作。支部里的组织干事负责做群众工作，支部里的宣传干事负责做宣传工作。组织干事和宣传干事的工作，是互相配合的。个别地方一开始也执行了一些盲动主义路线，机会主义残余还有，对待地主豪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去做。毛主席发现后，予以反对，提出不准杀人，不准放火。当然，对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土豪劣绅，还是把他惩办的，不惩办这些坏家伙，农民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分给他们的东西也不敢要。所以，必须予以惩办。在打土豪、筹款子时，要出布告，让群众都知道。如果土豪劣绅跑了就发动群众把他抓回来。每个部队都担负筹款任务。每个团要筹多少款，每个连要筹多少款，都有任务分配下去。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虽然有时行军一天辛苦了，但是在行军途中每到了一个地方，还深

入到群众中去，做群众工作，并且要了解这个村庄附近有没有土豪，有没有劣绅。党代表(也是支部书记)带头做群众工作。我们一路行军一路打土豪，一路发动群众，做群众工作。部队分散活动，做群众工作的时间就更长。所以，毛主席教导："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那时，我们往往以连排为单位，少至班为单位分到各村子里去做群众工作。有时，虽然时间很紧，只有三、四天的时间，也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土地的分配，尽管斗争会有反复，反动地主武装会重新回来，从农民手里夺回土地，可是，由于扦过了牌子，进行过土地分配，农民知道我们红军是主张分田地的，知道我们红军是为穷人的，在他们的脑子中有了"土地革命"的观念。正因为这样，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分配土地，是深入人心的。

其次谈一下井冈山时期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

在井冈山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毛选第一卷里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以及一九二九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些光辉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而且表现在各个方面，这里，我把有关毛主席与流寇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军阀主义作斗争的情况，向同志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先说一下毛主席和流寇主义作斗争的情况。

井冈山斗争时期，有些人的流寇思想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喜欢到处流动游击，今天打这里，明天又打那里，打下一个地方后，抓到一些土豪，筹到一些款子，改善一下生活，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是不做群众工作、不要根据地的。他们喜欢打到那里，吃到那里，吃完了就走。

在井冈山上，毛主席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八月失败"呢？就是由于极少数人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搞流寇主

义。红军在湘南遭到了失败，部队在湘南搞得是很惨的，简直搞得不成样子了，没有存下多少人了。当时，有人背的枪，前面挂了个鸭子、后面吊了个鸡子，什么样子都有，把部队搞得非常糟糕。一九二九年部队在福建时，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又去打福建的中部。他们去的是主力部队，留在闽西的部队在毛主席领导下却取得了胜利。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路线是错的。所以失败了。虽然他们执行流寇主义，遭到了失败，毛主席动员了龙岩的群众杀鸡宰猪，开会欢迎他们。

在一九二九年，有些同志还要把毛主席赶走，要毛主席离开军队。毛主席是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代表者。毛主席在战士里面有崇高的威望。我们总是首先了解一下毛主席来了没有。如果毛主席没有来，那么，我们都互相提醒，赶快把草鞋穿好，把鞋带扎紧，意思就是准备吃败仗，准备跑得快一点。如果毛主席来了，那么，我们就信心百倍，准备打胜仗，毛主席的威望不是凭空造成的，而在斗争中形成的，干革命要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不行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革命是搞不好的。

毛主席和有些同志的斗争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三十一团有政治素质，经过三湾的改编和以后的建设，政治觉悟非常高。但是有的同志却另有看法，把三十一团说成是书生兵，认为他们不会打仗。其实，三十一团是会打仗的，打仗时也很讲究策略，既能攻也能守，总是打胜仗。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大余时，有的部队打了两下，就不行了，顶不住，结果跑了。后来在项山战斗（一九二九年二月）中也是这样。我们在项山进行整编时，敌人全围了上来，形势很紧张。别的部队对于敌人的冲击顶不住，跑了。后来还是由三十一团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掩护了其它部队的撤退，并打败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再谈一下毛主席和瞿秋白盲动主义作斗争的情况。

“八·七”会议虽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却开始产生。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湘南表现得相当突出。当时，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湘南一方面指责井冈山烧杀太少，行动太慢，另一方面自己大搞烧杀政策。在湘南，那时组织了放火队，在耒阳的公路两旁，准备把三、四里宽以内的房子全部烧掉，如果谁不同意烧房子，那么，就说成是反革命。我们在湘南也烧了不少县衙门、安仁、耒阳、永兴等县的衙门都烧光了。在打土豪时，我们在土豪的家里门上贴上了这样一张条子：限你八天内交出××钱，否则，烧掉你的房子。这些做法，都是盲动主义的，都是为地主所利用，正好中了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他们污蔑我们的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因此，这样一来，把群众都赶到敌人那边去了，使自己脱离了群众。湘南武装暴动，可是，由于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结果失败了，起义的部队一下子退了下来。后来，由于在耒阳敖山庙歼灭了敌人一个营，打垮了敌人一个营，才重新收复了耒阳。由于盲动主义不顾主客观条件而致湘南的失败，这是一个很使人痛心的教训。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后来李立三表面上反对盲动主义，实际上搞的也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盲动主义作了斗争。毛主席是一贯反对杀人烧房子的。当发现这些现象后，毛主席都坚决地加以纠正。

在井冈山上，毛主席执行的是正确的政策。当打下永新后，毛主席亲自在永新县城召开过一次“书宣组”联席会议（即由部队党支部书记、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后来改称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参加的会议），专门对政策问题进行检查，比如如何发动群众，如何注意阶级路线，如何建党，如何建立政权等问

题。在井冈山上，各项政策都很明确，清楚。对大地主只没收他的浮财、粮食等，他的款（浮财和粮食，大部份给农民群众，留一部份下来作为军粮），不杀他。对于富农，一般不动他，有时也酌情筹款。对于工商业，特别对于中小工商业者（在县城，大工商业不多，主要是中小工商业），采取保护的政策。筹款数字不大，采取"评议"的方法，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地拿出一部份钱来，还宣布废除苛捐杂税这个政策，工商业兼地主者，对于地主部分财产，是加以没收的；对于工商业部分，不没收，采取了保护的政策。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政策，开始我们不够明确。看到是地主，不管是封建剥削部分，还是工商业部分，都全部没收。后来毛主席把它纠正过来了，提出了正确的政策，明确规定只能没收地主部分的浮财，不要损害工商业这部分。

这些政策，工商业者都感到满意。这样一来，既筹到了款，解决了我们自己的供给问题，同时又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保护了他们，团结了他们，使他们拥护和支持我们。本来我们吃盐是很困难的，后来由于有了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商人就愿意和我们做生意，把盐运了进来，所以，吃盐问题解决了不少。毛主席在光辉著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蓬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些，都体现了毛主席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

再次，还表现在和军阀主义残余作斗争。

在军队中有军阀主义残余。有一些人执行封建的资产阶级建军路线，随便打骂士兵。有一个传令兵，因为和传令班长顶了一下口，结果被他用扁担痛打了一顿，最后扁担也打断了，屁股也打烂了。毛主席历来是反对打人骂人的。为了克服军阀主

义残余，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毛主席在军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那时，连团师一级，都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对违反军队纪律和民主的行为，有权干涉，有建议批评军官错误的权力。士兵委员会起了一种监督作用，并且，使士兵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军队里还开士兵代表大会，可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检查军队纪律执行的情况（实际上就是维护军队纪律的执行），发扬政治和经济民主（在井冈山上只提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还没有提军事民主。军事民主是以后发展起来的，这样，就成了"三大民主"），调整官兵之间、士兵之间的关系。士兵委员会对于克服军阀主义残余，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对于俘虏过来的敌军士兵，起的作用更大。他们来到我们的部队后，感觉不一样，感觉很舒服，心情很愉快。这样，对他们就有很大的教育。同时，士兵委员会也教育士兵由不自觉到自觉地遵守各种纪律，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原先，个别地方有搜俘虏腰包的。士兵委员会跟大家进行教育，讲道理，宣传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工人、农民打仗的，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哪一个人打仗的。通过教育，慢慢克服了搜腰包，发洋财的不良现象。阶级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士兵委员会，有一定的权利，有时它可以和政治部一起出布告。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也由士兵委员会来解决。士兵委员会这个形式，确实很好，直到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保持了类似的形式。

当然，有了士兵委员会，并不是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斗争是长期的，军阀主义的残余还是有的，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古田会议"以后，才进一步解决了这个建军路线问题。

克服了一种倾向以后，又隐藏了另一种倾向。在部队中，以后又产生了绝对平均主义，什么事情都要非常平均，正象

毛主席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甚至抬伤病员，也要绝对平均。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不对了，在“古田会议”上，毛主席也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样，两方面的问题，毛主席正确解决了。

那时，部队中还有雇佣性质的表现，采取旧军队分军饷的那一套方法，招兵时，也打着一面“招募新兵”的旗子，同时，一方面俘虏兵逐渐增加，还有暴动农民不断参加（暴动农民容易产生报复主义的倾向，他们有阶级觉悟，并且，总是不断提高，可是，免不了会产生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思想）。军队的成分比较复杂，军队的来源是多方的，加上旧军队思想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有些人不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不重视政治思想建设，所以，部队的纪律也有散漫现象，有不受约束的情况发生。在一九二八年七月打湘南时，表现最明显。为了克服雇佣性质，加强教育，毛主席从政治思想工作着手，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强调政治因素（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人的因素），并且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排，着重进行思想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三十一团，在这方面是个好的例子。他们的纪律非常好，思想也非常好。他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那里做的。二十九团就差了一点。他们是郴州、宜章一带暴动出来的农民，思念家乡观念很重，也没有从政治上来作工作。结果，确实不行，一下在湘南就被打散了。

井冈山时期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政治上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对形势看法，认为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不能打下去。毛主席一方面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指出敌人是强大的，我们是弱小的。毛主席另一方面又从旧中国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考虑，认为中国不是由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而是由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同时也认为中国的军阀是割据的，不仅帝

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军阀和军阀之间也有矛盾。毛主席看清楚了这个矛盾，精辟地分析了这个矛盾，认为井冈山的红旗能够打下去，并且还认为当敌人内部暂时统一起来的时候，我们积极进攻就会遭到失败，当敌人内部进行冲突时，我们积极进攻就会取得胜利。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策略，要利用敌人的矛盾。一九二八年七月，有人把红军拉去打范石生的部队，就是不懂得策略，采取一概都同时打击的方法。这样一来，由于不讲策略，促进了敌人的"联合"向我们进行"围剿"。所以，利用矛盾是很重要的，要讲究灵活的策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在福建起义，反对蒋介石，结果王明反而说他们比蒋介石还要坏，不联合他们，一概"打倒"，最后，福建起义遭到了失败，帮助了蒋介石，不利于我们自己。

不管是瞿秋白路线，还是李立三路线，不管是流寇主义，还是盲动主义，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相对抗的。他们是不要根据地的，是不要群众的。他们自己错了，还污蔑、攻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井冈山斗争的事实证明，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革命就一定会胜利，相反，执行了错误路线，一定会使革命遭到损失。在江西，那时有哥老会、红枪会等绿林组织。

对于这些组织，我们不是伤害它，而是争取它，利用它，使它们对革命有利。那时，我们专门有对绿林组织进行宣传的内容。在井冈山时期由于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对的，所以，井冈山的红旗能始终不倒，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这是毛主席的英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最后，再跟同志们说一下井冈山斗争的一些其他情况。

成立红四军时，除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以外，其他都是湘南暴动出来的农民。开始暴动时，我们连饭都吃不上，有时靠当地农民协会组织帮助解决一点，刚出来时，也没有什么经

验，身上只穿二件单衣，也根本没有什么鞋子穿。在井冈山上，条件确实是非常艰苦的，经常没有菜吃，有时即使吃到了一点菜，也是一没有油二没有盐。在条件好的时候，我们的菜金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每人只有二钱油，五钱盐。五分钱菜金当中还有剩余的伙食尾子。有隔二、三个月清算一次，把剩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用。那时我们根本不发钱，官和兵都是一样的。我们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了，哪里还想到要什么薪金。刚来的俘虏兵就不一样，他们带来了旧军队的坏习惯，刚来时也要求发军饷。后来，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又看到上下都是一致的，大家都不发军饷，也就不再提了。为了节约粮食，吃剩下来的饭，行军时都带在身边，或者用毛巾包好，或者用碗装起来，从来不扔掉的。在冬天，我们也没有棉衣穿，晚上睡觉时，没有棉被盖，只有一条夹被，实际上就是用两层布缝起来的。当时我们确实是不怕苦，不怕死的，一九二九年三月打开汀州以后，条件才略有改善，每人做了两套军服，五角星帽，红领章。红臂章、红领章和五角星，三十一团在井冈山就有了。

我上井冈山以后，曾在茨坪的湘赣特委政治训练班里学习过。学员既有部队的，也有地方上的，专门培养政治干部。所以不太出操，课堂没有凳子，也没有桌子，就是用木板架起来当凳子，当桌子，我们一面上课，同时还要去背粮。从宁冈把粮食背回来，来回要走一百多里，当天来回。所以背粮时，天没亮吃了早饭就出发。

教导队里的政治教育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毛主席经常会给我们班讲话。毛主席讲当时的形势是什么，当时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毛主席还讲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人民的军队，怎样才能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怎样宣传群众，怎样进行调查研究，怎样筹款子。在教导队里，毛主席还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跟

我们讲什么是豪绅，什么是地主，什么叫剥削，什么叫压迫。毛主席还对我们进行政策的教育。

一九二九年元旦，我们吃了一顿南瓜、猪肉，就结束了学习，分配到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工作。当时农运科的科长是毛泽覃同志，妇运科的科长是伍若兰，工运科的科长，大概是个茶陵人或永新人。

毛主席是非常重视培养干部的，特别是政治思想上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端午节那一天打龙源口的这一次战斗是打得很凶。在打得很激烈的时候，开会争论要不要打下去。结果下午三时左右就把敌人打败了，一直追到永新。那时有首红色歌谣歌颂这次战斗。

成立红四军时，部队里已经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教育了。

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在崇义被二营营长袁崇全打死后，林彪被任命为二十八团的参谋长，朱德兼团长。到井冈山后，林彪任命为二十八团团长，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开始是何长工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三十一团团长是伍中豪，此人是禾阳人，黄埔军校学生。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

1.打开永新后，曾经枪毙掉敌人的两个营长。毛主席发现后，就提出不能杀俘虏，并且把它作为政策、作为纪律规定下来。以后部队里不再枪杀敌军俘虏了，俘虏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就发给三元路费让他们回家。

2.在打黄洋界的时候，在医院里养伤的伤病员也全部都自动地来了。他们有的是手受伤的，有的是腿受伤的，行动不方便，也没有什么武器，可是，坚持和红军战士一起作战。在八月三十日那天，拉了一门迫击炮上黄洋界。开始打了两发，没打响，第三发炮弹打响了，正好打在敌人中间，这时红军吹起了

冲锋号，发起了向敌人的冲锋。

3.一九二八年九月，毕占云率领部队投诚到红四军来的时候，在黄坳开了个欢迎会。欢迎台是用四张桌子搭起来的。毕占云反水当红军是不容易的，那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上山以后才入党的。毕占云在欢迎会上讲了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好比破云见青天。

4.袁文才是学生出身的，他家是茅坪一带的地主，我们部队的军需处即后勤机关都设在他家或他家附近。被服厂也在茅坪附近，还有兵工厂。其实也无所谓什么兵工厂，只是修理一些简单的兵械而已。湘赣边区土籍和客籍之间的斗争，是非常严重的，宗族斗争也是很严重。我们对他进行教育，讲天下穷人都是一家人，帮助他们消除隔阂，互相团结起来。

5.井冈山的红军医院，是在一九二八年秋毛主席领导井冈山军民建立起来的，可能是在小井。修红军医院时，我们还捐过钱，我记得自己捐了一块钱。给医院。

一九二八年湘南特委书记可能是彭梓荀。此人是耒阳人，学生出身，胆子很大，斗争不讲策略，风头主义搞得很厉害。现在湖南省革委会有个同志，叫做谢竹峰，也是耒阳人，有六十多岁了，在湘南暴动失败以后入党的。此人可能知道彭梓荀以及湘南特委的情况，那时湖南省委书记可能是夏曦。

回忆毛主席在茶陵的革命活动

谭 家 述

你们访问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期在茶陵的革命实践活动情况，这很好，我非常欢迎，非常支持。我知道的情况不太多，只记得一九二七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为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主席派我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占领茶陵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派大批兵力打来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遵照毛主席指示的避强打弱的方针，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决定暂时撤出茶陵城。就在这时，团长陈皓，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等一小撮阶级异己分子，他们乘此机会企图把部队带到桂东去投降国民党十三军方鼎英（方鼎英原是黄埔军校教育长，陈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不向东，不向毛主席所在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方向撤退，而向南面的桂东方向撤退。部队已由茶陵城撤到了茶陵的湖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井冈山赶来了，赶上了部队。毛主席当晚就住在湖口墟背王其生家里，第二天清早毛主席在湖口墟走坑口这端的坪里（坪边有两丘旱田，禾收割了，禾蔸还在田里，下丘田大，上丘田小）集合了部队开会。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灰色军装，脚打绑带，穿草鞋，从湖口墟背王其生家里走来，站在部队跟前的一条田埂上，面朝南，向部队讲话。毛主席一方面正确地分析了革命的形势，指明了前途，鼓舞了全体

指战员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宣布了陈皓、韩昌剑、徐庶是叛徒，揭穿了他们叛变投敌的阴谋，当场把陈皓等叛徒逮捕了。讲话后，毛主席把部队带回到了宁冈的砻市，在砻市把叛徒处决了。

毛主席的这一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工农革命军通过三湾改编以后，当时仅有两个营的兵力，极大部分都到了茶陵，如果毛主席不及时赶上部队，让叛徒的阴谋得逞了，那对我们的革命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们说意义重大，就是在这支军队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挽救了。

毛主席在湖口赶上部队逮捕陈皓等叛徒，挽救我工农革命军，挽救革命，这一伟大革命实践活动我记得一般经过就是这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而后才跟毛主席上井冈山，所以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

毛主席在湖口的伟大革命活动情况，我还问了谭希林同志，他当时还在湖口墟的对河谭宝国这个村子里驻过一个连。

回忆红四军在莲花的斗争

龙 开 富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禾已长得好高了，毛主席率领了一团一营和三营，在第二次打开茶陵县城后，转回来打莲花县。当时县城只有一些挨户团的地主武装，我们一打，就占领了莲花县城。主席当晚睡在西城门外不远的地方，床是用两条长板凳架的，上面铺条门板，垫条灰白色布，盖的是床旧薄被子，简单、朴素、艰苦。在莲花，吃了两顿饭。主席亲自告诉我："你上街买菜，一定要公买公卖，决不能占便宜，更不能乱要老百姓的东西。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最关心群众，最尊重群众，所以每到了一个地方，毛主席就深入群众之中和群众心连心。主席一到莲花就找贫苦农民群众进行亲切的谈心。

这次毛主席带领部队一到莲花就宣传我们共产党的主张，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剥削讲平等，建立一个新中国；宣传我们贫苦农民受苦受难，是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要翻身求解放就得起来闹革命；宣传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是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军队；宣传革命就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斗争，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军阀官僚不要怕，团结起来力量就大；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宣传我们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和有利条件等等。总之，宣传动员起来，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宣传的方

法，是个别与群众谈心，开小型坐谈会，还到处张贴宣言。在我们撤离莲花回永新时，赶到莲花的竹湖村小街上，还有许多群众在做买卖，我们部队就在那里召开了个群众大会，大力宣传我们的主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闹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大长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反动威风，使莲花的革命风暴越刮越大，最后获得了胜利。

井冈山茨坪和宁冈是根据地的中心，永新、莲花、茶陵三县是根据地的前哨，以九龙山为依托，向江西、湖南、广东、湖北等地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条件：1.有很多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莲、永、茶、宁四县交界，九龙山有利于作战地势，周围有很多的革命群众和党组织，当时山上吃用的粮食油布等给养，靠莲花、茶陵、永新三县供给，扩大红军也靠这几个县。毛主席当时多在莲花、永新等地活动，有它的深远意义：一便于指挥湖南农民革命运动；二能深入群众研究江西农村革命运动；三便于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和以江西、湖南、广东、湖北等地取得联系，指导全国革命；四主要是研究江西敌人朱倍德的动向。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莲花、永新、茶陵、宁冈、遂川、酃县和井冈山以外的游击区域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分析后，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为了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英明地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坚定了中国革命必定要胜利的信心。正如毛主席教导的："中国是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谈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几件事

刘 显 义

一、成立第四军

我是一九二八年四月随着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在井冈山上，毛主席的部队（称工农革命军）和湘南起义的部队（也称工农革命军）会合，在砻市编成第四军。在成立红四军的大会上，毛主席讲了话。毛主席对大家说："我们现在是工农红军，是由工人、农民组织起来的，是为工人、农民谋福利的。我们要打倒国民党，要解放全国人民。这个任务很重。"毛主席还说："我们工农红军要做群众工作，要打土豪分田地。"毛主席还跟大家讲我们是由几支部队合拢在一起的，今后我们要搞好团结，要互相学习，只有团结才能战胜敌人。

之后，部队由砻市驻扎到了茅坪。在那里，毛主席对我们部队讲了一次话。毛主席主要讲军队要发动群众做群众工作。毛主席还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帮助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群众的生产劳动，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在井冈山上，毛主席还会经常跟我们讲话。毛主席讲话的内容有二类：一类是讲部队怎样打仗、怎样做群众工作；另一类是部队是怎样搞好内部的团结，怎样搞好内部关系以及怎样遵守群众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讲话时毛

主席还会提到部队的学习问题。此外，在讲话时毛主席会运用表扬和总结的方法，说哪个单位打仗打得怎么样，哪个单位做群众工作做得怎么样，这个单位怎么样好，那个单位又怎么样好。在打仗前，毛主席都要交待任务，一打完仗后，就检查我们的工作，同时在讲话时把好的方面和不够的方面都替我们指出来。所以毛主席的几次讲话对我们的帮助都很大。

二、毛主席指挥我们打胜仗

刚成立第四军不久，我们在黄坳和五斗江打了一仗。开始在黄坳打。打完黄坳后，又直奔五斗江把部队驻扎在街上，准备在那里迎击敌人。那时天已经黑了，大家熄灯休息，以便在第二天精力充沛地和敌人进行战斗。第二天早上，有一个团的敌人从永新方向来五斗江。发现敌人后，战士们早已等得心里发急，准备向敌人开枪。这时，二十八团的首长很沉着地对大家说："不着急，不着急。"这天正好下大雨，并有大雾，伸手不见手掌。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我们把部队插到一块高地上，敌人也插到了那块高地，没有化多长时间，我们全部消灭了这股敌人，结束了这次战斗。这次战斗，二十九团没有参加，只有我们二十八团参加，而且在五斗江战斗刚开始时只有二十八团领导的第一营加上团部和迫击炮连、机关枪连参加。至于第二、三营还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直到我们快要结束战斗时，他们才赶到。

之后，我们又打了一次高陇和永新。高陇那里有个大军阀叫谭延闿。开始其他一支部队（指三十一团一部）去打他，打得相当激烈。第二天我们前去支援，才打垮了他，过后又打到了永新。

在七溪岭那边我们也打过一次仗。那次战斗，我们二十八

团在老七溪岭那边打，对付敌人二个团，由王尔琢指挥。我们的右翼是二十九团和三十二团对付一个团的敌人，由朱德指挥。毛主席则在另外一个地方指挥战斗。二十九团和三十二团走的是大路，我们二十八团走的是小路，加上路上都是被砍倒的树木（是当地老百姓以前砍倒的，可以防止敌人进犯根据地），非常难走。可是大家都相互鼓励，说这次也一定要消灭敌人，不消灭敌人就不回来。在那次战斗中我们二十八团很快消灭了老七溪岭上的二个团的敌人，然后抄到另外一个团敌人的背后和二十九团、三十二团一起，把这个团消灭了。

每打一仗前，毛主席总是会跟我们讲，这次敌人有多少，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又有多少人，准备怎么个打法，每个问题毛主席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每次打仗，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总是有把握的，总是满怀信心的，总是打胜仗的。一九二九年三月我们打闽西长汀时，敌人是一个混成旅，有三、四个团的兵力。我们只有千把人。可是有毛主席指挥，这次仗打得非常好，把敌人全部消灭了，还打死了他们的旅长郭凤鸣。部队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那么就要打败仗。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在大余时，情况比较紧张，敌人兵力相当多。在开会研究时，毛主席提出部队应该转移，不能再在大余呆下去。可是有的人不同意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非要在大余呆下去不可。后来敌人一包围上来，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也使部队丢掉不少东西。比如伙食费，就被丢掉不少，一直到后来打开汀州时，部队才有了伙食费。

毛主席无论在军队中或在地方上，威望都是非常高的。离开井冈山后，我们曾在兴国的高兴圩打一次仗。那次战斗执行的是王明路线，由李德指挥。他们瞎指挥，一开始就没有打好。这时我们就问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毛主席来了没有，他回答说："毛主席没有来。"听到毛主席没有来，大家都说：这

下糟了，肯定要打败仗了。

一九二八年三月在耒阳敖山庙那里，敌人有五百多人，分成两路向我们的部队包围上来。当时我们一个连长率领的部队只有七、八十人。看到这么多敌人包围我们七、八十人，群众都有点担心，怕打不过敌人，都想把粮食和其他东西运走。这时大家非常镇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了许多农民群众配合参战。他们纷纷拿起鸟枪、红旗，埋伏在山上，敌人来了以后，部队从中间插过去，并且在群众的配合下不到九个小时就把敌人全部消灭了。

有一次我们在东固时，有敌人包围上来。在开会讨论时，毛主席坚决主张打，认为部队不能撤走。机会主义却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认为部队要撤走。这时，有许多人站了起来，对机会主义者说：你们不打，我们打。后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败了这股敌人，并且打开了九个县，使我们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三、群众工作

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总是教导我们要做好群众工作。在这方面，毛主席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部队路过信丰时，毛主席把几百支枪送给了当地的党组织。以后他们这支地方武装从小到大得到发展，编成了红十二军。毛主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有一次我们打到进贤后，毛主席在第二天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会上毛主席问大家寻邬县城有几家卖豆付的，有几家卖布的。毛主席还问大家寻邬县城又有几家卖杂货的，几家卖猪肉的，毛主席问我们，大家都说不知道。毛主席问团长，团长也说不知道，毛主席问政委，政委也说不知道，后来毛主席问地方工作的同志（那时每个团政治部里面都有这样的同志，专

门做社会工作，专门搞社会调查的)。可是对毛主席提出来的问题，他们也回答不知道。后来还是毛主席替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把每个问题都讲得非常清楚，非常具体，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惊奇，也感到非常敬佩。毛主席是怎样知道这些情况呢？原来，当我们打进寻邬后，毛主席也来到寻邬，并且立即找了几个人来调查，所以毛主席很快就把寻邬各方面的情况都搞得一清二楚。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是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的。在井冈山上，毛主席每到一地除了抓紧时间看书外，也常会叫通讯员找个老百姓来了解情况熟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毛主席也经常教育我们红军战士要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在井冈山上，我们部队打完仗后，马上就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劳动，并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我们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性质。(就是讲我们红军是支什么样的军队，我们是干什么的)，宣传红军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宣传红军来了以后，没有衣服穿的有衣服穿，没有饭吃的要有饭吃，劳苦大众都要翻身解放。我们对他们讲：江西老俵，我们是毛委员的队伍，是领导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的队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队伍。同时我们又向群众宣传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每到一地，都要向群众宣传，只要看到老百姓，就要跟他们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一个连队除了留下几个人放哨、站岗外，全部都分到农村里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在行军时，我们也利用各种机会做群众工作，做宣传工作。

毛主席非常强调部队的群众纪律，并要求干部经常向战士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和宣传，要求红军战士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借了老百姓的东西要还，不准损坏，应该很好地爱护。那时，连长和连党代表经常检查连队的群众纪律和执行情况。在部队出发前，他们会到每个班每个排了解：老百姓的房子打扫了没有？借的东西还了没有？我们如果用了老百姓的东西，吃了

老百姓的粮食，离开时，或者写个条子放在那儿，待以后归还，或者放一些现洋在那里，有时也会放一些物质在那儿代替。开始的时候，老百姓还不大了解我们，看到我们有点害怕，对我们总是有点不放心。后来，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实际行动影响了他们；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宣传红军的政策，宣传红军是毛委员的队伍，教育了他们，使他们的认识慢慢地发生了转变。

毛主席除了强调部队要做群众工作外，还非常关心部队内部的团结问题。每打完一次仗毛主席都会讲到这个问题。毛主席非常关心群众、战士的生活。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在茅坪时，毛主席亲自到营房（我们都出操去了）来检查我们的生活。毛主席问伙夫（炊事员）大家吃得怎么样，吃什么饭，吃什么菜，并且还问大家吃得好不好。毛主席经常会到连队来看大家，和战士一起谈心。

在井冈山上，毛主席非常重视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即使在行军的时候，也得抓紧机会对战士进行教育。每次行军，政治部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布置行军的政治任务，提出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在行军休息时，每个班围在一起，根据政治部布置的内容大家相互进行检查，进行帮助，看看行军中有什么问题，哪些要求已经做到了，又有哪些要求还没有做到，或者做到还不够。然后，由连长、党代表、士兵委员会主任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向上汇报。毛主席不断对我们红军战士进行思想教育，不断提高我们红军战士的思想觉悟。

四、井冈山上的艰苦生活

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每人每天只有三分钱的伙食费，天天吃的是南瓜。开饭时，一锅子是饭，一锅子就是南瓜，每个班各装一盆子，七、八个人就一起吃了

起来。那时一元钱可买上三四百斤南瓜（我们吃菜都是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的，在茨坪，我记得机关还自己种了一点菜）。有时抓到河里几条小鱼放一些笋在里面煮，那算是非常好的菜了。在冬天我们没有被子盖，有时能搞到一条由两层布做成的“夹被”算是不错了，即使这样的夹被我们在开始时还没有；后来在打土豪时才缴到了一条。冬天我们两个人合在一起睡，上面盖一条，下面垫一条，夹被里面塞进干稻草，有时实在太冷了，我们就起来烤火，烤暖了再睡。虽然生活这样艰苦，但是大家都不感到什么苦，情绪是非常饱满的，精神是非常乐观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有毛主席在那儿领导，我们都感到有毛主席指挥我们打胜仗，那么什么苦都不在话下了；另一方面毛主席以身作则和我们一起过艰苦生活。我们也感到，毛主席和我们同甘共苦，我们一个普通的战士吃点苦还算得了什么呢？同时在我们的头脑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要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在井冈山上，每一个红军战士头脑都非常明确，我们不是为了资本家、为了土豪劣绅而打仗的，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自己的阶级而打仗的。目标明确了，干劲也就大了，吃什么苦都心甘情愿，即使是刚俘虏过来的敌军也是这样。他们以前是为剥削阶级打仗的，现在是为了劳动人民打仗的。所以明白了道理以后虽然生活上苦一点，也不感到苦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非常有效果的。以上这些原因，使得我们虽然生活艰苦，精神上却非常乐观，一点也没有埋怨情绪。

确实，在井冈山上，毛主席处处以身作则，处处和我们红军战士一起艰苦奋斗，共同克服困难。比如在穿着方面，毛主席就非常朴素，衣服上常有补钉。到了一个地方，甚至走在路上，或者行军骑在马上，毛主席总是抓紧时间看书看材料。如果房间里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毛主席就坐在石头上看书。每打完一个仗，搞到一些报纸材料，毛主席就认真阅看。正因为这

样，毛主席掌握的情况非常多，分析问题也非常准。

一九二八年冬天，毛主席跟我们红军战士一起到茅坪一带把粮食背到大井贮备起来。那时没有米袋，也没有其他袋子，大家就用裤子扎起来装米，然后放在肩上背回来。除了二十八团有一个营在七溪岭那边警戒外，其他营团都参加了背米运动。为了在艰苦的条件下实行官兵平等，毛主席在井冈山上设立了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士兵委员会讲民主，它的权力是很大的，有些问题连长和党代表都处理不了，那么就和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在我们连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时我们连有一半是南方人，非常喜欢吃辣椒，还有一半是北方人不大喜欢吃辣椒。当南方人当采买时（负责买蔬菜）拚命买辣椒回来，相反当北方人采买时一个辣椒也不买。这样为买辣椒这个问题连里产生了矛盾。对这个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连长、党代表也没有加以很好地解决。怎么办呢？后来连长、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主任一起开会发动大家讨论，最后决定，南方人不少，辣椒总是要买的，不能不买，但是不能买得太多，要适当照顾北方人。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支持，很顺利地处理了这个难题，当时士兵委员会负责连队的经济、生活问题，还兼管学习和部队的文娱生活（由俱乐部负责）。

除了军事问题以外，有许多事情也要士兵委员会来处理和解决，即使是一些军事问题，比如怎么样打仗，怎么样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让士兵委员会发动大家一起开会讨论研究。那时，部队党的组织还刚刚开始创建，连队党支部人数不多，没有多少党员。拿我们二十八团迫击炮连来讲，我是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入党的，我入党前，整个连队只有三名党员，我入党后才只有四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工作都要发动士兵委员会来做。否则的话，有些事情就不容易办好。确实，士兵委员会在那时是发挥了作用。

四十年前斗争生活的回忆

刘 荣 辉

一、从武昌到井冈山

一九二七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到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普遍组织了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革命组织。那时，在长江流域的广大区域，大革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益的蒋介石反动派发动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和屠杀，使大革命遭到了大失败。大革命的失败，不但没有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屈服，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愤恨，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入的武装斗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底八月初，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卢德铭和其他同志，领导我们警卫团在武昌举行起义。起义部队离开武昌时，分四路纵队在大街上示威游行，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没收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收回租界”等口号。接着，起义部队登上轮船，离开武汉，打算到江西去参加南昌起义。船行至中途，听到消息：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这时我们改变计划，就在离九江不远的阳新县登陆。上岸后，当地群众团体集会，热烈欢迎我们。在阳新未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又继续前进，到达了修水，与平、浏农军会合，并赶走了民团和反动军队，把部队驻扎在那里。

秋收起义爆发后，我们起义军开赴长寿街，不料遭到被收

编的一个土匪团的袭击。由于我们英勇沉着，打垮了他们，通过了阵地，并且到了浏阳的文家市。部队经过各地，又不断受到群众的欢迎。

在文家市，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那里，毛主席对我们讲了话（我记得讲话的地点好象是在大地主的一个场院里，有围墙）。毛主席讲到了这样一些内容：为什么要革命，现在全国的形势怎么样，革命的发展又会怎么样。毛主席还说，革命必定是艰苦的，也必定会碰到挫折的。但是，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毛主席讲的话，既生动，又通俗，句句都很有劲，对我们的鼓舞也很大，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非常愿意听。毛主席来到我们部队之中，使大家感到又惊又喜。那天，毛主席身上穿的是便服，脚上穿的是草鞋。开始，我们还有点不理解。后来毛主席跟我们讲话时，我们越听越有劲，觉得毛主席非常伟大。再过了一段时候，上了井冈山，上级告诉我们，毛主席是党中央委员，是领导我们闹革命的。毛主席对我们一向就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无论在何时、何地，总是和蔼可亲地对待我们每一个同志。所以，毛主席处处受到我们的尊敬和拥护。

从此，我们这支部队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向井冈山的进军。沿途，我们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当通过芦溪镇时，和国民党第三军朱培德的部队进行了几小时的激烈战斗，并且，终于打败了这支反动军队，逼使他们狼狈地退出了阻挠线。战斗的胜利，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以及同志们的英勇善战，是分不开的。这次战斗，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牺牲了卢德铭。同志们在行军中，随时悼念着牺牲的同志，同时，也就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愤恨。

之后，我们到了三湾。在三湾，我们部队进行了改编，部队的旗子和编制都作了变更。在那里，毛主席又跟我们讲了一

次话。毛主席主要讲了部队的这个变化，还讲到我们的任务是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这些敌人，都是我们革命的对象，都要把他们打倒。毛主席还跟我们讲，今后，我们革命的任务更加重了。在三湾，提了打土豪，还没有明确提分田地。到了一九二八年，才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分田地。

在行军途中，对伤病员的处理，根据情况而定。如果是轻伤、轻病，则随军一起行动。如果是重伤病员，则沿途安置在地方上，或者安置在群众家里，或者安置在村镇上比较可靠的药房、医院里，并且根据当地群众的条件和伤病员的病情，发给每人适当的银元和医药等。那时，部队中的卫生机关还刚刚开始建立，各方面条件还很差，医疗技术水平还很低，治疗方法也很简单。

二、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秋末冬初，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了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一部分带革命性质的武装部队，山上是王佐，山下是袁文才，各有部分枪枝、人马。之后，以我们秋收起义部队为基础，和他们一起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团。这时，部队用的是红旗子（师、团都有一面很大的红旗子，上面有镰刀，斧头，甚至营、连、排、班，也各有一面红旗子，在工农兵政府的门上，也都插上一面大红旗），每个人臂上带的是红袖章、领上带的是红带子，（好象是现在少先队员挂的红领巾一样）。在和敌人打仗时，我们虽然兵力不多，可是，到处都是红旗子、红领章、红带子，并且喊声震天，又吹起了冲锋号。这样一来，敌人就感到空虚起来，精神上相当惊慌。所以，我们一冲过去，敌人往往会垮下去，纷纷缴枪投降。为什么领口上挂红带子呢？它表示尽管军阀、官僚、资本家要屠杀我们

工农，但我们工农则不怕牺牲，不怕杀头，坚持和敌人斗争到底。所以，用血染成的红带子挂在每个人的脖子上，以表示我们的斗争决心。那时，连党代表也经常会跟大家讲这些道理。

上井冈山以后，我们以井冈山为中心，向周围几个县（遂川、宁冈、酃县、茶陵……）发展，建立根据地，开展群众运动，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在冬天，我们曾打过茶陵一次。那次，我们急行军两个白天、一个夜晚，直奔茶陵。当离开茶陵还有四十里时，我们一个跑步，在清晨就赶到了茶陵。当我们到达茶陵时，敌人还在睡觉，我们一个团一下子就冲到县衙门，活捉了伪县长和全部民团。打开茶陵后，我们在那里组织了工农兵政府。我们在茶陵一共呆了四十九天。在这四十九天中，反动军阀罗定拼凑了几个团的兵力，三次来袭击我们。第一次袭击，被我们粉碎了。第二次也被我们打跑了。第三次敌人来，则没有被打跑。一方面由于这次敌人力量比较强大，我们要保存有生力量，不和敌人争一城一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军队内部出了问题，团长陈皓及某些上层干部想叛变革命（那时叫反水）。毛主席知道这些情况后，指示部队从茶陵撤出。所以，当敌人第三次来袭击时，我们就从茶陵撤出，并经过高陇回到了宁冈砻市。在砻市休息了二、三天，其间，毛主席还召开了大会。在会上，枪毙了陈皓，同时，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其中，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句话。毛主席问大家：我们这个团由谁来当团长呢？毛主席接着说，团长的名字是红军。在茶陵四十九天中，我们工作比较平淡，革命风暴也不是闹得挺凶。

一九二八年初，毛主席在茅坪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我们武汉警卫团，底子是旧军队（大革命时期，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成分逐渐发生了变化，补进了不少工人、农民，开始走向革命的道路，部队的性质也慢慢有了改变，和旧军队相比，有了根本的区别。所

以，旧军队那些抢老百姓的东西，任意虐待老百姓等现象，在我们军队里是没有的。但是，由于底子有一部分是旧军队的底子，成员有一部分是从旧军队那儿来的，旧的习惯、旧的作风还没有完全克服掉。因此，在群众纪律方面，还有违反的的现象发生，比如，睡了老百姓的门板，不给他上好；用了老百姓的稻草，不替他捆好。毛主席为了建设我们这支军队，使得我们这支军队成为一支革命的、有组织性纪律性的新型军队，使得我们这支军队能和群众结合起来，并且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在一九二八年春，根据部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通过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我们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群众对我们军队也更加拥护了。

毛主席不仅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而且还经常对我们进行教育。毛主席跟我们讲清执行群众纪律的道理，讲明它们的含意，使得我们在认识上清楚起来。每到一地，对部队在遵守群众纪律方面还做得不够的地方，毛主席都会加以提出来，并针对问题进行教育，以便及时予以纠正。刚开始时，我们还不够习惯，执行得也不够自觉，经过毛主席的说服教育，逐步习惯了，自觉了。当然，对于一些问题严重的，也要给以纪律处分。所以，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在斗争实际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井冈山上，毛主席经常运用一些生动的比喻来教育我们红军战士。比如，毛主席用抬轿子这个现象来教育我们：统治阶级不但剥削了我们劳动人民的生产成果，还要用各种方法来强迫我们替他们当牛作马。听了毛主席讲的这个生动的比喻，我们很受启发，更加愤恨统治阶级。

在井冈山上，毛主席还指示我们部队要做群众工作。在武汉时，我们虽然有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可是，没有提出群众这个问题。群众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南昌起义

部队沿途不断遭到失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一上井冈山，毛主席就抓住了这个问题。到了三湾以后，毛主席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提出了根据地问题以及提出了群众的问题。以后，毛主席经常用这些内容来教育我们，要求我们部队做群众工作，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组织政权。

为了宣传群众，部队专门组织了宣传队。宣传队向群众宣传的内容有：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是干什么的，等等。宣传的方法有文字宣传，也有口头宣传。前一种方法主要就是写标语。那时写标语也不要花什么本钱，颜料用石灰（从国民党那里缴获过来的饭合子，用来装石灰水），写字用的笔用棕扎成。在井冈山时，印刷条件差，没有印刷机，纸张也很缺，不出版报纸，主要通过标语的方法来宣传群众。口头宣传，主要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来进行。除了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外，我们部队本身的行动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方法。一方面，我们部队纪律严明，不侵犯群众的利益，处处保护群众的利益。有时群众没有开门，我们就不去打扰他，部队在大树底下宿营。打碎了老百姓的一个盆子，也都要照价赔偿。即使老百姓不在，也要把钱设法送给他。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使群众很受感动，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可以说，这是种无形的宣传方法，效果非常好。另一方面，我们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帮助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帮助群众搞土地分配。农民是非常讲实际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使他们有了比较，得到了好处，获得了解放和翻身。所以，通过这些活动，群众知道我们的军队是为他们服务的，是他们的自己人，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因而，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经过宣传后，群众觉悟提高了，不论在战时或在平时，都积极地拥护和支持我们。在打仗时，他们也站岗放哨，还组织

了运输队，帮我们部队抬担架，输送伤病员。他们还搞侦察，向我们报告敌情。甚至连小孩都组织成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妇女也组织了妇女会，为战争服务。群众还积极参军，壮大我们的队伍。在平时，我们需要的许多东西，如粮食、油、盐、菜、锅子，也大部分要靠地方上帮我们解决。那时条件很艰苦，不可能象现在那样都有现成的。所以，没有地方上的帮助，有许多困难就没有办法解决。平时，他们还和我们一起打土豪。打土豪没收到的东西，除了粮食和银元留一部分下来供我们部队自己使用外，大部分都分给农民群众。在打土豪时，开始我们在执行政策方面有点偏差，有烧房子和杀人的现象。虽然这是局部的，可是毛主席发现后，也很快地把它纠正过来了。在井冈山上，军民关系确实是非常融洽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湘南起义部队从酃县那边过来，我们的部队和他们在砻市会合。湘南起义部队来的时候，有好几种情况。其中有的服装比较整齐；有的则穿了长袍；有的枪比较全，也有的都背了梭镖、马枪、大刀。有二、三十岁的男同志，也有不少女同志、老头，甚至还有抬在萝筐里，抱在手里的小孩。原来我们没有炮，他们部队带来了迫击炮。

在井冈山上，毛主席经常对我们红军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当时部队思想教育的内容主要有：1.阶级教育。这是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的根本内容。部队教育红军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红军是干什么的。通过教育，大家提高了阶级觉悟。特别是敌军俘虏兵，为什么一来红军就能打仗，而且又打得非常勇敢。一方面由于我们红军讲平等自由，不打人，不骂人；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红军进行了阶级教育，使他们明确到，我们不是为哪一个资本家、为哪一个地主服务的，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有了阶级觉悟后。所以，打起仗来就特别勇敢。2.有关群众工作，群众纪律的教育。

毛主席提出军队要进行思想教育，要党指挥枪。可是有些人却加以反对，总是要“枪杆子第一”，要枪指挥党。在井冈山上，以及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毛主席一方面与这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团结他们，以便在白色恐怖包围中把革命坚持下去。

下面谈谈当时部队卫生组织的情况。

1.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湘南起义部队和我们会合后，我们这个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我们这个团在编前、编后，都设有卫生队的组织，并打着红十字旗，卫生工作人员戴着红十字袖章。在营、连，也设有卫生组织。

2.由于军队还在刚刚建设阶段，没有很多精力过问卫生工作，所以，在那时很少听到提起部队的卫生工作，只是在平时作些治疗工作，在战时作些救护工作。当部队比较发展、党政组织比较健全以后，连队的卫生工作才逐渐地搞了起来，如平时的饮食卫生、整理清洁、掩埋厕所，以及个人方面的卫生（烫虱子、理发等），战时对伤病员的救护也周到起来，能及时得到包扎、治疗。由于红军战士政治觉悟非常高，轻伤病员都不愿下火线，对于重伤员，则能及时转运下来。那时，对伤病员很重视，并规定不准丢掉一个伤病员，不准有一个伤病员得不到治疗。

3.运输工具和运输力，大部分是依靠群众来解决。运输工具，也只有担架。担架由竹子和稻草搞成，上面有帆布，两人抬一副，非常轻便。三十一团专门设有担架排。那时，三十一团是正规团，军事装备比较好，组织机构也比较健全一些。在战时，担架排只能担负战场的一段运输，大部分还要靠群众来帮助。

再谈谈有关医院治疗的一些情况。

1.一九二八年第四次打永新时，我下肢负重伤，被送到井冈山医院治疗。井冈山上有大小五井，由宁冈这边去小井只有

一条路，要经过黄洋界，得走四十里的山路。

2.那时红军医院设在小井，院长是段治忠，留着满脸的胡子，是随湘南起义部队一起上井冈山的。医院下面设有各所，分内外各科、药房等。有中、西药品，中、西医官。医官中间，有少数一部分人有一般的技术，可做比较简单的腹部、截肢手术等。但是，大部分人只能处理切开脓包。

3.药品器材，开始还够用，以后随着战争频繁，伤病员逐渐增多，需药量加大；加上，有时敌人在山下，我们在山上，因为被封锁，医药器材光消耗而得不到补充。所以，到后来医药器材和其他各种物质是相当缺乏的。怎么办呢？大家自己动手想办法解决。那时，医院里用的脓盆、大小便器、镊子、护膜球等，大部分都是用井冈山的竹子做成的。护木是用杉树皮或竹子做成的。纱布不够，改用漂白布；盖布没有，用枫树叶代替。由于那时井冈山不种棉花，从外地又不好运进来，大家就用这些办法来克服困难。同时，对于纱布这些敷料，在使用时也非常注意节约，总是洗了又用，破了再补。因西药缺乏，内科大多采用中药。药品的来源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靠打仗缴获；第二，打开当地城市后，找到一些简单的西医药房，把它全部药材都买下来；第三，靠白区党的组织设法购进一些。总之，那时每一件药品都是来之不易的。虽然那时医疗条件很差，但是，治病效果还不错。我的伤，很快就在医院里治好了，也没有化脓。

4.在医院里，治病和护理等工作是做得不错的，护士和照护员之间协同得非常好。工作忙的时候，护士也照护，照护员则也护理（如换药，或其他工作，看不出有互相推脱、拈轻怕重的现象。）

5.医院的给养管理和设备条件：伤病员每日三餐，早、晚是干饭，中午吃稀饭，吃的都是红米（那时米要从山下运上

来），菜则以瓜类为主。然而，重伤病员有时也能吃到鸡蛋和牛牌炼乳。伤病员的伙食费，每人每日八分至一毛（部队每人每日三分到五分）。伤病员还发负伤费和营养费。伤病员的自觉性是非常高的，负了伤以后，能走的，就自己走上井冈山，到医院里来治疗，而不叫人家用担架抬。医院一进门，就是病床。轻伤病员睡地铺，地上铺了许多稻草，四周都是木头围起来，中间留一条路。虽然很简陋，却也显得整齐。条件困难，医院里棉被很少，夹被、毯子也只有一部分，但也不够分配；天冷的时候，就烤火取暖，捉拿虱子。伤病员在治病时，情绪仍然是非常高涨的，当病情减轻，自己能走路的时候，就坚决要求出院重返前线作战。平时，部队也经常派人来医院慰问伤病员，他们带来了慰问信和慰问的物质。使伤病员很受鼓舞。

三、从井冈山到东固

一九二八年冬天，我刚从小井出院，就随同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南康附近，我第三次负伤，行动困难，上级给了一匹马让我骑，到了东固，就进院治疗。这医院是红军独立二、四团开设的。在从井冈山到东固这一段行军中，治疗、护理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如：有时半夜到达宿营地，也要给伤员换药、吃饭、喝水等，总之，卫生工作人员先安顿伤病员的一切，然后再考虑自己的休息，或者料理自己其他事情。其实，这一段的行军是很紧张的。第一，要冲破敌人对我们的阻挠；第二，行动艰难，每日行军八、九十里甚至一百多里，走的又都是崎岖小道，有时夜间也要行动；第三，我们所经过的地区都是白区，土豪劣绅、反动军队、民团等，每天都要和我们打好几仗；同时，行动作战中，没有后方，伤病员要随军行进，这也是给部队增添了不方便。尽管这样，每个同志都有

刚毅的意志，下了坚强的决心，并且有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精神，所以，终于克服了困难，到达了东固。

这时部队的卫生状况，也比以前有了好转，因为，在行动中我们打开了一些城镇，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补充。此外，又和东固根据地会合，部队卫生人员有了增加。这时，瑞金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建立。师部还是和以前一样，有卫生队，也很简单。队长有的也不是医务人员。当时，我担任了副队长，还兼护士长。医官是曾玉（女）。此外，还有中医官、看护员、抬护员。至于技术水平，还很低，卫生工作人员懂得的东西不多，还正在学习。比如，看护员对几种纱布条，也往往弄不清楚，把带颜色的升汞纱叫红纱布，碘仿纱叫黄纱布。治疗方法也很简单。如枪伤、和溃疡等，分得不清楚，都是往伤处填纱布布，止血。小的出血用碘酒纱布条，大的出血就用铁氯纱布条往伤口里填，洗伤的药，由于药乏，那时能搞到"双氧水"就算不错了。"六〇六"是非常珍贵的，只能经过批准后才可使用。内科药来源困难，技术条件也差，所以，仍然主要用中药，西药不多，使用起来方便，往往留着在部队行动时才使用。那时，卫生工作人员为了到最前线去救护伤病员，英勇地牺牲或者光荣负伤的也不少。我就五次负过伤。

一九三〇年下半年，我们攻打长沙后，在九、十月间返回江西，打开了吉安。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我们在龙冈和张辉瓒的部队打了一仗。这就是第一次反"围剿"。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漂亮，上到师长张辉瓒，下至他的伙伕，当天，全部被我们歼灭，其中张辉瓒还被我活俘。老百姓看到张辉瓒被俘，非常高兴。由于以前受到他的残酷欺压，所以提到了张辉瓒，先让他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然后，割下他的脑袋，把它吊在木板上，投入赣江，让它漂流到南昌去见他的狗主子蒋介石。木板果然漂到了南昌，蒋介石捞上来见到后，吓得胆战心寒，非常

恐慌。就这样，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我们彻底粉碎了。通过这几次大规模的战斗，我们缴获到了不少药品器材，还俘虏到了一些敌军医务人员（如戴济民、李治等）。这样，我们的医药器材和医务工作人员不断增多。所以，不久即开办了卫生学校，自己培养卫生工作人员。在以后的战斗中，我们每次都满载而归，不断缴获到敌人的医药器材。并且总是会俘虏一批敌方医务人员（如范英武、张杰、李智广、姜齐贤、封旭东、张戊光、孙大坤、孟谦、贺连森等）。

对医务工作人员的照顾，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一直是很好的。比如，在部队中，除了团长和团政治委员各人配一匹马外，其他人都是没有马的。可是，为了方便工作，医官却每人有一匹马，每人还有一名勤务员。后来，从卫生学校培养出来的医生（那时称他们是红色医生），就不分配马了。

谈井冈山斗争史

肖　明

在茅坪红军医院

我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初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五月份在茅坪医院的看护班工作，三个月后转到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工作。

当时的茅坪红军医院里有队长（姓莫，广东或广西人）、党代表（姓叶，湖南人，长征时牺牲），他们两人的办公地方称队部。下面还设医务室（二个郎中即中医、二个西医共四个医师。我记得有个姓曾的医生，还有个中医，脚有点跛）、看护排（有十多人，排长姓范，湖北人）、担架排（十多人）、事务排（十多人，管理后勤等事务）。

医院可以容纳四、五十个病人，来来往往的病人就比较多了，因为当时从永新送来的伤兵比较多，先在茅坪医院治一下，马上转到小井医院去治。

伤病员在住院期间伤还没有好就经常争着要出院，特别是一些党团员。一些年轻的看护人员也是这样，总想到前方去打仗。有些人知道部队要出发打仗，开小差离开医院，别人批评他，他说我为打仗开小差有什么关系。

医院里的药材十分缺乏。虽然各地党组织想方设法冲破重重困难，把升汞（治枪伤用）、碘片等西药送到根据地里，但总是不够用（一般是先送到留守处，再由留守处分到医院或一些连队里）。因此医院经常组织医务人员和附近的群众上山采

药。我当时采药把附近的山头都爬过了。采药时，由懂药的人采个标本，然后大家照样子采。我记得医院有个医师是广东人，他认识许多草药，眼睛十分近视。他起初拿出干叶标本要我们上山去采药，我们上山采回药后，他一看说我们采错了，因为干叶标本和山上长着的草药是有些不同的。这时我们就和他开玩笑拿掉他的眼镜，他去掉眼镜后看不清东西对我们讨饶说："你们不要闹，把眼镜还给我，明天我和你们一起上山去采药，大家同心协力办好医院，办好医院是毛委员的指示。"当时用中草药一般的病都能治好。洗伤口用盐水洗，硝盐也能用，但要过滤才行。

毛主席对医院很关心。有一天晚饭后，毛主席散步到了医院，问医院有多少伤病员？伤重的有多少？伤轻的有多少？并且挨个地问每个伤员伤在什么部位？生活有些什么困难？使伤病员十分感动。当时群众每逢过年过节也都来慰问伤病员，送红薯片、苞粟、冻米糖给伤病员吃。医院的医务人员经常把自己省下来的东西给伤病员用，有些什么好吃的东西总是给伤病员吃，很多伤病员在医院治好病后重返前方时，经常向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部队出发打仗时，医院里的医生、担架排会抽出一部分随部队上前方去抢救伤员。

附近群众生了病会到医院来治病，国民党的俘虏兵受了伤，我们也给他们治疗。

药房里的布药袋要大一点，上面没有布盖子，竹钳子比现在陈列的要扁一点，现在太尖了，长的、短的有好多种规格。这个旧药柜子是象原来的样子。

当时医院的墙是土砖砌的，用石灰粉刷过的，窗子比现在的要小一点，没有摇窗。

重伤员行动不便住楼下，轻伤员住在二楼。

砻市毛主席旧居

我在这里见过毛主席。毛主席和朱德同志都是住在这栋房子里。

红四军成立后毛主席在这个大厅里向朱德同志介绍罗霄山脉的地形情况，但当时没有地图，讲的主要内容是：罗霄山脉地形最利于搞武装斗争，因地形好，群众基础好，搞武装革命就有一个好的立脚点，是以会议形式讲的，叫什么会议我不清楚，参加会议的是连、营的党代表干部，因毛主席历来就主张互通情报，所以成立四军后毛主席就在这里向朱德同志带来的部队干部介绍罗霄山脉中段的情况。

秋收起义在文家市会师时，毛主席向部队讲：我们要到湖南、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地方去建立根据地，那里各方面的条件很好，三湾到宁冈等地的罗霄山脉中段的山头约有七百多个，毛主席走遍了五百多个山头，到宁冈后就把医院和后方留守处放在茅坪，在砻市又办了教导队等，这都是为建立根据地而办的。这个会是在成立四军后三、四天的时候召开的。我当时年龄小，可以到处乱跑。我们走到这里找毛委员，所以在这里见到了毛主席，看到很多人在这里开会。我走到这厅时有人介绍说毛委员在这里开会，我们见到毛委员后就走了。

红四军成立大会我参加了。这次会是在这个沙洲上开的，当时没有草，那边的桥是木头的，部队大部分是住在祠堂里和庙里以及群众家里。

四军成立大会的会台是用禾桶放在底下，上面放木头，木头上面借到群众家里的门板搭成会台，开会很热闹，参加会的有一万多人，敲锣打鼓放火爆，还写对联，用红纸写的。每

个团都有红旗，但没有军旗。部队以团、营站队形，群众站在中间，部队站两边，靠街上这边站两个团，靠河那边站一个团，朱德同志带来的部队。前面是特务连兼搞会议的保卫。毛主席当时是坐在台上靠河这一边，穿的是便服不便带手枪，朱德同志穿军服，背了短枪。大会是在上午十——十一点钟左右开始，何长工宣布大会开始，先唱国际歌，毛主席、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毛主席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成立红四军后我们的力量就更强大了。我们要加强团结，要官兵一致，互相帮助，未成立红四军之前两三天在部队中就做了这方面的思想工作。称毛主席为毛委员，朱德同志为总指挥。

二月打新城后亦在这个广场召开过一次大会，有很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先宣布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和县委，然后公审判决伪县长张开扬的死刑。

井冈山斗争的片断回忆

何 健 础

（一）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在酃县水口

一九二七年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从浏阳文家市经过芦溪、莲花进入永新三湾。据说部队在三湾改编后到达砻市，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来酃县。当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就与刘雄同志二人来到酃县县城，准备发动群众迎接。等了两天，部队没有来，听说他们从宁冈出发，经过十都、泥湖、坂溪等地到了水口，不会来酃县县城。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刘雄两人立即跑到水口圩，在郭利昌饭铺里吃了晚饭后，八点钟左右，就到红军司令部去，当时的司令部设在朱家祠，有一面工农红军大旗插在门口。我俩走到司令部门口，卫兵问我们找谁。我们的答复是：找毛委员汇报，请示工作。一个卫兵把我们两个领到团长陈皓那里，陈问我们怎么认识毛委员？我答：去年省里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见过毛委员。毛委员还给我们作过政治报告，分析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并教育我们要怎样做农会工作。陈说："那好，你们还是毛委员的学生"。于是，立即派一个参谋提着马灯带我们到桥头江家一位姓江的农民家里。在厅堂后的房子里，毛委员还在办公。我记

得床是一铺架子床，靠窗右边摊着，是用凳子架起摊的，床上是毛委员带的行军被子，什么颜色记不清了，靠光窗放着一张三屉桌子，毛委员坐的是一把靠背椅子，桌左边还有一条长板凳，凳上摆着几本书，有一些纸，还有一盏菜油灯，点着几条灯蕊，发光并不那么很亮呢。

毛委员当时穿两件单衣，脚穿草鞋。我们进去，他很高兴，听了我们简短的汇报，主要内容是：我们酃县的农民运动的发展、组织情况，酃县武装力量的组织和水口当时挨户团的情况，并汇报了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雄厚，尤其东乡贾家的反动派很嚣张。毛委员说：你们要想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武装逐步扩大。接着毛委员对我们说："你两个人愿不愿来这里工作，我们部队要设政治部，但还未成立，需要人。"我们俩说："愿意！"当时我心里想多邀几个人去，毛委员又说："你们这里还有没有懂得军事的人？"我们说："有！"当时我们便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叫何史良，一个是叫何国臣，这两个人都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的学生。"马日事变"以后，不满蒋介石的叛变，逃回家里来了。毛委员听完我们的介绍以后，说："你们回去和他们商量一下，是否愿意来？"这次毛委员接见我们，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出来了。第二天早饭后，我们还准备再次去见毛委员，可警卫员说：毛委员正在和人家谈话，就可不好再去扰乱他了，所以我们就走在他们的大门口桥头边一所小学内，看当地许多妇女替工农革命军在做棉衣，然后就各自回去了。

回去以后，找到了何国臣、何史良二同志商量。他们回答说愿意去，可是后来何史良因爱人是资兴彭分庙的，要去和爱人商量，一去就是三、四天没见回来。毛委员率领部队在我们会见的第三天经八都、下村到江西省遂川县大汾上井冈山去了，我们便没有跟上。

（二）酃县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酃县一批在长沙、衡阳等地求学的知识青年，在毛委员努力宣传马列主义和进行革命组织活动的影响下，不少人接受了马列主义，追求真理，逐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概在一九二〇年或一九二一年就参加了党的组织，入党以后，一直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如何孟雄一九二六年冬以前一直坚持在北京长辛店、郑州、张家口等地进行铁路工人运动，京绥铁路工会是他亲手组织的，他并写过告京绥铁路工会工友书。一九二六年冬后，党组织调他到汉口、上海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先后任过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和江苏省委委员，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在全国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工人运动搞得很活跃。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英勇牺牲。现在北京历史博物馆还陈列着他的照片和遗物（他替人写的一把白纸扇用他原名何子静写的）。

一九二二年李树彝就由北京调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子弟学校任主任，现历史博物馆还陈列该校学生的证明书，有他的生平。

贾行青同志原在北京大学学习，曾在北方、内蒙、北京、张家口等地工作。后经党中央保送苏联学习几年军事，于一九二六年冬回国，即分派到河南冯玉祥部下做军事工作。冯叛变后，即将他逮捕入狱，受尽各种酷刑，一九二九年冬出狱，经河南省委送到上海中央治病，当时他的身体特别衰弱，中央即送到宝隆医院诊治。我那时在上海中央组织部做联络工作，曾到宝隆医院看过他几次，自他出院分配到北方工作后，就失了联系。

又如何伯刚、邓树霖于一九二五年在长沙岳云中学先后入党。还有罗芙芝（西乡人）、凌粹员（三口垅人）、房灿（西乡人）、段南、潘视浩、段瑞（均西乡人）、戴存恺（东乡人）、

万达才（东乡人）、郭光前（八都人）、邝星山（茅坪人）、郭天禄（水口人）、谭文（城里人）等，在一九二七年左右加入党组织。以后据说张经武、张平化、周礼、黎曦，刘寅生等同志于一九二六年前后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等校也先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后来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辉煌的事业。

在一九二四年夏，李树彝从安源煤矿工人子弟学校经省委调回酃县，公开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的工作。李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住县政府内进行工作。大约在十一月左右在城里组织酃县特支。一九二七年一月正式成立了酃县特别支部，并推选李树彝为支部书记，罗芙芝为组织委员，何伯刚为宣传委员。一九二七年一月朱子和（农运特派员）来酃县后参加了特别支部。特别支部直属湖南省委领导，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和消灭县内土豪劣绅农村封建势力。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县农协派我参加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后，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初于长沙营盘街东头尼里，毛主席又向党员代表作了关于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有关党组织工作的重要指示。因此，当时酃县的农民运动发展很快，真是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土豪劣绅搞得灰溜溜的，不敢为非作歹，这是我县从来未有的大好革命形势。

一九二七年由于蒋介石公开背叛人民，背叛革命，“马日事变”以后，革命暂时转向低潮，党的组织也随着转为地下活动。一九二八年四月，周介甫在中村山上被地主豪绅逮捕惨杀后，敌人到处搜山捉我，逼得我也在一九二八年五月离开酃县，由思龙、大小桂逃到桂东挑水、流源，由广州坐船经香港到上海去。

（三）酃县农民运动的情况

一九二五年的十二月，岳云中学放假时，在一次党小组会

上，我提出这次寒假回家看一看。当时小组的负责同志问："你明年什么时候回来？愿意来还是不愿意来？"我说："怎么不愿意来。"他说："党准备在湖南靠广东一带发动农民，组织农会，你如果不愿来，就在酃县发展农民运动。"他这样一说，我便表示了态度，向他说："党有什么任务需要我去做，可以不来。"会后，他把很多的宣传品给我，内容是取消高利贷，废除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回到家后，一边休息，一边到农民家里去了解情况。假期已满，父母都催我回校去工作，我推说有病（实际是有点病），打算不去，后来父母同意我在家吃药休养。这时我便拿着宣传品，到农民中去宣传，首先发动了何周禄（后介绍入了党）、何周盛、何炳强、李秀茅、黄起胜、谢吉庆、谢同庆兄弟二人等。在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开了一个六百多人的大会（在下龙潭乡一户姓周的家里开的会），成立了龙潭乡农民协会，选举我为委员长，何周禄、何仁臣、何炳强、黄长发、黄秀兰为委员。这次大会影响很大，大小桂来了不少农民，要求入会，观音山也来了不少的农民，记得在会上还贴了这样的一副对联：

"铁犁犁开平等路，
铁锤锤成自由钟。"

不几天，周介甫在中村发动农民，在周家祠开了一千多人的大会，成立了中村乡农民协会，选举周介甫为委员长，刘玉们为副委员长，这是酃县最早的农民协会组织。接着，龙渣等地分别挂起了牌子，主要是我与周介甫负责。不久黄板桥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十都、万达木也成立了农民协会。

一九二六年七月左右，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陈汤为农民特派员，来酃县筹备农民协会，当时在孔圣庙设立筹备处，大概在酃城附近及西乡各处，也都挂名成立了农民协会。一九二六年的九月间，召开了县农民协会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县农民协

会，当时的会员约计三万余人，实际也有二万多人。大会结束，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选出周介甫为委员长，何伯刚、周芳芝、房燥、潭文等九人为委员，陈汤就回长沙去了。

当时农民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废除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禁烟禁睹，减租减息，取消高利贷等，并继续成立各乡农民协会。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我作为酃县的农民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一直开到二七年元月初才结束。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很隆重，出席的代表有一百七十余人，邓中夏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报告。同时召开的还有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工农两代表大会合并在湖南省教育会大礼堂听了毛委员的报告。大会结束后，大会负责人留下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代表在长沙营盘街东一个人家里召开了会议。毛委员在这次会上亲切教育我们怎样作农民运动的工作，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给我们作了重要的指示。

这次省代表会还没有承认我县的农民协会，原因是：当时筹备成立农民协会的陈汤是一个国民党党员（马日事变后到江西当伪县长去了），是一个反动的家伙，他在酃县的农民协会挂了一块“中国国民党酃县农民协会”的牌子，经大会追查，说农民协会是个群众组织，不应在上面加中国国民党数字，这是错误的，上巴乡农民协会建立得还不普遍，因此，全省农协会不承认，要我回来，重新筹备。我在大会后期曾见到我的入党介绍人夏明翰同志。他当时是中共省委农民委员，我要求他把我调到资兴或桂东工作，当时我认为本地工作不好搞，酃县的土豪劣绅的势力很强大，特别是当时贾家的势力更大。而夏明翰同志说：“过去我两人是同学，现在是同志，革命工作不要怕困难，本县情况熟悉，应该回去工作，有困难再派一个人去帮忙。”我同意他的意见，于一九二七年元月中旬，持省农民协

会派为特派员的证件和指示回到酃县，重新建立酃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于城皇庙。这时周介甫等便回家里去了，而我勇于重新筹备县农民协会工作。元月下旬，省委派朱子和同志（也是特派员）来酃县，成立酃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朱子和、李树彝、何伯刚、罗芙芝、房灿、林强、段瑞、谭文等为委员，迁入文昌阁内办公。这时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我先后到泥湖、坂溪、三口垅、东门、木湾、西乡潘家等地成立乡农民协会。全县农民协会会员达三十万人以上。农民运动的兴起，给土豪劣绅以沉重的打击，农民纷纷起来打土豪劣绅。我记得朱子和来酃县后不久，分析当时农民协会的情况，认为要提高农民协会的威信，就必须打一个最大的土豪劣绅谭子谷，于是就在县城东门的大庙里，召开了一个五百多人的农民协会会员大会，朱子和上台说："我们农民祖祖辈辈受剥削、压迫就是有土豪劣绅。我们不打倒土豪劣绅，就不能抬头，今天我们去打一个最大的土豪劣绅谭子谷，大家同意不同意？"顷时，大家气壮山河，异口同声地说："同意！"五百多人的革命队伍，浩浩荡荡地进城了，围住谭子谷的房子，谭子谷见势不妙，便从南门一家酒店逃跑了。这次行动，对广大农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给土豪劣绅一个有力的打击。接着坂溪、中村等地都进行了，中村打了一个土豪劣绅钟伦元，抓住以后，戴高帽子游乡，后到酃县城，把他关了起来。

一九二七年三月间，为了镇压土豪劣绅的反动势力，以国民党县党部及特支的名义各写了一个报告到省里要求派兵。三月底，省里派了一连的兵力到酃县。五月间，长沙"马日事变"，蒋介石公开背叛人民，背叛革命，残酷镇压人民，杀害我们共产党员。五月底国民党省党部发来命令将一连的兵力调回长沙，我们抵抗不住。朱子和、房灿等不得已随农军上井冈山。一九二七年六月间，朱子和带领部队去攻打县城，走到晏

公潭时，因士兵内有叛徒反水，朱子和当场被逮捕，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壮烈牺牲。据说朱子和在监狱里和临死前，受尽各种酷刑，毫不畏惧，大喊：打倒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这种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人人敬仰。

谈井冈山斗争

周 里

一九二七年十月份，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水口。这时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由黎育教、旷光前和我三人组成。这是“马日事变”后在我家里成立的，我担任支部书记。我是“马日事变”前夕在长沙党校（国共合作办的）的学生，只填了入党申请书，尚未履行手续，就发生了“马日事变”。这时在长沙一师的老同学黎育教是个共产党员，他是公开的党员，不便回酃县活动，于是要我和刘平章回酃县，做恢复秘密农会的工作。那时我和刘平章都只是要求进步的学生。回去后我在策源公社成立了一个贫农小组，旷光前在八都、垇头成立了一个小组，刘平章在五都成立了小组。黎育教大约六月以后回酃县到我家检查我的工作时，才正式介绍我入党。同时成立了三人的临时支部，他俩因暴露了党员身份，故推我为支书，以便搞革命活动。

毛主席的部队来到中村的时候，临时支部便派我去接头。

我们去接头的前一天，看见毛主席的部队经过袁树垇，打的旗上面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有斧头镰刀的标记，我们便认定是自己的队伍来了。我在去找毛主席部队接头的路上，正好遇上了毛主席的部队派下来找地方组织的人（此人的名字不知道）。这个人首先把我带到团部。这时毛主席住在叶家祠，团部设在朱家祠，团长是陈皓。到团部的路

上那个“长子”（把我带到团部的人个子很高，所以我叫他“长子”）和我谈了一些话。他问我：你知道毛主席在哪里吗？我说：我们只听说毛委员（知道毛委员是中央委员）在攸县搞农民运动。“长子”就说：我带你去。就把我带到了朱家祠。朱家祠有个天井，在天井的边上有一张四方桌子。他就向毛主席介绍了我是酃县人，是来接头的。毛主席简单地问了一下酃县的情况，我便向毛主席汇报了酃县的情况：我们现在党的组织只有一个临时支部。“马日事变”后，酃县的农会都倒了。县委书记李却非和委员、党员都逃跑了。我只找到了黎育教、旷光前，黎育教是从长沙读书回来的。那时酃县农协全部打光了，党掌握的武装，已经被敌人缴掉了，带队的坚强的共产党员朱子和被敌人杀掉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二、三人，我还是新党员。接着毛主席就指示我们：要放手发动工农群众，城市依靠工人，农村依靠贫、雇农；找那些满脚都是泥巴，满脚都是牛屎的人；要发展组织，建设支部，重新武装工农。同时，还分析了形势。毛主席是很乐观的，指出了革命力量虽然暂时由于机会主义的领导的恶果，被敌人打下去了，还有一段很艰苦的工作，要看到前途光明。总之，主要是要我们发动农民搞武装斗争，只要有了群众，才能搞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这是大体回忆的内容，具体的话就记不清了。毛主席问到酃县敌人的情况时，我就告诉他，南乡有一个挨户团，是陈大观的头子，有六、七条枪；东乡是贾少隶的头子（贾少隶在大革命时，我们农协到东乡进剿过他，但没有缴到他的枪，因为他在山区，很分散。大革命失败后，他便来缴了我们的枪），全县都是白色恐怖。毛主席再三强调要注意发动工农群众，在农村要找那些满脚都是泥巴，满脚都是牛屎的人。最后，毛主席要我画本酃县的地图给他。我只画了三分之一，便画不下去了。我便说：我去找个全县的旧地图来好吗？

主席回答说可以。我便同那个"长子"在附近的朱家祠小学找到了一张地图。当时我还不晓得是毛主席，在谈话中有人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毛润芝同志收"，那时我还不晓得主席叫毛润芝，只知道主席叫毛泽东。地图找到了后，那个"长子"便叫我去茶陵侦察敌情。

我回来后，便找我哥哥周策长（我伯伯的崽，雇农，我发展党员就是首先发展他，他经常在茶陵做挑脚，对茶陵很熟悉）。第二天我们一天就赶到了茶陵，天都黑了，一百多里路。到一个伙铺里一问，知道罗定带了一千多人进攻酃县，分两路，一路走西乡，一路由县城到水口。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快跑回来（一天就跑回水口），便告诉了那个带我去见毛主席的"长子"。当我们还没吃饭时，就听说部队要集合了，不准备打。第二、三天便走了。估计部队在水口只住了一个星期。

部队走了后，我们才发现是分两路，一路是经八都到下村，到大汾圩，由荆竹山到井冈山。我们派了一个同志给主席的部队带路，这人叫刘青黎，是他回来后告诉我的。另一路不知道是到八都还是什么地方，宛希先同志带了一个连的兵力走中村——船形——安仁——茶陵，去打罗定的后方。那时茶陵城没有大的部队了，一进城就缴了敌人六十来支枪，政治犯全部都放了，伪县长被抓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听到了。罗定一听我们的部队打进茶陵后，他就赶快回去了。但回到茶陵又扑了空。我们这一连部队打了茶陵后，马上经高陇上井冈山会师去了（这是时一九二七年十月份，打茶陵是毛主席亲自布置的）。第一次打茶陵可能是十一月，也是由酃县党组织派人去侦察的。

毛主席亲自带的那一路部队，在大汾打了一仗，是同肖家璧打的（这是刘青黎从部队回酃县后告诉我的）。那是晚上袭击。那时我们的部队人少枪多，大概是六百来人，七八百余支

枪。大约部队到大汾时，王佐派人去把部队接到大小五井的。在进五井之前部队到茅坪时，毛主席见了袁文才，袁文才汇报了情况。袁文才有六十支枪，王佐也有六十支枪。"马日事变"后，各地的枪都被敌人缴了，唯袁、王便上山去了。听说毛主席在茅坪接见了袁文才，这时毛主席就送了一百支枪给他。袁文才就欢天喜地。袁文才就说：如果你们发生困难，可以到我这里来，这里有粮食。主席那时还要到各地发动群众，了解情况，察看地形，没有来井冈山，后来才从荆竹山进井冈山的，还有一匹马死在荆竹山，我到了井冈山时，还看见了。老百姓告诉我，袁文才与王佐是结拜兄弟。袁文才住在茅坪、大垅一带，王佐住在五井、茨坪一带。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在水口圩时，听说毛主席就派人到了王佐那里。

刘寅生到酃县，是因为我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向毛主席汇报酃县组织情况之后，主席部队便写了一封信给湘南特委，把我的通讯处转告了湘南特委，特委便派刘寅生来找我。一见面才知道我的通讯处本来他很熟悉，我进党校学习，还是刘寅生介绍去的。

不久（一九二八年一月份），刘寅生便上井冈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但是没有见到，只给主席留了一个信。他从井冈山回来后，我们便成立了特区。

一九二八年春节后（大约二月份），那时候我们是穿棉衣，部队还在烤火。刘寅生、周里、周××三人上井冈山去见毛主席。在山下遇见何长工（何是王佐部队的党代表），他告诉我们，主席不在井冈山，到黄坳去了，我们便在井冈山请了一个老俵带路，在黄坳的城皇庙里见到了主席。当天晚上，由于没有被子，刘寅生同主席共睡一床，主席的床铺上有蚊帐，主席还问刘寅生是三师哪一班的。我也在主席的同房，和二位同志共铺睡。房间里共有三张床。

第二天，我们是在一个厅堂里汇报工作。里面有一个长桌子。我们汇报后，主席就讲了形势，并指示了工作，还派另一个同志（可能是何挺颖同志）和我们讲组织工作（在另一个房间里谈的）同时还批准我们成立特区，书记刘寅生，组织邝光前，宣传周里。谈完后，便给了我们一百元钱作工作费用。

回来后，我们就按着毛主席指示精神，把酃县划为东、南、西乡，准备搞全县暴动。一天，刘寅生带我去西乡检查工作，布置全县暴动。

毛主席一来，就指出了革命的正确方针、路线，纠正了以前的机会主义路线，促进工作迅速的大发展，革命形势大振。我们原计划在毛主席来中村之前搞全县暴动，以免土豪劣绅一听到部队来就会跑掉。我们一接到部队来信，就漏夜赶回来，重新布置暴动时间和计划。

毛主席率领部队到水口，在连队发展党员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份的事情。

一九二八年三月，部队到中村，我们暴动了，成立了酃县赤卫队，主席还发给了我们枪，派了戴齐来指导。我们上井冈山，都是向主席汇报。主席病了一段时期，工作就由宛希先代理。在中村召开联席会议时，毛主席到了会，但没有讲话，主持会议的是谁，我记不清了。酃县是刘寅生汇报的。主席这次也没有找我们谈话。

部队在中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

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赤卫队成立后，离开中村时，我们的赤卫队也跟着去了，主要说去锻炼一下，再回来。

主席在中村时，批准了我们由特区改为县委，县委还是那么几个人：刘寅生，邝光前，周里，可能还有刘承向等五人组成。黄元古是县委秘书长。

主席率领部队离开中村去湘南后，我们又秘密埋伏下来，

县委设在中村的茅坪，那儿的农民基础较好，后来又搬回到策源来了，继续组织农民暴动，搞游击队。我回到策源后，主席的部队不到一个月又回到了中村。这时酃县县委又向主席汇报了工作，是刘寅生、万达才去的。刘寅生是县委书记，万达才是县团委书记。刘寅生回来后，告诉我们，主席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要停止烧房，不能乱杀人，只能杀恶坝地主。那时湘南搞盲动主义脱离群众。这次主席公开地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主席回来又打了酃县，经十都、沔渡到井冈山，我们的赤卫队也跟着上井冈山了。

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县委四人：刘寅生、周里、刘平章、黄元吉回到五都，先住在张平化同志的一个亲戚家里，后来张平化同志被派到九都工作，我们便不能住在他的亲戚家里，便由林立卓介绍在一家贫农家里住。不久林立卓叛变革命，带敌人包围我们住地，刘寅生，刘平章同志牺牲了，我和黄元吉冲出来了，这样酃县县委被破坏了。

酃县县委被破坏的具体情况是：林立卓是一个新发展的党员，没有经过多大考验，敌人一威胁便叛变了。头一天晚上我们要他到水口去买硝作炸药，并且还要他买点菜。当天下午他送来了，并买了几个鸡蛋。到晚上他突然送来一只鸡，说怕我们没菜吃，来时手发抖，上气不接下气，精神很紧张。当时我们问他为什么喘气不来？他说没有什么。这时我们便有了怀疑，因为我们并没有要他买鸡，他突然送鸡来了，并且精神又很紧张。当时我便同刘平章想偷偷地跟随他，准备到他家里打听个底细。那天晚上下大雨，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住地离林立卓家有一、二里远。我们跟随他到半路，一路我们讨论，林立卓家有一只很凶恶的狗，外人是不能近他家的，平时我们去必须很远就打招呼，要他家里将狗看好。我们怕把事搞坏，便半路回来了。现在看来，就是到了他家也是打听不出什么消

息，因为敌人早有准备，一定很隐蔽。那天半夜我们就被包围了，当我们睡到半夜时，突然听到狗叫，我们起来听了一下，认为没有什么，我们便鞋也未脱，和衣睡下。天刚蒙蒙亮，我们起来洗菜，便看见两个枪兵，那两个枪兵便叫："抓住！抓住！"敌人是不敢冲进屋内抓人，因为叛徒林立卓告诉敌人说我们有炸弹，所以围了一夜不敢进屋。敌人一共来了三十余人，一个排的兵力，因为叛徒告诉了敌人我们只有四个人。这时我们四人便紧张起来，打开前门一看，便看见两个枪兵，这时刘寅生还说："别怕，敌人是吓唬人的，冲过去了就好了。"但当黄元吉打开后门一看又有枪兵，我们便知道自己被包围了。我便叫："冲！冲出去！"我和刘平章，黄元吉三人从前门冲出去，黄元吉冲第一个，我冲第二个，刘平章冲第三个。刘平章出门不远便带花了。我提着个旅行小皮箱往外冲，四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拿了点东西。我和黄元吉是顺着田埂而走，当敌人追我们时，我便将小皮箱一丢，敌人便就去抢皮箱了，以为皮箱里有钱，实际上皮箱是一只空的。毛主席给我们一百元钱，我们并没有带在这里，只有黄元吉十元钱，也分给了我二块，因怕被冲散。我们两人便乘敌人抢皮箱之机逃出来了。刘寅生是从后门冲出来，他不是顺着田埂而走，结果被敌人打死了。我们酃县县委便就这样破坏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的县委是不应该设在五都，因为五都靠城镇近，是我们刚开辟的新的据点，群众工作基础并不那么好。当时酃县工作基础好的区域是策源、九都一带，农会基础好的地方是西乡。县委设在五都是受了湘南特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看来，五都是个中心，便于指挥，而不看主观和客观条件，不从形势来考虑，加上新发展的党员林立卓，是没有经过审查和斗争考验的人。从路线上看还是湘南特委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余影响的结果。这

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两人冲出来以后，便回到策源，这时游击队也回来了，我们是在路上碰到的，游击队便打掉了策源的挨户团，然后我们一起上了井冈山，在茅坪又重新成立了酃县县委。

在茅坪我们把酃县的游击队和干部集合起了一二百人左右，开了一个会，主席给我们作了政治报告（地址在茅坪主席办公地方的楼下），主席在报告中首先讲了形势，然后讲了任务和工作指示。我们就先向主席汇报了酃县县委被破坏的情况：刘寅生，刘平章二同志牺牲了，只有我们两人冲出来了，县委遭到了破坏。我提出要人，主席说你们要什么人呀？这里只有二个酃县干部，一是黎育教、二是李却非，我说现在我们没人，主席说二人都去。（李却非是“马日事变”后跑到长沙，又由省委介绍回县，由我送他到井冈山，后来他是特委委员，老资格）。主席作政治报告时，我在下面作记录。我们重新组织酃县县委：书记李却非，组织黎育教，我还是宣传，共三人。回来后又扩大了县委。

从此以后，我们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时酃县的赤卫队也同我们一起回酃县了，干部和部队一共一百多人。我们有计划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我们便以靠井冈山边区的青石岗、大院、西坑一带为基地向前发展，县委先设在青石岗；后迁到西坑。三区区委会设在大院，区域包括七都、八都，我任书记。县委下面有三个区，一区是青石岗、十都，区委书记可能是姚晓圆（此人以后在井冈山失守后自首了，自首后敌人将他关在监狱里，后来他冲狱，结果被敌人杀了）；二区是石州、九都、六都，区委书记可能是张平化同志。由于路线对了，我们不论群众运动，武装力量，都发展很快。

回忆两次打茶陵的情况

周　里

工农革命军打了两次茶陵。第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后经古城、茅坪大陇、十都到了水口，在水口住了一个礼拜左右。那时我是酃县临时党支部的书记，派我去找上级关系和汇报工作。我在樣树坳的一个同学家里住，看到有部队经过，打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知道是共产党的队伍。第二天我就跟着去。快到水口时，我在路上碰到部队里的一个政治工作人员，个子高高的，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学生，来部队找上级关系。他又问我：你知道毛泽东的部队在那里吗？我那时并不知道毛主席带部队到了这里，就说在醴陵、攸县搞农民运动。他听了后把我带进水口朱家祠，后来才知道朱家祠是团部，毛主席住在那里办公。高个子同志告诉毛主席说地方上的同志来找上级党的关系。毛主席叫我坐下，先问我关于酃县敌人的情况，又问了关于酃县党组织的情况。我把这些情况一一向主席汇报了。主席又要我画一个酃县的地图，我没有画成，就说我去找个旧的酃县地图，主席说可以。主席又对我说："回去要发动群众，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不要怕农民满脚是牛屎，多接近他们。"同时讲了要发展党员。

这时那个同志又来了，他要我去茶陵侦察情况。我有个堂兄叫周策长，给地主做长工，经常挑纸去茶陵。第二天，我要

他跟我去了。到了县城后，就看到有很多军队。我在一个铺子问别人这些部队到那里去，别人讲这些部队是罗定的，到酃县水口去剿“匪”呀。我听说这个情况后，赶快回酃县。在水口向那个同志汇报了情况。不久就听到吹号集合部队，我也回去了，部队往那里走不知道，以后才知道的。因为我们当时派了刘青黎（党员，后叛变了）给部队带路。听刘青黎回来讲：部队从八都到戴家铺，在大纷和地主反动武装打了一仗，毛主席带了部队从荆竹山上井冈山去了。张营长带了第三营到桂东去了。部队离开水口后还派了小部队去茶陵。大约三天后，就听说红军打到了茶陵县城，杀了狗县官，打开监狱放出了政治犯，缴了县衙门的武装。罗定的部队走了后，茶陵空虚了，等到罗定慌忙赶回，红军又撤出茶陵了。

部队离开水口后有两个连去打了茶陵，这是肯定的，但究竟在那里分兵去，就不那么清楚了。水口到中村有三十里，走八都也可以去，从中村的右面过去就是安仁，那次部队是经过安仁到茶陵的。

第一次和部队接上党组织关系的时候，我把我的通信处留了给部队，后来湘南特委派了刘寅生来找我，湖南省委也派了李却非来。是部队把通信处告诉了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接上了关系。

不久，我上井冈山汇报工作，在下井宛希先接待我。宛希先又要我去茶陵侦察情况。我又同堂兄周策长去了。在茶陵没有看到敌人的正规军队，第三天就赶回荆竹山，汇报了侦察的情况。马上就看到有部队集合了，我也走了。后来听说工农革命军有五个连去打了茶陵，在茶陵搞了四十多天。

袁文才、王佐被杀之前，特委来了个通知：要各县的地方武装开到永新县城去集中，准备攻打吉安。隔不久，又来了通知，通知酃县的地方武装不要去了，负责人去就行。我带了两

个同志到了永新县城，这时袁文才、王佐被杀掉一、两天了，是陈正人同志接待我的。他告诉我：袁、王靠不住，脱离领导，想当土匪，已给五军解决了，说完，还带我去看了尸体，看到的是王佐的尸体。陈正人同志说：王佐是在冬瓜潭里淹死的，袁文才是朱××打死的，五军头天晚上走了一个通夜，快天亮才到永新县城。王佐的警惕性很高，听到哨兵问到是五军的，心想五军不在，就下令开枪，带着排把子人冲出城门。朱××是永新县赤卫大队的大队长，又是特委常委，天不亮时带了三、四个人说有事找袁文才，袁文才还没有起床，就被打死在床上。袁、王死了后，他们的部队被缴了枪。

你们问到五分钱，我也讲不清，记得那时一块银元可抵十个银毫，一个银毫有十分，一分可能是抵一百文吧。

李却非原来当过酃县的县委书记，我就是接他的手。一九二九年井冈山失守后，在困难的时候，他带枪走了，先回到水口家里，后不知那里去了，报上也没有看到登他的消息。

关于鄠县革命斗争的情况

周　里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以前，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对鄠县党组织的情况不清楚。当时求学在第三师范，只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每当寒、暑假回到鄠县，与鄠县共产党人有些接触，如李树莽（李却非）是县委的负责人，戴寿凯（即戴齐在梅岗学校教书）。农民运动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向前发展时，鄠县的革命形势也很好，我只知道省里还派朱子和去领导农运，全县各地农民协会都组织起来了，还有一支农民自卫军有六十枝枪。农民运动的兴起，的确"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那时，鄠县反动集团头子最厉害的东乡贾少隶、贾少柳之流也无可奈何。朱子和经常率领农民自卫军去进攻反动武装。记得有次我回到县里，农民自卫军正攻打到十都一带，反动武装被打得头破血流到处逃窜，真是大长了工农群众的志气，大灭了豪绅阶级的威风。

由于我当时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在"马日事变"前，经共产党员刘寅生、黎育教同志介绍来到省党校学习。这个学校是国共合作时办的，校内的主办人是我们共产党人郭亮、夏曦同志。校长据说是个同情者林炳。"马日事变"时，反动军阀许克祥罪恶地突然袭击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把工会、农会的枪枝全部缴了。我们这党校也被取缔了，我被迫在第一师范黎育教那里住下（黎育教、刘平章从第三师范转到第

一师范，这时第一师范还没有被取缔），这时长沙城白色恐怖，心里非常气愤，但情况不明。黎育教是共产党员，知道的比较多，消息也灵通，我特去找他问情况，他说：“全省都出现白色恐怖，你还干不干？”我回答：“干！”黎说：“那你就回酃县去秘密恢复农民协会，做宣传组织工作，我到汉口去，暂不回酃县去。”我便和刘平章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回到酃县。回县后探听一下，党组织散了，农民自卫军的枪枝被敌人缴了，朱子和被敌人杀害了，熟悉的几个党员也跑了。我回到策源，恢复了一个贫雇农小组，现在还记得名字的有周策长（周是雇农牺牲了）、谢祥福（是贫农，牺牲了）、周日明、周策文、周策免、周策仙共七八个人。刘平章回到五都也恢复了一个小组，这时没有党员。

一九二七年六月底，黎育教回来了。他到策源检查我的工作，看到我搞了一些革命活动，恢复了贫雇农小组，就在这个时候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我家成立了一个支部。黎育教、邝光前、周里共三个人，并要我担任支部书记（因黎育教在长沙，衡阳等地工作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恐怕将来站不住脚，所以要我担任支部书记）。支部建立以后，我们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到西乡找到了段奉、段瑞（西乡原有几个党员）成立的支部。到九都找到了姚晓圆（是第三师范的进步同学），要他恢复那里的贫雇农小组。在这个期间没有得到上级党委的指示，不知怎样搞，只是秘密活动，深入发动贫苦农民，宣传党的主张，进行组织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旬或中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经湘赣边区来到水口（驻扎了一个星期），这支革命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支部派我到水口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在朱家祠接见了我，并指示：“要大胆地广泛地发动农民，组

织农民打倒豪绅，准备暴动，武装夺取政权。”这时，我们的中心活动放在策源地区，中村进步的青年学生周介甫、何国臣（黄浦学校毕业生，当时在团防总局任指导员，有几十条枪），听到毛主席这支革命队伍来了，也积极地找我联系，进步青年朱才亮也找革命关系。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准备武装暴动，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当时，要何国臣将团防总局的枪枝夺过来，我们主要是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准备武装群众搞游击暴动。

一九二八年元月湖南特委派刘寅生回到酃县负责领导工作（是湘赣特委通知湘南派的）。这时西乡有一个支部，段瑞负责；策源有一个支部，我负责；八都坳头有一个支部，邝光前负责。此外中村、茅坪、安坑（包括石洲）、五都等地也已建立支部，农民协会组织扩大到全县东、南、西乡。当时我和刘寅生到遂川的赤（车）坳农村里（毛主席部队驻扎地）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听了汇报后指出：酃县建立特别区委，属湘赣边界党委领导，刘寅生任特区区委书记，邝光前任组织委员，周里任宣传委员。特别区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党组织除注意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外，在成份上注意在斗争中发展贫雇农和工人为党员，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组织游击暴动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组织了全县武装暴动，我指挥十都、九都、策源一带；段瑞在西乡指挥；周介甫在中村指挥；邝远喧在茅坪指挥；朱才亮在水口指挥；邝光前在八都指挥；刘平章在五都指挥。就在全县武装暴动的时候，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分两路到了中村。各地的暴动队极大部分留在本乡外，还集中了共约二百多人（除西乡外）到了中村集合，成立县赤卫队。主力红军在中村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帮助地方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区域。毛主席亲自批准酃县县委，刘寅生为县委书记，邝光前为组织委员，周里为宣传委员，建立的地点是在

中村街上一个店里。县委建立后，在周南学校一个楼上开了一次军队、地方党联合会议。毛主席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四十多个，地方党只有刘寅生、萧寿凯、邝光前、周里等人。刘寅生向毛主席汇报了酃县的工作。这次会上毛主席没有讲话，当时我们不晓得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左"倾盲动路线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湖南。遂使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毛主席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离开中村，县赤卫队随主力军往湖南。反革命立即"清乡"，进行搜山，见人就杀，县委搬到茅坪大山上一个少数民族家里（邝远喧带去的）。为了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县委研究决定：我到八都坳头和策源地区；派周介甫留中村；段瑞留西乡；继续发动农民打倒土豪，组织武装游击斗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从湖南回到中村或龙渣，县委刘寅生、万达才向毛主席汇报情况。这时，毛主席彻底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并指出：从今以后，禁止烧屋，中、小地主分别对待，发动群众打倒豪绅、恶霸地主，烧屋是脱离群众的盲动行为，应该批判盲动主义路线，扭转盲动主义行为。县委跟毛主席到十都，召开了县委会议传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县赤卫队仍随红军主力去井冈山，县委继续开展本县的工作。从此县委机关搬到了五都刘平章工作的地区。县委委员未变，加上张平化、黄元吉、邝远喧、刘家相、周策长等工作人员。为了适应当时工作的开展，

决定张平化回九都工作，周策长、刘家相回策源地区工作。邝远喧去衡阳与湘南特委接头，中途被捕（在西乡被捕，后押到中村）英勇牺牲了。周策长在策源被敌人杀害。约五月中旬，林立卓叛变，带挨户团三十多人包围县委机关（此时县委机关在南岸离林立卓家半里远一个坑边的田埂上一栋茅屋子里），那时，四围白色恐怖，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大家都是一颗红心为革命，被敌人围了就冲，被抓就拚，捆住了手脚就咬，英勇刚强为革命。最可耻的是叛徒，我们被围的前几天托林立卓还到水口买了硫磺、白硝回来做炸弹，上午还送了一只鸡来，快睡觉了，又送来了一些鸡旦。我们虽产生过怀疑，但仍是麻痹，没有搬家（敌人知道我们做有炸弹），当天半夜敌人即包围了我们的县委机关，只听门外狗叫，没有叫门，我们起来从窗上听着，看着，没有看见人，大家便又未脱鞋睡在床上。刚天亮不久，敌人才大叫大喊："抓住！抓住！"黄元吉首先打开侧门一望，发觉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屋。我喊：冲！我和黄元吉首先突围冲出来。我刚爬上埂，刘平章冲出来，在门口被敌人子弹打中；刘寅生未出来，但敌人不敢进去，怕我们有炸弹（其实我们尚未做好炸弹）。便放火烧屋。刘寅生爬到墙上，被敌人一枪打中英勇牺牲了。这时全县白色恐怖，敌人到处带队搜山，捉共产党和革命工农群众。由于叛徒告密，周介甫在中村被捕，在水口被杀害。朱才亮也在水口被杀害。潘祖浩早在武装暴动后就逃到了茶陵。我和黄元吉、刘家相（黄、刘以后叛变）从五都脱险后回到黄挪潭的梨树州的下州，正准备上井冈山，那天县赤卫队来到黄挪潭，我们从下州赶到下坪，赤卫队已撤出黄挪潭，我们星夜赶到大院的桥头，赤卫队正在吃饭，我们就和他们一道上井冈山。到茅坪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毛主席指示说："可以派人重新组织县委。"并问我：黎育教、李却非二人谁回县委主持工作好？我要求两个都回

去加强酃县的领导工作，酃县县委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亲自派李却非回酃县任县委书记，黎育教任组织委员，周里任宣传委员兼三区区委书记。毛主席在茅坪还召开了酃县赤卫队和县委工作人员开大会，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并指示县委带领县赤卫队一齐回到酃县地区，坚持长期斗争，发展党，发展武装，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然后采取波浪式地扩大根据地的政策。县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具体布置，以大院、青石岗为中心地区。县委设在东坑，县以下成立三个区委会。第一区，姚晓圆为区委书记，以青石岗为工作中心向十都发展；第二区，张平化为区委书记，工作范围以九都、石洲为中心；第三区，周里兼任区委书记，以大院为中心向七都、八都发展工作。由于有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指引，此时酃县敌人虽然力量雄厚，"进剿"频繁，我们又是重新开辟根据地，力量薄弱，但革命武装，革命政权，群众割据地发展得很快。一九二八年五月酃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县主席徐鼎燕兼三区工农兵政府主席，秘书何国政，以后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是黄帮信。县以下成立三个区，区政府下面是乡政府，主要靠武装割据。每乡成立了暴动队，每区成立了赤卫队（有枪），县成立赤卫队并发展很快，何国成任县赤卫队大队长。这年秋县赤卫队有枪九十枝，二百多人，枪枝大部分是主力红军发给的，少部分是单独行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赤卫队建立了政治工作，武器仍然不好，但英勇善战，到处打击挨户团，迫使酃、遂边区的挨户团反动武装无处藏身。我们酃县的革命形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正飞跃向前发展。

毛主席离开井冈山去瑞金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敌人打进了井冈山，边界各县都被反动派占领了。县委机关和一、二区都垮了，三区剩下石禾堂、走马洲、上洞一带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何国臣率领赤卫队不请示县委，自由行动，自作主张，

号召有些动摇的人可以自动回家；在大院牛屎坪把枪枝放进二副棺材里埋起来。部队在八都与反动派打了一仗，何国臣负了伤，回家后偷偷送到桂东养伤去了，部队远离根据地跑到塘田，被反动派包围全部缴械。只有一个姓胡的班长跑回策源。全县的武装力量就只有三区剩下八枝好枪、十枝坏枪。

一九二九年一月，黎育教个人从八都来到了石禾坪。他说李却非逃了。黎育教主持在石禾堂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重新建立县委（县委机关先后设在石禾坪、走马洲），推选周里为书记，黎育教为组织委员，张平化为宣传委员，邝光前为游击队长，郭天禄为团县委书记。张平化兼二区区委书记，黎育教兼三区区委书记，其余干部大都消极回家不干了。我们的交通员也消极不干，回家作田了，但不叛变，有情况还送个信。反动派骗他们去自首，一面说要召集消极回家里的人开个大会，一面又派兵准备抓他们。发现敌人的诡计后，少部分人又上山去革命了。反动派见此计不行又生一计，骗他们到县里去搞一个自首证，结果去一个关一个，走到半路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就不敢再去了。关在牢里的后来有冲监牢出来了的，如刘家相等人，原区委书记姚晓圆被骗到县里杀害了。周道隆、周策畅等十余人都是在投敌自首后被杀害的。这些动摇分子，在反动派的引诱下，自首变节了。还有一批动摇回家不干了。基本群众坚持革命斗争，无限热爱党，忠实于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信革命胜利。半年后，县委、区委、支部、县赤卫队都恢复发展了。一九二九年秋天，县工农兵政府也重新建立起来了。革命根据地比以前更扩大了，东乡伸到坂添河渡，南乡伸到七都的长望、八都的下村，东边还发展到遂川境内。一九三〇年秋，县委机关，县工农兵政府搬到石州，这时我病了，张平化任县委书记。这时县赤卫队改编为独立营，有三百多人，十都、泥湖、坂添都是我们的红色区域。这时策源为三

区，九都为二区，十都为一区，区乡都有赤卫队。

一九三三年左右建立酃遂中心县委，陈山为书记，我是委员，管辖酃县、遂川两个县委，军事上设两个分区，李宗宝任司令，政委是中心县委书记兼，酃县、遂川各一个营，原酃县九营编入湘赣独立第四团，重新建立新九营。湘赣省除主力军还有六个独立团，第四团是酃县、遂川合并起来的。三三年冬除二个独立营外，还成立一个酃、遂游击队，周里任指挥并兼政委，任务是开辟新苏区。开始十几根枪，后来发展到二十八根枪，最后开辟了一个新区即荆竹山。一九三四年长征后，第四团扩大了，不属二分区管，属湘赣省委和湘粤赣边界特委双重领导指挥。地方重新组织湘粤赣边界特委，设在桂东，书记是陈山。中心县委书记周里兼独立营政委。

大约是一九三四年冬，遂川县委投敌叛变，独立营全部垮光，酃县县政府，区、乡政府大都垮了，只剩下独立营大约三、四十人。红色政权已垮，成为游击区了。这时反动派出兵占领各县区、乡，实行碉堡政策，步步为营（五次围剿），大院、石洲、南流、青石岗、良桥、斗坪湖都是碉堡，苏区无人烟，群众被迫併在碉堡里，把我们与群众隔开，并经常有一个营的反动部队到处追踪。这时我们在苏区见不到群众，找不到饭吃，只有深入敌后百把里打游击，创造新的游击区和搞粮食。一九三五年十月左右，张通冒称特委指示，要酃县独立营护送他到茶、永边界去找省委。于是我率领独立营送他到茶陵边界十八团的地方，他仍坚持请求要六十人枪一直把他送到湘赣省委。我便派六十人给他。我带了一个班回酃县。十一月份接到湘、赣、粤特委的决定，把酃县县委工作人员和全部武装转移到桂东地区。此时，独立营去湘赣省委尚未回来。我便将酃县所有后方人员编成一个排四十人左右，十一月离开酃县两天就到了桂东东边山，找到特委。特委分配我担任政治部主任、特委

委员。此后酃县就成了白区，没有党的组织和武装部队了。后来只有一个姓孟的学生党员由外回酃县恢复革命活动，但没有建党，具体情况不明。

事实证明，凡是发展了苏区，扩大了队伍，发展了革命势力，都是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凡是革命遭到失败都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井冈山的斗争，曾一度经"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烧、杀影响很坏，特别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致使红色区域损失很大。酃、遂全部退出，给后来开展白区工作、扩大红色区域带来很大困难。一九三六年，我被派到广东坪石、湖南耒阳领导发展游击武装和建党等工作。我们回忆毛主席是如何领导我们搞革命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是如何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提高了路线觉悟，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一些"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群众的拥护，红色区域就不断的扩大，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到一九三八年初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在桂东扩大为一个团，在坪石、耒阳扩大到一个营。

湘南农军及龙源口战斗

孙 鹤 一

一九二七年，党在湘南发动了年关暴动，我受郴州县苏维埃政府的委派，在八区第四十六乡组织农协，担任执行委员。同年三月，湘南特委发展了一批农协的骨干分子，加入党组织，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湖南省伪政府的主席是唐生智。唐是一个大军阀，国民党第七军军长。农民协会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只搞了几个月，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农会被反动势力摧垮了，但农会的骨干分子还在秘密活动。

“马日事变”前，许克祥的军队驻在乐昌的坪石。唐生智发了密电要他带军队向湖南出动，镇压革命。许克祥在白石渡屠杀了不少革命群众，一直杀到宜章、郴州。在郴州配合地主豪绅组织“铲共团”，屠杀共产党人。这时我还在郴州，有一天开会回来，在街上被“铲共团”抓住了。“铲共团”还在密岭的潭池水抓了四个姓李的农民，把我们一起解到青山头一个姓首的大劣绅家里，残酷地杀害了这四个农民。我因有个表姐与村庄上的一个地主有关系，由她出保，罚我一百二十六大洋，家里卖尽了东西，凑齐了钱把我买回。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出来后也不能在家里站脚，就躲在一个亲戚家里，从五月躲到八月。不久，南昌起义的部队由朱德同志率领南下广东，在攻打梅县时碰到余汉谋的部队，战斗失利后撤到湘南，配合湘南农民举行了年关暴动。我看到自己的队伍回来了，就回到第八区恢复了第四十六乡农协，还担任了赤卫队的队长。

反动派见革命蓬勃发展，异常害怕，忙调集了大量的军队来进攻。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湘南暴动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湘南特委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避免损失，号召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同时不少人在家里怕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就跟着"八一"起义部分部队上了井冈山。我和第四十六乡赤卫队的十几个人也跟着一起走。当时人很多，少年儿童团、妇女协会和老年人都有，拖男带女，就象刘备退出荆州一样。湘南几个县的农军大部分上了井冈山，留下的是一些还没有暴露出来的人，湘南特委也还在。

我们走到资兴，听说毛泽东委员也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来了，但没有看到毛委员。从资兴经过彭公庙、中村后到了酃县。毛委员的队伍也在，打着有犁头的红旗。朱老总部队的红旗就是一块红布。酃县住下后，吴尚的第八军打来了，我们在县城附近与敌人打了一仗，我们退到宁冈，开始住在砻市。听说有永新、遂川等几县的挨户团准备集中打我们，又转移到茅坪、大陇一带。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在砻市正式编队，成立红四军，当时叫工农革命军。因为国民党的是国民革命军、共产党的就叫工农革命军。过了几个月后，听说苏联派了代表到井冈山，要工农革命军改为工农红军。

当时湘南的农军来了有两万多，来的时候，为了便于行军，把所有的赤卫队都编成了团，有的百把个人也是一个团。邓允庭是负责的。砻市编队时共有六个团。毛主席带来的部队是三十一团。"八一"起义的部分部队是二十八团。边界的地方武装是三十二团，其他团是湘南农军编成的。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个团我当时没有看到，可能只有空架子，也就是只有番号。红四军有两只老虎：二十八团是铁老虎，勇敢冲锋；三十一团打仗沉着，不慌不忙。

我开始在二十九团，团长先是邓允庭，后是胡少海。不

久，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要一个党员去搞油印，把我调去了。特委的委员我记不清了，记得唐天际是在特委，他经常拿稿子要我抄写，我没有读过多少书，认不得几个字，写的不太好，邓乾元还教了我。特委办公主要在茅坪，茨坪也办过。我还在李筱甫家里搞过一个多星期。

在特委不到一个月，我调到了三十二团。为了扩充三十二团，当时从湘南农军中抽调了一、两百人到三十二团。记得去的时候，还在党小组会议上介绍说：袁文才是个好干部，又是本地人，是陆军保定大学的学生，政治、军事都有两下。何长工也讲过，说我们湘南农军要去求知识，向他们学习。我到三十二团是在第一连一排三班，连长是徐彦刚，党代表是房灿，一排长陈伯钧，二排长何寅飞，三排长许万壁，全连有两百多人，两个排有枪，一个排是梭镖。三十二团设有营，袁文才当时有四个连。我去的时候，三十二团早已有党支部了，我和何寅飞、李才佳都是一个地方人，同在一个小组。

王佐是副团长兼营长。他原来没有当过正规兵，有一次部队行军他喊口令，叫第一路走前卫，第二路走中卫，第三路走后卫，有些人笑了他。

第二次打开永新后，红军分了兵，后来敌人进攻根据地，红军撤出永新，部队撤到龙源口吃饭时，我送信到军部，听到朱老总对徐彦刚讲，你们这个连要到老七溪岭那边去警戒。徐彦刚回来后赶快叫我们吃完了饭，带着全连打跑步快行军，走了一个半小时，到了老七溪岭侧面的一个山后面。在龙源口，二十八、二十九团走老七溪岭，三十一团走新七溪岭回宁冈去了。

大约几天后，龙源口战斗打响了，我们连还是由徐彦刚带领埋伏在老七溪岭侧面的一个山上，那里有一个象庙一样的房子，山下有一个不小的村子，这时永新赤卫队也来了七、八十个同志，我们第一连有两百多人。徐连长说：下面这个村子很重

要，我们一定要拿下。这时老七溪岭早已枪声密集了，我们也打响了，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垮下去了，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使我们无后顾之忧，取得了新、老七溪岭战斗的胜利。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团乘胜追击到永新县城。我们连当天返回宁冈，在古城休整。在古城时，邓乾元也在，唐天际也来了。

龙源口战斗中，毛主席在哪里指挥我不知道。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是有，开始是叫苏维埃政府。边界政府成立后，主要是抓赤卫队、农民协会、妇女界联合委员会等群众工作。组织机构记不清了。

"八月失败"时三十二团没有去湘南，留在井冈山，主要是保护农民秋收。那时的禾正当割了，我们在睦村和敌人打了一仗。那时为了稳定情绪，还说了向成杰是朱老总的外甥，快要起义到红军了。

记得井冈山时期，部队没有帽徽，就是一个布帽，叫荷叶帽。领章是改为八路军的时候才有的，衣服也不统一，直到打了福建漳州后，才发了衣帽鞋子，变得整齐了。

红军公卖处是军队办的，茨坪在那时有一个。

一九二九年井冈山失守后，彭德怀带了七百八十三根枪退到于都。前敌委员会指示他带部队回井冈山，个把月后，他回来了，红五军编为五个纵队：一纵司令黄公略（留在平江一带），二纵司令贺国忠，三纵司令郭炳生，四纵司令李实行，五纵司令李灿、政委何长工。五纵是永新、宁冈、莲花、遂川几县的地方武装合编的，可以单独行动。

黄洋界保卫战，我们第一连参加了。当时没有埋竹钉。竹钉是一九二八年冬末守黄洋界时，天下了雪，我们的脚都冻肿了，李灿司令员的脚猛被树蔸碰了，疼痛得很，他想如果用竹片削成钉，埋在路上，可不是很好吗。这样就发动群众到处埋竹钉。有次敌人夜晚来摸哨，被竹钉戳伤了，吓得再也不敢来了。

回答有关茶陵的几个问题

熊　寿　棋

一、关于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1.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打下茶陵后，我在第一团第一连当战士。只听说毛主席来信指示要建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但未见过毛主席的指示信。

2. 茶陵县委的地点我不知道。

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毛主席来茶陵县境接军回山的问题

1. 这事我写过几次材料。第一次我说是在湖口，后来我查地图见湖口离茶陵县城很远，我又怀疑起来，不能肯定了。因为时间久了，当时未注意记地名，只记得我军是中午左右从茶陵县城撤退，沿河而上，到达离茶陵县城四十里〈这我记得较清〉的地方，天还未黑。一到，毛主席亲自迎上来慰问我们。并和伤病员握手，我当时负伤，毛主席就和我握手，慰问我。所以我至今还记得清。毛主席亲自带了袁文才部第一连来接我们，在这里碰上的，这地点，形状我还记得清，只是忘记它的名字，这里我可画个图供参考。我所记得的情况大致为上图。这地点一、离茶陵县城四十里；二、它在两河之间，河边有一广场；三、当晚开会就在面向广场的那一排房子之

内。名为街房，实际上房子不多，不象一个大市镇，我的印象它只是一个小集市，无大街，主要就是广场边那排房子。如果湖口与此情况相同，就是湖口，如与此情况不符，那就不是湖口了。

2.当晚干部会议情况：

当晚开会我记得毛主席是以“前委”扩大会的形式召开的。有团长、营长、连长和连、营党代表参加，又有一些士兵党员参加。当时，我是士兵党员又是“前委”的委员，所以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我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毛主席照以前给我们的指示那样，指出我军应该回宁冈，到井冈山根据地去休整，以后再乘敌虚，伺机击敌。团长陈皓主张把我军全部开赴湖南各县去，到处游击。毛主席认为离开根据地，到群众还未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湖南去是冒险，是流寇主义。当晚除一营营长（忘记其名）一个人赞成陈的意见外，全体干部和士兵党员都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决定回砻市。

3.第二天，天未亮我军便动身向宁冈砻市方向前进了。毛主席在部队出发前是否向全体官兵讲过话，我记不清了。如果讲了，那就是在河边广场上，因为我们是在广场上集合的。因为我们出发时间是在天明以前。时间久了，我记不起了。我因负伤曾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慰问，所以记得河边广场。又因当晚同陈皓争论关系我军的历史和发展壮大，我在会上以士兵党员代表的资格曾积极拥护过毛主席，反对过陈皓，所以我记得开会的主要情况。其它情况，时间久了记不起来。

八 月 失 败

杜 修 经

一、一九二八年六月井冈山形势

湘赣边境的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连江西的宁冈、遂川、永新、莲花、湖南的酃县，周围五百余里，山势复杂险峻，军事上易守难攻。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主席领导湖南农民秋收暴动后，集合平、浏、醴一带的武装农民、安源工人、原国民政府警卫团武装，进入井冈山地区，创建红军，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创造了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后经广东东江失败而保存下来的部队，进驻湘南的宜章，举起了工农红军的旗帜，配合湘南特委领导了湘南暴动，声势浩大。此时，湘南特委也要毛主席率领的部队去参加了。四月，湘南失败，毛主席、朱德在宁冈砻市会师，红军得到了壮大，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有朱德同志率领的二十八团，湘南宜章一带农民武装的二十九团，毛主席率领的武装三十一团和原井冈山的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所部的三十二团，共约五千余人。毛主席为军的党代表，朱德同志为军长，陈毅同志为军委书记，武备比较齐全，战斗力强。

井冈山边区，有了这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群众的发动越普遍，土地改革愈深入，各级人民武装越壮大，工农民主政权愈巩固，对周围地区影响很大，根据地得以迅速扩大。

一九二八年五、六月前一个时期，井冈山区与湖南省委及中央中断了联系。六月，我到井冈山，接通了边区与湖南省委的联系。

边区根据地的建立，是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真是“三天一小战，十天一大战”。湘赣两省的敌军，除地方武装外，经常有十来个团围着攻打。由于毛主席和边区党的路线正确，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力量，大小战斗，总以胜利而告结束。敌人对与红军作战的印象是：“如临大敌，如打大战”。

我来井冈山几天之后，敌人又突增六个团，企图大举进攻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回湖南省委，向省委作了汇报，汇报内容，着重于简单的军事形势。至于边区党的路线，党群工作的基础，对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由于没有认识，几乎没有提到，因而造成省委粗率的决定，要红军“杀出一条血路，到湘南去。”并要我带着这个决定重去井冈山。

二、永新会议

一九二八年六月，我带着省委的决定，同省委派赴边区的书记杨开明同志一路，进入莲花时，听到我军在江西打了个大胜仗。进莲花城时，我红军二十九团已入莲花，在那里我看到了二十九团的党代表龚楚、团长胡少海等，才比较详细地了解到六月二十三日，我军在永新龙源口同江西的王均等部两个师激战，击溃了敌人，进占了永新，接着二十九团又攻占了莲花。当时，红军战士兴致勃勃地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指江西敌师长杨池生、杨如轩）。”他们告诉我，毛

主席、朱德同志都在永新，所以我就同杨开明分手，他去宁冈，我去永新。

我到永新县城是六月三十日，已是天黑了，交通带我到毛主席的驻地，他们正在一间楼上开会。毛主席、朱德、陈毅等同志都在，这个会就是军委、边区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

白天，我在去永新的路上，考虑到省委的决定，是根据我谈的情况作出的，现在的情形，由于龙源口的大捷，已有很大的变化，省委的决定是不适宜的。我的这个思想活动和认识，也仅从一时的战争形势看问题，没有提高到路线觉悟。

会议上，毛主席见我到达，忙起来迎上，说："你来了，好。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当时，我真不知怎么说好。坐下后，继续开会。在会议上，我首先表明了省委决定的不适宜，然后传达了省委的决定。毛主席听了，面色顿时沉闷，但仍继续主持会议。对于省委的决定，由于我的表态，会议上没有发生争论，只就省委决定不适宜处作了讨论，并通过了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议。此外，还着重讨论了在一个星期内，如何加速永新全境的基层政权建立、土改、农民武装建成及筹款等。

会后，即全力进行工作，部队成立了工作队。我也下到东南边的乡下，视察下面的工作。

三、湘赣边境的会议

在我们全力经营永新的时候，湖南的敌人吴尚所部，乘虚进入了我们的宁冈。毛主席在永新，通知我们回县城开会，部队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上决定回击宁冈之敌。当我们进击宁冈的那天，敌人已仓皇地向永新走了，没有打着。我主力即向西攻占了湖南酃县。

本来，当时是计划继续打茶陵的。主力从酃县折回到湘赣

边境时，那是七月中旬。一个晚上，军委为了近日部队行军纪律松弛，召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朱德、陈毅、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议。这时，主要是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思想影响，对当时敌情并不清楚，也没有考虑边区毛主席、党的路线的正确，群众基础好，足以与敌周旋的有利条件，即冒然决定主力去湘南，并谓"围魏可以救赵"。就是说，我们主力去湘南，敌人主力也会紧迫我们，从而会减少边区的压力。这些错误的认识，于我也有一定的影响，反认为去湘南，还是有利的。因此，在会议上，我并没有坚持永新会议的精神，反对走湘南。对二十九团的欲回家乡的情绪，不知是政治动摇，是逃避斗争。只觉得这个决定，没有毛主席参加，应征求他的意见。我要部队推迟一天行动，让我去特委找毛主席，商议后再行动。次日，我到特委，毛主席恰好这天上午到永新去了，仅见到特委书记杨开明同志。开明同志听到我说明的情况，他也没有作慎重周密的考虑，只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我当即赶回部队，决定去湘南。

在我离开部队的那天白天，我部曾击退北来两团之敌。次日，是七月十七日，大队就向湘南出发了。

行军了两天，第三天上午，在行军路上，接到毛主席派人送来给我和朱德、陈毅同志的信，长达三页，要求主力回边区。那时，朱德同志说："等今天宿营了再商量。"宿营后，决定停留一天，研究去湘南和回边区的问题。当天，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朱德、陈毅、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也都参加了。会前，他们曾打开军用地图同我研究与井冈山的距离，看是否可以急回井冈，记得也是龚楚说，看来离井冈山近，因大山阻隔，实在很远。由于没有正确路线的指引，所以仍然只觉得回边区已不能解边区之围，不如急打郴州，这次会

是我主持的，重申了决定打郴州。

四、攻打郴州

七月二十四日晨，我们兵临郴州，攻击令已下，问得驻郴州之敌是范石生，朱德同志就犹豫了，因为朱德离粤来湘起义时，是从韶关范石生军中出来的。范曾对朱德同志说："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这时候，我根本没有具备对敌的战略思想，就说："已打响了　就打吧。"部队遂于上午九时攻入郴州，敌人仓皇完整北撤，与我胶着于北郊山下。

下午，四时左右，我与朱德同志在二十八团前线视察时，王尔琢同志说明了以上情况，我与朱德同志决定调二十九团参加战斗，先摧毁北撤之敌，后回击宜章南来之敌，再撤离城外，开始工作。

晚九点左右，敌人先向我反扑，我即撤离郴州，令集合资兴旧县待命。次日早，部队集合时，二十八团无大损失，二十九团各营已各自行动，分别向南去宜章，仅剩下团部团党代表龚楚、团长胡少海等百余人。

五、郴州失败之后

郴州失败，二十九团的离去，是分兵去湘南的一大打击。部队经过初步整理，即派出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所部并机炮一个连为前卫，向罗霄山脉靠近，扫清背后之敌，其余部队即由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负责就地整训，同时，开始开展地方工作。

二营出发多日，不见回报，正惦念间，接袁来信，要求我

杀掉朱德、陈毅同志，这才知道他已叛逃，当即与朱德、陈毅同志商量，决定去追击。追到桂东沙田，二营所部各步兵连党代表率部归来，仅机炮连以行动不便还被叛徒裹胁住，我们当即令其在沙田休整，与此同时，我们又令××所部攻打桂东，其余也留沙田，开展地方工作。

八月十八日，一营打下了桂东。八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带三十一团一个营来找主力，在桂东会合了。我和朱德、陈毅同志闻讯后，即由沙田前去与毛主席重会于桂东县城。

六、桂东会议

我到桂东城，已是天晚。当即到毛主席驻地，见到毛主席，我说："这次到湘南，就没有搞得好！"毛主席说："当时你们要不走就好了。"嗣后，他又检出林仲丹同志在我们走后给他的信给我看，我记得主要是当时的敌情分析及对部队行动的意见。第二天，主席和朱德、陈毅同志和我开会，由主席主持，各就分兵后的失败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我自己主动地对这次失败表示承担责任。会议开了一天，第二天正进入研究以后行动的问题时，敌人忽向我发动猛烈进攻，会议遂中止。战斗到晚，我们宿营在桂东城南面的道左一个村庄内，晚间继续开了一个会。这次会议，仍由主席主持，参加的仅朱德、陈毅、龚楚和我，决定红军主力随毛主席返回井冈山，由我组织湘南特委，进入资兴县的龙溪，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的工作。

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随之兴起。

一九二七年九月，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大半年时

间，在湘赣边区，建立了红军，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创建了根据地井冈山。正当在他那正确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八月失败”，使年青的红军损失一半，边区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罪行，是非常严重的！五十一年后的今天，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内疚之深，寝食不安！

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

李　奇　中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这一划时代的革命行动，在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已有许多论述。八一以前的革命形势和在南昌的暴动经过情形也有许多叙述，本文不再重复。本文仅就南昌暴动到井冈山会师这一段经过情形，凭我个人记忆所得的一些事情简略叙述，给编写革命历史汇集材料时提供一点补充参考资料。

第一部　南昌暴动到潮汕失败

一、起义军的编成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部分革命军队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夜晚举行暴动，将驻防在南昌城郊和南浔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全部解决之后，到次日即八月一日完全控制了这一带地区，取得了起义的胜利。这就是当时威震世界的南昌暴动。八月一日这个日子就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节日，成为人民革命军队的建军节日。

起义取得胜利后，立即在南昌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工作。例如：

（一）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参加起义

运动的各方人士集议，推举谭平山、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李立三、贺龙、叶挺、朱德等二十多人为委员，组成革命委员会，作为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中分设若干工作委员会和参谋团。参谋团由周恩来同志主持，行使军事指挥权。

（二）成立总指挥部。由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副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

（三）编组革命军队。暂时编成三个军，番号为第九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各军编组情形如下：

第九军，军长韦杵，副军长朱德。这个军没有部队，暂时是空番号，预计由朱德副军长到赣南和赣粤边境地区收编队伍，陆续编成。

第十一军，军长叶挺。这个军是由蔡廷锴的第十师，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叶升军长后，由团长董仲明升任师长），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逃跑后，由团长周士第升任师长）等三个师编成。这个军的政治力量很强，除蔡廷锴师以外，军长以下各级军官多数是共产党员。

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这个军是由贺龙的第二十五师五个团扩充为两个师，另外增加一个新编师编成。师的番号称为第一、二、三师，一师师长贺锦斋，二师师长陈光远，三师师长周逸群（军政治部主任兼任）。第三师由第六团、教导团编成。第六团是在湖北黄石港、石灰窑招收新兵编成的。教导团是由武汉警察总队中的军官教育队，毛泽东委员在武昌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班一部分学员，贺龙部队原有的军官教导队等三个部分并编而成。这个军的政治力量，第一、二两师以贺龙为中心，各级军官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只要贺龙革命，全体官兵都有可能跟着革命。第三师各级军官和政工人员都是共产党员，例如师长周逸群、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师参谋处、经理处袁策

夷（后改名仲贤）、郭德昭、团长傅维钰、副团长李奇中、营长陈赓等等。

这三个军编成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直接掌握具有完整体系的革命军队。这支革命队伍从南昌南下入粤以后，经过许多艰苦和曲折的战斗和斗争，队伍越耗越少，最后只剩下千把人。这千把人，人数虽少，但革命意志很坚强，在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同志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湘南暴动、土地革命，发展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从湘南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的队伍会师后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工农红军第四军是后来整个红军队伍中的主力军，由红军又发展为现在强大无比的人民解放军。因此，从发展的历史上说，南昌起义军是中国革命军队的种子。

二、起义军南下

南昌暴动胜利后，最初提出的政治口号是在广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三次北伐（按：第一次北伐是指一九二六年从广东出师打吴佩孚、孙传芳军阀，第二次北伐是指一九二七年武汉革命政府出师河南打张作霖军阀）。在这个口号的指导下，革命委员会作出以下决定：

起义军迅速占据广东潮梅和潮汕地区，站稳地步。利用汕头港埠取得武器装备的接济（据说，事先与苏联约定，起义军到达汕头后，立即从海参威运给六万人所需全套装备，并陆续运给），扩大军队。组织革命政府，先行统一广东，然后举行第三次北伐。

基于上述决定，起义军从八月三日起开始撤出南昌向广东前进，到八月六日全部南下。南下部署，原是派蔡廷锴师为先头部队。不料蔡廷锴并非真心参加革命，他率领第十师全部于八月三日离开南昌后，中途变卦，不是向广东前进，改向福建

逃跑了。因此，起义军只好重新规定行军部署，以贺龙部为前卫，叶挺部殿后。这支崭新的革命大军，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沿着抚州大道向广东挺进。

原定行军计划，是到达瑞金后向东入闽，经长汀向南入粤，迅速占领潮汕地区。八月下旬初，进抵瑞金以北的壬田市附近时发现敌情。前卫贺部第一师击退了当面之敌，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顺利地到达瑞金。从在壬田所俘敌军的口供中获悉壬田之敌，是钱大钧由会昌派出的前进部队，钱大钧部约两师以上的兵力集合于会昌城郊。鉴于会昌位于瑞金的右后侧，会昌之敌给予我入闽入粤的威胁甚大。为了保证行军安全，必须肃清会昌之敌，免除后顾之忧。因此，参谋团改变了原定计划，决定先肃清会昌之敌再折返瑞金照原定计划经闽入粤。

会昌之战于八月底开始部署，九月一日发起攻击，当天近晚，击败了会昌之敌，完全占领了会昌城。在攻击过程中，贺部主力（第一、二两师）作总预备队，仅派出第三师为左翼攻击队，归朱德同志指挥，叶部全部为右翼攻击队，由叶挺亲自指挥。这一战役，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我方以贺部第三师伤亡特别重，师部的两个处长郭德昭、蒋作舟阵亡，师部参谋处袁仲贤（原名策夷），教导团团长侯镜如、第六团第二营营长陈赓等许多干部重伤；士兵伤亡三分之一以上。

会昌战役结束后，仅留第二十五师在会昌城处理战俘，处理伤员等事宜。处理完毕后，向主力部队集结。

主力部队撤出会昌地区折返瑞金，在瑞金休息两天，向东入闽再向南入粤。

三、起义军占领潮汕地区

起义大军从会昌撤出折返瑞金略事休整后东进入闽，于九月上旬到达长汀。长汀的民众对我军很表欢迎，市区有一所医

院，很周到地治疗我军伤员病员，这是一值得纪念的事。

从长汀南下入粤，经大浦、三河坝进抵陷隍时，遭到薛岳部的抗拒，我前卫部队贺部第三师教导团排除了敌人的抗拒，薛岳本人几乎被我追击部队俘获。起义大军通过陷隍后，于九月二十日进据潮州，随即占领了潮汕地区。兵力配置如下：

后卫第二十五师留置三河坝，归朱德副军长指挥，担任该方面的警戒，尽力保持三河坝与潮汕之间的联络。

贺部第一、第二两师驻碣阳西南之炮台市附近，第三师驻潮州，派出第六团担任汕头市的警备任务。

叶部第二十四师驻潮州西北的汤坑附近。

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进驻汕头市。

革命委员会于九月二十一日进驻汕头市，举行会议，作出重要决定，主要事项有：

（一）组织革命政府筹备处，准备成立革命政府；

（二）扩充革命军队，迅速开始行动，成立新兵团；

（三）在潮州开办军官学校，先行利用贺部第三师教导团做基干，编为学员，学生队，新生入伍时分派为各级教育干部；

（四）财政委员迅速筹措经费；

（五）开展民众工作。

此外，尽量设法同驻在广州的张发奎建立合作关系，加速完成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这项工作先通过张发奎的政治部主任江董琴进行联系。

四、起义军失败经过

起义军暂时利用汕头市作为革命大本营所在地，大力推行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迅速求其实现。但是反动势力是不会容许革命势力顺利发展的，这时蒋系、桂系、粤系各派军阀暂时合力对付起义军，从几个方面威胁潮汕地区，形势异常紧迫。同

时起义军的应变工作又做得较差，所以革命委员会的决议无法在潮汕实现。

根据情报，九月二十五日汤坑方面发现敌情。薛岳、陈济棠两部约两个师协力向潮州进迫；桂系军阀黄绍竑部约两师之众从粤北沿粤赣边境进抵梅县后，间道窜到留隍，截断三河坝与潮州的通道并急向潮州迫进；钱大钧残部从会昌逃抵信丰加以整补后窜至韩江流域向三河坝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奇袭。在地形上，潮汕地区是一个滩头阵地，没有海军支援，无论攻或守都是不利的，尤其是给养补充极感困难。革命委员会面对这样的情况，断然决定撤离潮汕，向海陆丰地区转移。当时估计假如能在海陆丰地区站稳地步，有汕尾港口可资利用，取得国际援助仍较容易。

从潮汕向海陆丰前进的军事部署如下：

各部队在炮台市附近集合后，按贺部、革命委员会、叶部的行军序列行进。行进路线，从炮台市经流沙圩、白马圩向陆丰前进，占领陆丰后立即继续前进占领海丰。各部统限于九月二十九日在炮台市附近集结完毕。担任汕头市警备任务的贺部第六团和总指挥部特务营，等到革命委员会的人员和军需物资撤完，务于九月三十日赶到炮台市附近归还建制。

潮汕撤退到陆丰失败的情况分述如下：

撤离潮汕地区的情况

贺部、叶部主力如期到炮台市集结，没有发生问题。

担任汕头市警备任务的贺部第六团，掩护革命委员会撤退，派员到医院安排伤员陈赓等同志从海道撤退（有日本轮船驶往香港）。九月三十日，国民党的海军陆战队窜入汕头市区，与第六团发生剧烈巷战，一再将敌击退。这时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因为没有接到全军撤出潮汕的通知，于九月三十日晨从潮州坐火车来到汕头找革命委员会领取经费，扑了

个空（因革命委员会先日撤退了），又来到大浦会馆警备司令部即第六团部。由于此时从汕头到潮州的交通也中断了，徐特立同志只好随同第六团前往炮台市，避免了生命危险。

配合第六团担任汕头市警备和保卫革命委员会的任务的总指挥部特务营，一部随同革命委员会撤往炮台市，一部掩护军需物资撤退。营长刘立劳带兵一排押解巨量现金乘小火轮驶赴炮台湾时，遭到国民党军舰炮击，同时敌人海军陆战队有一部分从这个码头登陆，与敌进行战斗。因众寡悬殊，刘营长阵亡，现金和军需连同小火轮归入敌手。

担任潮州警备任务的贺部第三师教导团，以及驻在潮州的第三师政治部始终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十月二日潮州城突然遭到黄绍竑部攻击，教导团四出应战。因敌军兵力在一师以上，而教导团在会昌战役损失后尚未好好整补，战斗力不甚强，经过艰苦战斗，敌军包围圈越压越紧，而且被截成几处，彼此不容易呼应，迫不得已，分两路突围。一路是第一总队（即第一营）和未及撤走的小部队以及师部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向西南方向突围，前往炮台市寻找主力部队，后来在流沙圩附近赶上了叶部董仲明师；一路是第三总队即第三营和革命委员会警卫排以及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向东北突围，强渡韩江，退到饶平时，适值第二十五师从三河坝撤到饶平，两下会合了。

至于教导团第二总队的下落，至今还未查明，无从纪述。

五、在流沙圩、白马圩遭遇敌军奇袭

除了贺部第三师政治部和教导团没有归还建制、在潮州情况不明，叶部第二十五师没有归还建制、在三河坝情况不明以外，贺部叶部主力都集结完毕，按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为第一梯队，贺部第三师第六团、革命委员会为第二梯队，叶部第二十

四师为第三梯队的行军序列向陆丰、海丰地区前进。

十月一日开始行军，贺部两个师共五个团以及直属部队由第一师师长贺锦斋负责率领，第二师师长陈光远随贺龙在革命委员会行进,未在自己队伍里。叶部由师长董仲明负责率领，贺龙、叶挺等负责首长都在革命委员会，没有在他们自己的部队序列中行进。贺龙第三师第六团担任革命委员会军需行李的掩护任务。行军的头两天，行军秩序还好，以后的行军秩序就渐渐差了。例如作战部队对行军的战略工作重视不够，前后联络不严密，左右翼敌情搜索放松了，各级主管干部随便移动到当时指挥位置。又如革命委员会的徒手人员男女老幼一千多，各人随意沿途休息，把行军纵队拉得很长，很难适应于应战情况；在军需行李方面，仅现金一项就有三百多挑（行李都是民伕挑运），行军纵队也拉得很长，担任着掩护任务的第六团很难掌握行军秩序，假如发生敌情，应战将更感困难。

第二梯队即革命委员会和贺部第六团的行军序列位置，正是起义大军行军纵队的腰部。这个腰部的战斗力最薄弱，同先头后尾两部分战斗部队的连络又很不好，这是起义大军在行进中自己造成的弱点。不料问题就发生在这个“腰部”——十月五日突然遭到敌人的奇袭，竟成了革命事业的关键性问题。

十月五日午饭过后，第六团掩护军需行李向陆丰方向前进，行至白马圩附近突然发现敌情，右侧小树林中有一股敌军向我行军纵队射击，立即展开战斗。敌人大约只有几百人，但因我第六团是分组押护行李，当时的行军道路一边是蓄水稻田,一边是小川的小道,调集战斗兵很感困难，只靠团部直接掌握的一排兵力不足以制止敌人的射击。三百多个行李挑运伕一闻枪声就抛下挑子各自逃奔，整个行李纵队就混乱了。敌人是采取扰乱攻击的战法，一面对第六团和军需行李队伍扰乱射击，一面迅速向后延伸扰乱攻击，很快就延伸到流沙圩附近。

革命委员会这个徒手队伍上千人，没有人统率，一遇敌人射击就乱跑。听说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同志正在流沙圩附近一个村子里开会，情况不明，也无法调用战斗队伍。幸而周恩来同志掌握着政治保卫队，命令政治保卫队对敌反击，才掩护革命委员会一部分同志脱离敌火力射击范围，也是由于敌人本来不多，仅仅扰乱而已，所以没有造成伤亡损失。到此，起义大军行军纵队的腰部在指挥作用上是首脑部，此时被少数敌人冲散了，也就是象征着起义大军失败了。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白马圩、流沙圩战役。

第六团傅维钰、刘泰、李奇中等同志收容少数部队计议行止方向，陆丰方面情况不明，不知贺部主力是否遇敌，不能向陆丰走，同时担心革命委员会诸位领导同志，所以决心向后头走，从山道绕行寻找革命委员和董仲明队伍。

十月五日那天将近黄昏，在流沙西南地方一处小山上找到了第二十四师，跟着会见了董仲明师长。董仲明对战况莫名其妙，大骂叶挺、贺龙是饭桶，但是他自己的队伍并未正式对敌作战，为什么也被冲散，心中一塌糊涂。我笑他应该把饭桶的帽子自己戴上，当然我自己也是饭桶，弄得这个样子。大家经过简短商量后作出以下决定：

（一）由董仲明负责找到革命委员会诸首长；

（二）由李奇中、刘泰等同志带少数人换穿便衣迅速绕道去陆丰找贺锦斋（大家分析形势后，估计贺部主力未遇敌人，必然安全到达陆丰县城）；

（三）董仲明继续收容队伍，摸清情况即向陆丰同贺部会合。

六、贺锦斋在敌人谣言欺骗下和平缴械

李奇中、刘泰等人与董仲明分手后，找得农民作向导，决

定从甲子港坐渔船到碣石湾登陆去陆丰县城。李、刘等人到达陆丰县城,发现非常平静的现象,当然象征着贺部没有与敌人发生战事,所以心里很高兴,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在一个中学校里贺部的司令部找到了贺锦斋时却是大失所望。贺锦斋见到李、刘等人,经过简短问答,得知贺龙、叶挺等领导同志和叶部的实际情况后,大惊失色,几乎流下眼泪,显得万分懊悔地说:假如你们早来到一天半天,事情绝不会坏到这步田地,现在已是无法挽救了。原来贺锦斋在谣言欺骗下已经命令全部队伍架枪缴械,这时将要缴械完毕。贺锦斋诉说受骗经过,大意是:

十月五日晚上,贺锦斋率领贺龙全部队伍很顺利地到达陆丰县城宿营,沿途并未发现半点敌情,也未听到后面有何枪声,以为后面大队伍必然陆续到达,所以毫不介意。到了第二天,未见后面大队伍到来,也未得半点消息。正在发生怀疑之际,城里谣言四起,说是后面大队伍完全被消灭了,贺龙、叶挺等人被活捉了,其他一些共产党头目有的被打死有的活捉。贺锦斋面对这些谣言既不加分析判断,也不派员出城侦察,昏头昏脑,不知所措。这天夜晚,有人自称国民党军队的代表前往起义军司令部求见司令官,贺锦斋接见了他。那人对贺说,国民党军好几个师在白马圩流沙圩与叶部发生剧烈战斗,叶部全部被歼灭,贺龙、叶挺、周恩来、谭平山等人都被活捉;现在这几个师已经把陆丰县城包围了。那人又说,大势已去,贺部孤军处于大军包围之中,无外援无给养,陷入了必然消灭的绝境。那人劝贺锦斋顾念官兵是湖南子弟,各有身家生命,如果愿意和平缴械,可以保证官兵的生命安全,自由离开广东返回家乡。贺锦斋接受了国民党军代表的愚弄,愿意进行协商,投降缴械。至此,贺龙同志从千辛万苦中积聚起来的一点队伍就这样糊糊涂涂地完结了。

那时的实际情况怎样呢？实际情况是敌军只有陈济棠的一个补充团。袭击白马圩流沙圩的就是这个补充团。大部敌军黄绍竑、薛岳、陈济棠等人的部队进据潮汕普宁地区后，并未向起义大军采取第二步行动，据说这是因为粤系桂系两派军阀争夺潮汕富足地盘，粤系薛、陈等人逼迫桂系黄绍竑立即率部退出潮汕，在内讧中暂时放松对起义军的压力。这个补充团驻在陆丰县城，风闻贺、叶大军向陆丰前进，就撤离县城，原想逃往普宁，所走的路线正好与起义军的行进路线平行，上午没有遇着贺部主力，到了下午才发生情况。突然在它的右侧方白马圩附近发现起义军的挑运伕大队伍，於是试行攻击。这种试行攻击竟成为战术上的奇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成功，无意中把起义大军的行动纵队腰部打断了。这股敌军在白马圩流沙圩奇袭成功后，用夜间行军方法回转陆丰县城，因查知县城里驻有起义军，当然不敢进城，只是掩蔽在城外村子里，派出人员四出造谣，欺骗城里的起义军。因此，假如贺锦斋稍有头脑，稍有才能，局面就不会这样惨。

贺锦斋把贺龙全部队伍自行消灭在陆丰县城之后，起义大军的历史任务算是告一段落。至于叶部董仲明师的情况，后来听说收容两团多人，进据海陆丰一些地方，周恩来同志也在董仲明驻地休息了一个时期转往香港，尔后发展如何，不得而知。

第二部　起义军发展为工农红军

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军队从赣转闽入粤后，主力进据潮汕地区，叶部周士第的二十五师控制于闽粤边境军事重地的三河坝。当敌军进攻潮汕地区时，驻在三河坝的二十五师也遭到敌军的攻击。二十五师于进行剧烈战斗后撤出了三河坝走到潮州

东北的饶平，与从潮州突围出来的一部分队伍会合，在朱德同志的坚决领导下，经过许多艰苦曲折的斗争，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师，发展为工农红军。现在把这段经过简要叙述。

七、起义军从三河坝到犁铺头

起义军叶部第二十五师控制于三河坝掩护潮汕地区的安全，归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指挥。第二十五师在遭到死灰复燃的钱大钧部队攻击而进行了剧烈战斗后撤出三河坝沿韩江以西闽粤边境南下，原想迅速到潮汕地区与主力部会合，走到潮州东北的饶平时适值从潮州突围出来的队伍也到达饶平，得知潮汕已经放弃，无法与主力会合，于是回头北进入赣。第二十五师在经过三河坝战役后减员很多，又因到达饶平时得知潮汕失守，大军主力情况不明，有些干部对革命失去信心，多有脱离队伍自由行动的。师长周士第以及团长营长等等先后溜之大吉，幸而朱德副军长在王尔琢、陈毅等同志的协助下，重新形成领导核心才使这个队伍避免了全部瓦解的危险。

从潮州突围出来到达饶平的队伍是贺部第三师教导团第三总队，革命委员会警卫排。一部分政工人员，共约八九百人，枪枝三百左右。这部分队伍在饶平接受了朱德副军长的指挥，随同北进入赣。

两个部分的队伍由于陆续有走散的，共剩二千人左右，但徒手人员过多，给养困难，作战活动尤其感到困难。走到赣南安远县的时候，进行了初步整理，一方面组成短小精干的战斗队伍，一方面尽可能建立各个地方的革命工作小组。当众宣布，徒手人员可以脱离队伍自愿分往各个地方去做地下工作。武装队伍编成一个团、三个总队、一个教导大队（教导大队是由贺部教导团队伍和革命委员会警卫排等部分编成。）

经过整编的这支革命队伍，从安远往西行，徘徊于赣南各

县山区，给养全靠打土豪，革命形势又处于低潮，所以干部仍有动摇不定的人，难免煽动士兵闹点情绪，幸经朱德同志不断地进行耐心诚意的说服教育才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朱德同志在尽心尽力地团结队伍的同时，考虑将来如何发展革命运动的问题，打算找一个地方作为暂时渡过难关的所在。

听说范石生的部队驻防湘粤边境，范是朱德同志的好朋友，决定派人设法与范试行联系。朱德同志接到范石生愿意合作的回信后，率领队伍向湘境接近。当朱德同志亲自带着少数队伍到达湘南汝城县境的文英附近时，遭到汝城县反动团队胡凤章部队的夜袭，事出突然，朱德同志自称伙伕混过敌兵盘查，得以脱险。范石生率部入湘进驻郴州，朱德同志率部进驻郴州东邻的资兴县。范石生部又因故撤出湘南退驻广东韶关，朱德同志也随即率部入粤驻在韶关西河坝，在西河坝只驻了几天就移驻韶关以北的犁步头。

八、起义军在犁铺头

起义军在朱德同志领导下驻在犁铺头。这时已近年尾，为了起着掩护作用，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一百四十团，朱德同志化名王楷担任团长。全部其他负责人员：王尔琢为参谋长，蔡协民为政治部主任，毛泽覃为政治部副主任，龚楚为党代表，陈毅为秘书（实职是党委书记），戴成本、曹凤非等人为参谋，周子昆、李奇中、李天柱三人为第一、二、三营营长，李奇中兼任教导大队的大队长，蒙九龄为副大队长，林彪、龚楷、杨至诚等十一人为连长。

在犁铺头获得了弹药、被服、薪饷等项补充，一方面从事休整，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今后的革命事业的活动。例如：

（一）计划建立革命根据地。与范石生协商合作革命的办法，将第十六军全军转移到雷州半岛一带地区之后，沿广东越

南和广西越南边境向西发展，在这边境地带建成革命根据地，然后进入云南向西南广大地区力求大发展。在军械补充方面由朱德通过共产党向苏联购买，利用雷州半岛港口或越南的港口运进。在军费的供给方面由范石生设法筹。等到建立革命政权后再求合理解决。

（二）寻找革命组织。队伍流浪了几个月，对各方面的联系都中断了。为了同各方面取得联系，曾派人向海陆与叶剑英部联系，因为听说广州暴动之后，叶的教导团退往海陆丰。曾派毛泽覃同志，因为听说毛委员带着一部分武装农民队伍在湘赣边境罗霄山脉活动。事有合巧，毛泽覃还没有找到他的哥哥以前，毛委员派出的何长工同志却找到了朱德同志，取得密切的联系（何长工奉毛委员派遣，往各地找革命队伍，只知道南昌起义军有一部分退到湘赣边境，但不知何人负责率领，现在何地。他住在韶关一个小旅馆里听说范石生收编为共产党军队一个团，驻在犁铺头，团长姓王，当时并不知王团长就是朱德同志。何长工跑到犁铺头去见王团长，最初是参谋长王尔琢接见他，何、王二人是湘西同乡，联系友谊一下就打通了），何长工返回江西复命。

（三）开始新的军事教育。朱德同志估计今后的革命发展形势必须武装斗争为主，认为革命军队除了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官兵以外，还要用新的军事学术武装起来，才能在战斗中收到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作战效果，取得每一战役的胜利，从而加速整个革命事业的胜利。因此，决定制订一个军事教育计划，并且编写新的军事学术教材。

首先由参谋长王尔琢和教导大队李奇中、蒙九龄等人组成一个计划和研究小组进行工作。朱德同志把他在德国陆军大学和德国军队中所学到的，以及在苏联军事政治学院所学到的，分类口述，由李奇中、蒙九龄两人笔记，再根据笔记编成简要的

教材。这种简要教材分为两部分，一为步兵操典，一为阵中勤务。这个简要教材就是后来红军的军事教材纲领。

新军事材料初步编成后即开始试行教练，朱德同志亲自担任教练官。无论学科术科操场野外，朱德同志多半亲自主持或随队督促。先以教导大队为教育试点，教导大队的官长班长学生都学会了之后，再分头去教各营连的官兵，每学会一样就用上一样。教导大队的班长粟裕、洪超（在长征时任师长，于作战英勇牺牲）等人学习心得最好，时常得到朱德同志的嘉奖。朱德同志在第一次教练开始时曾对教导大队全体人员讲过一次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话，讲话中有关新军事学术与革命关系的一段很值得记述。

朱德同志说："这种新军事学术是我从外国主要是从苏联红军学来的。仅从军事观点说，这种新军事学术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加以消化以后，就是在战术上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法宝。"他说，他在南昌担任朱培德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团长，应该是负责教育军事的，但是并未做军事教育方面的事，更未曾设想教授新军事学术，而仅仅对学员讲演革命大道理，从来不讲军事学术。因为这些学员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干部，是革命的敌人，是全对革命事业开火的。所以不能教给他们新本领，免得徒弟打师傅。他说，现在用这些新东西来教育我们自己的革命军队，首先教会你们教导大队这些革命队伍的基本干部，希望大家认真重视，认真学习，努力学习。你们学好之后，以便更好地去教部队，去教将来更多的革命队伍。所有的革命队伍都能够既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又具有新军事学术知识新本领，就能更快更多地歼灭敌人，多打胜仗"。

九、起义军从犁铺头到蟒山洞

起义军在犁铺头进行对于发展革命事业的准备工作，满以

为可望获得一定的充裕时间，但是这个主观愿望没有实现。大约月余之后，情况大变了，范石生派人紧急通知朱德同志，说是李济琛发现这个一百四十团是贺、叶共产军，下令立即解除武装。（李济琛在北伐期间主持广东军政，进行清党，捕杀了大量革命分子，在南石头集中营囚禁了大量黄埔学生。在广州暴动后，李济琛又屠杀了更多的革命分子。）范石生重视友谊，不想执行李济琛的这个命令，叫朱德同志从速行动，并说后会有期。

估计当时形势，范石生的友谊是真诚的，李济琛代替蒋介石主持南方军政是反动到底，绝对不会容许起义军存在的，而且情况极端紧迫，必须迅速行动，不容迟疑耽误。因此，朱德同志召集主要负责同志开紧急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和步骤。当即作出决定：

（一）放弃雷州半岛地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另找适当地点发动革命运动。

（二）暂时第一步到海陆丰去与叶剑英队伍会合后再作计划。

（三）立刻离开犁铺头，经南雄迅速赶往海陆丰。

起义军按照上述决定，乘夜行动向海陆丰转移。走了一夜，预计采取高速急行军的办法通过南雄。不料行至仁化县东南方的鸡笼圩附近时，发现大量军队坐船上驶，经侦察得知是方鼎英一师人开往南雄，计算行程，将先我到达南雄。假如强行通过南雄，势必发生战斗，敌众我寡，不易取胜，而且徒然暴露目标，将造成被围剿消灭之势，在地形上想要前往海陆丰的必经捷径，只有通过南雄这一条道路。因此，起义军在这个临时变故情况下停止前进，细心地掩蔽起来，详商办法。这是一个严重关头，大有进退失据，万分焦急之感。

海陆丰不能去，到什么地方去呢？大家聚精会神地进行

研究讨论。但是大家在朱德同志领导下，都很镇静。党代表龚楚是湖南宜章人，他提议暂时到宜章山区以后再从容计议。龚楚说明湘粤边境的地理形势和民众情况，宜章的南边正邻接粤北的星子连州一带的大山区，这带大山区的北边有一个蟒山洞，属宜章境，很可以作为起义军掩蔽地点，给养也不成问题。李奇中也是湘南人，也了解湘南的地理民情，他首先支持龚楚的建议。大家反复考虑之后，同意了龚楚的建议。

这是后来红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假如这支革命队伍顺利地到达海陆丰，是不是会陷于被彻底消灭的命运，很难预料；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假如这支队伍不经过湖南土地革命运动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师，那末，想要在江西发展巨大的红军势力和建立红色政权，至少是要推迟时日的；因为在江西的红军势力是以这支队伍（后来编为红四军第二十八团，是红四军的主要战斗力量，在发展上，第二十八团是每次战斗中起着决定作用的队伍）做基础而发展起来。

起义军决定改向西进，进入湖南，从仁化折转向西行进，在乐昌南十里的长来圩渡过北江上游的武水，大约经过三天的行军就到达了湖南宜章境的蟒山洞，蟒山是大庾岭山脉向西延伸的一处大山。洞，是湖南人称呼山中盆地或田坝的名词。蟒山洞的风景非常好，有好多处村庄，共约百多户居民，有稻田数百亩，山地除森林外到处都是旱地作物。因此，这个蟒山洞在部队休整的意义上是大大超过犁铺头的。

环境，对于促进革命是很重要的。起义军来到蟒山洞这样美好壮丽的环境里，更加活跃了人们的革命心情，所以大家特别兴奋地计议今后的革命事业，根据南昌起义的教训，今后的革命运动应以土地革命为动力，决定在湘南发动土地革命。朱德同志领导大家研究当前的革命方针和行动纲领，订定以下几点：

（一）从湘南地区开始发动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红色政权。

（二）扩大革命军队，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发展地方革命武装力量。

（三）土地革命运动的政治口号暂时规定为：

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暴动！铲除一切封建势力！

暴动！杀尽一切土豪劣绅！

暴动！杀尽一切贪官污吏！

暴动！烧尽土豪劣绅的房子！

暴动！分尽土豪劣绅的田地财物！

暴动！烧毁反动统治的衙门、警察局、监狱！

暴动！组成工农兵政府！

……（还有几条口号，记不清了）

（四）正规军队和地方武装队伍以及各方工作人员（包括政府赤卫队、农民自卫军、少年先锋队、各部门工作人员等等）的给养来源，暂以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物为基础，尔后以工农业生产的征实或税款为基础。

（五）正规军的待遇，官兵平等，有饷发，官兵发给同等数目，无饷可发时，官兵吃一样的菜饭。

（六）实行军队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但是在军事上，士兵绝对服从官长，下级绝对服从上级。

这个纲领，后来在湖南土地革命运动中试行，基本上符合客观发展规律。

当起义军在蟒山洞从事于革命的准备工作的时候，驻在乐昌和坪石的许克祥妄想进攻起义军。许克祥是"马日事变"的祸首罪魁，这是起义军中的官兵都知道得清楚的，起义军听到这

个祸首要来输送武器，当然觉得又痛恨他又欢迎他。许克祥分两次向起义军进攻。第一次派一个团进攻蟒山，起义军只派出一营兵迎击，交锋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许克祥这个团被击溃了，但缴获很少。许克祥偷鸡未得反而蚀了一把米，心中不服，过了几天，他亲自率领全师三个团向起义军大举进攻。这次，起义军不是在蟒山迎击，而是向坪石方向前进迎敌，正在宜章武年司附近发生遭遇战，仅交战两小时，就把许克祥全部击溃，乘胜追击，直捣坪石许的司令部所在地，占领坪石。追击部队追到玉峰附近拾得许克祥本人军装，查知许化装落荒逃走才算结束战斗。清理战果，俘敌数百人，缴获枪枝千余，弹药无数，大大地补充了起义军。

起义军击败了许克祥部之后，目标完全暴露了，不宜再回蟒山洞去掩蔽，只能公开行动起来。所以在坪石稍事休息后转入湘境，选择宜章县属的石奇彭家驻扎，准备取攻宜章县城。在石奇彭家进行了好些工作，例如：

（一）发动民众；

（二）扩编队伍；

（三）剿灭附近反动武装团队；

（四）侦察宜章郴州等处的敌情；等等。

十、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发动土地革命运动

盘据宜章县城的反动军队在宜章民众组成的地方武装队伍攻击下逃走了，起义军没有派队伍协助，足见湘南民众的革命力量是很英勇雄厚的。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起义军进据宜章县城。这一天正是农历除夕，全城居民家家户户燃放炮竹，一方面欢度除夕迎接新年，一方面欢迎起义军。第二天大年初一，即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起义军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时

宣布一些新规定，例如改换军旗，把在南昌起义时所借用的青天白日旗废掉，换为满天红斧头镰刀军旗；规定战斗识别符号一律用红布领巾和红布袖章；规定部队的印章废除方形篆字改为圆形正字；还有其他一些规定。

由于工农革命军所用的旗帜、领巾、袖章等等都是红布做成的，民众就把这支革命队伍称为红军，队伍中的官兵称自己的军队也应合民众自称红军，不称工农革命军。因此，本文以后在叙述中也用红军的称呼。

红军第四军的编制，在宜章先编成一个师辖两个团一个教导大队，准备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陆续编成师团。第四军的各级负责人为：

军长朱德；

军党代表陈毅；

军参谋长王尔琢；

军政治部主任蔡协民；

第十师师长朱德（兼）；

第二十八团团长朱德（兼）；

第二八团第一、二、三营营长周子昆、李奇中、李天柱；

教导大队长李奇中（兼）；

副大队长蒙九龄；

连长龚楷、杨至诚等十二人；

第二十九团团长龚楚；

第二十九团副团长胡少海；

同一天举行民众大会，宣布成立宜章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推举政府负责人。这是广州暴动时成立广州公社之后在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工农政权。

红军在宜章发动了土地革命运动，把工作交给地方同志之后，向郴州前进。红军在摺岭、良田等地排除了敌人的顽强抵

抗，顺利地占领了郴州。郴州是湖南重镇，红军到达郴州，整个湖南地区大为震动。红军司令部驻在郴州，以郴州作为发动整个湖南土地革命的基地。向耒阳、资兴、永兴、桂阳、桂东、汝城、酃县等地大发展，不到一个月就把革命的影响广泛展开了。在耒阳打了两次大仗，两进两出，后来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后，沿衡耒公路追击，进抵衡阳江东岸的东阳渡。红军所到的县城，立即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随即组成了工农兵政权，进行打倒土豪、分田地。组成县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有宜章、郴州、永兴、耒阳、资兴、汝城、桂阳、桂东、酃县、茶陵。分田地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有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等县。烧了一些房子，郴州、资兴、永兴三个县城烧去了一部分，耒阳县城全部烧光了。事后受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批评。

九、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军第四军

当整个湘南地区组成了许多县级工农政权，广泛展开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自觉行动，使湘南变成了一个红色海洋，这个红色海洋的风浪快要冲出湖南境界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大量军队向红军反攻。红军决定迎击当面的强大敌军。这时活动于罗霄山脉的毛泽东同志也命令他的队伍向湘南前进，支援朱德同志。但是敌军的力量超过红军几倍，红军很难掌握决胜权，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暂时避免决战是为革命战略所许可的。因此，红军在耒阳给予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后，主力撤出耒阳，向茶陵转进，同时命令郴州军部向资兴转进，预计分别进入湘赣边境，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部队会合。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德同志所领导的红军全部撤出湘南地区，进入湘赣边区，朱德同志在宁冈东南方的砻市与毛泽东同志会见，两支革命队伍举行了会师大典。

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两支革命队伍会师后，组成前敌委

员会，以朱德、毛泽东、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同志为委员，陈毅为书记。两支队伍并编为一支队伍，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军参谋长王尔琢。编成三个师十二个团，朱德兼任第十师师长，毛泽东兼任第十一师师长，陈毅兼任第十二师师长；王尔琢兼第二十八团团长，龚楚为第二十九团团长，蒙九龄为第三十团团长，伍中豪为第三十一团团长，袁文才为第三十二团团长（井冈山地方武装改编）刘泰为第三十四团团长，尹子韶、黄克诚为第三十五团正副团长，李奇中为第三十六团团长。

第二十八团是红军的主力。第三十一团是毛泽东同志的基本队伍。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个团是郴州、永兴、资兴等县的地方武装。进入井冈山大小五井的人马，除了武装队伍之外，徒手人员男女老幼的人数超过武装人数，伙食供应，极感困难，作战上也感累重。前敌委员会决定精兵简政，命令湘南的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返回原籍去坚持原地斗争，只留第二十九团武装人员随第二十八团行动。五月下旬，湖南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各自返回湖南各县，各自建立根据地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一九二八年七月底，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红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团突然经过李奇中等同志在郴州资兴境内的龙溪十二洞和布田根据地向郴州急进，攻取郴州，这一仗没有打好。第二十九团从郴州脱离军部指挥，自由行动跑回宜章去了。军部参谋戴诚本、曹风非等人煽动叛乱被就地枪决了。第二十八团撤出战场返抵资兴布田，在布田举行了八一起义一周年大会，略事休息之后仍返回江西与毛泽东同志共同艰苦斗争。

从湘南到井冈山

陈　茂

一、朱德来到了我们家乡

一九二八年初，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一小部分队伍，从广东来到了我们的家乡——湖南宜章县粟源堡。他在来的那天晚上，召集我们全村人讲了话。他说你们这个村子，是大革命时期最勇敢的村子，你们也是最勇敢的农民，因而反动派的屠杀，把你们成立的农民协会推翻了。我们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农民协会是推不翻的，你们要把农民协会恢复起来，组织起来，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我们村，原来在一九二六年就成立了农民协会。我参加农民协会的时候，大家在一阳书院里喝过一次"鸡公血"（注）起过誓："永不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我们一些年青人都躲在山上，直到后来局势好转了才敢回来。

朱德同志这一讲，就好象干草堆上点了一把火，我们大家都活跃起来，个个又把红带子扎起来了。把梭镖又磨得闪闪发光，还爱惜地装上红丝条子，我们的农民暴动队又组织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暴动队欢送朱德同志带领队伍过河。我们把他们的队伍看了一下，才只有三百多人的样子啊！

送走了他们，我们暴动队就开始打土豪，占了河对岸的英商地理公司，外国军人都吓跑了，替外国保镖姓马的队长也不

知道去向。接着我们还到附近的地方去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了。

快过春节了，反动派许克祥从广东派来了三个团，来镇压湘南暴动。我们青年人都跑光了。农历正月初一，他的队伍进到了岩泉圩。初九中午就和朱德同志的队伍发生战斗。当天就被我们消灭了一个团。你说为什么我们只三百多人就消灭敌人一个团呢？

反动派到那里，就在那里结党，推翻农民协会，屠杀农民，见到身上有点红布的，就当共产党杀掉，因此老百姓害怕，都跑光了，没有群众支持他。他问我们队伍的地址和消息一点都问不到的。事实上，我们离他只有几十里路，他都不知道。加上初九那天逢圩，远处很多老百姓来赶圩，我们的朱德同志派出了几十个便衣队，打扮成商人和逢圩的农民一样都混进了岩泉圩，敌人也是一点也不知道。到了中午，朱德同志带领剩下的人员三路进攻，枪一响便衣队在城里就接应，把反动派闹昏了头，弄转了向，混成一团，等他们撤出岩泉圩，我们已经消灭了他们一个团的样子，剩下百余人都退往粟源堡，唉！那时光，我们暴动队只顾瞧热闹，也不懂战术，不久我们大家把浮桥拆掉，他们剩下的两个团一个也跑不掉，一个也不叫他剩下。

正月十三，许克祥死不甘心，又从广东调来了两个步兵团，一个教导团，想一下把朱德同志的队伍全部歼灭。

我们的朱德同志，不慌不忙，把队伍埋伏在山上。反动派刚一到岩泉圩，脚根还没站稳我们就来了个猛打猛叫，这一下就把他们的队伍给撵死了。敌人溃退，我们一口气把他们的五个团追了二十多里地，一直退到了武阳司。当晚，敌人守着长家岭，山顶上架着机关枪和迫击炮。

我们的朱德同志整齐地把部队带在暴水头一带休息。他和

战士们讲了话："今天我们追得好迅速，得到一些胜利，明天我们追得还要更迅速，取得更大的胜利。"当天晚上就下达消灭敌人的命令。分为两路进入长家岭，一天明就过了武家山渡河，不到两个钟头，就把长家岭占住了，大队乘胜追击，我们的暴动队也紧跟在后而追，一直追到坪后，在坪后把许克祥的师部全部缴了械，一共歼灭了敌人一个师。

朱德同志发给了我们暴动队员六七支新枪，还命令我们到长家岭去打扫战场。我们在长家岭得到了一些弹药，又回到了粟源堡。

第二、三天，朱德同志就率领部队向宜章县城进军，在宜章县城组织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把红旗插在城门上，迎风飘扬，把缴来的枪支发给了工农兵政府，要政府组织农民，把枪支发给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反动派进攻，是想把湘南革命的火焰扑灭，谁想到却刮起了燎原般的烈火，湘南革命斗争的火焰，越烧越大。

注："公鸡血"湘南一带农民过去有些习俗，立誓结盟时把一只公鸡的血放在酒里，名为"血酒"大家喝后永不叛变。

二、仇恨的火焰

我们在粟源堡也组织了苏维埃、乡农会、村农会。农民们都拿起了梭镖、鸟枪，五六尺长的过山炮、猪嘴炮（都是土炮的名字）也都抬出来了。

我家做过炮竹。我懂得些火药性能，会放炮，就当炮手，我和弟弟陈良均，扛着一杆土枪，两个人一起去打土豪，很是积极。

不久，宜章反动武装，那个给英商保镖的马队长，带着一百多条枪，后面还是六、七百地主、富农、地痞、流氓前来围

攻粟源堡。我们村有个小城墙，城外有条小街，街叫他们给烧光了，我们就守在城里，手里只有六七枝从朱德同志那里拿来的枪，这是我们暴动队头一次打仗啊！城里有三百多人，当外面枪响起来的时候，里面有些地主、富农想跑出去，叫我们给捉住了。胆小的人只害怕，我弟弟陈良均也害怕了（后来他脱离了革命，渐渐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的人）。

在这次战斗里，也考验了和锻炼了我们的队伍。

我在装药放猪嘴炮的时候，一颗子弹穿透了寨门，射中了一个姓刘的炮手的胸膛，他牺牲了。我们怀着仇恨，连续点燃着炮药，射出去的铁砂，杀伤了六、七个敌人，这才把反动派匪徒的凶恶气焰给压下去了。

从上午八点，一直坚持到下午三点多钟，敌人看攻不下去，就撤走了。

隔了十多天，敌人又来了。这次来得多，桂东的反动派赵风章带来了一个营，马队长也带来了三、四十条枪，一共有七、八百武装，还有机关枪。我们一看事情不妙，乘敌未到，半夜就撤离了粟源堡，爬上了猪武岭。

在山上等着天明，天刚亮，敌人的枪就响了，白白地打了半天，敌人才发现里面没有人了，这时枪声才停止，我们在山上好笑。可是没有多久，粟源堡（我们的家呀！那里有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冒出了浓烟，反动派把全村都烧了。

我们擦了擦眼泪，怀着满腔仇恨的火焰，跑到了宜章县。

三、第一次出征

我们到宜章编成了独立第七师，师长胡少海。我们从粟源堡跑出来的农民暴动队编在一个特务连，连长陈光，每天早晨起来有一个钟头的训练，跑步、瞄准、射击、装退子弹，冲锋

杀敌、散兵线……。中午讲革命理论和军事课，下午就肃反，打土豪。

到了二月中旬，师长命令我们特务连去打道县，说那里只有几十个许克祥的残兵败将，要我们去收缴枪枝。我们练了这些天的兵，每个人心里都痒痒的了，早就想打仗了，一听连长命令都乐坏了。我们一百来人，一共有四十几条枪，其他的人拿的都是梭镖。我们连夜赶，一天一百七、八十里。第二天下午就赶到道县，我们后面还跟着几百农民，手持梭镖，打着无数面的红旗，浩浩荡荡，声势浩大，敌人一见就害怕了。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队伍，连忙一边打枪一边跑出道县县城。

我们没有一个参加过这样的战斗啊！一听枪声就知道拿着红旗，猛打猛冲。农民跟着我们后面也把红旗一展，哎呀！满山遍野都是红旗，把敌人给吓跑了。无数面红旗都向道县集中，象无数个火把柴集成一个巨大的火把一样，把道县照耀得通红。

我们在城里缴到一挺钢把子机关枪，还有一门迫击炮，真高兴呀！叫人抬了回去。那时候，我们连机关枪要枪架，迫击炮要炮架也不知道。抬炮的同志说：零零碎碎的不好拿，不要它啦。结果炮架枪架零件都没有要了，光把枪管子炮筒子拿回来。

一路上我们扛着炮筒子，有说有笑的回到宜章，一直把它抬到司令部，找到了师长向他夸耀夸耀。师长听我们缴到了机关枪和迫击炮，也乐得合不上嘴了，可是出来一看就楞了，他向我问："零件带回来没有，炮座枪架呢？"我们说："要拿这些东西干嘛，怪麻烦的。"师长说："麻烦！嫌麻烦不要紧，这炮可成了麻烦物啦。"我们这才傻了眼，后来师长给在郴州的朱德同志写信，告诉我们的胜利消息，他回信鼓励了我们，夸奖了我们：农民队伍头一仗打得好，缴了机枪和大炮，很勇敢，很勇敢啦！

四、撤到哪里去

三月间，广东反动派陈济棠派来了三个师进攻宜章。敌人这次来势挺大，我们独立七师和宜章县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二三万人都撤出县城。守在离城三十里的节岭。我们在那里守了三天三夜，敌人没有前进半步。

我们的班长陈冕阳同志，他也是我们栗源堡人，他的孩子才只六、七岁，也随着大队上了节岭，跟在爸爸身旁。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了我们班长的左胸，血象水泉向外冒，当时就牺牲了。他的孩子吓得直哭，我背着尸首，领着他的孩子，走上了山顶的一个凉亭子。在这个时候，有人在喊："毛泽东同志来信啦！他要我们退往郴州。"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同志是谁呢？我们问团长："毛泽东同志是那里人？干什么的？"团长说："他也是湖南人，是带队伍的，做革命工作的。"我又问："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团长说："到郴州去，马上就走！"

我匆匆忙忙地准备行动，我们班长的尸体都没有来得及掩埋，我只把稻草把他的脸盖上就跟着大队准备出发了。

节岭离郴州城有六十里路，我们撤退的两三万人中，有白胡子老公公，有在娘怀中吃奶的娃娃，有手持梭镖和枪枝的战士，也有携包背裹的老百姓……。老人走不动的还要用轿子抬，小孩走不动的要背着和抱着走，有的则用扁担篮子挑上，一路上有哭有笑，倒也热闹。

当天晚上到了郴州，大家在节岭三天三夜，又走了一天路，可累坏了，好好的睡一觉吧！谁知道，毛泽东同志又来信了，要我们从永兴撤到江西省去。郴州不能住，敌人立刻会到，要连夜过河。

大家思想上乱了，不走嘛，反动派赶上来抓住了要杀头，还要刮皮；走嘛，疲劳还是小事，到江西省去以后还能回来吗？

可是，我们第一要的是活命呀！不能留下来任反动派象宰鸡杀狗那样给杀掉。我们要走，跟着大家一起走才有活路。

五、大陇会师

我们经过永兴县，到达了江西省宁冈县集合，我们独立七师就改编为红军第四军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

南昌起义的一部分同志和耒阳、茶陵、永兴、资兴等县的农民改编为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

秋收起义的工人和农民编为三十一团。井冈山的武装编为三十二团。

从湖南来的，有的全家老小，妇幼也跟着革命队伍爬上了井冈山。上级把这些不能上前线打仗的都送上了井冈山。在山上成立了幼儿园、养老院、补衣队、洗衣队、补鞋队、做鞋队、修筑队、担架队、运输队。还在山上盖好了几栋被服厂。湖南来的妇女也都到被服厂里去工作。山上还修了几栋楼房，给前方伤兵回来休养的。

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成了我们的家。

队伍整编好了以后，在砻市的草坪上我们搭上了一个台，插上了红旗，开了个“八一”南昌起义庆祝大会。那是二八年五月，正是阳春季节。天气好，人民的心情也好，好象春风吹暖了人们的心胸一样。大家都乐和和的，毛泽东同志很高兴地在大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他那湖南湘潭的口音，响亮而有力地宣布这些……。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他啊！从湖南把我们叫到这里，保存了革命的力量，把几股力量

汇成一股力量。

在会上毛泽东同志还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许打人骂人。他说打人骂人是军阀残余，我们革命队伍是官兵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反对官压迫士兵。官与兵，兵与官都要阶级友爱，要团结。他还讲了，打了胜仗不要骄傲打了败仗就不要灰心丧气！他说："我们要懂得反动派力量是很强大的，他们时常要向革命进攻的，打了败仗不要丧气，不要因此就认不清革命的前途，甚至不干革命了。"他又讲了革命的战略战术，要我们懂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道理。这就是要我们学会游击战术的原则。

朱德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是革命的红色战士"。

我一听到第一次他这样称呼我们，不知为什么，这个名字立刻从心里产生出说不出的喜欢。他接着说："我们红色革命战士首先要学会"三打"。"三打"是什么呢？我正在想，他就解释道："第一打要学会用枪打，第二打要学会用笔打，第三打要学会用口打。"用枪打我懂，可是用笔、用口打我怎么也不懂。他又说，用笔打就是用笔到处写标语，写我们的主张，到处要写，就是连上厕所解手也要写。用口打，就是向老百姓到处宣传说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保护无产阶级的，我们是帮助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打骂老百姓，不拉伕，不派款，帮助群众打倒抽苛捐杂税的反动派。在战场上，在火线上也要向敌人宣传，敌人在那里打枪，我们在这里宣传："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穷人，你们打仗都是为当官的打仗，当官的还每天打你们，骂你们，他们当官的吃好的，穿好的，你看你们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缴枪过来吧！缴一支五元钱，愿意回家的发路费，愿意在我们这里当兵的也好。我们这里官兵平等。不打骂，不压迫士兵。"

我当时听了这些，还想不出这样做有多大好处，后来我才

知道，口打的力量硬是不小。比如我们队伍有一次，到了一个村子，只有几个老年人在家看房子，经过我们一宣传，第二次再去时，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在家里，有的还向前来看我们背的枪枝，直夸我们的枪好。白军士兵听了我们的宣传，很多人都来缴枪枝投降。一个人缴了一次又缴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等到第五次他拉过来一个班，他和我说这是第五次了。

在大陇开了个会，毛泽东和朱德同志还给我们上了许多军事课，政治课，武装了我们头脑。军事训练又使我们增加了一些武装斗争本领。

红四军在井冈山的斗争

吴　淞

一九二六年冬，茶陵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此时为筹备会）。次年（即一九二七年）春，正式成立茶陵县坑口区农民协会，我担任纠察队长。那时打土豪劣绅民气奋发，若决江河。农民正在蓬勃之际，国民党叛变了（马日事变），茶陵的反动派也开始向工农革命组织进攻。当时总工会王友德同志率领农会、工会的积极分子坚持保卫茶陵七昼夜，因寡不敌众，即退出回乡。反动派头子罗定于农历五月十二日夜打进茶陵城，当时由于同志们缺少斗争经验，遇突然事变没法对付，各散西东。本年（一九二七年）古历七月间在酃县水口圩遇见了伟大领袖——毛委员（即毛主席）及其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毛委员指示我从各方面找寻原来逃之患难的老同志到井冈山集合。毛委员为了拯救患难同志，挑选八十支枪来攻茶陵。毛委员说："现在我们好象刘备丢襄阳走樊城的时候，同志们能够一心一意刻苦耐劳为无产阶级而奋斗，我们的计划必然可以实现。"这支精干部队，绕道安仁边陲直攻茶陵。攻进茶陵后，打开监狱救出患难同志八十余人，这支队伍又安全转回宁冈。

同年九月间，大部失散同志被找到集结在江西宁冈县茅坪地区，耕田的耕田，当兵的当兵。十月间，毛委员开始率兵进攻茶陵，一鼓而下，占领茶陵城后，派政治部谭梓生（安徽人）同志代理茶陵县长，共住四十余天。在住茶陵期间，前后

和反动派打了三次仗。第一，二次战斗都打胜了，缴获长短枪十余支，马驹（小马）数只。反动派吴尚匪军势力浩大，我们才放弃茶陵，仍旧安全返回宁冈，开始训练（三操二讲）军队。

一九二八年古历正月十一日下午，军队在宁冈茅坪集结，在群众协助下，围剿新城反动派。由第一营营长袁文才晓喻军队，订出纪律十条，现记得清楚的有："搜找老百姓者杀！不服从命令者杀！临阵退缩者杀！"次日（十二日）拂晓时到达目的地（新城）。反动派看见我们红军来了，把城门紧闭，在城上大叫："活捉袁文才！"由于没有攻城武器，造成对峙。到十点钟时，我们用手提式机枪向城头扫射，城内反动派吓得抱头鼠窜，大叫："不得了，毛泽东的队伍到了。"中午我们的同志用斧劈开城门，前赴后继攻破新城，缴获枪支二百余支，俘虏众匪很多，活捉伪县长张开阳。并且派文根宗同志代理宁冈县长。这次战斗是毛委员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次的大胜利。

同年二月间，我调特委会（住砻市），随毛泽覃（即毛主席之弟）同志工作。反动派前次在宁冈失败，妄图报复，调了大批伪军来宁冈"围剿"（叫第一次），在毛委员的"不打硬仗，敌来我去"的策略下，全部队伍开向湖南酃县。到达酃县南乡后，红军整编为独立第一师，全体官兵奉毛委员做师长。毛师长说："你们全体同志爱护我，我不过暂时代理，以后你们慢慢选一个有能力的人来代替"。这是毛主席当时谦谨的态度。三月间，敌人已退。我们第二团（团长袁文才）由资兴县会合朱德总司令队伍先回宁冈。第一团团长朱仁清和毛师长由桂东后回宁冈。

此时，朱德同志正率领郴县、耒阳工农子弟兵携带鸟铳、梭镖、步枪、迫击炮、机枪等等来到宁冈，和毛师长携手，才整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为军长，毛师长为党代表。下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四个团。在邻

近各县开展游击战争，时常凯歌奏旋，毛党代表说：我们要打泥鳅战。这是毛党代表看见泥鳅向水面一跃而吸收空气，因此感觉到以此法制服敌人。敌人来时，我们红军埋伏在山坡窄路之边，出其不意地攻其不备，使敌人首尾不能照顾，敌人屡来屡败，反动派每来宁冈，同志们便高兴的说："反动派又送枪来了"。

同年古历五月间，正是端阳之际，反动派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又由永新县企图进攻宁冈革命根据地。当时毛党代表、朱军长于先计划完善，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守新七溪岭，二十九团扼守老七溪岭，当时我军共计长短枪近三千支左右。然而敌人兵多，来势凶猛，双方对抗，历经一昼夜，我红军同志们翻山越岭在荆棘中抄到敌人重机枪部队（即已夺取敌人的重机枪来还击敌人）。敌人大败而逃，缴获各种枪一千余支，故群众和兄弟们有歌云："哎哟哎哟，七溪岭杨池生临阵脱逃，杨如轩带花先跑。"当时在宁冈三岁小孩都知道这个歌。我红军数千人当时能够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可见红军之勇敢。

同年六月间，我红四军向茶陵开展游击战。在高陇和反动派接触，不幸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姓名忘记）阵亡，后即转变计划，深夜围攻永新。当时所有短枪梭镖大刀之部队杀敌，将城攻下，缴枪千条，这是红军第三次大胜利。

同年七月间，反动派进行二次"围剿"。我们扼守五井（上井、中井、大井、小井、下井统属井冈山），另一部分埋伏警戒，敌人在黄洋界山下进攻四昼夜不得通过，我红军迫急炮连蒋连长测量好敌人住地，连发三炮，内外夹攻，白军大败而逃，反动派头子吴尚（伪军长）也剃了胡子逃跑了。

反动派经过几次失败，死不甘心，九月间又派来九千人枪进攻宁冈茅坪一带，见人就杀、见屋就烧，短凳子也要过刀。原来朱军长、毛党代表准备下井冈山进攻反动派，恰好反动

派先来进攻茅坪了。拂晓时枪声大作。於是全体动员抵抗，不到三十分钟敌人被击溃。毛党代表率部队由牛亚坡转赤坑，抄敌后路；朱军长率部队前追至新城（即宁冈县内），反动派全团被歼灭，缴获各种枪支千余支。这是第五次大胜利。

同年十二月间，彭德怀同志由浏阳、平江率领一支部队也到宁冈和毛党代表、朱军长会师。

一九二九年一月间，毛党代表和朱军长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临别的时候，开了一个大会，毛党代表在会上演说："要饭吃，要衣穿，就要向那边角上进攻（指瑞金方向），靠我毛委员（自称）一个人靠不住，要靠同志、兄弟们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才有饭吃，才有衣穿。如果我们出去明年一、二月不倒回来，我们就有希望，若是倒回来，那我们就没有意思。"

自毛党代表、朱军长率队离开井冈山后，反动派来了二十个团"围剿"（叫做第三次围剿）井冈山。

当时只有彭德怀同志的部队和赤卫队，共计约千余支枪保卫井冈山。山上住有伤病员数百人（后被反动派用机枪集体扫射牺牲了）。

此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雪达数尺，在防御工事前后左右设置有铁钉竹刀，在防御沟上面有弹簧性的炮弹。打了一周以后，以当地坏人曾会五为向导(后被镇压)率领反动派由黄洋界防御工事侧面偷袭进来，以致第一道防线失守，而第二道防线棍子坳相继放弃。于是彭军长不得已结集部队撤出了茨坪，刚好到大汾(原属遂川)，四面八方弹如雨下，彭军长当即传令全队不开枪，观清敌人阵势，然后集中兵力直向一个方向冲击，将敌冲垮，突出敌人包围圈，深夜兼程转向赣南，一路上缴获枪支数百，再和毛主席会合在一起。敌人占据井冈山后住了一周，见人杀，见屋烧，所谓"寸草不留"，造成其残酷惨情，

无人道之行为不能用笔墨所能形容。

自毛主席等离开井冈山后，而湘赣边区各县仍旧建设苏维埃政府，组织赤色游击队，和反动派长期斗争，发展范围日益扩大，至一九三四年以后，陈匪光中，王匪东原在湘赣边，用占一乡，进一村，建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办法，围剿苏区。我革命同志又几经艰苦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湘赣边区才被敌摧残。

那时，我们每次战斗所捉俘虏，均不虚传，过三日，邵叶新同志将其敌人的伤病兵，抬来住院医治，医治好了，听其自便，愿干者有工作，愿归家者发放旅费。

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挺进

陈　茂

革命自遭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损害之后，全国革命走向了低潮，反动势力一时嚣张。我在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参加了湘南起义。由于敌我势力悬殊，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使革命转向高潮，必须保持和扩大现有武装革命力量——红四军。在当时环境的要求，以湘赣边区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做根据地，罗霄山脉北通湖北的大冶，通城，南通广东南雄，东临江西的铜鼓、修水、萍乡、万载、莲花、永新、宁冈、上犹、崇义等地，西通湖南平江、浏阳、醴陵、茶陵、攸县、酃县、桂东、汝城等地。在四省环抱围绕中，象征着全国群众围绕在共产党的周围，井冈山是中段，其中有大、小、上、中、下五井五个村庄。

大小五井的群众，历年来受地主恶霸的剥削摧残和国民党的劫持。红军一到即团结起来,军民打成一片,建立乡村工农政府，分配了土地，还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协助红军放哨、带路、侦察敌情等,使红军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故二八——二九年中间，于永新、宁冈、遂川、莲花及湖南的茶陵、耒阳、郴县、桂东等县消灭不少敌人。

红军在当时每仗必胜，流传："我们没有打过不赚钱的仗，"发动了湘、赣几十个县的群众。

彭总在平江起义，打垮了湖南军阀吴尚的两个团，建立了

平、铜、浏、修一大片革命据根地。罗炳辉拖着江西的保安团来江西参加革命斗争。毕占云带着国民党军一个营加入红军。因而江西主力逐渐加大，由二千人发展到万人左右，由四个团编成十八个团了，使反动派日夜不安。由于发动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攻，但所得总是惨败，湖南反动头子何健和江西反动头子鲁涤平就恼羞成怒了，在一九二九年旧历十一月中旬纠合广东反动军队发动所谓“三省围攻”了。

我们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会攻，决定向赣南、闽西挺进，创造和巩固当时的新、老革命根据地。

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在我们侦悉敌人采取所谓稳扎稳打的“会攻”企图时，即决定红军主力即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全部向赣南、闽西挺进。留三十二团以及赤卫队、游击队配合当时彭德怀一部分红军坚守井冈山打击敌人，由于交通不便，器材缺乏，传达通知和集中军队都要沿山开路，所以费时很多。

坚守井冈山是一个艰苦持久的斗争，必须准备持久斗争的粮食，且粮食要由永新、宁冈运来，必须爬几十里的高山，但红军战士和群众日日夜夜高高兴兴的唱着少先队歌运输，叫道“征服高山黄洋界”；“准备运输队长蒋介石送枪支弹药来”；再欢迎“何健、鲁涤平反动部队士兵来当新战士。”当时山上储备了不少粮食，许多红军战士在此养伤养病，当时有人叫大小五井为“大小五省”，表示很有坚守信心。朱总司令也亲自来运粮食，这样鼓舞大家，每人多挑几十斤，一下就运完了。俘虏过来的新战士见总司令也运粮，就愤骂反动军官只会打人，感到红军真是人民的军队。粮运完了，“会攻”也开始了，我们挺进赣南、闽西的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

于是团营党委会议，连支部会议，营排以上干部会议都召开了，传达和研究了粉碎敌人的“三省会攻”，讨论了军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动群众，创造新的根据地，巩固老根据地，促进革命高潮，消灭反动势力。在行动前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何长工同志当书记，我由二十八团调来行委当秘书，主要是执行党的政策，争取群众，供给军队在行军的一切需要和解决战士们的困难问题。一切准备好了，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离开井冈山出发了。

二、经过崇山峻岭到大庾，敌向大庾进攻

我们不向敌人的正面走，而从敌侧向崇义县的营前冲出，在营前附近与敌保安团接触，几分钟的战斗，敌即逃窜。我军前卫即生龙活虎似的占领崇义县城，红军二连战士说：“我们没有当上前卫尖兵，连枪响都未听到，就被我们打垮了。那些怕死鬼见到红军就逃，很难缴到他们的枪！”为了完成前进任务，我们继续挺进，常常鸡鸣做饭，拂晓出发，十多里的行军行列，静悄严肃的走着，如果前卫遇敌，各连各排即传递“靠拢”口号，可是几天如入无人之境，很顺利的到达了大庾。据侦察，尾追我们的敌人相距两三天的路程，于是决定在大庾休息，再看敌情的变化来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此时我又调二十八团三营任营委秘书，对检查全营战斗、指挥员对政策执行的情况和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都表示非常满意。会议尚未结束，团部来了一个通信员，传达团长的口说命令，要我们三营各连就地集合，准备打击从南康来进攻我们的敌人李文彬匪军。党代表宣布休息，准备战斗，战士们高兴的唱起歌来，掮着枪观察着，等待着南康方向的动静，准备着击溃敌人。等了三个钟头敌人终究不敢向我冒进，怕吃亏，怕被消灭，我们都很安全地在大

庾住了一夜。但战士们都自觉的提高警惕，准备自己的武器，团结自己的班，随时准备战斗。次日早饭后，又继续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各连负责同志刚刚来齐，团部的通讯员飞也似的跑来传达团长的命令，要三营迅速集合，准备战斗，控制和占领通梅岭关的高山。不久即传来了通南康警戒哨上的枪声，战斗越来越激烈，战斗了几个钟头。匪军有李文彬、熊式辉两个旅和一些保安队，敌众我寡，黄昏时从大庾撤退。朱总司令与特务营营长毕占云亲自殿后，很安全地将全军撤向南雄北部的地区前进，敌人也不敢向我尾追，并迷失了我军所走的方向。

三、项山的遭遇

大庾撤退后，战士们对敌愤怒很深，以为没有打伤敌人，仇恨未报，又便宜了敌人。假设我们在大庾与李文彬、熊式辉匪军硬拚，伤亡必多，敌人又能继续增援，我军侧孤军奋斗，害多利少，且我们创造新区的任务很难达到，这一切都被战士们同仇敌忾的心情忘却。经过各连队首长的反复解释后，全军战士心悦诚服地进行着自己的准备，集结部队继续向南雄北部地区通过，黄昏时反动地主武装，向我发土炮遥轰，且枪声冷落地时现时息，战士们静悄悄地向前行进，毫不理采地通过一片开阔地，赶到乌径宿营。次日炊事员照例地三点钟送饭，四点早餐，拂晓出发，我们沿信丰的山路走，敌人从大道跟到信丰，我们向全南的崇山峻岭爬，敌人从大路跟到全南，我们就向龙山小路走，敌人从大道赶到龙山，我们就向定南的羊肠小道走，好象敌我正在赛跑一样。这时正值严冬腊月，高山上雪花飞舞，霜雨冰冻，同志们手脚冻僵的也有，脚跟冻疮流血，沿途滴淋于崎岖小道中，我就是其中一个。大家为了宣传革命的道理，为了创造新区的任务，一切困难都为了革命的

前进而消逝。行军照例地每天都是拂晓前进，黄昏黑夜宿营，同志们还要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征发地主反革命的赃物，熙熙攘攘乐聚一团，有时唱歌曲来助兴，有时激昂地谈及反革命军队究竟跑不过我们，“让他妈的先跑几天，我们是要赶到他的前头，如果敌人来走我们所走的山路，那怕走上一天，就会叫起他妈来。”不光是战士们的兴趣这样高，就是炊事员同志，大家好象订了竞赛条约似的，白天扛起军锅跟着走，不掉队也不落后，晚上三点钟还要起来做饭，有时还要参加全连士兵大会，自动地检查我们今天的饭煮得好不好？菜够吃不够吃？行军时拥挤不拥挤？在大庾负了伤的同志，坚持不愿坐担架，不愿拖累同志们来抬，高兴地走路。首长牵来让伤员骑骡马，互相推让着，要经过卫生员催动之后，才抱起伤比较重的同志骑上，随着长列的队伍前进。大家爬山越岭地走着，走了十多天到达项山宿营。

项山是一个小的地方，在万山之中，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使我忘记了它属于何县。到达后，约九点钟的光景，首长们照例侦察地形，派出警戒，战士们找群众谈，征发反革命地主的谷物。这一切工作作完之后，就地宿营。当日敌情未确定，拂晓前，熊敌军向我袭击。由于情况不明，开始还以为地主武装或土匪的骚扰，有的据守宿营地抗击，有的抢夺高地。在我军司令部出动时匪军已争夺了主要阵地，包围起我们，朱总司令险些受危，陈毅同志被敌抓住，他用拳头打倒两个敌人，摆脱了危险。在我军奋勇冲击之下，杀开一条血路，抢夺高山，集结主力。敌人再也不敢向我攻击了，完全冲出了项山的重围。

项山的遭遇，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我们下定了决心，继续向目的地前进。我们经得起考验，创造了闽粤赣边广阔的革命地区，发动了三省群众的斗争。反动派疯狂地进攻，终究是垂死的挣扎，回光反照的征兆。

四、大柏地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会攻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同志们坚毅顽强的意志，越发坚定，虽然遭受敌人项山的袭击，丝毫不馁气的紧跟着毛政委、朱军长原定的计划向前进发。为了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从寻邬边境插走，走了几天，才到达会昌地区。侦察会昌情况，有福建土著军阀卢新铭的海军陆战队两个，我们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攻进县城，卢匪军队抛弃机枪逃命。我们缴获一些胜利品，为了便利于侦察敌情，避免主力冲突，仍退出县城，向农村宿营。李、熊匪部虽然向我尾跟，总是相隔很远，就象战士们平素所说的："敌人赶不上我们，走不过我们，还怕我们袭击出其不意，狠狠地揍他几下！"真的，敌人狂妄的风焰，敌人的士兵拖得跛手跛脚，我们则从容地选择了向瑞金和宁都交界地的大柏地前进。这个地方在武汉国共分家时，贺、叶曾率领大军经过的地方，也是贺、叶曾经在此打垮敌人疯狂进攻的地方。我们来到此地，也是准备着打垮敌人，效仿贺、叶的英勇斗争，这是毛政委和朱军长已经胸有成竹，我们自井冈山出发，到大柏地宿营，走了一个月零七天，又是一九二九年旧历年除夕的前一夜，到的时候，天空射出了朱红的太阳。大家洗澡换衣，并且很好地休息休息，好象等着敌人挨我们的揍。

大柏地两面是山，中间一条大路，都是石板砌成的。通宁都要过一条河。河那边有赖州桢(后被我军活捉)匪把守，堵住我军，熊式辉匪部果然于黄昏时赶上了大柏地进攻我们，激战一夜，加之大雨淋漓，除夕的这一天，我军包抄一到，俘虏千多，缴获步枪、机枪约九万余支，一下子彻底地粉碎了蒋介石的"三省会攻"。

从井冈山到古田

陈　茂

一、向赣南闽西进军

记得那是一九二九年初。

井冈山上，司号员吹起了集合号。响亮的号声，穿过茂密的森林，在山谷里引起了回声。

红四军在山坡上集合了。冬天的冷风，在这高山上嘶叫着，刮落了树上残余的树叶子。已经变成了灰白色的树叶，旋转着飘落下山谷。一面面退了色的红旗，镰刀斧头的标志闪现着。

我们二连一排的黄排长，是在南昌起义就跟着朱德军长闹革命的。他穿着一套已经破烂不堪的灰军装，眨一眨仅有的一只眼睛对我笑着说："今天比昨天暖和多了，是不是？"

"不晓得！"我看了他一眼，心里说："幸之你穿的是单的，不然你也许还说今天太热了呢？"虽然是这样想，可是还是用羡慕的眼光看了看他那套军装，比我这身湘南暴动时就穿上身的农民服好多了。

毛泽东政委和朱德军长来了，毛政委选了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停下了脚步。他那瘦削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劈头就问："同志们冷不冷？"

"不冷！"雷一般的回答，震动着山冈。"说不冷是不科学的。可是说冷吗？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的井冈山，被敌人

封锁了，粮食、布匹都搞不到了。最近，蒋介石又动员了江西、湖南、广东三个省的兵力来围剿我们。他们在四面修碉堡、造工事，一步步的往山下挪，打算把我们困死在井冈山。”毛政委讲到这里，望望大家，接着说：“我们红五军的同志也到了山上，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越多，力量越大。可是人越多，吃饭、穿衣、过冬也就越困难。敌人看准了这一点，想把我们井冈山这堆红火浇灭，我们怎么办呢？等死吗？”

“不！”战士们齐声喊着。

“对！我们不能等死，我们要烧出去；我们要想有衣穿，有饭吃，就要烧出去；我们要向赣南、闽西进军！闹革命，靠我毛委员一个人靠不住，要靠同志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才有饭吃，有衣穿。如果我们出去，到明年二月还不倒回来，我们就有希望，若是倒回来，那就没有意思。”

记得毛政委讲完了话，我们就离开井冈山了。当时，我心想：再见吧，井冈山，谁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得倒回来？谁知道我们这红旗还能打得多久？有敌人就战斗，死了，有别人接着干。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革命是革定了，谁也捉不住！

二、井冈山下第一仗

爬山、越岭、披星、戴月，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深更半夜不宿营，为了出敌不意突出封锁线，我们象飞一样地奔路。

下山的第二天，我们赶了一百九十里，到了宿营地，正是夜十二点。有些人没吃饭就睡了，人困马乏，睡得沉沉的，一觉到天亮。

我那时三十二岁，年轻好动，起得早。爬起来，向村外望了望，突然发现山上有敌人了，已经把我们二十八团围住了。军事哨也被包围在里边，还没发觉，可真麻烦了。

我马上回身，把黄排长唤醒。这时，敌人已经象鸭子一样，往山上冲下来，直对着我们二连的阵地。一边冲，一边喊："交枪吧！"我们二连的林连长，拿出驳壳枪就打，我们随在他的后面，迎着敌人就冲。

正冲过一道坑，突然，我们军部的冲锋号也吹起来。我向军部那边一看，可不得了，敌人把军部也给包围了，一排排的敌人，正奔向军部驻地。看到情况不好，我们也不要连排长的指挥了，转过头来，就直对着军部冲过去。

杀声震动着山谷，枪声象炒豆子一样的在耳边响着，子弹"秃鲁，秃鲁"地从身边穿过，打得碎土四溅，就象下雨一样。不管这些，我们还是往前冲，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把朱军长和毛政委救出来。

敌人看见我们这样猛地从他们屁股后面冲，就顾不得前边了，一面向两面撤，一面对我们放枪，一会就闪出来一条路。

朱军长和毛政委冲出来了。他们的传令兵也没有了，只是两个人提着枪，从缺口跑出来。看见他俩往那里退，我们就往那里冲，整整冲出去十几里路。我们便占领了一个山峰，然后把二连的红旗高高地插在山顶上。

朱军长和毛政委认得我们的旗子，便从山下奔上山来，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这次战斗中，我们二连的一个新兵班被敌人抓去了，朱军长的妻子也被俘了，后来听说在赣州英勇牺牲了。我们红军战士都咬牙切齿痛恨敌人。

三、大庾遇敌

没有谁天生下来就是一个红军战士。我也是一样，从一个农民暴动队的队员，到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是犯过毛

病，作过傻事，经过了一个过程的。

就拿对我们的朱军长和毛政委来说吧，虽然我爱他们，胜过爱自己。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为他们去拚命；可要是他们在当时不是象哄小孩子一样哄着我，管的太严了，也少不了要对他们发脾气。

记得那正是我们占领大庾的时候。在井冈山下受了损失，一路上翻山走小路，好容易摆脱了追击的敌人。朱军长和毛政委决定：在大庾休息几天，打一打土豪，筹一点款子，好补发伙食费和草鞋费。

接到通知，我们真是高兴得要死。休息，多难得啊！好久没有洗脸了，这回可以领到钱买条毛巾讲讲卫生。草鞋也破得不能穿了，赤脚在冬天爬山涉水，可实在有点不太舒服。这回补发了草鞋费，说不定还可以买双胶皮鞋啦。再说，我们红军战士每天只有三文钱的伙食费，还好久都没有发了，又可以吃点南瓜，改善一下生活了。当时，记得我们常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至于吃肉，那时还不敢去想它，免得谈起来流口水。

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打土豪了。到第二天，我们已经把几千银元，很多布匹送到军政治部了。看到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再想想身上穿的军衣，我们都急得不得了，要求快点发下去。可是政治部为了让每个战士多领一些，免得买不成什么东西，零花浪费掉，就坚持着慢往下发。

也巧，这天下午，敌新八军就来了。当时我们有些人正在政治部门口看胜利品，有的站在河边逗小孩玩，还有的正看老百姓在河里淘金沙。敌人的迫击炮弹已经落进了城里，我们才发觉。

我们二十八团马上集合，往上增援，可是已经迟了。敌人已经攻到了城边，机枪扫过来，炮弹轰过来。抵抗是不行了，

政治部的同志，只好把布匹全部甩掉。

大庾这一仗，我们红四军又受了很大损失。我们二连有个机炮排长挂彩了，伤了脚趾尖，走路很不方便。偏偏这时天又下起雨来，我扶着他深一脚浅一脚拖泥带水地走着。刚好，毛政委骑一匹大黄马过来了，他一看见我们就下了马，把我们的机炮排长扶上去了。

四、在瑞金城下

一九二九年的瑞金，是荒凉的，无名的。当我们第一次来到瑞金城下的时候，正是旧历腊月三十的早晨。

城内只有赖世忠手下的一小股地主武装，我们决定到瑞金城里去过年。

毛政委带着三十、三十一团两个团攻城，很快就冲进去了。朱军长带着我们二十八团在城外宝塔山底下警戒。我们二连刚派出警戒哨，不过几分钟，一股敌人漫山遍野地冲上来。

“叭！叭！”两声枪打着瑞金城的上空，通知了毛政委，跟着我们就向西北方向撤退了。

我们二连一班走在最后面打掩护。敌人一面追，一面打我们。有一次，追到我们跟前，干脆就拚开了刺刀，当时我们班有个小个子，是耒阳人，他打仗从来都不用子弹，只拿刺刀拚。这次，他刺死了一些敌人，可是他也被敌人刺死了。

我们退了三十里，敌人也追了三十里。三十团和三十一团虽然已经突出来了，我们二十八团都被敌人包围了。看情况，怎么也摆脱不了敌人，敌人太多了。

这时，朱军长就在路边集合了大家。他说：“同志们，我们愿意死啦？还是愿意活？”

“要死怎样？要活怎样？”大家七嘴八舌地问着。

朱军长看着大家，指指周围说："前面有敌人拦住我们，后面有敌人追击我们，我们还往那里去呢？要是贪生求活，那就等敌人来时交枪投降，屈膝求饶；要是愿意为人民去死，那就干一仗，把敌人消灭掉。"

我们一听朱军长这些话，马上勇气百倍，便举手大叫："我们愿意死！"

"好！"朱军长不慌不忙地对四面观察着。这时，敌人已经把我们包围得水泄不通。一群群的敌人，明晃的刺刀，从四面八方拥上前来，没有一点空隙。

"全团一个方向。"朱军长斩钉断铁地说："一营跟着我从中间突破，二、三营左右配合，全团上刺杀。"说完这些话，他不再下命令，带头向敌人反冲过去。

不知是那儿来的力气，我们当时真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象箭一样往前飞跑，敌人不明白我们突然来了个反冲锋，还以为中了我们的伏兵，吓得回头就跑。

想和我们红军比脚吗？那可是笑话，我们在冲出包围之后，就把这些逃跑的敌人赶上，一个营的枪支，四百多个敌人，全部被我们活捉了。一问俘虏，我们才知道，敌人是刘士毅的五个团，专门从赣州来消灭我们的。

消灭，吹牛皮容易得很，实际上还不知道谁消灭谁呢？

在旧历年三十晚上，我们二十八团和三十团，三十一团会合后，来到了隘前，这里离瑞金只有九十里路，群众怕红军，都仓仓皇皇跑上山去了，喊也喊不回来。

过年嘛，每家每户都丢下刚做好的糕粑，我们当时没有钱，都看着甜甜的糕粑，肚子就突然更叫得厉害了，没别的说，大家吃一顿吧。

一边吃，一边对部队提出要求，有的说："刘士毅的部队是豆腐做的，一打就烂"；有的说：反攻瑞金吧，我们计划好

好地在城里过个年，叫豆腐渣给破坏了，可太不值得。

建议提上去了，一会，我们的营长胡少海，就集合大家讲话："军部来了命令，明天反攻瑞金，大家已经分配好了，我们也要抢一条街……。"

听了这话，大家觉得蛮对头，便不再吵着要打瑞金了，接着朱军长就指挥我们，让挑担子的同志把东西都放在大道中间，作出休息的模样，要部队埋伏在树林里，他说："敌人一追过来，挑行李担子的马上就跑，把敌人诱到埋伏区，你们就冲出来捉活的。"

我一听，当时就想：刘士毅，这回你这五个团可是要报销罗！

一直等到下午，敌人也没来，我们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又不出发了，他们要在瑞金过大年。

在隘前，整整等了两天，我们在正月初三早上，就出发去找敌人了。从隘前，我们足走了十里路，下午到了大柏地，我们二十八团的前卫部队已经冲进了村，听说要在这里宿营，我们脱了衣服下池塘，想摸两条鱼改善下生活，突然后面响起了枪声，原来是敌人从瑞金出来了，和我们三十团接了火。

我在床上还盘算着说："这次进攻后，别的洋财咱不发，第一要找几双鞋袜穿，天太冷了……。"我这天睡得很晚，因为脚上草鞋烂了，担心明天打仗跑不得路，便挨门挨户去找鞋子，后来终于找到了一双布鞋，心里高兴得要死。要知道，那是一双半新的布鞋呢。正在这时又来了第二条命令，说明天不打瑞金，我马上就讲起怪话来："怎么怕死啦。"

"怕死就撤火好了，何必当红军？"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来。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吃饭，六点半集合，毛政委首先给大家讲话。他说："有的同志先想打城市，不让他打，他就说别

人怕死。”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大家，当时我心里想，怎么我心里的事他都晓得了呢？这时他接着说：“我看不见得，同志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打仗不是为了攻占那一个城市，也不是为了把敌人吓跑，我们是要把反动派一个个地消灭掉，不管他是豆腐的还是石头的。敌人全消灭了，城市是我们的，天下也是我们的了……。”

“陈茂，快上来！”黄排长喊着。

我穿了衣服，追上了部队，马上就和大家一起爬上了山。在山上我们和敌人对峙着过了一夜，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把我们淋得浑身湿透，山风一吹，大家禁不住的冷得牙齿打架。稀稀拉拉的枪声，和风雨交杂在一起，挺着风雨听着枪声，好容易盼到天明。

雨停了，满天的大雾笼罩着群山，一团团的白雾在我们的身边滚动着，对面都看不见人。这时消灭敌人的命令来了，要我们一营向左边摸过去，不许打枪，偷偷地摸到敌人的背后。

黄排长跟着我们，贴着山边往前摸到了敌人的师指挥部，把卫兵杀掉，我们一个猛冲，就进了敌人的房子，房子里敌人的军官都不在，我们回身就冲上了敌人的指挥阵地。

阵地上一阵慌乱，敌人四散而逃了，指挥所被我们冲垮了，一个师的敌人就被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一个小山坡上。

从早上到中午，敌刘士毅部独立第七师的五个团都被我们消灭了。

在瑞金城下，我们完成了最大的一次歼灭战。

五、广昌会知县，白水打土豪

当时，红军没有供给部，大家只好靠打土豪来供给自己，所以穿的衣服，不但是破破烂烂的，冬天的单衣换不下来，有

些同志军衣也是花花绿绿的，有灰色的破军装，有黑色的百姓衣服，还有的干脆穿女的花衣，花裤的，花鞋的，这样一个外表，对谁说是军队，谁也不相信。

当时，唯一能识别我们的是红旗行军，打仗的时候，每个连都有几面旗，我们永远在前面打着它，看见那上面的镰刀斧头，才知我们是红军。

可巧有一天，我们走到了广昌县城外，突然天上乌云四合，接着就落起雨来。为了爱护红旗我们就不约而同地把它卷起来，装进袋子里。

广昌县的知县，带着他的下属喽罗们，前举着青天白日旗，在城门口欢迎我们来了。

“鄙人是县知事，这人是财政厅长，这位是警察局长，这位是……。”

一听这家伙的自我介绍，我们才明白，原来他们把我们当成是反动派军队了，忍住笑，我们大模大样地进了城。

在城里，我们向这位县长，征收了几千块光洋，等我们打着红旗离开城的时候，可猜得出来他心里是多么难受，晚上将是怎样神色。

在广昌，我们每人领到一块光洋，可是，用着它买袜子就不够买鞋，买了鞋又不够买袜子，所以我们希望找一个地方打一打土豪。

白水镇比广昌还热闹，一家家的商店，摆满了山珍海味。刚过了年，商店的灯笼不及摘掉，红对联贴满在门口，倒有点心平气和，又好象欢迎我们的红四军。

我们住在一家大商店，我们把很多货物都装进了仓库里。这家还是个大地主，后院里装有大仓大仓的粮食，不少的布匹，还养着几十头猪。

我们正在召集穷人，想把他分个一干二净。军政治部来了

通知，各单位只许打土豪，不许分商店。我一听，很不满意地问：那么仓库里的东西可不可以分呢？当时我想，这次资本家一见到我们来，把什么吃的、穿的都搬进仓库里去了，只要仓库可以分，正好给他们一个教训。

可是政治部又指示说："商店的仓库和商店是一码事，也不许分。"我一听便更恼火了，便又提出个问题："那商人兼大地主，地主的那一部分可不可以分呢？"

政治部回答说："可以！"我们马上就分开了。这时政治部又派来检查我们，班长龙浦林就对来的人说："有什么可检查的？"大家马上你一言，我一语地开了火，"摆什么官架子！""我们饿着肚子革命已经不短了，你们大概不知道了吧！""不管政策不政策，叫我们打仗牺牲可以，叫我们在老百姓房子外面挨冻也可以，可叫资本家活着，叫我们饿死不行。"

我们红军战士，了解政策，执行纪律，也不是一开始就能作到的呢！

六、"红军哥哥，再来我家住"

宁都城，城大墙高，十分坚固，专门在宁都、兴国、信丰、瑞金这几县帮助地主收租的赖世忠，有三百多狗腿子守在城内。

为了给几县的农民除害，也为了开辟红区，我们朱军长和毛政委下了命令，集中红军，打开宁都城。

攻打了几天几夜，城还是没打开，大家都有些疲劳了。这时，朱军长和毛政委，又下了命令要每个单位准备二十个梯子。二十八团爬西城，三十团攻南城，三十一团打北城。坚决打开宁都，消灭人民恨之入骨的赖世忠。

晚上枪声停止了，黑暗里，一排排的人影，抬着梯子往城边上靠拢。我们二连组织的一个义勇排，刚把梯子往墙上一靠，敌人马上就发觉了，接着一排子弹扫下来。

棉花团子浇上了煤油，点着了就象火球一样，一个、二个、三个……在空中掉下来，手榴弹一直落在我们的身边，就在身前、身后爆炸起来。

攻了一夜，还是没有攻进去，我们连的义勇排已经牺牲了十几个同志，只剩下二十来人了。好容易把梯子架上城头，可是天已大亮了，上去也是白送死，只好撤下来。

我们第一排攻不上去不说，因为撤的晚了些，还被敌人的火力封锁住了撤退道路，只好守在城边一间石房里，天越亮，越撤不出来了。为了监视敌人，我们排长命令我们把对着城的墙壁掏几个枪眼。

"排长，你看。"我从掏通的枪眼经外一望，不禁高兴地叫起来。

原来的房子地势很高，差不多那枪眼已经平了城墙，如果从这瞄准敌人，保证压得他一个也抬不起头来。黄排长看了一下，马上派人冲过封锁的火力网，去报告了连部。

晚上，义勇排就从我们前边进城了。我们从房子里瞄准城头上的敌人，拚命地射击，敌人一枪也没有打着我们，红旗插上了城头。

三百多敌人被全部消灭了！消息传开，几个县的农民，对我们非常感激。

在宁都，我们得到了很多钱，便背着，提着，返回到隘前、大柏地。在我们的宣传下，农民都来领赔偿费了，我们又向他们赔礼道谦说："上次在这里打仗，给农民兄弟造成了很大损失，硬是对不起罗。"

农民们拉着我们的手，流着泪对我们伸出大拇指说："红

军倒底是红军，硬是红啊！”

在我们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出发，我们走出了很远，还看见他们在招手，喊着“红军哥哥，下次再来住我家。”

记得，在那以后，我们常说常想：群众纪律，可是真有意义呢！难怪毛政委给我们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硬是高明得很呢！

七、打死郭风鸣，红军进长汀

一九二九年二月，我们把赣南的敌人打得闻风丧胆之后，向闽西进军了。

四都镇，民商齐集，人声喧闹，大街上正在唱木偶剧。几十个收税的反动武装，一看我们不是他们的队伍，便跑上山去了。

一宿没行动，一宿也没合眼。敌人在山上不停地对街里打枪。第二天清早，我们刚吃罢早饭，郭风鸣三个团的敌人已经攻上来了，警戒哨和敌接了火，枪声大作。

打！一直到消灭光为止！军部下了命令。二十八团团长指挥我们一营向右边高山上前进，第二营往左边高山上前进，三营配合三十团和三十一团由正面反冲过去。

我们红军战士爬山，敌人也从那一面爬山。我们一气冲上了山头，往下一看，敌人才爬到半山腰。这些家伙们可真是脓包，一看我们占领了制高点，回头见我们不在包抄他们的后路，三个团可真齐心，马上就象受了惊的兔子一样，直冲着长汀方向逃走了。

我们追，敌人从来也跑不了这样快，可是，逃走象赛跑一样，不顾命的向前冲。我当时一边追，一边骂：真是不要脸

攻，我们不打你们，你们就捣乱，好象非打不可。现在打呀，你们没胆子，又跑。

一追追到长汀城外，敌人马上就钻进了工事。

这城边上，到处都是工事、壕沟、碉堡，一层层，一道道，把城包的象铁桶一般，再加上是七个团的敌人困守一城，当然就更不容易攻开。

在敌人阵地面前几十步远的地方，我们停住了脚步。我当时心想，原来是他们凑到一起找伴来了。好吧！我们更省事了。

那时，郭风鸣是军长，他不怕死，还亲自上战场鼓动情绪来了。我们听见了他在工事里喊："弟兄们，努力打吧，共匪来了不得了，抓住你们要杀头的……。"

一会，又听见一个声音喊着："郭军长，发偿给我们吧，那我们就给你打。"

听到这里，我们就猛冲过去。敌人有很多士兵跑散了，郭风鸣还在那里喊。我们冲上去，一枪打倒他，然后就领先越过壕沟，冲进城去。

大部分敌人都逃走了。我们红四军在长汀整整休息了二十多天。

这次可真是休息了，没有敌人来捣乱，也不用在外面淋雨受冻。打仗缴获了很多钱，郭风鸣的老婆来赎尸又交了几千光洋，我们每个人都领到很多东西。

从大革命失败以来，我们就参加了起义、暴动。两年来，我们从没有发过一文钱买烟吸，也没有发过一件衣服。这次，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套新军装、新绑带和新帽子，还领到了新挂包、新子弹袋和新草鞋，甚至还领到了一个新斗笠，真是一色新啊！穿上了这些，队伍在操场上一集合，终于有了军人样子，大家真是从心眼里往外高兴。

不过到底是农民起义的队伍，什么都没正规，脑子里还有

很多旧影响。过去打仗饭也没得吃，大家只希望不饿肚子就好了，这次在长汀，每人只发了十几块钱，连里做鱼做肉都不吃了，三五成群下小馆去。

“节省几个钱吧！以后留着买草鞋穿。”有一次朱军长见我们从小馆里出来，就劝说我们。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军集合在飞机场上，朱军长就讲话了：“同志们，我们红军拿钱不是发饷，是发零用钱，同志们拿到钱不要赌，不要嫖，也不要乱花。年轻的同志，不能作这件事，可是更不能耽误了工作。”

听见朱军长这样讲，大家都笑了，以后乱跑的现象就少了。

可是，当时我们还是常说：“我们留钱干什么，不知那天就打死。能寄回家养父母最好，不然就花光，免得打死了让敌人发我们的洋财。”

八、飞袭龙岩洲

已经是五月了，我们红四军还没有倒回井冈山。转战在赣南、闽西一带，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们不单是毛政委所说的那样，有了希望，革命的红火是越烧越旺了。在我们经过的、占领的地方，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支援红军。我们红四军也就越战越强越打越勇了。

五月末，我们到闽西龙岩城，宿营地隔城四十里，腾房子、烧开水，磨豆腐、送菜，农民们热火朝天的慰问着我们，同时就要求我们打龙岩洲。

一个老农民逢到红军便说：“去打吧！陈国辉这个土匪头子把我们害苦了，蒋介石又封了他的官，他就更无法无天啦！去打他吧！他带着三个师到广东去打陈济棠去了，你们现在一

去，正好把他的老窝拆掉啊！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命令：原地休息，子弹袋不准解，待命行动。第二天早晨，就听说朱军长派出的侦察员回来了，说城内果然只有几百个敌人，三挺水机关枪，架在城内街中心，军需处在洋楼子前面。

二十八团二营作前锋，我们一营紧跟在后面。一个跑步前进就是四十里，直冲到城门口。敌人还以为是神兵天降呢！一个敌人的哨兵，只来得及放了两枪警报，还没有来得及关城门，我们已经跟在他的后面冲进了城。

在街中心，一座洋楼正是军需处，门前有三挺水机关枪，一齐对着二营横扫，子弹象急风暴雨一样，打的泥土四溅，碎石横飞。二营的同志们牺牲了很多，只好撤下来。

这时二十八团团长来了，他对我们连长说："龙浦林！你们二连组织一个义勇队。"

龙连长派出我们第一排。我们排在小胡同里集合了，黄排长便对大家说："现在我们革命部队还没有兵工厂，没有地方造机枪，造子弹，我们对付敌人那三挺机枪不可能是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一把刺刀。今天我们不许放枪，免得耽误时间，反正不是他们杀死我们，就是我们杀死他们。"说完这话，他狠狠地下了命令："上刺刀！"端上白光闪闪的刺刀，我们真象猛虎下山一样，一股气就冲上去了。我当时想：反正你来不及都把我们弄躺下，只要有一个冲到了，那机枪就是我们的了。

敌人跑过了河，三营追下去了，我们一营接到搜索的命令。

在搜索时，我们特别注意找子弹，子弹在那时可真是宝贝啊！当我们搜索那座洋房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陈国辉的军需处，见着箱子就开，可是打开一箱是鸦片烟，又砍开一箱是银元，又砍开一箱是伪中国农民银行的要事，一点子弹也没有找到。

原来陈国辉由蒋介石那儿领来了三个师的三个月的军饷，公杂书，一个也没发，就等着我们红军来打他们呢！

九、官庄夜战

秋天到了。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带着一个班持枪走出了官庄。风顺着山沟吹过来，树叶敲打着我们的头，我一边走一边想，已经是十二点钟了，要是在家当老百姓，这时也许在作梦，当红军就是苦啊，当个副班长就更不容易，照顾这个，关心那个，深更半夜还得起来带班。

两个老百姓，看见敌人奔往官庄来了，他们就打着灯，抄近路来报告了。我们把他们送到营部，营长龙浦林就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谈起来了。我当时心里可急了，据老百姓说：敌人多得数都数不清，可我们呢，这次是一个营离开大队到官庄做地方工作。总共四个连，三连还派出去工作了，四连又是新兵连。

两点钟才吃罢饭，两点半钟我们营党代表曹仲略带上新兵连就往右边山上绕过去了。看样子他好象是要从侧面去袭击敌人。

龙营长带着我们从正面走。漆黑的夜，伸手不见掌，四周是死一样的静，我们都没说话，只是紧跟前面的人，一步不敢拉下的往前走。

黄排长带着两个人作尖兵，他们先登上了一个凉亭子的小山，没等我们，马上又下去了。

谁晓得，敌人正在这山下休息，一排子弹，喷着火舌横扫过来，我们英勇的黄排长当时就牺牲了，两个传令兵，也被打倒在地。

一听枪响，我们马上就在山坡上散开。我们未见排长回来，马上浑身象着了火一样，大家一声不响地安上刺刀，奔下山

去。

黑夜里，在山沟打遭遇战，谁也看不见对方在那里，敌人在山下架着机枪，对着山坡瞎打。我们一枪也没放，就冲到敌人堆里去了。

在人堆里，一场刺刀战在混乱中开始了，敌人摸着镰刀斧头的符号就打，我们摸到青天白日符号就刺，敌人在黑暗里发出一声声临死的嚎叫。

我们的副排长被一个敌人盯住了，他一边对我们副排长拚刺着，一边又喊过来两个敌人，三个打一个。副排长一边抵抗一边喊："这儿有敌人！"我们听出是他的声音，立刻摸过去，没等敌人认清我是那一边的，便打倒了他们两个。

拚了整整的几十分钟，敌人见到我们很猛，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便边打边退，一直退出了两里多路。

天亮了，东方现出了鱼肚色的颜色，穿过微微的白雾向前望去，突然间，我看见一支队伍从敌人的侧面包抄过来，一面喊，一面冲，这是我们新兵连迂回过来了。

号声、杀声响成了一片，敌人的四个团，马上就夹起尾巴跑掉了。

当我们打扫战场时，红日已经钻出了东山，照着敌人丢下的几百具尸首，在红日照耀着的山坡上，我们又牺牲了三个同志，谁说我们红军不是勇猛善战的？名不虚传啊！

十、在古田的回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我们到了古田。

从井冈山到古田，整整一年。这一年间，我们红四军打通了赣南、闽西，开辟了历史上最有名的中央苏区——红色政权。这一年，我们红四军也成长了。

在古田，我们党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开会之后，我们在学习毛政委的报告和大会决议时，我回想起几件事来。

记得那是在我们刚编进红四军二十八团的时候，我因为出操时，向后转慢了一点，挨了连长龙浦林两皮带。

记得我们是在打完了长汀之后，有一次回军到宁都，在那里我打死了敌人一个瞭望哨，得了一百发子弹。当排长、连长命令我分给大家时，我坚决不肯。最后，党代表找我谈了几次话，我才交了它。

又记得那是我们在打了很多胜仗之后，很多人就骄傲起来了，不耐烦作细致的群众工作，想打大城市。不打时就骂领导说："首长想把我们红军拖死，整天东跑西颠的。"

在检查的时候，我们在会上回想着这些，批判着这些。

在古田会议之后，我们红四军在政治上成熟了，缺点被迅速的克服了，优点被大大的发扬了，我们成了真正的优秀的红军战士。我们红四军，也成了常胜的部队。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三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

罗荣桓　谭震林等

中共井冈山党委宣传部编汇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 1/4　字数43万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江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7110·201　定价：1.43元

统一书号：7110·20

定　　价：1.43